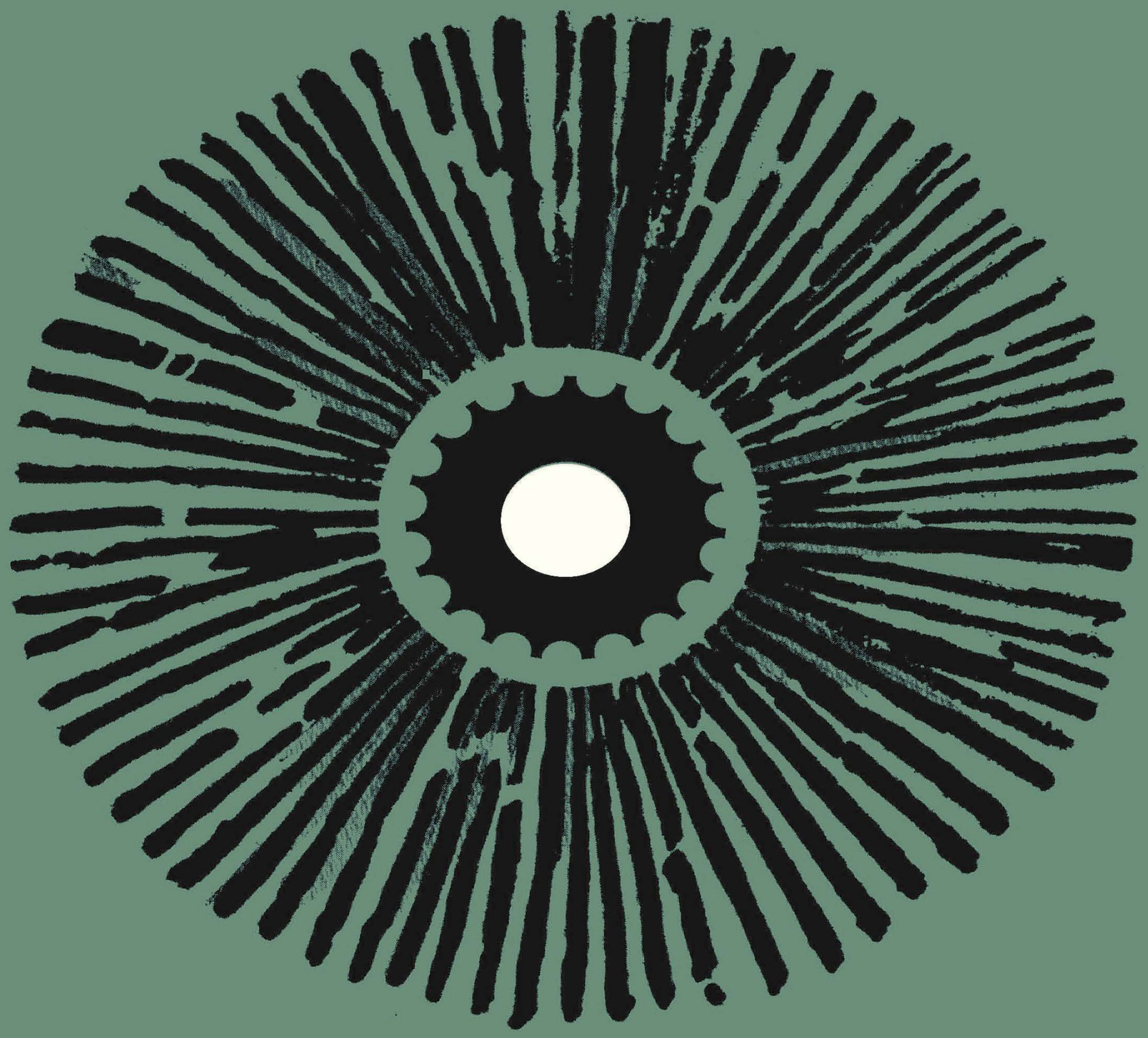
无价的珍珠

THE PRICELESS PEARL

鲁希叶·拉巴尼 著
史文韬 译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无价的珍珠

The Priceless Pearl

鲁希叶·拉巴尼　著

史文韬　译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无价的珍珠

阿博都-巴哈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部关于巴哈伊信仰之圣护守基·阿芬第的传记，是第一个专门介绍守基·阿芬第的中文译本。作者对圣护一生所历胜利与危殆、悲情与喜悦、为信仰所做的巨大贡献等做了详细的描述。本书结构清晰、重点明确、风格隽永、语言质朴而不失高雅，是认识、了解圣护的不二佳作。

编者对书中引用的相关圣言译文进行了替换统一，对少量文字做了修润。本书封面及版式皆沿用了英文原版的主体设计。

谨予说明。

编者

2012年11月

目　录

第 一 章　守基·阿芬第的童年和青年时期 1
第 二 章　阿博都-巴哈的逝世和后事 48
第 三 章　初任圣护 96
第 四 章　玛莎·鲁特和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 120
第 五 章　光影原理 138
第 六 章　守基·阿芬第的品格 153
第 七 章　情深似海 171
第 八 章　耳闻目睹 193
第 九 章　战争 214
第 十 章　圣护的著作 232
第十一章　巴哈伊国际机构的发展 268
第十二章　世界中心的崛起 303
第十三章　教务管理体制的建立 340
第十四章　思想指南 374
第十五章　执行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 420
第十六章　独一无二的使命周期 465

插图目录

图　一　那个孩子出生了 23
图　二　圣护的出生地 24
图　三　守基·阿芬第和他的妹妹 25
图　四　守基·阿芬第的早期学生时代 26
图　五　童年的守基·阿芬第 27
图　六　年轻的守基·阿芬第 28
图　七　守基·阿芬第绘制的地图 29
图　八　教长在祂房子的台阶上 30
图　九　教长的继任者 63
图　十　在贝鲁特的求学时光 64
图十一　身着东方长袍的守基·阿芬第 65
图十二　二十岁出头的守基·阿芬第 66
图十三　教长的秘书 67
图十四　俄国式茶炊 68
图十五　守基·阿芬第和哈里·兰德尔 69
图十六　成为圣护之前的守基·阿芬第 70
图十七　教长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 71
图十八　教长与一些卓著的巴哈伊在一起 72
图十九　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 105
图二十　守基·阿芬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 106
图二十一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139
图二十二　贝利奥尔学院的学生活动室 140
图二十三　守基·阿芬第和埃斯尔蒙特博士 141

图二十四　在曼彻斯特的一次集会 142
图二十五　信仰未来的领袖 143
图二十六　阿博都-巴哈之重担的继承者 144
图二十七　20世纪20年代初的守基·阿芬第 145
图二十八　首次飞行？ 146
图二十九　圣护成为了一名登山家 179
图 三 十　坚强不屈的登山迷 180
图三十一　守基·阿芬第和他的向导 181
图三十二　山地灾害 182
图三十三　于世界之巅 183
图三十四　莱茵河瀑布 184
图三十五　年轻的圣护在瑞士 185
图三十六　瑞士的因特拉肯 186
图三十七　初任圣护 249
图三十八　圣护与巴希叶·哈努姆 250
图三十九　圣护的波斯文手迹 251
图 四 十　阿博都-巴哈之家 252
图四十一　巴孛之墓 253
图四十二　守基·阿芬第的英文手迹 254
图四十三　至大圣叶的安息之地 255
图四十四　神圣之所 256
图四十五　返回海法后的圣护 315
图四十六　玛丽王后的手迹副本 316
图四十七　守基·阿芬第的手迹副本 317
图四十八　野外旅行 318
图四十九　圣护拍摄的一张照片 319
图 五 十　尼罗河上的渡船 320
图五十一　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 321
图五十二　非洲风景 322
图五十三　卡尔迈勒山的两幅图景 381

图五十四　圣护对卡尔迈勒山的开发 382
图五十五　卡尔迈勒山上的巴孛陵殿 383
图五十六　守基·阿芬第建起的建筑 384
图五十七　圣护仔细察看他的花园 385
图五十八　巴吉宅邸航拍图 386
图五十九　巴吉的巴哈欧拉陵殿 387
图 六 十　至圣陵殿 388
图六十一　圣护 469
图六十二　1957年的圣护 470
图六十三　圣护最后的信息 471
图六十四　圣护在伦敦的葬礼 472
图六十五　圣护灵柩 473
图六十六　刚建成的圣护墓地 474
图六十七　圣护在伦敦的墓地 475
图六十八　镀金雄鹰铜像 476

第一章　守基·阿芬第的童年和青年时期

> 敬意和赞美、祝福和荣耀归于这神圣而青嫩、翠绿而茂盛、由“孪生圣树”连理所生“圣树”之主枝，归于这颗出自那“两大澎湃之洋”的熠熠生辉、至为神奇且独一无二的无价珍珠。

在风雨交加的天空中，这些话犹如一道闪电，甚至是一束强烈的阳光，穿破了危险岁月的阴霾和风暴。闪耀在高处的是一个小男孩，他的外祖父是土耳其苏丹的一个囚犯。男孩住在土耳其叙利亚省的监狱之城阿卡。这些话被阿博都-巴哈写在了《阿博都-巴哈遗嘱》（*The Will And Testament of ‘Abdu’l-Bahá*）中的第一部分，说的便是祂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Shoghi Effendi）。

虽然这个孩子已经被外祖父任命为继任者，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巴哈欧拉在全世界不断增加的追随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在东方，嫡传制度被人们很好地理解，并作为一种正常的情况所接受。尽管巴哈欧拉本人已经证明了神秘而伟大的长嗣继承权制度的合理性，但毫无疑问，人们还是希望祂的儿子和继任者阿博都-巴哈也能这样做。在阿博都-巴哈离世的多年前，一些波斯信徒问道，在祂百年之后，有没有一个人是大家都应跟从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阿博都-巴哈写道：“……确知这是一个保守得很好的秘密。它甚至就像是一颗隐藏在贝壳中的宝石，注定会在未来显露。其光芒展现的时刻将会到来，其证据彰显的时刻将会到来，其秘密揭开的时刻将会到来。”

尤尼斯汗医生（Dr Yunis Khan）的日记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问题。1897年，他在阿卡与阿博都-巴哈一起度过了三个月。1900年时，他再次返回这里并居住了多年。我们从他的话中推测，可能是

因为教长有了一个外孙的消息传到了西方，美国的一位信徒写信问教长，《圣经》中曾提到在阿博都-巴哈之后“由孩童来引领它们”（《以赛亚书》11：6），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个真的、活着的孩子。在1897年的时候，尤尼斯·汗医生并不知道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阿博都-巴哈启示了如下一封书简：

上帝的女仆啊！

真确地，那个孩子已经出生并且存活着，奇妙的事情将出现在他的身上，你们将在未来得知。你们当注视着他，他有着最完美的外表，至高的才能，绝对的完美，高超的力量和无上的威力。他的面容将闪耀光彩，照亮世界所有的地平线；因此只要你们活着就不要忘记这些，因为岁月将留下他的痕迹。

向你致以问候和赞美。

阿博都-巴哈·阿巴斯

如此重要的一封书简不为东方所知，这可能是令人诧异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当时东西方的巴哈伊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书简通过抄录或口述在美国朋友中间流传。当尤尼斯·汗医生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时，破坏圣约的阴云正在教长头上越积越重。因此，对于这个朋友现在让他提给阿博都-巴哈的问题，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它被引出的背景；确实，他在日记中记述道：“阿博都-巴哈正走在宿店（在阿卡，许多信徒过去常住的建筑）前面；我走到祂身边告诉祂‘有人从美国给我写信说，他们听说教长祢说过，在祢之后出现的人已经降生，就在这个世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便有了答案，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等了一会儿后，祂的表情意味深长，暗暗兴奋，祂说道：‘是的，这是真的。’听到这一喜讯，我从内心里欣喜不已；我真切地感到圣约破坏者将一事无成，上帝的圣道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而这个世界将成为天国的写照。然而，当我们巴哈伊想象其中的含义时，我感到非常难以理解祂所说的‘出现’是什么意思，这在我心中是一个谜；我想寻求进一步的信息，于是我问祂：‘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启示？’如果祂的回答

是‘是’或者‘不是’，那么这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并带来更多的问题，但幸运的是，祂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足以使任何提问者安静下来，祂用更为明确的话说道：‘上帝之圣道的胜利就在他的手中！’”然后尤尼斯·汗继续讲述道，他把这一回答写信告诉了这位美国的信徒，但是多年来，他并没有向其他人诉说，甚至在自己心里也拒绝思考它的含义，也不会去问自己这个孩子是否在阿卡，或者是在其他的某个地方。他解释说，自己沉默的态度是因为巴哈欧拉在《圣约经》[①]中说道，所有的目光都必须聚集在圣约中心（阿博都-巴哈）身上；另外一个原因是，两代人以来，背叛、阴谋和挑拨一直烦扰着上帝之显示者的家族。

在日记的另外一部分中，尤尼斯·汗描述了他第一次看到教长外孙时的情景：“许多天以来，住在朝圣者招待所的人们乞求阿夫南（守基·阿芬第的父亲）让他们看一看守基·阿芬第。一天，这个四个月大的孩子突然被带到了比鲁尼（the biruni，教长的接待室）。信徒们高兴地来到他身边，我也享受到了这一特权。不过我告诉自己，‘只把他看作一个年幼的巴哈伊’。然而，我无法控制我的感情，因为一种内在的力量迫使我在他面前深深躬下身去。在那片刻间，这个婴儿的美令我深深着迷。我亲吻了他头上柔软的头发，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力量，只能说他就像我们在圣母玛利亚怀中看到的那个婴儿。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浮现在我眼前，之后我慢慢地把它忘记了。另外还有两次接触，我也有与此相同的感觉，一次是在他九岁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在他十一岁的时候。”

尤尼斯·汗还记录道，他从婴儿和幼年时期的守基·阿芬第身上，观察到了伟大灵性和独特品质，在得到这些内在和外在的证据之后，他无法再克制自己，并向一位年长且值得信赖的信徒吐露了他从阿博都-巴哈那里听到的关于一个孩子的话，即上帝之圣道的胜利就在这个孩子手中。

尽管如此，事实上，直到教长于1921年11月去世，人们从祂的

---

① Book of the Covenant，即《阿赫德经》（*Kitab-i-Ahd*）。——译者注

保险柜中找到并阅读了《阿博都-巴哈遗嘱》之时，巴哈伊世界中都没有人知道守基·阿芬第就是那颗“独特的珍珠”。而直到这颗珍珠在1957年被孕育它的海洋召回，人们才真正理解了阿博都-巴哈在祂身后留下了一颗多么独特、多么荣耀的珍珠。

在穆斯林历1314年，莱麦丹月的第二十七天，守基·阿芬第出生了。这一天是星期日，公历的1897年3月1日。这些日期是从守基·阿芬第童年时期一个笔记本中找到的，由他亲手写下。他是阿博都-巴哈的第一个外孙，也是祂孙辈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是阿博都-巴哈的长女迪亚伊·哈努姆（Díyá'íyyih Khánum）和她的丈夫米尔扎·哈迪·设拉子（Mírzá Hádí Shírází）（是一位阿夫南，巴孛的亲属）所生的孩子。他总是被外祖父称作“守基·阿芬第”；的确，阿博都-巴哈指示永远都要加上“阿芬第”的称谓，祂甚至告诉守基·阿芬第的父亲也必须这样称呼他，而不能仅仅称他为“守基”。“阿芬第”一词代表“阁下”或者“先生”，加在名字后面表示尊敬；同样，“哈努姆”一词被用于妇女姓名之后，意为“女士”或者“夫人”。

守基·阿芬第出生时，阿博都-巴哈和祂的家人仍然是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的囚犯；直到1908年土耳其青年革命爆发，政治犯随之获释，他们才从持续了四十多年的流亡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至少，对阿博都-巴哈和祂的妹妹而言是这样的。1897年时，他们都住在阿卜杜拉帕夏（Abdullah Pasha）的一座房子里，距离巨大的土耳其军事营地只有一箭之遥。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以及与祂们一道的信徒们于1868年踏进阿卡时，便被囚禁在这座军营里。1898年到1899年的冬天，来自西方世界的第一批朝圣者就是在这个家里拜访了教长，之后更多的西方早期信徒也来到了这里。他们乘坐一辆公用三驾马车，沿着海滩从海法行至阿卡，进入监狱之城坚固的城墙之内。几天时间里，他们作为阿博都-巴哈的客人，在这座房子中受到了欢迎。阿博都-巴哈就是从这座房子离开，并以自由之身来到十二英里外位于阿卡湾另一侧的海法居住的。要进入这座房子，先要走过一段长廊（其上是这座建筑的上层），然后来到一个围起来的小花园，花园里种着花、果树和一些

高高的棕榈树。在花园的一角，一排长长的台阶通往上面的一层。进到里面后是一个露天的庭院，有门通往各个房间，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可以进入其他房间。

阿博都-巴哈在五十三岁时有了第一个外孙，要想对此时教长内心的变化有所领会，我们必须记住，祂已经失去了不止一个儿子。其中，教长最钟爱、最完美的是侯赛因（Husayn），这是一个漂亮且十分庄重的小男孩，去世时只有几岁大。在阿博都-巴哈存活下来的四个女儿中，有三个女儿生下了十三个孩子，而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孩子正验证了一句谚语："虎父无犬子。"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孩子继承了他的父亲，而是说他有着上帝先知的血脉，并继承了外祖父阿博都-巴哈的高尚品格。此时阿博都-巴哈感情的深度从祂的一段话中得到了反映，祂在其中明确陈述道，"守基"这个名字——字面的意思为"盼望者"——是由上帝赐予这个外孙的：

> ……上帝啊！这是祢的仁慈之树上生发出的枝桠。通过祢的恩典和仁爱，他得以生长；通过祢的慷慨，他得以成为一枝青翠茂盛、花果繁炽的枝桠，令他的父母感到欢愉。愿赏赐给谁便赏赐给谁的神啊，请把"守基"这个名字赐给他，这样，他便会向往祢的王国，并升入那看不见的疆域。

守基·阿芬第自童年初期便开始表现出来的征象和他独特的天性，让他深深地进入了教长的心底。埃拉·古多尔·库珀（Ella Goodall Cooper）是最早的西方信徒之一，他曾在1899年3月见证了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之间的一次见面，并将其记了下来。的确，我们能拥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是十分幸运的：

> 一天……我同神圣之家的女士们一起在至大圣叶的房间里喝早茶，挚爱的教长坐在长沙发中祂最喜欢的角落里。透过右边的窗户，祂可以俯瞰护城墙，并看到城墙外的地中海。祂在忙着书写书简，房间里间杂着茶炊的气泡破裂声，分外安宁。一位年轻的女仆坐在茶炊前的地板上，正在冲茶。
>
> 过了一会儿，教长停下笔抬起头来，脸上带着微笑，并让

齐叶·哈努姆（Ziyyih Khanum）来吟诵一段祈祷文。她吟诵完后，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敞开着的门前，正对着阿博都-巴哈。他脱下鞋子，走进房间，目光集中在教长的脸上。阿博都-巴哈也用满怀爱意、欢迎的神情回应着他的注视，仿佛是在召唤这个小家伙到祂身边来。守基，这个美丽的小男孩，有着精雕细琢的脸庞和神情，以及富有吸引力的深色眼睛。他慢慢地走向长沙发，仿佛是被教长用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直到他静静地站在了教长的面前。他在那里停顿片刻，阿博都-巴哈并没有主动去拥抱他，而是非常平静地坐着，只是缓慢而令人难忘地点了两三下头，仿佛在说——“看到了吗？联接我们的纽带并非只是一般的骨肉之情，而是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当我们出神地看着他要怎么做时，这个小男孩弯下身去，捡起了阿博都-巴哈长袍的下摆，恭敬地用额头触碰着并亲吻了它，然后轻柔地把它放了回去，而他的目光一直没有从敬爱的教长的脸上移开。随后，他转身离去，蹦蹦跳跳地去玩耍了，就像所有普通的孩子一样……那时，他是阿博都-巴哈唯一的孙辈孩子……朝圣者们自然对他异常关注。

为了让自己对这个孩子的爱有一个限度，从而避免这爱的烈火使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位外祖父必然经历了巨大的挣扎。因为，教长诸多的敌人满怀仇恨和嫉妒，不断寻找祂的致命弱点，以期彻底击垮祂。许多次，当守基·阿芬第说起过去、说起阿博都-巴哈时，我不仅感受到了他对教长的爱是多么宽广、多么强烈，同时也感受到，他明白阿博都-巴哈之所以控制、隐藏了对自己的爱，目的是保护自己，保卫上帝之圣道不受敌人之害。

守基·阿芬第是一个矮小、细腻、非常活跃且淘气的孩子。幼年时的他不是十分强壮，这让他的母亲常常为他的健康而担忧。然而，长大之后的他却有着钢铁般的体格，再加上天性的非凡力量和意志力，他得以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每一处障碍。我们从他最早的照片上看到，他有着苍白的小脸、大大的眼睛和坚定、线条优美的下巴，在童年时期，这些特点使得他的脸呈现出了一个略长的心形。在这些最早的照片中，我们已然能够看到一种悲伤，一种惆怅，一

种对苦难挥之不去的偏爱，就像墙上的一个影子一样——一个孩子的身影被放大成了一个成人的身影。守基·阿芬第骨骼纤细（即使在他长大成人后也是如此），比他外祖父小时候要矮，他更像他的外曾祖父巴哈欧拉。他自己告诉我，阿博都-巴哈的妹妹至大圣叶有时会拉着他的双手说："这双手就像我父亲的手一样。"我把这双手称作知识之手——手指部分很宽，因而整个手掌呈方形，有力，总是在动，血管突出，姿势极富表现力，动作十分自信。在海法居住多年的阿梅莉亚·科林斯（Amelia Collins）总是对至大圣叶说，圣护生命中所有的苦难都反映在了那双手上。他的眼眸是一种让人迷惑的淡褐色，有的人不能像我一样经常直视它们，会以为它们是棕色或蓝色的。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清澈的淡褐色，有时会变成一种温暖、明亮的灰色。我从来没见过有谁的脸和眼睛像圣护的脸和眼睛一样富于表现力；感情和思维的每一种细微变化都反映在他的面容上，就像光影映照在水面上。当他对某事感到高兴、热心时，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睁大自己的眼睛，让虹膜的上部边缘露出来，而这总是让我联想到两轮美丽的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灿烂而闪耀。愤慨、生气和悲伤也都能同样清楚地从中反映出来，而且，他也有理由表现出生命中的这些感情，因为他的生命总是被问题和悲伤所困扰。他的脚与他的手一样美丽，都很小，足弓很高，同样给人以有力量的感觉。

说圣护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可能听起来有些不敬，但他自己告诉我，他确实是所有孩子中公认的"首恶"。这个小男孩精神高昂，热情勇敢，且充满了欢笑和智慧，在许多恶作剧中都是带头的那一个；每当有什么事在酝酿之中的时候，大家总会发现守基·阿芬第是幕后主使！这种旺盛的精力也常常是人们忧虑的来源，因为，在通往房子上面一层高高的楼梯上，他总会疯狂地跑上跑下，令楼下等着见教长的朝圣者惊惶不已。他高昂的精神是无法抑制的；而正是这个孩子身上的这种力量，使得长大成人后的他成为了巴哈欧拉力量的指挥者，他锲而不舍、坚定无畏，带领着这些力量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走向对整个地球的精神征服。圣护的这一特点有一个非常可靠的见证人，这便是阿博都-巴哈。为了让祂的小外孙

高兴，祂在一个用过的信封上写下了一个简短的句子：“守基·阿芬第是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他太能跑了！”

但是，我们切不可推断守基·阿芬第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孩子。东方的孩子们在摇篮之中便开始接受有关礼貌和举止的教育，而阿博都-巴哈的孩子们更是如此。巴哈欧拉的家族是皇族的后裔，除了祂责令务必做到有礼的神圣教义之外，家族的传统也确保了高贵的举止和礼仪，这使得守基·阿芬第从婴儿时期便显得与众不同。

在守基·阿芬第童年的日子里，按照习惯，他要在黎明时分起床，并在教长的房间中度过一天中的第一个小时。大家会在那里念祈祷文，整个家族要与教长一起吃早饭。孩子们恭敬地盘腿坐在地板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他们会遵从要求，为阿博都-巴哈吟诵，没有吵嚷或不得体的举止。早餐包括茶、全麦面包和山羊奶酪，茶在俄国铜质茶炊上冲好，盛放在小号的水晶玻璃杯中，又烫又甜。齐亚·巴格达迪医生（Dr. Zia Baghdadi）是神圣之家的一位至交，在回忆这些日子时，他记录道，守基·阿芬第总是第一个起床，并且总是非常守时——在受了一顿好好的教训之后。而教训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外祖父！

巴格达迪还将守基·阿芬第收到阿博都-巴哈第一封书简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他陈述道，守基·阿芬第只有五岁大的时候，他缠着教长给他写点什么，于是阿博都-巴哈亲手写下了这封感人的信，其中透露出许多信息：

祂是上帝！

我的守基啊，我没有时间说话，别打扰我！你说“写”——我就写了。还应做什么呢？对你来说，现在还不是读和写的时候，而是蹦蹦跳跳、吟诵“我的上帝”的时候，因此，记住天佑美尊的祈祷文，吟诵它们，让我可以听到它们，因为现在没有时间做其他任何事情。

看起来当这份美好的礼物送到这个孩子手中时，他就下定决心背下一些巴哈欧拉的祷文，并且会非常大声地吟诵它们，以至于整个社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当他的父母以及教长家族中的其他成

员向他抗议时，根据巴格达迪医生的记录，守基·阿芬第回答道："教长在信中让我吟诵，并让祂能够听到！我是在尽我所能！"而且，他每天都要以最大的嗓门吟诵好几个小时。最终他的父母乞求教长来阻止他，但教长却告诉他们不要打扰他。这是关于这个小男孩吟诵的一个方面。我们被告知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记住了一些感人的篇章，这些是阿博都-巴哈在巴哈欧拉升天后写下的，当他吟诵它们时，他那诚挚的小脸上会滚下泪珠。从另外一处记录中我们得知，一位当时住在教长家中的朋友请求教长为孩子们启示一篇祈祷文，祂照做了，而第一个记住并吟诵它的正是守基·阿芬第，他还会在朋友们的聚会中吟诵这篇祈祷文。

守基·阿芬第童年时的保姆以前常说，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教长会让一位在清真寺中吟诵的穆斯林信徒前来，用他那悦耳的声音，为这个孩子吟诵《古兰经》中卓越的诗文，每周至少一次。教长本人、圣护的母亲以及家族中许多其他成员都有着很好的嗓音。所有这些必然对守基·阿芬第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他一直吟诵，直到生命的终点。他有着洪亮、难以形容的嗓音，既不太高也不太低，非常清亮，说话时语调抑扬顿挫，不管是说英语还是说波斯语。对我而言，那声音总是有一种悲叹的特质，像一只鸽子在树枝上独自叫着。它常常让我非常伤心——在那自信、响亮的语调之下有一种悲伤、凄厉的东西。而奇怪的是，当他在巴孛陵殿吟诵完毕、进入教长陵殿背诵阿博都-巴哈的祈祷文，"卑微而含泪的我，向祢举起求助的双手……"，他的音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圣护的声音之中会出现一种温柔和渴望，这是我们在别处听不到的；而这个差别从未消失、不曾改变，一直都存在着。

在对这些早年时光的回忆中，一位巴哈伊曾写道：有一天，守基·阿芬第进入了教长的房间，拿起祂的笔试图写字。阿博都-巴哈把他拉到自己身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现在还不是写字的时候，现在是玩儿的时候，将来你会写很多。"不过，正是因为这个孩子对学习的渴望，教长的家中为孩子们成立了学习班，上课的老师是一位年长的波斯信徒。我知道在他童年的某段时间，很可能是他还居住在阿卡的时候，有一位意大利人给守基·阿芬第和孙

辈的其他孩子们讲过课。她是一位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女士。在我结婚后不久，她便前来拜访，她扮演着家庭教员或老师的角色。

尽管守基·阿芬第生命中最初的日子是在监狱之城阿卡度过的，被围困在护城河和城墙之内，大门有哨兵把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四处走动的机会。他经常去那些住在城内的巴哈伊家里，去朝圣者居住的宿店，去里兹万花园和巴吉宅邸。在很多次这样的外出中，他都是外祖父的开心伙伴。他有时会在巴吉宅邸中过夜，那所房子现在被用作朝圣者招待所；阿博都-巴哈会亲自来把他裹进被窝，说道："我需要他。"他还被带到这片地区唯一的大城市贝鲁特，这是阿博都-巴哈家族中成员常常拜访的地方。巴格达迪医生对这样的一次拜访有过描述。那时的守基·阿芬第是个五六岁的孩子，由他的父母、至大圣叶以及其他一些家族成员陪同。那一次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巴格达迪医生的房间中度过，看他医书中的图片，问一些问题。守基·阿芬第似乎想要看到某个被解剖的实物，而不仅仅满足于图片。这种对知识的热情（难怪他的眼睛那么大，目光坚定且充满智慧）完全征服了这个年轻的医学学生，他为守基·阿芬第提供了一个牺牲品——一只大野猫，并在守基·阿芬第面前把这只猫解剖了。开枪打死这只猫的是他的一位阿姨和仆人。他们屏息凝神地观看着。这个过程结束后，正当巴格达迪医生自问，这样一个小孩如何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他惊异地听到守基·阿芬第简明扼要地复述了他在解剖过程中叙述的要点。"我对自己说，"巴格达迪医生接着写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而的确是一位珍贵、可爱的天使！"1916年时，由于守基·阿芬第的一门课是动物学，他肯定回忆起了当初的第一堂早期解剖学课程。巴格达迪医生继续叙述道，在这种强大的学习能力之外，守基·阿芬第有一颗非常仁爱的心和一种极为温和的天性，如果他冒犯了任何一位玩伴——虽然他从不会这样做，除非这个孩子作弊或搞阴谋——他会拥抱这个孩子，在没有看到他高兴之前是不会上床睡觉的；他总是劝他的小伙伴们要在睡觉前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

守基·阿芬第有时会做一些生动且意味深长的梦，既有令人高

兴的，也有令人不快的。据说，婴儿时期的守基·阿芬第有天晚上哭泣着醒来，教长让保姆把他带到自己身边，这样祂就可以安慰他了，教长对妹妹至大圣叶说："看，他已经在做梦了！"

关于非巴哈伊人士如何看待阿博都-巴哈的这个外孙，我们没有太多的记录。不过，这其中的一段值得在这里作长篇的援引。这是一个名叫J. 法尔舍尔（J. Fallscheer）的德国女医生的回忆录。她住在海法，照料着阿博都-巴哈家族中的女士们。我们应该记住，她颇具趣味的叙述是在这些事件发生至少十一年后记录下来的，不过却有着巨大的意义：

> 1910年8月6日，当我结束在卡尔迈勒山上的一次出诊、回到我的房子时，我们的老仆人哈德奇尔（Hadtschile）对我说："刚才，阿巴斯·埃芬迪的一个仆人来过，说医生您要在三点钟去教长家女士们的住处，因为有位女仆手指受了重伤。"我不太喜欢在星期六的下午这么早就出门拜访，但我知道如果不是事态紧急，教长是绝不会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来叫我的，因此我决定准时前往……当一切结束时，伤者的手指、手和胳膊都缠上了绷带，并挂上了吊带。巴希叶·哈努姆（Bahiyyih Khanum）让那个小伤者去床上躺下了，并邀请我和她以及家族中的女士们一起用些茶点。我们正喝着咖啡，用土耳其语（这对我来说比阿拉伯语要容易些）讲话的时候，一位仆人过来说道："阿巴斯·埃芬迪想请医生您在离开之前到客厅找祂"……教长让我向祂报告那个年轻女孩的手指怎样了，是否有患败血症的危险。我给了祂一个放心的答复。这时祂的女婿（阿巴斯·埃芬迪长女的丈夫）走进房间，明显是来向教长道别的。起初我没注意到，在这个高大威严的男人身后，他的长子守基·阿芬第走进了房间，用一个东方式的吻手礼问候了他年高德劭的外祖父。之前我已经在不少场合与他打过照面。巴希叶·哈努姆最近告诉我，这个十二岁左右的小男孩是先知家里年纪最长的男性直系后裔，并注定要成为教长唯一的继承

人和代表（瓦齐尔[1]）。当阿巴斯·埃芬迪用波斯语跟站在祂面前的阿布·守基（守基·阿芬第的父亲）说事时，这个外孙礼貌地问候了我们并亲吻了他姑姥的手，之后，他以一种最为恭敬的姿态站在靠近门的地方。这时，几位波斯男子走进了房间，他们问候、道别，进进出出，大概有一刻钟的时间。巴希叶·哈努姆和我退到了右边靠近窗户的地方，压低声音，用土耳其语继续着我们的谈话。不过，我的目光一直没有从阿巴斯·埃芬迪的这个还十分年轻的外孙身上移开。他身着欧式的夏季衣服，下半身是短裤，却穿着一双齐膝的袜子，上半身是一件短外套。从个头和身材来看，人们可能会觉得他有十三四岁……在那张仍然稚气的脸上，那双已然成熟、忧郁的深色眼睛霎时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个男孩一直待在那里，并保持着恭顺的姿态。在他的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的那个男士与教长道别后，他正要出去时，父亲对他轻声说了些什么。于是这个年轻人以一种缓慢、慎重的方式，像个大人一样，走到他挚爱的外祖父身旁，等待着外祖父和他说话，并用波斯语做了清楚的回答，然后在得到外祖父的允许后带着笑容离开了，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是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恭敬地亲吻了外祖父的手。这个年轻人在离开房间时向后走的方式，以及在外祖父蓝色、神奇的目光中，他那一刻也没有游移、忠实的深色眼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巴斯·埃芬迪起身向我们走来，我们立刻站了起来，但教长力劝我们重新坐下来，祂自己也轻松地坐在了一个靠近我们的凳子上。像往常一样，我们在静默中等待着教长同我们讲话，祂也很快开了口："我的女儿，"祂开始说道，"你觉得我未来的继任者怎么样？""教长，如果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讲，我必须说，这个男孩脸上的深色双眼是一个受难者的双眼，他将承受太多的苦难！"教长沉思着把目光投向我们身

① Vazir：有时作vizir，是同一个波斯词的音译，原意是一个国王的大臣。该词下文还有出现。这里的意思如文中所示，作"代表"讲。——译者注

后的远方，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祂又重新注视着我们，说道："我外孙的双眼不是一个开拓者、一个战斗者或是一个获胜者的双眼，但在他的眼睛中，我们能看到深深的忠诚、不屈和认真。而且，我的女儿，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继承这沉重的遗产，成为我的瓦齐尔？"祂更多的是在看着祂亲爱的妹妹而不是我，仿佛已经忘了我的存在，祂没有等待我的回答，继续说道："至大圣美巴哈欧拉——愿祂的话语得福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选择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作为祂的继承者，不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出生的，而是因为祂内在的眼睛已经在我的额上辨察出了上帝之印。"

"在升入永恒之光之前，神圣的显圣者提醒我，在不考虑长子继承制以及年龄的情况下，我也必须在儿子们和孙辈的孩子们中间观察，谁是上帝意下的继承者。我的儿子们在他们最年幼的时候升入了永恒；在我的直系亲属中，在我的亲戚中，只有守基·阿芬第的眼睛深处有一种能成大器的影子。"说完又是长长的停顿，之后教长又转向我说，"目前，英帝国是最强大的，并且仍然在扩张之中，它的语言是一门世界语。我未来的瓦齐尔应该先在巴勒斯坦这里获得基本的东方语言知识和东方的智慧，然后到英格兰本土接受教育，为他的重任进行准备工作。"于是我大胆插话道："西方的教育、英语的训练是否会重塑他的天性，把他多才多艺的心智限制于知识主义的僵硬枷锁下，在教条和常规之中压抑他东方的非理性和直觉，那样的话，他也就不会再成为全能者之仆人，而只是西方机会主义和浅薄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奴隶？"我说完之后，空气如同凝结了一般，是一阵长长的停顿！然后阿巴斯·埃芬迪（阿博都-巴哈）站起身来，用一种有力、严肃的声音说道："我并不是把我的继任者交给英国人教育，我把他献给全能者。上帝的眼睛也会在牛津看护着我的孩子——天意自有安排！"

没有道别，没有再多说一句话，教长离开了房间。

我向巴希叶·哈努姆道了别，正往外走时，看见教长站在花园里，正看着一棵结满果实的无花果树，明显地深陷于思索

之中。

1921 年 11 月，居住在卢加诺时，我获悉阿巴斯·埃芬迪（阿博都 - 巴哈）在海法的过世，我的思绪和记忆回到了遥远的 1910 年 8 月的那一刻，我希望继任者——守基·阿芬第，以及所有美好的东西——有天意的眷顾。

多年后，当阿博都-巴哈委托祂的朋友拉明顿勋爵（一位受人尊敬的苏格兰贵族，深深敬重并钦佩教长）来帮助守基·阿芬第被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录取时，祂可能向法尔舍尔医生提起过这样一个计划，当然，我们并没有确凿的依据来考证她的话。

阿博都-巴哈刚刚搬进位于海法的新家（在1907年2月或者更早些时候，这所房子由祂的家族成员使用）时，各个房间被祂所有的家族成员占用着；最终，祂两个女儿的家庭搬到了她们自己的家中（离教长家很近），但这所房子总是挤满了亲戚、孩子、仆人、朝圣者以及客人。几年之后，守基·阿芬第从学校回到家中，他住在紧挨阿博都-巴哈的一个小房间里。由于这里只是在阿博都-巴哈去世前不久才安装了电缆，并且直到祂升天之后才接通，所以家中一直使用的是油灯。教长很多次都看到守基·阿芬第的灯光在夜里很晚的时候还亮着，祂会说："够了！够了！去睡觉吧！"而守基·阿芬第的这种认真令祂大为高兴。圣护告诉我，有一次他正在客厅工作，教长来到他身边，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的花园，背对着守基·阿芬第；另外一个房间里传来了家人谈笑的声音。阿博都-巴哈对守基·阿芬第说："我不想让你像他们那样——世俗。"守基·阿芬第告诉我，他记得还有一次，教长对祂的妻子说道："看他的眼睛，像水一般清澈。"守基·阿芬第还记得，有一回教长——很明显，祂一直站在一扇对着正门的窗户下——观察到守基·阿芬第轻快地走了进来并上了台阶。祂派人请他过来，并告诉他："不要那样走路，要走得端庄！"那时守基·阿芬第已经长大，正以多重身份服务着教长。在去英格兰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穿着长长的袍子，系着一条腰带或腰封，头上戴一顶菲斯帽。我们常常可以从照片中看到，他把帽子戴得很靠后，露出一卷深棕色、

接近黑色的头发，额头宽阔舒展，脸部饱满，美丽、坚定的下巴和让人误以为是黑色的大眼睛。他的嘴巴有一个独特之处：下嘴唇看起来几乎就是上嘴唇的压痕，颜色非常红润。他在童年之后总是留着一撮整齐的小胡子。

在教长踏上去西方的旅程之前，这个家族保留着更为东方式的习惯。在祂回来之后，他们慢慢地采用了一些西方的习俗。我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内容："守基·阿芬第刚刚向我生动地描述了教长在世时的午餐时间安排。他说教长会在上午十一点到大厅中问艾姆·戈利（Am Quli），'Saat chaneh（几点了）？'艾姆·戈利的职责是报告时间。女仆们会在古老的茶室的地板上铺一块布，并把走廊里的一张矮腿的大圆桌移进来；她们把桌子放在布上，再把一些老式的金属盘子（很可能是搪瓷的）和勺子放在桌子上（这些餐具从来不够分给每个人，只是随便分一下），她们还会把面包散放在桌子上，并在最好的位置放一些纸巾……教长会走进房间里坐下来，对在那里的每一个人（祂的女婿们，祂的叔叔，祂的堂兄，等等）喊道，'biya benshnid（来坐下）'。而祂有时会用勺子吃，有时会用手吃。祂有时还会亲自给其他人盛米饭等。当祂吃到大概一半时，哈努姆（至大圣叶）会从厨房进来，在走廊的门口换上拖鞋……并且会带着一盘零食坐在教长的旁边；她的位置总是会为她保留着。慢慢地，其他的一些人会进来，女客人，孩子们，教长的女儿们，等等。（教长和第一批用餐的男人们会从房间离开。）守基·阿芬第说，随后这里会一片嘈杂，孩子们哭喊着，每个人都在说话，十分混乱。他说，孙辈的孩子们（包括他自己）常常会等待着哈努姆给的满嘴的食物，因为那是最好吃的。他们管这叫'哈努姆的满口香'；圣护经常能吃到，因为他是哈努姆最喜欢的一个！家族中的女士们吃完后，女仆们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教长从西方回来后，更多西方的用餐方式被逐渐引进，其中有瓷器、椅子、餐具等。"

不过，让我们回到阿卡，看一看守基·阿芬第更早些年间的日子。毫无疑问，阿博都-巴哈会尽可能地保证守基·阿芬第有一个幸福、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在土耳其的苏丹刚刚被推翻后

的那些日子里，他挚爱的外祖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想对一个如此敏感、聪慧的孩子隐瞒这一事实肯定是不可能的。土耳其当局数次造访，前来调查圣约破坏者对阿博都-巴哈的恶毒指控；这些人还不断密谋杀害教长；信徒们面临着分离和再次被流放至利比亚的威胁——这些必然在教长的家族中制造了一种焦虑和极度紧张的气氛，守基·阿芬第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是一段暴力的破坏圣约的日子；当初信徒团体跟随巴哈欧拉被一同流放，许多忠实的人们满怀期待，可是现在这个团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顽疾的侵害，有的人公开加入了对阿博都-巴哈不忠的异母弟弟——穆罕默德·阿里（Muḥammad ʻAlí）的行列，有的则公然对他表示支持。正是在这些年间，阿博都-巴哈告诉守基·阿芬第千万不要在任何巴哈伊家中喝咖啡。祂害怕这个自己珍爱的外孙被人下毒！这是守基·阿芬第亲口告诉我的，当我们想到他当时还只是个年幼的孩子时，我们就会意识到，那段日子里他们所有人周围的危险有多大。

也许是由于这种不断恶化的情形，阿博都-巴哈把守基·阿芬第送去海法（当时已经有一些信徒在那里定居），和他的保姆一起居住；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我不清楚，不过那时他仍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他学的第一门外语是法语，尽管他不太愿意正式地说法语，因为他觉得自己疏于使用而说得并不流利，但至少在我听来，他对法语的掌握非常好，用法语做算术时快如闪电。到1907年时，他与这位从婴儿时期开始便一直陪伴着他的名叫哈贾尔·哈通（Hajar Khátún）的保姆一起住在阿博都-巴哈新修建的房子里。这座新建的房子成了教长最后的家，后来又成了圣护的家。就是在这里，守基·阿芬第做了一个意义非凡的梦，他把这个梦告诉了我，而且我把它记了下来。他说在他九岁或者十岁的时候，他与保姆住在这座房子里，当时他在海法上学。在梦中，他和另外一个孩子——他的一个阿拉伯同学——在阿卡那座房子的一个房间里（阿博都-巴哈以前常在那个房间里接待客人，守基·阿芬第在那里出生，教长此时正住在那里）。巴孛走进了房间，随后一个手持左轮手枪的人出现并向巴孛开枪；然后他告诉守基·阿芬第：“现在轮到你了。”并开始在房间里追着他向他开枪。这时守基·阿芬第醒了。他把这个

梦告诉了保姆，保姆让他把这个梦说给米尔扎·阿萨杜拉（Mirza Asadullah），并让阿萨杜拉告诉教长。米尔扎·阿萨杜拉把这个梦写了下来，送到了教长那里。作为答复，教长为守基·阿芬第启示了下面这封书简。守基·阿芬第说，奇怪的是，此时阿博都-巴哈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并写下了自己的一份遗嘱，在其中祂指定守基·阿芬第为圣护。

祂是上帝

我的守基：

这是一个很好的梦。放心，来到崇高者尊前——愿我的灵魂为祂而牺牲——是接受上帝恩典、获得祂至大仁爱和无上恩惠的证明。这一点对梦中其余的部分来说也是对的。我希望你能表现出阿卜哈之美的迸发，在信仰和知识上与日俱进。晚上祈祷、恳求，白天按照要求做事。

阿博都-巴哈

守基·阿芬第格外喜欢这个保姆，阿博都-巴哈在一封给妹妹的信中提到过她，祂在其中这样说道："守基·阿芬第，亲吻美妙花园中的花儿吧，并向哈贾尔·哈通传达问候。"我在日记中记录道："今天晚上，守基·阿芬第告诉我，当把他带大的保姆在亚历山大勒塔去世时他是多么伤心。他说，保姆年老后，他的母亲决心不再用她，他自己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对此深为怨恨，尽管他只有九岁或十岁的样子。当她的死讯传来时，守基·阿芬第正在父亲的花园卡尔姆（Carm）中。他说他跑进暗处里，为她哭泣——那时他大约十二岁。他对保姆的挚爱是家人们常常谈起的事。"

守基·阿芬第就读的是海法最好的学校——由耶稣会会士管理的兄弟学院（Collège des Frères）。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很不开心。确实，我从他那里获知，他在学校或大学里从来都没有真正开心过。尽管他天性愉悦，但他的敏感和他的背景——这种背景在每个方面都与其他人如此相异——只能把他隔离开来，为他带来诸多的痛心；的确，像他这样的人，他们开放、纯洁的心灵、敏捷的头脑以及亲切的天性加在一起似乎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远多于大多数

人的打击和苦难。由于他在这所学校并不开心，阿博都-巴哈决定把他送到贝鲁特，在那里，他作为一名寄宿生加入了另外一所天主教学校，同样还是不开心。家人在海法获知了此事，便派了一位值得信任的巴哈伊妇女到贝鲁特给守基·阿芬第租了一所房子，并且照料、服侍着他。不久后这位妇女便在给守基·阿芬第父亲的信中说，他在学校里很不开心，有时接连几天也不愿意去上学，并且日渐消瘦、衰弱。他的父亲把这封信给阿博都-巴哈看了。教长随后安排守基·阿芬第进入了贝鲁特的叙利亚新教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贝鲁特美国学院。该学院包含一所学校和一所大学。当圣护完成了相当于高中的学习后便进入了这所学院。守基·阿芬第在海法的家中度假，尽可能多地在他崇拜的并以之为终身服务目标的外祖父身边度过。守基·阿芬第学习的所有课程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自己适于为教长服务，为他做口译，并把祂的信件翻译成英文。

守基·阿芬第告诉我，在海法学习的早年间，他让教长为他取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样他就不会再与他的堂亲们混淆了，因为他们都被称作阿夫南。于是教长便给了他“拉巴尼”这样一个姓氏，意为“神赐的”，他的兄弟姐妹也使用这个姓。当时的人们没有姓，他们以自己的城市、长子或家族中显赫人物的名字被人称呼。

要追溯这些年间的事件发生的确切经过是非常困难的。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外祖父身上，尽管人们也非常爱戴和尊敬这个长外孙，但当太阳闪耀着光芒时，油灯也就被人们忽略了！一些朝圣者在描述中提到了与“守基·阿夫南”的见面，例如第一位美国信徒，于1907年拜访教长的桑顿·蔡斯（Thornton Chase）。事实上，蔡斯发表了一张守基·阿芬第的照片，他身上的衣服一定是他当时的惯常服饰，短裤，深色的长袜，头戴菲斯帽，身穿外套，巨大的水手领罩在肩膀上。但目前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填补所有空白。当阿博都-巴哈历史性地拜访欧洲和美国时，守基·阿芬第只有十三岁，即便是那些在这次西方之旅中陪伴着阿博都-巴哈、细心写日记的人，也没想到过多地去记录这样一个孩子的活动。

从漫长的囚禁中被释放并在海法永久定居下来之后，阿博都-

巴哈便立刻开始仔细计划这次旅程。于1910年发表在美国《巴哈伊新闻》（*Bahá'í News*）的一篇报道称：“大家要求对阿博都-巴哈前往埃及进行报道。阿博都-巴哈没有通知任何人祂要离开海法……在两天之内，祂把M．N．、守基·阿芬第、K．和这位仆人召集到了祂的面前。”根据一位巴哈伊的回忆，在9月的一个下午，阿博都-巴哈的船启航前往埃及的塞得港（Port Said）。就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极度伤心的守基·阿芬第孤零零地坐在教长房前的台阶上，说道：“教长现在在船上。祂把我留下了，但这其中一定有某种智慧！”或者类似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慈爱的教长非常了解外孙心中所想的，祂立刻派人去把这个孩子接来，以减轻与自己的第一次重大分离给他带来的打击；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找到其他关于此事的资料。我们知道教长在塞得港停留了大约一个月，随后去了亚历山大（Alexandria），而没有按祂最初的打算去欧洲。我们不知道那时守基·阿芬第与祂在埃及待了多长时间，但是由于学校要在10月初开学，我们推测他返回了叙利亚。我们知道的是，1911年4月，在亚历山大的郊区雷姆莱（Ramleh），守基·阿芬第又一次与教长在一起了，因为一位从美国前来拜访的巴哈伊路易斯·格雷戈里（Louis Gregory）（圣道的第一位黑人圣辅）提到，他在4月16日见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外孙“守基”——一个美丽的男孩，并且说，“守基”对朝圣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那一年的8月，教长启程，踏上了祂的第一次欧洲拜访之旅，并于1911年12月返回。我们不知道这次祂过了多久才又派人把外孙接来，但我们知道，也许是受祂自己对欧洲印象的影响，也许是因为祂对守基·阿芬第深深的想念，祂现在有了一个计划，这便是要带着守基·阿芬第一起去美国。

圣护本人告诉我，教长为他定做了长袍，两条头巾，一条绿色的，一条与教长本人的一样是白色的，这是守基·阿芬第在西方要穿戴的；他说，当这些东西被送来，他穿上给阿博都-巴哈看时，教长的眼睛中闪烁着自豪与喜悦。与阿博都-巴哈一起去西方的这次旅程对守基·阿芬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在阿博都-巴哈妻子的外甥阿明·法里德医生（Dr Amin Fareed）的阴

谋下，他却没有去成。阿明·法里德后来成为了一名背信弃义、卑鄙无耻的圣约破坏者，给教长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据守基·阿芬第说，当教长最终于1913年12月5日返回海法的家中时，祂立刻走进妻子的房间坐了下来，用虚弱的声音——同时打了一个手势——说道："法里德医生让我身陷绝境！"守基·阿芬第的心里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正是因为法里德，他才没能踏上这次历史性的旅程。

1912年3月25日，阿博都-巴哈、守基·阿芬第以及各位秘书和仆人一道，乘坐白星航运的S. S. 塞德里克号轮船（S. S. Cedric）从亚历山大启程前往欧洲。当船在那不勒斯进港后，意大利的卫生督察员宣称一位秘书、一位仆人以及守基·阿芬第的眼睛染病，并命令他们返回中东。米尔扎·马哈茂德（Mirza Mahmud）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这些事件，他说，尽管阿博都-巴哈、随行人员以及美国的朋友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这三人还是被拒绝登陆，并且，官员们宣称，即使他们允许这三人随行，美国的卫生当局也还是会将他们遣回。阿博都-巴哈花去一整天的时间用尽办法以改变这一决定，但是到了晚上，在伤感的告别后，祂被迫登上轮船，前往美国。我们从那天晚上祂向随行人员所讲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祂不相信守基·阿芬第由于这样一个捏造的借口被遣回了："这些意大利人认为我们是土耳其人，并且向上面做了报告。他们阻止了我们中的三个。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厨师，这不重要。但是这个孩子守基·阿芬第，他是无助的，他们为什么要对他如此苛刻？他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恶劣地对待了我们，而我却总是给予他们的团体以支持和帮助，无论是在亚历山大还是在海法……"

守基·阿芬第告诉我，他的眼睛没什么问题（他的眼睛一直都很健康），但法里德医生却找出各种各样的论据来支持意大利医生的话，坚持向阿博都-巴哈要求把他送回来。守基·阿芬第把整件事情归因于法里德对事态的干预，这是他无穷的野心和东方家族内部无休止的阴谋的一次典型体现。我们很容易想象，对于十五岁的男孩来说，在即将开启生命中第一次伟大的历险时，经历这样一件事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悲伤。而对于守基·阿芬第就更是如此，他是如此依恋外祖父，在那个长途航行还相对罕见且非同寻常的年代，乘

坐大船去往西方的伟大行程又令他如此兴奋！他总是伤心地记着这件事，但是，他却总是对整个生命中不断遭受的打击保持着一种令人感动的顺从态度。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说成是上帝的意愿——但是有谁知道，在人类的邪恶阴谋下，上帝计划的下一步常常进入了另外一条不那么完美的路径？毫无疑问，教长也因为这件事而深感悲痛，但又不得不把感情藏在心里，以免提早泄露关于守基·阿芬第的未来秘密，在他人的恶意和嫉妒之中，又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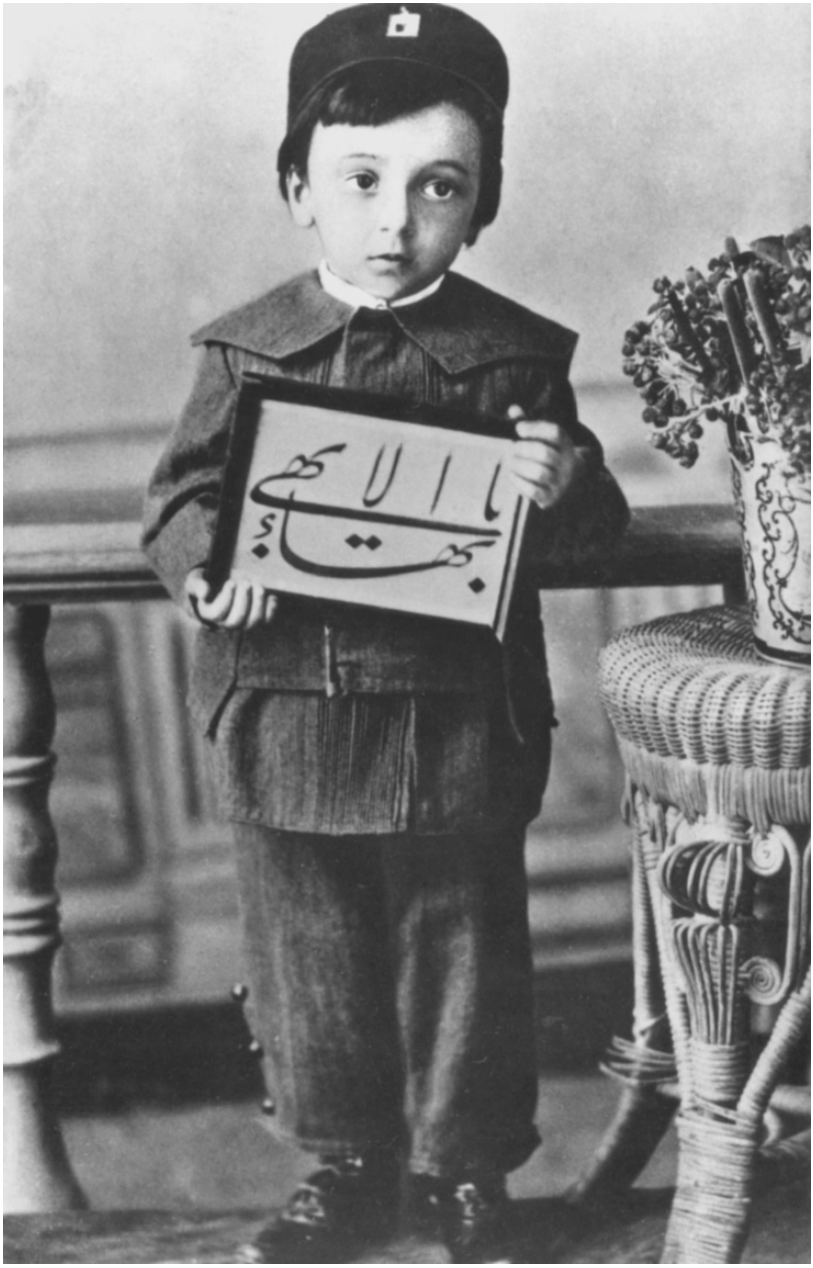
我们有一封守基·阿芬第在六个月之后写给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的一位秘书的信，信中说，虽然他订阅了《西方之星》（*Star of the West*），但有几份并没有收到，并烦请这位秘书确保他能得到报道了阿博都-巴哈美国之行的全部杂志。他把自己从10月份开始使用的地址给了他，即叙利亚贝鲁特的叙利亚新教学院，他写道，他很快就会进入这所学校。他把自己的名字署为“Choki Rabbani”。早年间，他似乎是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的，有时候也写成Shawki或者Shogi，最后变成了Shoghi，从而更准确地传达了这个名字在英语中的发音。在贝鲁特求学时期的一个笔记本中，他把自己的名字完整地用英文写了出来，即Shawqí Rabbání，这表明他是知道这种拼法的——但他从来没有用过。

在美国的那几个月令人精疲力竭，虽然阿博都-巴哈每天要做的事情都很难，但祂的思绪肯定还是常常回到心爱的外孙身上的。我们发现教长在旅行期间写给妹妹至大圣叶巴希叶·哈努姆的三封信中提到了守基·阿芬第，表现出祂对守基·阿芬第的担忧，也流露出了祂对外孙的大爱：“你最好立刻写信告诉我守基·阿芬第的情况，完完全全地告知我，不要隐瞒任何事情。”“请代吻神圣灵魂的同伴——守基·阿芬第之双目。”“请代吻美好花园中的新鲜花朵——守基·阿芬第。”这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了祂对这个情况并不总是很好的孩子的担忧，而且祂很清楚，这个孩子疯狂地想念着祂，并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还有一封阿博都-巴哈写给守基·阿芬第的书简，其中表达了祂对外孙健康的关心，不过是什么时候写的我不清楚：

祂是上帝

守基·阿芬第，万荣者之荣耀归于他！你年纪轻轻，容光焕发，我知道你生了病，不得不休息；不必担心，休息有时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若像阿博都-巴哈那样过度操劳，你会变得虚弱无力，不能工作。所以休息几天吧，没有关系。我希望你将处在天佑美尊的照顾和保护之下。

最终这次漫长的旅程结束了，六十九岁的教长因为繁重的劳动而筋疲力尽，于1913年6月16日返回埃及。祂的家人匆忙赶到了祂的身边，其中守基·阿芬第在教长到达大约六周后到了祂那里。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什么守基·阿芬第没有更早些赶到，那么我们必须记住，学校要在7月的第一周过后才放假，然后他很可能需要坐船从贝鲁特到海法（也可以坐大篷车从陆上走，这样更便宜一些，但是路途更远、更为辛劳），在海法又和家人一起坐船到埃及，再和至大圣叶以及其他人一起于8月1日抵达雷姆莱，阿博都-巴哈在那里又租下了一座别墅。守基·阿芬第总是会说“教长就像海洋”，意思是祂可以接纳一切，却并不表现出任何被打扰的迹象。这种超强的自控能力在日记作家的报道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其中说道，在听说祂在这个世上最爱的两个人抵达后，阿博都-巴哈又与巴哈伊们坐了一个钟头才返回家中问候他们！8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道：“今天受敬爱者没有在早上来看我们，因为祂在招待‘至大圣叶’和其他与她一同到来的朋友们。”当我们想象这种重聚的喜悦、读到这里的轻描淡写时，我们会认识到一直存在于阿博都-巴哈家族中的庄严和含蓄。不过我们也能窥见守基·阿芬第在那里的生活：在阿博都-巴哈面前祈祷的老习惯重新恢复，守基·阿芬第有时也会用他美好、年轻的声音吟唱，阿博都-巴哈有时会纠正并指导他。这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我本人常听到，当某人大声背诵韵文或诗的时候，家族中年长一些的成员会纠正他们的语调或发音；毫无疑问，教长多年来也曾许多次纠正过守基·阿芬第。在返回贝鲁特学习之前、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的几个月里，极为活跃且总是富于才干的守基·阿芬第一直为教长提供着帮助，写下祂给波斯信徒的信（当守



图一　那个孩子出生了

“真确地，那个孩子已经出生并且存活着，奇妙的事情将出现在他的身上，你们将在未来得知。”

阿博都-巴哈

图二　圣护的出生地

守基·阿芬第于1897年出生在监狱之城阿卡的这座房子里。

图三　守基·阿芬第和他的妹妹（约1902年）

这张照片拍摄于监狱之城阿卡。

图四　守基·阿芬第的早期学生时代

图五　童年的守基·阿芬第

“上帝啊！这是祢的仁慈之树上生发出的枝桠……请把‘守基’这个名字赐予他，这样他便会向往祢的王国……”

阿博都-巴哈

图六　年轻的守基·阿芬第

图七　守基·阿芬第绘制的地图（1914年）

他最早的地图作品之一，画的是罗马帝国。

图八　教长在祂房子的台阶上（约1914年）

未来的圣护站在第一排，右数第三个。

基·阿芬第坐在别墅的花园里时，教长会口授给他，教长习惯于在那里喝茶、待客），服侍着祂，为祂办理差事，被祂派去和其他人一起接待拜访者，或者去火车站接他们。我们被告知，阿博都-巴哈派守基·阿芬第带一些朋友去亚历山大最著名的公园和动物园，他还访问了开罗——我们可以想象他立刻就去参观了金字塔，因为守基·阿芬第有种冒险精神，渴望探访遥远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从一条记录中便可以看出：据说，他对一些从美国送来的“旅行”杂志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阿博都-巴哈的周围是很繁忙的；朝圣者从东西方前来，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老巴哈伊，例如卢阿·格青杰（Lua Getsinger）和米尔扎·阿布-法德勒（Mirza Abul Fazl），多年以后，他们最终长眠在了埃及的同一块墓碑下；信徒们启程前往印度，传播巴哈欧拉的天启；有来自贝鲁特和波斯的年轻巴哈伊学生的代表团；教长与舆论界代表和一些卓越、显赫的人物会晤。在这段时间，一位随教长一起去美国的秘书写到，那些与教长相伴的宝贵时光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仁爱。如果说这在他的头脑和内心里留下了生动的记忆，那么此事对守基·阿芬第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当陪伴阿博都-巴哈去西方的恩典被剥夺时他是如此伤心，在将近十五个月的分离之中他又如此渴望能在教长身边。十六岁的心灵所能拥有的那种喜悦很少会在日后的生命中重复出现；尽管战争的岁月马上要到来，但我相信，在教长于1921年去世之前的这段时期是守基·阿芬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记得守基·阿芬第给我讲过两个故事，都是关于他和教长在埃及的日子。他说，有一天，在参加了一个格外丰盛的宴席之后，教长回忆起了在巴格达的时光，那时父亲从苏莱曼尼亚山的自我放逐中返回，而且大家都很贫寒。但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巴哈欧拉下笔如泉涌，写下了许多崇高的著作。信徒们一夜又一夜地聚到一起，心醉神怡地聆听这美妙天启的吟唱，直到天亮。教长说，那些岁月里的干面包和椰枣比世界上其他任何食物都要美味。另外一个故事我听过不止一次，它让我大为惊奇，同时也深受启发。守基·阿芬第说，有一天他和教长租了马车，正从亚历山大返回雷姆

莱，同行的还有一位帕夏，他是应教长之邀去家中做客的。到达以后他们下了车，教长问那位魁梧的马车夫他们应该付多少钱。车夫要价出奇的高，于是教长拒绝付钱。车夫不肯让步，而且大爆粗口，竟然抓住教长的腰带，粗野地来回拉扯，坚持要那个高价。守基·阿芬第说，让尊贵的客人看到这样的场面使他非常尴尬。他还十分年幼，不能帮助教长，并感到恐惧和羞辱。但是阿博都-巴哈却没有这样，祂十分镇静，并拒绝让步。当车夫最终放手时，教长不多不少地把钱付给车夫，并告诉车夫，祂本来打算给他一笔不菲的小费，但是他的行为让他失去了它。教长说完转身离去！守基·阿芬第和帕夏跟在后面。毫无疑问，这类事情在圣护的人格中留下了终生的印记，他一生中从不为威逼所迫，也不被谎言所欺，无论事情是否让他以及为他工作的人感到尴尬或不便。

我们在守基·阿芬第身上所看到的作为圣护的品格在他的幼年和青春期便已养成。1914年3月8日，他从贝鲁特给教长在海法的一位秘书写了一封信，他是非常了解这个人的。信中他责备秘书没有给他写信：“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海法的消息，也没有你的只言片语。我确实没有想到会这样。我希望这种杳无音信的情况能得到改变，充满圣地佳音的信件能像雪片般飞来。”这位十七岁的男孩坚定并充满王者风范。他在信中继续写道，他希望“我们的主和教长身体安康”，并且要求凡是教长讲话的内容和提及的问题，以及祂的通信者可能获取的关于至高法庭的信息，都要在3月20日前寄达他那里。除了这封信之外，他对教长讲话和思想的渴求在另一封信中也得到了反映，其中他急切地要求得到所有报道了阿博都-巴哈美国之行的《西方之星》。在这封信里，还有另外一处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从侧面了解守基·阿芬第的兴趣和天性。“我就要看完美利坚合众国的地图了。这是一幅非常形象、美丽的地图。请在信中一个一个地按顺序告诉我我们的主拜访过的美国城市的名字。这样我就能在地图上找到它们了。”这位巴哈伊世界伟大的地图绘制者已经忙起来了！

在守基·阿芬第从1917年开始使用的笔记本中，我们发现，在贝鲁特时，在那些有人把冰送到他住处的日子里，他就会在日期

旁边打一个勾——这是他工作有条不紊的典型表现。他晚年习惯按收到的日期来整理他的报纸——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毫无疑问，他住在英国时便有订阅此报的习惯。《泰晤士报》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日报，也是唯一一份被巴哈欧拉在书简中提到名字的报纸。守基·阿芬第的笔记本中还包括对巴哈伊历的详细列举、信仰的基本原则、用法语记录的希伯来先知时期的笔记、回历和阳历的换算、度量衡、书简的抄录，还有一些数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熟练掌握了埃卜杰德数值法（the Abjad system of numerology），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他作为圣护的所有本质特征都能从这个男孩身上看出来。

守基·阿芬第总是勤于通过私人信件与巴哈伊朋友们保持联系。其中一封是写给缅甸的“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Syed Mustafa Roumie）[①]的，日期这一行写的是“1914年7月28日，叙利亚，海法”。他在信中说，“圣道在远东地区迅速发展的喜讯”让他感到十分欣喜，而且他还给教长看了这封信，“教长容光焕发，脸上浮现出了神圣而和蔼的笑容，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于是得知教长的身体十分健康，因为我记得教长说过，‘无论何时何地，当我听到有关圣道的好消息时，我的身体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因此我可以告诉你，教长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将这喜讯传达给印度的信徒。我非常希望这能提升他们传播圣道的勇气，坚定他们的信心，增加他们的热情。”

贝鲁特是那些来自波斯和远东的信徒们去海法以及从海法返回的中转站，对那些在贝鲁特学习的巴哈伊学生们来说，守基·阿芬第在他们的活动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在另外一封写给穆斯塔法·鲁米的信中（信头写的是“叙利亚，贝鲁特市，叙利亚新教学院，1914年5月3日”），他写道：“我向你们提过重返学院活动、重返巴哈伊朋友聚会的事，这一事宜已重新组织。我们只在今天寄信给各国的灵理会，并随函附上圣地方面的喜讯。”

1915年2月，守基·阿芬第赢得了一、二年级有奖竞赛的一等

① 较常用的拼法为Siyyid Mustafa Roumie。——译者注

奖（至于是什么奖没有说），奖项是由学生会颁发的。他是个好学生，但是他本人从未声称自己被视为卓越或者杰出的学者。深邃、广博、有远见、有逻辑的心智与聪明的大脑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多半是由野心和自负所激励的，并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守基·阿芬第从来不会自负，也没有任何野心。他的动力源于一个崇高的动机——为阿博都-巴哈服务，减轻祂肩上的担子和内心的忧虑。守基·阿芬第在一封1918年1月15日于贝鲁特写给阿博都-巴哈的信中这样说道："我已经重新开始学习了，集中我所有的精力，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学习知识，在未来服务圣道的日子里我会用到它们。"守基·阿芬第刚从海法返回贝鲁特，很显然是刚度完圣诞假期。他又写道，在一路上经历了寒冷和风雨之后，他"开心、安全地抵达了学校"。在这封信中，守基·阿芬第倾诉着"我对祢的爱和渴望"，字里行间都流露着真情。信的结尾说："我已邮寄给你一块奶酪，希望祢能喜欢。"信末签名是："祢谦卑的仆人守基"。当我们想到战争时期的黎巴嫩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饥荒时，我们就会明白这份礼物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

战争年月里，守基·阿芬第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尽管他性格开朗，但是战争无疑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忧虑。这一点可以从他写于1919年的一封信中看出来。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漫长而绝望的战争年代，流血、饥荒、瘟疫，那时圣地与世界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正在遭受最极端、最严重的镇压、暴政和破坏……"那些年，他亲爱的外公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危险，多数民众食不果腹，所有人都贫困交加，也包括他自己的家族。世界的斗争进行到最后时，海法面临着被协约国轰炸的巨大危险，以至于阿博都-巴哈将家人安置在了一个位于阿卡湾另一侧的山脚下的村庄里。全家人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守基·阿芬第也在那里住了一阵子。艾伦比将军（General Allenby）的胜利之师于1918年8月进驻海法，这支部队中有一位名叫图德·波尔（Tudor Pole）的少校军官。根据波尔少校的话，土耳其总司令想把教长和祂的家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此时教长和家人的生命面临着最大的威胁。在守基·阿芬第的描述中，这位贾迈勒·帕夏总司令"冷酷无情，大权在握，不择手

段，是信仰的一个顽敌”。图德·波尔少校说，这一卑劣的行动本来要在他们进入海法前的两天执行，但是由于英军迅猛的推进，土耳其军队随之仓皇撤退，这次行动才因此挫败。我们猜想守基·阿芬第已经完成了在贝鲁特的学业，并且在这段日子里与阿博都-巴哈待在一起，共同分担着令人痛苦的危机。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我奇怪地意识到，守基·阿芬第对生命中的个人事件所提甚少；他也不喜欢什么轶事，当它们涉及到他本人时，他也没有时间去回忆往昔。在我有幸与他共度的那个时期，他疲惫的头脑和精神完全被圣道的工作所占据。在当时，每天摆在他眼前、压在他心头最迫切的事业就是圣道。

守基·阿芬第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时是1918年。在那年的11月19日，他在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在完成贝鲁特美国大学文理课程以后，能够加入到为受敬爱者的服务中。我渴望并期待收到你的来信，了解你为圣道的服务，因为当我把你的信给受敬爱者看时，我将让祂感到快乐、愉悦，使祂身体变得强壮。过去的四年充满了难以计数的灾难、前所未有的压抑、无法描述的痛苦、严重的饥荒和穷困以及空前的杀戮和冲突。但是现在，和平之鸽已然归巢，传播上帝之言的黄金时机已经来到。我们将使之发扬光大，上帝之天启将在这个自由的地方不受任何限制地传播。这无疑是个服务的时代。”没有什么能比这几行字更能展现这位未来圣护的品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教长工作的虔诚，他让教长快乐安康的强烈渴望，以及他对自己的生活和服务之间的关系的简洁概括。同时他还分析了战争的结束在不远的将来对巴哈伊的工作意味着什么。他清新的修辞风格（尽管仍然受限于尚不熟练的英语，但是日后的卓越之处已经初现端倪）在诸如以下的段落中得到了体现：“朋友们……不论身体强弱，年龄长幼，健康与否，来自何方……都为近日发生的这些事件感到高兴；他们是不同躯体中的同一个灵魂，他们团结一致，立志服务并正在服务于人类的统一。”

守基·阿芬第当时二十一岁。通过早期的这些信件（大部分写于1919年），他与阿博都-巴哈的个人关系已经明确。在这些信中，

守基·阿芬第称教长为“我的外公，阿博都-巴哈”，并且署名为“守基·拉巴尼（阿博都-巴哈的外孙）。”我们必须记住，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内，教长与那么多国家的信徒重新取得了联系（多年的战争使得他们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巴哈伊信徒和非巴哈伊信徒都应当知道现在担任教长的秘书和得力助手的这位“守基·拉巴尼”是谁，这是非常有益处的。1919年9月27日出版的《西方之星》刊登了守基·阿芬第的一张全身照，题为 “守基·拉巴尼，阿博都-巴哈之外孙”，并称他是阿博都-巴哈近期的书简的译者，他的日记信件也开始在这期杂志中发表。守基·阿芬第完全掌控着世界中心的细枝末节，我个人认为，从这一点上来看，极有可能是教长本人让他把他们的家庭关系讲清楚的。

随着信件和报道如雪片般飞来，而且后来朝圣者如潮水般涌向海法，阿博都-巴哈的工作也日益增多。这也体现在守基·阿芬第写给许多巴哈伊朋友的个人信件中：“……我之所以与你们中断联络，完全是因为书简的口授和翻译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整个下午都在为祂翻译，却只能翻译出来自伦敦的请愿的部分内容。”他最后说道：“出于我的巴哈伊信仰和对你们的特殊情感，我附上两张照片……”“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今天非常忙碌，事情很多。从王公到普通士兵，有不下二十个人想见阿博都-巴哈。”“受敬爱者从早到晚，甚至直至午夜，都忙于启示书简，向这个令人悲伤和失望的世界传播祂那建设性的、充满活力的关于爱和道义的思想。”“在我写这些话的同时，我再一次深受感动，想让自己出现在祂面前，记录下祂对近日到达的请愿的回复。”青年王子在年迈的国王面前的无限活力、虔诚和热情反映在这每个字句中，他以全部的年轻活力和天性中极大的热忱服务、支持着祂。

守基·阿芬第频繁地陪伴教长出席祂应邀参加的正式聚会，聚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对驻海法的英国军事总督的拜访，以及与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他曾在巴勒斯坦率领盟军，后来晋升为艾伦比勋爵，为阿博都-巴哈教长被英国政府封为爵士做出了主要贡献）的会谈。守基·阿芬第写道：“这是阿博都-巴哈第二次访问将军，他们谈话的核心是圣道及其发展……他是一位

温文尔雅、为人谦逊、引人注目的人物，情感炽烈而举止庄重。”阿博都-巴哈的外孙开始在这些圈子中为人所知。军事总督在写给阿博都-巴哈的一封正式书信中写道：“阁下：今日，我从祢的外孙那里收到了____”。守基·阿芬第曾带着教长为“海法救济基金”的又一次捐款拜访了总督，这封信就是对此事的一个回复。守基·阿芬第还与朝圣者度过了大量时间（不仅仅是在阿博都-巴哈教长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们在一起时，他热切地获取着关于巴哈伊活动在不同国家的进展状况的信息。

教长这时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尽管很多人都在不断地为祂提供服务和帮助，但守基·阿芬第的作用依然无人能比。我记得圣护告诉我（我确信是在1920年初），一位年长的美国巴哈伊信徒将一辆坎宁安汽车作为礼物送给了教长；刚到周末，汽车运至港口码头区的通知就到了，教长指示守基·阿芬第去办理清关并将其运送回家。守基·阿芬第告诉我，尽管第二天港口没有高官，而且也不是工作日，他仍然成功地将车运走了；到家时，他走到教长面前，告诉祂车已停在门外。他说，教长大为惊奇，同时也非常高兴，问他是怎样办到的。守基·阿芬第回答说，他带上文件，登门拜访了多位官员，让他们签署文件并下达必要的指令，以使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的车能够立刻送到祂手中。这是守基·阿芬第整个一生中完成工作的典型方式。他总是希望尽可能快地完成每一件事情，希望每一件他所控制的事情都能够以这样的速度进展。

无论阿博都-巴哈走到哪里，这位至爱的外孙都尽可能地与祂同行。他们这种持久的陪伴延续了大约两年时间，这对他们两人来说必定都是一种深深的满足，也给守基·阿芬第带来了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两年间，当阿博都-巴哈的声名之星在本地以及国际范围内升起时，守基·阿芬第得到了观察教长如何应对高官及其他卓越人士的机会。这些人慕名而来，因为教长在他们眼中几乎就是东方先知，是亚洲最伟大的宗教人物。同时，守基·阿芬第也看到了在敌人和心存恶意者无时不在的嫉妒和阴谋面前，教长是多么泰然自若。在守基·阿芬第本人担任巴哈欧拉信仰圣护的三十六年间，他从外祖父身上学到的东西得到了体现。

在写给朋友的一封日期为1919年2月18日的信中，守基·阿芬第说他与教长同在巴吉。信的开头写道："带着最甜美的回忆，我从这个神圣的地方，向你——我远方的朋友——致以问候！"接着，在提到了海法日益喧闹的情况之后，他描述了巴吉的安宁："那里的蒸汽机和发动机不停地排放着各种气体，空气中充满了烟雾，而这里的空气却非常纯净、清新和芬芳。"我直到1923年才坐着阿博都-巴哈的马车去了巴吉，而战后的巴勒斯坦在1918年几乎不存在汽车交通。当考虑到这两点时，我们只能猜想，守基·阿芬第必定疯狂地热爱自然！是的，确实是这样！他描述教长每天两次从鲜花盛开的野外经过，去神圣陵殿。从中可以看出，在那些与他最爱的人亲密相处的宝贵时光里，他是多么欣喜。但是守基·阿芬第的这种福气很快就结束了。当时已经决定让他去英国，进入牛津大学读书，其读书的目的是众所周知的，那便是学好英语，从而更好地将阿博都-巴哈的书简及其他圣作译成英文。

在连续服侍阿博都-巴哈不到两年之后，在战后教长巨大的通信量稳定增长之时，做出让守基·阿芬第离开祂的决定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考虑：如果他打算追求学业，那么最好尽早；阿博都-巴哈现在有为数不少的人做祂的秘书；守基·阿芬第最年长的表弟已经从贝鲁特学成归来；教长本人的状况很好，计划进行得也很顺利，而且最重要的是，祂的健康状况在持续地改善。1918年，艾伦比的胜利之师正在巴勒斯坦，当时在这支军队中的图德·波尔写道："……教长精力充沛，比在伦敦时更为健康。"守基·阿芬第在1919年4月和8月的信中分别写道："受敬爱者健康状况极佳，强壮而精力充沛，并且非常开心、愉快……""挚爱的教长的确非常健康，身体强壮，十分活跃，每周启示数百封书简，做无数祈祷，接见许多访客和朝圣者，经常半夜醒来进行冥想和祈祷。"同一时期，守基·阿芬第在写给英国和缅甸朋友的信中传达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说阿博都-巴哈在认真地考虑再进行一次长途旅行："最重要、最吸引人的是，受敬爱者本人表示正在计划和考虑这样一次穿越印度洋的旅行。祂甚至宣布，祂希望先去印度，然后去印度支那、日本和夏威夷群岛，再从那里穿过美洲大陆去你们热爱的

伦敦，去法国、德国和埃及。祂自己把这次旅行的时间定为四到五年。哦，我们多么深切而真诚地希望这个伟大的旅行能够成真！让我们心中期望，并为之准备。”“受敬爱者最近宣布打算去印度旅行，我们希望这能够很快实现，希望通过朋友们的团结和力量，印度能够获得接待祂的能力。”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尤其是正当二十三岁的青春年华时——能够想象自己心爱的人离世，更何况亲人身体十分健康，正在为自己安排一次这样的旅行！所以一点也不奇怪的是，1920年春天的某个时候，当二十三岁的守基·阿芬第离开外公阿博都-巴哈时，他的内心是平静的，他深信自己日后能回到教长身边，用更加丰富的学识好好为祂服务，而且，我毫不怀疑，他心中一定想着，这次肯定能陪伴外公一起完成这个不平凡的旅程，未来的岁月中也还能有幸日夜为祂服务。守基·阿芬第展望着那些似乎会呈现在阿博都-巴哈面前的日子，但他忽略了教长的年龄（教长当时已是七十六岁高龄），忽略了一个常常会使我们的心灵和希望受打击的因素，那就是命运之神会以令人费解的方式干预我们的计划和生活。当年轻的圣护惊闻外公去世的噩耗时，他受到了多么沉重的打击。1922年2月，也就是外公去世数月后，他在给一位远房表兄弟的信中以痛苦的语言写道：“在祂最后的日子里，我不在祂身旁，心里感到万分遗憾，无论将来我能为祂做些什么，也不管我在英国的学习能在多大程度上报答祂对我的厚爱，这份遗憾我至死都不能释怀。”

1920年，阿博都-巴哈安排守基·阿芬第出国读书，由首次去海法朝圣、正要返回英国的卢图福拉·哈基姆（Lotfullah Hakim）负责陪同。虽然这时的守基·阿芬第还只是一个孩子，但阿博都-巴哈执意让他在旅途中先找个疗养院好好休息一下。关于圣护的一生，关于圣护在六十岁便早早去世，我们从这段小插曲能得到一些启示。战争持续多年，时局紧张，而在战争结束后，守基·阿芬第又投入到了繁重的工作和忙碌的服务中；外公的这番安排说明，他的精力一定是受到了巨大的损耗，外公当时也十分挂念他的身体状况。守基·阿芬第遵照外公的吩咐，在巴黎郊区讷伊（Neuilly）的一处疗养院静心休养。他并没有生病，只是有些精疲力竭而已；他与许多

信徒都有交往，有时打打网球，有时外出游览观光，渐渐熟悉了这座风光秀丽、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的城市。他还在小镇巴尔比宗（Barbizon）拜访了一些巴哈伊信徒。在疗养院待了大约两个月后，守基·阿芬第于7月份动身前往英国。

他在英国受到了阿博都-巴哈众多挚友热情、诚挚的接待。这其中有的人他早先就认识，比如J．E．埃斯尔蒙特博士（Dr J. E. Esslemont），他最近曾到过海法，与守基·阿芬第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合作翻译了教长的一封重要书简；还有W．图德·波尔少校，他在阿博都-巴哈旅居伦敦时见过教长，并曾经随英国占领军驻扎在巴勒斯坦，尽其所能地为信徒提供过帮助；还有拉明顿勋爵。

守基·阿芬第曾替外公给祂的一些英国朋友送过信。在他到达英国后不久写给法国的阿里·库利汗（Ali Kuli Khan）夫人的一封信中证明了这一点：

1920年7月28日

我最亲爱的巴哈伊姊妹：

自从踏上英国国土，我便忙得不可开交，截至目前，我的工作进展是非常出色的。我带来了教长写给布洛姆菲尔德夫人（Lady Blomfield）、拉明顿勋爵和图德·波尔少校的书简，通过他们，我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一些著名教授和东方学学者有了密切的接触。丹尼森·罗斯爵士（Sir Denison Ross）和克尔教授（Professor Ker）把我介绍并推荐给了沃尔特·雷利爵士（Walter Raleigh）和马戈柳思教授（Prof. Margoliouth），前者是牛津的一位英国文学教授和讲师，后者是牛津著名的阿拉伯学者和东方学家。于是，在伦敦度过了繁忙的一周后，我便匆忙去了牛津。事实上，在启程前往牛津之前我就收到了马戈柳思的来信，他在信中表示，他将竭尽所能为阿博都-巴哈的亲人提供帮助。我借机向马戈柳思和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格雷勋爵、寇松伯爵、米尔纳勋爵、阿斯奎斯男爵、斯温伯尼和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等众多伟人的母校）院长讲述了关于圣道的事情，并澄清了一些一直以来令这些忙碌的学者们疑惑不解的问题。

一定要为我祈祷，就像我在离别前夕对你要求的那样，祈祷在这个集贤汇智的地方，我能实现我的目标，到达我的终点……

拉明顿勋爵几天之后写给教长的一封信特别有意思：

1920年8月8日

亲爱的朋友：

从守基·拉巴尼手中拿到了祢给我的信，并得知祢一切安好，对此我感到很高兴。他自己看起来也十分健康，他的睿智和坦诚又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希望他能在牛津得到他所寻求的锻炼。他两三天就来一次上议院，但我恐怕每一次都没什么意思……

从上面的通信中，我们可以得知守基·阿芬第在伦敦的时间；因为他要替阿博都-巴哈送信给拉明顿勋爵，我们推测他立刻便把信送到了他那里，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位年轻人渴望见识议会之母的工作方式的迫切心情，在这位和蔼而饱经世事的贵族面前，这种心情当然隐瞒不了。在拉明顿勋爵的安排下，守基·阿芬第获准参加了上议院和下议院一些会议。我记得在婚后，当我们第一次一同前往伦敦时，他带我去了下议院，在其中一个会议上，我们就坐在旁听席里。如果说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一次非同小可的经历的话——当时我仍处在心神恍惚且激动不已的状态之中，因为我有幸与上帝在人间的表征如此亲近——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当时还很年轻的守基·阿芬第来说，这次经历会令他多么激动、难忘。在这段旅英的岁月里，他对伦敦有了很好的了解，并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有很多次，当我们一同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伦敦市中心、英国皇家植物园等地时，我意识到，从他的学生时代开始，这座著名的城市便与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毫无疑问，他把从阿博都-巴哈那里得来的非常有限的学生津贴尽可能地花在了游览英格兰上。我从他告诉我的许多事情中得知，他在很多方面是非

常节俭的，比如，他曾买了个电熨斗自己熨衣服！

埃斯尔蒙特博士在伯恩茅斯（Bournemouth）有一个私人疗养院，守基·阿芬第曾多次到那里拜访他。在两人的一张合影中，他们头靠得很近，站在疗养院的大楼前。埃斯尔蒙特过世后，守基·阿芬第曾写信给霍尔博士（Dr Hall），清楚地表达了这些拜访对他的意义："我将永远记得同我们已故的朋友约翰·埃斯尔蒙特一起在伯恩茅斯的那些快乐、悠闲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疗养院里一同进餐时的美好时光。"守基·阿芬第在那一地区时，还顺便游览了托基（Torquay）海滨胜地。多年后我们一同前往那里，圣护把著名的巴巴科姆丘原（Babbacombe Downs）指给我看，我们一起走在多年前他游览过的那个公园里，公园中有着深红色的小径，我想，正是这些小径把这种红路、绿草再加上装饰性花瓶的美景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多年以后，他从中得到灵感，并把这些景色复制到了巴吉和卡尔迈勒山上他自己的花园里。

学生时代的记忆永远都不会在守基·阿芬第的脑海中磨灭。我记得他晚年时曾告诉一个英国朝圣者，那一片片粗糙的黑面包涂上山莓果酱和德文郡奶油的味道是多么美妙。

旅英期间，他和居住在伦敦的一个年迈、可靠的波斯信徒齐亚乌拉·阿斯加尔扎德（Ziaollah Asgarzadeh）的关系尤为密切，与埃斯尔蒙特博士、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等人以及一些曼彻斯特的巴哈伊信徒也是如此。尽管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牛津度过，集中精力于学业，但他还是与英国的巴哈伊团体交往频繁，经常前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在一封当时居住在英格兰的一名印度信徒所写的信中（信的日期是1921年5月5日），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叙述："星期三晚上，我去参加了巴哈伊在林赛馆（Lindsay Hall）的例会。守基·拉巴尼先生宣读了一篇关于经济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的论文。他的文章措辞优美，写得非常好……"他似乎不仅仅是在巴哈伊集会上会宣读他的论文，因为他曾在一封从贝利奥尔学院寄出的、写给一个信徒的信中写道："过段时间我会寄给你一篇论文，是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我曾在牛津的一个主要社团中宣读过。"

时至今日，牛津和剑桥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字眼；1920年，

当大学和大学教育还不像现在这样普遍时，它们更是学术界遥不可及的象牙塔，光彩夺目。守基·阿芬第就读的贝利奥尔学院作为牛津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享有很高的声望。多年后，也是在圣护的引领下，我看到了那些他曾经走过的街道，看到了鲍德莱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熟铁大门之外，河流平静地穿过绿色的草地；教堂的历史已逾千年，它有着巨大的厨房和纵横如网的哥特式拱门；莫德林学院（Magdalen）美景如画；贝利奥尔学院围墙之中的四方院子宁静祥和，守基·阿芬第去上课时会从这里经过；凝望着那个狭窄的入口（他学生时代居住的房间便由此进入），还有他吃饭的餐厅……显然，这一切都承载着他诸多的回忆，但我想，这其中恐怕没有什么回忆是真正快乐的。

多年前，一名巴哈伊信徒写信给圣护，记述了一段与A．D．林赛（A. D. Lindsay）的对话。当时，林赛已是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在守基·阿芬第求学期间担任他的导师。我把林赛的话记录了下来；我们要记住这只是一个简短、非正式的对话，而不是一次专门的访谈。“在守基·阿芬第看来，教育就是要发现某个人，此人的观点令守基·阿芬第深以为然，然后向这个人提出问题。当守基·阿芬第得出答案后，他会把它们全部记录在一个黑色的小本上。我已经贴出了我的课程安排；守基·阿芬第跑到我跟前问，‘您在七点到八点半之间要做什么？’‘这还用说，’我大声说道，‘当然是吃饭！’‘噢，’守基·阿芬第明显带着失望的口气说道，‘但整个时间段您都要用来吃饭吗？’我在牛津还没发现谁的求知欲望像他那样强烈。于是我又安排出了十五分钟，也因此压缩了吃饭时间。事情就是这样——我为他受苦了。” 守基·阿芬第希望在分配给他的份额之外获得更多与导师探讨的时间，由此引发了这件小事。虽然有如上这段评论（其意图也是和善的），但这位博学之士几乎没能觉出他在后人眼中唯一的、真正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曾是守基·阿芬第的导师。虽然学院中的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守基·阿芬第中途退学、返回巴勒斯坦的原因，更不用说这位导师了，但我们并没发现任何他向自己的学生流露出丝毫个人情感的信件。

不过，他们之间是有书信往来的，因为守基·阿芬第在1927年给林赛勋爵博士的信中写道，他给林赛博士送了《巴哈伊年鉴》，称年鉴“表现了我突然间惜别贝利奥尔学院以来所从事的工作的特点。”他接着写道，“在您的指导下，我得到了非常宝贵的帮助，这些帮助在我承担艰辛而责任重大的任务时体现出了巨大的价值。我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两年多后，林赛给之前所有的成员写了一封信，呼吁大家为与该学院有关的某件事情捐款，信中他感谢守基·阿芬第送了那本书。守基·阿芬第第二天就做了回复，并附上了二十英镑的捐款。他在信中感谢林赛来信，因为这“让我想起在您的指导下，我在贝利奥尔学院度过的快乐而宝贵的时光。”圣护的地位是伟大的，但是当别人应当得到赞誉时，他的谦逊、正义感和礼貌总是让他将赞誉给予他人。在1923年写给贝鲁特美国大学的道奇教授（Professor Dodge）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这所位于近东的伟大学府，我对其感恩戴德……”

D．S．马戈柳思（D. S. Margoliouth）教授和他妻子的态度大相径庭，因为在1930年，她在感谢守基·阿芬第送书给他们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欣然回想起在这所房子里欢迎你们到牛津小住的那种快乐。”我们知道他并不只是在这个家中受到过接待，因为我们有一封他离开英格兰五年之后写给一位怀特夫人（Mrs Whyte）的信，其中写道：“我在牛津期间，你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盛情的款待，现在这些往事仍旧历历在目，而且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永远感激你且充满深情的朋友守基·阿芬第。”

在1920年的学院注册单上，我们发现，圣护亲笔将自己的名字署为舒基·哈迪·拉巴尼（Shawqi Hadi Rabbani），米尔扎·哈迪·设拉子（Mirza Hadi Shirazi）的长子，二十三岁。在他留存的一个笔记本里，我们发现了下面的单子，上面精心记录了1920年他开始求学的那些日子：

1920年10月14日　政治学：卡莱尔牧师（Rev. Carlyle）
1920年10月15日　社会和政治问题：史密斯先生（Mr. Smith）
（贝利奥尔学院硕士）

1920年10月13日　社会和工业问题：卡莱尔牧师
1920年10月12日　政治经济学：T．H．彭森爵士（T. H. Penson）（文学硕士）
1920年10月16日　1688年后的英国经济史：彭森爵士
1920年10月11日　逻辑学：罗斯先生（文学硕士）
1920年10月12日　东方问题：F．F．厄克特（F. F. Urquhart）（文学硕士）
1920年10月19日　资本和劳工的关系：克莱，新学院

其中一些课他记了笔记，至少在数门课的头几堂课我们仍有他的笔记。圣护深知自己为何在牛津；幸运的是，我们有一封他在1920年10月18日写给一位东方信徒的信，其中对此有所表述："我亲爱的灵性朋友……赞美归于上帝，我很健康，并满怀希望，正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用将来圣道所需的知识武装自己，我希望我能快速学到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精华知识，然后回到家中，以新的形式，重塑巴哈伊信仰的真理，以此来为神圣门槛服务。"毫无疑问，他指的是将来最精准地把教义翻译成英文，在英格兰暂住期间他就为此打下了基础。

在守基·阿芬第于1921年11月22日写给一个英国信徒的信中，他在牛津大学取得的工作进展得到了清楚的体现。从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崭新的娴熟和自信："……最近我沉浸在工作中，修改了很多译文，并且给霍尔先生寄了由我翻译的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书简，这封书简里充满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对世界的忠告，是这个令人悲伤和失望的世界所急需的！如果你还没有细读这部作品，请务必向霍尔先生索要，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巴哈欧拉对世界问题的最卓著、最有力的宣言。"守基·阿芬第接着说道，他随函附上自己"在鲍德莱恩图书馆（Bodleian）读巴哈伊信仰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新的和旧的"节录。在同一时期，他在给一个在伦敦的朋友用波斯文写的信中说道："在这片土地上，我日夜致力于完善自己的翻译艺术……我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感谢上帝，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结果还是好的。"他讲述道，由于自己全神贯注于一些事

情，学业也很繁重，再加上学校校规原因，他只有星期天才是空闲的，他的朋友也只能在星期天到百特街（Broad Street）45号来见他。

从在贝鲁特的年代到生命的最后，守基·阿芬第一直保持着在笔记本上摘记词汇和典型英语短语的习惯。他摘记了成百上千的词语和句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为了掌握这门令他钟爱和陶醉的语言，他付出了多年的潜心学习。他喜爱詹姆斯国王钦定版的《圣经》，以及历史学家卡莱尔（Carlyle）和吉本（Gibbon）的作品，他十分欣赏这两人的风格，尤其是吉本。守基·阿芬第非常喜欢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我从未见过他的房间里什么时候会少了这本书，在旅行时这本书也常伴他左右。他去世时，床边放着一本小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普通人的图书馆”出版社的版本，节选了全书中的一部分。那是他学习英语的圣经，他经常给我朗读里面的选段，朗读时还会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听这段，啊，多好的风格，多美的语言，多么跌宕起伏的句子。”他声音优美，发音也很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牛津腔”，但是并不夸张），书中文字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的朗读中像宝石一般呈现出来，熠熠生辉。我尤其记得，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我们坐在伦敦圣詹姆斯公园里面朝着湖泊的长椅上，他大声地给我朗读吉本的著作，那一刻是如此安宁（这种安宁是多么难得啊！）。吉本令守基·阿芬第沉醉，在他所有的写作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吉本的风格对他的影响。就像在他翻译巴哈欧拉的祈祷文、《隐言经》和书简时，我们会从中看到圣经式的英文。

我知道守基·阿芬第和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①]那时都在牛津读书。他们相互认识但并不是朋友，实际上我从未听他提到过有谁是他的朋友；守基·阿芬第只和他的一些教授有联系，而总是和别人保持着距离，这可能是由于他的腼腆，在他作为圣护的威严之下，这种腼腆并不容易被察觉，但却是他的一个极为明显的性格特征。他参加了一个辩论协会，喜欢打网球，但是令人奇怪的

① 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丘吉尔的副首相等职，后在50年代出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是，他在牛津的日子的细节却十分匮乏。教长的离世给他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蒙上了阴影，对他生活的影响也极为严重，对此唯一真正的记录只存在于对他的作品和性格的影响中。在牛津的氛围和品质下，大学中的短暂逗留塑造和磨砺了他原本就十分清晰和富于逻辑的思维，提高了他的批判能力，再次强化了他强烈的正义感和推理能力，为巴哈欧拉家庭中显著的东方式高贵注入了最优秀的英国绅士文化。

第二章　阿博都–巴哈的逝世和后事

图德·波尔少校在伦敦的住处时常成为巴哈伊信徒的电报邮件中转站。只要去伦敦，守基·阿芬第都会亲自登门拜访。1921年11月29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这个办公室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伦敦

神圣的阿博都-巴哈已升入阿卜哈王国。告诸友人。

至大圣叶

关于这场可怕的变故以及它的影响，图德·波尔在他的笔记里记录道，他立刻通过电报、电话和信件将消息告诉给了朋友们。我相信他也通知了守基·阿芬第，并让他立刻赶到办公室来，但之所以没有隔那么远的距离将消息告诉他，是因为他知道，这对他是一个太大的打击了。但不管怎样，守基·阿芬第于中午到达了伦敦，来到圣詹姆斯街（皮卡迪利大街附近，靠近白金汉宫），然后被领进了这个私人办公室里。图德·波尔当时不在房间，但是当守基·阿芬第站在那里时，他看到桌上有封翻开的电报，并在电报上发现了阿博都-巴哈的名字，于是他阅读了电文。当图德·波尔在几分钟后走进房间时，他看见的是精神崩溃的守基·阿芬第，这噩耗让他恍惚而不知所措。他被带到格兰德小姐（Miss Grand，一位伦敦的信徒）的家中，并在那里卧床数日。守基·阿芬第的妹妹鲁汉盖泽（Rouhangeze）当时在伦敦读书，她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以及其他人都尽可能地安慰着这个悲痛欲绝的年轻人。

埃斯尔蒙特博士立刻伸出了援助之手；听到消息后，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守基·阿芬第。在一封11月29日的信里他这样写道：

最亲爱的守基：

今早图德·波尔的电报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教长昨日清晨在海法安详辞世……"您现在远离家人，甚至远离所有的巴哈伊朋友们，一定很难过。您现在要怎么办？我想您会尽快赶回海法。同时我非常欢迎您来这里住上几天……只要给我发个电报……我就会给您准备好房间……如果能提供任何帮助，我将非常高兴。我可以想象您现在是多么伤心，多么想回到家中，您一定觉得生命中有一个可怕的空白。基督升天之后，离祂所爱的人反而更近，所以我祈祷我们的受敬爱者和我们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尽自己的力量来分担圣道的责任，祂的灵魂和力量会与我们同在，并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伯恩茅斯疗养之家

几天后，在格兰德小姐的家里，守基·阿芬第醒了过来，准备在处理完自己的事情后马上返回圣地。图德·波尔在12月2日给美国巴哈伊的信中写道："这个月底，守基·拉巴尼和他的妹妹将由布洛姆菲尔德夫人陪同前往海法。"我们推测12月3日这天守基·阿芬第在牛津，因为马戈柳思教授在这天向他表示了自己的哀悼，并且邀请他"顺便拜访"。他给伦敦的一名巴哈伊学生写了一封信（可惜的是，信上未标明日期），从中我们得知他接受了埃斯尔蒙特博士的邀请，因为他这样写道：

几天来，我的身心和灵魂都浸没在这个可怕的消息中，我卧床几天，几乎没有知觉。慢慢地，祂的力量让我得到了恢复，并且给我注入了信心，我希望这信心今后可以在我卑微的服务工作中给我指引和启示。虽然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但来得还是太突然了。然而，祂的圣道给世界创造出如此之多的美丽灵魂，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将存在且繁荣下去，并在不久之后遍布整个世界！我将立即动身前往海法接受祂留下的指示，而且我已立下了一个无上的决心，那就是，我要把一生都投入到为祂的服务之中，并在祂的帮助下，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用来践行祂的指示。

在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后，我的朋友坚持让我留在这里和埃斯尔蒙特博士一起休息一两天，明天我将返回伦敦，再从那里返回圣地。

如今，巴哈伊世界掀起的震荡是圣道的推动力，它将唤醒每一个忠实的灵魂来承担教长赋予每个人的责任。

圣地依旧是巴哈伊世界的中心；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教长已经巩固了祂伟大愿景之中的工作，祂的精神使我相信其结果会很快彰显。

我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将前往海法，如果途中在伦敦耽搁了行程，我将去拜访你，向你讲述教长对身后之事的伟大设计，以及祂关于圣道之未来的重大宣告……

在为祂的服务中，我带着对圣道的祈祷与信念为你祝福。

守基

这几乎是一封令人震惊的信，因为写这封信时，教长遗嘱中的条款还不为人所知，也未被传播开来，尽管守基·阿芬第已经获知教长在海法留下了一个信封，等着他的归来。仿佛教长的灵魂在飞入永恒之时经过了英格兰，并将祂的衣钵传了给祂家的后裔！阿博都-巴哈的一个女儿曾在1921年12月22日写道："祂已经写下了最后的指示，并装进信封中留给守基·阿芬第——因此，在他到达之前我们不能将它打开。由于他现在已经在返回的路上，因此，我们希望他能在月底左右赶到这里。"

他很快就能知道自己所要承担的崇高职位；挚爱的外祖父多年来对他悉心培养：这些似乎在守基·阿芬第生命中最悲惨的时刻为他注入了灵性的力量。曼彻斯特的一位年长的信徒E．T．霍尔（E. T. Hall）于12 月 5 日写给他的信感人至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极度悲痛，但仍抽出时间来安慰他人：

当我们极度悲伤却异常坚决、极度震惊却完全领悟时，您那充满爱意、亲切和崇高的信件满载着鼓励和勇气来到了我们面前；在神的意愿之下，它将我们的感情变得至为平静、坚忍……您崇高的来信使我们所有人感到振奋，并为我们带来了

新的力量和决心；因为，如果您能够在这种巨大的悲痛和震惊中重新振作并安慰我们，那么我们也责无旁贷，唯有振作起来，服务于母亲般的圣道……我知道，出发前往圣地之前，您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但我们都深深地爱您，而且我们所有人都空前地团结和坚强。带上我们的爱、同情和我们所有人的心前往神圣之地[①]去吧，我们将永远与您同在。

由于护照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守基·阿芬第发电报到海法，说他月底才能到达。在布姆菲尔德夫人和鲁汉盖泽的陪同下，他于12月16日乘船从英国出发，船在埃及停靠后，他换乘火车并于12月29日下午五点二十分抵达海法。许多朋友前去火车站接他回家；据说，抵达海法后的守基·阿芬第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上台阶时不得不由人搀扶。他亲爱的姑姥——阿博都-巴哈的妹妹正在家里等候着他。姑姥是唯一能够多少减轻一些他的痛苦的人。她总是那么瘦弱，那么安静，那么谦逊。在过去的几周里，她表现得坚如磐石，让信徒们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能够有所依靠。在这个异常艰难和危险的时期，她的灵魂和品质、她的教养和身份，使她能够胜任她在圣道和守基·阿芬第的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

阿博都-巴哈并没有严重的疾病，当祂出人意料地在安详中与世长辞时，祂的家族成员怀着烦乱的心情到处搜寻祂的文件，试图找到祂在偶然间留下的对祂死后安葬地的任何指示，却无果而终，于是他们便将祂葬在与巴孛陵殿内宫毗邻的三个房间的中心位置。他们发现了祂留给守基·阿芬第的遗嘱（其中包括祂在不同时间写下的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共同组成了一个文件）。现在，对守基·阿芬第而言，聆听遗嘱的内容是一项痛苦的义务；在他到达海法的几天后，他们为他宣读了遗嘱。为了对这种情况给他带来的影响有些许的理解，我们必须记住，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不只是对我，也对在西方朝圣者招待所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说过），他事前并不知道圣护制度的存在，更不知道他被指定为圣护；在他的预想之中，由于他是最年长的外孙，阿博都-巴哈可能会留下关于如何选

① Hallowed Spot，指巴哈欧拉的陵殿。——译者注

举产生世界正义院的相关指示，而他可能会受到委派负责监督相关事宜的执行，并作为正义院选举会议的召集人。

房子里现在空荡荡的，空的可怕，在房间里迈出的每一步都让他回想起教长，而教长已经永远离去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绝望之中。他在给怀特夫人的信中写道："我时常感到消沉、悲恸和不安，因为不论我去哪里，我都会想起挚爱的外祖父；不论我做什么，我都会感到祂如此突然地置于我瘦弱肩头上的重担。"这封信写于1922年2月6日，也就是他刚刚回来一个多月的时候。信中，他向朋友敞开心扉："在这个弘扬光荣信念的信仰中，我应挺身奔赴前线，担起命中注定的职责，但在此之前，我强烈地感受到我迫切需要一次彻底的内在的重生，我需要力量、自信和圣灵从我渴望的灵魂中流露出来。我知道，祂不会置我于不顾，我信赖祂的指引，相信祂的智慧，但我恳求的是永恒的信念和保证，让我确信祂不会令我失望。任务如此艰巨，而我深知自己身单力薄，因此，每当我面对使命的时候，我只能退却，并沮丧不已……"很显然，这位高贵的女士此前在写给守基·阿芬第的信中给予了他巨大的鼓励，他告诉她，读信的时候他"感动得流下泪水"，继而呼号道，"在我年轻而脆弱的生命中，我多么希望时时刻刻都能有强大的感染、有力的提醒以及鼓舞和安慰的话语！"他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作为信的结尾，告诉她他曾多次向家中女眷提到她的明智忠告，"不要把信仰变成一个教派"。他在信尾署名道："你亲爱的朋友"。

就在同月，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祂的离世让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痛苦和悲恸……"而在这种煎熬中，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发现，他不仅被指定为"自那'孪生圣树'连理而生的神圣主枝"，其树荫"荫庇全人类"，而且他还是"因他是上帝之表征，蒙选之枝，圣护，所有阿格桑[①]、阿夫南[②]、圣辅和上帝所钟爱的人们皆须顺从之人"。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便被委以此重任。我们只能希望，这一事实的启示能给他带来些许安慰。阿博都-

① 巴哈欧拉的男性后裔。

② 巴孛的亲属。

巴哈的遗嘱有三部分；数年之后，守基·阿芬第写道，“它的第一部分”是“祂被囚禁于阿卡监狱时写成的，那是祂一生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一部分中，守基·阿芬第被赋予了“圣护”这一神圣的身份，但他的外祖父一直小心地保守着这个秘密，祂在遗嘱中亲笔写道，“这部手稿在地下保存了很长时间……圣地的局势正处在动荡之中，所以手稿也未被动过。”

守基·阿芬第也发现了他是“上帝之言的阐释者”，反对他便是反对上帝，与他斗争或辩论便是与上帝斗争或辩论，不相信他就是不相信上帝，偏离、脱离和背弃他诚然就是偏离、脱离和背弃上帝，并且教长已唤起上帝的暴怒、激愤和报复降临于这样的人！他还得知，他将是世界正义院不可变更的终身领袖，而且他和正义院将得到巴孛和巴哈欧拉一贯准确的指引，他们的决定将是来自上帝的旨意；违背他或他们就是违背上帝，反抗他或他们就是反抗上帝。他发现，他要在有生之年任命他的长子，但如果这长子并没有“此儿乃其父之神秘化身”的表征，他便需要遴选另一脉系作为继承人。他发现教长一直深情地挂念着他：“ 阿博都-巴哈所钟爱的信民啊！无微不至地照顾守基·阿芬第乃是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莫让绝望与悲伤之尘土玷污他愉悦的本性，让他能在幸福、快乐和灵性中逐日长大，直到成为一棵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有人将以一肩之力担起世界的重量，但我们很难接受这个人便是自己。信徒们接受了守基·阿芬第，但是他要经受的磨难则是要努力接受自己。

毫无疑问，在守基·阿芬第到达海法之前，至大圣叶以及教长家族中的几个被选出的人至少已经知道遗嘱的核心主旨了，因为大家需要确认教长关于自己的埋葬有什么安排。1921年12月21日，至大圣叶给波斯和美国的信徒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内容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中，她在给美国信徒的电报中说道：“1月7日世界追悼会。为团结和坚定祈祷。教长遗嘱中有详细指示，译本日后送达。告诸朋友。”但是遗嘱中的条款在向守基·阿芬第宣读前，也就是1922年1月3日正式宣读之前，并没有公布于世。

我坚信，在那段日子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守基·阿芬第和教长

家族承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我经常看到人近晚年的他紧张不安，拒绝吃喝，拒绝说话，在被子下辗转反侧，除了痛苦，什么都做不了，像是被大雨击倒在地一样；这种状况有时会一连持续几天，直到他体内的力量调整平衡并使他重新站起来。他会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无人能懂的世界。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知道这是一条苦难之路，但我必须坚持走下去，一切都必须在苦难中完成。"

在守基·阿芬第担任圣护的前几年，他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被抛弃以及认为自己无价值的感觉，同时又深深地怀念着外祖父，这令他深受困扰。而当我们考虑到另外一个事实时，圣护的这些感觉就显得更为令人心碎。这一点他的母亲曾向我和几位波斯女士说到，一位美国信徒在信中也曾提及。教长去世时这位信徒在场，这封信就写于教长去世后的几天。事实上，在阿博都-巴哈离世前的几周，祂曾忽然来到守基·阿芬第父亲的房间，说："给守基·阿芬第发电报，让他即刻归来。"圣护的母亲告诉我们，得知这一点后，她和她的母亲商量了一下，她们认为这样做会无谓地惊动守基·阿芬第，于是她们决定只是把教长的指示写信告诉他，而当信件送达时教长已经离世。守基·阿芬第的母亲说，教长身体状况一直非常好，她们从来没有想到教长会与世长辞。毫无疑问，这件事的初衷是好的，但这也是很典型的家庭干涉，她们自认为这只是家务事，目光太过短浅而没能够认识到阿博都-巴哈总是对的，她们应当始终服从。毫无疑问，这种悲剧式的人为因素在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的时代都带来了不计其数的危害。无论如何，这件事的发生使得守基·阿芬第没能与外祖父见上最后一面。守基·阿芬第时常说，他觉得如果他能够见教长最后一面，教长可能会给他提出一些特别的建议和指示，更不用说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与教长做最后的道别会给守基·阿芬第带来多么大的安慰了。

守基·阿芬第到海法后住进了他原来的房间，就在阿博都-巴哈的隔壁；但是，过了几天他就搬到了隔壁的一位姑姑家中，并且在海法期间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23年夏天，至大圣叶在教长家的屋顶上为他建了两间房和一间小浴室，他才搬走。毫无疑问，当时他决定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是有许多原因的：原来的房间会给他带来

痛苦的回忆；来教长房间的人络绎不绝。另外一个因素则体现了守基·阿芬第的典型作风。他是一个有着强烈正义感的人。他自己的家人因为抚养出一个地位很高的儿子而得到了诸多荣誉，因此，他现在必须要和他父母这一辈的亲属以及表亲堂亲们一起分享这份荣誉和厚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种平衡。

站在图德·波尔的办公室里，守基·阿芬第读完了那封灾难性的电报。他得知了教长离世的消息，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在这样一次返乡之中，他根本没有机会从中恢复过来。尽管他现在状况不佳，但教长的《遗嘱》现在授予他的头衔已经将责任的重担赋予了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责任再无其他个体或机构能与他分担，就像教长在巴哈欧拉过世时也担起了重大的责任一样，当时巴哈欧拉在祂的圣约之书中明确指出阿博都-巴哈为祂的继承人。守基·阿芬第必须做出决定，这第一个决定就是以何种方式将遗嘱公之于众。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获悉，守基·阿芬第曾在1922年1月3日拜访巴孛陵殿以及外祖父的陵墓；当天晚些时候，在他姑姑家中，教长的《遗嘱》被当着九个人的面宣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阿博都-巴哈家族的成员，不过守基·阿芬第并不在场；同时，教长的印章、签名和祂亲笔所书的全部内容都展示给了众人。圣护要求一位在场者——此人是一位来自波斯的信徒——做了一份真实的副本。几周之后，守基·阿芬第写信给一位年长的巴哈伊，信中说道：“1922年1月7日，在阿博都-巴哈的家中，祂的《遗嘱》向在场的来自波斯、印度、埃及、意大利、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巴哈伊进行了宣读……”此次集会圣护也没有参加，显然是由于身体欠佳的原因，同时也与他处事谨慎的特点有关。根据当地习俗，在逝者四十天忌日时应当举行纪念性集会。一些巴哈伊和很多名流聚集到了教长家的大厅，这其中也包括海法的行政长官。他们先吃了午饭，然后在原地召开大会，与会者做了怀念已故教长的讲话，并且宣读了教长遗嘱中的条款。客人们热切地盼望守基·阿芬第对他们讲几句话，有一位朋友将这一消息传给了他。当时，守基·阿芬第正与至大圣叶待在在她的房间里，他说，他太伤心了，无法满足客人们的要

求。他很快地写下了几句话让别人代为宣读，他在文中表达了他本人和阿博都-巴哈一家真挚的谢意，感谢行政长官以及发言者们的光临，他们真诚的话语“唤醒了祂在我们心中的神圣记忆……我希望我们作为祂的亲属和家人能够通过行动和语言，证明我们无愧于祂给我们树立的光辉榜样，从而赢得你们的尊敬和爱戴。愿祂永恒的精神与我们同在，并将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这篇短文的开篇写道：“对于年轻的我来说，这打击来得太过突然，太过沉痛，以至于在挚爱的阿博都-巴哈所爱之人参加的集会上，我却无法出现。”

教长遗嘱中的条款更适合由至大圣叶来向巴哈伊们宣告，而不是守基·阿芬第本人。1月7日，至大圣叶向波斯发了两封电报，电文如下：“世界各地的追悼会已经举行。诸世之主在《阿博都-巴哈遗嘱》中启示了祂的命令。复本将被寄出。通知信徒。”另外一封这样写道：“《遗嘱》推立守基·阿芬第为圣道之核心。”有必要记住，阿博都-巴哈显然预见到了将来的情况，祂在回答德黑兰灵理会的疑问时曾说道：“你们曾经问过，在政府那里和颁发的法律文书中，捐赠的不动产和建筑应该登记在谁的名下。它们应该登记在米尔扎·守基·拉巴尼的名下，他是米尔扎·哈迪·设拉子（Mirza Hadi Shirazi）的儿子，现在在伦敦。”不管教长升天给波斯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悲痛，引起了多么巨大的震惊，守基·阿芬第的任命在那些消息更加灵通的朋友们那里并未引起太多惊奇，特别是在接到阿博都-巴哈这样一个启示性的指示后。至大圣叶在1月16日发给美国的电文如下：“《遗嘱》任命守基·阿芬第为圣道之圣护和正义院之领袖。通知美国朋友。”尽管在处理接踵而来的事情中，守基·阿芬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老练和沉稳，但他还是非常依赖至大圣叶，至大圣叶的性格、身份以及对圣护的爱都使她立刻成为了圣护的后援和庇护。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守基·阿芬第立刻从遗嘱中挑出了八篇文章，并将这些文章在巴哈伊信徒之间传播；其中只有一篇说的是他自己，文章非常简短，引用如下：“阿博都-巴哈所钟爱的信民啊！无微不至地照顾守基·阿芬第乃是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他是继阿博都-巴哈之后圣道的守护者，故而，阿夫南、圣辅（栋

梁）及主所钟爱的人们皆须服从他、仰赖他。”在《遗嘱》中所有提到他自己的振聋发聩的伟大篇章中，守基·阿芬第最初选择了最平淡、最平和的一篇在信徒中间传播。从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引导，并引导着他人。

必须将守基·阿芬第担任圣护的最初几年看成一个不断跌倒又爬起的过程，他常常因受到的可怕打击而步履蹒跚，却仍衷心不渝地担负起他的任命。正是他对阿博都-巴哈的爱让他能够不断向前。他呼号道：“但是我相信”，“而且是坚定地相信祂的力量、祂的指引、祂永存的精神……”在一封于1922年2月写给阿博都-巴哈的侄子纳伊尔·阿夫南（Nayir Afnan）的信中，守基·阿芬第灵魂的痛苦得到了清楚地反映：“当我正处在伤心、忧虑和痛苦之中时，你的信送到了……祂的离世让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痛苦和悲恸，祂置于我柔弱而年轻的肩膀上的重任令我难以承受……”他接着说道：“随函附上亲爱的教长的《遗嘱》的复件，你读一下，看祂在亲属的手中遭受了什么……你还会看到祂让我承担的重大责任，只有祂言辞的创造力量才能帮我面对……”这封信不仅表明了他的感受，而且，鉴于在巴哈欧拉升天后，收信人曾是教长的敌人之一，属于祂在遗嘱中强烈谴责的那一支亲属，因此，从这封信中我们也能看出，过去在守基·阿芬第的心中就如明镜一般，但同时，他又希望在当前的环境下得到此人的支持和效忠。

守基·阿芬第最早的信件表现出了他独特的力量、智慧和庄重。在一封于1922年3月19日写给贝鲁特美国大学的一位教授的信中，他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地位：“回答你关于我是否受到正式指派来代表巴哈伊团体的问题：阿博都-巴哈在遗嘱中指定我为世界正义院的领袖，正义院将适时地由国家总会选举产生，它们代表了不同国家的巴哈欧拉的追随者……”

不过，我们切不可认为教长《遗嘱》的公布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轻而易举地使圣道步入了一个新纪元。事实上远非如此。在守基·阿芬第到达海法之前，至大圣叶不得不于12月14日给美国发电报，内容如下：“此巨大考验来临之时，朋友们应坚定团结地保卫圣道。圣约破坏者通过全世界的媒体和其他渠道开始活动。选择智

慧冷静的人组成委员会，处理美国的媒体宣传。”这封电报中表明的事件是令人担忧的，而且我们不能将它们与阿博都-巴哈去世时美国的严峻形势分开来看。教长对这个国家破坏圣约的事态关注已经有段时间了，祂甚至在几年前写的一封信中就预测到在祂去世之后这里会波澜骤起，并在信中为保护信徒而祈祷。1921年11月8日，祂给祂信赖的通信者罗伊·威廉（Roy Wilhelm）发了电报，内容如下：“朋友们的处境和健康状况如何？”第二天，威廉先生不得不回复道：“芝加哥、华盛顿、费城煽起了以弗纳尔德（Fernald）、戴尔（Dyer）、沃森（Watson）为核心的背叛。纽约、波士顿拒绝加入，团结一致地支持有建设性的方针。”11月12日，阿博都-巴哈立刻回复了电报，用最严厉的措辞清楚地表达了祂的忧虑：“与麻风病人坐在一起的人会得麻风；与基督在一起的人避开了法利赛人[①]，并憎恶犹大。毫无疑问要躲开背叛者。电告古多尔、特鲁和帕森斯（Parsons）。”同一天给罗伊·威廉在第二封电报中，教长说道：“我从神圣恩赐中乞求健康。”这些是美国收到的来自教长的最后信息。

阿博都-巴哈的突然离世没有给这种局势带来任何补救。毫无疑问，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至大圣叶电告美国朋友们，教长在祂的遗嘱中留下了详细的指示。自从巴哈欧拉升天之后，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ʻAlí）无休止的煽动从未减弱，他在美国的党羽也很警惕且十分活跃。当时，《事实》（*Reality*）杂志作为一份巴哈伊刊物，其栏目竟然是圣约破坏者及其活动的新闻；这令那些更为智慧、经验更为丰富的信徒大为忧虑，尤其是那些曾有幸结识阿博都-巴哈的人，但是，那些年轻、缺乏经验且思想“解放”的人却无动于衷，意识不到他们的危险。正是由于这种病态、模糊的态度，阿博都-巴哈在祂离世前不到两个月时写了一篇书简，发表在《西方之星》上。在书简中，祂努力向朋友们澄清，如果草率地对待这样的情况，他们将面临巨大的危险，而且巴哈欧拉曾警告祂的追随者，一种难闻的气味将传播开来，信徒们应避开它，而这种难

① 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犹太祭司阶层，反对耶稣，耶稣最后被判死刑也是因他们的指使。——译者注

闻的气味指的正是圣约破坏者。守基·阿芬第现在则沿袭了这一形势。

1922年1月18日，也就是教长遗嘱中的条款公开宣布后不到两周，一位年长且十分可靠的美国信徒给守基·阿芬第写信，内容如下："如您所知，在美国的圣道中，我们正经受着背叛者带来的巨大麻烦和悲伤。这一毒药深深地渗入到了朋友们中间……"在许多报道中，大量涌现出针对新任圣护的非常具体的指责和详细情况的罗列。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带着感人的诚恳和信任，东西方的巴哈伊扶持着他们年轻的领袖，公开宣告他们的爱和忠诚："我们渴望在每一个方面协助圣护，我们的心对压在他年轻的肩膀上的重担深为关切……""我们已在华盛顿收到了消息，得知挚爱的教长已将圣道的指引和保护交到您手中，并指定您为正义院的领袖。我们写给您的这短短的几行字，全心全意地回应着我们挚爱的主的神圣指示，并保证将竭尽所能地给予全部的支持和忠诚……""受敬爱者所爱之人，"信仰在美国的两位栋梁这样称呼他，"得知教长并非让我们全无安慰，而是让您——祂所挚爱之人——成为了祂的圣道团结之中心时，我们的心灵在欢唱，这样一来所有的朋友们便能在心中找到安宁和信念了。""我们的生命处在最为黑暗的时刻，直到至大圣叶神圣的电报带着第一束光线到来，这便是您被仁慈的主任命为我们的圣护、我们的领袖，以及圣道的圣护和正义院的领袖。""无论圣道之圣护希望或建议我们这些仆人们去做些什么，我们都将全心全意地去做"在一封于1922年8月写给至大圣叶的信中，一位年长的信徒（刚刚从海法返回）写道："朋友们对守基·阿芬第充满了深深的感情，他们想做的事情除了遵从主的命令，别无其他，即我们都应支持圣道之圣护……"另外一位年长的信徒大约在同一时间写信给守基·阿芬第，向他保证，尽管"我们仍有许多困难和痛楚，但我感觉到了那种治愈的力量，总体而言，相信圣道在美国从未比现在更健康、更根深蒂固……"无疑，这些信息是一种巨大的慰藉，但是与西方信徒的数量相比，与圣护的心碎相比，它们的数量似乎仍然少得可怜。还有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曾经最坚定地支持他的人，后来也离开了圣道，甚至站到了圣

道的对立面。龙卷风将大树连根拔起，却使卑微的小草未受影响。

毫无疑问，听到教长遗嘱中的条款之后，各地的巴哈伊被一股爱与忠诚的巨大浪潮所席卷了。然而，遗嘱对圣约破坏者的影响却使他们采取了暴力行动。就像一个多头的怪物，它的每一个头都竞相发出恶毒的嘶嘶声。它们立起身来，向教长年轻的继任者发起攻击。阿博都-巴哈的异母弟弟穆罕默德·阿里，阿里的弟弟、儿子和同党，信仰在波斯的夙敌，还有那些不忠不满者、漠不关心者、满怀野心者，不管他们在哪里，也不管他们是谁，都开始挑起事端。1月16日，两名在德黑兰服务的资深美国巴哈伊写信给教长的家族，信中附上的照片展示了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的信件透露出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即阿博都-巴哈曾写信寄往波斯，为了启迪朋友们，教长随信附上了一封守基·阿芬第写给祂的信，信的内容是关于圣道在英格兰的消息。这封信在教长去世后才送达，不过它显示出了教长对外孙的自豪之情，而且，当我们把它和随后发生的教长去世和圣护任命放在一起来看时，这封信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这些信继续说道："……掀起了针对圣道的愤怒抗议……但羊儿们并没有被驱散和遗忘，它们坚定、忠诚、团结一致，支持挚爱的教长赐予我们的勇敢、年轻的领袖。守基·阿芬第在我们中间一直家喻户晓，今天，整个巴哈伊国度向他表示欢迎和问候。'奉主之名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①]……""我希望你能听到信徒们充满感激之情的表达：'现在我们得到了安慰。现在我们满意了。圣道变得年轻了。'"

圣护在1月16日给波斯的巴哈伊写了第一封信，鼓励他们要保持坚定，保护信仰，并令人动容地表达了他对挚爱的教长离世的悲痛。1月22日，守基·阿芬第给美国的巴哈伊发了电报："美国人的不渝忠诚和崇高决心使神圣之叶深感安慰。此坚定之日。接受我爱的合作。"之前一天他已经给他们写了第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在这个清晨，当早上的阳光刚刚撒向圣地时，失去亲爱的教长的阴云仍厚厚地悬于心灵之上，而我仿佛感觉我的灵魂在思慕之爱

① 语出《路加福音》13章35节。——译者注

中，满怀希望、漂洋过海，转向祂所爱之人的伟大群体……”他已经把手置于舵柄之上，并看到他必须驶上的航道清楚地在他前方，用他的话说，也就是那“宽阔笔直的传道之路”。团结、无私、冷静、谨慎、小心、实现教长愿望的热切努力、对祂精神存在的感知、避开圣道的敌人——这些必须作为信徒们的目标和生命力。四天后他给日本巴哈伊写了第一封信：“尽管在这些阴暗的日子里我深为沮丧、伤心，但每当我想起离去的教长满怀信心地寄望于远东土地上的信徒时，希望便又在我内心重燃，并驱走祂的离去所带来的阴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都是祂的侍从和秘书，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在祂面前打开你们的请愿书时祂容光焕发的样子……”

在这段日子里，守基·阿芬第还在忙着把外祖父的遗嘱翻译成英文。艾摩金·霍格（Emogene Hoagg）在教长去世前已经在海法住了一段时间，他在1月24日写道：“不久亲爱的教长的遗嘱就能够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读到了。守基·阿芬第现在正在翻译。”

守基·阿芬第因此而忙碌着，他聚积力量，开始给不同国家的巴哈伊写一些类似于以下这封信的信件。就在这段时间，他收到了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Sir Herbert Samuel）的信，写信的日期为1922年1月24日，信的内容如下：

> 亲爱的拉巴尼先生：
>
> 我必须告知你我已于1月16日收到了你的来信，并感谢你在信中的亲切话语。
>
> 如果阿博都-巴哈阁下令人永远悲伤的去世影响到了你在牛津完成学业，那将是不幸的，而我希望这样的情形不要出现。
>
> 我非常有兴趣了解你们为巴哈伊信仰的稳定组织所提供的措施。
>
> 无论何时，如果你在耶路撒冷，若能见到你我将十分荣幸。
>
> 赫伯特·塞缪尔　谨启

不管这封信的口吻多么友好，它实际上是在要求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知国王陛下的政府。考虑到穆罕默德·阿里的活动，这也

不足为奇。在阿博都-巴哈去世后不久，这位恼火不满、背信弃义的异母弟弟基于伊斯兰法律（他假装他仍有权成为巴哈欧拉的继承者！）正式提出了一项要求，即作为阿博都-巴哈的弟弟，他现在有权获取其财产的一部分。他已经派人去叫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一直住在美国，并在那里宣传他父亲的主张）也加入到这次对教长本人及其家族的新的直接攻击中。这是他真实本性的体现，他对此并不满意，于是向当局申请将巴哈欧拉陵殿的监护权转交给他，理由是他是阿博都-巴哈的合法继任者。由于这看起来是一个宗教问题，英国当局对此予以拒绝；随后他向穆斯林首领发出请求，让阿卡的穆夫提正式主管[①]巴哈欧拉陵殿；不过，这位显贵却说，他不认为他能这么办，因为巴哈伊教义与沙里亚律法不相一致。所有其他的途径都失败了，他又派自己的弟弟巴迪乌拉（Badiullah）和他们的一些支持者去巴哈欧拉陵殿。1月30日（星期二）那天，这些人从巴哈伊看护人手中强行夺取了圣坟的钥匙，并因此断言，穆罕默德·阿里有权成为父亲安息之地的合法监护人。这一不道德的行径在巴哈伊团体中制造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于连阿卡的行政长官都下令要求把钥匙交给当局，并在陵殿设置了守卫，但当局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拒绝把钥匙归还给任何一方。

不难想象，这对守基·阿芬第来说又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消息在天黑之后由一位气喘吁吁、情绪激动的信使送到，想到至圣遗迹在几十年来首次落入圣约中心的夙敌之手，所有信徒的激愤、忧虑之情都难以用语言形容。有一位美国信徒在1922年3月间与守基·阿芬第一起拜访了陵殿，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一情况："在我最近三次对巴吉的拜访中，每一次都只能走到圣坟的庭院——内部的圣堂被封上了……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预见这个事件最后会怎样。守基·阿芬第因此事深感忧虑。"守基·阿芬第压下个人的情感，忠实地遵循着教长在其他那些充满攻击和风暴的日子里做出的榜样，在陵殿的照明安装过程中，他就灯光在陵殿内外的安放位置冷静地给出了指令。

① 解释伊斯兰教法典的官员。——译者注

图九　教长的继任者

这张照片很可能拍摄于阿博都-巴哈开启其西方世界的伟大之旅的那段时期。

图十　在贝鲁特的求学时光（约1914年）

守基·阿芬第与叙利亚新教学院的同学们在一起，他站在第二排左起第三个。

图十一　身着东方长袍的守基·阿芬第

在去英格兰学习之前，圣护常穿成这样。

图十二　二十岁出头的守基·阿芬第

图十三　教长的秘书（约1919年）

守基·阿芬第坐在卧室（紧挨教长房间）阳台的一台小打印机旁，很可能是在翻译外祖父的书简。

图十四　俄国式茶炊

守基·阿芬第（左起第二个）在阿博都-巴哈于海法的家的马房房顶上。

图十五　守基·阿芬第和哈里·兰德尔（1919年）

拍摄于阿卡附近的里兹万花园。

图十六　成为圣护之前的守基·阿芬第

图十七　教长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

阿博都-巴哈说："看他的眼睛，像水一样清澈。"

图十八　教长与一些卓著的巴哈伊在一起

祂的继任者守基·阿芬第（左数第二个），阿格尼丝·帕森斯（教长身后），J. E. 埃斯尔蒙特和卢图福拉·哈基姆（最上一排，从右到左）。拍摄于守基·阿芬第在1920年3月前往英国之前。

这位信徒接着写道，当他在海法时，圣护给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King Feisal）发了电报，就政府在夺取神圣的巴哈欧拉居所（各地巴哈伊的指定朝圣地点）时的行为向他提出上诉，而且守基·阿芬第还安排其他的巴哈伊社区也发出了类似的信息。这对守基·阿芬第又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就接连遭受了四次打击，每一次都给他的整个身心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在这种局势下，守基·阿芬第发现自己难堪重负。尽管大部分信徒都是忠诚的，但圣道正在受到敌人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阿博都-巴哈的离世增加了他们的胆量，也令他们大为欢喜。一位年长的巴哈伊（当时他本人是海法行政长官的秘书）告诉我们，地方当局通常会称圣护为“小子”。除去年纪轻轻，这位没有胡须的牛津学生，无论其举止多么庄重，他都拒绝把自己假装成人们所熟知的、作为海法特征之一的有胡须的宗教领袖的样子——祂或被深爱，或被憎恨，但作为杰出人士，总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守基·阿芬第拒绝像教长那样戴头巾、穿东方长袍；他拒绝在星期五去清真寺，这是阿博都-巴哈惯常的行为；他拒绝花时间与前来拜访的穆斯林毛拉在一起，而这些毛拉们习惯于和教长在一起，并且毫无疑问，他们现在迫切地要评估这位被教长放在祂自己位置上、作为信仰领袖的青年。当阿博都-巴哈的家族成员向圣护抗议他没有遵循教长的方式时，他回应说，他必须心无旁骛地奉献于圣道的工作。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他的痛苦，并在家族和当地社区内带来了很大的恐慌。其中一些人悄悄地怀疑守基·阿芬第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需要年纪更长、更睿智的人在他身边，而且世界正义院越早成立，对圣道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方面就越好。

毫无疑问，在他深深的忧虑之中，崇拜、敬慕、建议、质疑、警告、挑战交替存在，他感到了对支持和咨询的需求。1922年3月，他把一群代表和著名的巴哈伊聚集到了海法：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已和他一起从英格兰返回，艾摩金·霍格已经住在了海法；除了这些人之外，英格兰的罗森堡小姐（Miss Rosenberg），美国的罗伊·威廉、芒福特·米尔斯（Mountfort Mills）和梅森·里米（Mason Remey），法国的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内（Hippolyte

Dreyfus-Barney），德国的孔叙尔（Consul Schwarz）和艾丽斯·施瓦茨（Alice Schwarz）夫妇，以及图德·波尔少校也都加入了进来。两位来自波斯的著名巴哈伊传教者阿瓦雷（Avarih）和法泽勒（Fazel）也都被召集到了海法，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抵达时间推迟了许久；后来，圣护把他们分别派到欧洲和北美，去执行长期的传教任务。缅甸的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美国的科琳娜·特鲁（Corinne True）和她的女儿凯瑟琳（Katherine）也随后抵达了。在这头几个月期间，其他的朝圣者也都来来去去。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不仅许多较为年长的巴哈伊认为接下来的工作是成立世界正义院，就连海法的行政长官本人也在与一名被守基·阿芬第派去的巴哈伊的对话中提出了这一话题，他说，他感觉当正义院成立、巴哈伊圣所注册在正义院名下时，整个问题也就不再是一种家族争吵的状态，而是被放在了一个永久性的宗教组织的坚实的法律基础上。不仅一名英国官员这样认为，一些信徒以及阿博都-巴哈的家族成员也认为应该如此，这一观点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圣护的态度。他的年轻、他自己在使命期开始阶段的状态使他们相信，在这个由他担任永久领袖的机构中，他需要其他成员的帮助和建议，同时也需要获得一个更为坚实的法律基础，以便在此基础之上，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敌人们根据穆斯林的沙里亚律法对在这两个国家的巴哈伊圣所提出的所有权的要求予以回击。

持有这样的观点成了一种趋势，同时，守基·阿芬第与被他召集来的巴哈伊也进行了商议。尽管守基·阿芬第可能在个人情感上时常感到极度伤心，但当他面对这样的趋势和他人的建议时，他的反应却总像一位卓越的将军，将战场中央所有的战斗尽收眼底，而从不被细节和紧急情况遮蔽双眼。前面提到的日记记录道：“在我拜访守基·阿芬第的最初的日子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与芒福特·米尔斯、罗伊·威廉、德雷富斯·巴内夫妇、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和图德·波尔少校以及之后到来的施瓦茨夫妇的商议上，商议的内容是关于世界正义院的建立。我大致听说了他们所讨论的事情。看起来，在世界正义院成立之前，地方正义院和国家正义院必须在那些已经有巴哈伊的国家运作起来。我听说守基·阿芬第召集

了一些来自波斯和印度的朋友们来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赶到，没能与我上面提到的几位来自西方的朋友们会面。”

这些讨论的结果似乎是这样的：圣护指示施瓦茨夫妇返回德国，为地方性机构和国家性机构的成立而工作；罗伊·威廉和芒福特·米尔斯要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向美国传达这一消息：执行委员会（北美巴哈伊的国家性机构）要在功能上变成一个立法机构，指导所有的国家层面的事务，而不仅仅是执行在年度代表大会上由代表们经协商做出的决策和提出的建议。毫无疑问，在这里的英国巴哈伊同样也要向他们自己的团体传达这一完整的概念。这实际上意味着守基·阿芬第在成为圣护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之后，已经开始按照阿博都-巴哈遗嘱中的指示，建立信仰的行政秩序。

但是，这件事情的困难程度却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当时，他指定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机构，暂时作为一个灵理会。我们发现，该机构在其1922年4月7日的档案中记录道，他们收到了一封至大圣叶的来信，信中写道：“上帝圣道之圣护、特选之枝、巴哈人民之领袖守基·阿芬第在伤心和无限悲痛的重压下，已经被迫离开了这里，到别处度过一段时日，以获得休息和恢复，之后会回到圣地继续提供服务、履行职责。”她接着说道，她随函附上了守基·阿芬第的信件，按照这封信的指示，圣护已指定她在其离开期间管理所有巴哈伊事务，这是与阿博都-巴哈的家人以及一个选定的灵理会商量后的决定。在大表兄的陪同下，守基·阿芬第已于4月5日离开海法，去了欧洲。至大圣叶把这一决定和圣护的信件传给了《西方之星》的编辑，《西方之星》发表了信件的译文，以及至大圣叶本人的复本和守基·阿芬第的波斯文原件。无疑，类似的信息也传给了其他主要的巴哈伊中心。在写给《西方之星》的信中，至大圣叶解释说，她已经组织了一个灵理会，成员都是由守基·阿芬第指定的。圣护的信件如下：

祂乃上帝！

神圣的阿博都-巴哈升入了阿卜哈王国，在这一悲痛的事件和巨大的灾难之后，作为一名仆人的我深受悲伤和痛苦的打

击，并深陷圣道的敌人所制造的麻烦之中，因此，在这样的时期和环境之下，我认为我身处此地无益于我重要、神圣使命的履行。

鉴于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把圣道在国内外的事务都交由神圣之家监管、至大圣叶领导（愿我的灵魂为她牺牲），这是我当下唯一能做的，直到我承蒙上帝之恩，获得了健康、力量、自信和灵性的能量，并按照我的目标和愿望将服务工作完全、持续地掌握在手中之时，我将实现我至为灵性的希望和志向。

祂的门槛之仆
守基

4月8日，至大圣叶给全球的朋友们写了一封信。她首先确认收到了他们发来的表达忠诚的信件，并说，守基·阿芬第正依靠着他们来传扬巴哈欧拉的新天启；从现在开始，巴哈伊世界必须通过灵理会团结在一起，地方性问题必须提交给灵理会。接下来她继续说道：“在我们挚爱的阿博都-巴哈升天后，守基·阿芬第深受打击……因而他已然去寻求必要的安静了，并在这样的安静之中沉思摆在他面前的艰巨任务，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暂时离开了这些地区。在他离开期间，他指定我为他的代表，而在他做出这一巨大努力之时，阿博都-巴哈的家人坚信你们都将成功地推进巴哈欧拉的圣道……”这封用英文打印出来的信件署名为波斯文的“巴希叶”，并以至大圣叶的印章做了封印。

纸面上的文字看上去十分镇静，但在它们背后，守基·阿芬第的心灵和大脑中却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他走了，”至大圣叶写道，“去往各个国家。”他与表兄一同离开，去了德国求医。我记得他曾告诉我，医生们发现他几乎没有任何放松，并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但当他离开了权力和活动的中心时，他发现自己获得了部分痊愈，在他之前的许多人也有这样的感受。几年后的 1926 年，他给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写了一封信。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二人就相识了，很明显，守基·阿芬第感觉德雷福斯是一位亲密的朋友，可以对他敞开心扉。圣护在信中说，“在去往伯尔尼高地（Bernese Oberland）

的路上，”他已经收到了德雷福斯的来信，“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这里的山脉十分迷人，在山脉的要塞和幽深处，我会尽力忘却长时间以来一直折磨着我的极度烦扰……我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问题，你对这些问题也已经十分熟悉。在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下，我感觉我很不愿意甚至也没有办法进行任何关于它们的严肃讨论，对此我深感自责。海法的氛围令人难以忍受，要实现彻底的改变也是不切实际的。但要将教务转移到另一中心则是难以想象、不受欢迎的，而且在许多人的观念之中，这也是令人反感的……我的言辞远不能表达我的记忆之中所承受的巨大苦难。”

在阿博都-巴哈离世后的前几年，尽管守基·阿芬第经常怀着年轻人的好奇心在欧洲旅行，但也未能片刻忘却他繁重的工作和责任。他一次次地回到那些荒凉、高耸的山脉之中，回到它们巍峨的寂静之中。

守基·阿芬第曾在一位德裔瑞士人家中寄宿过许多个夏天。我们从他与这位瑞士人的法语通信中最能看出他的天性、他对“善良、朴实的人”的爱以及他细腻的情感（这是他的友谊中最常见的特征）：

亲爱的豪泽先生（Mr. Hauser）：

我已收到了你亲切的明信片并看到了少女峰（the Jungfrau）的景色。在我暂住你家时，你的友好、体贴和好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些记忆被栩栩如生的因特拉肯（Interlaken）小城唤醒了。所有这些我都不会忘记，而且我将永远带着感激的情感珍视这段温馨的记忆。

寄给你一些邮票，希望你会感兴趣。

亲爱的豪泽先生，我全心全意地祝愿你新年快乐，并祝你长寿、富足、幸福！

希望能再见到你，永不会忘记你。

你忠诚的

守基

1923年12月22日

第二年的9月26日，守基·阿芬第又一次写信给他：

我亲爱的豪泽先生：

我回来了，在我回家的路上，我想写的第一封信便是给我难以忘怀的、亲爱的豪泽先生的。住在你家时，我感受到了风景如画的瑞士带给我的愉悦，你热情的魔力也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褪去。

舒适、简朴的霍荷韦格木舍（Chalet Hoheweg）为我提供了一份安静，我永远不会忘记它的美好，而回忆我在此之前的经历和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艰险时，我常常感觉到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希望有一天能在我的家中、在我家庭的安全感之下见到你，向你表示我的感激和友谊！而如果不能做到，我希望你会永远记住我的感激和挚爱。

我刚刚通过信件收到了一些新的波斯邮票，上面有新沙阿的肖像，希望你会感兴趣。

我全心全意地祝愿你长寿、开心、富足，并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因特拉肯，这个令我挚爱的国家的中心，再一次见到你。

你永远忠实的朋友

12月18日，守基·阿芬第感谢这位朋友寄来了明信片，并给了他一份“海法城小小的纪念品，风景如画的瑞士有着诸多美丽的景点，与它们相比，海法是如此不同且远不如它们”，并祝他“亲爱的、难以忘怀的朋友”新年富足。

此人是一位年长的瑞士向导，他在主街上有一所房子，守基·阿芬第曾租过其中的一个小房间。那房间其实是屋檐下的一间阁楼，租金是每晚一个法郎。房间的天花板非常低，当他的大个子姨父来看他时都没法站直身体。房间里有一张小床，还有一个脸盆和一个装有冷水的水壶可以用来洗脸。因特拉肯在伯尔尼高地的中心，也是守基·阿芬第多次进入周边山脉和山谷中远足时的起点。守基·阿芬第常常会在日出前好久便动身，他身着及膝的短裤和一件诺福克短外套，裹着黑色的羊毛裹腿，穿一双结实的山地靴，背一个便宜的小帆布包，拿一柄手杖。他会乘火车来到某座山的脚下

或者某个山口，然后开始他的远足。他经常要步行十到十六个小时，而且往往是一个人，不过有时也会由某位和他在一起的亲属陪伴；他们很少能够适应这种紧张的节奏，过几天后便开始找借口。他也从这里攀登了一些更高的山脉，攀登时他会通过绳索将自己与向导连在一起。这些探险几乎一直持续到他结婚的时候。我记得在1937年的夏天，我们第一次去因特拉肯，守基·阿芬第带我去了豪泽先生的家中，本想把他的妻子介绍给这位老人认识。他对豪泽先生有很深的感情，豪泽先生也曾带着极大的兴趣听他热情洋溢地讲述白天的步行或攀登，并惊叹于这个年轻人的无穷精力和坚定决心。但我们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圣护带着我，去了那片面积很小的山间墓地拜访他的陵墓。守基·阿芬第常常给我讲他早年间在山林之中的那些故事，并会把他攀登过的某座山峰、行走过的某个山口指给我看。他说，他最长的一次步行距离是四十二公里，经过了两个山口。他常常会遭遇雨天，然后一直走到身上的衣服干了为止。他对美丽的景色有一种深深的热爱，而我相信，那些没有停歇、使人精疲力竭的连续行进在某种程度上愈合了教长的离世留在他心中的深深的伤口。

守基·阿芬第告诉我，在晚上返回之前，他几乎不吃任何东西，他会去一个小旅馆，要一些炒土豆、煎蛋和沙拉，因为这些东西很便宜，又很容易充饥，吃完后回到他屋檐下的小房间，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昏睡去，中间会醒来用玻璃瓶喝一些凉的山泉水，再接着睡去，直到在灵魂的可怕不安中醒来并再一次于破晓之前出发。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异且深深感动的事情：他回到了那些他最为热爱的地方，再一次去拜访它们，仿佛群山那长长的影子在向他伸手召唤。这早些年间不仅是他最为不安的时候，也是他对自己最为严苛的时候。对自己以及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他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纪律。他为夏天拨出一笔少之又少的钱，有时他与某位作为他的同伴或秘书的亲属一起，也有时还会有其他的家族成员加入进来，但不管是哪种情况，这笔钱都不会再作增加，他们量入为出。如果有更多的人，经济上会再宽松一些。他从来只坐三等车，即便在他中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乘火车去某地

时很少坐一等车或二等车，除非是火车过于肮脏或拥挤以至于三等车无法乘坐。如果他乘坐的是夜车，他会头枕着帆布包在硬木椅上睡觉，这一点是与他同行的人难以做到的。他有两套标准，当他作为公众注视下的信仰领袖、与圣道的荣誉（等同于他的荣誉）紧紧联系在一起时有一套标准；而当他作为一个不表露身份的个体时，他只需要表现出一个自然、谦逊、认真、谨慎的个人形象，而绝不愿将身居要职的他可以支配的资金做奢侈的用度，此时他又有另外一套标准。他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负有责任，地球上的任何巴哈伊都不会质疑他所选择去做的事情，但他却会质疑自己，而且他是个严苛的监工。

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他肩负的重担给他带来越来越多的消耗，我尽可能多地替他承担一些压力，并小心翼翼地让他对自己不那么苛刻、不那么严格，至少接受一所像样的舒适旅馆能进行一些健康上的治疗，有一个可以洗澡的房间，吃些更有营养、质量更好的食物（他每天只吃一顿），但也不敢过分要求。他接受了这微小的改变，只因为米莉·科林斯（Milly Collins）的一个习惯：出于对守基·阿芬第的挚爱，她会在他的“休息”开始之前为他提供一笔钱，并乞求他把这笔钱给自己用，想怎么用都可以。在我的强烈请求之下，他才接受了米莉·科林斯出于对他个人温柔的爱和关心而给的钱，才将其中的一小部分给自己用——其余的则用在了与花园、圣所和文物馆相关的购置上；不过这给他带来了真正的愉悦，因此米莉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守基·阿芬第告诉我，在他使命周期之初的一两年的夏天，他曾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并骑车走过了许多山口。我常常会想，精力旺盛、胆量过人但不通机械的他是如何安全抵达家中的，但事实上他总能安全抵达！作为一名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对机器没什么感觉，尽管当他愿意的时候，他也可以用双手做出小巧精致的东西。

尽管守基·阿芬第退却了（因为这第一次从圣地的离开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退却），但他积聚的力量却正在结出果实。一位回到国内的朝圣者告知美国巴哈伊大会（1922年4月召开）：“我们的拜访是应守基·阿芬第的召唤的。在海法，我们遇到了来自波斯、印

度、缅甸、埃及、意大利、英格兰和法国的巴哈伊……抵达那里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感受笼罩着我，那便是上帝在祂的天国之中，而世界上的一切都很好……我们与守基·阿芬第见了面，他一身黑色打扮，他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人。想一想他今天代表了什么！与这个年轻人面对的问题相比，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家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如同儿戏，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他面临的困难让人透不过气来，没人能够对这些困难形成任何概念……教长没有离开，祂的精神以更高的强度、更大的力量与我们同在……守基·阿芬第，这个年轻人，就站在这种辐射的中心。他一人之力便可以……拯救世界，实现真正的文明。他是如此谦卑、如此温顺、如此无私，见到他是令人感动的。他的信件令人惊叹。准许我们拥有这位伟大的领导核心以面对困难是上帝的大智慧。这些问题，就像我们的问题一样，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来到他面前，他以最为轻松的方式来面对并解决它们……在上帝之王国在人间的外延世界上，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定下的伟大准则现在有了基础。毫无疑问，这基础正在今天由守基·阿芬第在海法打下。”另外一位被召去海法商量事务的人说道：“当一个人到了海法，与守基·阿芬第见了面，并见识了他的大脑和心灵的工作方式、他奇妙的活力以及对事务的掌控后，他会有种妙不可言的感觉。”他们报道了他们在海法的听闻：守基·阿芬第在凌晨三点休息，凌晨六点起床，曾有一次不吃不喝连续工作了四十八个小时。守基·阿芬第通过一位回国的朝圣者给聚集在会议上的朋友们送了一束紫罗兰，并向所有的信徒表达了他的爱。大会的报告称：“所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神圣王国在地球上组织起来的时间已经到来了……”1922年初，拜访海法的美国巴哈伊得到了一些指示，按照这些指示，本次大会选出了一个总灵理会，原来的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体的执行委员会被取代，这使得信仰在北美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922年秋天，至大圣叶为守基·阿芬第的长时间离去深感忧虑，派遣他的家庭成员去找他，并恳求他回到圣地。傍晚，当守基·阿芬第从一次全天的步行中返回时，他非常惊奇地发现，在一个山间小村的路上，母亲正在寻找他；为了找他回去，母亲在另外

一位教长家族成员的陪伴下，从巴勒斯坦一路来到这里；她眼含着泪水把巴希叶·哈努姆、家人以及朋友们的忧虑告诉了他，并说服他返回海法，承担他的合法职位。

美国的巴哈伊新闻《西方之星》的一个通告称："守基·阿芬第……于12月15日星期五下午返回了海法。他身体健康，心情愉悦，重新担起了《阿博都-巴哈遗嘱》中赋予他的巴哈伊圣道的圣护一职。"圣护自己的信件和电报也反映出了他状态的变化。返回海法两天之后，他写信给德国的信徒："由于那些我无法控制的伤心境况，我没能一直与你们保持紧密的联系……这让我深感遗憾，我非常痛苦，这么长时间的离去也在我自己的意料之外……"但是，他接着说道，他现在已经"带着全新的活力和精神返回了圣地"。同一天，他写信给法国的巴哈伊："既已振奋精神、找回信心，我重新担起了艰巨的职责。"还写信给日本的巴哈伊："已经结束了长期的退隐和冥想"；他说他一直坚信"我从现役服务领域的突然退却……绝不会削弱你们温柔的希望"。同时他也澄清，对他而言，这种"突然的消失"是必要的："尽管这个阶段极为漫长。"他在1922年12月16日写给美国的信中说道，"但我强烈地感觉到，自从我认识到这新时代以来，尽管这样一次必要的引退必然会带来暂时的脱节，但它的结果远远胜过了我当时能够立刻在巴哈欧拉门槛前提供任何卑微的服务。"隐居中的守基·阿芬第纪念了教长离世的第一个周年；要在位于海法的阿博都-巴哈的陵墓中面对这样的一个场合，是第一年担任圣护的他所难以承受的。

用守基·阿芬第的话说，他现在已经"带着喜悦的自信"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天性中的某些东西曾使得一位巴哈伊写信给他（那时他还是贝鲁特的一名学生），"你微笑的脸总在我面前。"现在，这种天性又回来了。1922年12月16日，也就是抵达海法后的第二天，他给几乎整个巴哈伊世界发出了大批电报，其中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这种天性。我一字不动地从他的文件中将电文引用如下：

波斯：

"在我重回服务领域之际，在这片承蒙恩惠的土地上，万军之主

能赋予祂勇敢的武士们以清新的祝福，这的确是我最诚挚的祈祷。”

美国：

“圣道向前的步伐没有停下，也永远不会停下。我向万能者祈祷，我现已焕然一新，努力在你们始终不减的支持下将圣道带向荣耀的胜利。”

英国：

“我深感慰藉，我获得了力量。现在，让我以卑微的付出加入到你们为巴哈欧拉圣道所做的不懈努力中。”

德国：

“迄今为止，我在思维和冥想中与你们团结在一起，现在，我高兴且满怀希望地为我们之间增加一条更为深刻的纽带，那便是积极地参与到在巴哈欧拉门槛前的终身服务中。”

印度：

“愿我们在服务的荣耀舞台上的重聚最终成为灵性之域中凯旋的先兆。”

日本：

“重振精神、重拾信心的我现在穿越重洋向你们伸出我的手，它代表着在巴哈圣道中的兄弟般的合作。”

美索不达米亚：

“带着不减的热情和重新振作的力量，我现在在圣地等待你们的喜讯。”

土耳其：

“回到这神圣环境中的我向你们伸出我的手，它代表着在巴哈欧拉圣道中的友谊和服务。”

法国：

“在圣地等待你们的喜讯。”

12月18日，他又发了一封电报：

瑞士：

“请传达给我的瑞士朋友们，让他们坚信，已经开心地回到圣地的我将提供永不停歇的合作。”

12月19日，他发了如下两封电报：

意大利：

“在我返回圣地之际，向意大利的朋友们传达我最美好的祝愿。”

致邓恩：

“在圣地等待澳大利亚朋友们的爱的喜讯。”

守基·阿芬第也给一些亲属发了电报，其中清楚地反映出了他的决心、他的急切和一丝年轻的热忱，这热忱刺穿人心，让人对他充满同情。12月18日，他给一位正在拜访埃及的姑姑发了电报：“坚定、明确地担起信仰之重担。万分想念您。让我确知您健康。”同一天，他给表兄也发了电报：“已重新进入服务之领域。相信你始终不变的合作。”第二天，他给另外一位远房表弟发了电报，其中写道：“……坚信你兄弟般的合作。”

守基·阿芬第的天性是十分讲求条理的，在这早些年间，他十分完整地保存着发出信件的记录和复件；后来，工作的压力和种种问题使他不能继续下去，但电报是个例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都按号码和年份记录着发出的电报。1922年居住在海法的几个月期间，他曾写信寄往六十七个中心，他把这些中心都列了出来。从1922年12月16日到1923年2月23日，他记录下了一百三十二个他曾寄信的地方，其中有的地方他不止写过一次信。在一封日期为1922年12月16日的信上他写道：“……我现在迫切地等待着圣道发展和你们的活动扩张的喜讯，并将不遗余力地与这里和其他地方的忠实信徒分享有关圣道发展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很受欢迎。”这期间的通信覆盖了二十一个国家和六十七个城市，但收到他信件的个人却

不过十几个，其中很多都不是巴哈伊。在他使命周期的开始阶段，他曾寄信的国家包括波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瑞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the Pacific Islands）、日本、印度、缅甸、高加索、突厥斯坦、土耳其、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埃及。

守基·阿芬第带着热情和谨慎（这是他天性中的两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在他于1922年12月到达海法后的第二天，便给他在英国的朋友们写了如下这封信：

> 我最亲爱的上帝信仰中的兄弟姐妹们：
>
> 在给你们的这第一封信的开头，请允许我用语言（无论多么贫乏，却都是发自肺腑、真心实意的）向你们的心灵传达一丝我在引退期间燃烧的期盼之情：我是那么盼望尽快返回，在巩固圣道的工作中与你们携起手来，而这伟大的工作将降临在巴哈欧拉圣道中的每一位诚挚的信徒身上。在过去令人疲惫的几个月里，我不时地为自己的毫无准备感到失落，而现在我感觉自己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可以持续、坚强地担起我千丝万缕的职责，于是，失落的酸楚也融入到了当前的美好之中。此时我认识到，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我都为肩负起圣道的责任做了更好的准备……一个新的国家总会已经设立，它的主要目标是引导、组织和协调朋友们的各种活动。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几乎无法形容我的感激和欣喜之情……

在信的最后，他向朋友们保证："带着永恒的挚爱和焕然一新的活力"，他迫切地等待着他们的消息，而信的署名非常简单，只有"你们的兄弟守基"几个字。在接下来的一封写于同月23日的信中，他告诉朋友们："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迫切地等待着西方朋友们新发来的书面消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回到了圣地。"他说，第一封西方的信件是一名英国的信徒写来的，并接着说道："现在，我已经完全重新担负起了我的任务，圣道的重要工作正摆在你们面前，我真诚地希望我能在这些工作中向你们提供些许卑微

的协助和建议。”在一封于12月20日写给一位亲属的私人信件中，他吐露了内心深处的感受：“诚然，我的任务十分艰巨，我的责任重大且庞杂，但全智的教长给我的话语让我对工作充满了信心，在这份正在我面前展开的事业中，这种信心便是我的庇护和支持。”

12月23日，在第一封写给新选举出的美国总灵理会的信中，守基·阿芬第写道：“自从你们开始担负起庞杂、艰苦的职责以来，由于那些不可预见、无法避免的境况，我未能与你们保持通信，这令我深感遗憾和难过，而这也是我起初没有预料到的。”这是一个从噩梦之中走出的人所说的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他过去一年的生命中，他曾坠入的苦难之渊是如此之深。“但是，”他接着说道，“心中永不熄灭的信念让我重燃自信、重获力量，不管在上帝的圣道中发生了什么，也无论其眼下的影响多么令人不安，这其中都充满了无限的智慧，并将最终促进其在全球的发展。”

在这些早期的信件中，他让各灵理会写信给他，并让他们把“需求、匮乏和愿望，还有计划和活动”告诉他，这样他就可以“通过我的祈祷和兄弟般的协助来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荣耀使命中获得成功，不论这协助多么贫乏。”他对自己“卑微的建议”得到执行的方式深表感激，并向朋友们保证他的“兄弟般的协助永不衰退。”

巴哈伊们从圣护的电报中得知，他已经返回海法，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像雪片一样向他飞来。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但也让他深感为难，对此，他在一封写给一位远房表哥的信中（写于他使命周期的第一年）曾有过清楚地表述：“与个人的通信是我最为紧迫的工作之一。对我来说，仿效教长是冒昧的，同时，考虑到信仰的迅速发展，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我只和其中的一些人进行私人通信，相信你会明白，这会逐渐导致摩擦、气馁甚至敌意的产生，因为你很清楚，有不少朋友都是期望很高，却做得很少。我希望彻底摆脱与个人的通信，而是间接地依靠由我的助手和同事写下的书面信息，同时我能够将时间用于和各个灵理会的直接通信上。但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会非常重视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后一种方法有一个明显的弊端，那就是所有与朋友们的私人关系将被切

断。”1923年1月，圣护在给德国信徒的信中写道：考虑到“信仰在全世界令人惊叹的迅猛发展”，他不能与东西方的每一个信徒进行个人之间的通信，因为这会“耗费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无法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其他职责上，而这些职责如今也是万分紧迫和重要的。因此，尽管很不情愿，但我将不得不只与每个地区（不管它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村落）的巴哈伊团体保持直接的通信……并通过总灵理会……协调他们的活动……”在1923年11月，这个问题仍然令他担忧。他写信给英国总灵理会，他正“谨慎、专心地关注着”这个问题，并向他们保证“任何书面信息，不管它多么次要，都不会由除我之外的任何人首先打开和阅读”；他在1926年写道：“我非常困惑且心事重重，我几乎没有时间进行直接通信。”

多年来，确切的说是三十六年来，这个如何挤出时间处理信件的问题始终令圣护忧虑；最终他决定不放弃答复个人信件，尤其是来自西方的信件，以及来自有了新信徒的国家的信件，因为他从一些痛苦的经历中发现，灵理会并不总是明智的，在与人打交道时，也不能总是为人疗伤、让人们在信仰中保持活跃的。总灵理会并不总是能很好地接受这种与个人进行通信的做法，当总灵理会发现某个人是一个重要事实的接收者时，它觉得它应该对这种信息进行官方的过滤。1941年，圣护的秘书代表他给一个灵理会写信，从中我们发现了他自己对这类事务的政策方面的解释：“守基·阿芬第多次向世界各地的信徒声明，巴哈伊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就任何事务给他写信；同样，他当然也可以以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答复。目前，圣道的机构刚刚开始运作，守基·阿芬第认为保持这种大量的通信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增加了他本已繁重的负担。有时会有这种情况：关于某一影响到信仰利益的重要步骤，他常常是通过个人信件而不是灵理会的途径得到的消息；如果消息来源于一个行政机构，这当然是更好的，但不管消息来源是什么，圣护唯一关心的是信仰的健康发展，当他认为某一步骤有害时，他会在答复中表明他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自由的。”

“现在，”守基·阿芬第在1923年写信给图德·波尔，“我已完全恢复了健康，正聚精会神于当前的工作。”不过，通信远非

他唯一的活动；他还“参与到了为当时拜访圣地的朝圣者的服务中”。在他使命周期的初期，定期在阿博都-巴哈的家中召开会议是他的一个习惯。1922年12月，在他返回圣地五天之后，他写道：“我常常在教长以前的会见室里与亲爱的朝圣者和居住在圣地的朋友们会面，我已经与他们完全分享了你们的消息。”守基·阿芬第十分关心客人们的起居，他在阿博都-巴哈房子对面的西方朝圣者招待所里与朝圣者们一起用餐，并和东方的朋友们一同拜访了巴孛和教长的陵殿，还常常在紧邻的东方朝圣者招待所中与他们一起喝茶，除此之外，他还把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放在了巴哈伊世界中心的改进和扩大上。在1922年4月9日，新的西方朝圣者招待所开始动工，阿博都-巴哈一生都致力于这一计划，而守基·阿芬第此时正强有力地将其付诸实践。在里兹万节的第一天，巴哈欧拉和巴孛的陵殿根据教长升天前的安排首次通电照明，尽管守基·阿芬第本人已经离开海法，但这次活动还是在他的监管之下进行的。在里米先生（Mr. Remey）于1922年3月拜访期间，守基·阿芬第已经就阿博都-巴哈坟墓最终建设的各种可能性、卡尔迈勒山上的巴哈伊灵曦堂的位置和对那里的巴哈伊地产进行美化的大致计划与他进行了详细地讨论。

在守基·阿芬第对崇高职位的履行过程中，这些工作可以算作一个更为愉快的阶段，尽管它们用掉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真正令他难以承受的是圣约破坏者的活动。在他返回海法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写道：“……阿博都-巴哈有关圣约破坏者的可怕预见已经惊人地应验了！”事态正在不断恶化；1923年2月，守基·阿芬第感到有必要发电报给美国：“通知朋友们，将所有信件挂号邮寄。”这表现出他对信件能否安全送达自己手中的深切忧虑。1月，他写信给侯赛因·阿夫南（Hussein Afnan)：“我想，你从过往的经历中可以推知，我主张在一切有关圣道的事务中保持绝对的真诚和完全的正义，并对信仰的敌人（圣约破坏者）持绝不让步的态度。上帝将挫败他们无休止的卑劣行径。”收信人是巴哈欧拉的外孙，阿博都-巴哈的外甥，不久之后，他自己就成了一名臭名昭著的圣约破坏者；他的三位兄弟娶了教长的三位外孙女，其中两位是圣护本人的

妹妹，如此便织就了一张解不开的家族情感、不忠和憎恨之网，最终把阿博都-巴哈的整个家族都卷入其中，而守基·阿芬第则失去了所有的亲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单纯、年轻的圣护身上闪耀着政治家般的钢铁意志，他是信仰荫庇一切的保护者，是忠诚之人的守卫者，是阿博都-巴哈留给追随者最伟大的礼物，也是祂最宝贵的财产。就在这封信的最后，守基·阿芬第向他保证："我以一颗纯洁之心，迫切盼望能看到一些迹象，使你那支持教长遗嘱、避开圣约破坏者的意愿和决心可以清楚地从中彰显出来。"用守基·阿芬第自己的话来说，"敌人发动着永无休止的攻击"，而他不得不在"这攻击沉淀下的炙热和灰尘中"进行他的工作。

考虑到信仰的处境，与委任当局培养审慎的关系就成为了必要之举。阿博都-巴哈声名远扬且倍受尊敬，尽管任何巴勒斯坦人都不太可能对信仰的宏大影响有丝毫的了解，但他们接受阿博都-巴哈为这个信仰的领袖。1922年12月19日，守基·阿芬第给驻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高级专员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在我返回圣地、重新担起使命之际，请接受我美好的祝愿和亲切的问候。"在他离开的八个月里肯定是流言四起，再加上圣约破坏者从中大做文章，现在发这样一封电报是守基·阿芬第仔细斟酌后的动作，同时也是一种礼貌的行为。

不过，守基·阿芬第最为关心的却是巴哈欧拉在巴吉的陵殿。内部墓室的钥匙仍由当局持有；巴哈伊和圣约破坏者都被授予了进入陵殿其他部分的权力；巴哈伊看护人像以前那样照看着它，所有的决策似乎都处在搁置的状态。守基·阿芬第一刻都没有放松努力，直到他通过派到当局的代表，并且在全世界巴哈伊的坚定支持下，成功地将圣坟看护权纳入了他的管理之下。1923年2月7日，他写信给图德·波尔："我与赛姆斯上校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详细解释了目前的事态：所有巴哈伊社区明确、浩大的呼吁声浪以及他们支持《阿博都-巴哈遗嘱》的坚定决心。最近赛姆斯上校给穆罕默德·阿里送了信，向他索要一百零八英镑的警察费用，称是他挑起了事端，因此应该负担这笔费用。目前他还没有答应这一要求，我迫切地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天，守基·阿芬第从耶路撒冷的表兄那里收到了这封电报：

> 崇高的守基·阿芬第·拉巴尼，海法。信收悉。已立刻采取措施。高级专员的决策有利于我们。钥匙是你们的了。

电报里提到的信是巴勒斯坦政府的主任秘书吉尔伯特·克莱顿爵士（Sir Gilbert Clayton）写给高级专员的。在写给图德·波尔的另外一封信中，守基·阿芬第告诉他，自己与海法行政长官、G. 斯图尔特·赛姆斯上校（G. Stewart Symes）关系很好，并且已经与吉尔伯特爵士见了面；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样的接触，当局做出了有利于圣护的决定，并且把钥匙正式归还给了陵殿的合法巴哈伊看护人，在此之前，钥匙从他的手上被夺走已经有一年多了。

每当人们走进圣护生命中任何一个阶段并详细审视他的经历时，他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最糟糕的一个阶段”。他的整个使命周期都充满了紧张、问题和难以承受的压力。不过它们都有一个模式，有不同的主题，有高点和低点。在他的私人生活中，1922年、1923年和1924年的模式表现为一种英雄般的尝试——在上帝之圣道中掌舵，对他而言这是一项艰巨的使命，也是他受命承担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困惑之中。他对自己作为阿博都-巴哈继任者的价值有所怀疑，这种自我怀疑令他痛苦不堪，就像许多在他之前的先知和被选中的人一样，他与自己进行着斗争，在灵魂深处，他与自己的宿命争论，向命运抗议，并恳求上帝带给他慰藉，然而却无济于事。教长宏伟的《遗嘱》就像一张网，将他牢牢地困在其中。关于这一点，他在信件中曾有过多次暗示：“自从阿博都-巴哈离世之后，我的生命一直处在风暴和压力的漩涡中……”“在我的圣道服务生涯的前几年，健康欠佳、身体疲惫的不幸境况挥之不去，当我回头看这些时，我难有满足之情，实际上，在我服务圣道的这饱经坎坷的两年时间里，若不是世界各地的同道们以他们勤勉、不懈的努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树立了振奋人心的榜样，我将极为沮丧。”在另外一封信中他写道：“……在我引退的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忧虑和沮丧的感觉令我痛苦不堪……在那漫长的岁

月里，那种不确定感和令人不安的寂静伴随着我们，对于挚爱者的每一个亲切、忠实的仆人来说，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受到了巨大的折磨，我完全可以想象到这种不安和痛苦的程度……”

他自身的状况，再加上他自认为没能成功应对教长离世后的新形势，这在许多年里都是最令他痛苦的因素，这在他信件的一些片段中也有所体现。直至1924年9月他才写道：“我不得已从服务领域中多次退却，我对退却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影响深感难过……但是，我长期的离去、完全的不作为不应仅仅归因于不和谐、不满和不忠的某些外在表现（不管它们对我工作的继续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同时，也应归因于我自己的无价值、不完美和弱点。”从一开始，他最艰难的任务便是接受他自己。

1923年夏初，守基·阿芬第再一次离开海法，到瑞士的高山中独居，希望能恢复健康、获得慰藉。但是，与日后情况不同的是（那时的他继续通过电报和信件与圣道的工作不断保持联系），这又是一次彻底的隔绝，通过遁入荒野，通过灵魂的寻求，通过与自我和命运的沟通，以找到重新回去、担起崇高职责的力量。他于1923年11月返回，当月的14日，他给美国信徒写信，说自己已从一次“被迫的”离去中返回。信中的一个句子透露了那段时期他心中的变化。他说：“挚爱者的《遗嘱》的非凡启示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惊叹，并且包含着有力的谕令，这些启示令最聪明的头脑都感到富于挑战且困惑……”有人怀疑，它们也使他的头脑感到困惑吗？一方面，守基·阿芬第有着最谦卑的天性，另一方面，他对教长有着强烈的信念和信心，这也是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两点使得守基·阿芬第必定苦心思考了教长遗嘱的含义，思考了当他“在长时间未被打破的沉寂之后”、再一次开始“服务于巴哈欧拉圣道的工作”时，他自己的路应该如何走。

这一次他申明要在教长离世两周年纪念之前返回。这次活动让他深感悲伤，这一点在电报中得到了反映，其中提到了这一次两周年纪念唤起的“悲伤记忆”、“悲痛和创伤”。他在给波斯的电报中说：“愿今晚最黑暗的痛苦时刻为波斯亲爱的人们宣告新一天黎明的到来。”多年来，他在许多信件中强调过这次周年纪念及其相

关活动；它总是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的悲伤记忆。我记得在阿博都-巴哈离世三十五周年时，守基·阿芬第曾多次说：“你知道我已经背负这一重担长达三十六年了吗？我累了，累了！”

随着1923年的结束，人们几乎可以说，圣护已经破茧成蝶，告别年幼，脱胎换骨；他的羽翼可能尚未完全展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拍打愈发自信，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直到最后可以荫庇全人类。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掌控在作风、思想和力量等方面的展现。让我们随便选取一些事实和引文，看一下它们是如何清楚地证实了这种正在发生的变化。从一开始，他就转向信徒们，以无可企及的坦诚和信任的风格赢得了所有人的心，并让他们为他祈祷，以使他能够通过与信徒们的合作实现“上帝之圣道在每一块土地上的迅速胜利”。他的问题是富于挑战性的，他的思想是敏锐的：“我们是被空洞、冲突的思想洪流冲走，还是要坚决、纯洁地站在上帝神圣指示的永久基石上？”“……我们是否要相信任何降临在我们身上的都是神圣的命令，而绝不是我们怯懦和疏忽的结果？”在1923年，他就已经把世界和圣道看作两种不同的事物，而不应感情用事，混为一谈。他断言上帝之意愿“与这个短暂而纷乱的年代中那些难以捉摸的观点、毫无效用的教义、粗鄙的理论、散漫虚妄的想象是相冲突的”。

在这早些年间，守基·阿芬第在信件中一次次地提到我们需要“挺身为这个冷漠无情、充满苦难的世界提供自己的一份服务”。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指出了一个本质性的区别：“朋友们不应思考自己应如何为圣道服务，而是应当思考圣道应得到怎样的服务，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直到今天我们或许仍应继续思考这几句话。圣道的需求是什么，圣道的方向是什么，圣道的目标是什么？

在担任圣护的第一年里，守基·阿芬第对太平洋的兴趣和圣道在这个地区未来发展的意识就得到了体现。1923年1月，他写信给太平洋岛屿，用令人愉悦、富有感情的话说道：“它们的名字在我们心中唤起了深深的希望和赞赏之情，任时光流逝，生命变迁，它们永不减弱或消失。”并于1924年1月写信 “给阿博都-巴哈在澳大利

亚、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以及太平洋上毗邻岛屿的亲爱的朋友们。巴哈欧拉之王国的朋友们和使徒们：一阵清新的微风满载着你们的爱和对我们挚爱圣道的忠诚的香气，再一次从你们那遥远的南部海岸吹到了圣地，并让我们所有人想起了永不熄灭的服务和自我牺牲精神。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挚爱者的离去在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将这种精神点燃。”

他在1923年12月写给一个美国灵理会的话听起来几乎像是独白：“上帝给受苦难的人类传来了世上最伟大的天启，而我们便是这天启的特选捎信人。上帝高深莫测的智慧命令我们在最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无助的环境中，在空前的考验下，辛苦劳作，推进我们的工作，并且在没有金钱、没有影响力、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坚定实现对人类心灵的征服并使之再生。”他写给各个灵理会的许多早期信件都有这样的特质，它们不是长篇大论，而是在表达他内心最深处的考虑。他在同一个月写道：“……诚然，与圣道在尘世的迅猛崛起和发展相比，我们工作的进展是令人痛苦且缓慢的，但我们坚定地相信且永不怀疑，通过我们，上帝带来的伟大的灵性革命将注定在人们心中坚实地实现全人类的彻底重生。”“无论我们的苦难多么深重，无论生命的痛苦多么意外，让我们在心中牢记祂（教长）在我们之前所过的生活，鼓起勇气、心怀感激、坚定且刚毅地担起我们的重任，这样在即将到来的世界中，在我们挚爱的慰藉者尊前，我们才能得到祂对我们劳动的真正安慰和奖励。”“无论什么事情降临在我们身上，无论未来前景看上去有多么黑暗，只要我们尽职尽责，我们便可以确信未知者之手正在运作，它决定并塑造着世间的事件和环境，为人类铺设着我们的目标和希望最终得以实现的道路。”“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语言种子，我们的首要职责是，通过一言一行来以身作则，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这些种子可以发芽、结果。若能如此，便足可以确保这个纷乱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让我们挺身以正直、信念、活力和对信仰的理解去传导祂的圣道……让我们把这当作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激情。让我们去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牺牲个人的利益、舒适、爱好、乐趣

来与世界各种族、各民族的人们融合在一起，熟悉他们的礼仪、传统、思想和习惯。”这其中有些话的语气听起来像是他在神圣计划实行期间的伟大天启，但它们是守基·阿芬第在1923年到1924年的冬天写下的。他为自己定下了使命，那便是要看到信仰升入“普遍认可的无限光明”中，这个说法也是他在这一年使用的。

守基·阿芬第从婴儿时期便受到了教义的熏陶，并有幸在年幼时听到、阅读和写下了许多教长的话语，在东西方朋友们注定要走的路上，他坚定地引导着他们。1922年3月，他就在最初一封写给美国信徒的信件中陈述道：“严格禁止上帝在全世界的朋友们插手政治事务。”他在自己最早的这些信件中使用了“拓荒者”一词，并在1925年记录了全世界巴哈伊中心的名单！

尽管如他所言：“通向我艰辛职责的道路是一条荆棘之路”，“我要肩负的责任和忧心之事是如此沉重（肩负它们是我的命运和殊荣）”，他明确地表达了圣道的需求和信徒们面对的任务，并对此有着清楚的理解。他也同样清楚地界定了他希望巴哈伊们与他有怎样的关系，以及他们应该用何种方式看待他。他在1922年2月6日给一位巴哈伊写信：“不管我将来有多大成就，我希望被看作是祂的葡萄园中众多工人中的一名，仅此而已……无论发生什么，我相信祂（阿博都-巴哈）对我奇妙的爱。愿我无论在行为、思想还是言语上，都永不妨碍祂永存的精神之溪流，在面对祂置于我年轻肩膀上的责任时，祂的精神是我极度需要的……”3月5日，他把如下的附言加在了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请允许我表达我衷心的希望：愿上帝在每一块土地上的朋友们仅仅把我看作一位真正的兄弟，与他们团结在教长神圣门槛前的共同服务中，同时，愿他们在书面和口头上永远称呼我为守基·阿芬第，因为除了亲爱的教长习惯叫我的这个名字之外，我不希望被人叫做其他。在所有的称谓中，这个名字是最有益于我的灵性成长和进步的。”1924年，他在给印度的电报中清楚明白地说道：“不应庆祝我的生日。”1930年，他的秘书代表他写道：“关于守基·阿芬第的身份：除了教长在遗嘱中赋予他的身份之外，他没有其他身份，而遗嘱也说明了他的身份是什么。如果有人误读了遗嘱中的一部分，那么他便误读了

遗嘱的全部。”守基·阿芬第曾给全球的巴哈伊写了一封题为《巴哈欧拉的天启》的信，他在信中彻底地阐明了他的地位，将自己与巴哈欧拉赋予阿博都-巴哈的特有权利和身份完全区分开来：“根据这一真理，若然向信仰之圣护祈祷，尊称他为教主或教长，呼他为圣尊，寻求他的祝福，庆祝他的生日或纪念与他生平有关的事件，这便是等于背离了珍藏于我们所热爱的信仰中那些已确立的真理。”1945年，他的秘书代表他写道：“……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禁止朋友们收藏他个人的照片；他只是宁愿让人们把重点放在亲爱的教长身上。”

第三章　初任圣护

我们不禁感到疑惑：一个这样描写自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留给人的印象如何？他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他人面前？

有一位美国信徒曾在1922年3月应守基·阿芬第的召唤来到海法，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守基·阿芬第出现在我面前，以一种最为亲切、热情的方式问候了我。我已经八年没见过他了，我对他的变化和成长感到惊讶。八年前，我认识的守基·阿芬第还是个孩子，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虽然年纪尚轻，但就精神和思想上的沉稳和深度而言，他已早早成熟……”守基·阿芬第给了他一份打印的教长的《遗嘱》供他阅读，他把自己对其中内容的感受记录如下：“从来没有任何文字能像这份文件一样在我的心中留下这般喜悦和和鼓舞。它……给了我一个明确的方向和一个永久的中心，只要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就应当围绕着这个中心……王中之王统治着这个世界，给国王、贵族以及平民提供同样的保护。”他接着描述了守基·阿芬第给他留下的印象：“我常常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守基·阿芬第，对他与教长的相像程度印象深刻：他头部的轮廓和姿势，他的肩膀，他的步伐，以及他整个人都体现着这种相像。然后我感受到了压在这个年轻男孩肩上的沉重的负担和责任。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在他这样的年龄，生活才刚刚开始，可他却要担负起如此重大的职责，这副重担似乎令人透不过气来。他将为此耗尽心血，并将自我放在一边，从而把生命中属于普通人的自由和乐趣通通剥离出去——这普通人的一面不是永恒的，但它却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1929 年，一位印度巴哈伊朝圣者这样描写守基·阿芬第：“我们必须理解守基·阿芬第，这样才能帮助他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艰

巨任务。他是如此镇定，却又活力四射；如此安静，却又精力充沛。”这几乎是对圣护的某方面卓越品性的传神刻画。1947 年，首位在二战之后被召到海法的美国巴哈伊对他印象的描述则揭示了他性格中的其他方面：“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暖、亲切的微笑和握手，这令我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在与他会面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了他诸多伟大的特质——他的高尚、庄重和火一般的热情，他有时幽默风趣，有时义愤填膺，而他永远、永远将巴哈伊信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守基·阿芬第用他实实在在、合情合理的方式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是一位被需要的帮手。他简要描述了我的一些职责，从第二天起，我就需要着手去做！在这第一次拜访中他就给了我一些建议，相比之下，我为他所做的努力则相形见绌；他说，他希望我明确地遵照他的指示，如果我没有成功或者遇到了困难，就把情况准确地汇报给他，他会给我一个新的行动计划……对于在国际中心工作的巴哈伊来说，没有哪一天是用来休息的，至少在这段时期是这样。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认识到，每一个时刻都属于信仰……”她接着讲述道，在那些与他一起坐在餐桌旁的夜晚，守基·阿芬第会与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的计划，以及他要发出的电报和信件，有时还有他的一些珍贵的文件。她还说道：“……内心的激动和新的计划使他神采奕奕。他常常把餐盘推到一旁而不去碰它们，要来纸和笔，随时处理口袋里的通讯和信件。那些需要巴哈伊们去执行的新的想法和希望令我们兴奋不已……挚爱的圣护非常不喜欢拍照，因此现存的照片都不能反映他真实的‘形象’。首先一点就是，他的表情会很快地从脸上滑过，要捕捉到他的情绪得需要一系列的照片。看到和听到他笑是一种愉悦……当成功地完成了某个计划时，他的眼睛会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他的幽默感是我们的乐趣所在！他像一座巍峨的山峰，永远矗立在那里，从未被征服，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高度和深度……他是一个非常周到的人，他教给了我们所有人一种新的完美感和对细节的注重……他密切地关注所有资金的支出……他对巴哈伊的相关统计数据非常关心……对所有与教团活动相关的事务，从‘平民’层面一直到世界中心，他都了如指掌，对此我们永远都不能充分理解……”

她的丈夫也享受到了在世界中心服务的特权。1948年，他曾写信给一位美国巴哈伊，其中谈到了圣护留给他本人的印象："我所见到的不多，但我要说，没有太多东方人能够适应守基·阿芬第设定的节奏。我们只能惊叹于他心智的广度和他强大的力量。不过，虽然他如火焰和钢铁一般，但他又是我所认识的最亲切、最善解人意、最富有同情心、最为体贴的人。他无人可比。没有谁能像他一样。我多么希望其他人也能有幸认识他，就像格拉迪丝（Gladys）和我一样。在我写下的文字中，我不是在描写他作为圣护的地位，那不是我的笔能描述的。所有的巴哈伊都应该为这个伟大的人物工作！他的负担太重了。"

一位朝圣者在1956年精确、睿智地记录下了她对圣护的印象："他的脸是美丽的，因为它那么超脱，表情那么纯净，但同时又那么温柔、庄重……我看到了灰蓝色的大眼睛……他的鼻子一半像他小时候照片里那样（他与那时仍然很像！），一半像教长的那种高高的鼻子。他看起来不超过四十八岁，而不是六十岁。他有一撮逐渐变成灰白色的胡须，修剪得十分服帖。他的嘴唇坚定、纯洁，牙齿洁白、美丽。他的微笑是一种珍贵的恩赐……他至为简单、直率。他自己不要求人们对他有这样的敬重，但仅仅是在他面前就能让人感到绝对的'软弱和卑微'。他一向都彬彬有礼，不会在面对不成熟者的问题时失去耐心。但是，当需要告诉人们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而哪些可以在日后由世界正义院[①]回答时，他也从不吝惜自己的话语……"她说，守基·阿芬第主持讨论的方式"如此简单，却有着国王般的风采——因为只有一个伟大的国王才能如此简单！……我感到他仿佛是一辆动力强劲的火车头，身后拖着一列长长的车厢，车上装载的重量几乎没有主动前进的意愿，而只是在完全被动地前行！这重量是那些每一刻都必须被推拉、哄劝、表扬着才能行动起来的信徒。挚爱的圣护早就预见到了需求，预见到了时间的短缺，预见到了阻碍和问题。他强烈的光芒指引着我们，我们实际上就在他身后被他牵引着。他其实就是火车头，他

① 最初称为"国际正义院"。——译者注

可以快速地一直向前，也可以慢下来，但他不能偏离他的轨道，他必须遵循他的神圣指引的路线。他让人知道作为一个完美工具的含意：冷静客观，但对每一种见解或氛围都高度敏感。他不能在思想上摇摆不定。他不能受到友谊、喜好、金钱的丝毫影响，也不能在意是否伤害到了感情。他绝对高于所有这一切……圣护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还不是沉思教义中深奥部分的时候——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主动积极地完成“十年远征计划”……他讲话、评论，话一说完便立刻整齐地折叠起他的餐巾，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离开餐桌……我们无法对圣护的美和光辉有哪怕丝毫的描述或传达。如果他对你微笑，或者用那种具有穿透力的眼神迅速地从你身上扫过，你会有种激动、振奋的感觉……他的谈话总是与圣道有关，谈话的主题离不开“十年远征计划”的完成。有好消息传来时他会兴高采烈，而听到不好的消息甚至噩耗时他会陷入深深的沮丧……尽管他喜欢听到人们对花园、陵殿的美以及它们的设计表达欣赏之情，但他似乎总是在回避人们对他个人的赞美，也不愿因任何事情接受别人的感谢……我们急切地要把他亲爱的面容永远印在记忆中，不漏掉他表情中的每一处细微变化，他的表情总是那么超脱、突如其来、富于变化且令人惊奇……啊，守基·阿芬第‘光辉的天性’常常会因为朋友们的不智、他们明目张胆的违抗或者对他的指示的漠视而受到遮蔽并黯淡下来。人们常常会诚惶诚恐地想，谁不曾在某个方面辜负过他！”

我之所以引用这些篇章，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对圣护的生动描述与我之所见是吻合的。我不记得阿博都-巴哈，因此我不能保证他们之间的相像，但许多年长的巴哈伊都说，他们能清楚地看到这种相似。我现在把我对上帝圣道之圣护的各种印象从我自己的日记中引用如下：

“守基·阿芬第在气质上是一个行动家、建设者、组织者，而且他厌恶心不在焉！……守基·阿芬第为这一阶段的圣道做好了完美的准备，当我们观察他时，没有人可以对此有片刻的怀疑，而我相信，他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完成他现在的使命。他是我所见过的方向最为单一的人。他的天性非常简单，品味以及好恶也都十分

单一。他仿佛在朝着一个方向高速地行进，这个方向给他带来了近乎于无穷的驱动力。他的毅力是不可阻止的；他的力量永远不会耗尽。他只想做一件事情，他热切地想着它，希望能迅速、彻底、完美地完成它。大到灵曦堂的兴建，小到花园里几级台阶的修砌，他都会尽快推进，在完成之前绝不放手。他勇往直前。我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他喜欢绿色的草坪、红色和白色的小路，喜欢红色的天竺葵、柏树，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我想说的是，并非每一棵树和每一朵花都是他喜欢或者想得到的。不，他只想要这几棵、这几朵，只想在这样一个地方。食物、颜色、衣服也是如此——就几种，他热切地喜欢着它们，而且从不会厌倦，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想要！正是这种对一两个主题的心无旁骛的坚持使得他能够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为圣道打下这样的根基。这是一个品味广泛、气质多样的人永远无法做到的！”

“圣护比地震仪还要敏感，在他身上有某种比智力或任何外在的信息更为深刻的东西，记录着个体的状态，记录着甚至连个体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索引，如果他发现我们身上的某种微妙的态度有不当之处，我们应当审视自我，直到找出问题所在。”我们可能会问自己，是否应该总是把这当作我们的指引；当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著作时，是否会找不出所需的表述（关于我们的个体，我们的民族和种族的缺点），因而也就得不到相应的警告和指导。我写道：守基·阿芬第“就像教义的音叉一样正确无误……”“他是圣护，他与上帝关系的本质当然是一种奥秘。他可以理解任何奥秘，他可以阐释信仰最神秘的篇章，他可以写下有着神秘本质的文字——他这样做是受到激励的。”

“巴哈欧拉是先知。祂为当前的世界做了一切有必要的事情，说了一切有必要的话语。阿博都-巴哈是祂力量和教义的体现。教长为这个世界注入了一个要素，其中蕴涵着服务的真髓，蕴含着美德，蕴含着不朽宗教生命的至高境界。在此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是人们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包括教长家族中的成员和一些巴哈伊）在获得对事物的理解的途中跌倒了。他们希望能有第二个阿博都-巴哈——以圣护的身份不断出现。但是上帝似乎

有另外一个想法。守基·阿芬第就像一个有着惊人力量和速度的物体，向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前行。这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巴哈欧拉像太阳一样闪耀，教长像月亮一样继续温和地散发祂的光芒，那么守基·阿芬第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前两者像是静止、发光的物体，而后者则向着它的目标疾飞过去。或者有人会把他比作化学物品。巴哈欧拉聚集起了我们所需的一切东西，教长把这些东西混合起来并将其备好；然后上帝再把一种元素、一种通用的沉淀剂加入进来，我们需要它来澄清这个整体并使之继续完成其本质——这便是圣护……他被创造出来完全是为了满足此时圣道的需求，也是这个星球本身的需求。

尽管对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存在来说，守基·阿芬第在其本质上永远都是一个奥秘（直到有一天，一个新的上帝显示者到来，祂可能会选择为我们解读守基·阿芬第，因为前者身份更高，而后者则远低于祂），不过，我们对他认识较深，并且有权力来温柔地保存对他的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可能多有不足。

在他使命周期的早些年间，尽管他感到悲伤、痛苦，但他终究是一个年轻人，他那充满活力、男孩儿气的一面是藏不住的。他天性热切，这是一个直到他生命的终点也不曾丧失的特点，在那些日子里，这一特点明显地洋溢在他的信件和电报中，并融进了他与人们的私人交往中。

他唯一的个人爱好是摄影；早些年间，他拍过瑞士以及其他地方的景色，那是一些非常优秀的艺术照片。我们找到了他在1924年写给瑞士小镇的一位摄影家的信件的复本，他在信中用法语告诉对方：“我正急切地等待着我寄给你的照片的消息……我希望你已经收到了它们。它们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请立刻就此事发明信片好让我放心。我希望它们最后的效果都很好。提前向你表示感谢，你忠实的朋友。”他连复本都潇洒地署上了“守基”，虽然这封信是由别人代写的！

园艺学领域同样也能反映出守基·阿芬第即刻将事情完成的愿望。他决心在巴孛陵殿前面以及其他巴哈伊地产上种植草坪。1923年5月，他发电报给巴黎的一位巴哈伊老友：“我们的草坪工程如

何？”却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十天之后他又发了一封电报：“信未得到答复。草坪的种子如何？”答复最终收到了，但结果好像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当守基·阿芬第在秋天返回海法时，他似乎已经在这方面展开了一项定期的活动——尽管阿博都-巴哈的园丁固执地坚信巴勒斯坦不能种植草坪！9月29日，守基·阿芬第通知埃及的一位表兄：“我们的草种明显不能令人满意。你能否把埃及能买到的、且适合我们这里气候的、最好的草种给我送来三十公斤。”显然，一周之后他收到了一份他看不明白的答复，于是他给对方回了电报：“感到诧异。通过信件向我解释。”这次的解释似乎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守基·阿芬第放弃了与亲戚朋友们打交道，并在12月18日亲自给四家不同的苗圃公司和种子商（其中一家在法国，另外三家在英国）写信，向他们订草种、花种、球茎和插枝。他写道，他正“迫切地等待着”回复！在那年夏天，或者之前一年的夏天，他肯定已经安排人把一些灌木送到了海法，因为他在12月的时候发电报给巴黎的德雷富斯·巴内夫妇，说“卡尔迈勒用奥尔良的玫瑰欢迎二位。”

我们推测，守基·阿芬第与一些商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因为在一封于1925年1月用法语写成的信中，他这样说道：“在此我向你送上数额为.....的钱，请你立刻为我送来黑麦草种用以种植草坪。我对你之前送来的草种种植出来的草坪很满意，并且希望能尽快收到草种，在此，提前向你表示感谢。亲爱的先生，我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守基·拉巴尼。”据我所知，这些草坪是最早在巴勒斯坦大规模种植的草坪。守基·阿芬第给一家靠近诺威奇（Norwich）的英国园艺公司写信，信中说道：“……我喜欢花和花园。我随函另付一英镑，请为我寄来你认为适合我的用途的植物图片。”

我怀疑守基·阿芬第在他的一生中是否曾种下过任何植物，或者是否有过这样的意愿。他感兴趣的是花园，而不是从事园艺。他从不错过拜访那些美丽的或者著名的花园的机会；我说不清我们曾在二十年间一起拜访过多少花园。似乎不管在哪里，只要有花园我们都会去，而且我们会年复一年地回到同一个花园，就像去拜访一位老友。在他使命周期的大约前十年，守基·阿芬第竭尽所能，

让其他国家里他喜欢的植物所产生的效果能够复制到他自己在圣地的花园中；他在一年内就从荷兰订购了几千株球茎，另外一年里他从法国买了几百棵玫瑰；他甚至让人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送来了桉树，但他的园丁们让他的每一次努力都化为泡影（有时也有植物本身不适合在这里种植的原因，比如桉树、水仙、风信子、番红花、杜鹃花等等），最终他放弃了引进除草种外的一切植物。

在阿博都-巴哈的年代，水是一个大问题。祂在巴吉和卡尔迈勒山上都建造了小花园，挨着圣坟，花园里主要种植柑橘树和花。守基·阿芬第改造、扩建了这些花园，使之更为正式。我记得当我和母亲在1923年第一次前来朝圣时，紧挨着巴孛陵殿的一小片花园已经有了非常正式的布局，母亲对这片花园做了评价，她说圣护正在全世界建立行政秩序，而这花园就是这种行政秩序的一个象征。我相信守基·阿芬第没有这样想过，但模式和秩序是他天性中所固有的；这是他工作的唯一方式。

华盛顿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的阿莱纳·洛克（Alaine Locke）教授是在守基·阿芬第刚刚担任圣护时前来海法朝圣的一位巴哈伊。他描述了当他和守基·阿芬第走在巴孛陵殿旁的花园里时圣护留给他的印象：“守基·阿芬第既注重细节又讲究原则，既有执行的远见又有规划的愿景，他在这方面是一位大师。不过，当我与他谈起露台和花园的美化和布局方案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细节可以从微不足道的琐碎中剥离出来。这些露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都将通过感官的作用来激发我们的情感，启迪我们的灵魂。

守基·阿芬第不断增加花园的数量，这些花园的名声也与日俱增。到他去世之前，每年拜访这些花园和巴孛陵殿的人数多达九万。一位拜访者在1935年写信给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这样一次拜访留给许多人的印象，她说：“陵殿含蓄的美和花园带来的幸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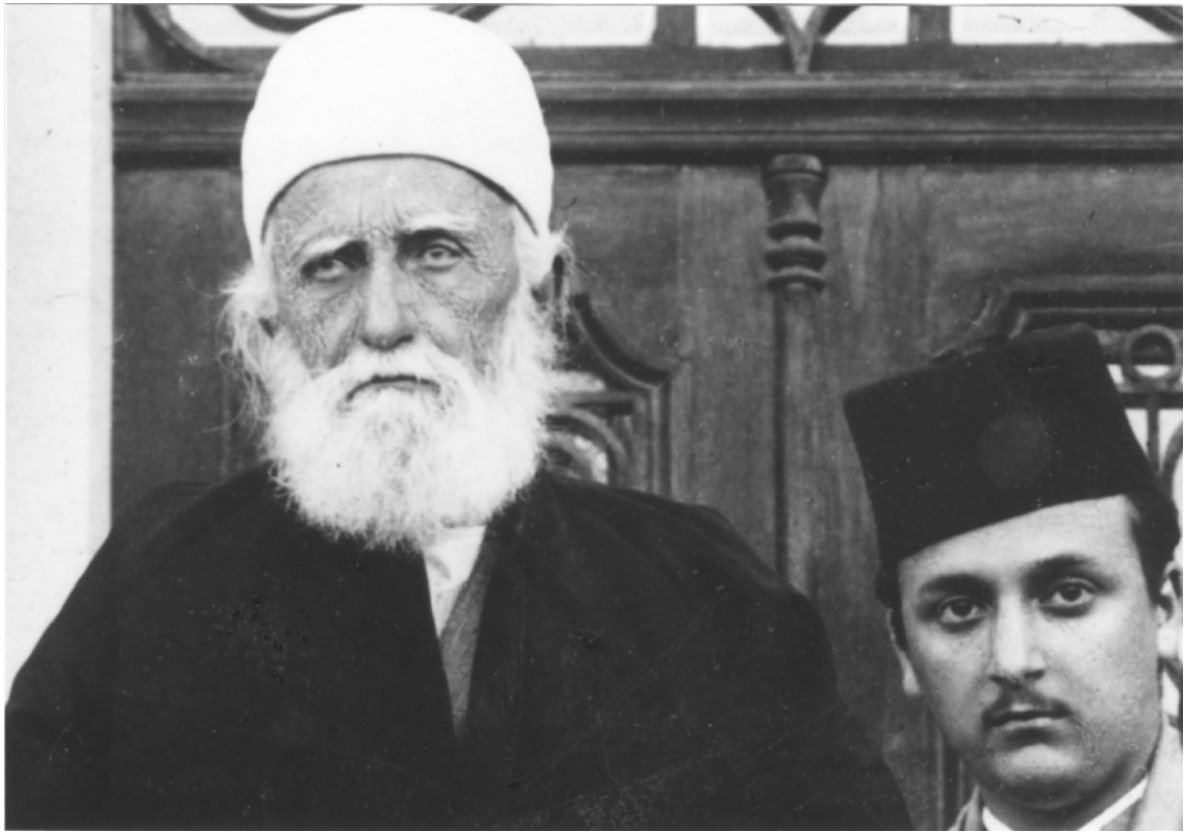
扩大巴孛和阿博都-巴哈陵殿周围的种植面积是守基·阿芬第每年的习惯。他希望在每一个领域都永远遵从教长的遗愿，他在这一方向上的最初驱动力无疑也是来源于此。他知道阿博都-巴哈计划

在原先的德国殖民地到巴孛陵殿之间建设一系列的露台；事实上，教长已经开始了第一座露台的建设。多年来，守基·阿芬第致力于完成这项工程，而且，在研究该计划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他还总结出了一整套在陵殿周围建设花园的思想——因为他要建设许多花园，而不是一个。要理解并欣赏守基·阿芬第在卡尔迈勒山和巴吉创造出的非凡的审美效果，我们必须了解他的方法。

在海法时，他几乎每天都会走到陵殿区域，轮流拜访巴孛和教长的陵殿；但在灵宴日时，他却依次拜访了两座陵殿。当他看着眼前的景物时，他那创造性的思维会提出发展和改进的方案。他知道阿博都-巴哈计划在陵殿内建造九个房间，而且他已经着手在坟墓的南面建造这其中的最后三间。之前，巴孛陵殿内部的东西两面墙上有两个普通的木门，他把两面墙打开，建造了拱门，创造出一种远景效果，并且可以从这里看到至圣所[①]，从而大大美化了陵殿的内部格局。多年来，他改变着陵殿的装饰，而且在增加装饰的同时又不失简约感和正式感，这大大增添了这一神圣之地的魅力。在建设陵殿的上层结构时，改进工程达到了顶峰。而在做出改进的同时，守基·阿芬第研究了周围贫瘠的山坡，并开始年复一年，一块接一块地开垦这些独立的区域。但露台的建设是个例外。我们必须记住，他从来没有做出一个整体的计划。这赋予了卡尔迈勒山上的花园一种不同寻常的特质。在走路时，守基·阿芬第会形成关于如何建造某个花园，并使之融入周围地形的想法。在为一块地做出规划时，他不会小题大做地进行无谓的推敲，同时也没有别人的建议和帮助（除了那些技艺生涩的农民，他们扮演了园丁的角色）。如果有必要，他会请人对这块地进行勘定，并画出弧线或直线，不过他常常会省去这一步，全部由自己去完成。

当守基·阿芬第回到家中时，他会生动地描述他的发现和计划。我从他的描述中推测出他的方法，即他在地产周围走动时，他会注视着他打算开发的那块地；这时，一种模式会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然后，他会研究这种模式：不仅通过实地观察，而且画出图

① Holy of Holies，出自《旧约》，在这里是指巴孛陵殿中央的遗体埋葬位置。——译者注



图十九　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

圣约中心与未来的圣护在教长房前的台阶上，照片拍摄于他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年里。

图二十　守基·阿芬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

他坐在椅子上（右数第三位），他身后是卢图福拉·哈基姆。拍摄于1920年3月21日，不久后他便去了欧洲。

纸。尽管在他所有的工作领域中，许多想法都是在一闪念间出现在他头脑中的；尽管有的时候，他可能一眼就看出了他打算对某个花园所采用的整体设计，但他还是会在图纸中费尽心思地计算出相关的维度，确定其中的细节。他的图纸并没有按照与实物的比例来画，因为这会额外耗费很多时间，但他会在图中计算和标示出所有的维度。例如：假设他的主路要有二十五米长、二米宽；此外要有二十五厘米宽的绿化带，一百二十厘米宽的带状区域用来种植柏树（间距为一百五十厘米），等等。当他都计划好后，他会站在那里，指导园丁们如何布置。他们把绳子栓在木桩上，拉出一条长线，用一个木桩和一条绳子当作圆规，用“拃”（手完全张开时，拇指和小指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树的间距，把颜色浅的土撒成一条线——通过诸如此类的简单方法，他常常可以在一个下午之内就做好整片花园的详细布局。守基·阿芬第对自己要做什么了然于心，通常他会让那些按照设计进行布局的人走在前面，其他园丁则跟在后面，这样一来，当按照计划丈量好土地时，树坑就挖好了，柏树也栽上了，花床也铺好了，绿化带也种上了，而与此同时，守基·阿芬第在他们前面继续着他的测量进程！阿拉伯人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无论谁戴上了所罗门王的指环，指环一转，一切事物都会眨眼间改变。一些阿拉伯工人常常说，守基·阿芬第找到了所罗门王的指环！

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事都很慢，而守基·阿芬第却可以这么快。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地说他“受到了上帝的指引”，那么在我看来，这并不足以解释其中的缘由。我认为，伟大的人能够统揽全局，小人物却会受到细节的羁绊。守基·阿芬第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绝不会让诸多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一个人常常会给下属发指令，并让他们以自己的步伐去执行）为他制造障碍，相反，他会让整件事情在他的关注之下一次性完成。他出色地组织着这件事情，并迅速、完美地将其完成；任何他可以自己去做的事情总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耽误和挫败通常是在他把工作交给他人时发生的。

守基·阿芬第对比例有一种无可挑剔的感觉。他自己总说，他

不能将事物具象化；换句话说，有的艺术家能闭上眼睛想象事物完成后的效果，但守基·阿芬第没有这种天赋。不过，当他看到一张图纸，或者自己研究地形、算出了尺寸大小时，他的比例绝对是完美的。这种对比例的感觉，再加上一种没有被传统或过多信息所束缚的创造力，使得他的花园如此独特、迷人和美丽。如果说他缺乏想象某种事物完成后的样子的能力（如他自己所言），那么他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真正艺术家的另外一项创造天赋，那便是让某个东西在他手中成形的能力，以及获得灵感而不被先入为主的数据所束缚的能力。

在为巴吉的巴哈欧拉陵殿铺设地面时，这一点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他最早的计划是以圣坟和相邻的巴吉宅邸为轴心，形成一种巨大的轮形布局。1952年，在完成与以色列国的最终交易后，圣坟周围有了超过十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土地。他开始平整陵殿对面的荒芜的土地（这块地大约占到了一片广袤的圆形土地的四分之一）。他们租了一辆推土机，为了亲自指导工作，守基·阿芬第在巴吉住了许多天。

在施工现场的边缘有一座被损毁了的建筑（它只有一个房间），守基·阿芬第急于观察这块土地，便爬上了这座建筑。他发现这种高度的增加带来了大为不同的效果，于是他修缮了墙和房顶，并在外面加了一排木质的台阶，一直通到房顶上，还在建筑的内部配备了家具，把这里当成了办公室和回复信件的地方。当他从这个新的、有利的位置上观察和指挥工作时，他对位于一块平地中间的陵殿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这让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由于在平整的过程中许多土都被铲了下来，他下令把这些土全部推到了东边，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高高的路堤，这使得每一个站在上面的人都可以看到整个区域在自己面前展现开来，就像一块有着美丽图案的地毯一样。这一计划的成功令圣护大为欣喜，于是他筑起了两座逐层增高的台阶，整个建筑几乎像座小山一样高。

最终这片新的区域建设完成了——草坪铺上了，花床种好了，沿着美丽的红色小路的灯柱也矗立起来了，此时的守基·阿芬第立即把集会地点移到新开发地区的周边，让客人们沿着陵殿对面的半

圆形小路坐下来，这里距离他以前习惯坐着的地方有将近一百米。作为上帝之圣道的保护者，这是圣护对圣道最典型的态度。我不知道他已经周密地考虑过了这一安排，那天晚上，当我在参加完集会后返回海法时，我向守基·阿芬第问起此事。他说是“出于对陵殿的尊敬”，他把集会的地点移到了离它更远的地方。从那时起，所有在巴吉召开的集会，包括纪念巴哈欧拉升天的集会（这次集会是在午夜举行的），都在这个新位置举行。

在守基·阿芬第去世后，为了完成他本人曾表达过的意愿，人们在那两座台阶之上又建起了一座台阶，为他对陵殿花园的宏伟设计添上了最后一笔。这一新的概念意味着他对花园的最初的车轮形设计完全被放弃了，因为汇集于同一中心的路径系统不再具有可行性。守基·阿芬第曾多次改变他的计划，因为当他来到现场时，他的眼睛会帮他发现某些更美、更值得赞赏的东西。

就像在他之前的教长一样，守基·阿芬第也深深地喜爱着光线。他痛恨昏暗的房间。他对明亮光线的喜爱非常明显，他工作时，桌上的台灯光线非常强，几乎直射在他眼中，为此我以前常常向他抗议，我担心这有点太过刺眼了。他自己房间的光线总是很好，几座陵殿里也都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灯。他作为圣护的最早的行动之一便是在巴孛陵殿的门上（门的对面便是露台和山脚下笔直的路，而山的那边便是海）装了一盏明亮的灯。我记得在1923年，镇上的人们取笑这件事，问这盏灯怎么会装在那里。毫无疑问，几年后，一位名叫杜米特（Dumit）的狂热的基督徒在自己的屋顶上（他的房子距离巴孛的圣坟不远）立起了一个光亮的十字架以示抗议，不过守基·阿芬第完全没有因此而生气，用他的话说，对于陵殿而言，这个十字架就好比是西服左襟上的一朵花！

海法和巴吉的花园都陆续通电照明，装上了有四个分枝的熟铁灯柱，其中仅在巴吉就立起了九十九根。在它们首次被点亮的那个晚上，也就是在1953年的里兹万灵宴上，我们乘车前往巴吉，夜空被照亮了，我们仿佛是在驶向一座小城！圣护告诉波斯朝圣者，这里一直有光，现在是“光上加光”（在原来的语言中，这里有一个美丽的文字游戏，暗指巴哈欧拉为“光”）。此外，海法的陵殿，

以及至大圣叶、阿博都-巴哈的母亲和弟弟的安息之处也都在夜晚点亮了泛光灯，国际文物馆（Inter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也按照命令装上了大功率的反光镜。

在做所有事情时，圣护都费尽心思、十分严格，他完全不依靠运气，也极少给同事们留有批评余地。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他总是会彻底地查明某个巴哈伊纪念日在海法的确切日期。由于阴历和阳历的日期之间会有差别（在有些情况下，阴历依据的是新月升起的时间），守基·阿芬第会查清阴历的日期和春分的具体时间，如果春分发生在某一时刻之前，这意味着巴哈伊新年的日期是3月20日，而不是3月21日。下面的这封电报是他在1923年发给贝鲁特的表兄的：“查清春分的具体时间并电告我。”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类似的电报。毫无疑问，他认为来自美国大学的信息要比本地的信息更为科学。1932年，他给当时在同一所大学学习的弟弟发电报：“查清基督诞生后的最初两个世纪里罗马帝国的大致人口……”他不仅要求精准、确切，而且凭借着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的敏锐，他意识到，在合适的地方引用事实，就像将宝石镶嵌到首饰上一样，会产生惊人的效果，令首饰顿然生色。举例来说，麦克默多海湾（McMurdo Sound）位于罗斯海（Ross sea）南纬77°，这只是一条非常平常的信息；但是当守基·阿芬第通知信徒们，巴哈伊著作已经被送到了美国南极探险队那里（他们的基地就在麦克默多海湾），并且在加上了其准确的纬度时，这段文字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而且变得十分浪漫，令人兴奋！

1924年，守基·阿芬第决意解决他面对的一个问题。尽管在教长离世之后他陷入了不佳的状态，但他已经向那些对他持恶意态度的人清楚地表明了，他既不软弱，也不缺乏方向和判断力。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打破过去的一些传统和习惯是很困难的，同时，在圣道历史上的这个新阶段，由于为数众多的巴哈伊在观念和思想上各不相同，要使他们熟悉这一阶段必要的变化和要求也是十分不易的。”不过他正在为此而努力，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在海法，他迫切需要更多的帮手。他的父亲几乎不懂英语；三位姨父中，有两位在海法做生意，另一位住在埃及；年纪较长的表兄弟以及他的亲弟

弟都在工作或求学。尽管他得到了阿博都-巴哈的一些家族成员的协助，但圣道的工作正在稳步发展，而守基·阿芬第已经开始将许多圣作翻译成英文，并将译作送到西方。此外，他的通信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给他带来了一个真正的问题。1923年1月，他给伦敦的巴哈伊写信："我非常欢迎也极度渴望能有一位有能力的助理来协助我目前在海法的翻译工作，我已经把此事提交给了议会的成员，请他们考虑派一位英国的朋友来待一段时间，同我一起做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回应这一呼吁的不是别人，正是守基·阿芬第挚爱的埃斯尔蒙特博士（Dr. Esslemont）。他来到海法定居，与守基·阿芬第一起工作，为守基·阿芬第提供服务，直到他在1925年11月22日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不佳的健康状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而且我们发现，在教长离世之后的1922年2月，他在给守基·阿芬第的电报中这样说道："康复得很好。遗嘱已收到。你忠实的朋友。"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当埃斯尔蒙特非常出人意料地去世时，守基·阿芬第给他的亲属发电报："深爱的埃斯尔蒙特的去世令我沉浸在悲伤之中。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请相信我个人和全世界巴哈伊诚挚的同情和哀悼。信随后送上。"四天后，他写信给他们："约翰·埃斯尔蒙特是我亲爱的合作者和朋友，毫不夸张地说，对他的去世，我找不出语言来完全表达我个人的失落感。"埃斯尔蒙特不仅是巴哈伊世界中一位卓越的国际人物——他的著作（《巴哈欧拉和新纪元》，现已被翻译成大约一百种语言）被守基·阿芬第赞为"将激励未来世界的人们"，而且对守基·阿芬第个人来说，他还是"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一位值得信赖的顾问，一位不知疲倦的合作者，一位可爱的同伴"。守基·阿芬第"把最珍贵的希望寄托在了"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上，而现在，这种关系戛然而止了。圣护为这位学生时代的朋友而哭泣，但是，像以前一样，尽管他深感悲伤，他的职位却使得他必须继续履行作为圣护的职能。他立刻给英格兰、美国、德国、波斯和印度发电报，让他们给埃斯尔蒙特的亲属（他们都不是巴哈伊）发电报表达他们的同情，并举行特别纪念会。他还追认埃斯尔蒙特为圣辅。

埃斯尔蒙特博士来到了海法，但这远远未能解决守基·阿芬第的问题，只给守基·阿芬第已然深受苦难的心灵增添了新的悲伤。1926年1月，守基·阿芬第说道：“我要肩负的责任重担和忧心之事是如此沉重（肩负它们是我的命运和殊荣）”，并接着谈到了“我从不间断的辛劳、我的痛苦和困惑”以及“通向我艰辛职责”的“荆棘之路”。四个月后，他给霍勒斯·霍利（Horace Holley）写信：“我常常迫切地渴望能有一位像你一样的合作者到海法来，在我身边工作。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失去埃斯尔蒙特医生的切肤之痛，我希望这里和国外的条件能够让我更为系统地处理在海法的工作。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这封信写于5月。9月，他再次写信给霍勒斯，信中赞扬了他的服务，并重申“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在海法需要一位像你这样的工作者，他要像你一样有能力，像你一样仔细，像你一样有条理，像你一样机敏。目前你不能也不应离开你的岗位。海法将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自力更生。”

在这两封信间隔的时间里，守基·阿芬第曾于1926年6月30日在瑞士给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内写信：“我需要一位有能力、值得信赖、工作勤奋、有条理、有经验的秘书，他要具备文学表达的天赋，而且他在巴哈伊世界的地位要能够被认可。埃斯尔蒙特博士是一位最为合适的同伴，他无牵无挂、仔细、忠诚、谦逊而且有能力。我为失去他而感到痛心……我需要一位有能力、仔细的秘书，他要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还需要两位主要的顾问，他们要庄重、忠诚，可以在特定的场合代表巴哈伊信仰；再加上两位东方的同事，他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渊博的知识。这些人可以帮助我渡过难关，同时释放出他们的能量，将圣道带向其注定要实现的解放和胜利……我的记忆里有太多的苦难，远非言语所能表达。”

尽管这些信件是写给个人的，但他并没有隐瞒他的需求；1926年10月，他在给美国的信中说道，“工作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大，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它们必须在圣地得到必要的处理。这使我强烈地感受到，在海法成立一个国际巴哈伊秘书处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是在顾问还是在执行方面，它都将在我庞杂、艰苦的工作中助我一臂之力。”他接着说道，他“急切地考虑了这一重要事务”，并

要求来自美国、欧洲和波斯的三位代表来到圣地，与他商讨满足当前要求所需的各项措施；他说，这不仅能够协助他加强国际中心与全世界的联系，同时可以为“第一个世界正义院”的最终建立做一些前期准备。他在5月份就已经写信给一位他正在考虑的人选：“我想知道你能否在明年秋天与H君加入到我在海法的工作之中。摆在我面前的是最复杂、最微妙的问题，我感觉到自己需要有能力、无所畏惧且值得信赖的合作者……我必须停笔了，因为我很难集中我的思绪。”

尽管守基·阿芬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在这封信中设想的合作却没能成为现实。1922年，当他开始行使作为圣护的职责时，他就缺乏有能力的帮手；而现在，他健康状况不佳，圣道局势紧张，再加上他所考虑的人选又面临着家庭和生意上的困难，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他又回到了那时的情形。1927年2月，他给一位选定的帮手写信：“……在方便的情况下，希望你能尽快加入到我辛苦的工作之中。”9月，他再次给这位朋友（他因为生病而留在了家中）写信：“我意识到了工作的庞杂以及在面对艰巨任务时我的势单力薄，因此我怀着忧虑的心情盼望着这个冬天的工作。正如我已经观察到的，会议的作用是有限的，我需要的是紧密、持续的合作，这样才能启动并执行那些传播和巩固圣道所必需的措施。同时，我将不得不继续进行我目前的工作，虽然我感觉它们的重要性是排在第二位的，而且可以由一位秘书来轻松地承担……”10月，他又一次给这位巴哈伊写信说：“目前我孤身一人，我正在竭尽所能。”还有1928年1月的信：“所有其他的事务都处于停滞状态，我等待着一位有能力的、忠实的、有经验的助手的关注和帮助。”

这些话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圣护形象。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也不再像使命周期的早年间那样被悲伤彻底击倒；他看到了圣道的需要，他看到，如果他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并因此能更加自由地把时间投入到核心事务上，那么他的工作就会有很大的改善潜力。遗憾的是，他需要的那种帮手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放弃一切，来到海法定居。一位印度朝圣者在信中清清楚楚地转述了这一情况，毫无疑问，这正是由守基·阿芬第本人讲出的，因

为他习惯于同拜访圣地的巴哈伊们自由交谈。这位信徒在1929年6月15日写道："守基·阿芬第希望在我们拥有任何其他的国际组织之前，首先能在海法成立一个国际秘书处，但由于有能力、值得信赖的巴哈伊的人数不够，这一想法尚未实现……"

这件事便搁置了下来，直到1951年国际巴哈伊理事会成立。守基·阿芬第实际上是孤身一人在奋斗，并且要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这是一个他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他下定决心要担起所有的工作，而且他也做到了。他把教长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当作秘书，面对他们日渐增涨的不满情绪，他让自己安于永无止境的、辛苦乏味的工作（这里面有琐碎的事情，也有重要的任务）。他顺从地接受命运，并常常感到绝望，但他总是怀着忠诚和坚毅。我们完全可以说，他凭借一己之力影响了神圣祖先的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并证明自己与祂们是一样的，同属一个无上的阶层。

这些年里，正当守基·阿芬第努力尝试着在身边聚集起一群有能力的同事时，一个规模空前的危机降临在了他的身上。在上帝圣道之洋上，吹起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天数与偶然之风，搅乱了它的平静。现在，它被卷进了一场风暴之中，惊涛骇浪无情地拍打着守基·阿芬第的心灵，考验着他的意志、勇气和才智。巴哈欧拉曾在巴格达一所神圣的房子里住过，按照祂的命令，这座房子被视为了一个"神圣、圣洁，受珍爱的巴哈伊朝圣和崇拜的对象"（守基·阿芬第语）。早在阿博都-巴哈的时代，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就通过一系列恶毒的伎俩得到了这座房子，不过后来英国当局又将它交还给了它的合法看护人。而当阿博都-巴哈离世的消息传到了信仰的顽敌那里时，他们再一次掀起了攻击的浪潮，声称这座房子的所有权属于他们。自从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后，这里就由巴哈伊的代表占据着，而且费萨尔国王（King Feisal）曾保证，他会尊重巴哈伊对这座建筑的所有权。尽管如此，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国王陛下违背了他的诺言。1922年，政府接管了这座房子的钥匙；到1923年，他们毫无正义可言地把钥匙再一次交给了什叶派教徒。从阿博都-巴哈离世之初，一直到1925年11月，为保护这座至圣居所，巴哈伊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个案子首先被什叶派教徒提交给了他们自己的

宗教法庭，很快地，又从那里移交到了和平法庭，随后又递交给了当地的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利于巴哈伊的权利，但这一判决随后被递交到了上诉法庭，也就是伊拉克高级法院，后者的裁定则有利于什叶派教徒。

这是对正义明目张胆的亵渎，当圣护得知这一消息时，他立刻召集巴哈伊世界采取行动：他发出了十九封电报，发送的对象既有个人，也有各个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波斯、高加索、突厥斯坦、伊拉克、日本、缅甸、中国、土耳其、莫斯科、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和太平洋岛屿的巴哈伊。他令巴哈伊们就这一判决向英国驻伊拉克的高级专员写信抗议。波斯和北美的巴哈伊社团数量众多，他对这两个国家的命令是，各地方灵理会要直接发出抗议，而总灵理会则不仅需要与高级专员联络，还应向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和伦敦的英国当局表示抗议。印度和缅甸的灵理会也要向费萨尔国王本人抗议，但不必向伦敦抗议。有的地方巴哈伊的数量较少，比如法国和中国，守基·阿芬第建议这样的地方要通过个人签名的方式抗议。所有这些命令都明显地表现出了守基·阿芬第战略家的一面。在给巴哈伊世界的电报中，他说，形势是“危险的”，“后果极为严重”；这是我们“深爱的地方”，是“神圣的建筑”，是“巴哈欧拉之神圣居所”，所有人都必须“立刻行动，保卫巴哈伊们对它的灵性的所有权”。他给人们提供建议，同时也把合适的措辞教给了他们。东方的朋友们被告知，要“感情强烈、恭敬有礼”，“用坚定、周全的语言”，诚挚地请求对方“考虑他们对所有权的灵性要求”，呼吁实现“英国的正义感”。西方的信徒则被告知，“有效、迅速的行动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向法院明显的不公表示强烈的抗议，呼吁纠正英国的公平感，坚持巴哈伊的灵性所有权……宣告你们会尽全力维护自己合法和神圣权利的坚定决心。”守基·阿芬第以一贯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建议美国巴哈伊，地方灵理会发出的信息“不应在措辞上存在雷同现象”。

在为期六个月的时间里，除了与保卫至圣居所的代理人保持持续的通信外，圣护与各地的电报往来有将近一百封，充分证明了

守基·阿芬第对此事的关切。在收到最高法院判决的消息后，圣护最初的行动之一便是给巴格达的高级专员发电报，内容如下："关于巴哈欧拉神圣居所的所有权，全世界的巴哈伊都诧异、惊愕地看待法院出乎意料的裁定。在他们的记忆中，长久以来这一财产一直归属于他们，因此他们拒绝相信阁下会支持这样明显的不公。他们庄严许诺，将坚定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向至高的荣誉感和正义感发出呼吁，他们坚定地相信，这是贵政府的生命力所在。以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的家族和整个巴哈伊社团的名义。守基·拉巴尼。"同一天，他给巴哈欧拉居所伤心欲绝的看护人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不必悲伤。案子在上帝手中。放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守基·阿芬第发出的许多电报都包含了这样的话语：应继续努力地追究至圣居所的案子。他给许多杰出的非巴哈伊人士发电报，并且不断协调着他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助手们的努力。当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后，守基·阿芬第给各国总灵理会发电报，指示他们以"礼貌的措辞"向高级专员询问"调查结果"，因为英国当局曾承诺要进行调查。这是一场正在走向失败的战斗，因为伊拉克的政治和宗教分子有着共同的目标，且拒绝向施加于他们身上的压力低头，其中就包括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

然而，守基·阿芬第不会如此轻易地接受失败，而且，神圣居所的案子会在1928年11月呈交到国际联盟常设托管委员会（League of Nations Permanent Mandates Commission），在此之前他是绝不会罢手的；托管国支持巴哈伊们对这所房子的所有权，托管委员会建议国际联盟理事会要求英国政府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抗议，使其纠正在这个案子中对巴哈伊的不公行为。从1928年到1933年，巴哈伊们继续敦促这一事务，但由于缺少执行决策的工具，而且伊拉克内部的什叶派教徒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使得伊拉克政府在需要做出决策时，总是会将整个问题搁置下来，因此，巴哈伊们的施压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像这种对事件的简要概括有着很大的局限，它传达不出每天伴随他们的悬而未决的焦虑，传达不出希望和绝望之间的落差，传达不出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交替出现如何将人们的心智与力量消磨殆

尽。当埃斯尔蒙特博士突然去世时，人们几乎没有感受到最高法院的决策带给他们的最初影响。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失去朋友对圣护而言是令人痛苦的双重打击。

在此事发生前仅仅一周，守基·阿芬第曾给巴哈伊世界发去消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内还有另外一件令他烦恼的事情。当时人们纷纷传言，某位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领袖的遗体可能会被带到圣地，并葬在卡尔迈勒山上。鉴于此，守基·阿芬第呼吁信徒们捐献资金，立刻购买巴孛陵殿周围的土地，尤其是那些可以俯瞰陵殿的地方，这样便可以保护这一神圣之所。人们的回复十分踊跃，才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之后，守基·阿芬第便可以通知大家，他们慷慨、出色的支持达到了目的，不过毫无疑问，这至少也在一段时间内大大加重了圣护的负担。

1926年2月，他写信给一位信徒，其中提到了这种重负："我淹没在了一片无边的海洋中，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忧虑和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我的头脑极度疲倦，由于这种精神上的劳累，我感觉自己正在变得低效、迟缓。"后来这一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于是他被迫离开作短暂的休整。"紧迫的忧心之事和责任的重担令我喘不上气来，"他在3月底写道："这使得我必须离开，虽然此时我无比急切地想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肯定病得很重，否则他不会让自己离开海法和他的客人们，但不管他在2月和3月的状态如何，与后来的情况相比，都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一封于4月11日从设拉子发来的电报让他陷入了更糟的处境，其中直言不讳地说道："十二名在贾赫罗姆（Jahrom）的朋友殉道。动乱可能会波及其他地方。"守基·阿芬第在同一天回复道："对此突然灾难感到震惊。暂停活动。向中央政府上诉。向亲属传达最真切的同情。"他还在同一天给德黑兰发去电报，其中的消息体现了信仰的精神，它与贾胡拉姆（Jahrum）事件的联系不应被忽略："我郑重地要求所有波斯、突厥斯坦、高加索的信徒全心全意地参与到新的灵理会的选举中。没有任何真正的巴哈伊可以置身事外。通过中央灵理会将结果即刻交由圣地，并向每一个中心宣布。谨慎行事。祈求神圣帮助。"第二天，守基·阿芬第从设拉子收到了一封更为详实的电

报，得知动乱的主要掀起者已被逮捕，并为他提供了一些建议，于是他给德黑兰发了电报，其中写道：“对贾赫罗姆殉道事件深感悲伤。代表全体巴哈伊和我本人转告国王陛下，我们对他的及时干预深表感激，并郑重恳求他立刻惩罚犯下如此残忍恶行的罪犯。敦促波斯所有的灵理会发出类似的消息。” 在最初的电报中，他将“贾胡拉姆（Jahrum）”一词按照发音拼成了“Jahrom”，但后来又根据音译原则改成了“Jahrum”。从这一微小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守基·阿芬第在刚刚收到这个消息时，肯定是心神不宁。

1924年4月24日，守基·阿芬第给一位同事写信，向其表述了这一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首先确认收到了对方的多封来信，然后解释说，之所以没能及时回复，是因为“我不幸生病了，身体几乎崩溃，再加上我又刚刚从波斯收到了一条最令人痛苦的消息，得知我们有十二名朋友在设拉子以南的贾胡拉姆小城殉道。我已经发出了电报，以了解具体情况。一旦收到详细的信息，我会立刻就相关细节与各个巴哈伊中心交流。政治方面的考虑和私人之间的争斗可能在其中扮演了不小的角色……我已经通过波斯总灵理会给沙阿传信……我还要求国外的灵理会用温和的语言在他们各自的报纸中对此事进行全面的报道，但我已考虑到让他们直接与沙阿联系尚不成熟……巴哈伊们在诸多令人痛苦和耻辱的环境下深受压迫，他们为从执政当局那里获得所需的帮助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目前看来，他们的付出似乎无济于事。想到这一点，我便感到伤心和恼火。在这种表面的徒劳无功之下，一定蕴含着某种智慧。”两周之后，守基·阿芬第在给这同一个人的电报中说他“深受折磨”。

5月21日，他又给这位巴哈伊写信，信中他敞开心扉：“目前，我本人十分疲倦，难以开展任何有效的工作。我变得迟缓、缺乏耐心、效率低下……如果没有新的危机再次来袭，我将试着离开一段时间。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经历了太多的危机……”但即使处在这样的状态下，守基·阿芬第仍努力去完成一些他认为可以办到的事情：“我感到如果我们具备耐心、技巧、勇气和才智，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发展促进圣道的利益，扩大圣道的影响。”他召集了巴哈伊世界的力量去保卫受压迫的波斯教团，同时确保国外媒体会对这些

殉道事件予以广泛的报道，并且对各个灵理会在此事以及至圣居所的案子中所应采取的行动给予不断的指导。

这便是圣护在这个阶段里的故事；从教长离世时起，重担就压在了他的肩膀上，短短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正当他还在努力平衡肩上的重担之时，他受到了多少打击啊！

第四章　玛莎·鲁特和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

守基·阿芬第过去常说，虽然自己历尽苦难，但是这些苦难总是孕育着生机。他会首先历经火海的煎熬，遭受苦难的炙烤，然后天降喜讯之甘霖，让他重获生机。可能我现在仍然无法理解奉献的真谛，但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圣人都是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之后方能取得成就。

5月4日，时值圣护苦难缠身之际，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Queen Marie）在《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上就巴哈伊信仰发表了一份极富感激之情的声明，此后，在王后访问美国和加拿大期间，她又陆续发表了多份同样的声明，刊登在二百多份报纸上。这是巴哈伊信仰覆盖面最广、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宣传。圣护在5月29日的一封密函中称：“这是圣道进程中最杰出的一件事情，其意义十分重大。”

罗马尼亚王后是第一位接受巴哈伊信仰的皇室领袖，她承认了巴哈欧拉的地位，这是守基·阿芬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篇章，同时，这也和玛莎·鲁特（Martha Root）的服务密不可分。玛莎·鲁特被圣护赞誉为“巴哈欧拉的信仰中最出色的仆人”，她在圣护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崇高的灵魂与圣护的关系，那么任何对圣护生命的记述都不可能是完整的。玛莎·鲁特女士的职业是一名记者，她出生于美国的名门望族。她曾在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之时与祂相识，而且，在《神圣计划书简集》的激发之下，她从1919年起开始了历史性的旅行传道，以此服务圣道。她的旅行范围比任何一个巴哈伊都要广，路程也更为遥远，不仅如此，正如圣护所说，她还经常到“极端凶险的地方”去传道。在阿博都-巴哈离世的时候，玛莎·鲁特已经年满四十九岁，此时的她，

外表朴素但绝不平庸，美丽的蓝眼睛显得格外真诚，而且她虔诚地信仰巴哈欧拉，相信祂无所不能，正如她自己曾经所说的一样，如果人们放手将事情交给巴哈欧拉，那么祂将为人们完成一切。玛莎·鲁特一共历经了四次传道之旅，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正是由于这些伟大的传道之旅，加上她自己那些优秀的品质，使她深得守基·阿芬第的喜爱，并被他誉为“旅行传道者的典范”。没有任何信徒的服务可以像玛莎·鲁特一样让圣护如此满意。守基·阿芬第曾在1926年10月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她：“从她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真正清楚地看到，当无所畏惧的信仰与个人崇高的品质相结合的时候，会产生多么伟大的成就，会释放多么巨大的力量，会到达多么非凡的高度。”

从守基·阿芬第使命周期之初，玛莎·鲁特就不仅对圣护倾注了全部的爱心，而且还不断就自己的计划向圣护咨询。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的工作中，她都与圣护保持着合作关系，他们相互关爱，相互信任，这在圣护饱受磨难的一生中是弥足珍贵的。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有书信和电报往来，她向圣护通报自己的计划、需求和成果，并请求指导；圣护一直予以答复，鼓励她，给她提供建议。1923年，在一封给玛莎·鲁特的信中，圣护称她为“阿博都-巴哈坚强和热情的追随者”。诸如此类的话语经常出现在圣护写给她的信件中，通过这样的话语，圣护向她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温暖。例如，圣护会说，他怀着“自豪和感激之情阅读了她的信件”，它们“一如既往地使我的内心愉悦”，以及“亲爱的玛莎，收到你的来信我总是很高兴”。1926年7月，圣护给玛莎·鲁特写信，此时的她正在与欧洲的王室频频接触：“……要经常给我写信，我渴望了解你的行动和成就中的每一个细节。给予你我无尽的爱……”在8月份时，他说：“你在服务的领域中取得了伟大的进展，我迫切地想知道其中的每一个微小细节……现附上一封致王后的信函，请勿与他人分享其中的内容。”然而，圣护却迫不及待地想与她分享这封信（王后从玛莎·鲁特那里学习了信仰）。到了9月份，圣护写道：“我很高兴与你分享罗马尼亚王后的回信内容。我认为这是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函，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期望。王后所

发生的变化，包括她直率的举止、敏锐的言辞以及果敢的立场，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上帝之精神无所不能，体现了你对圣道服务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守基·阿芬第和玛莎之间的信任将彼此连结在一起，两人在1926年10月的电报往来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玛莎在给圣护的电报中说：“至爱，你是否同意我于11月末在葡萄牙继续执行初定计划？请回电。”她在电报的开头频频使用“爱”这个字眼，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她温柔的天性了。圣护就此回电：“遵照神圣指引的启发。最温柔的爱。”随即，他又为她送去了六十英镑，“你正在为我们挚爱的圣道开展卓越的工作，我希望能为你的工作做出一点卑微的贡献。”圣护之举并非仅此一次，我们发现他经常给她一些资金支持，正如他自己所说，以此“赞扬你在神圣葡萄园的模范劳作”，并且“资助你四处旅行传道，补偿你日益增长的开销，支援你了不起的工作”。当圣护得知她生病时，他也时常给她送钱过去。守基·阿芬第把约翰·埃斯尔蒙特博士（Dr. John Esslemont）的著作称为巴哈伊信仰的教科书，而玛莎则积极地投身于该书各种外文版本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之中。圣护鼓励她要不断推动这项工作的进展，并且给她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他偶尔还因为其他事情给过她资助。不过，这种赠与绝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发现，守基·阿芬第曾这样写道：“我已经收到你送给我的金戒指……试戴之后，我已将其赠与至大圣叶……你不知道你给予了我们饱受折磨和打击的波斯同胞多大的道德支持、心灵安慰和精神鼓励。在未来的世界中你将获得无限的恩宠！愿你拥有更多的力量！”在1929年2月的一封信的附言中，他说道：“我已经收到你送给我的漂亮手帕，我会好好珍惜它，藉此怀念亲爱的你。”这就是典型的守基·阿芬第，当他把戒指送给别人之后，就会突然想到玛莎可能会因此伤心，所以赶紧告诉她手帕的事情！他们之间似乎经常互送礼物。他曾送给她一些书让她分发；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他说他正准备给她送两叠信纸，上面印有至大圣名的字样，“便于你同著名人士之间的联系。”我们发现玛莎曾向圣护汇来十九美元，用以偿付圣护回复自己的问题所花的电报费用。

玛莎在一封给守基·阿芬第的电报中说："至爱，盼来信"。守基·阿芬第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你如此充满活力地投身服务，如此迅速和出色地为巴哈欧拉的信仰获得全世界的认可铺就道路，未来的世代会满怀愉悦地怀念你。"他称她为"圣道无与伦比的使徒"。在守基·阿芬第使命周期的前十年，他曾写信给玛莎说，信徒们对传道领域的需求"态度较为冷淡，缺少关注"，因此在这种形势下，玛莎的服务和信函对于圣护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26年7月10日，圣护写信给她："在我焦虑消沉、身心俱疲的时候，你的信……给了我力量，为我带来了快乐，并鼓舞着我。"1927年6月，圣护让玛莎放心，和她通信不是一种负担，"……相反，它消除了我心灵的疲惫，缓解了我无尽的烦恼和沉重的焦虑，振奋了我的精神。"同年12月，海法收到伊莱亚娜公主（Princess Ileana）致玛莎的一封信的复件后，守基·阿芬第告诉玛莎："这封信让至大圣叶喜极而泣……我相信，你没有意识到自己为圣道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在另一封写于1928年9月的信中，守基·阿芬第在开头说道："我最亲爱的和最珍爱的玛莎，"然后向她讲述了巴哈伊信仰在俄国的处境是多么地糟糕，继而说道："我现在精神紧张，身心俱疲，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跟你书信来往，我几乎写不出东西来了。你悲伤但满怀感激的兄弟。"11月，守基·阿芬第确认已经收到了五封玛莎的来信（我们可以看出两人之间书信往来有多频繁），并且说："你信中优美的文字总能让我想起巴哈欧拉所向无敌的力量，它的光芒从你巨大和神圣的努力中散发出来。每念及于此，我便倍感欣慰、深受鼓舞……"他还给她送去了九块可以镶在戒指上的宝石，"把它们送给你认为应该拥有它们的人"，以及三十英镑，"与你巨大的努力相比，这点钱微不足道……"

玛莎经常向守基·阿芬第寻求帮助，为了巴哈伊信仰的利益，她会毫不犹豫地向守基·阿芬第提出请求。圣护很清楚，她动机纯正，判断准确，因此面对她的请求时（从给一些普通人写信鼓励他们，到致电一些知名人士），圣护几乎有求必应。他会这样告诉玛莎："按照你的要求，现随函附上此信。"同样，守基·阿芬第也

经常向玛莎提出要求，玛莎则永远都会心甘情愿地投身服务，促进巴哈伊信仰的发展，抵挡敌对势力的破坏。守基·阿芬第曾多次派玛莎代表他参加各种国际性的集会和会议（他们与巴哈伊们志同道合）。比如，当第三届两年一度的“世界教育联合会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在日内瓦举行时，他在1929年6月12日写给大会的信中说道：“亲爱的人道主义同仁：兹派美国记者及国际巴哈伊发言人和传道者玛莎·L．鲁特女士作为一名国际巴哈伊代表参加7月份的大会。她届时将代表我向大会致问候信。向你们崇高的事业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兄弟及同仁守基谨启。”这些会议中，很多都使用世界语，而玛莎能够出色地使用这种语言。一封发于1938年4月的电报这样说道：“玛莎·鲁特，孟买，向宗教联盟（All Faiths League）的成功磋商致以最诚挚的祝愿。愿神圣指引赋予集会代表完成最高目标、再创辉煌的能力。”像这样的电报并不少见。

1936年3月，玛莎通过电报把玛丽王后姐姐的死讯告诉了守基·阿芬第。第二天，守基·阿芬第回电：“……转告亲爱的王后，我们致以最沉痛的哀思……”守基·阿芬第和玛莎两人的为人处事都非常讲究，他们深思熟虑、友好善良，总是用最合适的方式处理各种事务。玛莎是一位自然、纯真、热情且有魅力的女士。圣护是巴哈欧拉的国王，玛丽王后则是首位接受巴哈伊信仰的王后；毫无疑问，正是玛莎的这种真诚、朴实和崇高的天性使得她同时深得这两个人的喜爱。1934年，玛莎在一封给守基·阿芬第的电报中写道：“我们的玛丽向您致以爱和感谢。会面很成功。”

玛莎曾致电圣护：“……若立刻告知我你对胡佛总统的问候则甚佳。”守基·阿芬第次日回电：“谨代表全世界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向胡佛总统致以他们最诚挚的祈祷，总统为促进国际友谊与和平事业不遗余力（巴哈欧拉的追随者近一百年来同样对此坚持不懈），愿总统在该事业上取得成功。”而恰好在一年前，即1930年11月，玛莎在日本访问期间，两人也有过类似电报往来。玛莎致电说：“若电告我你对天皇的问候则甚好。”守基·阿芬第回电道：“请代表我本人及巴哈伊世界向日本天皇陛下致以最深切的爱，衷

心祝愿陛下古老的王国幸福安康，繁荣昌盛。”爱因爱而生，玛莎对圣护倾注了无尽的爱，圣护同样也以爱相报，犹如钻石捕捉光芒，再将其灿烂地反射出来。

1927年3月，守基·阿芬第在给玛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玛莎，无论你在何地，无论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中欧、俄罗斯、土耳其，还是在波斯，我热切的祈祷都会一直陪伴着你。我相信，你是巴哈伊信仰的模范拥护者，一定会受到保护、获得力量、得到指引，并完成这项空前的使命。”

玛莎虽然从未去过俄国，但是她却拜访了波斯，替圣护完成了他一直以来的心愿。1930年1月22日，守基·阿芬第致电玛莎：“愿挚爱者保佑你一帆风顺到达波斯。”同年4月初，玛莎到达印度。守基·阿芬第在写给她的信中确认，他收到了她写来的至少十二封信：“波斯朋友们对你怀有深深的敬意、爱戴和热情，你受之无愧。由于我长时间重病，康复后事务繁多，故未能及时回信，但我时时刻刻都惦记着你，尤其是当我俯首于陵殿的神圣门槛之时。”时光流逝，年复一年，玛莎的发丝开始染上霜白，身体每况愈下，但她仍然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继续着她的传道之旅，直到被一场“致命和痛苦的疾病”（守基·阿芬第之言）击倒，并最终于1939年9月28日在火奴鲁鲁去世。在玛莎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旅行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她倍受疾病的煎熬。在返回美国的途中，为了协助执行第一个“七年计划”，直到去世前那一刻她还在工作。圣护称赞她是巴哈欧拉天启的“形成时代”结出的最美好的果实。

我清楚地记得守基·阿芬第从电报中得知玛莎·鲁特死讯的那一天。当时圣护正患有白蛉热，高烧104华氏度（相当于40摄氏度——译注），唉，他真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得知这样的消息！但是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告诉他，因为他是圣护，而去世的是玛莎·鲁特。圣护不顾母亲、兄弟和我的劝阻，执意在床上坐起身来，由于遭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的打击，他脸色苍白，身体十分虚弱。他口述了发给美国的电报内容，宣告玛莎的死讯。他说自己还能怎样呢，整个巴哈伊世界都在等着他的宣告。在那封长长的电报中，他说道：“巴哈伊世界无数仰慕者沉痛缅怀玛莎英雄的一

生……后世将确认她为首屈一指的圣辅……在第一个巴哈伊世纪中……她是信仰在‘形成时代’结出的第一个最美好的果实。”玛莎·鲁特的“行动为美国巴哈伊社区增添了不灭的光辉”，因此圣护说，自己必须跟美国灵理会共同出资修建玛莎·鲁特的陵墓。在守基·阿芬第和玛莎·鲁特之间长达十八年的独一无二的伙伴关系中，这是最后一笔花销。玛莎是在一个朋友家去世的，圣护后来致电这位朋友：“……至高天庭有她一席之地，甚为欣慰……”

实际上，守基·阿芬第一直以来都对玛莎·鲁特赞颂有加，称赞她“无与伦比”，是“巴哈欧拉的信仰中最杰出的女性代表”。1929年，他在一封给西方巴哈伊的信中写道：“总而言之，我想赞美玛莎崇高的服务，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不甚全面。玛莎·鲁特女士是我们亲爱的姐妹，一位模范传道者，她坚持不懈地为圣道服务。她周游世界，其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鼓舞人心之成就，点缀和丰富了上帝永恒的信仰。传道早期，她去过美洲最南端、印度、南非、亚洲东部、南半球海域的一些岛屿，以及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近期，她与欧洲的统治者和王室交流密切，她无畏的精神给巴尔干半岛国家的王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平社团、人道主义团体和世界语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最近，她在德国的大学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所有这些都不得不令人相信巴哈欧拉力量的强大。在经济拮据和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凭借忠诚和忘我的精神，以无可比拟的细致和活力，独立完成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阿博都-巴哈在西方的传道之旅中为追随者树立了典范，而玛莎·鲁特是“最接近这一典范”的人。

玛莎·鲁特坚信自己拥有世界上最无价的珍宝——巴哈欧拉之天启。她相信，当她向任何人——无论君王还是百姓——展示和馈赠这颗珍宝时，她都使此人受到了最大的恩赐。玛莎既非家财万贯，也非地位显赫，她简单朴素，不讲究穿着，她既不是伟大的学者，也不是杰出的智士，但是凭借心中那份崇高的信念，她见到了众多的国王、王后、王子、公主、总统以及各类著名人士，并向他们传道，在圣道的历史上，她的功绩是任何一位巴哈伊都无法企及的。由于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圣护本人及其生活，而非其他，因此

我们无法进一步详细讲述玛莎与这些显要人物的会面情况，以及他们对天启的反应，不过其他的巴哈伊著作中对此有大量的记载。守基·阿芬第和罗马尼亚玛丽王后的关系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玛莎曾向守基·阿芬第详细汇报了她第一次和玛丽王后会面（她们之间的会面共有八次）的情况。1926年1月30日，玛丽王后在收到玛莎赠送的埃斯尔蒙特博士所著的《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一书后，邀请她到布加勒斯特的科特罗切尼宫（Controceni Palace）会面。显然，王后被巴哈伊教义所吸引，当有传言说玛丽王后将访问北美时，守基·阿芬第于1926年8月21日写信向美国灵理会下达指示，他的秘书对此记载道："我们从《泰晤士报》获悉，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将访问美国，她似乎对圣道非常感兴趣。因此，我们必须谨言慎行，以免做出不当之事，令王后形成偏见，并收回已经迈出的这一步。如果王后访美，守基·阿芬第希望朋友们要含蓄、智慧地行事，在未与总灵理会协商之前切不可贸然行动。"

玛丽王后一直都在学习巴哈伊教义。在此次访问期间，她深受教义的鼓舞，并在美国和加拿大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上发表公开信，用"优雅的语言"证明了巴哈欧拉天启的力量和崇高。自从看到第一封公开信时起，守基·阿芬第就"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并执笔写信，他向王后表达了其本人和东西方巴哈伊的感激和赞美之情，感谢王后对巴哈伊信仰的赞颂之辞。1926年8月27日，玛丽王后对圣护写来的第一封信做出了回复，用圣护自己的话说，王后的回信令人"深深感动"：

> 亲爱的先生：
>
> 收到你的来信，我甚为感动。
>
> 诚然，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天启犹如一道明亮的光芒照耀在了我身上。在我极度悲伤之际，在我内心充满矛盾与忧虑之时，幸得天启降临，让希望的种子深埋于心。
>
> 我的小女儿也从敬爱的圣者们的天启中汲取了力量，获得了慰藉。
>
> 我们将天启口口相传。凡天启所到之处，光芒骤然照耀，

人们的内心豁然开朗，以前晦涩难懂的事物，如今变得简单明了，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希望。

我的公开信能给为圣道而忍受痛苦的人们带去慰藉，我也感到万分愉悦。我将此视为上帝接受我卑微的赞颂之辞的迹象。

通过这封信，我得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也得益于祂的安排。诚然，正是由于一系列机缘，我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前进，直到一切豁然开朗。

祂便是这样带领我们最终走向终极命运的。

我所在的社会中的一些人怀疑我、反对我，因为他们觉得我的言辞有违君主的身份，但是，我内心存有一股无法阻止的力量，激励着我前进。

我俯首承认，我只不过是圣道的工具，我深知这个道理，也因此而快乐。

慢慢地，我眼前的帷幕逐渐揭开，悲伤将它一分为二。同时，悲伤让我更加接近真理，因此我不会因悲伤而哭泣！

愿先人的神圣力量保佑并支持你和受你指引的人们。

玛丽

1926年8月27日于布兰（Bran）

玛丽王后的美丽众所周知，而且她还是一位品格高尚、思想独立的女作家。她分别于1926年5月4日和9月28日在《多伦多每日星报》上，9月27日在费城的《晚间快报》（*Evening Bulletin*）上数次发表“公开信”，信中说：“前些天，一位女士送给了我一部圣作，我之所以称它为圣作，是因为它是一部充满了慈爱、善良、力量和美感的荣耀的著作……我向所有人推荐这本书。如果你们看到了巴哈欧拉或者阿博都-巴哈的名字，不要对它们置之不理，而要找到祂们的圣作，因为这些荣耀的圣作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创造仁爱，让那些滋润了我心田的话语和教诲也同样滋润你们的心田吧。你可能整天忙碌，无暇顾及宗教，或者你已经有了让你满意的宗教，但是，这些温和、慈爱的智者所带来的教义能与任何宗教

兼容并存，但又不同于它们。寻找祂们的圣作吧，做一个更加幸福的人。”“起初，我们都认为上帝是我们之外的某个人或某种事物……实则不然。我们俗世的感官无法完全理解上帝的意义——我们同样也无法真正理解永恒的意义……上帝是万物，是一切。祂是所有开端的力量。祂是供给、仁爱、善良、进步和成就的不竭源泉。因此，上帝就是幸福。上帝的圣言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为我们分辨善恶，但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却忽视和误解了上帝的圣言。因此，上帝会让自己的钦选者降临于世，为众生阐释圣言的真义，这才有了先知，有了基督、穆罕默德和巴哈欧拉，因为世人不时地需要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能够让他接近上帝，并且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给人们的圣言必须通过血肉之躯来传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俗世的耳朵聆听并理解圣言。”

在收到从加拿大寄来的王后的首封“公开信”的复本后，守基·阿芬第在5月29日写信给玛莎·鲁特：“为了我们挚爱的圣道的传播，你付出了卓越且堪称典范的努力，王后的信便是对你的努力的证明，这种证明你当之无愧，并且值得纪念。王后的信让我格外激动，它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和力量。你的功绩我们不会忘却，在圣道的历史上，你的成就让人难以企及。”由于此前贾赫拉姆发生了殉道事件，在这封信中，守基·阿芬第还询问玛莎可否将此事告知玛丽王后，藉此获得王后对发生在波斯的迫害的同情。毋庸置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玛丽王后就巴哈伊信仰发表了更加勇敢的声明，这在王后给守基·阿芬第的一封信中也得到了证实。守基·阿芬第收到王后发表声明的消息时，正值在巴吉宅邸纪念巴哈欧拉升天活动的前夜，他本人在一份公开信中对当时的情形有所描述：“巴哈欧拉悲伤的仆人们聚集在巴哈欧拉陵殿，向祂诉说着苦难，祈求祂救助饱受蹂躏的波斯。”他继续写道：“我们怀着感激之情俯首躬身，王室对巴哈欧拉圣道的赞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阿博都-巴哈所预言的，这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必定预示着上帝神圣信仰的胜利即将到来。”

从此，玛莎·鲁特（有时还有守基·阿芬第本人）开始了同玛丽王后以及欧洲其他王室成员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守基·阿芬第不

仅极力鼓舞玛莎，指导她如何处理与王室的关系，而且他本人也始终保持着尊严和良好的教养，并总是以诚挚的态度对待人际关系。他只是利用这些联系来更好地为圣道的利益服务，因为这些联系可以提升圣道在公众眼中的声望，并且可以让巴哈伊信仰的敌人知道巴哈伊信仰已经和欧洲王室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直到1938年玛丽王后去世之前，玛莎·鲁特一直和王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会把所有的巴哈伊活动告知王后，王后也会亲笔写信给她，这些信件无不反映出王后对巴哈伊教义的友好和忠诚。守基·阿芬第和玛丽王后之间也有书信和电报往来；但更多的时候，守基·阿芬第都会让玛莎代为传递，因为他和王后两人在各自环境中都身居高位，所以这种方式更为私密，也更加省力。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提，那就是玛丽王后一直以来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玛丽王后在她的国家位高权重，在她作为王后和王太后的时期，由于教会和政治派系的纷争，罗马尼亚在政治风暴中动荡飘摇。当时的巴哈伊信仰不像现在这样广为人知，一些无知的人认为巴哈伊信仰本质上就是伊斯兰教，因此，玛丽王后公开支持巴哈伊信仰不仅遭到了竭力反对，还被认为是一种极不理智的行为。这些人对王后施压，希望她对信仰保持沉默。

玛丽王后在给圣护的第一封信中提到："我所在的社会阶层中的一些人怀疑我、反对我，因为他们觉得我的言辞有违君主的身份……"但王后不断就巴哈伊信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并允许这些文章对外公布，这其中包括她专门为《巴哈伊世界》（*The Bahá'í World*）撰写的一些文章。这些行动需要过人的勇气和深深的虔诚。1934年1月1日，王后给玛莎写信，其中提到了她本人和她家庭的消息，并附上了一份珍贵的颂词，信中写道："这个能用于第五期吗？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在于避免重复自己……"

1927年10月25日，守基·阿芬第给玛莎写信："我已收到了最为盼望的来信……信中内容让我分外激动，特别是你与王后和公主不同寻常的历史性会面。现寄给你一些巴哈伊戒石……请你代表我赠与王后、公主，以及其他你认为会喜爱和珍惜它们的王室成员……请王后和公主相信我们诚挚的爱，相信我们为她们的幸福和

成功所做的祈祷，同时我们热情和诚恳地邀请她们访问圣地，挚爱者之家定会热情接待。”

守基·阿芬第在上面的信中所提到的与王后的这次会面，其背后毫无疑问有赖于他本人的影响和支持。1927年6月29日，守基·阿芬第给玛莎写信，并做出指示：“我希望你不仅与罗马尼亚王后成功会面，还要同塞尔维亚王后和保加利亚的鲍里斯国王（King Boris）会面。你的工作至关重要，我相信你会在第一时间将详情细节告知我。”1927年7月27日，玛丽王后在锡纳亚宫（Sinaia Palace）致电守基·阿芬第，确认她已收了到戒石礼物，以及圣护发出的访问海法的邀请[①]：

守基·阿芬第，海法

感谢你以及所有的信徒，我感觉到了与你们在灵性上的紧密联系。

玛丽

玛莎·鲁特也成功地完成了守基·阿芬第的其他指示，因此，守基·阿芬第在1928年5月给她写信：“……你出色地同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王室成员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我们深受鼓舞，激动万分……”

在早些时候，即4月份，玛丽王后和女儿伊莱亚娜正在塞浦路斯访问，圣护给玛莎写信说，一些报纸已经刊登了王后打算访问海法的消息，他想知道“王后她们是否真有访问海法之意？报纸提前泄露行程会不会影响她们的朝圣之旅……”王后一行访问塞浦路斯期间，由塞浦路斯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Sir Ronald Storrs）负责接待，因此守基·阿芬第致电爵士：“罗马尼亚王后陛下和伊莱亚娜公主殿下为理想献上的崇高颂词使得巴哈伊信仰充满生机，我谨代表阿博都-巴哈的家族及朋友们向她们表达真诚的谢意。请代为转达我们美好的祝愿和深深的感激。”罗纳德爵士将王后和公主充

① 1927年7月20日，玛丽女王的丈夫费迪南德国王去世，守基·阿芬第于1927年7月22日致电慰问。后经证实，此电报为玛丽女王给守基·阿芬第的回复。

满感激的回复通过电报转发给了守基·阿芬第。

下面这份亲笔手稿是圣护致王后的一封长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罗马尼亚王后陛下
布加勒斯特

尊敬的王后陛下：

我刚刚收到我亲爱的巴哈伊姐妹玛莎·鲁特女士转交的陛下的签名肖像。除了签名，陛下还亲笔写下了几句话，言语虽短，但字字情真意切。陛下的照片美丽动人，我将珍爱这张绝佳的肖像，而且请相信，至大圣叶与阿博都-巴哈的家族对陛下怀有深深的爱与敬佩，因此他们和我一样，对收到陛下的照片感到非常欣喜。

过去数年里，我一直关注着贵国发生的种种事情，并深表同情。我知道王后陛下一定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忧虑。王后陛下对巴哈伊信仰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崇高颂词，以及一直以来对巴哈伊信仰给予的无私关怀，给长期以来饱受煎熬的东方巴哈伊信徒带去了力量和慰藉。我坚信，王后陛下无论遭遇何种生命沉浮和迷茫困惑，即使在最悲伤的时刻，只要想到这一点，就一定会得到无尽的支持和愉悦。亲爱的王后陛下，你的地位是巴哈欧拉从天国赐予的，而且是任何尘世的威权都无法企及的。

第二期《巴哈伊世界》一经美国巴哈伊出版委员会发行，我立即将其分别寄往王后陛下和伊莱亚娜公主殿下在布加勒斯特的地址。这是一份最新、最全面的巴哈伊出版物。请允许我明年给陛下寄送第三期，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收笔之际，我再次表达对王后陛下的深深感激。你给阿博都-巴哈的家族以及全世界的巴哈伊注入了无穷的力量，鼓舞他们在圣道上前进。

如果王后陛下和伊莱亚娜公主有意拜访圣地，到阿博都-巴哈位于海法的家中，或者其他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生活过的

且值得纪念的圣所，我与家人表示最热情的欢迎。

守基

1929年12月3日于海法

1930年，王后陛下和伊莱亚娜公主访问埃及。在此之前，玛丽王后曾访问塞浦路斯，当时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歪曲报道，有鉴于此，守基·阿芬第于2月19日致电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如王后访埃，建议灵理会仅以书面形式代表巴哈伊表示欢迎和感激。可以送花。严格避免单独交流。通知开罗。"

当年，巴哈欧拉曾给玛丽王后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写过一封书简。为了让玛丽王后最终能够来巴勒斯坦访问巴哈伊圣地，圣护让人用优美的波斯书法誊写这封书简，并在德黑兰做了精美的装帧。2月21日，圣护致电德黑兰："致维多利亚女王的精装本书简务必于3月10日之前送到海法。"这是圣护为王后陛下准备的礼物。玛丽王后到达埃及之后，圣护一直没有收到她准备访问圣地的消息，因此他在3月8日直接致电玛丽王后："阿斯旺市，五月花号，罗马尼亚玛丽王后陛下。我和阿博都-巴哈家族再次诚挚邀请王后陛下及伊莱亚娜公主殿下访问海法圣地。王后陛下参观巴哈欧拉陵殿和监狱之城阿卡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还会给所有默默受苦的东方巴哈伊信徒带来无尽的力量、愉悦和希望。致以最诚挚的爱和祝愿，为王后陛下的幸福和安康祈祷。"

这封电报仍然没有回音。守基·阿芬第于3月26日再次给下榻在开罗市塞米勒米斯旅馆（Hotel Semiramis）的王后陛下发了电报，电报中写道："恐之前致王后陛下及伊莱亚娜公主殿下的信和电报（其中提到我及阿博都-巴哈家族邀请陛下和殿下前来访问）未能送达，现再次致电。如王后陛下能够访问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陵殿以及监狱之城阿卡，我们将不胜欣喜。对报纸的擅自报道深表遗憾。"两天之后，驻开罗的罗马尼亚大使致电守基·阿芬第："王后陛下未去巴勒斯坦，无法造访，深表歉意。"

圣护曾在1930年4月2日给玛莎·鲁特写过一封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此事的反应："现就王后计划访问海法一事致此密函。

非常遗憾，此事未能实现。其中原因，我完全不予理睬。”他在这封信中还说，虽然他给王后发过一封书面邀请，并且在王后在埃及时给她发过两封电报（他在该信中引述了这封电报的全部内容），但他只收到了罗马尼亚大使的一封电报（该信中也引述了这封电报的全部内容）。守基·阿芬第在一封致玛丽王后的电报中提到了报纸擅自报道一事，的确，报纸在各地（如巴勒斯坦、英国和美国）擅自报道，歪曲事实。他告诉玛莎：“美国合众新闻社（United Press of America）的记者采访过我，但是他们的报道跟我所说的完全相反，他们歪曲了事实。我希望我们能够确保王后陛下至少知道真相！但是今后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信函能够送到陛下手中？我认为你应当给她写信，解释整个事情的真相，告诉她我对此事深感失望。”圣护要求玛莎对这件事严格保密，并且说：“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只会增强王后对巴哈伊信仰的信念和热爱，并让她坚定决心、重新振作、传播圣道。”很显然，圣护对此次不快之事格外苦恼，但他还是安慰玛莎：“亲爱的玛莎，不要悲伤，不要懊恼。你充满爱心、全心全意、辛勤地播撒种子，这些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的……”

玛丽王后陛下之前一直想访问巴哈伊圣地，所以此次她和女儿被迫取消访问计划，不仅让圣护大失所望，王后本人也非常失望。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勇敢独立的玛丽王后肯定与反对者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因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玛丽王后亲自给玛莎·鲁特写信，讲述了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封信写于1931年6月28日，玛丽王后在信中说：“访问神圣陵殿和会见守基·阿芬第的计划受阻，我和伊莱亚娜格外失望。我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我的任何行动都对我不利，并且在政治上遭到了恶意的利用。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并且被无情地剥夺了自由。人在某些时候必须屈服于压迫，不管这个人有多么刚毅，当别人刻薄卑鄙、心怀恶意地对待他时，他肯定会悲痛万分。我当时要保护我的孩子，她比我更加痛苦，所以我不能挺身而出挑战整个世界。但是真理之美仍存我心，虽然历经风风雨雨，我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它……听闻你的传道之旅成果丰硕，我甚为喜悦，你给每一块土地带去了如此美

妙的讯息，祝愿你取得更多的成功。”在王后的署名下方，附有一句话作为信件的结尾，这句话最能体现王后的品格和她对信仰的态度：“现附上一句话，或可在《年鉴》中用到。”收到此信后，玛莎·鲁特立即致电守基·阿芬第，向他汇报了信件的主要内容。圣护回电说他很高兴，并让玛莎把王后的来信寄给他。

我记得守基·阿芬第曾多次向我讲述至大圣叶在教长的家中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准备迎接玛丽王后和她的女儿——王后陛下确实已经乘船前往海法，因此守基·阿芬第相信王后要展开计划中的朝圣之旅。但是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直到轮船靠岸都没能收到王后的消息。圣护后来才得知，已经有人在船上会见了王后一行，并告知他们访问之事不妥，不予批准。王后一行随后被送进一辆汽车，离开了巴勒斯坦，去往另外一个中东国家。难怪王后在给玛莎的信中写道，有些人“刻薄卑鄙，心怀恶意”。

守基·阿芬第称玛丽王后为“王室皈依者”。面对日益严重的孤立、不断增长的年龄和欧洲复杂的政治形势，她的很多王室亲属逐渐倾覆，但是她对巴哈伊信仰的忠诚始终不渝，这深深地感动了守基·阿芬第。1934年1月23日，守基·阿芬第再次写信给玛丽王后：

尊敬的王后陛下：

收到你为《巴哈伊世界》写的赞颂之辞，其美妙之处令我深为感动。这深刻体现了王后陛下一直以来对巴哈欧拉圣道的关心，我在此对王后陛下表示诚挚和无尽的感激。

亲自翻译王后陛下的撰文，我万分激动。我坚信，东西方无数的巴哈伊信徒一定会深受鼓舞，为了实现巴哈欧拉预言的至大和平而不懈努力。

我现将一份珍贵的巴哈欧拉的手稿托玛莎·鲁特女士转交于你。该手稿是由德黑兰一位忠实的信徒装帧的。

希望以此表达我对王后陛下高贵精神的敬仰之情。凭借这种高贵的精神，陛下对拼争和压迫中的巴哈伊信仰表达了崇高的赞同。

我将在巴哈欧拉陵殿的神圣门槛前为王后陛下的安康和幸福祈祷。

守基 谨启

守基·阿芬第给王后陛下送了一本他最近刚翻译完成的《巴哈欧拉圣作选萃》（*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王后回信表示“最深的感激”，并且在信末写道：“愿天父之精神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的生活和行动。”在此之后，守基·阿芬第给王后陛下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王后陛下：

王后陛下为即将发行的《巴哈伊世界》撰写了赞颂之辞，鲁特女士已经将原稿转交给我。这是王后陛下一如既往地关注和赞扬巴哈伊教义的又一次证明，我十分感动，并发自内心地感激。

全世界的巴哈伊社区都会怀着自豪和感激之情，永远铭记王后陛下优美感人的信仰宣言。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必定会鼓舞和振奋所有信仰者为了传播巴哈欧拉圣道而不断努力。

得知王后陛下阅读《巴哈欧拉圣作选萃》受益匪浅，我十分高兴并深受鼓舞，觉得翻译这些选录完全得到了回报。

劳烦麦克尼尔夫人（Mrs. McNeill）向你转交一张从美国收到的最新的照片，照片中展示了位于威尔梅特（Wilmette）的巴哈伊灵曦堂的建设的进展情况。

你对巴哈欧拉的圣道给予了崇高的支持，愿巴哈欧拉之灵保佑你并赋予你力量。

致以最深的感情、最崇高的谢意。

守基

1936年2月18日于海法

这封信中提到的麦克尼尔夫人居住在离阿卡城不远的马兹拉伊庄园，巴哈欧拉曾经住在这里。她从小就在马耳他认识了玛丽王后，当她通过圣护得知王后对巴哈伊信仰感兴趣时，她便把自己

对巴哈伊信仰的兴趣以及现在居住的房子与巴哈伊的联系告诉了王后。王后写信给她说：“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特别是想到你居住在海法附近，跟我一样是巴哈伊教义的追随者……你的房子曾经住过这样一位我们大家都敬仰的圣者……这令它极为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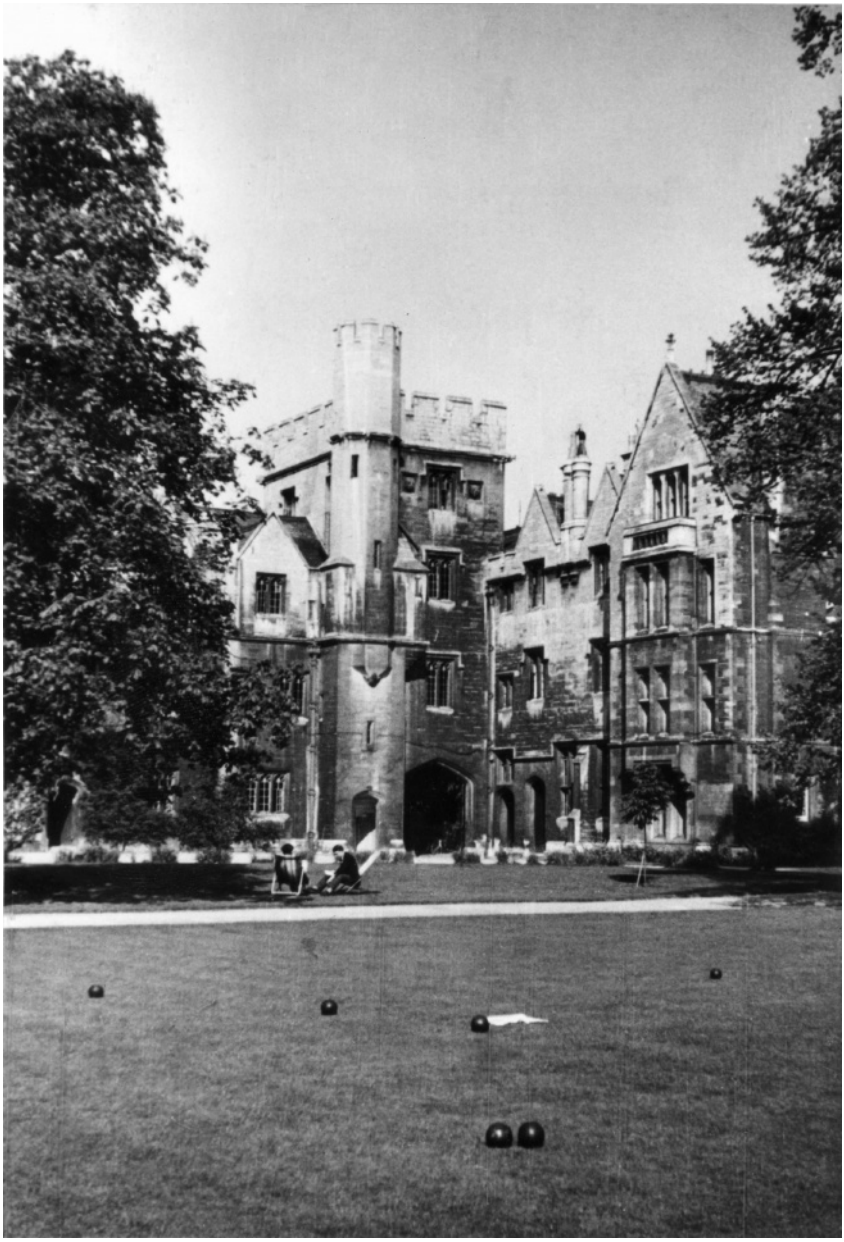
1936年，王后陛下发表了最后一篇巴哈伊颂词，两年之后她便去世了。这篇颂词最能体现巴哈欧拉天启对于她的意义：“对于那些寻找光明的人们来说，巴哈伊教义犹如一颗明星，给予他们智慧、信心、安宁和善良。”守基·阿芬第写道，她通过“为天父巴哈欧拉的信仰所做出的勇敢、划时代的声明”，为自己“在巴哈欧拉的天国中……赢得了永不磨灭的声誉”。“荣耀的玛丽王后堪称圣道的首位王室支持者，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人出现，用巴哈欧拉的话来说，他们‘是人类的眼睛，是受造物额头上绚烂的装饰，是给全世界的福佑之源。’”

我们可以看到，自1926年初守基·阿芬第担任圣护以来，在重重严峻的危难面前，巴哈伊信仰释放出了巨大的灵性力量，取得了无数的胜利，这其中就包括首位王后对巴哈伊信仰的皈依。

第五章　光影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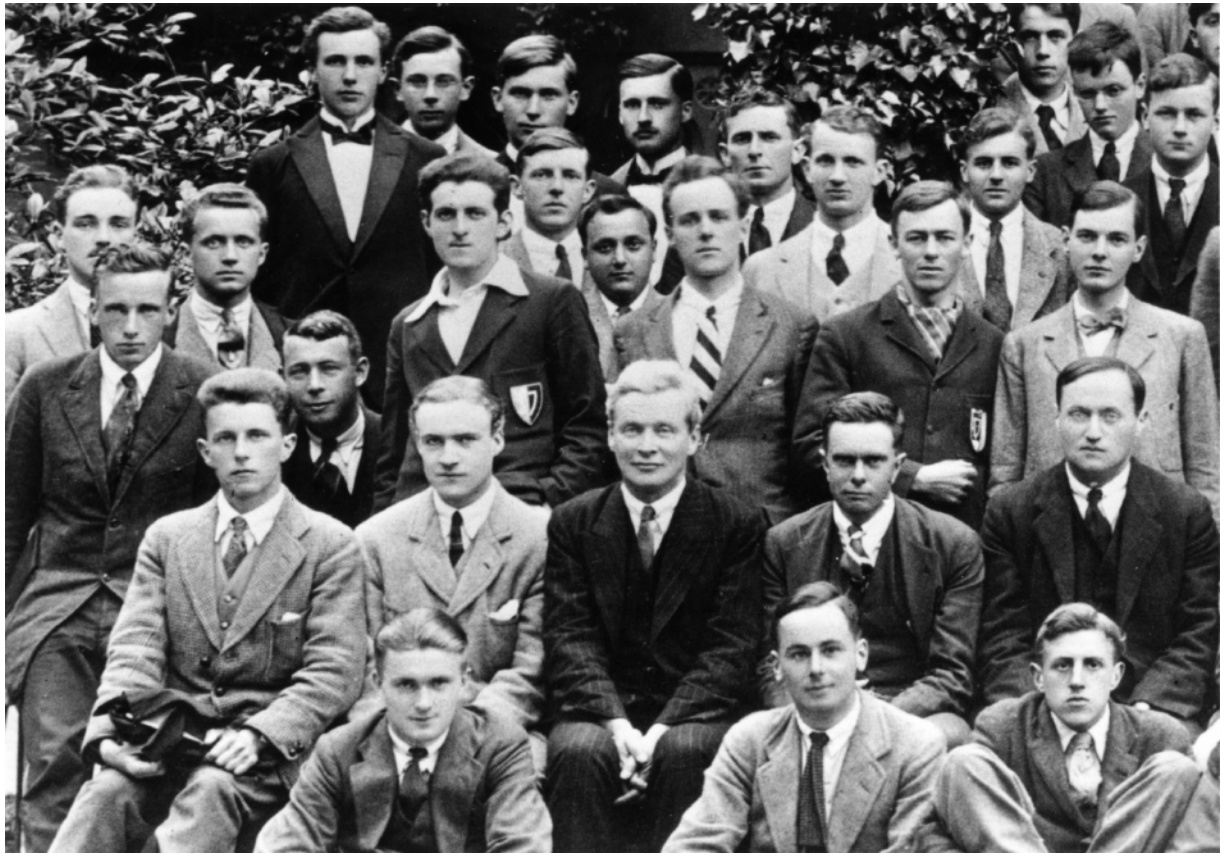
如果不提破坏圣约这个话题，那么守基·阿芬第的人生画卷肯定是不完整的。光和影相互交错，相互映衬，这样的原理不仅见于自然界，还见于人类历史。太阳的光芒照射出影子，灯盏的底部呈现出暗影；光线越亮，影子越黑；内心的邪恶使人渴望正义，崇高的正义使邪恶原形毕露。圣护的一生饱受磨难，一些野心勃勃的愚蠢之人，心怀嫉妒和仇恨，不断对抗圣道，反对圣护作为圣道的领袖。他们以为自己要么能够彻底颠覆巴哈伊信仰，要么能够使圣护丧失名誉，从而自封为反对派的领袖，拉拢信徒听从他们对教义的阐释，服从他们制定的圣道管理模式。不过，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企图能够最终得逞。尽管如此，那些不忠的叛徒却从未停止过他们的破坏活动。一些叛徒的头目误导无知的群众，一些被逐出信仰的人不断试图引诱忠实的信徒误入歧途。

阿博都-巴哈的使命周期里就出现了一些圣约破坏者，他们曾试图夺取巴哈欧拉陵殿的钥匙。同样，在守基·阿芬第的使命周期之初，在埃及也出现了一位名叫法伊格（Faeg）的叛教者，他创立了“科学学会”，想以此来对抗以守基·阿芬第为首的教务管理。守基·阿芬第早已对这些攻击做好了准备，特别是当他阅读了阿博都-巴哈在遗嘱中对以前的圣约破坏者的强烈谴责之后。不过，在如此意想不到的地方，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反对，他还是陷入了极大的震惊和焦虑之中。1923年，他把我和母亲叫到他的卧室，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我们站在床尾处，他躺在床上，显得身心俱疲且十分伤心，眼睛下方出现了深深的黑眼圈。他跟我们说他实在难以承受，想要离开，因为他发现自己被四面八方的攻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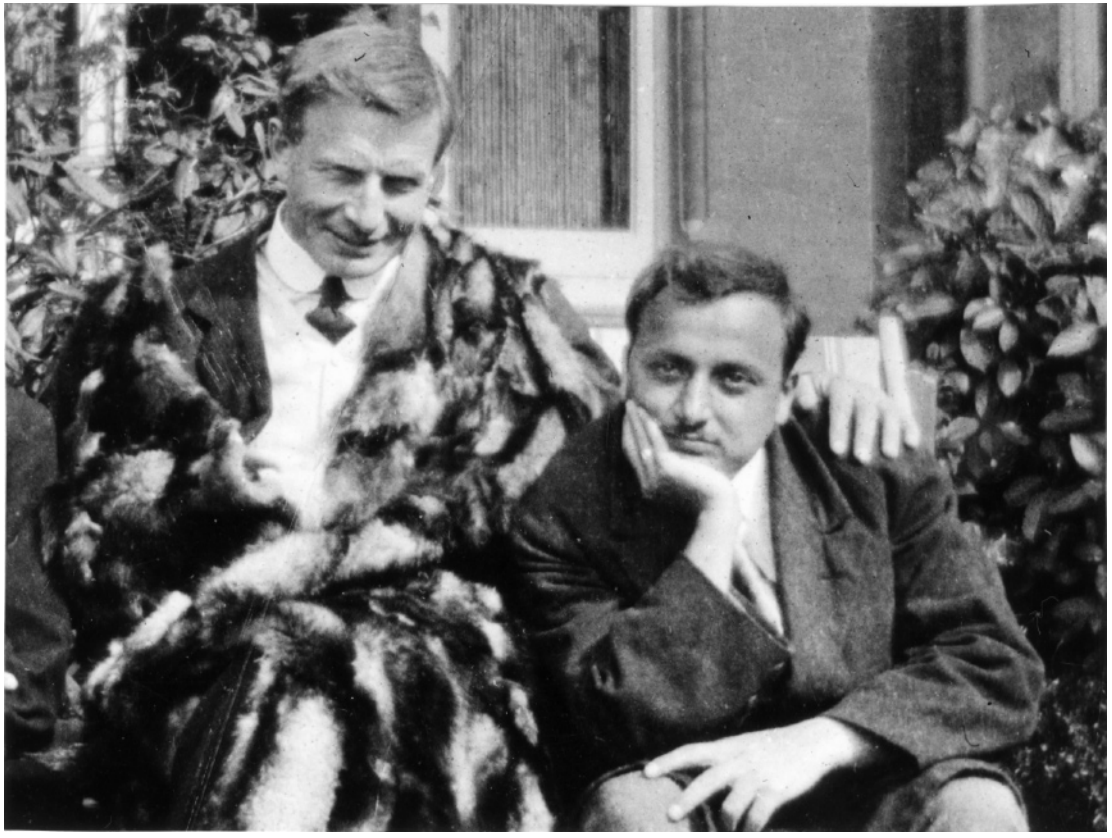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一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图中的建筑是学生时代的守基·阿芬第常去的。



图二十二　贝利奥尔学院的学生活动室（1920年）

守基·阿芬第站在中间，周围是他的一些同班同学（截取自一张更大的照片）。



图二十三　守基·阿芬第和埃斯尔蒙特博士

拍摄于埃斯尔蒙特博士在伯恩茅斯的疗养院，当时守基·阿芬第前去拜访他，两人是忠实的朋友。

图二十四　在曼彻斯特的一次集会

在牛津学习期间，守基·阿芬第（第二排左数第三位）常常拜访曼彻斯特的巴哈伊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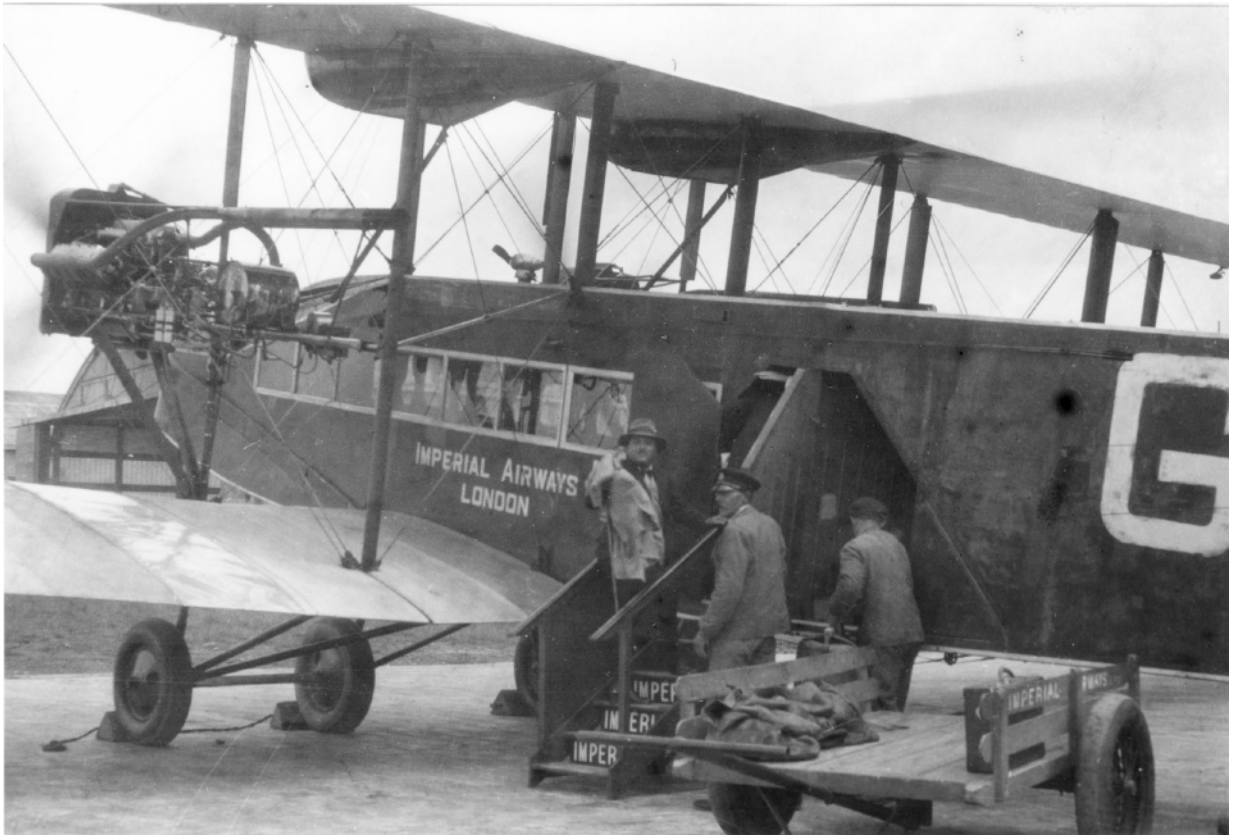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五　信仰未来的领袖

虽然还是一位学生，但守基·阿芬第身上的领袖特质已经显现出来。

图二十六　阿博都–巴哈之重担的继承者

二十二岁的守基·阿芬第。

图二十七　20世纪20年代初的守基・阿芬第



图二十八　首次飞行?

早在1920至1921年期间，守基·阿芬第便坚信空中旅行的可行性。

包围，而且他知道，根据委任，他必须行使他的权力，履行他的职责，将某些人驱逐出教团，以保护巴哈伊信仰，保护羊群免受狼群的侵扰。确实，这一切对一个这么年轻的人来说太过艰难了。

破坏圣约的事情总会让守基·阿芬第陷入病痛；仿佛他就是圣道，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任何对圣道的攻击都会使作为圣道中心的他感到切肤之痛。1930年，一位愚蠢至极的美国信徒对信仰的攻击达到了顶峰，他声称阿博都-巴哈的遗嘱是伪造的。守基·阿芬第在给图德·波尔的信中说道："在东方，巴哈伊信仰最强大、最顽固的敌人虽然挑战了巴哈欧拉天启的根基……但是从未暗示过遗嘱可能是伪造的。他们猛烈地攻击遗嘱中的条款，却从未质疑过遗嘱的真实性。我认为，对此事的报道越多，甚至政府也参与进来，对圣道就越有利……"他接着说道："对于怀特夫人（Mrs. White）的费尽心机，我只会感到可悲，而不是恐惧……她提出的问题举足轻重，关乎圣道的荣耀，我们迟早会看到结果……我相信，她挑起的这个事端不会损害圣道，反而对圣道有利。"他还说："遗嘱的真实性不容置疑。"怀特夫人一直以来机关算尽，阻碍圣道的发展，她甚至给美国邮政部长写信，要求他下令禁止美国灵理会利用美国邮政系统"散播守基·阿芬第是阿博都-巴哈的继承者、是巴哈伊信仰的圣护之类的谣言"；她还要求巴勒斯坦行政当局采取法律措施，宣告遗嘱是伪造的——但是直接遭到了拒绝。怀特夫人的一系列行为给守基·阿芬第增添了不必要的焦虑，当时他已经负担过重，"淹没在无休止的工作中"了，却不得不提高警觉，付出更多的精力。怀特夫人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的煽动活动达到顶峰的时候，英国灵理会通过德国灵理会向德国的所有巴哈伊社区致信，告诉他们英国巴哈伊始终忠于圣护。但是，德国巴哈伊社区的创立者之一赫里格尔（Herrigel）背离了圣护管理下的巴哈伊信仰。

怀特夫人事件之后，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1941年，怀特夫人的丈夫致电守基·阿芬第，说自己"深深地悲痛和后悔，恳求圣护的原谅……"看起来他从来没有真正认同过自己的妻子。

守基·阿芬第回信给他，为他开启了回归信仰之门。不过即便到了这个地步，他仍然无法从他那令人畏惧、不知悔改的妻子手中摆脱出来，因此，这种内心的变化仍然无法改变他的身份。

阿瓦雷（Avarih）曾是一位著名的波斯传道者，自教长升天之后，守基·阿芬第就派他到欧洲去加强信徒的信仰，但他后来却背负了一个“无耻背教者”的骂名。此时他已经背离圣道，并开始写书（持续了多年）攻击圣道，他不仅用污言秽语诋毁圣护，到最后甚至也诋毁教长和巴哈欧拉本人。然而可贵的是，跟怀特夫人的丈夫截然相反，他的妻子与他完全断绝了关系，由于这种忠于信仰的勇敢行为，她仍然是一名忠诚且广为称道的巴哈伊。

艾哈迈德·苏赫拉布（Ahmad Sohrab）曾经与教长关系密切，并做过祂的秘书，也因此有幸随教长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中心。后来由于自我和野心的膨胀，他成立了“新历史学会”，并通过自身的行为（例如，他习惯于在公开演讲中引用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话，好像这些话都是他自己说的一样）逐渐和巴哈伊教友疏远。守基·阿芬第起初给他发了大量的电报和信件（仅仅是引用这些电报和信件就可以轻易地写成一本书，来记录他叛教的过程），希望劝说他诚心悔改，但是他继续歪曲事实，散布赤裸裸的谎言，破坏教长在遗嘱中规定的行政秩序，所以后来守基·阿芬第不得不揭露他，以此来保护美国的巴哈伊。同样可贵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也是巴哈伊，她们完全断绝了和他的关系。由于对他的行径感到羞耻和厌恶，她们竟然把自己的姓氏都改了。

对于所有这样的危机，守基·阿芬第写道：“我们必须看到，那些背叛了信仰或者声称忠于信仰的人制造了诸多灾难的风暴，但每一次风暴的背后都隐藏着上帝的福佑。他们对信仰的攻击，不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非但无法破坏信仰，反而更加坚定了信仰的根基，让信仰之火愈燃愈烈。他们的本来意图是为了掩盖巴哈伊信仰的光芒，最后却向全世界宣告了信仰那高尚的教规、完整的团结、独特的地位以及广泛的影响。”

但是以上这些叛教事件并不能完整地告诉我们，在守基·阿芬

第的使命周期里，破坏圣约究竟意味着什么。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懂得该隐和亚伯[①]这个古老的故事，它讲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嫉妒，这种嫉妒就像人类历史织网中的一根隐秘的线头，贯穿了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历史事件。从巴哈欧拉的弟弟米尔扎·叶海亚背离圣道开始，破坏圣约这颗毒瘤就进入了巴哈伊信仰，处在了圣约中心的对立面，并一直留存下来。如果一个人从未经历过这颗毒瘤的伤害，或者从未思考过破坏圣约这个话题，那么他很难想象圣约破坏事件的破坏力。巴哈欧拉家族的所有人都是在破坏圣约的阴影中成长起来的，当某位亲密、优秀的亲人由于在灵性上染上了疾病，从而导致他的灵性逐渐丧失时，家族关系的冲突、疏离、调解和最终的破裂总是如影随形。如果一个人没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他很难想象这其中的一切。人的内心总是会受到一些无足轻重的事物的羁绊，他的心智被顽固自大所蒙蔽，这些弱点很容易将其卷入情感的漩涡，从而使他丧失判断能力，最终误入歧途。在东方，人们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烈的家族观念，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西方人来得紧密。不管叶海亚做过什么，他的家人对他仍心存感情，认为他毕竟有自己的理由，在家族事务中，并非只有巴哈欧拉的行为才是合理的。如果有丝毫这样的想法存在于巴哈欧拉的家族中，那么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就很难对破坏圣约的行为有正确的认识，这一点不难理解。有人认为完美典范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完美的，有时候在评判他人时也会出现小错误，这种怀疑是相当危险的。当这种怀疑产生时，就如同病菌进入了人体，它们有可能一直潜伏在体内，也有可能活跃起来，带来一场疾病。巴哈欧拉升天后，祂的家族开始分裂，两代人之后，阿博都-巴哈的整个家族都相继背叛了守基·阿芬第。我一直认为，这些事情的根源在于人们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巴格达时期就已经产生，当时巴哈欧拉尚未宣告祂的使命。根在那时便已扎下，并在八十年后结出了有毒的果实。

在一个人与上帝、显圣者和宗教领袖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信

① 典出《圣经》，主人公该隐（Cain）和亚伯（Abel）是一对兄弟，该隐因嫉妒亚伯而将其杀死。——译者注

仰和服从。即使一个人看不到，他也必须要相信；即使他不相信，也必须要服从。巴哈欧拉家族内部发生的圣约破坏事件犹如一株藤蔓，它缠绕在树上，并且把树勒死；它的卷须四处伸展，卷住任何能够触及的东西，然后将其摧毁。这就是为什么圣道中心周围有那么多的普通亲戚、秘书、社区成员经常会卷入到背叛事件中，而每当某个“患病”的成员被隔离出去时，总有一批盲目同情他们的人也会随之离开。

这些事情在纸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悲伤的情绪年复一年地席卷这个家族，当一幅幅令人思想麻木、精神崩溃、感情混乱的场景不断出现在家族成员的面前时，破坏圣约就不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了，而是给人带来地狱般的折磨。在一个病人躺上手术台切除病变部分之前，他肯定因为犹豫而耽搁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试图进行药物治疗，最后在康复无望的情况下才选择动手术。破坏圣约也是如此；先是察觉到破坏圣约的动向，接下来是警告、抗议、开导，然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又死灰复燃，并且比之前更加严重，接着发生动乱——悔恨和原谅随之而来——然后同样的循环周而复始，只是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加严重。这样的循环充斥在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的人生中，只是每次的形式稍有不同而已。

过去都已成历史，没必要把每件事都捡起来重述一遍。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弄清楚。他们这些杰出的人跟我们普通人对事情的反应总是不一样的，他们——不论地位的差异有多大——跟我们普通人完全不一样。早年和圣护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常想，为什么这些事情让他如此忧虑，反应如此强烈？为什么破坏圣约的行为让他身心俱疲？慢慢地我才开始明白，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灵魂中有一架神秘的内置天平，可以自动显示别人的灵性状态，就好像当你在天平的一端放上某种物体，由于失去了平衡，这一端会立即下沉一样。我们每一位巴哈伊都像是圣道之洋里的鱼儿，但是他们就好比海洋本身。圣道之洋可以根据事物的本质，识别出掺杂在其中的任何异物，自动地对它们产生反应，并将其中的死亡之物清除出去。

守基·阿芬第被迫经常公开地宣告一些有名的巴哈伊和阿博都-巴哈家族成员灵性堕落的问题。他指责后者说："他们的行为宣告他们已经脱离了神圣之树，放弃了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力。"在教长的家族中，一些卑鄙的成员一直在进行叛教活动，守基·阿芬第的内心因此饱受折磨。他澄清道，叛教事件其实是"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一种神秘的智慧会不时地从祂选择的追随者的群体中清除掉那些不受人欢迎、不配追随祂的污秽之辈……"守基·阿芬第指出，一些人对巴哈伊信仰怀有敌意，他们把这个净化心灵的过程视为分裂的征兆，满心欢喜地期望信仰的衰亡，但是这样的期望从未实现。

虽然破坏圣约是宗教的一种必然现象，但这并不是说破坏圣约不会损害圣道，相反，正如守基·阿芬第在一位亲人去世后致电巴哈伊信徒时所说的一样："二十多年来，阿博都-巴哈的家族一直遭受破坏圣约之病毒的侵害，伤害程度有多深只有等时间来揭示。"这也并不是说，哪怕再多的个人努力和忠诚，也无法避免破坏圣约之病毒的侵害。而最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破坏圣约的现象不会给圣约中心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守基·阿芬第的一生遭受到了无数恶毒的个人攻击，我个人认为，圣护在三十六年的使命周期中不停地与圣约破坏者作斗争，最终因为劳累过度，身体严重受损，才导致他的心脏在1957年停止了跳动。需要说明的是，正是由于守基·阿芬第的妹夫的去世，上文中的那封电报才有机会发出，我们由此才对守基·阿芬第在使命周期中不断经受的磨难有所了解。

有一位信徒与守基·阿芬第的关系很近，当守基·阿芬第得知他遭到身边一位亲属的恶劣对待后，就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深表同情，勇敢忍受。你我境遇相同，铭记你无上、不朽的持续服务。虔诚祈祷神圣陵殿最深的爱。"

在一场巨大的危机中，守基·阿芬第失去了他的亲人，我目睹了他所经历的一切。我在1940到1945年间写了一些日记，可能其中的一些话最能说明圣约破坏事件对守基·阿芬第的影响。"他继续走下去，就像一位在暴风雪中行走的人，白花花的雪片让他无法睁开眼睛。""他似乎已经遍体灼伤……他能坚持前进便是一桩奇

迹。”“我相信会出现转机。但是，啊！再也、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守基·阿芬第了。我不相信世界上能有什么可以抹去他这些年来所受的伤害！时间是最好的药物，但是它却无法消除伤疤。”“似乎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地破碎了。”

毫无疑问，不断出现的危机严重妨碍了他为圣道的工作。早在1926年，守基·阿芬第曾给一名态度冷漠的信徒写过一封信（后来这位信徒成了一个最卑鄙的圣约破坏者），信中写道：“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感情柔弱的人，从来都不是。我渴望工作，如果条件允许，如果我没有受到内部和外部攻击的话，我的思绪会集中在完成一些重要任务上面。”

在处理自己家族中出现的这些糟糕的局面时，守基·阿芬第是非常有耐心的。有一次，守基·阿芬第足足等了八个月，才在补救无效、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发出了将兄弟驱逐出信仰的电报——一封令他心碎的电报。

破坏圣约的行为会给圣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守基·阿芬第在使命周期中的最后的几项工作之一，就是要求圣辅指派第二批辅助团成员，以保护巴哈伊信仰。

第六章　守基·阿芬第的品格

凡是与保护信仰有关的事情，守基·阿芬第都会表现得严肃苛刻，但这并不能掩盖他温和慈爱的一面。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在心境平和的情况下，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信徒，都能感受到他与生俱来的慈爱和温柔。在他的电报档案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旦某个国家遭受灾难，他总是一再地给那里的巴哈伊发送慰问电报，就像这封发给波斯的电报，其中写道："获悉波斯突厥斯坦地震，忧虑。电报告知我朋友们是否平安。"除此之外，他还会在经济上资助那些生活极为困难的人。有一位美国的巴哈伊，在波斯的时候犯了脊髓灰质炎，准备随妻子回美国。守基·阿芬第给自己在贝鲁特、亚历山大市和纽约的朋友发去电报，让他们去码头接这对夫妇，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还有一位巴哈伊在来海法的路上以及朝圣结束后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守基·阿芬第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发了七封电报帮助她。下面这封发往埃及的电报尤其体现了守基·阿芬第的体贴和周到，电报内容为："新西兰巴哈伊杜因（Dewing）今晚抵达开罗，逗留一天。务必到火车站迎接。他戴太阳帽。如错过，则次日上午九点在库克斯（Cooks）办公室见。请盛情接待。"有一位巴哈伊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海法登岸，守基·阿芬第于是致电说："代表我安慰他。"一位丈夫发电报给守基·阿芬第，说他的妻子"精神完全错乱，相信圣护爱的讯息可让她镇定"，守基·阿芬第立刻回了电报："致以……无尽的爱和信心。"守基·阿芬第曾给近东地区的一位信徒（他的亲属们住在巴勒斯坦）发过一封电报，其中说道："欢迎来访，建议带上孩子们，以解祖母思念之苦。"他在给一位杰出的新巴哈伊的电报中说："致电公主，转达诚挚祝福。愿巴哈欧拉的力量伴随她。"

达格玛·多尔（Dagmar Dole）是一位虔诚的拓荒者，去世后被埋葬在了瑞士。有一次，我因生病在床上躺了几天，守基·阿芬第来到我面前，告诉我他刚去探访了达格玛·多尔的墓地。坐火车去的话，墓地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我记得当时的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同时又很惊讶。

除了给巴哈伊们提供惯常性的鼓励和一般性的指示外，有时候，他也会直接参与到他们的计划之中。在第一个七年计划期间，有一位十七岁的男孩想去拉丁美洲，但是有人说他年纪太小，建议等到年纪稍大、完成更多的学业之后再去。守基·阿芬第致电美国灵理会，请他们重新考虑让男孩去拉丁美洲。圣护在日后也常自豪地提起这位年轻人对拓荒要求的回应。埃拉·贝利（Ella Bailey）是一位腿部有残疾的妇女，而且已经上了岁数，但她想去北非拓荒，守基·阿芬第鼓励她去了。后来，在一张地图上，埃拉去世的地方被他贴上了一颗金色的星星！我记得有一位朝圣者在吃饭的时候跟守基 ·阿芬第说，她的丈夫已经同意夫妻两人做拓荒者，然后问圣护建议他们去哪里。圣护立刻说："非洲。""具体是非洲的哪个地方呢？"，她问。"南非，"他答道。这些快速简短的回答让朝圣者很吃惊，她说："具体是哪一座城市呢？"。他答道："约翰内斯堡。"简单的三个词，就让她和她的家庭找到了命运的方向，随后他们举家迁到了那里。

有时候，巴哈伊们会受到某种巨大精神的鼓舞，而这种精神甚至让守基·阿芬第改变了自己的指示，玛丽昂·杰克（Marion Jack）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阿博都-巴哈称玛丽昂·杰克为"杰克将军"，圣护把她誉为"不朽的女英雄"，说她是东方和西方、现在和未来所有拓荒者的光辉榜样，除了"无法超越的玛莎·鲁特之外"，没人能比得上她那"坚定、忠诚、克己和无畏的精神"。杰克（她经常被这样称呼）居住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当战争爆发时，守基·阿芬第十分关心她的安全状况，于是发电报给她，电报中说道："建议回加拿大，回电告知我资金是否充足。"她回复道："……瑞士如何？"并保证完全服从他的安排。守基·阿芬第随后致电道："同意瑞士。"但是她实在不愿意离开自己拓荒者的

岗位，恳求继续留在保加利亚，对此，圣护回复道：“建议留在索菲亚，致爱意。”

服务的层次中蕴涵着一种巨大的奥秘。守基·阿芬第总是建议朋友们凡事讲究适度，明智行事，但如果他们不满足于此，想到达英雄和自我牺牲的高度，他也为他们由衷地感到自豪。但殉道终究是一件既不明智、也不适度的事情——不过巴哈伊信仰最无上的荣光就是我们的首位先知的殉道，并且有两万信徒追随了祂的脚步。我一直试图解开这个奥秘，一方面我思考适度之道，另一方面我又思考巴哈欧拉的话：“……就用那洒在我圣道上的血红之墨去书写！对我来说，这确实比什么都甜美……”在我看来，飞机似乎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飞机靠着轮子在地面上隆隆前进时，它是在地面的维度上的一架稳步向前的飞机；但是当它收起起落架，飞速地向上冲的时候，它就进入了天空的领域，二者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地面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世俗的美好忠告；而如果我们选择离开地面，跃入更高的服务和牺牲的疆域，我们得到的就不再是世俗的教导，我们会赢得不朽的声誉，成为上帝圣道的英雄。

守基·阿芬第在工作中善于借助一切事物，不管他遇到的是人、是物还是一片土地，只要对巴哈伊信仰有利，他都会抓住并且加以利用。虽然通常情况下，守基·阿芬第是通过各国灵理会和委员会展开工作的，但是他也会直接依靠一些个人，比如说被人们称为“维多利亚阿姨”的维多利亚·贝迪基昂（Victoria Bedekian）。多年来，她写的信件在东西方广为流传，圣护对此十分支持，甚至还告诉她应该在通讯中着重强调什么。

守基·阿芬第不会过分计较各种消息的来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通过私人信件或者通过朝圣者得知，某位拓荒者已经踏上了传道之路，或者其他方面的好消息，他不会非得等到官方渠道确认后才相信，相反，他会立刻将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大家。正是由于守基·阿芬第这种灵活的处事方式，巴哈伊信仰的事务才能够大跨步地前进。与所有伟大的领袖一样，守基·阿芬第具备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一些特质，他深知时间在消息传递过程中的重要性，深知速度本身能够影响和激发想象力。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误以为守

基·阿芬第是一个不严谨的人。当他在整理数据、搜集历史资料，以及在地图上仔细查证的时候，他的精细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圣护与每一位配得上“巴哈伊”之名的信徒都有着亲密的感情，除此之外，他与一些人的私交则超出了普通情感和美好意愿的范围。有一次，守基·阿芬第患病，菲利普·斯普拉格（Philip Sprague）致电问候，并在电报末尾写道：“心中满怀挚爱。”守基·阿芬第回复道：“已康复，同样祝福你。”守基·阿芬第经常给他在意大利的代理商贾凯里博士（Dr Giachery）发电报，为巴哈伊世界中心订购各种所需物资，其中有很多电报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内容：“另订购二十四根灯柱，样式与之前相同，致爱意。”发送这样的电报绝非圣护惯常的做法。

但是圣护的电报还有另外一面。如果说其中的一些电报充满了爱意，并且大部分采用了常规表达方式的话，那么，另外一些电报的措辞则相当强硬。比如，他在1923年给美国灵理会的一封电报中写道：“期待频繁、全面的汇报……”还有许多发给个人的电报，语气更加强硬，比如：“警惕不忠，祝福”“再次警告你”“切勿疏忽”等等。守基·阿芬第的电报从来不罗嗦含糊。比如他给贝鲁特的弟弟致电说：“让妹妹带十条黑色科罗娜色带回来。”当战争结束，朝圣再次开放的时候，他给第一位请求拜访海法的巴哈伊回了电报，其中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词：“欢迎。”

这些电报是一个缩影，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守基·阿芬第担任圣护期间的一切行为、思想和感情，以及他对外界的回应和对巴哈伊的教导。与成千上万封他写给不同人的书信相比，这些电报更为私密、更为有力，并且透露出了更多的信息，因为书信中的细节经常会由圣护的秘书处理，唯有附言是他亲笔写的，他常常会在附言中为收信人祈祷，鼓励收信人，还会在其中阐述信仰的基本原则。

守基·阿芬第与他的外祖父和外曾祖父一样，都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感，这在他高兴或者内心平静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他的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有时他会轻声地笑，有时则会开怀大笑。有一位年轻的朝圣者对守基·阿芬第说他想结婚，守

基·阿芬第回答道：“抓紧，不要指望妻子从天而降！”1923年，他给贝鲁特的几位年幼的亲戚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两个任性的秘书何时结束治疗，回电。”在守基·阿芬第的家庭中，他喜欢戏弄自己熟悉的人，我便经常成为受害者。他知道我相信他所说的任何话，因此总是借机跟我开玩笑。记得在二战期间，有一次，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面色凝重，眼神焦虑。我立刻警觉起来，开始担心。随后他对我说，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让我更加焦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丘吉尔去世了。由于当时正处在二战最紧要的关头，听到这样的消息后我内心非常不安。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问他，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去世了，同盟国该怎么办？还有好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守基·阿芬第却一直把我蒙在鼓里，直到他自己忍不住突然大笑起来！他发现我非常容易上当，所以经常对我玩这样的小把戏。但是慢慢地我学聪明了，跟他一起生活二十年后，他说自己已经很难骗到我了。有时候，我也略微地跟他开同样的玩笑，但总不如他表演得真实，也很少能让他上当。

一方面如此威严，另一方面又如此信任他人、天真单纯、充满朝气，这就是我们的圣护！守基·阿芬第知道我略懂绘画，于是让我负责地图的填色工作。其中一幅地图显示的是巴哈伊社区在卡尔迈勒山上所拥有的土地。有一天，我正在地图上为新获得的区域填色，守基·阿芬第告诉我这几块的颜色要涂亮一些。我问他原因，他说为了表示出这些是“新增区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这些新购得的土地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快乐。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给一些大大小小的照片着色，这些照片是三个陵墓纪念碑的立视图，中间是至大圣叶的，两侧分别是她的母亲和弟弟的。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守基·阿芬第的另外一个优秀品格。他执着于自己的目标，果断、坚定，但不会不切实际、盲目行事。虽然他从不轻易改变目标，但他会随机应变，改变原有计划以更好地实现目标。当他决定将巴希叶·哈努姆的母亲和弟弟的遗骨从阿卡迁往卡尔迈勒山的时候，他立刻从意大利购买了两块漂亮的大理石纪念碑，同至大圣叶的纪念碑十分相似。当时守基·阿芬第并不在海

法，他打算将这两块纪念碑放在至大圣叶陵墓的两侧，并找人设计了效果图。但是当他回到海法、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块纪念碑（作为一对）放在一侧并使其处在同一轴线上会更加美观，于是他最终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

在圣护的使命周期中，我们看到神圣指引的光芒闪耀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肯定着他的决策，激发着他的选择。但是，每一个计划中总是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因素。上帝的行为和人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或大或小地改变着原本的计划，无论是伟人还是常人都概莫能外，先知们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一点。守基·阿芬第同样也受制于这些因素，但是他常常会灵活地改变计划，这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例子：他曾准备将巴哈欧拉的陵殿建在卡尔迈勒山上，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最终决定建在巴吉；“世界远征”或“十年计划”最初称作“七年计划”；该计划中原定建造一座灵曦堂，后来增加到三座；在欧洲原定有七个目标国，后来增加到十个；等等。有时守基·阿芬第会根据当前环境修正和扩张自己的计划，但也有的时候，计划会遭到外界不可抗力的破坏，这种情况下他会刻不容缓地采取补救措施，以保证圣道即使遭遇暂时的失利或屈辱，但是最终依然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和更丰硕的惠赐。

虽然守基·阿芬第会改变计划的实施方式，但是他绝不会动摇自己的目标。他是一位极富创造才华的人。十年计划期间总共新建了三座洲际灵曦堂，其中有两座都是由守基·阿芬第统筹规划的，这是他的才华的一个典型事例。他从身边的设计师那里选取了一些适合悉尼灵曦堂和坎帕拉灵曦堂的设计。这些设计雄伟壮观，规模合理，风格稳健，造价也不高。由于设计师不能参与具体执行，也无法监督实际建设，因此，守基·阿芬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亲自指导两国灵理会，要求他们找到当地的建筑公司去具体施工并建起这两座灵曦堂。这些建筑公司最初提出的造价过于昂贵，于是守基·阿芬第对其做了修改，最终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建成了这两座灵曦堂。守基·阿芬第的精明敏锐和机智判断一次又一次地为圣道节约了大量的资金，这些省下来的钱便可以用在诸多重要的任务上了，这样一来也避免了不合理的项目所造成的暂时性的破产。

守基·阿芬第严格恪守经济节俭的原则，在钱的问题上很苛刻。有一个人身负债务，守基·阿芬第不止一次地拒绝他的朝圣请求，让他先把债务还清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圣护在付账之前不仔细算账，不管是一顿饭钱还是上千元的账单！如果别人要价过高，他一定会指出来——同样，如果别人少收了他的钱，他也会提醒对方。记得有很多次，我提醒别人账目总数有问题，建议他们重新加一遍，不然他们肯定会吃亏，听完之后，他们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此外，他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态度十分坚决，如果觉得价格过高，他是绝对不会买的。很多次，圣护发现好多漂亮的装饰物，可以用来装点陵殿、文物馆和花园，但是价格很贵，卖方又不能或不愿降价，因此，即便他很想买，也有能力买，最终还是决定不买。守基·阿芬第曾经拥有一辆私家车和一位私人司机（与阿博都-巴哈一样），但是由于时值残酷的二战期间，很多零部件很难购买，于是他就把这辆车卖了，从此改坐出租车。我相信，只要钱够，一个人完全可以购买任何东西，他也可以再购买一辆车，但他却从没有这样想过。他反对挥霍、炫耀或奢侈，只要他觉得价格不合理，或者东西本身不合适，那么，他不仅自己不买，还会劝说别人也不要买。

坦诚也是圣护的一个优秀的品格。他把所有的信徒都视作知己。他直率、威严，他有着超然的态度，但同时又有一种最为亲切、迷人的自信。如果有朝圣者到他的家中做客，他不仅会跟他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对教义的阐释，还会把他的方案和计划也告诉他们。他对所有的交谈者都一视同仁。虽然守基·阿芬第所有伟大的计划都是通过各国总灵理会渠道向外传播的，也由它们负责实施，但是不管遇到谁，他总喜欢亲自向他们详细地讲述计划的内容。难怪许多朝圣回来的人都说，只要去朝圣，就可以大致知道官方即将对巴哈伊世界发布的计划细节。他在巴哈伊世界中心工作时也是如此。他的态度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坦率，有时候他会在桌上画一些草图，向大家解释他在卡尔迈勒山上的公园里做的是些什么，“卡尔迈勒山建筑计划”是怎样的，山上将会建起哪些建筑，等等。

每当要开展一项国内或国际的新工作时，守基·阿芬第总是

遵循着一套固定的模式，整个过程恰似曙光破晓一般：首先，第一道光芒会出现在他给朝圣者的话语中，或者隐隐地显现在他与巴哈伊世界的通讯中，试探着人们的视线；接着，随着思想之阳渐升渐高，闪耀的目标开始成形，他头脑的光辉能量便集中于此；最后，整个想法如太阳般喷薄而出，如此华美——七年计划，十年计划，公开信件中的一些警告和承诺，对巴孛陵殿、国际文物馆、灵曦堂等重大项目的完整指示，对《神圣正义的降临》（*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应许之日来临》（*The Promised Day Is Come*）等书中所包含的某些基本主题的阐述等等，皆是如此。

守基·阿芬第与朝圣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礼数周到，每一个细节都流露出友善，而且他会敞开心扉地与他们交谈。巴哈伊能在这么多国家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守基·阿芬第待人接物的方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如果信徒们受到了守基·阿芬第的热情接待，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时，他们肯定就像催化剂一样，激励自己的巴哈伊教友更加努力地为圣道服务，同时让没有机会当面见到圣护的人更加真实地了解他，这也是拉近信徒与圣护和世界中心的距离的最好方法。当他与朝圣者讨论一些话题时，他的言语会比写作时更加流畅、有力，更能传递出心中强烈的感情。1937年，在我和母亲朝圣期间，我有幸记录了他与我们在桌旁的谈话内容，但后来我就很少做记录了。不过，我还是记下了他的几次谈话，其中一次是在1954年，当时他就“世界远征的迫切需要”和“巴哈伊对拓荒的态度”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强有力的阐述：“我可以鼓励他们，我可以劝导他们，但是我不可能在他们心中创造出服务的精神——这只会令我感到不快乐，并给信徒们带来危险……”“虽然很多拥护者无所作为，但是圣道总能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不断取得胜利。”他提到了有些地方的学校里的老师，“他们把美国的生活方式带进了学校，而不是消除它们，建立巴哈伊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守基·阿芬第还是给予了朝圣者们丰厚的馈赠。作为他的客人，朝圣者们享受到了舒适的物质条件，而且圣护为他们揭开了眼前的面纱，提供信仰的教育。但是，每当朝圣者们衷心地赞美他、深深地感激他的时候，他总是会立刻转移话题，说拜访神圣陵

殿才是朝圣的目的。

每当我想起朝圣者（也包括我自己），无数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1923年的一天清早（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孩子），我们在巴吉纪念巴哈欧拉升天。活动结束后，我们乘坐圣护的汽车返回。我坚持要坐在游览车折篷的边沿上，而不是座位上。守基·阿芬第劝我别那么坐，提醒我别掉下去，我告诉他说不会的。那天早上我兴奋不已，受宠若惊，全然不知道害怕。当时的路况非常糟糕，我们在阿卡和海法之间的沙滩上，沿着大海和沙丘之间的一条狭长潮湿的沙路行驶。我们的眼前是无尽的波涛，汽车驶过，成百上千只白色的小螃蟹慌乱地寻找洞穴避难。太阳刚刚升起，整个世界显得那么清新、绚丽和洁净。随后，守基·阿芬第开始跟我说他多么渴望去加拿大看落基山，多么热爱山脉，多么喜欢登山。他关注任何有关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报道，直到生命的终点。守基·阿芬第非常热爱自然景观，如果他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没有事务缠身，那么我敢肯定，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游览世界各地的风景名胜上。

在圣护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两名瑞士的朝圣者来到了海法。他们的出现勾起了圣护在瑞士的所有记忆，对私人生活和个人情感一向矜持的他，竟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对瑞士的喜爱。我当时卧病在床，没有参加朝圣者招待所举行的晚宴。当他结束晚宴回到家中后，他告诉我，他“说了所有的事情”：登过哪些山，走过哪些地方，喜欢哪些风景。守基·阿芬第很少这样，很明显，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蕴藏着一股浓厚的热情。

我还记得在瑞士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那天傍晚我们正乘火车离开采尔马特（Zermatt）。在我们一起旅行的这些年里，守基·阿芬第没有与任何人建立私人关系，也很少跟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的性格不是这样，我有时会溜出自己的车厢，有时会找乘客漫天攀谈。这些他都知道，但他从不介意。我想，当我聊天回来之后，他一定能从我激动兴奋的表情中猜到我干什么去了，会目光有神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一次，却是他兴致勃勃地跟别人聊了很长时间。我们坐的是三等车厢，硬木座位，对面是一位可爱大方的男孩，他是白俄罗斯后裔，在美国生活。这是他第一次来瑞士旅游。

于是，守基·阿芬第以他惯有的友善热情，详细地向他介绍在可供支配的有限时间里，哪些地方是必游之地。他甚至还掏出一本瑞士铁路指南，告诉他坐哪趟车，在什么地方坐，以及上下车的时间。我轻松地坐在座位上，听着他们交谈。我看着少年俊秀的脸，表情是那样的谦恭和愉悦，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居然能如此地关心他。我心里在默默地祈祷（当然我不能直接告诉他），今天他所得到的恩惠，在某种机缘的安排下，会带领他走向眼前的这个陌生人领导下的圣道！

回到刚才的话题，两名瑞士的朝圣者来到了海法，守基·阿芬第与他们进行了谈话。他激动地对他们说，希望瑞士建造它自己的灵曦堂，地址最好选在首都伯尔尼附近，因为从那里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伯尔尼阿尔卑斯山——这座他曾在生命中花费数月时间行走和攀登的山脉。1957年8月12日，他就此事联系了当时的意大利灵理会和瑞士灵理会。他的秘书写道：“正如他与XX所谈论的，他迫切希望在瑞士购买一块土地，建造一座灵曦堂，不管刚开始的时候面积和规模有多大。他希望在伯尔尼郊外选址，这样便可以俯瞰伯尔尼高地；如果能够亲自把这块地赠送给瑞士巴哈伊社区，他将十分高兴。请勿宣扬此事，以免遭到伯尔尼其他宗教的阻挠，在德国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旦负责此事的委员会找到合适的地址，他希望你们的灵理会能够立刻向他汇报详情。”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馈赠，巴哈伊世界的其他社区从未享受过如此殊荣。这块将近两千平方米的土地位于伯尔尼郊外，俯瞰着古尔贝托（Gürbetal），而且从那里还可以看到著名的芬斯特拉峰（Finsteraarhorn）、门希峰（Mönch）、艾格尔山（Eiger）和圣女峰（Jungfrau），圣护曾多次在这些地方登山，并在此度过了外祖父升天后最痛苦的时光。

有一次，一位从加拿大来的朝圣者告诉圣护，在给爱斯基摩人传道的时候，他很难让他们明白诸如夜莺和玫瑰这类的比喻，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些事物。圣护的解决方式十分独特。朝圣者临走的时候，圣护送给她一小瓶波斯的玫瑰油，让她把这玫瑰的精华涂在爱斯基摩人的身上，或许这样他们就知道巴哈欧拉拿玫瑰做比喻的寓意何在了。

我还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在守基·阿芬第于1957年6月离开海法之前（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来），他在朝圣者招待所接见了两位来自美国的黑人朝圣者，他们跟圣护面对面坐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其中一位女士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当她见到圣护时（在圣护眼中，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她一生中所经受的伤害和痛苦都烟消云散了。她望着圣护，眼中既饱含着一位母亲伟大的慈爱之情，又充满了对圣护的无比崇敬之意。我想，这就是天使在天堂里仰望上帝时的那种表情吧。

圣护通过他的言语、他对事物的回应和他自身的榜样力量，不断发展着圣道。凡有幸接触圣护的人，无论他们的阅历有多少，成为巴哈伊的时间有多久（有些人跟我一样，从出生起便是巴哈伊），他们都能感受到圣道的伟大。在他于1957年向巴哈伊世界发布的长篇里兹万文告中，圣护提到了乌干达的基塔利亚监狱（Kitalya Prison）里新近皈依巴哈伊信仰的几名囚犯（很显然，他对此是很自豪的，不然他不会在文告中提起）。我记得自己当时的惊讶之情。我从没见谁能够不带羞愧地提到一名监狱中的巴哈伊！但守基·阿芬第却在文告中宣称，监狱中有一群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他经常对朝圣者说起这件事。对此，我思索良多，最后我才明白，巴哈伊信仰属于所有人，不管是圣人还是罪人，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以下两条原则：其一，社会必须依靠法律管理，依赖法律保护，违法者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其二，对上帝之显示者的信仰是普世性的，应该把所有人都包括进来，因为有信念的行为是点亮灵魂的火花，它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上帝的永恒存在，每一个人，无论犯了什么罪，都有接受信仰的权力。守基·阿芬第曾多次给不同的巴哈伊写信，鼓励他们到监狱里传道。

上帝的所有先知都给予了受蹂躏的、柔弱的、贫穷的和被抛弃的人们特别的援助、保护和爱的鼓励。同样，圣护的一言一行也都流露出了对这些人的怜悯。不过，我们要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人虽然需要特别的关注，但同时，他们身上也蕴藏着强大的力量和伟大的灵性。以西半球的印第安人为例，阿博都-巴哈曾写道：“你必须重视印第安人，他们是美洲的原始居民，他们的灵魂跟阿

拉伯半岛古代的原始居民一样。在穆罕默德天启来临之前，后者处在愚昧无知的野蛮状态；当穆罕默德之光洒向他们之后，他们的光彩辉映了整个世界。同样，如果这些印第安人接受教育，受到正确的指引，那么毫无疑问，神圣的教义必然会点亮他们，他们的光芒一定会照耀全世界。”在整个使命周期中，守基·阿芬第谨记这些话语，并反复敦促加拿大和美国的信徒，要把这些印第安人的灵魂召集到巴哈伊信仰的旗帜之下。1957年7月，守基·阿芬第向西半球各国总灵理会致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几封信之一），他在信中郑重重申了这个问题，并提到“早就应该让美洲印第安人皈依巴哈伊信仰”。我摘录了他的一些由秘书代写的指示：

“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传道工作；你们的灵理会在每次会议上都应对此给予高度关注，而对其他任何事情的考虑都应退居其次。我们必须大量发展新的灵理会，以及学习小组和独立中心，此外，还要集中精力让印第安人皈依巴哈伊信仰。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由印第安人组成的灵理会，让这片土地上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原住居民认识到，在圣道的事务中，他们与我们享有平等的地位，是我们的伙伴，巴哈欧拉是他们的上帝显示者。”

“看到一些印第安信徒参加了代表大会，他感到格外高兴。他高度重视向美洲印第安人传道的工作。阿博都-巴哈本人曾说，他们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今天，非印第安人的巴哈伊有权利、也有义务见证他们接受上帝的天启。你们的灵理会最有价值的目标之一，便是建立多个全部由印第安人组成的灵理会。同样，也要努力找到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向他们传导教义。请朋友们切记，与其他社会团体不同，在我们的信仰中，少数民族应该得到特别的关心、关爱和关怀，以弥补他们可能受到的低人一等的待遇……”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你们要集中精力制定计划。在此过程中，圣护告诫你们一定要牢记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增加灵理会、学习小组和独立中心的数量，从而为今后建立全国性的机构奠定更广泛、更深厚的基础。每一位信徒都要考虑到他们当前所在地区的实际需求，同时也要到邻近的和遥远的城镇中去拓荒。灵理会要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经常是贫穷的、

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不是那些声名显赫、家财万贯、生活无忧之人。在我们信仰的早期，敢于挺身而出、成为英雄和殉道者的是筛麦人（the Sifter of Wheat），而不是同一个城市中那些有学问的教士！”

他对另外一个民族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1957年6月27日，他致信（由他人代笔）新成立的新西兰总灵理会：“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当你们制定和实施计划时，他希望你们要切记向毛利人传道。毛利人是最初发现新西兰的人，他们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们的崇高品质一直以来令人钦佩；我们不仅要努力接触城市里的毛利人，让他们皈依巴哈伊信仰，还要深入村镇，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建立以毛利信徒为主体的灵理会（如果不能全部由毛利人组成的话）。这将是一项伟大的壮举。”

圣护曾对一位蒙古朝圣者说，世界上主要的人种并不是白人，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巴哈伊的主要群体必须是白人。相反，圣道应该反映出真实的世界。在守基·阿芬第看来，差异不应被消除，它们是合理的、必要的、奇妙的，正是因为形形色色的差异才让整个世界更加美好、更加完美。

一直以来，守基·阿芬第不仅教育巴哈伊要尊重不同民族的人，而且还告诉他们，作为培养高尚品格所必需的条件，尊重，尤其是崇敬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当今的西方世界严重缺乏对神圣事物的崇敬，人们错误地认为平等就是让每一片叶子都处在同一个高度。而圣护却格外尊重位高于己的人。他无比崇敬双显圣者和阿博都-巴哈，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作品、他的讲话或者他拜访祂们陵殿的方式，无不流露出他对祂们无上的崇敬，这永远值得所有的巴哈伊学习。每当守基·阿芬第走进祂们的陵殿时，我们都能充分感受到他的崇敬之情。他安静、庄严地走向陵殿，满怀着崇敬，屈膝下跪，将前额置于门槛之上，从不转身背对陵殿中安息的圣人。他语气平和，举止庄重。这一切都值得任何访问至圣所的人学习。他们应当脱去鞋子，因为他们踏上的是神圣的土地。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的灵魂，因为当他离去时，这是他唯一能够带走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道理（在当今的哲学

中，它却变得如此模糊并被人遗忘）赋予了高尚的人以神秘的力量，哪怕他化作灰烬，这力量也依然存在。这就像某些玫瑰花，香味异常浓烈，哪怕枯萎数年后，人们也依然能够闻到它们的芬芳。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如果神圣的灵魂在生前拥有崇高的灵性，那么死后，他们的骨灰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这种美妙的崇敬之情是圣护身上的一个深刻的特点，它犹如一阵和风，吹去了我们幼稚天性中的糟粕。圣护在年幼的时候，常常坐在自己的后脚跟上，双手交叉抱胸，面对着崇高的外祖父。这种崇敬之情从那时起就已经形成了。我记得，我的父母于1937年返回加拿大后，从家里给我寄来了一些书和书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我按照之前卧室的布局，小心翼翼地摆放着我的书，然后把阿博都-巴哈的照片放在书堆上，照片正好跟床尾平行。守基·阿芬第看到后大声叫道："你怎么能把教长的照片放在脚边！"的确，我当时非常吃惊，没想到守基·阿芬第的语气会这样严厉。我说这样放的话，早上起床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教长了。守基·阿芬第说这样不合适，我应该把教长放在头顶以示尊重，而不是脚边。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一间房子也有首尾之分，像巴哈欧拉圣约之中心的照片和至大圣名的画像这类神圣的物件，必须摆放在房间里最尊贵的位置上。还有一个事例。1933年，守基·阿芬第致信美国总灵理会（由秘书执笔代写）："关于巴哈欧拉给至大圣叶的书简，守基·阿芬第认为，直接在宣传册上印刷巴哈欧拉的亲笔书简实为不敬。这些书简必须经过装帧后方可赠送给各国总灵理会珍藏，存放在国家文献馆。"

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早在1923年，守基·阿芬第就曾致电美国总灵理会："圣道之尊严要求我们在使用和传播教长录音时务必谨慎。"这里指的是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期间的谈话录音。还有一次，守基·阿芬第告诉该灵理会："国家总会办公室无论举办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严格保证活动场所的庄严性，尤其在灵曦堂附近，所有信徒务必遵守巴哈伊教义规定的行为准则和社交规范。"

在这里，仪式性的东西并非利害攸关之事。巴哈伊信仰不讲究固定的仪式，在乎的只是信徒的态度。尽管圣护在圣坟的门槛前总

是习惯于拜服在地，但他不得不经常煞费苦心地向朝圣者解释，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这样做，而他自己这样做则是出于东方人的习俗（他的祖先来自东方）。崇敬和仪式是两个概念，仪式只是个人选择表达崇敬的一种方式，而崇敬是当一名虔诚的信徒走向这些神圣的处所时，心中怀有的那种合乎情境的精神。

教长曾宣称，祂的身份是上帝仆人之仆。圣护则紧跟教长的脚步。他习惯站在陵殿的门口，在每一位从他身边经过的信徒身上洒上玫瑰花露或玫瑰精油。他自己会最后一个进入陵殿。但是，他也关注到地位和身份是有分别的，所以在进入陵殿之后，他会以圣护身份带领信徒祈祷。在海法，只有地位最高的人才能跟随圣护进入陵殿，或者才有资格在去巴吉参加巴哈伊纪念活动的时候与圣护同坐一辆车。礼仪、尊重和崇敬都各有其位置，有些时候他对人谦恭有礼，但有些时候他也会要求应有的尊敬。

正是因为对巴哈伊信仰的中心人物怀有深深的崇敬，守基·阿芬第时刻注意保卫祂们免遭任何轻视和侮辱。1941年1月发生的一件事情便是一个例子。当时，市政当局将阿博都-巴哈住宅和西方朝圣者招待所对面的一条短街命名为“巴哈街”。守基·阿芬第对此十分恼怒，立刻派秘书找市长抗议此事，认为此举非但不恰当，而且是对巴哈伊信仰创始人的侮辱。后来市政当局将此街更名为“伊朗街”。我记得圣护当时非常严肃认真，他说，如果他们不把路牌摘掉，他就亲手把它毁掉，哪怕被抓去坐牢！我想到这一点都觉得后怕，因为我不想让他一个人被关进监狱，但又不知道怎样才能陪他一起入狱。

如果没有提到守基·阿芬第深厚的艺术修养，那么任何对他性格的描述都是不完整的。这并不是说守基·阿芬第原本可以成为一名画家（他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但他确实拥有画家和建筑家的慧眼。这双慧眼与那种对比例的完美感知力相得益彰。我想，这种感知能力是一种基本素质，离开了它，任何人都无法在艺术或科学领域中取得卓越的成就。而守基·阿芬第对比例的感觉可以精确到毫米，而非厘米。是他通过给我父亲的指示（主要是原则上的，而非细节上的）确定了巴孛陵殿的建筑风格。是他敲定了国际文物

馆的设计，他参与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使得设计师总说这是守基·阿芬第的设计，而不是他的设计。在没有任何帮助和建议的情况下，圣护以高超的水准设计了巴吉和海法的公园，每一次丈量都是他亲历亲为的。人们可能不知道，陵殿内部的装饰、巴哈欧拉宅邸、阿布德故居和马兹拉伊庄园，其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出自守基·阿芬第之手。他不断增添装饰物、照片、灯具和家具，把这些地方装点得十分美丽。此外，所有的物品都是在他的监督下精心摆放的。墙上的每一幅画都是由他挂上去的，位置几乎没有丝毫偏差。任何进入这些地方的人都不禁赞叹其华美。不仅如此，这些物品的价格也很低廉。他选购物品时不太在乎它们的风格和年代；他看重的主要是价格低廉，并且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跟它们的内在价值并无关联。只有当他去了陵殿和花园时，我才有机会整理他的房间。我记得，无论我和女仆多么费力地把桌上的物品归于原位，每次他回到卧室，只要扫一眼书桌，就能发现物品细微的移位，然后重新把它们摆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上。我敢肯定，常人的眼睛是无法发现这些细微的变化的。而圣护对于干净和整洁的要求自然也无需赘言。

守基·阿芬第非常喜欢华美的事物，喜欢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华美，更是因为它们美好的比例。这些年来，我知道他喜欢哪些建筑，喜欢什么样的建筑风格。他最喜欢的是希腊风格的建筑，特别是帕台农神殿，他觉得它的比例是如此匀称绝美。其次喜欢哥特式建筑，虽然它们跟希腊风格相差甚远，但他还是对其高耸的拱门和石质的花饰窗格赞不绝口。我们曾多次到英国参观哥特式教堂，而他的一个房间里就摆放了一张米兰教堂的巨幅照片。他认为西班牙格塞维利亚的阿兰布拉宫（Alhambra）也十分美丽，并在他自己的家中以及巴吉宅邸中放了一些这座宫殿的照片。还有一座建筑，其风格和规模跟之前的那些迥然不同，但守基·阿芬第也十分喜欢，那就是佛罗伦萨的赛诺利亚广场（Signoria）。这座宏伟的意大利建筑与他的其他喜好如此不同，而守基·阿芬第却能深深地喜爱它、欣赏它，这一点最能清楚地说明他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天生的艺术感知力。

在品味上，守基·阿芬第不受传统的束缚，总会以新颖、巧妙的方式实现他想要的效果。他做事情永远不会拘泥于各种条条框框。以国际文物馆为例，它是一座希腊风格的建筑，内部是一个巨型的大厅。为了获取更多的陈列空间，守基·阿芬第在大厅的两侧设计了两个狭长的阳台，阳台的护栏采用了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木质栏杆。他选用了大量的日本漆器和中国柚木木雕，排列在楼下大厅的墙边。六盏巨大的枝形水晶吊灯悬挂在天花板上，这是地地道道的欧洲设计风格。当我问圣护准备在两个阳台上摆放什么家具时，他说，他准备采用之前文物馆里的一些橱柜，而这些橱柜毫无风格可言，就是一些胶合板家具，在时下的家庭里十分常见。但是，在这些代表着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物品中，不乏大量的艺术作品，它们经过圣护别具匠心地组合后，竟在人们眼前呈现出一幅华美、高贵、绚烂和壮丽的景象。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体现圣护非凡的创造力。在阿卡的阿布德故居里，有一小块开阔的庭院，守基·阿芬第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两层楼高的小型花园。他没有向任何人寻求建议（当然也就没有人劝阻他放弃），仅仅靠一些多余的砖头、水泥，一副破旧的木质基架，一座金属孔雀雕像和一些植物，就建成了一座小巧别致的花园。路过此地的阿卡居民看到它时无不目瞪口呆（阿布德故居对外开放时他们可以进去参观）、赞不绝口。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同时也让巴哈伊社区声名远扬。

圣护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每当想到他的性格和成就时，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无数的事例。凡是虔诚待他的人，他必定虔诚待之，无一例外。巴孛陵殿的前方有一座花园，花园内有一座露台，露台上有一座水泥建造的房子，比大包厢的体积稍大些。房子里面住的是陵殿的看守员阿布·卡西姆（Abu'l Kasim），他为人忠诚、品行端正，深受守基·阿芬第的喜爱。在他去世前一天的晚上，守基·阿芬第告诉我，他连续两次做了同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巴孛陵殿附近翠绿的植物全都枯萎了，好像被火烧过一般。他迷惑不解，觉得这个梦肯定有什么寓意。几个小时后，当陵殿的看守员去世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时，他立刻全都明白了。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圣护在修建巴孛陵殿和扩建陵殿前面的露台的过程中，曾多次拆毁这座房子，但是每次又将它重建，位置稍微往西，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忠诚的灵魂。

第七章　情深似海

守基·阿芬第的一生中有许多忠诚善良的亲友，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当属至大圣叶。1932年，至大圣叶去世，守基·阿芬第在瑞士的因特拉肯小城得知了这一噩耗。虽然守基·阿芬第早已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在1929年的一封信中，他就说至大圣叶“已经到了垂暮之年，视力下降，体弱无力”）；虽然他早就预感到死亡离她已经很近（在1932年3月时，他就写信给美国信徒，催促他们加紧完成“我们挚爱的灵曦堂”的穹顶的建设，他说，“至大圣叶热切的——恐怕也是最后一次的——恳求让我的声音更加坚定。她的灵魂盘旋在天国的边缘，并渴望继续飞入阿卜哈天国……这一伟大事业的完成将点亮她在尘世生活的最后时光”）；虽然她已是八十六岁高龄。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减轻他所遭受的打击，也无法缓解他的悲伤。7月15日，守基·阿芬第致电美国灵理会，宣布至大圣叶的灵魂已经飞入天国，沉重悼念“我在尘世唯一的支撑、我生命的快乐和慰藉之源的突然离世”，并告知巴哈伊教友，“丧亲之痛如此沉重，巴哈伊世界所有形式的宗教庆典暂停九个月”，国内外将为“巴哈欧拉最后的遗产”举行纪念集会。

7月17日，守基·阿芬第给美国和加拿大的信徒们写了一封信，略微表达了自己悲痛的心情。他在信中赞美了阿博都-巴哈的妹妹至大圣叶那荣耀的一生、崇高的地位和光辉的事迹，他那充满爱意的语言令人难以忘怀。

> 亲爱的至大圣叶！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泪水模糊了双眼，但是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您那崇高的身影，依然能够认出您那仁慈安详的脸庞。虽然坟墓已将我们分隔开来，我却仍然能

够注视着您那充满爱意的蓝色眼睛，通过它们，我感受到了您内心深处缓缓流淌着的对圣道的无边的爱，对最为平凡卑微的信徒的感情，以及对我温暖的关爱。我今后的道路注定崎岖坎坷，您美丽的笑颜必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一路上鼓舞、激励着我。您的双手曾带给我抚慰，这种回忆将鞭策我坚定不移地沿着您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在最黑暗的逆境中，您甜美的声音将回响在我的耳边，提醒我迅速抓牢那根您在毕生时光里都紧紧握住的绳索。

烦请转告您那崇高神圣的兄长阿博都-巴哈：倘若巴哈欧拉为之操劳奋斗、为之痛苦哀伤、神圣的鲜血为之流淌成河的圣道，在今后遭遇比之前更加严重的苦难，恳求祂继续把祂无所不在的关爱和智慧撒向祂这些脆弱卑微的孩子。

自教长升天之日起，至大圣叶给予了守基·阿芬第不计其数的帮助。正如守基·阿芬第所说，在巴哈伊历史上这段动荡的时期里，至大圣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特别是在阿博都-巴哈去世后，她帮助守基·阿芬第建立了他自己的教务系统。守基·阿芬第在信中写道："在我生命中最关键、最烦乱的时刻，她一如既往地关爱着我，她的恩情我又怎能一语道尽？"对他来说，至大圣叶就是阿博都-巴哈无所不在的温柔和关爱的化身。至大圣叶的离世让守基·阿芬第的心灵遭到了重创。但是作为圣护，守基·阿芬第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已经完全成长为一个有能力担负崇高使命的男人，并且能够以刚毅的品格应付接连不断的打击。在至大圣叶生命的潮水退去的时候，这一切定能令她感到深深的满足和欣慰。

教长升天之后，守基·阿芬第就成了巴希叶·哈努姆生命中头等重要的人物，他是她生活的中心——她对他来说也是同样的，是这个世界上仅次于外祖父的、最为挚爱的亲人。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情。1923年，我随同母亲一起来到海法朝圣，当时人们在阿博都-巴哈的住宅里举行了一个大型集会，许多巴哈伊男性聚集在房子的大厅里，母亲和伊迪丝·桑德森（Edith Sanderson）坐在圣护的旁边，但是我必须跟其他妇女一起坐在另外一间跟大厅相通的房间里。我

们没有开灯，就处在黑暗里，这样门就可以开着（按照当时的习俗，东方的男人和女人必须严格分开）。我们隐约能够听到大厅里面的动静。突然，好像是一位东方的信徒控制不住感情，一下子拜倒在守基·阿芬第的脚下。我们在房间里看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到外面掀起了一阵骚动。此时，纤弱的至大圣叶猛地跳起身来，大叫一声，因为她生怕年轻的圣护遭遇不测。直到后来有人告诉她圣护没事，她才平静下来。她的悲痛是那么明显，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情景。

在至大圣叶去世之前，守基·阿芬第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他每天都会陪她在她自己卧室的小桌上共进一餐。他经常跟我说，每当至大圣叶看到他处于焦虑状态时，都建议他先别吃饭，因为那样对身体不好。他还跟我说，他坚持让至大圣叶从阿博都-巴哈那里继承了一小笔钱，但是她却拿出其中的绝大部分来建造巴孛陵殿前面的露台，以完成哥哥阿博都-巴哈的宝贵计划。

守基·阿芬第和他的姑姥至大圣叶之间的关系极其融洽。在电报和其他通信工具中，他指代两人的称谓常常不分彼此，尤其是在他管理宗教的早期。比如他经常写道：“向我们保证……”、“至大圣叶和我”、“我们”等等。在1931年的一封电报中，他甚至署名“巴希叶·守基”。没有什么比下面这件事更能体现守基·阿芬第对至大圣叶的浓烈的爱了。在我们结婚当天，圣护选择在至大圣叶的房间里举行简单的巴哈伊婚礼。房间里的每一处都经过了精心布置，就像是她的大喜之日一样。我们手拉手站在她的床边，用阿拉伯语宣誓：“诚然，我们都将忠于上帝的旨意。”

至大圣叶悉心照顾圣护长达三十五年，比一位母亲还要尽责；而守基·阿芬第对至大圣叶的爱也伴随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当他在瑞士得知至大圣叶去世的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为她建一座体面的纪念碑，并且立刻前往意大利订购。纪念碑由光亮的白色卡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结构精美匀称，它凝聚了守基·阿芬第对至大圣叶的无尽的爱。我们可以看出，守基·阿芬第从一些风格相似的建筑中获得了灵感，构思出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在他的督导之下，一位艺术家将他的设计理念融入到了纪念碑的建造之中。

按照他的计划，这座纪念碑最终矗立在了至大圣叶的安息之处。守基·阿芬第曾将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的阶段比作纪念碑：它的三级碑座就像是地方灵理会，碑身犹如总灵理会，碑顶则象征在地方灵理会和总灵理会之上统领二者的世界正义院；只有坚实地建造好碑座和碑身，碑顶才能屹立不倒。在至大圣叶的纪念碑美轮美奂地矗立起来之后，守基·阿芬第给许多灵理会以及一些私人朋友寄去了纪念碑的照片，他希望能够将这些照片作为一种饱含深情的纪念品赠送给他们。

至大圣叶的房间里有一把扶手椅，守基·阿芬第以前经常坐在上面，自从她去世之后，守基·阿芬第就把这椅子搬到了自己工作之余休息的地方，并一直用到他生命的尽头。守基·阿芬第的卧室里贴满了至大圣叶各个时期的照片，并且有不止一张她纪念碑的照片。至大圣叶逝世七个月后，守基·阿芬第给美国灵理会发了一封感人至深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赞扬了世界秩序的捍卫者和建立者的忠诚与牺牲精神，他还说："巴哈伊信仰的创始者对他们智慧的教务管理深感满意，阿博都-巴哈为他们的英勇感到自豪，至大圣叶为他们的忠实深感喜悦。"他写道："在这个动荡破碎的世界，对至大圣叶的回忆让我的志节愈加崇高……"守基·阿芬第用阿博都-巴哈给至大圣叶的精装书简以及她的一些遗物来装饰文物馆。在那些书简里，他还放进了至大圣叶和她纪念碑的照片。在他告诉我他决定娶我为妻的那一天，他把一枚刻有至大圣名标志的、朴实的金戒指戴在了我的手上。这枚戒指是至大圣叶多年以前送给他的，作为他的巴哈伊戒指。他告诉我这枚戒指暂时还不能让别人看到，于是我就把它串在一条链子上，戴在了脖子上面，直到结婚那天才将它取了下来。

在生命中的每个行动里，守基·阿芬第都会将至大圣叶与他对信仰的服务联系在一起。至大圣叶曾经多次提到，希望死后能够跟母亲和哥哥葬在一起，于是守基·阿芬第下令将此二人的遗骨迁葬到卡尔迈勒山上。他在电报中写道："……至大圣叶夙愿终偿。"在那个纪念性的时刻，守基·阿芬第说，他很高兴能够为巴希叶·哈努姆基金（该基金致力于完成美国灵曦堂的最终建设）

捐献一千英镑。他写道，此次迁葬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他说：“至大圣叶同母亲和哥哥葬在一起，会无限地增强那块神圣之地的灵性潜质”，“而这块神圣之地必将成为震惊世界、心怀世界、引导世界的巴哈伊教务管理机构的中心，这是巴哈欧拉所钦定的……”

当阿博都-巴哈作为宗教领袖的重担落到了守基·阿芬第的肩上时，他的身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灵性变化的本质是我们无法理解和定义的，因为圣护的身份和地位是我们遥不可及的。他曾多次告诉我：“从我聆听教长遗嘱之时起，我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了。”守基·阿芬第以前是一个颇有风度、气质高贵的年轻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举手投足之间越来越显现出了一种王者风范。这种改变不是装腔作势，也不是简单地模仿外祖父，而是上天赐予的。除了家族中一些关系亲密的成员以及早期的助手和秘书之外，守基·阿芬第实际上很少有私人交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的重担逐年增加，私人交情也就进一步减少了。当国际巴哈伊理事会成员来到海法时，守基·阿芬第很少有机会跟某个西方的理事会成员单独会面，只有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才会跟他们道别，或者在圣辅们要代表他出席会议时，他会给他们一些指示。在这些理事会成员中，守基·阿芬第最喜欢的当属米莉·科林斯（Milly Collins），她对圣护不同寻常的爱和忠诚使她深得圣护的喜爱。我父亲去世后，圣护到加拿大去参观他的住所。在此期间，圣护曾邀请米莉来海法。由于西方朝圣者招待所的房子比较潮湿，她的关节炎又很严重，圣护便把她安排在了教长家的一间房子里（之前我父亲曾在这里住过）。除了卢图福拉·哈基姆之外，国际巴哈伊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住在朝圣者招待所里。圣护在招待所的餐桌上与他们一起开展工作，或者通过联络员把他的消息传到那里去。

但是，这并不是说守基·阿芬第极少与理事会成员们亲近，米莉跟他的关系便尤为密切。每当我们离开海法，出门在外的时候，她是除了他的邮件管理员（当然还有我父亲）之外，唯一一个知道圣护地址的人，因此她可以经常联络圣护。米莉在教长升天后不久就认识了圣护。她格外地体贴、关爱圣护。为了省去圣护回信的时

间，她从来不直接给圣护写信，而总是将信寄给我。她心里非常清楚，有些信徒为自己积攒了五六十封，甚至更多封圣护的亲笔信，这些行为虽属无心之举，但却给圣护额外增加了许多负担！她下决心绝不给圣护添麻烦，并且尽一切可能减轻圣护的劳累，用一切方式愉悦圣护的心灵。米莉特别在意不去打扰圣护。虽然她就住在圣护的家里，但是每当圣护出来进去走动时，她都会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因为在她看来，圣护的工作已经够繁重了，再跟她打招呼就会耽误圣护宝贵的休息时间。由于年事已高，疾病缠身，米莉有时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于是圣护就会到她的房间里看望她，并且经常带上一份小礼物。我记得有一次米莉病了，圣护在傍晚的时候去看望她。他把自己脖子上的那条柔软温暖的羊绒围巾取了下来（这条围巾是一位巴哈伊送给他的），亲手帮她系上。从那以后，这围巾便成为了米莉最珍爱的物品，而圣护留在围巾上的体温是她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类似这样的亲密关系在圣护的一生中是非常罕见的。不过，我的父亲则是其中一位。我常常想，仁慈的上帝赐予了我一生太多的恩惠，其中最大的恩惠当属守基·阿芬第和我父亲之间的伟大友情。这份友情可以追溯到我与圣护结婚的时候。在父亲去世十年之前，母亲一直都是一位著名的巴哈伊。1898年到1899年的冬天，母亲是第一批去阿卡拜见阿博都-巴哈的西方朝圣者之一；她是欧洲土地上的第一位巴哈伊，同时也是法国和加拿大巴哈伊社团的创立者；她是教长最早和最优秀的追随者之一，并且深得教长的喜爱。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当守基·阿芬第到西方朝圣者招待所用餐时，他对母亲说，如果我不是梅·马克斯韦尔（May Maxwell）的女儿，他就不会跟我结婚。虽然这并不是他娶我的唯一理由，但是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1940年3月3日，在我母亲去世两天之后，守基·阿芬第公开发表电报，宣布她去世的消息。他说：“她出色的服务促成了一桩神圣的婚姻，而现在她的殉道又为这婚姻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她理应得到双重的桂冠。”这些话很明显地说明了母亲与他的婚姻之间的关系。阿博都-巴哈曾给她的一个富有灵性的孩子写过一封书简，其中写道：“与

她相伴，可使灵魂得到升华和进步。”我有幸与守基·阿芬第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其间的耳濡目染，令他对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在此之前，我的品格、我对巴哈欧拉的信仰，以及我对圣道的所有服务，可以说完全是受到了我母亲的影响。从以上事实中我们不难想见，1937年1月，当我第三次随母亲来海法朝圣时，我父亲在信仰中的身份只能称得上是“马克斯韦尔女士的丈夫”。

在我们一家人当中，母亲是最先认识守基·阿芬第的。上世纪末，母亲来到圣地朝圣，见到了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的守基·阿芬第。1909年，母亲再次和父亲来到海法，但是我不知道此次朝圣过程中，他们是否与守基·阿芬第有过来往。阿博都-巴哈升天后，母亲从电话里得知了这个噩耗，悲痛一下子摧毁了她的身体。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们不知道她是要活着，还是想死去，又或者是失去了理智。父亲认为，要想驱散母亲心头的愁云（她觉得自己太过卑微，因此永远都无法在下一个世界里见到挚爱的教长），唯一的希望就是再次去海法朝圣，并拜见阿博都-巴哈年轻的继承者。1923年4月，我们一家人来到了海法，那时母亲已经病得很重，不能下地走路，只能在轮椅上活动，但是见到守基·阿芬第却使她重获新生。从那以后，母亲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圣护的身上。我们在海法待了很长时间（中途，当守基·阿芬第去往欧洲时，我们离开海法去了一趟埃及），回到美国之后，母亲又开始积极热忱地为圣道服务了。三年后，我自己跟随母亲的两位巴哈伊朋友再次来到海法朝圣。当我们于1937年抵达海法时，他们二人已经不再是陌生人，而变成了两位满怀爱意的信徒。

守基·阿芬第的婚礼相当简朴，就像阿博都-巴哈在监狱之城阿卡结婚时一样，这个榜样值得各地的巴哈伊思考和学习。除了我们双方的父母、他的一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他们都住在海法）之外，没人知道我们结婚的事情。他对此严格保密，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圣道的每次重大活动都会带来巨大的麻烦。1937年3月24日下午，我坐在守基·阿芬第的旁边，由司机开车带我们去巴哈欧拉的陵殿。在生命中这个重要的时刻，他心中向往的还是这块最神圣的土地。当佣人们和当地的巴哈伊看到这一幕时，之前毫不知情的他

们不禁大吃一惊。在那个特殊的场合，我除了一件白色蕾丝衬衫之外，全身一袭黑衣，这是那个时代东方妇女们出行时的典型装束。虽然我来自西方，但是守基·阿芬第希望我融入当地的风俗习惯（其东方特征尤为明显），保持自然和低调。我感到无比幸福，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愿去做。当我们到达巴吉，进入陵殿后，守基·阿芬第让我拿出戒指，于是我取下了戴在脖子上的戒指。接着，他把戒指戴在了我右手的无名指上，而这枚戒指以前就戴在他的无名指上。这是他做出的唯一表示。随后，他来到了巴哈欧拉长眠的陵殿内室，用手帕把所有的干花瓣和花朵（陵殿看护人常常会在陵殿门槛处采集花朵，并把它们放在巴哈欧拉脚下的一个银质容器中）都包了起来。等他吟诵完《拜谒书简》（*Tablet of Visitation*）之后，我们便回到了海法，在至大圣叶的房间里举行了婚礼，上文对此已有所叙述。除了此次巴吉之行，他告诉我决定娶我为妻的那一天，以及在西方朝圣者招待所进餐时的一两次短暂相会之外，我从来没有跟圣护单独待在一起。我们的婚礼没有庆祝活动，没有鲜花，没有精心筹备的仪式，没有结婚礼服，没有宾客。他的父母按照巴哈欧拉的律法，在我们的结婚证书上签署同意。之后我就回到了街对面的西方朝圣者招待所，跟我的父母亲见面（此前的活动他们均未出席），而守基·阿芬第则回去忙自己的工作了。像往常一样，守基·阿芬第在晚餐时间出现，向我的父母表达了他的爱和祝贺。他拿出了那块装满了珍贵花朵的手帕，带着他独特的笑容把这些花朵送给了我母亲，他说，这是他特意从巴哈欧拉陵殿的内室给她带来的。我的父母也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吃过晚饭后，我就跟守基·阿芬第回家了。趁我们吃饭时，藤田已经把我的行李搬到了街对面的房子里。我们跟他的家人一起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到了他在楼上的两个房间里。这两间房是至大圣叶在很早以前为守基·阿芬第修建的。

这场婚礼没有兴师动众，简简单单，低调却不失尊贵。虽然没有大张旗鼓，但这并不意味着圣护把这桩婚事看得无关紧要——事实恰恰相反。下面这封发给美国灵理会的电报由圣护本人起草，他的母亲署名，其内容为：“向各灵理会宣告圣护新婚之喜。无上的

图二十九　圣护成为了一名登山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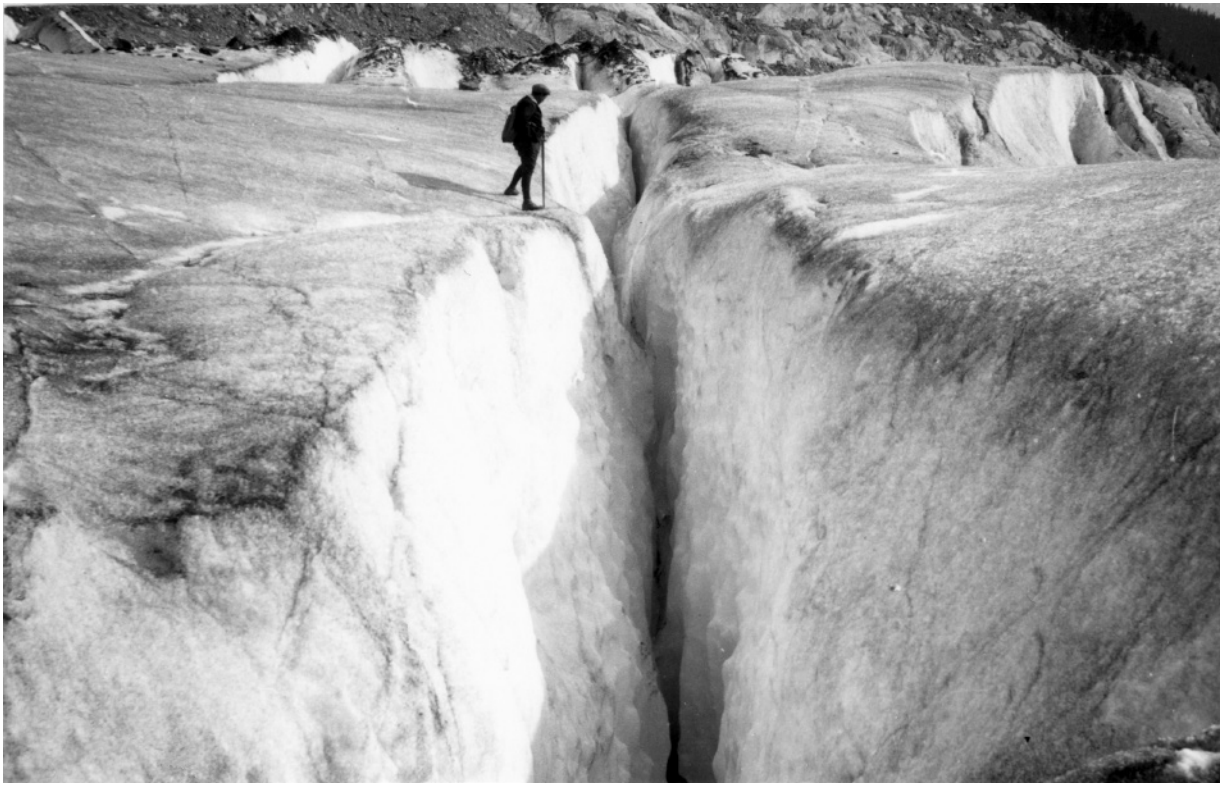
守基·阿芬第（戴着护目镜）与一队登山者一起，在向导带领下攀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图三十　坚强不屈的登山迷

在一次攀登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过程中，守基·阿芬第跨坐在一条冰封的山脊上。

图三十一　守基·阿芬第和他的向导

年轻快乐的圣护与向导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顶上，他带着自己的相机，这张照片无疑是由另外一个登山队员拍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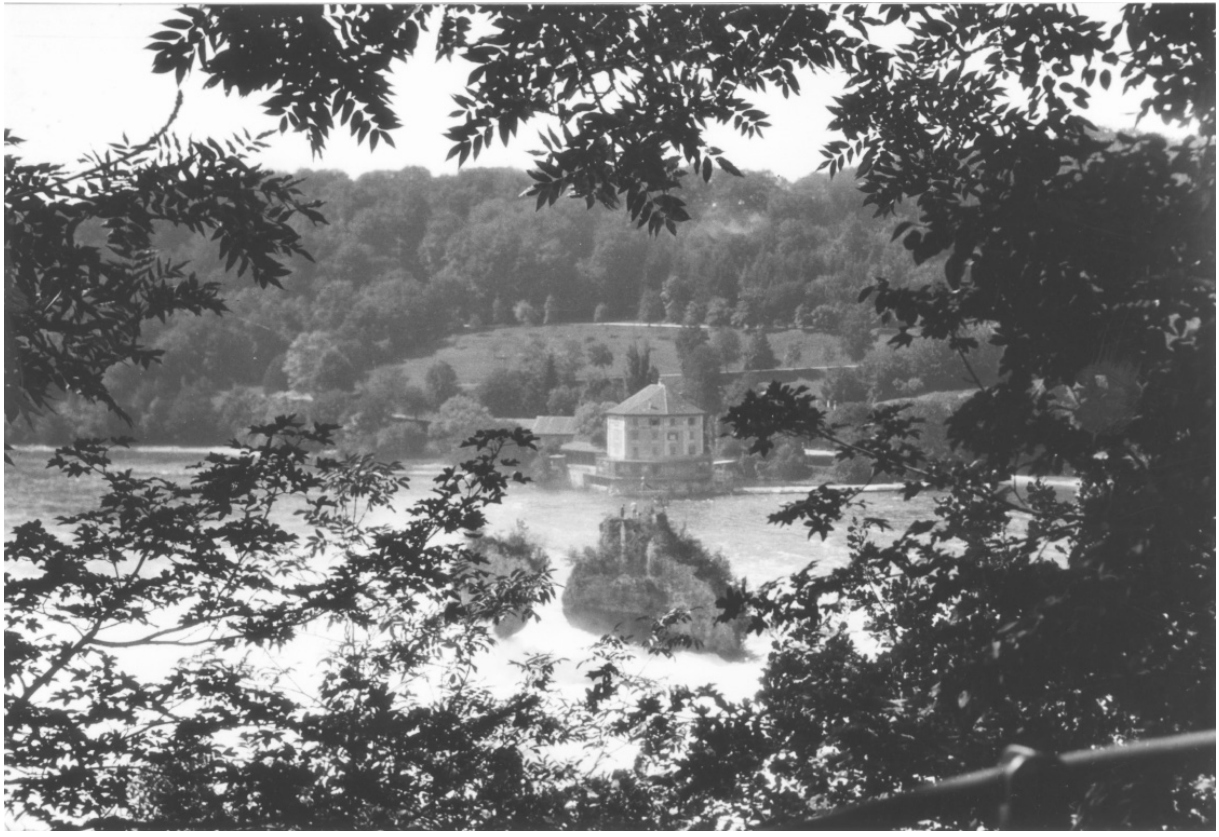


图三十二　山地灾害

守基·阿芬第在考察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冰川裂缝。

图三十三　于世界之巅

自行车——穷人的车子——成了他的最爱。有时，他会登上瑞士最高的山隘，上山时推着车，下山时骑着。



图三十四　莱茵河瀑布

守基·阿芬第格外喜爱瀑布和艺术摄影，这是他拍摄的位于瑞士沙夫豪森的莱茵河瀑布。

图三十五　年轻的圣护在瑞士

在日内瓦湖畔，守基·阿芬第陶醉在长满野生水仙花的春季的田野风光里。

图三十六　瑞士的因特拉肯

圣护常常会连续十个小时行走在山脉之间，疲惫的他正在欣赏自己深爱的阿尔卑斯景致。

荣光赐予巴哈欧拉的女仆鲁希叶·哈努姆——玛丽·马克斯韦尔女士。东西方的联系更加稳固。圣护之母齐亚伊叶（Ziaiyyih）。”波斯也收到了一封类似的电报。这则期盼已久的消息令所有的巴哈伊欣喜万分，世界各地的祝福纷纷涌来。守基·阿芬第给美国和加拿大总灵理会回复道：“收到贺词甚为感动。圣护制度是巴哈欧拉圣道的教务管理体制之基石，因与巴哈伊信仰双创始圣人的有机联系而荣耀。现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信徒的直接联系巩固了圣护制度。开创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是你们灵性的命运。在此祝贺美国信徒与圣护之间建立的紧密联系。”还有许多类似的回复，基本上都是在表达守基·阿芬第真诚的感激之情。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回复的语气会因对方的品格和真诚程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有一个不被圣护喜欢也不得圣护信任的人发来了一封贺电（其口吻无可指责），圣护并没有表达感激，只是简单地回复道：“为你祈祷”，意思相当于“我不需要你的祝福，但是你肯定需要我的祈祷”！当时，最让圣护感动的一封电报来自阿什哈巴德的巴哈伊。守基·阿芬第通过他人转发了电报，其中写道：“感谢阿什哈巴德巴哈伊发来的珍贵电文，继续为你们祈祷福佑。”约翰和路易丝·博施（Louise Bosch）也发来贺电，其中说道：“荣耀婚姻，普天同庆。”圣护的回复约略反应出了这封充满爱意的电报给他带来的触动：“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致以最深的爱意。”在给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回电中，守基·阿芬第同样也流露出了深深的温暖情意：“向亲爱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同胞致以诚挚的谢意。”

守基·阿芬第强调，此次婚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加强了东西方的联系。美国灵理会发来电报询问守基·阿芬第道：“请指示婚姻宣布事宜。”他回复道：“准许公开宣布。强调东西方纽带增强以及波斯美国命运相连。暗示赐予英国人民的无限荣耀。”这里的英国人民暗指我父亲，他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

这一切对美国巴哈伊社团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告知守基·阿芬第，美国的七十一个灵理会分别向圣护赠送十九美元作为结婚礼物，以庆祝“美国巴哈伊和圣护制度之间迅速增强的新纽带”。确实，这是送给圣道的最独特、最真挚的结婚礼物！

婚礼过后，守基·阿芬第的工作又恢复如初。两个多月以来，我的父母基本上都住在巴勒斯坦的西方朝圣者招待所里。虽然圣护几乎每天晚上都与他们共进晚餐，但是促膝交谈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最终，他们离开海法的日子到了。临走前那天，母亲问我："玛丽，你觉得圣护会送我吻别礼吗？"（虽然大家都用圣护给我起的波斯名字鲁希叶·哈努姆来称呼我，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的家人还是习惯叫我玛丽。）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把母亲的话转述给了守基·阿芬第，但是我丝毫没有请求他的意思！我的父母准备当天下午走，吃过午饭后，圣护单独到我母亲位于朝圣者招待所的房间里去看望她。圣护走后，我进入母亲的房间，看到她的双眼就像星星一般闪耀着光芒。她对我说："他吻我了。"年复一年，母亲一直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为圣道服务，以报答教长赐予她的无限恩泽，尤其是她的女儿和圣护的联姻之喜。终于在1940年，她下定决心前往南美洲，到阿根廷去传播圣道，因为那里的巴哈伊社团才刚刚起步。也正是从那时起，父亲和圣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早在海法的时候，父亲就得到了圣护的爱戴，其优秀的品格也深深吸引了圣护，但在当时，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结下亲密的关系。现在，我的母亲已是七十岁高龄，身体虚弱的她却要远赴万里之外。圣护心里清楚地知道，对我父亲来说，这意味着什么。1940年1月22日，圣护致电父亲："对高贵的牺牲深表感激。致深爱。"同一天，他给当时正在船上的母亲发了电报，说自己为她的"高尚决心"感到骄傲。圣护、父亲和我都同意母亲踏上这次漫长的征途，但在这般年纪、心脏又有疾病的情况下，母亲这一走真是生死未卜。

之所以讲述这些私事，是因为在这些事情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我们总能看到圣护崇高的精神、温柔的内心、为圣道的无私服务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公正客观的作风。母亲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很快就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在此期间，我总共收到了三封电报：一封来自母亲，她在电报中请求圣护为她祈祷；一封来自父亲，他告知我母亲已经病危，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最后一封来自一直陪伴着母亲的表姐珍妮·博尔斯（Jeanne Bolles），她在电报中

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三封电报我没有看，而是亲手转交给了圣护。圣护读着这些电报，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关切和焦虑。他不得不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我想，当身陷这种打击和悲伤时，恐怕没有人能够像我一样，得到圣护如此真挚的关怀。他赞扬了母亲无私奉献的精神，描述了她在下一个世界中的幸福生活，正如他在电报中把母亲的死讯告知伊拉克总灵理会时所说的："天国的灵魂向天堂中央的她祈求福佑。"他说，母亲穿行在荣耀天国，总会不厌其烦地谈论起她深爱的女儿！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幸福，很多时候，想着圣护为母亲描绘的幸福生活，我会禁不住跟着他一起笑起来。

母亲的离世加深了圣护和父亲萨瑟兰·马克斯韦尔之间的情谊，也让父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达到了为圣道服务的顶峰。3月2日，守基·阿芬第在给父亲的电报中说道："她是巴哈欧拉圣道中崇高和英勇的典范，我在悲痛之余，亦为其感到欣慰。鲁希叶清楚地知道母亲的生命已无可挽回，但永恒之桂冠当属荣耀的母亲。建议将她葬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墓碑由你设计，由我建造。她光荣战斗和倒下的地方将成为历史上巴哈伊拓荒者的中心。欢迎来海法安排相关事宜。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正是这封电报将父亲带到了海法。父亲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并因此被委以重任。父亲在教长工作的基础上，继续修建巴孛陵殿的上半部分建筑，并最终完成了阿博都-巴哈的建造计划。在战争时期，与部分家族成员关系的急剧恶化让守基·阿芬第饱受痛苦。而此时，他和父亲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为守基·阿芬第带来了安慰。跟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既保持亲密又不失尊敬，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父亲却做得游刃有余。有时候，父亲拿着新的设计草图给守基·阿芬第看，圣护就垫着枕头坐在床上，然后邀请父亲坐在他的身边，以便更好地研究草图的细节。当我看到两位至爱的亲人坐在一起，头靠得如此之近，鬓角处的头发一个全白，一个日渐花白，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我该是多么幸福！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这种安静祥和的天伦之乐转瞬即逝，但它却给我们苦涩的生活带来了一丝甘甜。

1949年到1950年的冬天，父亲病危，医生对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束手无策。当时的他似乎已经失去知觉，甚至连我——他深深宠爱的、唯一的孩子——都完全不认识了，他就像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一样无法控制自己。如果说我还需要什么来确信灵魂的存在的话，那么下面这件事情便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虽然父亲当时不能说话，也不能清楚地用动作示意，但是每当守基·阿芬第走近他的时候，他总会眨一下眼睛，或者抖动一下，或者做出其他一些轻微的动作，这些动作短暂、迅速，却可以察觉得到。很显然，父亲的护士（海法最好的护士）也发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并对此迷惑不解。当父亲的头脑逐渐萎缩的时候，他对很久之前的事情的记忆远比对刚刚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忆来得清楚，这显然违背了常理。守基·阿芬第决意挽救父亲的生命。当时，包括我在内，没有人对此事抱有任何希望。但在圣护的坚持下，我们带着父亲和他的护士来到了瑞士。在医生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很快就康复了，并且康复得非常彻底。几个星期后，我和新来的瑞士护士带父亲开车出去兜风，路上，他看见坐落在花园中心的一家咖啡馆，便邀请我们进去喝茶，我当然满怀惊喜和感激地接受了他的美意。父亲康复之后，守基·阿芬第格外感动。1950年7月，他给美国发去了一封电报，告知建造巴孛陵殿的进展情况。他在电报中同时提到："才华横溢的建筑师萨瑟兰·马克斯韦尔身患绝症，奇迹康复，让我深怀感动。"

在父亲同病魔抗争的年月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胆囊炎不断复发，并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然而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守基·阿芬第对这位病弱的老人却表现出了非凡的爱心和耐心。从性情上来讲，守基·阿芬第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无休无止的工作总是令他烦躁，但是，这件事情却体现出了守基·阿芬第性格中的另一面。父亲对守基·阿芬第的敬仰之情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这种敬仰不仅仅是建立在一个巴哈伊对圣道的坚定的信仰以及对圣护的尊敬和服从的基础之上，更是出于父亲对守基·阿芬第本人的爱，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我记得在1942年，当父亲唯一在世的姐姐去世后，守基·阿芬第告诉父亲，他现在不应该再把蒙特利尔看作

第一故乡，把这里看作第二故乡了，而是应该反过来，把这里当成第一故乡。圣护还说，父亲越来越多地为他提供帮助，而他也会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守基·阿芬第对待父亲的非巴哈伊亲戚（父亲只有一位姐姐曾经是一名巴哈伊，但她在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的态度特别能够体现他的天性。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些亲戚写信向我和“守基”表达最深的祝福。我当时有点尴尬，不知该如何向上帝在世上的表征传递他们的祝福，但我最终还是决定把姑姑的信念给他听。圣护仔细地听完，过了一会儿，他温柔地说：“也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多年来，守基·阿芬第一直跟他们保持着通信往来。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如此和善、崇高和自然！

守基·阿芬第对待父亲的态度十分友善，其中一个表现是，他经常会热心地将一些玫瑰香水涂在父亲的身上。在东方，不存在男性禁用香水这一荒唐的禁忌，而且圣护也格外喜欢这种迷人的香味。但是在我那苏格兰裔父亲的成长环境里，男性使用香水则是被诅咒的，他甚至连带香味的乳液都从来不用。因此，父亲一方面对他身上强烈的香水味道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又沉浸在得到圣护关爱的喜悦之中，两种复杂的心理交织在一起，使得他的脸庞上呈现出一幅非同寻常的表情，这样的表情绝对值得一看！

1951年，圣护再次决定带父亲和我们一起去瑞士。但是当我们准备返回海法圣地时，我们被告知，海法的饮食状况十分恶劣，很难保证为父亲提供新鲜的食物；而新鲜的食物又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父亲的病很容易复发。当时父亲也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看望阔别了十一年的亲人。于是，守基·阿芬第决定送父亲回加拿大，并且派那位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悉心照料他的瑞士护士（她当时也和我们在一起）与他同行。正是在他的家乡，他出生的城市，父亲得知了他被圣护晋升为圣辅一事，但此时的父亲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暮年。

守基·阿芬第的一生打击不断，他的心中已无空间再去承受有关父亲的任何苦难；而父亲却一直重病缠身，不断治愈又不断复发，最终还是因病逝世。1952年3月，从加拿大传来了父亲病危的消息，这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对我们来说又是一次可怕的打击。如果

我希望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的话，必须火速赶往蒙特利尔。就在我急急忙忙准备出发之前，我在心中祈祷，如果父亲真要去世的话，最好在我出发之前就离去吧，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把守基·阿芬第一个人丢下，让他独自去面对所有的工作了，而且此时，即便我赶到父亲那里，他可能也不知道我就在他身边陪着他。我的祈祷果然应验了，我很快就得知了父亲从尘世中解脱的消息。看到守基·阿芬第悲痛不已，我甚至都忘记了死者是我自己的父亲。我之所以记录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是守基·阿芬第生活中的一部分，折射出了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不幸，而这些磨难和不幸正不断打击着他那本已脆弱的身心。

1953年，在我和科林斯女士参加完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大会之后，经守基·阿芬第同意，我们前往蒙特利尔拜访父亲的墓地，同时按照守基·阿芬第和母亲的愿望，将我们的房子——阿博都·巴哈在北美游历期间在加拿大访问过的唯一一所房子——捐献给加拿大灵理会。守基·阿芬第没有忘记他爱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忠贞不渝。在给蒙特利尔地方灵理会发过电报后，守基·阿芬第于1953年5月9日给我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已通知蒙特利尔地方灵理会在萨瑟兰墓地举行悼念活动。建议献上从巴孛陵殿带去的花，并代我购买一百美元的最好的鲜花，以蓝色为主。附上碑铭：深切怀念圣辅及巴孛陵殿上层结构的出色建筑师萨瑟兰·马克斯韦尔，守基。保留悼念活动的照片。电告悼念活动的日期。”最让我感动的是，守基·阿芬第在海法时送给了我一小瓶玫瑰精油，嘱咐我洒在父亲的坟上，他还从巴孛陵殿的门槛处摘了一些花，让我放在父亲的墓地上。守基·阿芬第还特意吩咐我代他买一些蓝色的鲜花送给父亲，因为父亲生前总是穿着蓝色的衣服。当我回到海法的时候，我给守基·阿芬第带去了很多照片，他对着它们仔细端详了许久，并且在看完后亲自将它们收藏了起来。

第八章　耳闻目睹

除了身边的亲人之外，其他所有人对守基·阿芬第的生活都知之甚少。为了让读者有些许的了解，我决定从自己的日记中摘抄一些段落。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常年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像大多数的日记一样，只是对一些事件的粗略记录，因为在当时，要想详细描述这些事件的话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而多年之后，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我也没有再对它们进行补充。日记中出现的人物也只是恰好在那时候出现在守基·阿芬第日常生活的场景中的，并非刻意引用。当年写下这些日记的时候，我对其中的事件有着深刻的感情和敏锐的观察；而时隔多年，当我再回过头去看那些文字时，我脑海中的印象却淡化了不少。为了重温当年那种紧迫和沉痛的感觉，我才斗胆将这些引文出版。我无意详述或解释守基·阿芬第的生活，只是在他每日辛劳和悲伤之洋上揭开一角面纱，使之呈现于读者面前。

“守基·阿芬第非常客观，我有时觉得他身上的这种品质是上帝赐予他的恩惠。他是一个绝对没有自我意识的工具。他拥有强大的动力，没有人（我是指公正客观的人）会怀疑他为圣道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这些贡献都是在毫不迟疑的动力的驱使下完成的。他所有的决定都是这样做出的——但是在行动之前，他肯定会在头脑中反复思考，少则几周，多则几年。他的头脑里装着千万种想法，一旦感受到某种强烈的愿望，他就会立即行动起来！”（1939年）

“教长给了我们一个信托，这个信托就是圣护。祂说‘失望之尘永远不会玷污他光辉的天性’。失望之尘！许多人原本应当拥护和鼓励圣护，但圣护却饱受了他们的伤害与折磨，这使得圣护光辉的天性在当下难得一现。有的时候，他光辉的本性就犹如明亮的太

阳在他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很多时候因为心力憔悴，只好卧床休息！”（1939年）

“为了将这个社团送出海法，他不断经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1939年）

“今天六点起床，然后去办理签证（这样我们才能离开瑞士）。我们已经连续奔走了十八个小时，这种忙碌的状态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无暇顾及任何事情……”（1939年8月8日）

“回到中东……又是一段极度疲倦的旅程，大部分时间都无法安睡。有一天晚上，我们只睡了一个半小时！完全感觉不出战争已经降临。穿过黑漆漆的城镇，看着运兵列车迎面驶来，等待广播电台的新闻……守基·阿芬第像以前一样工作——战火似乎就在我们周围，但我们安然无恙。”（1939年9月6日）

“他说自己像一根被折断了的芦苇。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当然归结于他已经连续发了十天的高烧，中间有几次都烧到了华氏104度（相当于40摄氏度——译注）！Z某和我日日夜夜地照顾着他，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独自一人面对病重的圣护和一位陌生的医生让我感到极度紧张，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每天最多只能睡四个小时！”（1939年10月5日）

“圣护和圣道是坚不可摧的。我一直想对巴哈伊说：‘跟随他吧，无论天堂还是地狱，光明还是黑暗，生存还是死亡，盲目还是领悟，忠于他吧，他是你们唯一的救赎。’今天晚上，一个男人来到这里。他在走进房间的时候还是一个巴哈伊，离开的时候却变成了一个圣约破坏者（他断然拒绝服从圣护）。他在门口站了很长时间，当时，我真想对他大声呼喊，‘你怎能如此轻易地将自己的灵魂丢在身后？’这么多年里，信仰滋养着他的灵魂，而他却如此随意地把它抛弃！没有了灵魂，生命又有何意义？他把上帝最珍贵的赐予扔在路边，只因为当时的他不愿意服从……真希望朋友们能知道当地的一些巴哈伊给教长和圣护带来的苦难！这些人里，有一些是善良的，但另一些却是邪恶的。一旦某人在圣约中犯了错误，

他们就直接攻击显圣者、完美典范或者圣护。我见过这类事情，它就像一剂毒药，虽然守基·阿芬第可以从中恢复，但却受到了数不清的伤害。也正因如此，教长在遗嘱中称自己为‘断了翅膀的鸟儿’。这些伤害是全身心的，而绝不是感情受伤而已。”（1940年1月22日）

“唯有行动方可成就英雄。行动是试金石。行动不是来去无常的动作，而是内在品格的证明。杰克（玛丽昂·杰克，Marion Jack）正是因为她的行为才成为英雄的，英雄的精神在她身上显现出来。玛莎（玛莎·鲁特）也付出了英雄般的行动，她坚持不懈地奋斗，直至倒下的那天。”（守基·阿芬第注释）

“对于巴哈伊而言，生活的目标就是促进人类一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文明，而这个文明反过来也会影响每个个体的品格。”

“我知道这是一条苦难之路，但我必须在这条路上跋涉，直至尽头。唯有历经苦难，才能成就事业。”

“他说，这可能不是初级和平之前的最后一场战争，也许会出现一个僵持或者停战的阶段，但是在那之后，战争又会重新爆发或者继续，并且比之前的更为残酷。当然，他不会武断地下结论，他只是说，‘可能，很有可能。’”（1942年1月2日）

“他们（家族成员）已经偏离了家族的主旋律——圣护。因此，当最主要的东西缺失时，他们也就不可能符合巴哈伊的标准了。”（1942年1月5日）

“所有这一切都给圣护带来了痛苦。我真的很担心他的心脏。昨天晚上，他的心脏跳得太快了，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他心烦意乱，连续几个小时呼吸沉重而急促……守基·阿芬第的身上似乎有种类似于气压计的东西，它可以测量人的灵性压力。有时候，在尚未知晓某件事情时，他就已经为它感到心烦意乱了，对此，任何外部的东西都很难做出解释。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次。他对事情的反应是本能而迅速的。很多时候，等到原因真相大白之后，人们便会约略看出整件事情的运行方式。但是这种能力最终将终结他的生命，而终结的方式和时间则要根据上帝的智慧。他将永远是胜利

者——他一直以来都是。但是渐渐地，问题接踵而至，斗争无休无止，家族成员不断背叛他，所有这些都在消磨着他的生命。他的压力太大了，他的身心已经憔悴，他的精神已经崩溃……”（1942年1月7日）

“为了彻底压垮圣护的精神，他们（教长的家族成员）无所不为。从天性上讲，圣护是一个快乐、活跃的人，他的性格中有一种独特、非凡的聪颖，每当他高兴的时候或者热衷于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总能闪现出智慧的火花。但是，教长家族中的成员对他无休止的攻击，以及他在担任圣护的过程中不断遭受的打击（来自于圣道中的各种危机）……所有这些都如同乌云一般笼罩在圣护的头顶。过去五年里，我亲眼目睹了，每当圣护高兴的时候，总会有人出现，把焦虑和痛苦砸在他身上。每次都是这样！这简直就是犯罪！我多次听圣护说道：‘如果我是快乐的，如果他们能让我快乐，你就会看到我能为圣道做出多大的贡献！’他就像一缕清泉，每当泉眼开始汩汩冒水的时候，总会有人过来把它再次堵上！虽然摆脱不了这些苦难和困扰，虽然无法自由、快乐、平静地为圣道服务，但是守基·阿芬第依然为圣道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我们禁不住会想，要是他能够快乐的话，他将会做出多大的贡献啊！守基·阿芬第不断地遭受伤害，‘伤害’这个词贯穿了他的一生。现在，他已经到了只能背水一战的地步。他说，他会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回合……”（1942年3月16日）

有一次，守基·阿芬第正在伏案写作《神临记》（*God Passes By*），就在这时，两架执行演练任务的战斗机由于机翼相撞，飞机失去控制而坠毁。其中一架飞机紧贴着我们的房顶呼啸而过，我当时以为它就要撞向守基·阿芬第房间的天花板了，不过所幸最后它降落在了距离我们的房子不足一百码远的街尾处后爆炸了。（1942年3月20日）

“守基·阿芬第一直向我倾诉他的痛苦。他说，阿博都-巴哈饱受身边人的折磨，就像巴哈欧拉饱受身边人的折磨一样。他甚至说，‘我也会被他们折磨死的。’圣护对我说，哈吉·阿里（Haji Ali）曾经告诉过他，在巴哈欧拉升天前的几天，巴哈欧拉曾把哈吉

叫到自己的房间里（要向他交代一些事情）。巴哈欧拉在房间里来回不停地踱步，烦乱得说不出话来，最后，祂示意哈吉·阿里离开房间。哈吉能够看出巴哈欧拉当时非常生气，尽管祂并没有解释原因。圣护接着说，巴哈欧拉当然可以预见穆罕穆德·阿里将来会反抗教长，因此祂的内心一定十分痛苦，但是祂把所有的话都留在了自己心里。”（1942年4月26日）

“守基·阿芬第经常提到，教长曾告诉他们（教长的家族成员），在祂去世之后，‘他们都会堕落的。’”（1942年5月18日）

“埃及已经遭到入侵了。他一直在思考，如果这里的局势开始恶化，我们是该留下还是该离开。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不过，我们已经对困难习以为常，因此它们现在几乎不会再让我们感到困扰了！”（1942年7月4日）

“任何了解守基·阿芬第真实生活的人都会哭泣——为他的善良而哭泣，为他纯洁、简单的心灵而哭泣，为他历经的艰辛和忧虑而哭泣，为他常年独自饱受煎熬、遭到身边人的迫害而哭泣！”（1943年1月3日）

“前几天，他走进我的房间，当时的他正为工作感到心烦意乱。我问他，为什么不读一些跟他正在写的这本书（《神临记》）相关的书籍，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点灵感……他说：‘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二十年来，我一直都没有时间！’”（1943年1月30日）

“我真的很担心守基·阿芬第。他以前也会感到焦虑和烦乱，但都没有现在这样严重。我有时想，这会令他早逝……他的呼吸特别沉重，就像刚跑完步，他的眼睛下面还浮现出了大大的黑眼圈。他强迫自己读完桌上堆积了数天的信件，有时候一封信他要反复读上十几分钟，因为他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想，最大的煎熬莫过于看着自己所爱的人遭受煎熬，而自己却束手无策。我总在想，上帝怎么忍心看着他遭受这样的苦难呢？”（1943年11月29日）

“虽然这个夏天很平静，没有发生可怕的危机……但是我想，圣护从来没有在‘假期’里如此辛苦地工作过，而且我敢肯定，我也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他经常说，‘这本书快折磨死我了。’我

对此的回答总是‘我也快被折磨死了’。换句话说，他写作这部“百年评论”（《神临记》）的方式是残酷的；两年来他为此呕心沥血，而这期间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和烦心事……”（守基·阿芬第曾经收到某个灵理会寄来的信件，信中语言生涩，感情冷漠，我对此十分生气。）“……这是我见过的最生涩、最冷酷的信件。他为什么不向圣护学习？哪怕给一位智力不足的人写信，圣护的信中都充满了仁爱之情。这些巴哈伊不配拥有这样的圣护，我只希望上帝不要用别人来替换他们。”

一位家族成员去世了，他的遗孀后来找到了守基·阿芬第，希望圣护接受此人遗嘱中的内容，并收下他给圣道的捐款。此外，这位女士还希望守基·阿芬第收下一些巴哈欧拉的印章，这些印章弥足珍贵，是阿博都-巴哈去西方游历时交给她保管的。但是由于这位女士仍与被开除教籍的家族成员保持着联系，这两样东西守基·阿芬第都没有接受……我向守基·阿芬第汇报了我与这位女士的谈话内容（守基·阿芬第不想见她，就派我代他前去了）：

“我把事情向守基·阿芬第做了详细的汇报，并将印章和此人的遗嘱拿给他看。他让我告诉她，哪怕给他一百万枚印章或整座卡尔迈勒山，他都不稀罕，他想要的是真诚和忠诚，除非她在心中跟XX的家族成员彻底划清界限，否则他帮不了她……圣护肯定非常喜欢这些印章，如果能把它们存放在文物馆里就最好不过了。但是，正如他所说，他不能一边心安理得地拿着这些印章，一边却把这位女士拒之门外！令我费解的是，教长已经去世二十三年了，其间的许多年里，这位女士与圣护都十分亲近，难道她就没有一次想过把教长托付给她的东西归还给圣护？她看到圣护不愿意接受这些物品，于是就希望我能收下它们，但是我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守基·阿芬第不希望我这样做……”（1943年12月26日）

“守基·阿芬第整天都在录入他的手稿（《神临记》），我也在阅读复印稿，以确保在将稿件邮寄给霍勒斯（霍勒斯·霍利，美国总灵理会秘书）之前，其中的每一处错误都得到了修正。我们俩花了好多个小时在一起阅读原稿，勘定错误，字斟句酌地修改。

“我还没来得及记下来，父亲在守基·阿芬第的要求下，为巴

孛陵殿做了一份设计。今天，陵殿的塔尖设计（出自圣护的建议）已经通过了圣护的审核。接下来，父亲要完成具体的细节并给出最终的设计图（最终的设计图要在巴哈伊信仰创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上公布和展示）。此外，父亲还必须根据设计草图做出陵殿的模型，这是最关键的考验。如果守基·阿芬第满意，他就会向整个巴哈伊世界宣布这项计划。

“父亲能有幸为巴孛陵殿做设计实在是太好了。如果他成功了，这将是上帝最纯洁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成功，我们也不会感到失落，因为上帝赐予我们这个家庭的恩惠已经够多了！”（1944年7月5日）

“守基·阿芬第天生就是一位卓越的管理者和建设者。这两方面的能力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与上帝的计划相比，人类的眼界是多么地渺小啊！我想，哪怕我们从早到晚地赞美上帝一百万年，也仍然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但实际上，我们却经常对上帝的福佑视而不见！”（1944年7月24日）

“守基·阿芬第已经无法再承受了。我非常担心他……他们正在消耗着他的生命。他今天的状态特别差，甚至还留下了眼泪。我写不下去了。我无法忍受了！上帝怎么能看着他承受这样的痛苦。”（1944年12月18日）

“这是最艰难的岁月。我想，守基·阿芬第再也不会遇到比现在更严重的危机了（家族成员、当地社区和仆人们的背叛）。我希望不会！我想知道，他的身体和精神如何能经得起这般摧残！”（1945年1月30日）

“我不能讲出细节，但我必须说，守基·阿芬第的身边的确存在一些愚蠢之人，甚至是恶毒之徒，他们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守基·阿芬第遭受了多少苦难！他每天晚上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我已经担心到了极点……”（1945年2月27日）

“我相信会出现转机。但是，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个守基·阿芬第了。我不相信世界上能有什么可以抹去他这些年来所受的伤害！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但是它无法消除伤疤。”（1945年4月13日）

“……如果我想知道某位巴哈伊是否忠诚于守基·阿芬第，我只需看看身边有哪些人恨他——如果他遭到家族成员的痛恨，那么他肯定忠于圣护！”（1945年7月6日）

“阿里·阿斯卡尔（Ali Askar）住院了……在过去的三四天里，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所有这些都令人疲惫。但是，我只担心此事会给圣护带来重大的打击……他们还活着，那些卑鄙无能的敌人也活着，而阿里·阿斯卡尔却要走了。守基·阿芬第说过，阿里·阿斯卡尔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朋友’！但是上帝会帮助阿里·阿斯卡尔的。祂会的，祂会的，我知道祂会的。祂会赐予他荣耀。昨天晚上我还在想，毕竟，上帝的点滴之爱就可以抚平千年伤痛……今天，守基·阿芬第去探望了阿里·阿斯卡尔，当时我也在那里。守基·阿芬第准备给阿里·阿斯卡尔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因为他（守基·阿芬第）渴望看到这样一场葬礼，敌人也需要看到这样一场葬礼。但是，这对守基·阿芬第来说太沉重、太沉重了……守基·阿芬第说：‘现在我只剩下你父亲、你和阿里·阿斯卡尔了，而上帝却把阿里·阿斯卡尔带走了！’”（1945年7月8日）

“我下午四点去了医院，一直待到晚上八点。守基·阿芬第让我转告阿里·阿斯卡尔，他已经给波斯的朋友们发过电报了，他在电报里称阿里·阿斯卡尔为‘上帝爱之丛林里的雄狮’，并提到了他一直以来的服务。听完我的话后，阿里·阿斯卡尔——他的神志十分清醒，只是身体过于虚弱——的脸上隐隐浮现出了最可爱的幸福笑容……我告诉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就已经进入了天堂——圣护慈爱、愉悦和赞美的天堂。阿里·阿斯卡尔沉默了一会儿（他只发出喃喃低语表示感激），他显然很清楚，这样一封电报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他积起力量，告诉我，他想把自己订购的书籍赠送给守基·阿芬第……回家后，我向守基·阿芬第汇报了阿里·阿斯卡尔的情况，并且告诉他，阿里·阿斯卡尔想把书送给他。听了这些话，圣护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可怜的守基·阿芬第，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受伤害的人！我们应该为阿里·阿斯卡尔感到欣慰——他像国王般地去世了……今天，

守基·阿芬第把妇女们召集到客厅里，向她们讲述了阿里·阿斯卡尔为圣道服务的事迹，最后，这些朝圣者纷纷给他写信，称自己为‘圣居之仆的仆人’！守基·阿芬第说，正如《艾哈迈德书简》（*Tablet of Ahmad*）中所说的那样，阿里·阿斯卡尔‘对我所爱者要如生命之河，对我的敌人要如炽然之火’。在离开客厅的时候，守基·阿芬第说：‘阿里·阿斯卡尔已经升入了至高天庭，正在跟自己的同伴愉快地畅谈！’是啊，一个人还能对此生要求些什么呢？当天下午，守基·阿芬第前往陵殿拜访。拜访结束后，他吩咐XX把两座陵殿门槛处所有的鲜花都带上。圣护独自一人走到阿里·阿斯卡尔的遗体前，亲手为他涂了两瓶玫瑰精油，然后将鲜花放在了他的遗体之上，并流下了眼泪——除此之外，一个人还能对这个世界要求些什么呢！……昨晚回来后，守基·阿芬第给我讲了一些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他说，当他独自守在阿里·阿斯卡尔的遗体旁时，他想起了‘他如何为我服务’……于是他走上前去，拉下裹布，看着阿里·阿斯卡尔的面容，他说他真想大声地呼喊：‘阿里·阿斯卡尔，你醒醒，快起来！’因为阿里·阿斯卡尔看起来是那么自然，不像是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的样子……”（1945年7月11日）

“葬礼非常完美。守基·阿芬第首先做了讲话；然后让众人将灵柩抬到朝圣者招待所楼上的房间里，他和在场的所有人起身为逝者祈祷；接着，他将玫瑰精油洒在了灵柩上；之后，众人抬起灵柩，守基·阿芬第跟随灵柩走到朝圣者招待所的大门口，他安排一些人坐在前面两辆出租车里……送行的车队由二十五辆车组成……待他们都离开后，守基·阿芬第前去拜访了陵殿，他吩咐XX去陵殿门槛处将所有的鲜花收集了起来，并把它们送到墓地……啊，阿里·阿斯卡尔现在一定升入了第七天堂——每个人都在感叹，并希望自己也能得到阿里·阿斯卡尔的待遇！我也这样希望。”（1945年7月14日）

“守基·阿芬第生病了。我想可能是由于过度劳累、紧张而导致的消化不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得这种病了。他还活着就是一个奇迹……他现在发着高烧，我向上帝祈祷不要有什么大碍……我刚

量了他的体温——华氏103.6度（相当于39.6摄氏度——译注）！”（1945年7月15日）

“我实在受不了XX医生的惊吓了！现在他又说守基 ·阿芬第得的是阑尾炎和痢疾。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场景：我、守基·阿芬第和父亲一起，乘坐救护车像疯了一样奔往耶路撒冷（在当时的海法，没有哪位外科医生可以让我们放心地将这么重要的一位病人交给他）——但是我实在不能相信会到这种地步……我们只顾狂奔，狂奔，至于担忧，我的大脑已经麻木得感觉不到了！……我每个小时都给他测量体温。他是如此温柔和蔼——周围人这样对待他简直就是一种犯罪……上帝保佑，希望他没有得阑尾炎，将来也不要得……”（1945年7月17日）

“啊！好多了，但是太紧张、太累了！……”（1945年7月20日）

“我并不希望恶毒的人也遭受守基·阿芬第和我所经历的苦难。我永远都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些苦难——心灵和精神的痛楚……独自承受……工作、工作、工作，一天到晚地工作。购买土地、解决问题、收发信件、回答问题、纠纷、敌意、猜疑，无休无止。”（1946年4月11日）

“守基·阿芬第让父亲开始实施计划，建设陵殿的第一个单元——哈利路亚！”（1946年4月20日）

“……圣护的工作太繁重了……但他还是撰写了致美国巴哈伊年度大会的电文，并且附上了新的七年计划。此外，他还开始了陵殿的建造工作。他已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了！”（1946年5月25日）

“除了父亲（以及两位忠诚的巴哈伊，其中一位将近八十岁高龄）之外，守基·阿芬第和我的身边已经别无他人。父亲就是我们的一切，他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事情：办理银行业务，寄送信件，拍发电报，完成一切需要保密的差事（如签证、政府事务和市政厅事务等），以及提供咨询和设计，等等。而父亲已是七十一岁高龄了。阿里·阿斯卡尔、里亚兹（Riaz）和侯赛因（Hussein）三个人的工作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头上，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守基·阿

芬第和我一直在商讨我们的计划；他说我们必须走……再次离开年迈、疲惫的父亲是痛苦的，他需要为圣道肩负起所有的工作，而没有任何休息或喘息的机会。但是，当我今天跟他说起此事的时候，他却非常高兴，他说他能应付所有事情，不用为他担心，一切都会很好。父亲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他如此谦逊，却又是如此崇高，充满了英雄气概。可我实在是太累了（今天我已经哭过三回了），我不能把这些一一写出来。”（1947年7月18日）

“她（格拉迪丝·安德森）已于3月30日抵达海法……谢天谢地，她现在正做着父亲全部的工作！……她要办理银行事务、发送电报和信件、跑差事、与人会面……父亲于4月底去了一趟塞浦路斯，并在那里待了六个星期——这是他七年来的首个假期。这次度假让他受益匪浅，他现在已经开始为巴孛陵殿设计图纸了。”（一封来自鲁希叶·拉巴尼的信）

“以前，我总能找到一位犹太速记员来帮忙。但是现在，犹太人都不能到这条街上来，因为这里是阿拉伯人的地盘。过去的德国殖民区和我们的周边地区，主要居住着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你可能很难相信，在我们居住的这条街上，有人会被残忍地杀害，就因为他从这里经过。但这就是巴勒斯坦的现实情况。当然，肯定会有一些勇敢的宿命论者愿意冒险，他们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穿过街道，但是毫不夸张地说，他们都是些鲁莽之人。”

“一切都悲惨至极。而最令人难过的是，在面对这样的氛围时，人心已经麻木。以前，任何一次枪杀事件总能让你毛骨悚然、义愤填膺，而当这样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最多只对犯罪者和受害者报以几声咒骂，便接着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不久之后，就又能听说有人死于枪下。在圣地，人们居然能够容忍这种状况在阴谋和疏忽之中滋生蔓延，这实在是太可恶了，可恶得难以形容……”

“这些天来，愤怒的情绪占据了我的内心。那些无理、放肆的谋杀者令我震怒。其实大多数人只想平平安安地活着。虽然那些嗜血之徒只是少数而非主流，但他们的确存在。为什么没有人杀掉他们？我看到的全都是无辜的人被他们杀死的悲惨景象！”（1948年3

月1日）

“阿拉伯人的居住区居然有人公开出售军火，当地以及阿卡、太巴列（Tiberius）等地的巴哈伊都可以作证……哈桑（Hassan）说，有一天，他跟堂兄穆罕默德坐在太巴列的一家咖啡馆里，突然听到外面有一位男童正在叫卖：‘手榴弹！卖手榴弹啦！’哈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他把男童叫过来，问他卖的是什么。男童说是炸弹，他背上背着一大包呢。男童主动把包裹卸在地上，然后取下了一捆手榴弹（蛋形手榴弹）！‘多少钱一个？’哈桑问。‘七十五皮阿斯特[①]，’男童回答。当然，哈桑并没有买……前几天，我透过卧室的窗户看见外面有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被一群阿拉伯人围住。他想确定手枪是否能用，于是走到我们家花园的墙壁这边来，对着墙开了两枪，然后掉头往城里去了，估计又要去干一些谋杀的勾当了。”

“父亲和本（本·威登，格拉迪丝·安德森的丈夫）已经乘坐一辆装甲出租车前往特拉维夫市了。他们准备在13号从卢德（Lydda）坐飞机飞往罗马，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跟当地的商家签订陵殿的柱子和装饰物的购买合同。”

“格拉迪丝今晚在我们的房子里过夜……这样她就可以待在我们身边了，因为外面的枪声不断响起，她晚上独自一人待在朝圣者招待所里很不安全……此外，天黑之后再在这条街上来回走动也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告诉本说，我们会把格拉迪丝带到这边来，所以他不必担心。”（1948年4月21日）

“由于形势所迫，我们无法拜访巴吉，只拜访了这里的陵殿。后来，因为有人在路上开枪，道路被封，汽车开不到花园里来，也无法从这里离开。于是守基·阿芬第走下了花园附近的台阶，步行回到家中。格拉迪丝和我也是如此。”（1948年4月23日）

“我已经累垮了，所以这篇日记就长话短说吧……我想，各处的报纸对海法战役都做了详细的报道，因此，我只讲述一下我自己在这期间的生活。这场战役持续了很长时间，是一场真正的战

① piastre，中东一些国家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争。那天晚上，我的感觉就像是睡在一潭死水里面，而且有人在不停地搅动。当时，我十分疲惫，所以倒是睡着了几次，但是梦境与枪炮声掺杂在一起，这种感觉比醒着或睡着都要难受。这些天里，守基·阿芬第一直被A某、M某和其他一些问题弄得心烦意乱。”（1948年4月25日）

“我仍在试图写下这份备忘录的要点：23日，海法战役的第二天，魏因歇尔博士（Dr. Weinshall，圣护的律师）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状况。我说我们都很好，一直待在家里。他说：‘你们没有打算离开吧？’我说当然没有，我们没想过离开，为什么要离开？他说确实没有理由离开，听我这么说他很高兴。然后我说，我们知道犹太人，犹太人也知道我们，我们没什么可惧怕他们的。他说当然是这样，所有人都十分敬重我们。他又问我们的仆人有没有离开，我说当然没有。在我们就阿拉伯人愚蠢的大规模撤离简短交流了各自的想法之后，他让我向守基·阿芬第转达他最真诚的问候。守基·阿芬第收到了魏因歇尔博士的问候，他吩咐我去向魏因歇尔博士表示感谢。圣护希望魏因歇尔博士对一些事情有所了解，于是我就把穆尼卜（Monib）与贾迈勒·侯赛尼（Jamal Husseini）的女儿结婚等事情告诉了他。他非常震惊，记下了穆尼卜和哈桑的名字。我还把鲁希（Ruhi）遭驱逐一事也告诉了他。我想，魏因歇尔博士可能想知道我们家族纷争的真正原因，于是我解释说，这其中不仅有宗教上的分歧，还有政治上的纠葛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告诉他，我们会把圣护的电报给他送来（这是在昨天的一次谈话中说到的），以便他了解此事……

“今天，我再次给魏因歇尔博士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想把一些人的名字给他。这些人无权向我们提出请求，因为他们只是假装自己是巴哈伊。我说，守基·阿芬第自然非常痛恨这群人，他们离开巴哈伊社团已经十年甚至十五年了，但是为了跟犹太人拉近距离，这些人现在却又声称自己是巴哈伊。实际上，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年来他们都在干什么。”（1948年4月27日）

“昨天，女仆急匆匆地跑上楼，使劲地敲着门说哈加纳

（Haganah）[1]要进来。幸好当时我已经穿好了衣服……我赶紧跑下楼去……之前我们的小笨笨去开门时，看到外面站着一帮犹太人，手里拿着冲锋枪和左轮手枪，她简直吓傻了，赶紧叫巴努（Banu）过来。外面的犹太人说：‘开门！’巴努说，她得去把房子的女主人叫来，话音未落，她急急忙忙地去找B某，可是B某不在，她便来叫我。这帮犹太人冲着屋内喊：‘再不开门，我们就砸门进去！’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我赶了过来，并赶紧放他们进来。我问他们会不会说英语，其中一个人说会一点。我便问这个人，知不知道这是巴哈伊社团领袖的家。他说知道，但我感觉他们并不知道。我想，这里可能有两件事情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其一，此前不久，一辆满载阿拉伯人的卡车在我家门前停了一会儿，他们可能怀疑我们家藏有阿拉伯人；其二，他们也有可能是冲着我们家的汽车来的，因为他们一进来就问：‘车库里的车是谁的？’当我给出答案后，他们很满意。后来我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说波斯语，这个人说，虽然他自己来自耶路撒冷，但他的母亲是波斯人，于是我就一直用波斯语同他交谈。他们似乎也无心搜查我们的房子，并且对我们十分礼貌客气，还告诉我不要害怕，我对他们说，我当然不害怕！他们随便看了看，也就不想再下楼或者去厨房之类的地方查看了，于是便离开了……

“无论局势好坏，格拉迪丝和我都在犹太人居住区里进进出出，就像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样，从不间断。当时的阿拉伯人非常仇视犹太人，而且就在这条街上，卫兵还是阿拉伯人，所以说去犹太人居住区还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去的不那么频繁了，但还是会去。我想这样做是很明智的，我们的举动向那些认识我们的犹太人表明，我们并不是只可同安乐，不能共患难的朋友。我们的车每次都会被犹太卫兵搜查，而且我们经常需要向那些不认识我们的卫兵出示美国护照。上星期的一天，在开车从犹太人居住区回来的路上，我们在路障处放慢了速度。这时，一辆犹太人的汽车从旁

① 在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期间，活动于该地区的一个犹太军事组织。——译者注

边飞速驶过，停在了我们前面，挡住了去路。车上的犹太人开始和卫兵讲话，我们的车开不过去，他的车也不动。于是我问卫兵，犹太人的车是不是不能往前开了。他稍显尴尬地说，他们看到我们这辆车是阿拉伯人开的。我说：‘的确是这样的。可你知道这是谁的车吗？这是巴哈伊信仰的领袖守基·阿芬第的车。我们雇了一名阿拉伯人司机，每天下午负责把他载到巴哈伊花园，然后再送他回家。其他时间我们都是自己开车。你可以看一下，一刻钟后，这辆车会从山路上开过来，去接守基·阿芬第，开车的便是这位阿拉伯人。’他似乎看出来我说的是实话，于是也就不再为难我们了……

“B某告诉了我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问，我们的阿拉伯邻居们是否准备离开……B某说，他每天都被邻居们追问：‘守基·阿芬第要走吗？’邻居们说，圣护一走，他们就走。B某还说，K某的家里住着一位巴勒斯坦的警察，这位警察问K某他应该什么时候走，K某告诉他：‘当你看见守基·阿芬第离开时，你就拿起外套，锁上门，然后跟着他！’警察还说：‘……如果守基·阿芬第准备要走的时候你不通知我，那么一旦他走了，你就要为我的性命负责。’我们在这里住了二十五年，邻居们一直对圣道和圣护视而不见，因此，现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尊敬着实令人感到可笑！”（1948年5月4日）

“今天我们的汽车被盗了！（这辆车是罗伊·威廉送给守基·阿芬第的礼物。圣护之前的那辆旧车由于买不到零部件，在战争期间卖掉了，之后的很多年里，圣护一直都没有车。）上帝啊，多么倒霉的一天！下午两点半，格拉迪丝和我正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女仆走了过来，说门口有一个犹太人。格拉迪丝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想看看他要干什么。长话短说，这个犹太人是当地哈加纳的领袖弗里德曼（Friedman）先生，他的身边带着大约二十名武装人员。弗里德曼先生说，根据一名哈加纳卫兵（有两名卫兵在我们所在的街道执勤）的报告，有五名武装人员在我们的车库门前走来走去。当这名卫兵用左轮手枪指着他们、让他们离开时，那些武装人员全部拿枪对着他，并让他快点走开。由于是五对一，这名卫兵便去寻求援助。那些武装人员有一辆吉普车，当援兵赶到时，

他们已经离开了。虽然车库门上的挂锁已经被锯断，但是门是从里面被关上的，因此弗里德曼他们认为车子应该还在。于是我从锁眼往里看，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别克车没了！可怜的格拉迪丝从车库后面的小门冲进去，确实，别克车没了！那名哈加纳卫兵暗示偷车贼是犹太人（或者英国人），但是他没有明说。于是，弗里德曼通知了哈加纳，格拉迪丝和曼苏尔（Mansoor）通知了军队和斯坦顿（Stanton）街道警察局。我给魏因歇尔博士打了电话，他建议我们去哈达尔·哈卡尔迈勒（Hadar Hacarmel）警察局报告此事。守基·阿芬第比任何人都镇定，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的敌人这下该高兴了！’我想，可能我们谁都不指望能够再次见到这辆车。但是，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没车的日子后，我们才刚刚收到这辆让人珍爱的大别克车，而现在它就这样没了，我们的心里真是太难受了！我费了一些周折才给圣护找到一辆犹太人的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说：‘如果是犹太人偷走了你们的汽车，你们一定能再把它取回来！’我和格拉迪丝一起去了警察局，我在外面等，她在里面做记录。我们给魏因歇尔博士也留了一份对汽车的描述，因为他之前说过要给他一份，这样他也许能帮得上忙。接着，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又将我们带到了另外一处的哈加纳，我们向那里也报告了此事。就在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我们正疲惫不堪、无精打采地往家走，格拉迪丝在赫兹尔（Herzl）大街的一家化妆品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款护手霜，正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本来我不想麻烦了，但后来还是决定买下这款护手霜，于是我们走进了店里。店主和我父亲还有我已经认识很多年了，他问起了我父亲的近况，我也问候了他的老父亲，大家彼此寒暄了几句。我原本没打算跟他提起汽车被盗的事情，因为这件事让我觉得很丢脸。但是，我付完钱后，竟然忘了拿东西就走出去了，我赶紧为自己的窘态道歉，并且告诉他说：‘我今天很烦躁，因为我们的汽车刚刚被盗了！’店主说：‘但是我今天看到你们的车了，两点一刻左右，就在新商业中心！我还纳闷呢，你们怎么把这么漂亮的新车给卖了呢！’看起来，他在前一天就曾看见格拉迪丝和我开着这辆车，并且对车的外观以及那块美国牌照记忆非常深刻！他说，他今天看到这辆车时，

发现车里坐着一些犹太人，开车的也是一名犹太人，车子就在萨沃伊旅馆（Savoy Hotel）的拐角处。他请求我们千万别说他是目击证人，但是我说，如果不这样讲的话，就帮不了我们，最后他改变了主意，同意做我们的证人。于是我们急忙赶回警察局，把店主的话向警察做了汇报。回家之后，我发现弗里德曼先生给我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就打电话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些线索足够了。现在我知道他们把车开到了我们的地盘上，我一定能抓住他们！’过了一会儿，哈达警察局打来电话说：‘我们已经找到汽车了，你们明天就可以取回，所以不必担心。’弗里德曼先生也给我们打来了同样的电话。果然，4号上午十一点，弗里德曼再次打来了电话，让格拉迪丝去取车。格拉迪丝开车去了哈达警察局并拿到了车子！谢天谢地，我们真是太高兴了！有意思的是，在回家的路上，在去化妆品店之前，我还说只有出现奇迹，我们的车才可能找回来！

“在犹太人刚刚占领海法之后，有五名年轻的犹太武装人员（前文提到过）曾经来到这里，并且自称是哈加纳成员。而吉普车（吉普车在整个事件中反复出现，所以我认为它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里面的那帮年轻人，在一天晚上正准备闯入车库时被B某发现了。B某告诉他们，他会把门打开，不必破门而入。于是他们走进了车库，围着我们的汽车。最后B某说：‘如果你们想知道这是谁的车，可以打电话问问你们的长官，问问魏因歇尔博士。’听完之后，他们都匆忙离开了。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两队人马其实是同一拨人，他们很有可能是伊尔贡组织（Irgun Zvi Leumi）[①]的成员，而绝不是哈加纳！”（1948年5月14日）

“今晚，午夜时分，英国的委任统治权结束了！战争已经打响了，而且正在激烈进行，未来将会怎样？……父亲和本明天就要回来了！我好累啊！”（1948年5月15日）

“父亲回家了！黎巴嫩前线的纳库拉（Nakura）和海法之间的

① 一般拼作Irgun Zvai Leumi，希伯来语意为“国家军事组织”，是一个秘密的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译者注

山区中不断传来猛烈的枪炮声。昨天也是如此，当犹太人占领阿卡时，我们也能听到他们的激烈交火。但不同的是，我们今天一直都能清楚地听见机枪的扫射声。眼下的情景不禁令我想起英国占领黎巴嫩时的情景——只是当时我们都知道这场战斗肯定会离我们远去。但是现在呢？谁都不知道。在巴勒斯坦，交战双方的距离非常近——十英里就能改变战斗的进程，决定战斗的胜败……”

“格拉迪丝去接父亲和本，下午一点半他们就到家了。他们乘坐的阿根廷号汽轮（S.S. Argentina）昨天晚上就进港了，由于他们跳过了亚历山大和特拉维夫，因此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两天到达。这次旅行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上帝给了我们这些奇迹和恩惠，我们感激不尽！”（1948年7月3日）

“今天晚上，父亲吃过晚饭后来看望守基·阿芬第。守基·阿芬第对父亲说：‘今晚十点十五分，陵殿的修建工作正式启动！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然后，他紧紧地握住了父亲的手！……附言：晚上十一点三十分，我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爆炸声。上帝救救这个悲惨的国度吧！”（1948年7月6日）

“守基·阿芬第十分担心战争可能在星期五再次爆发。实在太可怕了。正如他对本、格拉迪丝和我所说的，最坏的威胁在于战争有可能对巴哈欧拉的陵殿造成破坏。既然马吉德丁（Majdi-d-din）和舒阿·巴哈伊（Shoah Bahá’í）住在巴吉宅邸，如果阿拉伯人来了，后果不言而喻。天啊，有太多的负担、太多的问题了……如果没有信仰，我们会在哪里呢？

“守基·阿芬第在本和格拉迪丝面前高度赞扬了父亲，说每个人都爱他，他拥有一颗非常纯洁的心灵。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因此圣护选择了他。”（1948年12月28日）

“我感到精疲力竭。今年我似乎已经无力反抗命运了……我感觉自己病得很重，但也许并无大碍。我希望如此，因为我现在虽然虚弱，但是仍被他人所需要，还不是一无所用……

“今晚，索莱尔玻恩公司（Solel Boneh）建设拱廊的报价出来了——一万八千英镑，太离谱了！守基·阿芬第非常焦虑和沮丧，而现在石料正在陆续运来，他已经拆下了原来的瓷砖，加固了

地基，平整了陵殿后面的一片山坡！他说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天价——天哪，问题太多太多了！上帝赐予我服务的力量吧，让我继续鼓起勇气！”（1949年1月20日）

“简单记录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天气一直很恶劣，而我们还有八十多个箱子放在港口，需要运到陵殿去。外面的雨声让我无法入眠，因为我知道这场雨又要耽误工程的进度了……烦心事总是一件接着一件。因陵殿建设的缘故，今年我们所有人的工作节奏似乎都越来越快了。”（1949年1月21日）

“今天实在太糟糕、太糟糕了。这样的日子应该被法律禁止。昨天晚上，圣护收到了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在市政招待会上与首相见面。他决定派父亲和本前去。在因下雨而暂停了四天之后，今天，码头的装运工作又重新开始了。场面混乱不堪……

“就在刚才，四点一刻的时候，市长本人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他已经‘履行了职责’，安排圣护于今晚七点一刻到位于山顶的D先生家中拜访本·古里安（Ben Gurion）……此事纸上说来可能平淡无奇，但它却令亲历者痛苦不堪。其中的每件事情都完成得相当不易。不过，圣护将与首相见面，我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昨天晚上，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圣护仍旧觉得亲自出席市政招待会非常不妥，但他跟我说，他愿意做出妥协，亲自去拜访首相，不过不能在熙熙攘攘的招待会上见面，也不能有失他作为信仰领袖的身份。于是我请求他让我给市长打电话，他同意了，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

“现在是七点钟，本刚刚开车载着圣护和父亲离开……二十五年来，圣护一直在努力，让人们将圣道视为一个世界中心而非地方性团体，同时把他视为世界性的而非地方或国家层面的宗教领袖，因此这次与首相见面的机会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本·古里安觉得自己是在屈尊俯就——真希望他能明白这对他是多大的荣耀，而上帝今晚是多么地屈尊俯就！这就是人生命的渺小和世间的虚华。

“会谈结束了。整个过程持续了十五分钟。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圣护发现D先生家的大门是半开着的，他走进去，没看见人，于是敲门，继续往里走，然后发现本·古里安夫妇和房子主人正在

一间小房子里吃甜点，房子由凹室分隔成一个个的房间……本·古里安站起身来，把圣护带到了隔壁的……房间，礼貌地安排他坐在最好的位置上。接着，本·古里安询问了一些有关圣道的问题，他说自己对圣道有一些了解，知道它是一场‘社会运动’。圣护就此回答说，圣道不止于此，它是上帝神圣的力量所促成的，等等。他没有使用特别强烈的语言。本·古里安还询问了圣护与信仰之间的确切的关系，圣护对此也做了回答。

“圣护不想打断本·古里安的晚餐，于是在短暂谈话后便起身告辞。本·古里安带他走到另外一个门口处，一位仆人把他送到汽车跟前，并为他打开了车门……

“本·古里安问圣护，是否有关于圣道历史的书籍可以供他阅读。圣护说很愿意送他一本书（他送的是《神临记》）。圣护还说，如果有机会，他很乐意带他去参观陵殿，但是首相说自己实在很忙，我想这也就意味着拒绝了……此番见面适逢大选的前两天，本·古里安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与圣护会谈，实属恭敬有礼；而利维（Levy）市长亲自安排，在我看来，也是友好之举。圣护和本·古里安见面时，圣护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他希望当面向首相重申他在写给首相的信中（首相记得收到了这封信）曾经表达过的那些观点。本·古里安说可以，当然，……本·古里安告诉我，圣护对他十分热情。我敢肯定，圣护高洁、真诚和坦率的品格一定会给像本·古里安这样深谙人性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48年2月8日）

“凌晨三点，我们满载石料的驳船沉没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把此事报告给了守基·阿芬第，他说：‘我已经顾不上了！’如今伴随着我们的只有悲剧！恶劣的天气，无休无止的混乱，而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能够把船打捞上来——我听他们这么说。”（1948年2月11日）

“由于陵殿后面的挖掘工作等一些事务，守基·阿芬第几乎每天都从早到晚地待在花园里，以此亲身示范，厉行节约。”（1949年4月5日）

“守基·阿芬第有时间的时候，会来客厅看望格拉迪丝和本

（还有我）。这一回，我发现他的外套上沾着一些泥巴，于是就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我跟泥将军打了一仗，结果我输了！’他向我解释说，下雨天路太滑，他又摔了一跤——我们都笑开了花。”（1952年4月3日）

“我真怀疑自己有没有时间和精力把日记继续写下去——如果不写的话就太可惜了，因为我看见了并且知道太多的内部情况……”（1955年9月15日）

“我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痛楚。但我希望，不要有太多人遭受守基·阿芬第和我所遭受的磨难。如果有人让我给磨难下个定义，我会说，虽然磨难有许多种，但是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无责任的磨难，另一类是有责任的磨难……”（在这里，我所谓的磨难是指痛苦，是指令人饱受煎熬的深深的苦难。）（1955年11月14日）

“圣护已经得知了瓦尔加（Varqa）的死讯，他说，‘瓦尔加是我们最优秀的帮手’。虽然圣护对于瓦尔加的去世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他仍然为失去这样一位能干而且出色的巴哈伊而感到惋惜。”

第九章　战争

前面引用的那些日记只是我多年间积累下来的几百页日记中的一小部分。当通读那些日记的时候，让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它们几乎对六年间肆虐全球的世界大战只字未提，而这场世界大战给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安全，特别是巴哈伊宗教领袖——圣护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没有什么能比日记中的这段空白更好地说明圣护在那些年里所经历的内部动乱了。日复一日的压力、工作、担忧以及心理上的疲劳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已经顾不上记录那些无时无刻不在的危险和焦虑了。守基·阿芬第是对政治事件最敏锐的观察家，他对各方面的动态都了如指掌。他的才智和分析能力并没有让他自鸣得意。有时人们对“信仰”意味着什么有一种幼稚的理解，而他也没有在这方面误入歧途。他十分清楚，信仰上帝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智、不顾危险、盲目行事，或者在危急关头不知所措。

守基·阿芬第的私人生活完美无缺，同时也充满了磨难。我原本极不情愿提及他的私人生活，但我最终选择这么做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只有对圣护的经历有所了解，哪怕只是匆匆一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到他成就的光辉；其二，对任何一位著名人物而言，后人总会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对其进行大量详细的历史研究，通过各处搜集的记录材料，他的许多事情都将为人所知，而如果没有任何见证人来解释这些事情，那么它们则很可能为后人所误读，各种纯粹基于想象的愚蠢故事也会随之被编造出来。

在母亲于1940年3月在阿根廷突然辞世后，圣护便邀请父亲到海法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出于个人原因，圣护在那时就已经决定前往英国了。对于生活在中东和欧洲战区以外的人来讲，他们几乎不可能理解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困难程度。虽然圣护已经颇具威望和影响

力，但是巴勒斯坦当局仍然拒绝发放英国签证，于是我们只好把申请递交到伦敦。此外，守基·阿芬第还向老朋友拉明顿勋爵求助，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威望确保签证获批。启程赴英之事已经迫在眉睫，但巴勒斯坦当局仍然没有得到英国方面的回复，而我们也迟迟没有收到拉明顿勋爵的消息。在一种力量的神秘驱使下（他所有的决策都是如此），守基·阿芬第决定首先前往意大利。意大利的签证我们已经拿到，因此，在5月15日，我们乘坐一艘味道怪异的意大利小汽艇离开了海法。一路上，海水不断拍打着我们脚下的船板，让人觉得仿佛是坐在一艘破旧的划桨船上。几天后，我们抵达了罗马，我前往热那亚去接父亲。父亲乘坐的是雷克斯（Rex）号汽轮，这是该汽轮作为客船的最后一次航行。我和父亲一回来，圣护就派我们到英国领事那里去询问签证是否已从巴勒斯坦转递过来，但是没有任何消息，领事说，他也无权给我们签证，因为所有的签证都必须经过伦敦方面的批准，而他现在也无法与自己的政府取得联系！我们带着这则令人沮丧的消息回到了圣护这里。圣护派我们再去一次，我和父亲当然绝对服从，因为他是圣护。但是，我和父亲都觉得，再去也无济于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再一次坐到了领事的面前，把第一次见面时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只是这次，我无意间提到了守基·阿芬第是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的继任者和外孙。当然，我之前就说过守基·阿芬第是巴哈伊信仰的领袖之类的话。领事看着我说：“我记得阿博都-巴哈……”接着，他继续讲述了他和教长之间的一些交往；显然，这段回忆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拿过我们的护照，在上盖了章。他说自己无权这样做，所以这份签证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进入英国，我们必须自己承担被拒绝入境的风险。带着这份签证，我们立即离开了意大利，去了法国。5月25日，我们穿过了芒通市（Menton），抵达了马赛。几天后，意大利加入到了与同盟国的战斗中。

接下来的日子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整个情节就像是一场触目惊心的噩梦——不光是我们个人的噩梦，更是将整个欧洲都卷入其中的一场巨大的噩梦。当时我们正乘坐火车前往巴黎。在同盟国

迅速崩溃的北方前线面前，途中的每一站都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四下一片混乱，我们根本无从了解准确的消息。到达巴黎后，我们沮丧地发现，通往英国的所有港口均已关闭，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一个名为圣马洛（St Malo）的小港口去，看看能不能从那儿坐上船，可是这个希望也在一点一点地破灭。当时还有几百人想要从圣马洛回到他们在英国的家中，大家在那里足足等了一周，最终才有两艘船靠岸。从早到晚，圣护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安静地坐着，仿佛一尊石像。我从来没有见过圣护出现这种情况，我感觉到，他正在遭受着苦难的销蚀，犹如一根正在燃尽自己的蜡烛。他会派我和父亲去轮船公司询问是否有船过来，我们一天要去询问两次，但是每次回来后，我们告诉他的都是“没有消息”。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守基·阿芬第为何如此忧虑，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心智远远高于我们，他比我们更能理解圣道所面临的危险——上帝知道，当时我也已经忧虑成疾了。母亲因心脏病发作突然辞世，我和父亲仍然没有从这一巨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再加上其他种种事情，使得父亲在当时几乎陷入了麻木的状态。然而圣护没有麻木。纳粹已经在德国禁止了圣道的传播，并且跟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者又积极地参与阿拉伯的政治，并公开声称与圣护为敌，因此守基·阿芬第知道，如果他落入纳粹手中，那么他很有可能被关进监狱，甚至还不止于此。这样一来，在这个世界陷入混乱的时刻，巴哈伊信仰就失去了领袖，无数巴哈伊信徒就失去了鼓励和引导之人。在我看来，目前的状况与教长在阿卡的岁月极为相似。当时教长面临着被流放到其他地方的危险，而且祂也是在候船。我们等到6月2日，终于来了两艘船，准备疏散困在圣马洛港口的人群。于是我们登上了第一艘船，在漆黑的夜色中驶向南安普顿，并于次日早上到达。我记得，就在我们离开之后的第二天，德国军队便占领了圣马洛港口。

进入英国的过程困难重重，而离开英国时，我们也费尽了周折。当时正赶上“儿童疏散”大行动，这才是当务之急；多亏了守基·阿芬第的地位，以及父亲跟加拿大驻伦敦高级专员的关系，我们才成功获得了前往南非的通行许可。7月28日，我们乘坐“开普敦

城堡”（Cape Town Castle）号汽轮去了开普敦。这是一艘快船，在一个很大的护卫编队的护航下，我们离开了英国海岸，此后便独自在海上航行。我记得这艘船的航线十分奇怪，呈“之”字形。它采取了一种飘忽不定的行进方式，以降低遭到潜水艇攻击的概率。随着意大利也加入了这场战争，地中海的航道已经对同盟国的船只关闭。要想回到巴勒斯坦，唯一的途径就是取道非洲。守基·阿芬第在担任圣护的初期曾经穿越过非洲。1929年9月，他从英国起航，到达开普敦后，再主要经由陆路抵达开罗。他的冒险精神、他对美景的热爱吸引他登上高高的山峰，踏入茂密的丛林，并最终完成了非洲之旅。他对比属刚果向往已久，只可惜由于某些原因，在当时没有获得签证。而现在，就在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我们却奇迹般地获得了刚果的签证。在抵达斯坦利维尔（Stanleyville）后，我们就去茂密的原始丛林做了一次短途旅行。我知道，守基·阿芬第对自然美景的热爱是吸引他去到那里的原因之一；他想要看到百花盛开的丛林。可惜啊，这里既不是赏景的地点，也没到赏景的季节，于是我们只好失望地继续赶路。

守基·阿芬第非常担心父亲的身体（父亲已经六十六岁了，身体十分虚弱），不想让他跟随我们在陆地上奔波，于是便把他安顿在德班市（Durban）的一家宾馆里，等日后再让他乘飞机回去。由于等飞机的人太多，为了保证那些肩负要务的旅客的优先权，非政府和非军队人士不断被取消登机资格。就在等待登机的那几个星期里，父亲设计出了母亲的墓碑。这一设计不但融合了我和父亲的想法，而且也采纳了守基·阿芬第提出的美化墓碑的宝贵建议。

我们驱车从斯坦利维尔出发，三天后到达了苏丹境内的朱巴（Juba）。接着，我们乘船顺尼罗河而下，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对我来说，那里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晚饭后，我和守基·阿芬第坐在宾馆的门廊下乘凉。夜色中忽然走出一群刚下飞机的乘客，准备在此过夜，而人群中竟然有我的父亲！能在非洲的中心相遇让我们喜出望外，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更不清楚如何才能取得联系——这下我们放心了。在德班的时候，守基·阿芬第只是告诉父亲要前往巴勒斯坦，在拿撒勒找一家宾馆住下，然后在那里

等着我们一起返回海法。

让我们惊喜的是，总督斯图尔特·赛姆斯（Stewart Symes）爵士邀请我们于10月1日在其官邸共进午餐。与老熟人叙过旧后，我们继续启程前往开罗和巴勒斯坦，按原计划跟父亲会合。在离开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海法。不难想象，这样的一次旅行，因为有了未知、焦虑和危险伴随始终，其本身便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同时也让我们精疲力竭。守基·阿芬第从未去过西半球，往东最远也就到过大马士革。不过有趣的是，他曾两次从南向北穿越非洲。

1940年12月27日，守基·阿芬第致电英国灵理会，电报内容为："转告伦敦和曼彻斯特的朋友们，我已安全返回。致以真爱和赞美。"圣护没在电报中说他与伦敦的闪电战擦肩而过，才刚刚返回圣地海法的事情。如果正处在困境中的英国巴哈伊知道这些，很难想象他们的惊讶之情！

在我们返回巴勒斯坦后的几年，圣地面临了巨大的危险。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巴哈伊世界中心和圣护本人，还有许多国家的巴哈伊。

守基·阿芬第从小便受到教义的熏陶，而且挚爱的外祖父总是那么警觉、敏锐地陪伴着他，因此，对于"缺乏信仰的人类即将遭受的世界灾难的纷乱前奏"（守基·阿芬第语），他似乎早有意识。虽然他知道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但是他并没有惶惶不可终日。1927年，玛莎·鲁特曾在欧洲给守基·阿芬第写信，向他讲述了自己心中的恐惧。守基·阿芬第在回信中安慰她道："至于欧洲是否会最终爆发战争，切勿担心焦虑。战争仍很遥远，近期不存在危险。"不过就在这一年，守基·阿芬第也表示，一场致命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爆发，这一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他再三告诫巴哈伊，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即将来临，所有人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他在1938年写道："内部瓦解和外部混乱的双重进程正在加速，并且一天天地临近高潮。种种力量的爆发必将'使人类全身战栗'，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爆发前的隆隆声响。《圣经》中预言的'末后'和'末后之年'最终降临在我们身上了。"在1938年12

月底完成的《神圣正义的降临》（*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一书中，他清楚地预料到了战争的发生，他写道：“谁知道呢，剩下的几年转瞬即逝，这期间也许正孕育着空前的冲突和毁灭！”1939年4月，他写道：“垂死文明之光阴正在不可避免地耗尽。”

战争的阴霾逐渐笼罩了欧洲。1939年8月30日，守基·阿芬第从欧洲的中心发来了电报，其中写道：“黑暗正在降临，人类正遭受着摧残……”读着电报开头那充满诗意、铿锵有力的语言，我深切地感受到灾难已将我包围。1940年7月，守基·阿芬第乘船去了英国，此前一周，他曾经通过海法转发了一封电报（在他出门期间，所有电报均通过海法转发），其中说道，战火“……如今正威胁和破坏着近东和远西地区，世界中心成为了巴哈欧拉信仰留存下来的主要堡垒……”圣护正为许多事情深感焦虑，而且在过去的半年里，我们一直在和时间赛跑（先是急着离开海法，而后又急着返回海法），但他居然还能拥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伏案写作像《应许之日来临》这样的书！守基·阿芬第在书中明确提出，“报应的灾难”已经席卷人类，不管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是怎样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类一百年来对上帝之天启的漠视。

战争给海法乃至全世界的巴哈伊都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和困难，但守基·阿芬第总能从容应对。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遭遇战争的磨难，相反，他始终背负着责任的重担，从未有片刻弃之不管。我记得有一次我非常生气，因为每一件事他都要亲自决策，哪怕是在他生病的时候。他说，其他的领袖，甚至是首相，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将权力暂时委托给他人的，但是他不可以，只要他还活着，他一刻都不能将权力委托出去。没有人像他一样是在神圣指引下发挥作用的，他也不能将这种指引委托给他人。

虽然二战从未殃及圣地，但是多年来，战争随时降临的恐惧却一直笼罩着我们。跟许多国家一样，我们这里也采取了全面的灯火管制。教长住宅中的各种建筑共有将近一百扇窗户，因此，灯火管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当然，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灯都熄灭，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肯定少不了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外面还总是频繁传来防空队员怒气冲冲的叫喊声。海法是一座重要的

港口城市，并且还拥有一个大型炼油厂，因此这里是一处重要的战略据点。城市里安装了大量的高射炮以作防御之用，其中的两架距圣护的住宅仅有一英里。我们的城市确实遭到过炸弹的袭击，幸好没有重大的损失（真是奇迹般的防御）。不过空袭是常有的事情，大型高射炮的炮弹碎片也四处飞溅。守基·阿芬第因此又增添了一份担忧。那些精美的大理石纪念碑标示着教长家人的安歇之处，哪怕葡萄大小的弹片也会给它们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坏。纪念碑附近也确实发现了一些较大的弹片，但纪念碑却从未被击中过。迫于当时的形势，我们建造了一个防空洞，不过，圣护和我从未进去躲避过。当警报在夜晚响起时，守基·阿芬第有时会起身看看窗外的情况，但通常情况下他都不予理会。英军攻入黎巴嫩是动静最大的一次行动。整整一周，轰隆隆的炮火声不绝于耳，距离我们家半英里的港口不断遭到维希（Vichy）[①]军队的俯冲轰炸。

但所有这些并不十分严重或者危险。1941年11月，守基·阿芬第在一封电报中对未来做出预言，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破坏的加剧，世界将遭受史无前例的苦难……”不管世界面临着怎样的前景，1941年，我们在巴勒斯坦度过了整场战争中最受煎熬的几个月。在此期间，守基·阿芬第忧心忡忡。那一年中，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在伊拉克发动了反同盟国革命，并以失败告终；英军在利比亚被隆美尔将军打得节节败退；德军不断逼近亚历山大港（于1942年最终攻陷）；纳粹部队占领了克里特岛，并将其作为第二块跳板，伺机征服中东；英法军队攻入黎巴嫩，颠覆了维希政府控制的政权。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危险之外，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巴哈伊信仰和圣护的敌人——与纳粹政府相互勾结，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不难想象，假如德军成功占领了巴勒斯坦，然后同阴险恶毒的穆夫提狼狈为奸，那么守基·阿芬第、陵殿以及世界中心的记录和档案材料定会面临灭顶之灾。圣护曾多次说过，我们在当地有太多的敌人，他们可以和穆夫提一起轻易地蒙蔽德军，使其站在圣护的对立面上，此外，巴哈伊信仰在许多方面都同

① 法国城市，二战时为法国傀儡政府的首都。——译者注

纳粹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因此，一旦德国占领巴勒斯坦，圣护的处境将十分危险。

在那几个月里，守基·阿芬第目睹着战争渐渐逼近，心急如焚。他在思索，如果海法遭到入侵，他本人作为信仰的象征，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从各个方面最好地保护圣道。

在战争的岁月里，守基·阿芬第一直与广大信徒保持着联系。这些信徒中，既有来自波斯、美国、印度和英国等地的（它们是最早成立巴哈伊社团的国家，其信徒的人数也是最多的），也有来自拉丁美洲的（那里的中心刚刚建立，正在迅速发展）。只有日本、欧洲国家、缅甸和伊拉克的一些相对较小的社团与守基·阿芬第失去了联系（其中伊拉克的社团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联系）。圣护对此万分惋惜，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的命运。圣护近乎奇迹般地与全世界的巴哈伊保持着联系，正因如此，他不仅能够将指令传达给各国的灵理会，而且得以向全世界的巴哈伊阐释这次战争的意义。在其书信体著作《应许之日来临》中，圣护说道：“上帝的旨意正是将长期隔离、长久受难的人类带入一个伟大时代、黄金时代。唯有上帝才能做到此事，唯有上帝才知道此事的全部意义。人类的现状，甚至不远的未来，都是黑暗的，令人不安的黑暗。然而，遥远的未来却是光辉的，荣耀的光辉，这样的光辉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人类的婴儿期和童年期已经一去不返，伟大时代是一切时代的完结，必然标志着人类一家的实现，但它尚未到来。现在是人类历史上的过渡期，也是最为动荡的时期，其震颤乃是至伟时代、‘末后’时代到来的先决条件，同时也预示着后者的到来。自历史开端以来，冲突的愚蠢和骚乱便玷污了人类的史册，而新时代降临后，它们将被不受干扰、普遍和长久的和平所带来的智慧和平静取代。届时，人类子民的不和与分隔将让位于世界范围内的和解，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元素将完全统一……无论是否愿意，人类正在向着这个阶段迈进，其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深重的磨难，正在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为人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铺平道路。”

1945年5月，战争在欧洲结束。守基·阿芬第如释重负，满心愉

悦。他致电美国道：“各地爆发的战争使人类饱经动乱，而今战争结束，五大洲的巴哈欧拉追随者同庆。”同时，他还表达了内心深藏的感情：“危难之年，神圣天意之干预使圣道逃过此劫，感激地颂扬其显著迹象。”他简要重述了信仰在战争阴影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并对其他社团奇迹般的保全表达了感激之情。1945年8月20日，圣护再次致电：“漫长空前的世界性冲突彻底结束，难抑心中感激之情。”种种限制的解除令人欢欣鼓舞，现在，美国信徒可以启动第二阶段的神圣计划了。圣护督促他们挺身服务，继续开展各项工作。在世界遭受史无前例的创伤之后，守基·阿芬第传递出的这些信息最能体现他的决心、热情和卓越的领导才华。

无论世界其他地方的状况如何，巴勒斯坦内部的形势仍在持续恶化。欧洲的犹太人惨遭屠杀；按照英国政策，犹太移民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管控，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因此陷入了深重的苦难；阿拉伯人对这一政策也极度愤慨——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当地的紧张局面和仇恨情绪。其他国家遭遇的许多困苦也逐渐开始在这里出现，比如，我们目前正面临的严重的食品短缺。一切都很艰难。虽然我们不再处于外敌入侵或者炮弹袭击的危险之中，但是进入这个被守基·阿芬第称作“当代最严重的震动圣地的动乱”时期后，我们这个小而神圣的国家的前景愈渐黑暗了。

在战争的岁月里，守基·阿芬第每天都紧绷着神经，疲惫不堪。他不仅完成了《应许之日来临》和《神临记》的写作，而且还执行了第一个七年计划中的前五年的任务。没有人能够否认，正是因为守基·阿芬第在此之中奉献了无尽的热情和精力并且不断鼓舞人心，才促使巴哈伊投身到行动之中。他安慰和激励着巴哈伊，把整个巴哈伊世界团结在一起；他逐步扩大圣道的影响范围，深化和拓展了各个巴哈伊国家社团的生活。在此期间，作为一项独一无二的工程，巴孛陵殿上层结构的建造正式启动；阿博都-巴哈的家族成员，包括圣护自己的家人在内，都无可救药地背离了他。如今，守基·阿芬第已经年近五十，他的两鬓染上了霜白，他的背部也因为长期的伏案写作而微驼了。他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我坚信，这些苦难不仅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悲伤，而且也正在逐渐耗尽他的心力。

1948年5月14日，随着英国委任统治接近尾声，巴勒斯坦的局势也日趋恶化。整个国家陷入了恐慌和仇恨之中，恐怖活动频频爆发。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英国人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但是这三方都十分清楚，圣护在这些利害攸关的政治问题上是完全置身事外的。毫不夸张地说，圣护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各方都不会把他牵扯进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前的几年，尤其是前几个月，巴勒斯坦几乎不存在中立的势力。犹太人拼命守住犹太社区，阿拉伯人誓死保卫阿拉伯社区。在当时的形势下，圣护带领着人数不多的巴哈伊社区安然无恙地避开了危险，而且也没有人向他索要钱财以支持东方同胞们的事业（所有人都知道圣护是在这个国家出生和长大的），这些都证明圣护已经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坚持原则、有着钢铁般决心的人。

但是，圣护不受各方干扰并不意味着危险不会降临于他，或者圣道不会陷入困境。巴孛陵殿的外围有一块没有建筑的空地，就在阿拉伯人占领区的旁边，这成为了圣护最大的担忧。由于斗争的双方常常遭到狙击，成为炸弹和手榴弹的受害者，因此，对于各方而言，任何空地或者有利地形都会令他们恐惧不已。有一天，守基·阿芬第拿着望远镜观察陵殿附近的情况时，忽然发现英国士兵在我们的空地上架起了一挺机关枪，枪口正对着一条大路。守基·阿芬第大吃一惊。很显然，英国士兵发现这里是个有利地形，附近任何人发动攻击，他们都能够在此进行扫射。虽然他们后来撤走了机关枪，但这却给我们提了一个醒——稍有不慎，我们就有可能无意识地卷入派别的选择和杀戮中，从而陷入险境。

有一个犹太人常常会为我们做一些特殊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他刚刚离开陵殿，一些阿拉伯人就来调查他在哪儿。我们是一个极力反对流血杀戮，在政治斗争中完全保持中立的社团。如果这个犹太人被找到了，他很可能会被杀死，这样一来对我们的影响就太严重了。教长住宅附近经常能够听到枪声，有时甚至演变成小规模的枪战。虽然没有人朝我们开枪或者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被误伤的危险。随着恐怖活动的增多，在一些地区，包括我们这里，人们到了晚上会自觉关灯，整条街上没有一盏灯亮着。发生

激烈的战斗或者重大的恐怖活动时，白天也常常戒严，只有英国军队在四处走动，他们的巨型坦克在废弃的街道上轰鸣而过，行驶途中，他们的机关枪还常常胡乱扫射。空袭警报的尖啸是最怪异、最难听的声音，每当它在夜晚响起的时候，常常令那些本就紧绷着神经、生活在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边缘的人们毛骨悚然。

在此期间，守基·阿芬第照例每天前往卡尔迈勒山，处理自己的事务，监督花园里的工作，拜访陵殿，然后在天黑之前赶回家。我记得他只有一两次没去，因为当天实行了戒严。一天，威登女士（Mrs Weeden）开车载着守基·阿芬第前往陵殿（我们的阿拉伯司机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途中，一辆汽车突然朝着它自己前面的那辆汽车开火，前面的那辆汽车猛然间超过了守基·阿芬第的汽车，这样一来，守基·阿芬第的汽车就被夹在了两车中间，不过很快，后面那辆汽车也超了上来，继续它们的酣战。可以想象，我们后来听到这个消息时是什么感觉！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只有两种选择——离开，或者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我们选择了后者。以下的片段节选自我在1948年2月22日写下的一篇日记中，这篇日记准确地记录了我们当时的生活氛围：“我们知道巴哈欧拉会照管我们。但作为常人，我们也有焦虑的时候，比如全城发生了枪战，而挚爱的圣护还没有从陵殿回来，可是道路却封闭了，圣护只能徒步回家——我们知道，此时只能靠巴哈欧拉的保佑了……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天晚上未曾发生枪击。有时枪声甚至会断断续续地持续一整夜。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入睡，除非有炮弹炸响……”

不过，让守基·阿芬第夜不能寐的并不是这些危险，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两座神圣的陵殿。随着英国委任统治的结束，以及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战争爆发，两座陵殿面临着真正的威胁，这让圣护忧心忡忡。入侵的军队随时都有可能压到边境线，而巴吉宅邸距边境仅有十五英里，这是其中一个担忧。而另外一个担忧甚至更为严重。当时有一个饱受争议的计划曾一度被认真考虑过。按照该计划，新的犹太国家北方的边境线会将海法和阿卡分隔开，这样一来，世界中心将被一分为二，其行政中心在一个国家，而地球上的

至圣之地、信仰的吉卜利却在另外一个与之为敌、与信仰为敌的国家。

如果人们会对受到神圣指引的圣护为什么会为这些事情如此担忧感到疑惑，那么我想基于我个人的理解在此给出一个解释。在我看来，大多数的情况都会涉及三个因素：上帝的旨意，其中包括祂的仁慈、祂的全能、祂为人类所钦定的命运，最终，祂的旨意将纠正所有的谬误；偶然的成分，正如阿博都-巴哈所说，偶然是自然中所固有的；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责任。记住了这些因素，我们便会明白守基·阿芬第为何如此担忧任何有损圣道利益、影响圣道安危的事情；为何如此焦虑地思索他所面临的问题，确保找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抓住了最好的机遇，为圣道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在英国委任统治的末期以及犹太国家稳固建立的过程中，世界中心受到了奇迹般的保护，对此守基·阿芬第曾多次提及。在1949年4月25日致美国巴哈伊代表大会的电报中，守基·阿芬第列举了大家在这段时期内避开的危险和取得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他所经历的深深的焦虑和他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份电报的刊印版本中指出："在第二个七年计划的第三年中，上帝赐予世界中心和巴哈伊信仰神圣的保护迹象"是如此显著，并且继续说道："承蒙神助，肆虐圣地的漫长战争得以终结。与属于其他信仰的圣地不同，巴哈伊的圣地得到了奇迹般的护卫。我们避免了重重危险，这些危险不亚于信仰的世界中心在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和贾迈勒帕夏（Jamal Pasha）时期以及希特勒图谋占领近东时期所受到的威胁。圣地所在的这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已经建立并得到承认，这标志着其长达两千多年的省级地位的终结。这个新建国家的首相正式保证，保护巴哈伊圣地，恢复巴哈伊朝圣。政府正式邀请我们参加首届议会，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巴哈伊婚姻得到当局正式登记认可，巴哈伊捐赠也获当局免税待遇。新近当选的首相执政，我们发去贺信，首相亲笔回信，向巴哈欧拉的信仰致以美好祝愿。"

战争结束后，巴哈伊不断取得胜利，联合国——人类设计出的最强大的创造和平的工具——也出现了。因此，我们中的许多人当

然希望，并满怀憧憬地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现在便可以看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巴哈伊坚信世界将迎来黎明）。但是，清醒且受到神圣指引的圣护并不这样认为。巴哈欧拉曾经说过：“遥远的未来是十分光明的，而不久的将来却是非常黑暗的。”从战前一直到圣护生命的尽头，他总是根据巴哈欧拉的这句话做出同样的评论。

守基·阿芬第经常给全世界的巴哈伊传递鼓励的讯息，他会在其中赞扬他们为圣道所提供的卓越服务，他会详细地给出他所制定的供大家执行的计划，并不时地提出预言和告诫。他在1947年说道，在前进的道路上，巴哈伊一直以来都受到了仁慈的帮助，“在最终救赎到来之前，人类社会必然会不断受到狂风逆流的侵扰，但巴哈伊前进的方向却并没有因此而偏离……”在这封信函中，他督促美国巴哈伊社团要加紧步伐，完成第二个七年计划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此外，他还提到了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国际局势持续恶化，人类的命运之潮安静地退下……在预示凶兆的事件和灾难所带来的紧张和压力之下，当今社会的结构变得支离破碎。裂缝逐渐扩大，不同的国家、阶级、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分歧不断加剧……”我们还远未达到转过弯去，永远摆脱过往苦难的时候，“一场逐渐加深的危机”依然笼罩着我们。在1948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守基·阿芬第对此给出了进一步的阐释，此次谈话被我记录在了日记中：“今晚，守基·阿芬第跟我说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大致含义是，根据当今的形势，说战争不会再次爆发是愚蠢的；如果战争确实爆发了，说不会使用原子弹也是愚蠢的。因此我们必须相信，世界上很可能还会爆发战争，也很可能会用到原子弹，地球将遭到可怕的破坏。但是他认为，巴哈伊会站出来，构成未来世界文明的核心。他说，好人会与坏人一起消亡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巴哈欧拉向世人宣布了祂的天启之后，祂遭到了所有人的漠视和反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人都是坏人，所有人都应受到指责。守基·阿芬第说，不管是修道院的圣人还是欧洲肉欲之地的罪人，他们都是邪恶的，因为他们拒绝了真理。他说，有些巴哈伊错误地认为，善良的人会跟邪恶的人一起消亡，事实上，所有人都是邪恶

的，因为他们在今天否认了上帝，背离了上帝。他说，我们只能相信，虽然世界遭受了重创，但是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仍然会有足够的东西留下来，供人们创造未来。”

同年11月，守基·阿芬第再次鼓励美国信徒，要坚持不懈地完成他们的计划。他写道：“更为激烈的动乱正在攻击这个苦难深重的年代，而且这一威胁还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冲突的羽翼也遮蔽了国际地平线，这一冲突注定要为新秩序的诞生贡献一份显著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力量，而新秩序的诞生必定标志着初级和平的到来……更加恐怖的灾难正发出阵阵低吼，以越来越高的频率搅动着这个痛苦和混乱的世界……世界已饱受毁灭性冲突的蹂躏，如今又面临一场更为严峻的斗争，而就在此时，第二个七年计划的精神以一种更加崇高的方式得到了彰显……”同月，守基·阿芬第还指出：“不断深化的危机进一步带来了不祥的威胁，本已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人心败坏、道德沦丧、灵性泯灭的社会可能会被打乱平衡。”他接着说道，“又一场磨难的预兆已经显现，东西半球都将被它的阴影所笼罩。”“世界的前景日渐暗淡。”他督促巴哈伊，“要稳步迈向未来，人类的命运之潮正在迅速退下，要坚信当标志着其最低谷的末世灾难到来之时，恰是巴哈伊奋发有为之日，也是他们建立至伟功勋的绝佳机会。”

圣护的信写得很长，其中谈到了我们取得的胜利，以及圣护的赞扬、鼓励和喜悦，当然还有他的警告。1950年，圣护告诉巴哈伊，在“逐渐恶化的国际形势”面前，他们必须对其凶险“无所畏惧”。1951年，他通知欧洲传导大会，“灾难深重的欧洲”所面临的威胁正在“不断加剧”。1954年，守基·阿芬第写了一封至为严肃且发人深省的信。他在信中详细阐述了未来的冲突，包括它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它对美国的影响，内容丰富详实，语言铿锵有力。他把当今社会四处蔓延的“愚昧的”、“癌细胞般的物质主义”同巴哈欧拉的警告联系起来，说巴哈欧拉把这种“愚昧的”、“癌细胞般的物质主义”比作“吞噬一切的火焰”，称它们是“促成人类的悲惨苦难和震撼世界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其必然带来的后果是，城市的煎熬，恐怖活动的传播，以及人们内心恐惧的滋

生。”守基·阿芬第继续说道：“这场熊熊烈火将给世界带来一场灾难，在这场悲惨的、席卷世界的争夺中，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城市都将化为废墟。刚刚过去的世界大战让我们提前感受到了这场灾难的前奏，它标志着全球浩劫的第二阶段的到来。由于人类忘记了他们的上帝，忽视了上帝为当今时代委任的使者所发出的明确警告，所以啊，他们必定在劫难逃。”

这封包含了圣护可怕预言的信是写给美国巴哈伊的。圣护在信中指出，参与这场世界争夺的两大阵营 “都被卷入了恐惧、猜疑和仇恨的漩涡之中”，从而造成了这个“纷乱的世界”的局势不断恶化，破坏性越来越强的武器装备不断增加。上述两种后果正在日渐深刻地影响着两大阵营中的国家，如果不予以纠正的话，它们将注定“把美国拖入一场灾难之中。这场灾难的规模是难以想象的，它给美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美国人民、政府的标准和观念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是无法衡量的……美利坚民族眼下的命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而威胁它的那些灾难和困苦，有一些是可以避免的，但大多数都是必然发生的，是上帝降下的……”他接着说道，美国政府和人民仍然固守着“绝对主权的过时教条”，而那些不可避免的苦难将改变这一状况，因为“在这个四海毗邻、呼唤团结的世界中，”这一教条“显然与当今的需求相互矛盾”。通过这场苦难，美国将肃清其落伍的观念，并且“像阿博都-巴哈所预言的那样，在初级和平的建立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即将到来的“艰难困苦”不但会“把美利坚民族与其位于东西半球的兄弟民族联结在一起”，而且会为它“清除掉长期积累下来的糟粕。在连续几代的更迭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四处蔓延的物质主义、广泛传播的无神论调以及日渐沦丧的道德情操共同作用，产生了这些糟粕。正是由于它们的阻碍，到目前为止，美国远未承担起世界灵性领袖的角色。但在历经过痛苦和悲伤之后，它终将应验阿博都-巴哈无误之笔的预言，承担起这一角色。”

由于圣护长时间地与我们自身的弱点做斗争，并且长年累月不间断地辛勤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奉献，因此，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冬天，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在说起这个话题时，语气也比

以往更为强烈，不仅对信仰的未来提出了警告，而且还严格评估了东西方所有的巴哈伊没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未能以与其伟大使命相配的人数，到更远、更广的地方传道，到新开辟的疆土和全球的岛屿上传道。但是，我们还有时间和机会去传播圣道，我们要在信仰追随者的数量大幅增加的基础上，组成灵性的核心，以抵消当今人类社会中的破坏力量，为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培育土壤。我们坚信，这一新秩序一定能够从当前的混乱中崛起。

我们应当警惕，但不能慌乱。1957年8月，守基·阿芬第由秘书代笔，给欧洲的一个总灵理会发了一封信："他希望朋友们不要担心，不要对未来惶恐不安。他们应该明白，只要做好分内的工作，即实现了十年计划的目标，那么毫无疑问，上帝也会完成祂分内的工作，并赐予人们福佑。"在另一封给非洲各国灵理会的信中，圣护为巴哈伊们指明了在世界危难时期的行动方针。这封信写于此前一个月，同样由秘书代笔，信中写道："非洲乃至世界的局势持续恶化，朋友们须争分夺秒，投入到更高水平的奉献和服务中，尤其要提高灵性的意识。我们要尽可能多地救赎自己的同胞，这是我们的使命。这些同胞的内心是开明的，我们要在某些巨大的灾难来临之前完成救赎。因为在灾难之中，他们有可能会被绝望吞噬，也有可能得到净化，获得力量，并且愿意为圣道服务。不管黑暗何时降临，信徒都将如灯塔般矗立，而且信徒的数量越多越好；因此，传道是现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

守基·阿芬第之前已经指出："无论挑战多么严峻，无论任务多么繁重，无论时间多么紧迫，无论世界的前景多么暗淡，无论一个捉襟见肘的年轻社团的物质来源多么匮乏，天国尚未发掘的力量之泉总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供它尽情汲取。只要人们做好每日的工作，接受必要的牺牲，天国之泉将毫不犹豫地释放其充满能量的影响力。"太多的事情要靠我们自己来完成；一旦我们付出了至高无上的努力，我们便可以放心地将其他工作交予上帝。

我们这代人，犹如新时代之阳升起前的曙光。如果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会在当今时代面临这样的灾难，从圣护对教义的伟大阐述中，我们便可以清清楚楚地找到答案。圣护告诉我们，这其中

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包含在巴哈欧拉的话里："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很多社会深陷于各自的风俗、迷信和偏见之中，要撕去这层由来已久的保护外衣，并将各个社会纳入到一个普世的、新的存在体系之中，是一个唯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实施的手术。手术的过程必然是十分痛苦的，而且人们灵魂和心智的状态会进一步提高这种痛苦的程度。一些社会是"明目张胆的世俗主义（反宗教的直接产物）"的受害者，还有一些社会无法摆脱"公然的物质主义和种族主义"（守基·阿芬第称它们"篡夺了上帝的权利"）的桎梏。不过，所有人——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是有罪的，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拒绝承认显圣者，而祂的到来是所有宗教曾经允诺过的，唯有通过祂的信仰，所有的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而且它们也必须获得救赎。"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这个新的信仰（守基·阿芬第称之为"神圣天启之无价珍宝，它铭刻着上帝之灵，是上帝对当今全人类的旨意的化身"），世界才"正在遭受如此创痛"。巴哈欧拉本人曾说："世界的平衡在此无比伟大的新世界秩序的震撼下被打破。""突变震撼和天下大乱已迫在眉睫，而现行的制度却显得可悲的无能。""世界正备受煎熬，纷扰正日渐严重。它的脸已转向刚愎自用，转向不信上苍。世界将陷入的灾难如此严重，现在予以揭示既不适当也不合宜。世界的任性执拗将持续很久。当那命定的时刻到来时，突然的事变将使世人为之震颤。届时，唯有那时，神圣的旗帜才会招展，天堂夜莺方会妙音连连。"

不过，守基·阿芬第用美妙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未来愿景。这一愿景用强大的信心和无限的欢欣驱散了每一位巴哈伊内心的恐惧，未来的任何苦难和匮乏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摧垮他们的希望。守基·阿芬第写道："事实上，世界正在向着它的命运迈进。无论分裂势力的领袖们发出何种言论、采取何种行动，地球上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已是既成事实。"一个世界联合体"注定要从这场世界大动乱的杀戮、浩劫和创痛中崛起，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联合体的出现之时定是这些势力的恶行终结之日。初级和平将首先来到，它将由地球上的各国自行开

创，虽然此时它们尚未意识到巴哈欧拉的天启；“这一历史性重大步伐的迈出是因为人类逐渐认识到了其同一性和整体性，它包含了人类的重建，并将带来大众灵性的觉醒，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巴哈欧拉信仰的特质，承认了信仰的主张——这是所有种族、宗教、阶级和国家实现最终融合的一个必要前提，同时也标志着上帝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现。”守基·阿芬第继续说道：“到那时，所有的种族和国家都将宣布并庆祝人类一家的实现；至大和平的旗帜将被高高举起；巴哈欧拉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权将……被稳固地建立起来，并得到认可和赞颂；在万民皆属同一上帝的普世信仰中，在人们对同一个天启的忠诚中，这个星球将受到激励，……并被……称颂为人间天堂，它将能够完成其不可言喻的命运——自太古之时起，造物主的爱与智慧为它定下的命运。”

第十章　圣护的著作

在那个时代，人们均视言语为儿戏，不加甄别地来回耍弄，丝毫不尊重其中的含义和正确的用法，而守基·阿芬第的文风却以其眩目的秀美而出类拔萃。不管他用的是自己非常喜欢的英语，还是在写给东方信徒的公开信中所用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混合，字里行间的愉悦是他最强烈的个人风格之一。虽然他在个人品味方面很朴素，但在一些巴哈伊圣地的装饰安排上，在巴孛陵殿的风格上，在对建筑的喜好上，在选词造句上，他却表现出了对华美的天生喜爱。我们可以借用另一位大作家麦考利（Macaulay）的话来形容圣护，那就是“他所用的语言……精确而闪光”。和很多人不同，守基·阿芬第所写即所意，所意即所写。他的风格简明凝练，我们几乎不可能从句中删减字词而不损害其原意。像《神临记》这样的书是名副其实的精华中之精华；仅是这段一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轻易写成五十本书，而且没有一本会是肤浅空洞之作或缺乏材料，因为圣护提供的素材如此丰富，而他对素材的处理又是如此地凝练。

不管是写给西方巴哈伊还是写给东方巴哈伊，守基·阿芬第对所用的语言都有一定的标准，以保证他们不会沦为识字的文盲（不幸的是，至少在词的使用和鉴赏方面，这常常是这一代人的一个典型特点）。圣护从不因读者的无知而妥协，而是期望他们用对知识的渴望来战胜无知。他会尽可能地为自己的思想选择正确的表达途径，至于一般人是否能看懂他的用词则并不重要。毕竟，人们对于不懂的东西总是可以去探寻的。尽管圣护有着过人的语言组织能力，但他还是经常查阅韦氏大词典，确定所用词的含义，从而巩固自己的知识。我的工作常常就是给他递来字典，那真是本沉甸甸的大部头！他往往会选择一个词的第三或第四种用法，有时候这

些用法几乎已经过时，但却正好可以传达他的意思，所以就被他采用了。我记得母亲曾说过成为巴哈伊就像上大学，只不过人们永远无法完成学习，永远毕不了业。尤其在自己的文章中，守基·阿芬第为巴哈伊著作的翻译——特别是他自己的写作——设定了一套标准，这种标准教育了读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同时也用思想和真理滋养了他们的心智。

从最开始与圣护在一起一直到最后，几乎每次他用英语翻译或写作书籍、长信和电文时我都在场。这并不稀奇，他喜欢这个时候有人在房间听一听他写的内容。他的写作方法在我看来既新颖又有趣。他写作的时候会大声念出来，一边念一边写。我想这种英语写作的习惯是从波斯语来的：优美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作品不仅可以吟唱，而且也应该吟唱。有人记得巴孛在启示《盖尤穆勒-艾斯玛》（*Qayyúmu'l-Asmá'*）时，就是将它读了出来，巴哈欧拉也是这样启示祂的书简的。这就是圣护使用英语和波斯语时的习惯，而且我相信正因如此，他那长而复杂的句子被读出来时，听上去就更加流畅易懂。有的时候我会对句子的长度做些评论，这时守基·阿芬第就会抬起头看着我，他那双美妙的眼睛频繁地变换着颜色和眼神，还带着少许反驳和叛逆——但他是不会缩短句子的！我记得只有一次他沮丧地承认那的确是个长句子，但是他并没有进行修改。它准确表达了他想说的内容，糟糕的是它太长了。另外，他有时喜欢用很短的句子结构，像甩鞭子一样一句接着一句。他会让我注意文体的变化，并为我指出每种方法为何有效，以及二者的结合又如何给文章整体增光添色，并达到不同的效果。他很喜欢押头韵，这种修辞在东方语言里经常使用，在英语里却不多见。举个典型的例子，在他的一封电文里，有句话反复使用P开头的单词：“Time pressing opportunity priceless potent aid providentially promised unfailing.（时间紧迫，机遇难得，天意所许的强大援助源源不断。）”

写作时的守基·阿芬第就像一个正在工作的马赛克艺术家，后者会把图画分成色彩明晰的小片，与此类似，在圣护的作品中，每个词也都有自己的位置，如果他在打磨一个复杂的句子，他不会更弦易辙以容纳文法上不适合句子结构的思想，而是坚持原来的句

子。有时他真的会花上几个钟头，直到把问题解决，将思想融入进来，并拼接好每一片“马赛克”，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不断诵读短语，到最后我基本上已是精疲力竭。在我印象里他很少放弃某个句子而另起炉灶。有时某个词所传达的思想会被大众误用或滥用，而圣护并不会因此而放弃或避免使用这个词，而是将其合适、准确的意思用出来。他不避讳说到人们对巴哈伊信仰的“皈依”，或者称他们为“皈依者”；他称赞那些在“国外传教地区”怀着“传教热情”的拓荒者，但同时又会说明我们没有牧师或传教士，也不会劝人入教。

我记得有一次守基·阿芬第让我阅读一篇摘自某英国报纸的文章。文章提醒人们要注意官僚式的语言正在蔓延，尤以美国为甚。这种语言用词越来越多，表意却越来越少，只会使人困惑不解。守基·阿芬第完全支持这篇文章！对他来说，语言是一种十分精确的工具。我还记得有次他在西方朝圣者招待所对两个概念做了绝妙的区别，他说：“我们很正统，但绝不狂热。”

很多时候，圣护的语言达到了诗歌的高度。请看以下这些闪耀着光华的句子：“像审视一部伟大的戏剧一样，我们看到在其第一幕的情节中，英雄巴孛的身影如流星一般从设拉子的地平线上升起，从南到北地划过波斯昏暗的天空，却又悲怆地迅速陨落，消失在一团荣耀的火焰之中。我们看见了祂的卫星，那是一个由醉心于上帝的英雄组成的星系，他们从同样的地平线升起，放射出同样炽热的光芒，也以同样的速度燃尽了自我，以此为上帝新生信仰日渐强劲的势头增添动力。”他称巴孛为“年轻的荣耀之王子”，对巴孛遗体在卡尔迈勒山下葬的情景他有着这样的描写：“大功告成，设拉子殉道先知的肉身遗体经过诸多周折后终于安全地放置到上帝圣山的怀抱中，得以永久安息，此时此刻，阿博都-巴哈取下头巾，脱去鞋子和长袍，在尚未封闭的石棺前俯身下拜。祂的一头银发随风飘逸，神情激动，容光焕发。祂将额首置于木棺边沿，声泪俱下，在场者无不随之落泪。”“第二个时期……从威严的巴哈欧拉那里得到了启迪，祂的神圣至高无上，祂的力量和能力令人惊叹，祂的荣耀光芒万丈，无可企及。”“当身边的阴影越积越重时，

我们能依稀看见巴哈欧拉天国的威权之光时断时续地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还有他写给至大圣叶的话语：“阿卜哈天国高贵的圣叶啊，在心灵的至深处，我们为您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府邸，时间的力量永远无法将其摧垮；我们为您建造了一座神龛，其上永远印刻着您举世无双的美丽容颜；我们还为您建造了一座圣坛，上面永世燃烧着您爱的炙热火焰。”他用下面的话描绘了一幅上帝现世惩戒的图画：“惊涛之上，苍穹之中，大地之表，战端之前线，庙堂乡野之内，至神至圣之地，世俗膜拜之所，无一处不彰显上帝惩治之严苛，训诫之高深。死难者日夜递增——不论王子庶民，不论巾帼须眉，不论垂髫黄发，于此浩劫之内，皆不得幸免。”下面这段文字则说到了圣道真正的仆人所应持有的态度：“这些英雄儿女可谓‘把他乡作故土，把故土作他乡’，因为他们……是巴哈欧拉之王国的公民。尽管他们愿意尽情分享尘世生命赋予的世俗裨益和短暂快乐，尽管他们热切地参与到任何可以使此世生命变得充实、幸福、祥和的活动中，但他们时刻不忘这段生命不过是存在中的转瞬一刻，生活在此世的人也不过是朝圣远行之人，他们的目标是天国之城，他们的家园是欢乐与光明永存的国度。”

在用英文叙述巴哈欧拉的地位时，守基·阿芬第选择了宝石般的华丽辞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他的描写功力。以下表述均摘自圣护的著作，尽管出处不同，但是放在一起却体现出非凡的广度和力量：“永恒之父，万军之主，至大圣名，永存之瑰宝，至伟圣光，至大圣洋，至高天堂，原初圣根，宇宙之启明星，圣判者，神法制订者，全人类之救赎者，全星球之组织者，人类子民之统一者，长久期盼之千年的开创者，新世界秩序之创造者，至大和平之建立者，至大正义之源泉，人类一家的时代到来的宣布者，世界文明的启迪者和创建者。”在翻译阿博都-巴哈的头衔时，守基·阿芬第的用词也同样体现出了超凡的造诣：“人类大同之主发条”，“至大和平之舰旗”，“上帝律法之臂”。

当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的追随者挺身执行祂的神圣计划时，守基·阿芬第称他们正在“为整个地球束上荣耀之带”，并前去“将新的胜利印在他们的盾牌之上”。在1956年写给巴哈伊世界的一封

里兹万文告中，他用独有的华丽语言激励巴哈欧拉的追随者：“穿上祂爱的甲胄，扣紧祂强大的圣约之盾，跨上忠诚的骏马，高举万军之主的圣言之矛。征途中，对祂的允诺的坚定信念便是最好的食粮；让他们把脸朝向那尚未探索之地，向着尚未企及的目标迈进，坚信那曾经带领他们实现辉煌胜利的祂，引导他们在祂的王国中取得荣耀奖章的祂，会继续帮助他们强化自己与生俱来的灵性权利，其程度乃是有限的心智想象不出的，是人类的心灵无法领悟的。”

守基·阿芬第的文学生命是丰富多彩的。我能轻松列出与他在一起的二十年里，他用来消遣的书（不包括他心爱的作家吉本），尽管他年轻时曾广泛涉猎各类书籍。这点毋庸置疑，因为到1937年，当我在海法开始了新的生活时，日益增多的工作方面的材料已经令他应接不暇，包括简讯、总灵理会的会议记录、通告以及邮件等。在他晚年，他每天至少要花两三个小时阅读各类材料，否则就跟不上工作的步伐。飞机上、火车中、花园里都是他阅读的地方。当我们离开海法时，他会在餐桌上阅读，当我们就在海法时，他会连续好几个钟头在书桌前伏案阅读，等到精疲力竭时，他便坐靠在床上继续阅读。他专注于政治新闻和世界大势，《泰晤士报》、《耶路撒冷邮报》以及一些著名的欧洲的日报，如《日内瓦日报》和《纽约先驱导报》巴黎版，都是他经常读的报纸。战前他订阅了一份叫《十九世纪》的英文杂志，其中有很多评论时事的文章；我就见他读过这份杂志，但由于其水准在战后出现了下降，后来圣护也就不再阅读了。他常常说“剔除”一词；他会剔除无关紧要的东西，跳过次要事件，推开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枝节。他常常用这种“剔除”的方式来读报。他对《泰晤士报》哪一页上有他想看的内容了如指掌——领导人消息，世界新闻，当然最重要的算是社论。他会先快速浏览一遍这些内容，接着把它们撕下来细细品读，然后把余下的扔掉，即他所谓的“剔除”！对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一方面，这当然是为了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极度疲惫的大脑为了卸去额外的负担而做的思考。多一片纸也是多一份负担。我很难读到几份完整的报纸，读到的基本上只有圣护递过来的长纸条，他会对我说：“读读这个，很有意思。”上面的内容多半是跟

众议院的辩论有关，要么就是涉及政治形势、当前的经济和社会趋势以及宗教事务等方面的精炼文章。我总是将这团皱巴巴的纸塞进钱包或口袋里面，过段时间找个空闲去读它们。

圣护的写作方式很有意思：他不喜欢大尺寸纸张，他撰写书本和长篇通讯的时候都用小尺寸带横线的便签纸。所有的文章都是手写；如果第一遍草稿有过多的更改，他就会再誊写一份。在一台十分小巧的便携式打字机上，他用双指打字法打印出全部的手稿，同时进一步修改。所以，他能写出如此精雕细琢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用波斯语写作的时候，守基·阿芬第会先清晰地亲手写下原件，接着让秘书工整地抄写一份，然后他再将这份副本发往德黑兰。我总是饶有兴致地留意他是如何在成为圣护后将英语练得得心应手的，他的英文总是富有力度、面面俱到且容易理解。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波斯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都有很多种书法形式，他的风格是“纳斯塔利克体”的变体，令人赏心悦目，其结构新颖，独有一种优雅和力道。要知道书法是伊斯兰国家平面造型艺术的最高形式，一手好字是有教养的人最优秀的特点。巴孛、巴哈欧拉以及阿博都-巴哈的书法水平都很高，而守基·阿芬第的书法同样也无愧于他的声望。

不过，他并没有在这方面过于讲究。我写给各国灵理会的信件有很多页，有时会很长，在翻阅时，他会在空白处划上一些“X”、“XX”，甚至“XXX”之类的符号，好让我补上遗漏的词或意思。然后他会在秘书的结尾处写上附言，常常会填满每页纸的空白。我的意思是，就算一封要紧的英文信件里满篇都是改正过的错误，他也不会因此而心烦意乱，只要观点表述出来并且清楚明了就行。

阿博都-巴哈在遗嘱指定，守基·阿芬第是圣作唯一的、权威的阐释者，由于这一职责，圣护进行了大量的英文翻译，写作了大量的通讯，而这些作品的至高重要性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波斯文的语句结构较为松散，很多时候会在读者的头脑中产生歧义。而细致准确的英语首先就不会产生歧义，当它与守基·阿芬第卓越的心智和阐释圣言的能力结合后，便成了一种精准的传达教义的工具。

在参考了守基·阿芬第的英文翻译后，我们往往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巴孛、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原意，将来也不会有所误读。他在翻译时一丝不苟，确保所用英语能完美地表达原有思想或原文词意，而没有任何偏差。对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较为精通的人才能充分理解他所做的工作。比如，阿拉伯语原文中有一个词可以翻成英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以“能力”、“威力”和“力量”为例，守基·阿芬第在组织英语译文时会用它们依次替换原词，根据其间的细微差别选择最为合适的一个；这样就避免了重复使用，既让译文增色，又不失其真意，实际上，这样反而能强化真正的意思。他常说阿拉伯语的同义词通常就是一个意思，而英语的同义词则总是有着细微的差别，能把思想表达得更精确。他还说，巴哈欧拉的一些极为神秘、充满诗意的作品根本无法翻译，因为译文会变得太像外国话、太过华丽，其原有的美丽和意义会消失殆尽，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有一次（在我们忙碌、疲惫的一生中，仅此一次），守基·阿芬第对我说，我现在掌握的波斯语已经足够理解原文，然后他给我念了一段巴哈欧拉的书简，问道：“这怎么可能翻成英文呢？”我们尝试了两个小时，所谓尝试，实际上是他在尝试，而我勉强地跟着他的思路。当我建议某句话可以如何表达时（我给的句子其实传达出了原来的意思），守基·阿芬第就说：“呃，但这就不是翻译了！你不能篡改意义，删减原文，而只是用英语表达出了你个人的理解。”他指出，译者必须完全忠实于原文，即便这意味着译文会显得丑陋或者难以理解。巴哈欧拉的语言总有一种超群的美，所以这段文字根本就翻译不出来。最后他放弃了努力，说这不可能翻译成合适的英文，而这段文字还远不能算巴哈欧拉最高深、神秘的著作。

据我所知，守基·阿芬第仅有一次对原文的意思做了轻微的修改，就是在他翻译教长遗嘱的时候，当时教长刚刚去世。所涉及的原文是关于世界正义院的，内容为：“上帝圣道之圣护是其神圣领袖，他终生都是这个机构的卓越成员。”守基·阿芬第说他将原文中的“必不可缺”一词改成了较为温和的“终生……成员”的表达。在表述他与世界正义院的关系时，他采用了这样一种低调的说

法，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他深深的谦卑了。

圣护对一切与圣言原文有关的事情都非常谨慎。在与原文核对之前，他从不对拿给他的英文译文做出解释或评论（如果不是他本人所译的话）。在对信仰中的各种事件做出评论时，他会对用词十分小心，比如，他不会因为某人被杀害便认定他为殉道者（这是一种地位），而有时，那些并非死于杀戮的人却会被他认定为殉道者，因为在他看来，他们的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殉道。

教义的阐释者是上帝赋予守基·阿芬第的神圣职责。这份职责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不仅要保护圣言不被误解，还要小心地维护教义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重要性，保护信仰的三位中心人物的正当地位。我们可以在A. L. M. 尼古拉（A. L. M. Nicolas）的一封信中找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尼古拉是一位法国学者，是他将巴孛的《巴扬经》翻译成了法语。也许称他为巴比信徒会更为准确，在他多年来的印象里，巴哈伊忽视了巴孛的重要性，贬低了祂的地位。实际上，守基·阿芬第的作品里充满了对巴孛的赞美之词。通过像《纳比勒手记》（*Nabil's Narrative*）这样的书，圣护永远地封存下了人们对巴孛的记忆，而且他还不断将巴孛的圣言译成英文。当尼古拉发现这一点后，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给一名年长的法国信徒写信说："现在我可以平静地死去了……荣耀属于守基·阿芬第，是他抚慰了我的痛苦和忧愁，荣耀属于他，是他让我认识到了被称为巴孛的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的价值。我感到心满意足，我愿亲吻您的手，是您将守基的信息寄到我的家中的，谢谢您，夫人，我衷心地感谢您。"

守基·阿芬第对自己作品的处理非常豁达，也很实事求是。多年以来，他一直将自己的翻译和手稿寄给乔治·汤曾德（George Townshend），此人英语方面的知识和对英文的掌握令圣护十分钦佩。在一封写给他的信中，守基·阿芬第写道："您对我提出的建议十分宝贵、详尽且慎重，对此我深为感激……"霍勒斯·霍利为许多守基·阿芬第写给西方的公开信加了标题，并且在正文中插入了一些副标题，用的是圣护的文字中最能概括主旨的词句。这样可以让他的信更加易于阅读，方便一般美国信徒的理解，守基·阿芬

第也就没有意见了。霍勒斯本人就是一位作家，他为圣护的通讯加的标题不仅使其更明确，同时还增强了效果，抓住了想象力。

在守基·阿芬第的使命周期中，他最早的工作之一就是让他的圣文译文传播开来。在阿博都-巴哈的遗嘱宣读一年零十天后，圣护致信美国灵理会，其中写道："挚爱的教长留给了我们诸多祷文和书简，能和你们分享这些译文是我莫大的荣幸……"他继而补充道，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定期给你们寄来准确、可靠的译文……这些译文会为你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野，让你们重新认识祂荣耀的使命……让你们对祂神圣教义的特质和意义有深入的了解。"在他写给各国的早期信件中，他总是会附上某篇译文，寄给巴哈伊们。在上面这封信发出一个月后，他在另一封寄给美国的信里写道："随函附上巴哈欧拉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隐言经》的修订译文，希望将来能给你们带来更多巴哈欧拉的圣言和教义。"同年4月27日，守基·阿芬第再次致信美国总灵理会，信中写道："同时附上我翻译的若干《亚格达斯经》中的片段，朋友们之间可任意互相传阅。"同年11月，他又写信给该灵理会，说他发来一份"音译的东方术语……相信教友不会被这份严守权威但却有任意符号的东方术语的拼写方法弄得精疲力竭，失去耐心。"毫无疑问，音译是让人心烦的，而且常常让人困惑，不过一般人都没有意识到，通过音译，文字得到了精确的传达，熟知该体系的人会立刻知道原文是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中重组这个词。对信仰的学者和批评家而言，这种准确性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这也消除了同一个词多种多样、令人困惑的拼法。

有趣的是，在上述引文中，守基·阿芬第多多少少是按发音来拼写"亚格达斯经"的，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引入后来采用的音译体系。关于这部至圣经书还要补充一点：尽管这是巴哈欧拉的律法之源，但它却是很小的一本书，主要包含的都是其他一些主题。在守基·阿芬第去世前，他已经基本上将这部经书翻译成了卓越的英文，并传给了西方的巴哈伊，译文包括书中的大部分篇章，以及他觉得适用于居住在非巴哈伊社会的信徒的全部律法。他不仅翻译、传发了很多摘自教义的篇章，还要确保信徒不会因为过于热情和缺

乏远见，而在编辑和印刷巴哈伊文集时做出过激的行为。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些关于印一本综合祈祷书的想法，圣护对此的答复如下：“我同意他的意见，但分类不可逾越巴哈欧拉的指示，否则我们就会落入严法峻令之中。”

巴哈伊文学的创作、翻译和推广都是圣护关注的重点，对此他从不厌倦，总是全力支持。最理想的状况是地方和国家的社团能为自己的活动提供资金，但圣护深知，在信仰形成时期，这种情况并不一定能实现，因此，多年来，他一直用可供自己支配的资金来大力支持巴哈伊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当形势紧张而且宝贵目标的实现面临困难时，守基·阿芬第便会挺身而出；他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筹集了两千多英镑，资助印度总灵理会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在启动“十年远征计划”的美国洲际大会刚刚结束时，守基·阿芬第就致电美国总灵理会：“望速出版美洲各语种的宣传册。”两天后他给欧洲传导委员会发去了同样的电报，只是换成了“欧洲各语种”。相似的电报也发到了印度和英国。他向英国保证他会资助一千英镑。从使命周期的第一天开始，圣护就时刻关注着各语种巴哈伊文献的传播，在担任圣护的三十六年里，他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大多数的翻译工作。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举个典型的例子，守基·阿芬第曾写信给一个名叫波尔的人（当时正在波兰学习教义），告诉对方他寄来了罗马尼亚王后玛丽的关于信仰的文章，看能不能帮他翻译成波兰语，再寄回来。此事发生在1926年，但是同样的热情和坚持始终贯穿于他在这个领域的工作之中，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在守基·阿芬第初任圣护时，世界语正在迅速发展，尤其在欧洲。因此，他非常鼓励发行一份巴哈伊的世界语公报，并给予此事极大的关注。他向公报的编辑解释说，他对此很感兴趣，因为“目前的形势让研究一种国际语言成为可能，我非常渴望推进巴哈伊世界在这方面的工作”。

圣护在海法收集了各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他把这些书籍放在了自己的图书馆里，放在了朝圣者招待所的两座图书馆里，还放在了巴哈欧拉在巴吉的宅邸以及国际文物馆里。说起来，他放置图书

的方法很有意思，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许多书本都是那种低廉的版本，装帧黯淡，封面有的是灰色，还有更多的是蓝色或其他颜色。圣护会按照一种样式把它们装上书架，五本红色，两本蓝色，五本红色，如此往复，依靠颜色和数量的变化来为书架的整体效果增色，否则看上去就显得单调无趣。

1931年，守基·阿芬第给玛莎·鲁特写信说“我的房间里现在有七份打印出来的译文”（指的是埃斯尔蒙特博士的教材），并督促她继续坚定地翻译。圣护说道：“若能给最终的出版提供帮助，我将十分欣喜。”一年后，他给身在缅甸的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寄去了一封信，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新的出版物让他十分满意。信上写道：“附上九镑，以便尽快完成缅甸语书籍的出版。已经有十六种译本被收集在了巴吉的巴哈欧拉宅邸，另外十六种语言的版本正在翻译，包括缅甸语。”到1935年，他已能告诉这位朋友：“该书在整个巴哈伊世界已经发行了三十一个版本。”

从守基·阿芬第的记录来看，他发过的电报不计其数。他曾致电伦敦的阿斯加尔扎德（Asgarzadeh）：“敬请电复俄语版埃斯尔蒙特图书最低印刷成本。”他明显是收到了对方的答复，因为他此后又发去一封电报，电报中写道：“寄去四十镑，感觉够印五百本。俄语稿第一部分今日已寄出，其他尽快寄出。对你的合作和持续服务深表感激。”圣护还给上海的乌斯库利（Ouskouli）发过电报，其中写道：“电复埃斯尔蒙特（Esslemont）图书出版日期。寄五十本。致爱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守基·阿芬第会不时地对工作的某些方面进行评估，看看是否需要即刻采取有力行动。举个例子，1932年的一天，圣护先后将四封电报发给欧洲的玛莎·鲁特以及美国、新西兰和缅甸方面，电报的内容分别是：“须速将埃斯尔蒙特的书译成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希腊诸语，此为欧洲集中传导活动的第一步。急切期盼提供资金支持，等待估价。致爱意。”“急盼埃斯尔蒙特图书速译盲文。电复。致爱意。”“告B君确保埃斯尔蒙特图书速译毛利语。”“敦促速将埃斯尔蒙特的书译成缅甸语。致爱意。”各个项目的进展缓慢让他有些失去耐心，因此当年晚些时候他又发去电报，电报中写道：“法语埃斯尔蒙特是

否出版，电告。”“急盼库尔德语埃斯尔蒙特图书。”

守基·阿芬第十分鼓励各位巴哈伊写下对信仰的感想。1927年，他曾给英国的一位品钦小姐发去电报，其中写道：“您的书内容可赞，文笔优美。望速出版，寄十九镑。”1926年，他致电霍勒斯·霍利：“敬请寄我一百本书。致深爱。”守基·阿芬第不仅为巴哈伊书籍的出版提供资助，还经常订购这些书籍。他曾致电美国方面道：“敬请速寄若干埃斯尔蒙特图书的最便宜版本，价值在五十美元之内。寄去支票。”

除非角度正确、解读深刻，否则事实和事件就或多或少地变得没有价值。守基·阿芬第最卓著的才华之一就是他能从一堆与圣道无关的纷繁乱象中，发现某一事件或某个独立现象的意义，将其放在一个历史维度内，并对其进行评估，让我们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它在当前和未来的意义。这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不是一幅图画，而是对一头正在大洋里移动的庞然大物的描述——巴哈欧拉追随者的社团在祂的天启之洋中协调运动。一届灵理会的成立，一个人的去世，某个不起眼的政府机构通过的证书，就其本身而言，它们都是独立的事件，但是在守基·阿芬第的眼里，它们却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而且他让我们看清了这种模式的来龙去脉。圣护经常通过在《巴哈伊世界》中撰文来达到这种效果，这不仅是为信徒，而是为全体大众。他升华了信仰的发展过程，用大量分散的事件和毫无联系的照片来证明信仰的国际性和包容性。

有趣的是，有一期《巴哈伊世界》中的一些建议实际上是霍勒斯·霍利给守基·阿芬第的。他曾在1924年2月致信圣护，提到了这些建议。当然，我毫不怀疑，正是年轻圣护的宽广视野，正是他通过给西方的信件给圣道的工作定好的框架，对霍勒斯的创造思维起了作用，促使他想到了这个概念。守基·阿芬第充分利用了此事。从此霍勒斯成了守基·阿芬第的得力助手，他贡献出了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天赋，充分利用了身为美国总灵理会秘书的便利，而且他将《巴哈伊世界》打造成一部非凡而独特的刊物。《巴哈伊世界》的第一期于1925年出版，被称为《巴哈伊年鉴》，记述了1925年4月至1926年4月之间的情况，共有一百七十四页。自第二期起，《巴哈

伊世界——双年度国际纪事》被确定为永久标题。关于标题的建议由美国总灵理会倡议，并得到了守基·阿芬第的首肯。在圣护的一生中，该刊物一共出版了十二期，最长的一期超过一千页。尽管它们是由美国总灵理会指导，由其下的出版委员会出版，由若干编辑编纂，献给守基·阿芬第的，但称呼它们为守基·阿芬第之书更符合事实。他自己担任了主编，在出版前，每卷书所用的大量材料和照片都要由美国灵理会送到他手上，他要最终决定哪些可以保留，哪些需要去除。这其中有六期在我与他在一起时完成的，因此我看到了他是如何进行编辑的。守基·阿芬第有用不完的能量，他会纵览大堆的文件和照片，剔除质量较差、关联较小的材料，然后会准备好目录（由他亲自排好）后的各个部分，并将其放到一边，直到全部的稿件都可以寄回美国准备出版。他总是批评材料的质量不高。正是由于他的决心和意志，《巴哈伊世界》才成为了一份卓越而令人难忘的刊物。那些编辑们（有些是圣护亲自提名的）要和阻挠所有人取得成功的惯性做斗争，要与千里之外的人通信，还要和没有经验、效率较低的教务管理部门打交道，若不是有圣护的推动和权威，他们根本不能收集到所需的材料。这项工作中还有一个有趣之处，书出版后，守基·阿芬第让人把所有的原始稿件寄回了海法，保存在世界中心。

每一期出版之后，圣护便立刻开始收集下一期的材料。除了反复提醒美国总灵理会也要着手准备之外，他还给不同的灵理会和个人发了不计其数的信和电报。例如，他曾在同一天给三个总灵理会发去电报，其中写道：“用于《巴哈伊世界》的总灵理会照片至关重要。”他还给上海这样一个孤立、遥远的前方发过电报，索要资料。像“《巴哈伊世界》手稿已寄出。望迅速、慎重出版”这样的电报美国灵理会也经常收到。守基·阿芬第会定好每一期内容的顺序，他在海法把整个目录打印好，给所有图片配上标题，选好所有的卷首插图，确定封面的颜色，最重要的是，他还会通过详细的长信把精确的指示发给霍勒斯·霍利，霍勒斯·霍利作为最有天赋、最见多识广的人，被他选来撰写《当前巴哈伊活动的国际调查》，圣护给予了此事极大的重视。他曾给霍勒斯发过电报说：“为《国

际调查》寄去内容详实的信件，相信你会对收集的信息有巧妙的处理。”以下片段摘自守基·阿芬第的秘书写给霍勒斯的信（但我基本确信是由圣护口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圣护在涉及这项工作时所写的信件是多么面面俱到、费尽心思。信中写道：“守基·阿芬第对这份材料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更改和安排，用他收集到的新素材充实了原文，整理出了最终的形式，并将于本月底之前把所有手稿寄给您……他花了大量时间检查和安排琐细之处，觉得这是一份严格而艰巨的工作……他强调，务必严守他所制定的顺序安排。他希望不要像前一期那样再发生位置错排的情况。”

守基·阿芬第还把他对《巴哈伊世界》的所思所想付诸笔端。早在1927年，当第一期出版时，他曾写信给一名非巴哈伊人士，信中写道：“我强烈建议您看一下《巴哈伊年鉴》……它清晰、权威地阐述了信仰的意图、主张和影响。” 他在1928年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其内容紧扣《巴哈伊世界》这个主题：“致东西方主所挚爱之人、慈悲者的仆人……自创刊之时，我就对它的发展给予了强烈而持续的关注，而且我本人也参与了搜集材料、编排内容、数据勘误等工作。我满怀信心地向东西方所有富有思想、满腔热情的信徒力荐此刊……”他写道，该刊的材料可读性强、引人入胜、信息全面且有权威，它对圣道之基本原则的解释简明扼要而令人信服，其例证极富代表性，其他同类的巴哈伊出版物难以与其相媲美。守基·阿芬第一直认为，这份读物既适合大众、也适合学者（实际上，这也是他有意为之的设计），可以放进图书馆里，用他的话说，“长久以来巴哈欧拉光明的信仰严重受困于那些恶毒的歪曲和不幸的误解”，而这份刊物是一个可以“使之烟消云散”的工具。

他把这本刊物当成礼品，送给皇室成员、政治家、教授、大学、报刊编辑和非巴哈伊人士，送出去的时候，同时附上他那简单的名片“守基·拉巴尼”。一位美国教授的回复清楚地传达了这份礼物留给他的印象：“我收到了两本《巴哈伊世界》……这份读物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有趣和启迪人心的，能研读此刊令我感激不尽。我对您，尤其是对您在文学上的贡献表示祝贺，对您为保存您所领导下不同群体的整体风貌所做的工作表示祝贺。”但是，对这

份凝结守基·阿芬第多年心血的出版物最高献礼来自一位高贵的王后，她专门为信仰写了颂词，并同意这些文字和她的相片可以作为卷首插图，出现在各期《巴哈伊世界》中。1931年，守基·阿芬第从玛莎·鲁特那里收到了玛丽王后专门撰写的颂词，他在回信时说道："您在信中附上了一份珍贵的鉴赏性文章，在新一期的《巴哈伊世界》中，它将是一份富有价值、举足轻重的稿件，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我在收到这封信时的愉悦之情。"

在回顾守基·阿芬第的成就时，很难想象属于他的作品只有一部，这就是1944年出版的《神临记》。即使是写于1941年的《应许之日来临》也不过是一部一百三十六页的书信集，其中都是写给西方巴哈伊的公开信。圣护谦逊的品格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之所以与巴哈伊有信件往来，是因为他被指派来引导他们，是因为他是巴哈欧拉信仰的守护者；他受到了某种比他更强大的力量的驱使，而对这种力量他自己并不能控制。一系列长度不等的信不间断地从他那里寄给西方的巴哈伊以及各国的灵理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质不同的公开信，有的是写给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的，有的是写给西方的巴哈伊的，这些信被收集起来，编成一册，名为《巴哈欧拉之世界秩序》（*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巴哈欧拉之世界秩序》和《再思巴哈欧拉之世界秩序》（*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Further Considerations*）分别作于1929年和1930年，用来向信徒阐明信仰的真正意义和目的以及信仰的教义、内涵、命运和未来，此外，北美和西方的社区正在不断展现并慢慢成熟，这两部著作可以指导它们更好地理解其义务、权利和命运。随后的1931年，圣护写了一封题为《新世界秩序之目标》（*The Goal of a New World Order*）的信，这封信以一种新的、成熟而肯定的口吻，超越了一般领域里写给同事的书信，开始反映出一个伟大领袖和杰出作家所具有的非凡的思想阐述能力。1932年1月，一封由圣护的秘书代笔的信件中说道（显然谈的是《新世界秩序之目标》）："守基·阿芬第意识到，公众应该了解巴哈伊信仰对广泛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所持的态度，所以才写了上一封致西方朋友的公开信。我们应该让全世界知道巴哈欧拉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守基·阿芬第将

这封信和阿博都-巴哈去世十周年联系了起来，并在其中详述了世界的现状，认为必须根据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的教义，对其组成部分做出改变。

《巴哈欧拉圣道之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the Cause of Bahá'u'lláh*）于1932年出版，对信仰的神性做了精湛的阐释，守基·阿芬第写道，其神性从“隐藏的上天力量之泉”中汲取着营养。他再一次澄清了这个天启周期同过去各周期的关系，以及本周期与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的关系。1933年，他把《美洲与至大和平》（*America and the Most Great Peace*）送到了北美的巴哈伊手中。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上帝赋予美洲的现世责任，回顾了教长在西方的服务和自我牺牲之旅，简要重述了这片深受眷顾的社区已经为信仰赢得的胜利。1934年，意义非凡的专著《巴哈欧拉的天启》（*The Dispensation of Bahá'u'lláh*）问世，它像一道刺目的闪电从巴哈伊眼前划过。我记得第一次阅读此文的时候，我有种极为奇妙的感觉，好像身边的整个宇宙突然膨胀，广阔无垠的闪亮星空出现在了我们眼前，我的知识的维度向外扩张，圣道的荣耀及其中心人物的真正地位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脱胎换骨。有人相信，圣护的这封信可谓振聋发聩，它能永远地消除灵魂的懦弱！不管守基·阿芬第内心中对自己的其他著作有什么看法，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已经在这篇《天启》畅所欲言了。

1936年，守基·阿芬第完成了《世界文明的展现》（*The Unfolding of World Civilization*）一文，如先前一样，他将该文和阿博都-巴哈的去世联系起来。这篇文章进一步地阐述了世界的形势，政治、道德和精神的明显退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日益式微，人类的放纵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巴哈欧拉的教义为我们带来的强大、神圣、充满希望的药方。圣护的这些美妙的信件意义重大，且教育性很强。他巧妙地翻译并在信中援引了巴哈欧拉本人的许多话语，为信徒提供了灵性的营养，因为我们知道显圣者的圣言正是灵魂的食粮。这些信件也大量引用了教长书简中的文字，其优美的译文同样亦是出自圣护之手。在这一道道盛筵中，圣护用他带给信徒的丰盛惠赐滋养了他们，为信仰培育起了新一代的忠实仆人。他的文字点

燃了信徒的想象力，通过不断的挑战带领他们达到新的高度，并让他们的根基在圣道肥沃的土壤里扎得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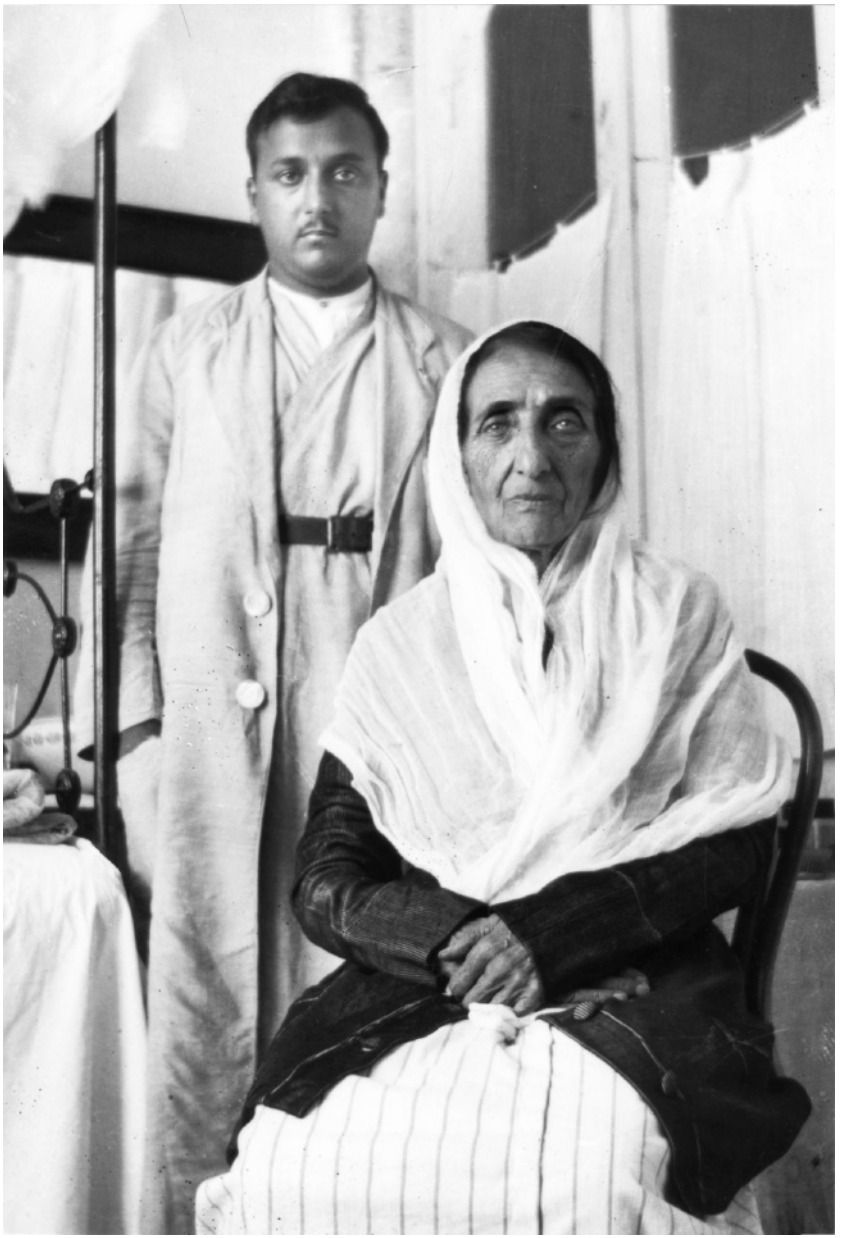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看到，守基·阿芬第的写作风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变化。以笔做刀枪的圣护现在巍然矗立，以巨人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以前人们还能从他的文字中捕捉到一丝不同，这与教长升天以及他担任圣护后所经历的灵魂上的痛苦十分相似，是一种因想念离去的挚爱之人而发出的呼号；而现在，他的语气发生了变化，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力量的人在讲话。这个战士现在知道了什么是战争。他曾被那些居心不良、刚愎自用的敌人打击过、骚扰过、伤害过。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柔弱且容易轻信他人的年轻人了。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他对巴哈伊世界下达的指示上，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东西方的教务管理风格上，也不仅仅体现在他将迥异多样的教区融为一个整体的方法上，更体现在他优美而自信的文风上，当岁月逝去，他的文风日渐闪光。

守基·阿芬第笔耕不辍，就这类重大主题写出了首批发人深省的信件，而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两本书的翻译工作。在一封写于1930年7月4日的信中，守基·阿芬第说："过去一年的艰辛工作让我感到尤为疲倦，特别是我又增加了《伊甘经》（*Kitáb-i-Íqán*）的翻译工作。我已经将译文寄到了美国。"这部经书是他的第一部主要译作，其内容是巴哈欧拉关于上帝显示者的角色和地位的阐释，主要是根据伊斯兰教义和预言来分析这些问题的，被称作《伊甘经》或《笃信经》（*Book of Certitude*）。对西方巴哈伊而言，该书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信仰研究参考书，可以深刻地丰富他们对神圣启示的理解。

同一年，圣护开始翻译于此期间出版的第二本著作。这本书既不是译自巴哈欧拉的圣言，也不是守基·阿芬第的一封公开信，但它必须被视为一部文学巨著，对读者而言，它永远都是一份至为珍贵的礼物。这本书是一位名叫纳比勒的人所编纂的纪事，他是巴孛和巴哈欧拉同时代的追随者。圣护翻译的是该书的第一部分。译作于1932年出版，书名叫《破晓群英传》。如果说批评家和怀疑者还容易认为巴哈伊文学是浅显的宗教读物，仅适于新人阅读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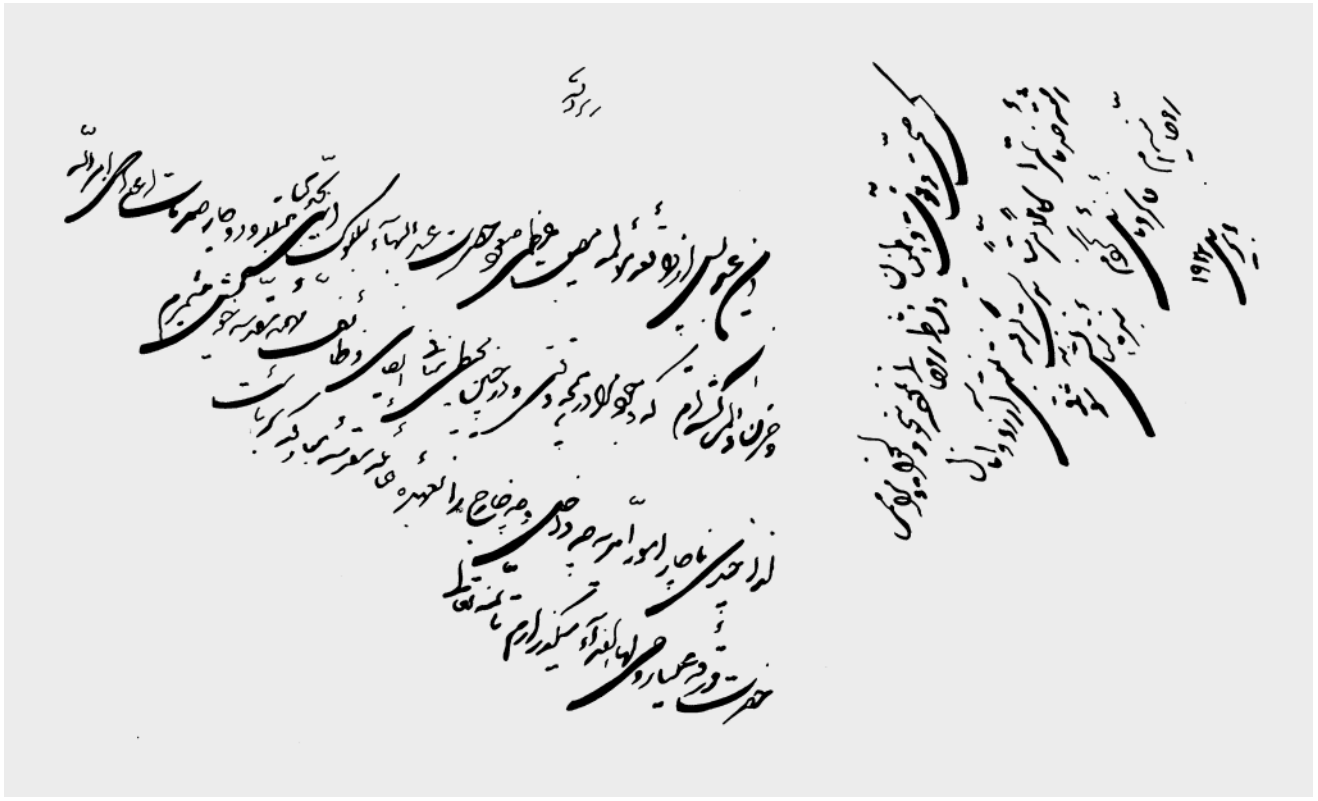
图三十七　初任圣护（1921年）

守基·阿芬第成为了巴哈伊信仰的圣护。拍摄于教长海法家中的花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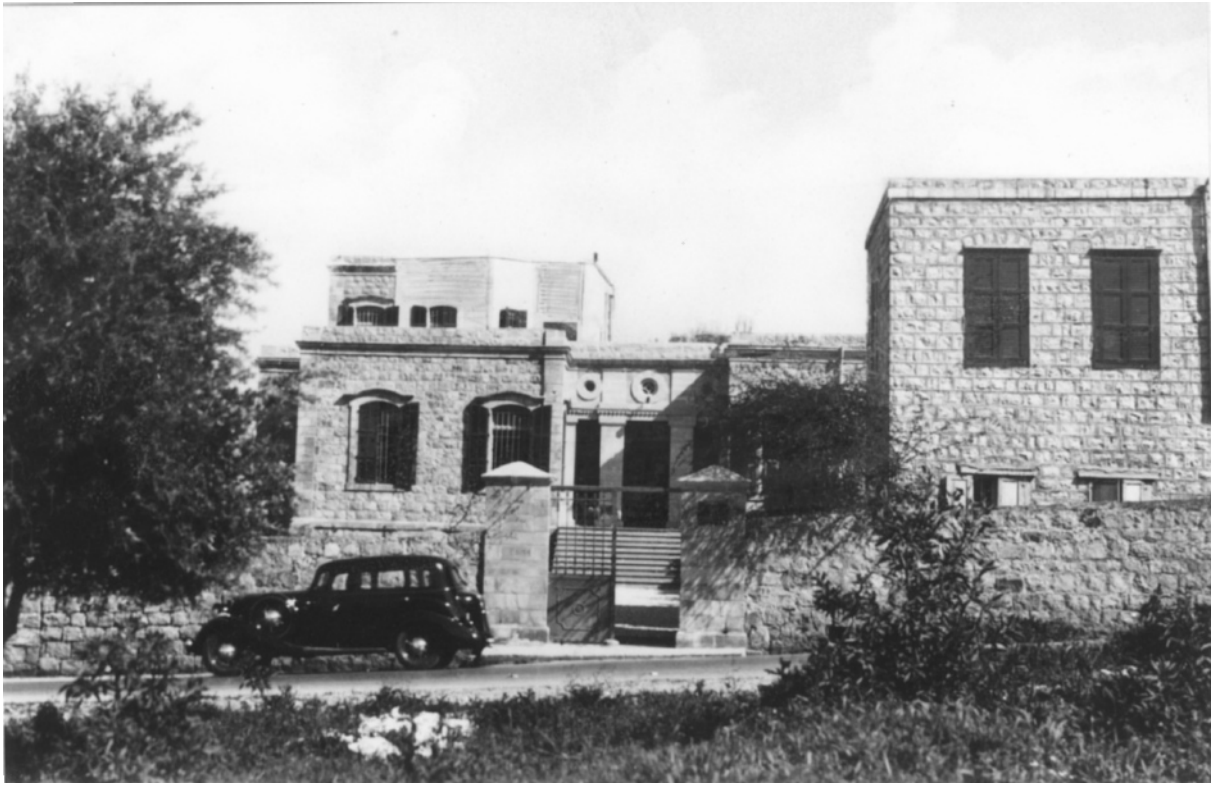
图三十八　圣护与巴希叶·哈努姆

很可能拍摄于1919年，在守基·阿芬第前往英格兰学习之前。



图三十九　圣护的波斯文手迹

在一封写给《西方之星》的信中，守基·阿芬第告诉巴哈伊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把圣道在国内外的事务都交由……至大圣叶主持，这是我当下唯一能做的。”信大约写于1922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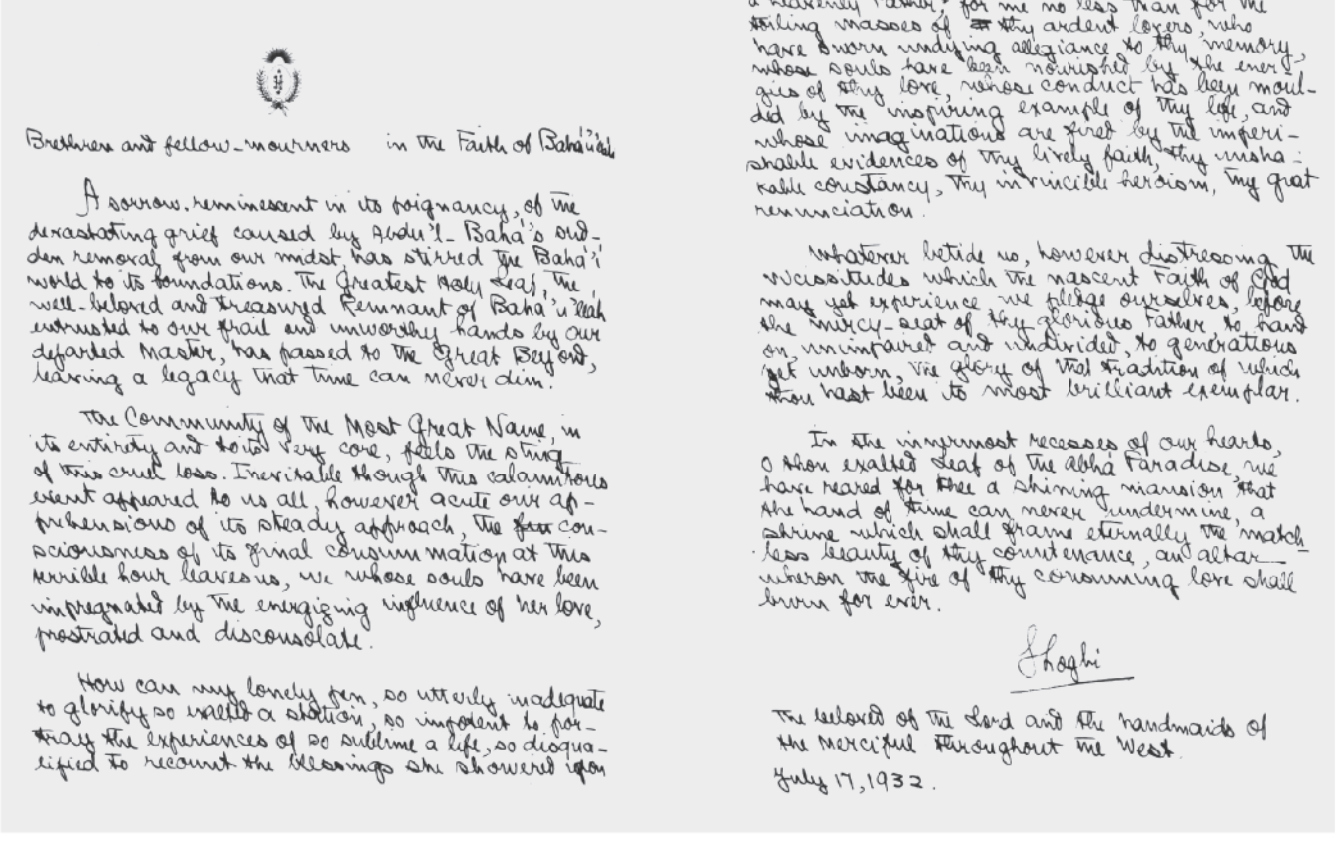


图四十　阿博都–巴哈之家

1923年，至大圣叶在房顶上为守基·阿芬第修建了几个房间（左边）。

图四十一　巴孛之墓

圣护在教长房顶的房间里拍摄了这张照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为陵殿点缀的明亮灯光。



Brethren and fellow-mourners in the Faith of Bahá'u'lláh,

A sorrow, reminiscent in its poignancy, of the devastating grief caused by 'Abdu'l-Bahá's sudden removal from our midst has stirred the Bahá'í world to its foundations. The Greatest Holy Leaf, the well-beloved and treasured Remnant of Bahá'u'lláh entrusted to our frail and unworthy hands by our departed Master, has passed to the Great Beyond, leaving a legacy that time can never dim.

The Community of the Most Great Name, in its entirety and to its very core, feels the sting of this cruel loss. Inevitable though this calamitous event appeared to us all, however acute our apprehensions of its steady approach, the fore consciousness of its final consummation at this terrible hour leaves us, we whose souls have been impregnated by the energizing influence of her love, prostrated and disconsolate.

How can my lonely pen, so utterly inadequate to glorify so exalted a station, so impotent to portray the experiences of so sublime a life, so disqualified to recount the blessings she showered upon

a heavenly Father, for me no less than for the stirling masses of Thy ardent lovers, who have sworn undying allegiance to Thy memory, whose souls have been nourished by the energies of Thy love, whose conduct has been moulded by the inspiring example of Thy life, and whose imaginations are fired by the imperishable evidences of Thy lively faith, Thy unshakable constancy, Thy invincible heroism, Thy great renunciation.

Whatever betide us, however distressing the vicissitudes which the nascent Faith of God may yet experience we pledge ourselves, before the mercy-seat of Thy glorious Father to hand on unimpaired and undivided, to generations yet unborn, the glory of that tradition of which Thou hast been its most brilliant exemplar.

In the innermost recesses of our hearts, O Thou exalted Leaf of the Abhá Paradise we have reared for Thee a shining mansion that the hand of time can never undermine, a shrine which shall frame eternally the matchless beauty of Thy countenance, an altar whereon the fire of Thy consuming love shall burn for ever.

Shoghi

The beloved of the Lord and the handmaids of the merciful throughout the West.

July 17, 1932.

图四十二　守基·阿芬第的英文手迹

守基·阿芬第因至大圣叶去世所写的英文信件，这幅图片是这封信首页和末页的传真。

图四十三　至大圣叶的安息之地

图四十四　神圣之所

从左到右：标志着阿博都-巴哈的弟弟、母亲、妻子和妹妹的安息之地的纪念碑，在它们的上面，面对这一段弧形的路径，信仰的国际教务管理机构聚集在此。

那么他们肯定不会贬低《纳比勒手记》每一卷的价值，这本书可以被看作英语文学中长篇叙事作品的经典。尽管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部原文为波斯文的译作，但守基·阿芬第用英语对其进行了重塑，他的译文堪比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对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的《鲁拜集》所做的处理。可以说，菲茨杰拉德为世界贡献的译文是一部在众多方面远胜于原文的诗歌作品。对圣护的这部巨著最好最详尽的评论来自一些非巴哈伊的著名人士。剧作家戈登·博顿利（Gordon Bottomley）写道："……与它在一起的日子是人生中的一段重大经历；不过，在此之外，它还透过照射到《新约》叙事的精神之光，让阅读成为一种打动人心的经历。"著名的学者和人道主义者，民族文化协会的阿尔弗雷德·W. 马丁博士（Dr Alfred W. Martin）在答谢守基·阿芬第赠送《纳比勒手记》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部伟大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一定会成为所有时代的经典和标杆。您的职位为您带来了诸多日常活动，而在此之外，您还能筹划这部作品的出版，对此我心悦诚服。"圣护的一位老教授，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贝亚德·道奇（Bayard Dodge）在收到《纳比勒手记》后于信中写道："……这最新的一本书——《破晓群英传》——是一份尤为宝贵的贡献。我对您出版该书表示诚挚的祝贺。译文十分出色，注释和图片也很有意思，您一定费了很多心血。"不久他对这卷独一无二的作品做了详尽的评论：

> 这个夏天给了我阅读《纳比勒手记》的良机……您出版了一本出类拔萃色的作品，任何一位对宗教和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应感谢您的贡献。这部作品的内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翻译相关的某些具体问题上，似乎任何对您的恭维都难以言尽译文之优点。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告诉您，我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完成一项如此浩大的工程。
>
> 英文的质量非常高，阅读译文让人觉得愉悦、轻松，而通常译文都很难读懂。你在书的中性立场以及脚注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工作，使得这部作品读上去更偏向严谨的历史，而不是什么宣传品。这本书有着强大的力量，因为译文是如此科学，原

作者又毫不做作，就算是最冷嘲热讽的批评家，也会相信这本书是真实可信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本书的意义极大。同时，这本书的实用性也很强，因为它揭示了我们伟大的宗教启示后面隐藏的心理因素。当然，该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其对巴哈伊早期运动的记述。最初的皈依者的生平可谓振奋人心。

我把书借给了克劳福德教授（Prof. Crawford）和西利教授（Prof. Seelye），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能花时间来读读这本启迪智慧、鼓舞人心的书。

尽管这种对他工作意义的积极评价一定让守基·阿芬第既高兴又感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最珍惜的还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知名东方学家E·丹尼森·罗斯爵士（Sir E. Denison Ross）写来的信：

亲爱的守基·阿芬第：

承蒙顾念，也感谢您从千里之外寄来两本新书，我非常喜欢。《破晓群英传》是我多年以来读到的最美丽的文字；其纸张、印制和插图都精美绝伦，而您的英语行文更是上乘，读上去根本不像翻译。自您来牛津算起，您最大的成就便是将我们的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请容我对此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除此之外，我在每一堂讲解巴孛和巴哈的课上，《纳比勒手记》将给我带来莫大的帮助。

祝您身体健康！

您忠实的朋友

E．丹尼森·罗斯主任

1932年4月27日

在1931年3月3日写给玛莎·鲁特的信中，守基·阿芬第这样形容了《破晓群英传》以及该书对他的意义：“经过八个月不间断的辛勤劳动，我刚刚翻译完这份记述圣道早期历史的著作，并把手稿寄给了美国总灵理会。这本书大概有六百页，还有两百页注释，是

我花了一个夏天从不同书里援引过来的。我太忙于工作了，不得不推迟通信……我现在很疲劳，几乎无法写作……这部主要讲述了巴孛的记录是真实可信的。书的一部分已经读给巴哈欧拉听过，而且阿博都-巴哈还做过修订……由于这份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我现在已经精疲力竭，必须躺下休息。”

考虑到书即将出版，守基·阿芬第于1931年10月致电美国，电报中说道：“敦促所有说英语的信徒专注学习纳比勒不朽的纪事，灵曦堂已竣工，因此重启密集的传导活动迫在眉睫，而在此之前，研读此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深信广泛使用其中丰富、可靠的各式材料乃面对关键时期挑战之最有效武器。强烈推荐给每个希望拜访巴哈欧拉故土的来客。”

守基·阿芬第推荐给信徒学习的书长达七百四十八页，包括一百五十多张照片；其中巴孛家族的详尽谱系是圣护亲手绘制的摹本。除了文本以外，守基·阿芬第还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所掌握的语言，援引各种不同的书籍，巧妙利用纳比勒的原稿，增加了很多英语和法语的注释，阐明了书本所记载的事件，极大地增加了它们的吸引力和历史真实性。三百本精装的签名限量版和普通版一起发售。守基·阿芬第为此耗费了近两年时间进行研究、编纂和翻译，直到将该书完成。1930年，他派了一名摄影师（一位澳大利亚的巴哈伊）来到波斯，努力探寻巴孛在故乡的足迹，追溯祂和追随者殉道的情景，访问诸多古迹。如果不是守基·阿芬第做了这项工作，很多地方的原有面貌可能就永远无从寻迹了。除了为《纳比勒手记》搜集照片外，守基·阿芬第还精心安排，将巴孛给十九门徒的原始书简以及写给巴哈欧拉的书简（题为《上帝将昭示天下者》）的完整副本寄到了美国。圣护称它们为“无价的信托”。他用一幅描绘巴孛陵殿内部构造的彩图作为卷首图。最后，圣护将这份弥足珍贵的礼物献给了他最敬爱的人：

> 我以极其感恩与热爱的心情，谨将此书献给光辉的英雄时代最后的幸存者至大圣叶。

通过对这个关于巴孛的生平及祂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改造的历

史的阅读，西方的巴哈伊不断涌现，他们就像沾染了早期殉道者的宝贵鲜血一般。他们得以一窥这些人身后的传统，他们明白了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信仰，明白了守基·阿芬第的话语，明白了圣护在称他们为破晓者的灵性后裔时，对他们所抱有的期望。这本书在巴哈欧拉的西方追随者心中播下了种子，在“十年远征计划”中，这种子生根发芽，随着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继续在全球开展，这片待收的庄稼也将变得更加丰实。

1935年，守基·阿芬第再次为西方巴哈伊奉上了一份厚礼：一部题为《巴哈欧拉圣作选萃》的译作。在写给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的信中，圣护这样形容了这部著作：“它收录了巴哈伊启示的创始者的著作中最具特点但是迄今未被发表的段落。”须知，《新约》的轻描淡写，佛祖名扬四海的字句，还有其他神圣启示者寥寥数语的点拨，这些文字在几个世纪以来令几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了升华。《圣作选萃》是指引和启迪之源，只此一部，便足够为任何先知提供灵性启示。诺曼·本特威奇（Norman Bentwich）教授在感谢守基·阿芬第赠送《圣作选萃》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珍视这部作品，珍视您勤劳虔诚的一切产物。”——这不失为一篇对守基·阿芬第作品的动人赞美，它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上帝的显圣之言。当然，最珍贵的颂词还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她这样对玛莎·鲁特说道：“即便是怀疑论者也会在其中发现强大的力量，如果他们静心阅读下去，就会有机会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1936年1月，在收到圣护寄来的书后，王后给守基·阿芬第本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请允许我表达对这部伟大译作的最诚挚的谢意。书中的每一个字对我而言都很宝贵，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焦虑和不安的年代里。”圣护在回信中说，当他听说王后从阅读中获益匪浅时，便觉得自己在翻译时所付出的努力完全得到了回报。

随后的1936年至1937年，圣护翻译了《巴哈欧拉祈祷冥想集》，这本书堪称《圣作选萃》的姐妹篇，其内容同样也很丰富，而且还加入了新的资料。圣护以前的老师贝亚德·道奇再次致信，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信中写道：“翻译具有深邃诗意的思想，比如《巴哈欧拉祈祷冥想集》，需要大量艰辛的工作……我曾对您说

过我是多么惊叹于您的英语水平。”收到《圣作选萃》的翻译时贝亚德·道奇教授就曾说：“您的英语已经炉火纯青，我肯定原文的意义和魅力并没有因为翻译而丢失。”当《隐言经》送到他手中后，他又以非凡的洞见力指出了该书的意义：“我明白将美丽的东方思想翻译成英语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祝贺您写出了质量如此之高的英文。”

这部与上帝交流的著作是一座巨大的宝藏，是世界上任何宗教作品所无法超越的。此书出版后不久，守基·阿芬第着手写了一封公开信，其长度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封信。1939年，这封题为《神圣正义的降临》的信写成了。由于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圣护写信时正在欧洲，信件写成后被寄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手中。守基·阿芬第在其中首次提到了该社团在全世界人类逐渐展现的命运面前注定要扮演的角色。他明确了最近开展的“七年计划”（也即执行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的内容的第一步）的目标，并指出，该计划是巴哈欧拉的追随者迄今担起的最伟大的事业，其成败将决定未来弘扬世界秩序的活动的命运。守基·阿芬第用充满善意而坚强有力的手在北美教区树立起了一面文明之境，用振聋发聩的语言警告他们防范文明中的邪恶，向他们指出了一个很少有人思考的真理：正是文明中的种种罪恶才使得他们的国家在冥冥中为上帝所选中，作为今日祂世界秩序诞生的摇篮。守基·阿芬第在使命周期中给信徒们带来了大量的愿景和指引，这些被收入《神圣正义的降临》的警告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对自己的使命有正确的理解，就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他怒斥了道德的败坏、政治的腐败、种族歧视和腐蚀人性的物质主义，而相比之下，巴哈欧拉的教义所谆嘱的是崇高的标准，祂严令追随者千万要遵循。书中还警告战争即将到来，并告诫他们要坚守阵地，不管将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遇到怎样的考验。他让他们坚定自己的神圣信念，继续推行最近在西半球展开的神圣计划，直到取得成功。

1941年，圣护的另一封公开信出版了。这封信是写给西方的巴哈伊机构的，其标题为《应许之日来临》。这封信同《神圣正义的降临》一起阐述了当今世界深入骨髓的腐败堕落。信写于二战

爆发后的第二年，守基·阿芬第在其中厉声斥责了当代人的刚愎自用和沉重罪孽，用巴哈欧拉亲口说出的圣言作为自己锋利的武器："世界毁灭、人类消亡的时候到了。""应许之日来临，无情的审判会在你们头上涌动，在你们脚下翻滚，说道：'你们这是自食其果！'""不久，祂的惩罚必将像暴风雨般吹打在你们身上，地狱的尘土将覆盖你们。""当命定的时辰到来时，将会骤然发生令人类四肢战栗的事件。""狂烈的火焰将吞噬各个城市，这日子已然届临。那时，宏伟之舌将宣告道：'天国是上苍的，上苍是全能者、备受称颂者。'""很快，你们会大声求助却得不到回应。""我们为你设定了时限，噢，世人啊，到那时你若不归依上帝，祂必行苛法峻律于你，让痛苦的折磨从四方来打击你。那时主对你的惩罚必定严酷！""世人啊！要知道，千真万确，不测的灾难紧随而来，悲惨的报应把你等待。别以为你胡作非为能瞒过我的眼。以我的圣美之名！我的圣笔已用明明白白的字句，将你所做的一切铭刻于橄榄石书简。"

圣护描绘了一幅恐怖骇人而又场景宏大的画卷，描述了人类被巴哈欧拉坚定拒绝后的悲惨境况。"世界范围的磨难已经降临到人类头上"，他写道，"这主要是上帝对地球各民族做出的审判，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拒绝承认所有宗教的允诺者的到来。"守基·阿芬第回顾了巴孛、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三人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迫害、污蔑和暴行，详述了祂们的清白，祂们在面对考验时的耐心和刚毅，以及当祂们扶正衣冠、去创造者的天国时，祂们对这个世界流露出的最后的疲倦。守基·阿芬第列举了人类对无罪者所犯下的罪，强烈指责了人类的领袖、君王、最高的神职人员和统治者。上帝的双显示者将祂们讯息的全部力量传达给这些人，但他们却忽视了自己至高的义务，拒绝了上帝的召唤。因此巴哈欧拉说："人类的两个阶层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君王和教士。"

守基·阿芬第的作品主题丰富多样，引人入胜，因此人们一阅读《应许之日来临》，就会发现自己徜徉在他的思绪之中，忘记了这封信的目的不是评论他的著作，而是审度他的生活和成就的多个方面。不过，我禁不住援引一位谦卑的巴哈伊在书出版后写给他

的信：“《应许之日来临》是一本让我爱不释手的书。谢谢您的好意，守基·阿芬第，您不知道您帮了我多大的忙……而我们为您做过些什么呢？您为我们做了一切……”

在《神圣正义的降临》和《应许之日来临》这两封公开信之间，守基·阿芬第给西方信徒送去了他的第五本也是最后一本巴哈欧拉著作的翻译，这项工作是在1939年至1940年冬天完成的，这又是一段极其艰难危险的日子。当时欧洲战事一触即发，他在动身去往欧洲前夕把信件寄到了美国出版。《致狼子书》是巴哈欧拉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其中还包含了一些由祂本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从自己的著作中节选出来的文字（这在宗教历史上当然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本书在我们信仰的文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该书出版前发出的一封电报里，守基·阿芬第说道：“非常希望研习该书能使真理得到进一步的启迪和更深刻的理解，今后的传导及教务管理事业是否有效均系于此……”

我在1944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回溯与展望》（*Prospect and Retrospect*）进行了最后一次校稿，这是守基·阿芬第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明天就会寄给霍勒斯。圣护着手写作此书已有两年（甚至更长！），而且这项工作几乎一直都在进行，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与压力，但这些都是值得的！这是一部非凡之作。”这些卑微的文字记述的是他生命中的重大事件，记述者对此都有先知先觉，当最后终于精疲力竭地完成时，因为太疲惫，所说的不过是些老生常谈的应景之词，同样，他们也因为过于疲惫，忘记了守基·阿芬第和我所说的“著作”花去了两年的时间——最后它得到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神临记》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为光辉、最为美妙的故事，是名副其实的未来历史“之母”，书中的每个字都有其意义，每句话都蕴含着思想，每个思想都延展至各自领域。它充满显著的事实，有着雪花结晶一般的排列和精确，每个设计都完美无瑕，每个主题都结构鲜明、相互联系、轻重相当，也可独立成章，对研究、学习、评价和详述巴哈欧拉的讯息和指示的人们来说，此书是一座宝库。这是守基·阿芬第最集中、最浩大的成就，是他写下的唯一真正的

书——由于他的谦恭虚心，其他所有通讯都只是一些写给巴哈伊世界某个社团或地区的信件而已。

写作《神临记》时，守基·阿芬第先花了一年时间潜心阅读每一部波斯文和英文的巴哈伊著作，每本关于巴哈伊信仰的书籍，不管是手抄本还是出版物，以及所有非巴哈伊人士写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我想，这个阅读量至少相当于两百本书。阅读过程中他做下笔记，编纂、整理好自己的素材。任何一个从事历史方面的工作的人都知道要进行多少研究，知道如何取舍有关资料在不同的地方所记录的不同发生时间，知道整个工作有多么浩大、繁重。而圣护同时还要准备即将到来的信仰的百年纪念活动，要负责巴孛陵殿上层结构的设计，这使得写作变得更加困难。当书的所有构成部分组合起来后，守基·阿芬第将它们编入了巴哈伊天启第一个百年的宏大图卷之中。他说，他的目的不是写一部关于这个百年的详尽史书，而是要回顾信仰诞生和崛起中的最突出的特征，其教务管理机构的建立，以及一系列的危机是如何释放其中的神圣力量，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推动信仰前进，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的。他向我们揭示了事情的全景。他写道，“一百年来的变革……在我们眼前展开”，并且揭开了舞台大幕，其序幕是一出“不可分割、恢弘浩大、卓越无比的戏剧，其奥秘深不可解，其高潮无法领悟，其结局不能预知”。

有多少个小时用来阅读资料、整理笔记，有多少个日月用来写下（常常还要重写）宏伟的篇章，有多少个疲惫的日子花在了便携打字机面前，用手指一个个地敲，有时敲上十个小时，直到最终完成他的作品！又有多少个小时，他挑灯夜战，当白天的稿子打出来后，他把它们一页页整齐地放在卧室的大桌子上，每张都有三份复印件，然后就不停修订，改正错误，用笔注上千余个音译词汇的读音符号，并大声朗读它们，直到眼睛充血、视野模糊、脊背和臂膀都因疲惫而酸痛，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一整章或当天打出来的某一章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这样工作，而且必须保持这样的速度。他一直在和时间竞赛，好让西方的巴哈伊在信仰的百年纪念时得到这份举世无双的礼物。他给美国寄了一些修订好的章节，但美国当时的情

况使得出版推迟了，直到1944年11月中旬稿件才完成印刷。

只看成绩是不够的，还得看成绩是如何取得的，以及当时的环境。阿博都-巴哈在写就《神圣计划书简集》时，已是步入老年，身体虚弱，还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之中。二十年的圣护工作令守基·阿芬第疲惫不堪，圣地、圣护本人、信仰的世界中心面临着二战战火的威胁，破坏圣约的流毒又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守基·阿芬第肩负起了这一任务，开始对巴哈伊时代第一个世纪中的重大事件进行评价。那些年里，我有几次不幸看见他在哭泣，好像心在流血——他的痛苦是多么沉重，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巨大啊！

守基·阿芬第并不满足于用英语完成的历史记述，他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了巴哈欧拉的家乡，在那里，忠诚、挚爱的追随者长期遭受磨难和迫害。他开始写作另一篇作品，纪念巴哈伊信仰在波斯的第一个百年。这篇文章与之前相同题材的文章相比不相上下，只是长度稍短，性质有别，但其事例和语言同样出色。我在他用英语写作《神临记》时一直陪伴左右，但是没有参与到这封书信的写作当中。守基·阿芬第的波斯语信件和语段（其间插有洒脱的阿拉伯语）与日常波斯语的区别就好比莎士比亚英语和现代新闻用语的区别！我对波斯语有些许掌握，对阿拉伯语则一窍不通，所以在十个词汇中只能认出三四个。不过他会念给我听，或者吟诵其中的一些片段，尽管我并不能完全领会它们的意思，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文字的磅礴、完美和有力。我记得每当我走近他的房间时，总能听见他一边写，一边诵读着所写的内容，声音如泣如诉、优美动听。有趣的是，他会一直这样吟诵，直到碰上一个不和谐的字音，那美妙的声音就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然后回到句子开头，重新开始。如果这次还不满意，就再次重复，直到成功！好像一只神奇的小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寻属于自己的旋律。这封书信写了一百多页，是守基·阿芬第的又一部代表作。这两部回顾百年历史的作品是圣护献给巴哈伊信仰百年纪念的礼物，他为此殚精竭虑，而当时，规模空前的战争震撼了整个世界。

以后的十三年里，守基·阿芬第既没有翻译，也没有写书。他

再也没有时间来从事这些工作，这是我们巨大的损失。从1921年开始，他苦心经营的巴哈伊国际社团蓬勃发展，占尽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令他无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上天在这方面赐予了他极高的天赋）。不过他还是通过信函，尤其是长篇电报，给信徒和各国机构提供了指导。到1941年，守基·阿芬第已经开始历数巴哈伊在全世界所取得的胜利。这种信息最终变成了振奋人心的里兹万文告，它们记述着每年的成就，让信徒能够把每个国家的工作放在一幅更大的图景之下。

从使命周期开始以来，守基·阿芬第对电报的使用越来越多，他向我解释说，这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能带来一种心理效果。电报能传达一种紧迫、戏剧的意味，更能使人理解。守基·阿芬第发展出了一套“电报语言”，这几乎可以视为他的一项文学成就。他的电报常常跟信件一样长。在写电报时，他以一种缩略的方式思考，而不是先写一篇普通长度的文章，再删除那些不需要的词，他根本没想用这些词，因此文章的风格就显得十分醒目、遒劲，富有张力。有人会使用一堆诸如“如果”、“而且”、“的”、“这”等词，觉得这样才能表达清楚，其实这样是失去了自己的风格，尽管其意思常常是正确的。如果不用括号，这些插入语就成了我们信仰文献里不必要的干扰，有的编辑会在守基·阿芬第的句子中间插入这些词，以为这样会让意思更直白。实际上，任何插入语，哪怕用括号括起来，也似乎在暗示读者是个傻瓜，不能自己领会圣护的意思。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守基·阿芬第都在用他的指示和思想启迪着巴哈伊世界。他的笔下流淌出充满力量和意义的文字，其数量相当于数卷作品。一个时代以战争的结束和全世界教务管理活动的发展而告终。尽管守基·阿芬第的力量从没有离开他，尽管他每天还是工作那么多小时，为上帝的圣道服务，但他真的很累了。

守基·阿芬第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翻译巴哈欧拉、巴孛和阿博都-巴哈的圣言以及《纳比勒手记》；亲自写作过去百年的历史，并以《神临记》为题出版，孜孜不倦地通过信函指示信徒，告诉他们建设教务管理机构的意义、时间和方法；为增加和巩固一个

世界性宗教的物质财产而马不停蹄地工作，不但在世界中心修建、完成和美化了巴哈伊圣地，还建设了灵曦堂，购置了地方和总灵理会的总部，建立了东西方很多国家的捐献；最重要的是，他巧妙地把思想指引到巴哈伊教义所蕴涵的概念之中，并将这些教义有序地归类，将巴哈欧拉宗教的意义、内涵、命运和目的全部展示出来，指出宗教真理本身就将人看作上帝创造的巅峰之作，人会不断进化，直到完美，那时，上帝之王国便会在人间建立。

第十一章　巴哈伊国际机构的发展

在圣护的支持下，信仰的世界中心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圣护一生中最为重大的成就之一，其重要性只有圣道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巩固才能与之相比。关于这一中心的独特意义，守基·阿芬第写道，它是“……圣地——巴哈伊世界社团的吉卜利；是心脏，生机勃勃的信仰通过它源源不断地迸发出令人振奋的影响力；是神定的教务管理体制那多样化的活动所围绕的所在地和中心。”

1921 年，守基·阿芬第承担起了《阿博都 - 巴哈遗嘱》赋予他的职责。在当时，海法与阿卡的巴哈伊财产包括：位于巴吉的巴哈欧拉陵殿（陵殿所在的住宅属于巴哈欧拉的女儿和一位阿夫南的子嗣，巴哈欧拉升天之后就埋葬在这里）；位于卡尔迈勒山上的巴孛陵殿，其周围是阿博都 - 巴哈生前购买的几块地，东方朝圣者招待所便矗立在这其中的一块土地上；阿布德的住宅，巴哈欧拉在阿卡时，曾在这所宅邸居住多年，并在此启示了《亚格达斯经》；里兹万和邻近的花园；以及阿博都 - 巴哈在海法的住宅。巴哈欧拉的宅邸毗邻祂的陵殿，已被破坏圣约的魁首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í）所占据；几乎每一项巴哈伊财产的所有权都登记在各个家族成员的名下，或者是在一些巴哈伊的名下。巴哈伊信仰及其财产的整体法律地位非常缺乏保障，因此，守基·阿芬第在他的使命周期所完成的工作几乎是一个奇迹。他很好地保护了这些圣所并增加了它们的数量；他扩大了土地的面积，并对它们进行了登记（很多情况下都是登记在各国总灵理会在巴勒斯坦当地的分部名下）；他使这些财产获得了市政和国家规定的免税待遇。在 1922 年的时候，守基·阿芬第的地位还极不稳固，以至于穆罕默德·阿里胆敢夺取巴哈欧拉陵殿的钥匙，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嫉妒阿博都 - 巴哈在其生命尽头所

享有的普遍爱戴，他们也迫不及待地败坏教长年轻的继承人在当局心目中的名声，而圣道内外各种性质的严重问题又令守基·阿芬第本人应接不暇。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时，我们只能再次为圣护在处理世界中心的事务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政治才能感到惊叹。

巴哈伊信仰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守基·阿芬第所称的“形成时代”以他本人的使命周期为开端，并且一直由他塑造。守基·阿芬第充分认识到，无论是自己的地位还是能力，都与他挚爱的教长有所不同，因此，他拒绝在任何方面模仿教长，不管是衣着、习惯还是举止。他认为，这种模仿不但完全缺乏判断力，而且毫无敬意。这将是一个解放巴哈伊信仰、承认其独立地位、确立其秩序、建立其机构的时代。阿博都-巴哈以一个囚犯与流放者的身份来到了圣地；尽管在祂的西方之旅中，在祂的信函里，祂可以宣布父亲之圣道的独立性，然而，晚年的教长却不能冲破当地一些习俗的束缚，长久以来，这些习俗将祂同那个穆斯林居多的社团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从英国学成归来、年轻、受过西方教育、习惯西化的守基·阿芬第，此时却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阿博都-巴哈多么受人爱戴和尊敬，祂都没有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性宗教的首领，而只是“人类一家”这一伟大灵性哲学的倡导圣贤，是巴勒斯坦众多名人显贵中杰出的一位。祂完全是凭借人格的魅力影响着周围的人。但是守基·阿芬第知道，在他担任圣护之初的周围环境里，这是他绝无可能做到的，而且他也完全不想这样做。他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世界中心）的职能都是为圣道赢得认可，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它有权享有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相同的地位与权利。

守基·阿芬第从一开始便深知，在巴哈伊信仰必将向海外拓展的数年间，要想合理地建立世界中心，那么在地方上，他本人的地位——不是地方或国家领袖，而是信仰的世界领袖——必须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立足点上。尽管巴勒斯坦是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圣地，但是对于其他两大宗教而言，它却不是其灵性中心和管理中心的共同所在地。因此，在巴勒斯坦，任何人所拥有的地位都不能与守基·阿芬第相比。而巴哈伊信仰可以与两大宗教相提并论，作为

巴哈伊信仰的领袖，守基·阿芬第居住在其灵性中心和行政中心的共同所在地，与本国其他的宗教领袖相比，他应该享有优先权。尽管守基·阿芬第从使命周期一开始便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他明智地意识到，自己在当时绝不可能使其他人接受这一观点。他不参与教长的活动，也不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交聚会中随意与人交往，这些举动都表现出了他的才智。他深知，他不能指望在当地的权威人士中间获得优先权，尽管这是他的地位所应得的。而且，由于他的年轻和庞大的穆斯林社团所拥有的权力，作为巴哈伊的代表，一旦他被降级到一个次要的地位上，那么这样的先例将会固定下来，以后他再想取得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领袖的合法地位几乎是不可能了。主要由于这一原因，在三十六年间（只有一两次例外），守基·阿芬第始终在得体地回避一切政府及市政社交聚会，不参与任何社交生活，坚决要求他或他选派来代替他的人得到应有的优先权。到他生命的最后，他实际上已经赢得了这场漫长的战斗。尽管巴哈伊代表并非总能得到守基·阿芬第所期望的优先权，但是他有效地防止了我们的代表在官方聚会中永远被固定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在他本人偶尔出席以色列国事聚会时，他得到了一个世界性信仰领袖所应有的待遇。守基·阿芬第始终专注于工作，一生中反复受到各种危机的冲击，而且朝圣者也占用了他很多的时间，考虑到这些，放弃全部的社交生活对他来说并非巨大的损失。但是，这却让他更为孤独，他无法与那些有才干、有影响力的人士会面，从而损失了在一个较高的知识层面上获得交谊与激励的机会。

不过，在守基·阿芬第使命周期的最初二十年间，他或多或少地与各个高级专员和地区专员有一些密切的私人联系。通过这些交往，他重新获得了巴哈欧拉陵殿的钥匙，维护了他对这座陵殿无可争辩的保管权，获得了巴哈欧拉宅邸的所有权，获准在巴孛陵殿附近（位于卡尔迈勒山上一处居住区的中心）埋葬阿博都-巴哈的几位至亲，使巴哈伊结婚证书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的结婚证书具有同等的效力。而最重要的是，在巴勒斯坦，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守基·阿芬第成功地使英国当局认识到了巴哈伊财产的神圣本质，并从他们那里赢得了他所寻求的市政和

国家规定的免税待遇。

巴吉一直是守基·阿芬第首要关注的对象。他决心不仅要保护安葬巴哈欧拉的陵殿，而且要保护祂在此世最后居住的住宅以及与之毗连的建筑物和土地。从1892年巴哈欧拉离世一直到1929年，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亲属一直占据着乌迪·哈马尔（Údí Khammar）的这个被称为“宫殿”的家。在巴勒斯坦，这座建筑因其独有的雄伟风格而著称，巴哈欧拉在祂生命的尽头把它买了下来。此时，这座宅邸年久失修，污迹斑驳，屡遭雨水侵蚀，屋顶已经塌陷，曾经漂亮的房间或遭遗弃，或用作贮藏室，其状况十分严重且令人痛惜。1927年11月，守基·阿芬第写信给一名信徒说：“宫殿仍然被穆罕默德所占据。马吉德丁（穆罕默德的表亲）送信要求我们修缮随时可能坍塌的屋顶。我们已经斩钉截铁地告诉他，除非他们搬出整座建筑，否则我们将不会进行任何修缮。”最终，宅邸的状况似乎到了圣约破坏者别无选择的地步，他们只能遵照守基·阿芬第的要求。1929年11月27日，也就是阿博都-巴哈逝世八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守基·阿芬第给一位亲属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宫殿已腾出。开始修复。”12月5日，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被穆罕默德·阿里及其追随者占据了约四十年的巴哈欧拉宅邸终于腾出来了。从随函附上的照片中你会看到他们把宫殿弄成了什么样子！修复工作已经开始，朝圣者们已经开始参拜巴哈欧拉辞世时所在的房间，也正是在这里，祂度过了一生中最安宁、幸福的日子。”两年后，修复工作完成。修整后的建筑恢复了其原有的美丽。有一名巴哈伊年轻时常到这里，他有能力，也很认真负责，守基·阿芬第便把他找来监督这里的工作。屋顶、木造部分、阳台上的壁画、精致的模版装饰（所有上层房间的墙壁上都有）、精美的木梁天花板都恢复了原貌。做完这些之后，守基·阿芬第给这座宅邸铺上波斯的巴哈伊信徒送来的珍贵地毯，在墙上挂起了罕见的灯饰，灯饰上还书有著名巴哈伊书法家米什金·盖莱姆（Mishkin Qalam）的作品，陈设了装满多种语言的巴哈伊译著的书柜，并在各个房间里摆放了无数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与文件，然后圣护邀请英国高级专员前来参观，他本人则亲自陪同了这次观摩之旅。当一切

都看过之后，守基·阿芬第询问专员阁下，问他是否认为，这样一座因其与全世界巴哈伊的联系而如此神圣的地方，绝不能被视为任何人的私人住宅，而应该作为一个朝圣之地和历史博物馆被保存下来。专员阁下表示赞成。毫无疑问，这一主张的倡导者与实际的证据都给他留下了同等深刻的印象。宅邸继续保留在了守基·阿芬第的手中。到1932年4月，朝圣者有幸能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神圣地点过夜。这座宅邸的大门也向非巴哈伊拜访者打开，他们漫步于其美丽的房间，凝视着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够证明圣道之世界性的材料，还有无数关于巴哈伊灵理会注册、结婚证书及其他历史资料的影印材料，以及信仰之殉道者和拓荒者的照片。

我清楚地记得，尽管守基·阿芬第拥有巴哈欧拉的宅邸，但他却因圣约破坏者仍然占用与其毗邻的住宅而不断苦恼，直至生命尽头。巴哈欧拉升天纪念日的当晚，圣护走在一队巴哈伊男子的最前面，他在拜访了宅邸中巴哈欧拉离世时所在的房间之后前往巴哈欧拉陵殿时，不得不从圣约破坏者正在其中单独守夜的房间前面经过，面对他们对自己叽叽喳喳的议论。这个夜晚，本来已经够令人悲痛万分的了，这些人的行为则更是雪上加霜。直到1957年6月，圣护才得以致电巴哈伊世界，电报中讲道：“我怀着深深的喜悦、欢欣与感激之情宣布：在巴哈欧拉升天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将于明天到来之际，我们赢得了对一群可耻的圣约破坏者的胜利，六十余年来，他们一直盘踞在巴哈伊世界至圣陵殿的周围。”

1923年1月，守基·阿芬第致信巴哈欧拉的女儿的长子，要求他做出明确声明，即无论这几位阿夫南的合法权利怎样，巴吉的陵殿因其性质而属于巴哈伊信仰。自那时起直到生命尽头，守基·阿芬第不断奋斗，以巩固圣地的法律地位。然而，三十余年来，他的每一份努力都会遭到这伙声名狼藉的亲属的反对。正是由于上帝的神秘运作，在独立战争之后，由于阿拉伯人（包括许多巴哈伊信仰的敌人）的大规模迁离，守基·阿芬第最终得以从这番长期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巴哈欧拉陵殿与宅邸周围的土地面积超过了十四万五千平方米，到1952年，我们终于获得了这些地产。早在1931年，守基·阿芬第便力图让政府征用这片土地中的一部分（最早属于宅

邸，但后来被穆罕默德·阿里的穆斯林朋友和支持者夺取），但是政府拒绝干预，而且这片土地的要价是其市场价的十倍以上。圣护不得不等待了二十余年，直至战争的风云变化使得这片土地回到了其合法所有人手中。除此之外，朝圣者招待所和一座被称为“教长茶馆”的建筑也双双为圣护在其晚年所获得。巴哈欧拉升天之后，招待所便一直为阿博都-巴哈所用，茶馆则常常是教长招待信徒的地方，其中包括西方的第一批朝圣者。1952年，以色列政府从海法民事法庭撤销了圣约破坏者就巴吉一座住宅的拆除对圣护所提起的诉讼，支持圣护的该问题属宗教问题的论点，使他得以在与阿博都-巴哈的顽敌的斗争中再次取得胜利。这些人一直紧紧地把守着他们位于巴哈欧拉神圣陵殿附近的据点，从不放弃。最后，在1957年，也是由于以色列国家当局的配合，守基·阿芬第拿到了一份对这些房子（占据它们的圣约破坏者被圣护称为的“可恶的残存者”）的征用命令，理由是它们靠近朝圣的神圣场所，从而最终实现了他所称的对哈拉姆-埃格德斯（Haram-i-Aqdas）[①]之灵性玷污的净化。圣约破坏者对将他们驱逐出巴吉的征用命令提出强烈质疑，并将诉状提交到了以色列最高法院，但他们败诉而归，被强制彻底搬离巴吉。

圣护表示，他希望亲自监督拆除这些毗连巴吉宅邸、紧邻巴哈欧拉陵殿的房屋，但是他再也没有返回圣地。圣护辞世数月之后，人们按照他的计划拆毁这些房屋时，发现在这些房屋前面，由他修建的布局整齐的大型花园不论测量、规划都非常精确，在扩建时可以越过这些房屋曾经所处的位置并刚好延伸到宅邸的墙边。我很想说，它就像一张地毯一样给铺了开来。

守基·阿芬第时刻铭记着，作为圣护他所担负的最深切的信赖是什么，那便是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不折不扣地完成挚爱的教长的每一个愿望和指示。在世界中心，他关心的第二件事便是巴孛陵殿。这是巴哈伊信仰中第二神圣的陵殿，与它相关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陵殿本身的完善，以及对其周围环境的保护和维持。第一方面涉及到建造另外三个房间以及一个上层结构（其本身即是一座完整

① 指巴哈欧拉陵寝附近的花园。——译者注

的建筑）。该上层结构堪称地中海海岸上最漂亮的建筑之一。至于第二个方面，则是要在三分之一个世纪里逐步购买一条环绕巴孛陵殿的巨大土地防护带，从卡尔迈勒山顶延伸到山脚。这片逾五十英亩的地区位于市中心，呈一个巨大的没有光亮的“V”字形，最宜在夜间观赏。在花园与土地柔和的黑色空间映衬下，灯火通明的巴孛陵殿雄伟地依偎在山的怀抱之中，仿佛别在该地区中心的一枚金色胸针。三十六年里，守基·阿芬第一直致力于开发这一位于上帝圣山中心的神圣之地；他在这里的工作如此令人钦赞，极为独特且意义十分重大，在我看来，他的气韵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石头和土壤中。

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履行了巴孛遗骸对他们所意味的神圣信托，这份信托开始于巴孛殉道的1850年，一直持续到巴孛陵殿最终竣工的1953年。从得知巴孛被处决的那一刻，到1892年升天，巴哈欧拉一直看护着神圣遗骸，监管它从一个隐藏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藏地。有一次拜访卡尔迈勒山时，祂亲手向阿博都-巴哈指出了巴孛的永久安息之地，指示祂购买这块土地，并将被藏起来的巴孛遗骸从波斯运送到这里埋葬。巴孛和祂的殉道同伴的遗骸被装在了一个小木箱里，身为囚犯的阿博都-巴哈成功地让人用大篷车和船把这些遗骸从波斯运送到了阿卡。当第一批西方朝圣者于1898年到1899年冬拜访监狱之城时，这一宝贵的木棺已经藏在了教长的家中。木棺的存在则是一个精心保守的秘密。

1915年的一天，阿博都-巴哈站在自家的台阶上仰望巴孛陵殿时向祂的一名同伴说道：“雄伟的巴孛陵殿至今仍然没有修建。需要一两万英镑。若一切顺利，完工之日可期。”祂还曾对一名朝圣者说过：“巴孛陵殿将按照最美、最雄伟的风格修建。”祂甚至命令海法的一名土耳其人为祂草绘了陵殿竣工后的样子。然而，尽管教长极度渴望为巴哈伊信仰之先驱修建这座陵殿，对于其基本特征祂也有着明确的构想，但最终的任务还是落在了守基·阿芬第的肩上。

要完成底层的建设，还需要修建另外三个高大的拱顶房间。为

了给这三个房间腾出空间，1928年，守基·阿芬第命人动工开凿现有建筑背后的卡尔迈勒山上的坚固岩石。我们发现他曾在1929年2月14日致电一位阿夫南道：“麦卡姆（波斯语对巴孛陵殿的称呼）开工。”同年12月，他告诉一个朋友：“与卡尔迈勒山上的巴孛陵殿相邻的另外三个房间很快将会完工。教长建造九个房间作为巴孛陵殿底层的计划实现了。”完成阿博都-巴哈当初的计划本身便是一项重大的工程，有趣的是，这一工程与巴哈欧拉宅邸艰巨而耗资巨大的修复工作是在同一年进行的，并且耗时大致相同。

守基·阿芬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以教长的意愿为指引。到1907年时，阿博都-巴哈只完成了九个房间中的六个。这九个房间将构成一个正方形，巴孛的遗体将长眠在它的中心。那一年，已经有人在面朝大海的房间中举行过几次会议。1909年，阿博都-巴哈亲手将巴哈伊信仰殉道先驱的遗骸安放在了其最终的安息之所。第二年，阿博都-巴哈踏上了西方之旅，战争随之爆发，教长也与世长辞。不过，祂已经表达了祂对最终结构的构想：它应该有一条拱廊，环绕在最初规划的九个房间的周围，上部要建一个穹顶。守基·阿芬第时刻铭记着教长的设想，但最终的实现却似乎充满了变数。他何时何地才能找到合适的建筑师来设计这样一座陵殿，才能筹措到修建资金呢？

答案不期而至。1940年，我的母亲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于是父亲便孑然一人，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孩子。守基·阿芬第的体贴真是无与伦比。一天，他对我说，母亲去世了，父亲应该与我们在一起。他邀请父亲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尽管战火在迅速蔓延，父亲还是来到了我们身边。多年来，当守基·阿芬第在巴哈伊地产上进行施工时，他偶尔会找一名当地的建筑师或工程师来协助他。除了要再为巴孛陵殿修建三个房间，在阿博都-巴哈最亲近的家人的坟墓上立起大而独特的纪念碑外，守基·阿芬第为至大圣叶的安息地修建了漂亮的入口，成功购买并拆除了杜米特的房屋，并用房屋的石块、门和窗框修建了东方朝圣者招待所的附属建筑，还在一条街道的上方搭建了桥梁以承载巴孛陵殿前面的一级台阶。1937年，我的父亲设计了另外几个房间，要加在阿博都-巴哈住宅屋顶上圣护

所居住的几个房间旁。除了像这样的需要专业帮助的事情之外，守基·阿芬第总是独自计算出他设置在花园中的台阶和小门的大小。我本人没有这方面经验。记得有一次，他想要建造一段更为华丽的台阶，台阶两侧有两个支柱，一直通向一条新建小路尽头的巴孛陵殿。我们在台阶大小的问题上花费了几个小时，最后我为他按照比例做出了一个纸质模型。看着模型，我们顾虑重重。然而，竣工后的台阶却引人注目，大家都十分满意。虽然圣护不是专业人士，但他认为在这么小的事情上没有必要花钱请建筑师。这些小事给他带来了难题，耗费了他不少时间。一天，从巴孛陵殿花园回到家中后，圣护问我对一段台阶的大小有什么意见。我说，既然加拿大最优秀的建筑师之一就住在街对面的西方朝圣者招待所，他为什么不请我的父亲为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他惊讶地看着我，问我他是否可以这样做。我向他保证，对父亲来说，设计这样的东西轻而易举，他立刻就能做到。这并不是说守基·阿芬第对父亲作为建筑师的能力缺乏信心。守基·阿芬第曾经给住在蒙特利尔的父亲寄过几张照片，照片上的铁门是圣护为陵殿底部的台阶定制的。他请父亲为这扇门的安装提供设计，事实上，守基·阿芬第非常喜欢父亲的想法，但是在台阶与市政所属的地产如何连结的问题上，他却始终无法同当局达成一致，因此这个计划也就始终未能实施。圣护只是从未想过，在经历了多年的独自奋斗之后，他现在有了一个人愿意为他做这些事情。这标志着一段美妙的合作关系的开始。我从未见到有人像父亲和守基·阿芬第这样拥有如此完美的比例感，而在这两人中间，我认为圣护又要更胜一筹。

回顾守基·阿芬第的一生，在我看来，信仰的胜利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除了信仰在全世界的传播之外，与其他任何信徒相比，玛莎·鲁特和萨瑟兰·马克斯韦尔（Sutherland Maxwell）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为圣护带来了更多的满足。二人在一些方面十分相像，他们圣洁、谦逊，十分敬慕守基·阿芬第，在对他的服务和忠诚度上堪称典范。尽管玛莎的服务对圣道来说更为重要，但萨瑟兰的才华也是一个中介，通过它，守基·阿芬第终于轻松地将他伟大的创造和艺术天性展现了出来，这给圣护带来了满足和幸福。直至生命的晚

年，我的父亲仍然在为阿芬第设计台阶、墙壁、立柱、灯具以及通往卡尔迈勒山花园的各个入口。他不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建筑师，还画得一手好画，而且可以用双手塑造和雕刻作品。记得有一天晚上，守基·阿芬第让父亲帮他设计通往陵殿及周边土地的正门，并且加上为陵殿最后一级台阶（前文已有提及，当时并没有完成）设计的铁门。然后我把设计拿给了父亲，他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递给他的小幅彩图，一言不发。然后他突然说道："这不公平！"我吃了一惊，问他此话何意。他说："如此美丽，没有人能够拒绝！"父亲最后不仅建造了正门，并且将设计草图装裱起来，挂在了床边的墙上。

守基·阿芬第让父亲做了几个小项目之后，发现他堪当重负。后来圣护突然告诉父亲（我想应该是在1942年底），希望他能够设计巴孛陵殿的上层结构。至此，建设者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工具，他终于可以借此实现阿博都-巴哈的计划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守基·阿芬第完全专注于写作《神临记》，他要赶在巴哈伊信仰建立一百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完成此书。而与此同时，他居然还有精力去关注这样一项巨大工程。回顾这几个月，我常常因此而惊叹。开始时，守基·阿芬第只是向萨瑟兰提了一些简单的要求，告诉他陵殿必须要有穹顶和拱廊，风格上既不要完全西式，又不能过于东方，不要修成清真寺，也不能像教堂；他让萨瑟兰自由地构想自己的设计。萨瑟兰的第一个方案显示了一个带有拱廊和天窗的结构，顶部耸立着一个金字塔状的穹顶，但守基·阿芬第并不满意。他就圆顶的设计与萨瑟兰做了讨论，希望他能按照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样式设计，因为圣护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美的穹顶。如果说上帝给了守基·阿芬第一位建筑师，那么，至为仁慈的祂不仅赐予了这名建筑师无法估量的灵性福佑，还有任何职业人士都难以获得的机会——他可以尽情挥洒天资和人生经验，展现他无与伦比的才情。在守基·阿芬第看来，父亲的第二套草图在比例方面让人满意，但却过于强调欧洲元素，于是他要求父亲做相应的修改。这番建议让父亲十分高兴，他又回归到了为美国巴哈伊灵曦堂设计的穹顶风格，当时他正是以这套设计参加了竞

标，印度风格在一些细节上有着明显的体现。最终的设计方案令守基·阿芬第大为赞赏，只是在天窗上部的局部处理中，他感觉还需要把八个窗角加高一些。一周又一周，萨瑟兰不断地把草图呈交给守基·阿芬第，在1943年12月25日，守基·阿芬第最终批准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极富创意的尖塔设计方案。而他的意见也影响了拱廊四角的设计。他认为这四个角应该再尖一点，于是最终的设计也做了相应的修改。我的父亲将最后的设计绘制成了彩色立视图，尽管守基·阿芬第非常喜欢这种呈现方式，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在最终做出决定之前按比例做出一个模型，以便更为直观地观察实际的建筑结构，毕竟此事事关重大；百年纪念活动将于海法举行，在这期间，如果设计得到了圣护的认可，圣护会在巴孛宣示一百周年之际正式公布。

当时，要找到一个能够制作模型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名义上有人承担了这项工作，但事实上，大部分工作还是落在了父亲的肩上。为了尽快完成工作，父亲总是不停地赶时间。模型于5月份交付，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守基·阿芬第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并于5月22日通知媒体，我们已经选出了完善巴孛陵殿的设计，条件完备后即将开工。5月23日，巴哈伊们在东方朝圣者招待所举行下午集会，圣护以及一些来自邻国的拜访者出席了集会，共同纪念信仰在一百年前诞生。守基·阿芬第拿出设计模型，将其摆放在桌子上供众人观赏。两天后他致电美国，“……在信仰的殉道先知宣示使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巴哈欧拉选定的地址上，完成阿博都-巴哈为其修建的圣坟。将此喜讯通告诸朋友。最近设计的穹顶模型已在集会上向信徒公布。祈祷早日肃清障碍，完成信仰缔造者之伟大计划，实现圣约中心所珍视的希望。”

在这一通告发出之时，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怕的战争行将结束；西半球的巴哈伊正竭力实现他们第一个七年计划的目标；大多数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萧条的情况，信徒们深受影响。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圣护无意于设立陵殿专项基金，这项工程得以相对平静地顺利展开，公众也没有再听到关于它的消息，直到1946年4月11日，守基·阿芬第指示马克斯韦尔先生将计划付诸实施，开始建

造陵殿的第一个部分，并在随后亲笔致信市政当局：

海法地方建筑及城市规划委员会

亲爱的主席先生：

关于呈交的设计图纸和请求建筑许可的申请书，我希望能够再做一些解释。

巴孛与阿博都-巴哈（也就是海法本地人民所熟知的“阿巴斯·埃芬迪”）的陵殿已经存在于卡尔迈勒山之上，只是尚不完善。至于当前的状况，尽管周围有大片的花园，但它只是一座平凡无奇的建筑，外表看起来像座城堡。

因此，我准备启动这座建筑的完善工程。原先的建筑结构将予以保留，为了对其加以修饰，我们将会建造一座雄伟、美丽的建筑，借以改善卡尔迈勒山坡的整体外观。

这座建筑完成之后的功能与目前一样，依然是专门安放巴孛遗体的陵殿。

如附上的草图所示，完工后建筑的第一层或者说底层将会建有一条拱廊，由二十四根大理石或是其他岩石制成的圆柱所支撑，它们的顶部有一条装饰性栏杆。这部分工程我们希望能够立即动工。中间部分和穹顶在建成之后将覆盖整座建筑，我们会在以后修建这两个部分，如有可能，我们将在底层的拱廊修建完毕之后早日动工。

设计此纪念性建筑的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加拿大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加拿大皇家艺术学院成员、著名建筑师W. S. 马克斯韦尔先生。他所在的公司曾经建造过位于魁北克省的芳堤娜城堡旅馆、里贾纳市议会大厦以及蒙特利尔市的美术馆、弥撒教堂和多家银行的办公大楼。我相信他对巴孛陵殿完善工程的完美设计将会给我们的城市增光添彩，使我们的城市多一处吸引访客的名胜。

此致

守基·拉巴尼

1947年12月7日于海法

我在这里引用了这封信的全文，因为它展现了守基·阿芬第如何以一种清晰、成熟和富有技巧的方式同政府当局进行沟通，并最终得到了必要的建筑许可。12月15日，守基·阿芬第致电美国，他在电报中写道："在此愉快宣布：环绕巴孛墓室的拱廊的设计和细节已经完成。这是整项事业的第一步，穹顶的完工将是其高潮和圆满成功的标志。这是阿博都-巴哈所长久期待的，五十年前，祂根据巴哈欧拉的指示启动了这一事业。"

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是在实现这个计划的路途中，我们似乎仍然要跨越难以逾越的障碍。英国的委任统治即将结束，巴勒斯坦国内动乱不止，并且很快又卷入了一场地区战争之中。而建筑陵墓所用的合适石料需要由本地安全供应，我们在询查后发现，位于黎巴嫩边境的采石场符合要求，但是该采石场主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开始正常运货。此外，建筑上的大量人工雕饰需要由一批专业的工人完成，国内却严重缺乏此类技工。有鉴于此，守基·阿芬第以他一贯的实用主义精神和胆识，做出了另外一项决定：看看能否在意大利完成部分工作。

兴建这座伟大陵殿的过程充满了无数奇妙的细节，我不可能一一详述。1948年4月6日，我代表圣护致信乌戈·贾凯里博士（Dr Ugo Giachery），清楚地传达了当时的情形："……由于各种各样的困难……马克斯韦尔先生……没能签订任何合同，以在巴勒斯坦当地开展实际的工作。不过，他已经与卡拉拉的一家意大利工厂取得联系，双方就签订花岗岩石柱采购合同进行了磋商。这些石柱将环绕在建筑的第一层。他即将前往意大利，主要是为了签订购买这些石柱的合同，而且，如果能够在当地找到与巴勒斯坦石头相匹配的石头，他还会签订购买柱顶和某些雕饰的合同……本杰明·威登先生（Mr. Benjamin Weeden）……会陪同马克斯韦尔先生前往，既是为了照顾他，也是为了尽快开展工作……这个国家正变得极端混乱，短期之内局势不会明朗，因此圣护十分焦急，希望能够在意大利早日签订合同，也希望马克斯韦尔先生和本杰明·威登先生早日归来，以免被迫羁留海外，与我们失去联系。如果您能尽可能地协助他们，为他们提供翻译，并确保他们联系到可靠的公司，在交易

时得到了公平的对待，圣护将由衷地感激……不幸的是，由于与耶路撒冷的通讯几乎被全部切断……威登先生无法与那里的意大利领事馆取得联系，因此也就拿不到签证。当他的飞机抵达时，如果您和他无法在罗马拿到签证，那么他将不得不乘这架飞机继续飞往日内瓦……只能在返回时再来找马克斯韦尔先生……马克斯韦尔先生现在已是七十四岁高龄，尽管身体非常好，但我们还是恳请您能照顾一下他……这里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办完差事并安然返回巴勒斯坦。”

这个月的15日，我代表圣护致信美国总灵理会秘书霍勒斯·霍利，把此次意大利之行详细地告诉了他，并解释由于巴勒斯坦采取了严厉的货币管制，圣护的资金遭到冻结，“圣护打算求助于金融界的朋友们，请他们筹借一笔贷款，作为签订这批合同的资金……他本人希望为此事担保，会尽快偿还这笔贷款。他非常希望朋友们对此不要有误会。他正在用圣道的国际基金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而且他只会以贷款方式接受这笔款项……我们这里的局势极不稳定，信件和电报随时都有可能暂时中断，因此圣护迫切希望将此信息告诉您……如果一切安排妥当，合同顺利签署，那么贾凯里先生将在此事中担任代表，负责接收您从美国汇来的资金，监督意大利的工作进展，并在我们所有人都失去联系的时候，全权处理那里的各项事务……他已经敦促马克斯韦尔先生和威登先生，让他们尽可能于三周之内返回巴勒斯坦，主要是担心双方有可能完全失去联系……我非常高兴地得知，陵殿建设的实际工作进展极为顺利，并且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破土动工。但我们仍需克服巨大的困难，而圣护也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巴孛遗骸的运送和祂陵殿的建设是一段充满波折的历史，在这段动荡的岁月中，我们又迈出了新的一步。第二天，也就是4月16日，送别父亲和威登先生时我们很不放心，他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车的全身都裹着装甲板，仅给司机留下了半英寸宽的缝隙，供他目视前方。我们一直没有他们的音讯，后来才收到他们从意大利发来的电报。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们曾被迫下车，拖着沉重的行李走了几百米，才换乘到另一辆车上。这些都是完全不必要的苦难，

但在当时，却是国内人民的家常便饭。他们乘坐的飞机是卢德机场遭到突袭和占领之前飞离的最后几架班机之一，之后所有的机场服务全部中断。他们离开之后，独立战争爆发，国家陷入了一触即发的武装停战状态。

1948年，守基·阿芬第开始挖掘位于陵殿后方的岩石，以便腾出大片空地修建拱廊，这是他二十年内的第二次尝试。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需要移除占地几百平方米的石头。随着工程的进展，守基·阿芬第的才智显露无遗：他买到了一段二手铁轨和一辆手推车，将铁轨铺设在与陵殿平行的前方路径上，让挖出的土石沿着木质斜槽滚下，由马车运往台阶的最东端，倾倒出来后再用于台阶本身的扩建。从清晨到黄昏，常常是在超过八个钟头的时间里，他都在站着指挥工作，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这本来并非他的职责范围，但是守基·阿芬第要确保这项工作能够既快又经济地完成，没有人拥有这样的意志力和耐力，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凭借这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守基·阿芬第将世界中心的几处圣所建成了今天的样子。

在我1949年2月24日星期二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星期日，M君（承包商）将开始对东南角和西边的地基进行施工，一个星期后铺设门槛处的石头。终于要正式动工了。"圣护几个月的辛劳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这座建筑即将拔地而起！守基·阿芬第坚持不懈地修建陵殿，他说，这座陵殿"实现了巴哈欧拉不可抗拒的夙愿，那就是建立一座永恒而得体的丰碑，以纪念祂的神圣使徒和祂信仰的共同缔造者。"他不仅仅是建造一座陵殿，而且要将其升华，让信徒们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使之成为信徒和圣护心之所系的地方。他让原本平凡的建筑工作变得振奋人心。当他宣布从意大利运来一批新的石头，给出具体的吨数时；当他通知大家一个新的单元已经完成建设时；当他告诉我们陵殿穹顶的表面积达到了二百五十平方米时；当他描述美丽的细节时——他神奇的话语以及话语中传达出的热情总能在我们心中激起阵阵喜悦的浪潮，让我们难以自持。在这项无比伟大且令人振奋的事业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于是，原本是混沌众生每天都能听到的单

调琐事，却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在心底深处更加认同自己的信仰。这也难怪战后专注于国家大事的信徒们都聚集在圣护的周围，协助他在五年时间里筹集了七十五万美元的资金，真可谓“世界产业”。

守基·阿芬第原本考虑首先完成陵殿的拱廊部分，把上层结构的实际工作留到以后。但是，世界各地的巴哈伊反响热烈，大力支持这一神圣建筑的修建，国际形势渐趋恶化，经济发展的趋势又带来了成本的提高，此外，在承包意大利石料项目的公司中，工人们很好地完成了拱廊的施工，而这批效率高、技术好的工人此时仍然可以为我们所用。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守基·阿芬第决定继续进行下一阶段的工作。

这项旷日持久的工程费时多年，充满了艰辛与困难。我代表圣护负责与主管工程师及承包商进行谈判，谈判的过程一波三折，因为没有人能够误导或是欺骗守基·阿芬第。如果报价过高，他就会直接拒绝。有一次他甚至表示，要无限期地停止陵殿修建工程，他不愿支付在他看来高得离谱的价格。就这样，守基·阿芬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而我经常吃惊地发现自己便是他手中的利剑！不仅所有的石料都要从意大利进口，甚至有段时间，连钢筋和水泥都要从意大利获取，因为本地物资严重匮乏，我们也因此面临了无尽的麻烦而且忧心忡忡。

除了这类困难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守基·阿芬第，甚至让他不得不推迟陵殿上层结构的实际建设，因为我们知道，拱廊只是围绕着原来的建筑，而不是建在原有建筑之上。为了建造陵殿的剩余部分，必须将八根混凝土柱穿过八面内墙，直达基岩。圣护极为关切此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安葬阿博都-巴哈遗体的房间的具体量度，倘若沿着某面墙向下打通地基的话，整个陵殿便有被冲破的危险。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守基·阿芬第所展现出来的崇敬、庄严和神圣是我此后一生都未曾感受到的。守基·阿芬第认为，如果我们要打破地下的房间，那么就必须转移教长的遗体。在我看来这非常简单，祂只是被暂时安放在别处而已。守基·阿芬第当时说得多好啊！真希望我能完整地记住他的原话。他说，教长

的遗体不能受到如此随意的对待，转移必须妥善进行，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将遗体安放在某个合适的地方，而回葬时也要有同样的尊敬。守基·阿芬第问道，当地人情如此冷漠，居民又多为仆人，再加上通往邻国的边境全部封锁，到哪里去找人来参加如此庄严、神圣的仪式呢？最重要的是，在陵殿内部的修建竣工之前，哪里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暂时安放阿博都-巴哈的神圣遗体呢？说话的语气充满了敬畏。在这件事之后，我对宗教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最后，我的父亲与工程师反复从各个位置敲击地板和墙体，出席教长葬礼的老巴哈伊回忆了房间的位置，确保每一根柱子都要尽可能地靠近外墙，而不会冲破坟墓。一切妥当之后，工程正式展开。

1952年3月，在病魔缠身两年之后，萨瑟兰·马克斯韦尔去世了。尽管他的离去并不会影响到陵殿设计方案的实施，但在陵殿部分的设计上，再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画出大幅草图，也没有人会如此一丝不苟，从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为了表彰父亲和贾凯里博士对建造巴孛陵殿的贡献，守基·阿芬第以他们二人的名字为阿博都-巴哈最初修建的无名之门命名，后来通往八角殿堂的门则以约阿斯先生（Mr. Ioas）的名字命名，他主持了穹顶和穹顶围墙的修建。

当自己投注了大量心血的陵殿最终完工时，守基·阿芬第感受到它蕴含着一种显著的女性纯洁而美丽的特质，于是将其取名为“卡尔迈勒女王”。他这样描述了这座陵殿：“稳坐在上帝之山的卡尔迈勒女王，她头戴闪光的金冠，身着发亮的白袍，腰束祖母绿的腰带，令天上、海中、平原、山峦上的人都为之倾倒。”为了赞美和解释这一圣址的深刻灵性意义，守基·阿芬第写下了许多篇章。他曾把信仰殉道先驱的遗体看成一种灵性旋涡的中心，而这也堪称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铿锵有力的一段文字。巴哈欧拉本人说，在灵性的王国里，巴孛是“所有先知和信使的本体都围绕着的一个点。”守基·阿芬第则说，在祂的肉体留存于世上的神圣遗骸中，巴孛是九个同心圆的核心和中心：最外面的一个圆便是地球本身；在此之内是至圣之地，阿博都-巴哈称之为“先知之巢”；在此巢内是上帝之山、主之葡萄园、以利亚灵修之所（巴孛本身象征了以利亚的回归）；在此山上是神圣教区，即国际上捐赠的土地；这

些土地上的花园和台阶共同构成了至圣庭院；至圣庭院之中矗立着精美绝伦的巴孛之陵墓，也即贝壳；贝壳之中是无价珍珠，至尊圣地，也就是教长亲自修建的最初的陵殿；保存在至尊圣地中的是圣体灵堂，或称圣墓，也就是陵殿的中心堂室；圣体灵堂中安放着雪花石膏之棺，即至圣石棺，如守基·阿芬第所写，石棺中“存放的是无价之宝——巴孛的神圣遗骸。”

守基·阿芬第说陵殿其实是一个“机构”，“在巴哈伊世界教务管理中心的逐步建立和构成未来世界秩序之雏形的最高机构的发展中”，这一机构注定要发挥重大的作用，其重要性无法估量。当宏伟的上层结构拔地而起时，守基·阿芬第不断揭示了陵殿更多的真正意义。他写道，在世界中心，陵殿不仅是第一座高高耸立起的最为神圣的建筑，而且是“首个国际机构，它预示着世界教务管理中心最高立法机构的建立”。

巴哈欧拉的地位受到了无限的赞美，祂的遗骸是信徒的“朝拜点”或“吉卜利”，其本质太过神圣，因而不能作为世界秩序中各机构的灵性动力来源。不过，巴哈欧拉亲自选定了巴孛的遗骸作为各教务管理机构所围绕的中心，并在卡尔迈勒山上为巴孛的遗体选定了安息之地，指示阿博都-巴哈购得了这块土地并将遗体从波斯运来在此下葬。由于巴哈欧拉的这些安排，在此中心的荫庇下，各教务管理机构将发挥它们的作用。在描述自己与巴哈欧拉的地位关系时，巴孛说，自己是“祂掌中的一枚戒指，上帝将使祂彰显”，祂“可以随意将其翻转，凭其所念，如其所愿。”我们必须牢记，远在巴哈欧拉宣示其地位之前，是巴孛率先吹响建立“新秩序”的号角的。因此，选择祂的遗体来实现这一目的则是最有意义、最合适不过。在提到世界中心诸多建筑的双子性质时（如双子陵殿、信仰的教务管理和灵性双子中心），守基·阿芬第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区别。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宣读《阿博都-巴哈遗嘱》时，守基·阿芬第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建立巴哈伊信仰的最高教务管理机构——世界正义院。1922年，他采取了前期的一些行动，其中之一便是把一些年长和主要的信徒召集到海法商议此事。他在函件中也反复提到

了这件事。实际上，在他于1922年1月16日写给波斯的第一封信里，他就说到了成立世界正义院的事情，并表示稍后会向朋友们公布有关选举的初步安排。他从未质疑过世界正义院的功能和意义；1923年3月，他将世界正义院描述为“最高委员会，负责指导、组织、统领信仰在全世界的事务”。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初任圣护时，他的心中交织着两种力量，一种是他年轻的渴望，他希望尽快实现挚爱的教长留给他的所有指示，其中就包括成立世界正义院；而另一种力量则是遗嘱中许诺给他的神圣指引和护佑；后者修正着前者。守基·阿芬第不断努力，试图至少将选举最高机构的前期工作开展起来，然而天意之手却不断地控制着事态的进展，使得任何尚不成熟的行动最终都无从开展。1922年，守基·阿芬第举行了若干次商议，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尽管自己迫切希望完成建立世界正义院的前期工作，但此时迈出这一步却是十分危险的。选举和支持世界正义院要有坚实的教务管理基础，这是当前尚不具备的一个条件，而且我们也找不到足够多的能力过硬、见多识广的信徒。

意识到世界正义院的成立之路尚不可行之后，守基·阿芬第决定先成立一些具有雏形的机构，以此为后面的选举做铺垫。在使命周期最初的几年里，守基·阿芬第努力把一些人员召集到海法，请他们帮助自己在世界中心成立一个明确的机构。这一想法在他留下的文字中也有体现。1926年8月30日，守基·阿芬第写信给巴哈伊们，信中写道：“我正急切地考虑通过何种方式或途径在海法成立一个高效、合格的秘书处……我想了很多，目前仍在探索，希望能找到一位能干、可靠、有条理、有经验的同事，要求不受限制，不受外界纷扰，能够……连续几个月投入到这项复杂、重大的任务中。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那么联结世界中心与各灵理会之间的纽带就会得到加强。”同年12月7日，他告诉一位亲属，已经有两位杰出的巴哈伊加入到了他在海法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建立某种国际巴哈伊秘书处……”关于这个秘书处在他头脑中的真正意义，他在两周后的一封信件中做了清楚的阐明。他把这两位巴哈伊介绍给巴勒斯坦北区专员亚伯拉姆森先生，在说过他们的姓名后，他写道：“这两名巴哈伊代表……是我邀来与其他东方巴哈伊一起共商

建立巴哈伊国际秘书处一事的，这是建立国际巴哈伊委员会的初期步骤。”

1929年6月15日，海法的一位印度朝圣者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这样写道：“守基·阿芬第说……只要各国总灵理会还没有达到稳定、有序的状态，那么，即便是建立非正式的正义院也是不可能的。他要求我们根据《美国信托》的内容，草拟总灵理会章程，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将灵理会在印度政府注册为宗教机构，若不可能，则注册为商业机构……在最近写给东方国家的信件中，守基·阿芬第敦促各国使总灵理会作为宗教法庭的地位得到政府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8月，守基·阿芬第曾给斯坦纳德夫人（Mrs Stannard）写信。斯坦纳德夫人是日内瓦国际巴哈伊办事处的负责人，该办事处旨在推广信仰在欧洲的事务，促进信仰在全世界的国际职能，在工作上一直受到圣护的鼓励和指示。圣护在这封信中写道，他希望该办事处的巴哈伊简报能“以欧洲的三种主要语言发行，即英语、法语和德语……我已在电报中表明，愿定期为你们提供经济资助，确保此刊物能以被巴哈伊世界西部阵营所认可的三种官方语言发行……在瑞士的贵中心和在汉堡发行的巴哈伊世界语杂志都将注定担负起这其中的一些职责和功能，日后这些职责和功能将由届时成立的国际巴哈伊灵理会承担。”

在许多这样的信函中，特别是使命周期的前十年，守基·阿芬第常常透露出想在世界正义院成立之前，建立某种国际秘书处或委员会的愿望。而该机构的作用、意义和地位也在他的脑海中渐渐成形。1929年夏天的某段时间，圣护希望巴哈伊们举办一次国际会议。在会上，各方朋友可以自由畅谈，商讨尽快成立东方巴哈伊总灵理会的方式和途径，也可谈论他当时正在落实的教务管理问题。这样，阿博都-巴哈所设想的正义院便可及早选举成立。一些年长的巴哈伊对会议内容有着不同的设想，他们期望看到的是某种过渡性机构的选举出现。守基·阿芬第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929年12月12日致电两位负责安排会议的人士，强制性地取消了这次会议，称它将会“带来疑惑、误解，甚至纷争”。他避开了那些不成熟的人，因为他预见到了这些人将会带来的巨大危险。对于他目前正着

手建立的教务管理秩序，他们只是一知半解，他们拥有的是与自己的能力不相称的地位和权力。二十多年来，整个构想都处于搁置状态，他早年的信件还屡次提到成立世界正义院一事，此后便只字未提，直到他亲自任命成员，成立了国际委员会。从他不时向我吐露的心声中，我得知，在最初担任圣护时，他已察觉到某些颇有声望的信徒意欲在正义院或临时机构中担任职位，并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力及能力心存质疑，甚至有妄图驾驭上帝之圣道的野心。对此，我深信不疑。论年岁，这些人足够当他的父亲；姑且不论他们对教长之意愿所持的见解，在他们眼中，守基·阿芬第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

从一开始，守基·阿芬第就致力于拓展和巩固“各国地方和总灵理会”。早在1924年，他就称这些灵理会构成了我们的“根基，只有依靠它们的力量，才能在未来坚实地建立起世界正义院”。之后几年，几乎每次号召成立新的总灵理会时，圣护都会使用一些类似的措辞，就像他于1951年发给第四次欧洲传导会议的原文一样：“……未来世界正义院的成立还需依靠东西方各教团，后者是前者得以稳固的力量支柱。三个国家总灵理会的诞生定会使它获得额外的力量……它等待着类似机构在欧洲大陆的崛起和成立……”展望这一庄严机构的选举成立时，在其缔造者巴哈欧拉所言基础上，在阿博都-巴哈通过《遗嘱》赋予它明确无误的力量和特有权利之外，守基·阿芬第的声明将在至少一千年内增添世界正义院的力量，并协助它行使使命。圣护说，世界正义院将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核心与先导”；“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文明中”，“未来的正义院”将被“后人视作最后的避难所”；它将成为“巴哈欧拉萌芽期的世界秩序的收尾之作”；是“信仰教务管理等级中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选举机构”。圣护称：“有些事务是巴哈欧拉没有在教义中特别指出的，祂把这方面的立法职责指派给了正义院的信托人，并许诺上帝将‘按照其旨意启迪他们’。”他还写道：“世界正义院的力量和特权使之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可对至圣经书中未曾明确启示的事项立法；法令免除了正义院成员对所代表人的一切责任，以及遵守他们的观点、信仰和看法的义务；正义院是世界巴哈伊社

团中唯一的立法机构，我们有具体的条款要求信徒进行自由、民主的选举——这些以及其他特质结合起来，共同将与巴哈欧拉之天启紧密相关的秩序和任何现存的人类政府体系区别开来。”

1950年11月，如守基·阿芬第所言，在瑞士治疗的父亲“奇迹般地”从一场大病中恢复了过来。有一天，同在瑞士的圣护突然坐下来，大大出乎我意料地邀请该机构的第一批成员（后来他们成为了国际巴哈伊委员会的成员）前往海法。同圣护一贯的行事风格一样，这次也先是端倪初见，随后成熟的理念便如同太阳般从地平线上升起。在我们返回圣地之后，有一天，卢图福拉·哈基姆（最先到达）、杰茜和埃塞尔·雷维尔（Jessie and Ethel Revell）、阿梅莉亚·科林斯（Amelia Collins）和梅森·里米（Mason Remey，随后抵达）以及格拉迪丝·威登和她的丈夫本（两位先前就住在这里）齐聚西方朝圣者招待所，围坐一桌。圣护向我们宣布，他打算从小组中选出人员组建一个国际委员会。圣护此举的性质前所未有，而且这一决定也给与会者以及整个巴哈伊世界带来了无限的裨益。不过，圣护直到1951年1月9日才发布了这一消息。那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如下：“特此向东西方国家总灵理会宣布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决策，作为最高教务管理机构的先导，首个国际巴哈伊委员会即将成立。信仰的世界灵性中心已在双子城阿卡和海法建立，终有一天，最高教务管理机构将在其荫庇的土地上崛起。”

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的预言已然实现：时隔两千年，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终于建立；巴孛陵殿上层结构的建设伟业已经展开；九个国家总灵理会各行其责，日渐成熟。所有这些使得守基·阿芬第做出了这一历史性决策，在三十年来不断完善的教务管理体制中，这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一座里程碑。在电报接下来的内容里，守基·阿芬第又阐述了这一新机构的三重职能：与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官员建立联系，协助他建设陵殿（当时仅完成了拱廊的建设），就个人身份问题与民事当局展开协商。这首个“萌芽期的国际机构”将发展成被官方承认的巴哈伊法庭，成为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并最终发展为成熟的世界正义院。到那时，这一机构还会承担更多的职能。在这个过程中，届时，许多附属机构也将纷纷

成立，共同构成世界教务管理中心。这则消息包含了振奋人心的预兆，像一道闪电划过了巴哈伊世界的天空。守基·阿芬第就像一位娴熟的技工，他将机器的各个零部件装在一起，拧紧了最后的零件——世界正义院。

十四个月之后，即1952年3月8日，守基·阿芬第给巴哈伊世界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宣布将扩充国际巴哈伊委员会，其中写道："现有的成员包括阿玛图-巴哈·鲁希叶（Amatu'l-Bahá Rúḥíyyih），她将充当我和委员会之间的联系人。圣辅梅森·里米、阿梅莉亚·科林斯、乌戈·贾凯里和勒罗伊·约阿斯（Leroy Ioas）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一般成员和秘书长。杰茜·雷维尔、埃塞尔·雷维尔和卢图福拉·哈基姆分别担任财务主管、西方助理秘书长和东方助理秘书长。"由于威登夫妇因健康原因离开，一直为圣护提供服务的约阿斯先生到来，原有成员组成有所改变。贾凯里博士也被纳入进来，不过他继续居住在意大利，监督陵殿的筹建工作，并作为圣护的代理，负责订购许多海法需要的其他物资。陵殿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从意大利采得的，经切割、雕刻后运至海法，陵殿穹顶的烫金瓷砖则来自荷兰。1955年5月，圣护宣布，由于西尔维娅·约阿斯（Sylvia Ioas）获得了任命，国际巴哈伊委员会成员增至九人。多年前圣护就希望成立一个秘书处，而委员会的职能便正在于此。在朝圣者招待所餐桌旁的轻松氛围中，其成员分别获得了圣护的指示；他们也不会频繁地举行会议，因为各成员总在为圣护分配的诸多事宜奔波忙碌。守基·阿芬第巧妙地在政府和市政官员心目中将这一新机构塑造成一个国际组织，该组织在世界中心处理着我们的教务管理事宜。公众对这一机构的权威并不关心，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深知，守基·阿芬第是其核心。但公众却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个雏形，不久之后它将演变成为世界正义院。

在这两封函件中，守基·阿芬第先后把国际巴哈伊委员会的组建和成员构成告知了巴哈伊世界。在此期间，他还做出了世界中心发展历程中另一至关重要的决定。1951年12月24日，他正式宣布了首批十二人的圣辅队伍。他们被分派到了圣地、亚洲、美洲以及欧洲大陆。当时，被圣护授予这一卓越头衔的人包括：圣

地圣辅萨瑟兰·马克斯韦尔、梅森·里米和阿梅莉亚·科林斯；亚洲圣辅瓦利奥拉·瓦尔加（Valíyu'lláh Varqá）、塔拉祖拉·萨曼达里（Ṭarázu'lláh Samandarí）和阿里-阿克巴尔·福鲁坦（'Alí-Akbar Furútan）；美洲圣辅霍勒斯·霍利、多萝西·贝克（Dorothy Baker）和勒罗伊·约阿斯；欧洲圣辅乔治·汤曾德（George Townshend）、赫尔曼·格罗斯曼（Hermann Grossmann）和乌戈·贾凯里。两个月后，即1952年2月29日，守基·阿芬第向东西方教友宣布，他将把圣辅人数增至十九人。此次新获得提名的人包括加拿大的弗雷德·朔普夫洛赫尔（Fred Schopflocher）、美国的科琳娜·特鲁、波斯的齐克鲁拉·哈德姆（Dhikru'lláh Khádem）和舒阿乌拉·阿拉伊（Shu'á'u'lláh 'Alá'í）、德国的阿德尔贝特·米尔施勒格尔（Adelbert Mühlschlegel）、非洲的穆萨·巴纳尼（Músá Banání）以及澳大利亚的克拉拉·邓恩（Clara Dunn）。关于两次任命圣辅一事，守基·阿芬第说，从阿博都-巴哈遗嘱中得知，采取这一步骤的时机已经来到，而作为一项初期的措施，国际巴哈伊委员会也已经成立，而且它将注定发展成为最终的世界正义院。他宣布，遵照阿博都-巴哈的遗嘱，庄严的圣辅机构已经开始运转，传播信仰和保护信仰的团结是其双重的神圣职能。

1957年10月，在给巴哈伊世界的最后一封信中，守基·阿芬第宣布他又指定了“一支圣辅队伍……八位擢至此崇高行列的人是：西非的伊诺克·奥林加（Enoch Olinga）和南非的威廉·西尔斯（William Sears）、约翰·罗巴茨（John Robarts）；不列颠群岛的哈桑·巴柳齐（Ḥasan Balyuzi）、约翰·费拉比（John Ferraby）；太平洋地区的科利斯·费瑟斯通（Collis Featherstone）、拉赫马图拉·穆哈吉尔（Raḥmatu'lláh Muhájir）；阿拉伯半岛的阿布-卡西姆·法伊齐（Abu'l-Qásim Faizí）。这个机构的成员从全球四大洲中选出，代表着阿夫南和黑白两色人种，而且其成员拥有着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的不同背景。”

1952年，接连两个月中，圣护创立了一个瓦希德（十九）圣辅机构。到1957年，圣护又为其添加了八个人，这样圣辅的人数就成了九的三倍数。一旦原有十九人中有一人离世，守基·阿芬第就会

任命一位新的圣辅。两位因这一原因获得任命的圣辅都是接替了父亲的职位。于是，1952年3月26日，当萨瑟兰·麦斯威尔离世时，他的职责便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接替了他的圣辅之职；另外，阿里-穆罕默德·瓦尔加（'Alí-Muḥammad Varqá）也于1955年11月15日接替父亲，获得了任命，并成为了胡古古拉的信托人。在多萝西·贝克意外身亡后，保罗·哈尼于1954年3月19日被任命为圣辅。弗雷德·朔普夫洛赫尔离世后，贾拉勒·哈泽（Jalál Kházeh）于1953年12月7日加入了这一行列；乔治·汤曾德过世后不久，圣护于1957年3月27日任命了阿格尼丝·亚历山大（Agnes Alexander）。于是，在守基·阿芬第在最后一封信中提名第三支圣辅队伍之前，亦即世界远征计划进展到一半时，圣辅的人数一直保持在十九人。

1951年1月9日到1952年3月8日期间，在世界中心，信仰的教务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变化。守基·阿芬第写道，这些变化标志着“最高组织体系”、“至高机构”终于得以建立起来；在正在展现的体制中，“萌芽期”的至高机构正在神圣陵殿周围发展。他在著作中向信徒们指出，在三部伟大“章程”给出的指示和灵性力量的指引下，巴哈欧拉世界秩序不断进步和展现出来。三部章程推动了三项不同的进程，其中第一部是巴哈欧拉本人在《卡尔迈勒书简》中启示给我们的，另外两部则出自教长之笔，分别是《阿博都-巴哈遗嘱》和《神圣计划书简集》。第一部章程在守基·阿芬第称之为“全球地理、灵性和教务管理之中心的土地上”发挥着作用。这里是“圣地、中心和枢轴，我们的信仰无处不在、无往不利，而其神圣命定的、快速发展的机构围绕在此地周围”；这里是“一个世界社团的圣地和吉卜利，充满活力的信仰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迸发出蓬勃的力量，在神圣命定的教务管理体制中，多元的活动便是以此为基点和中心的”。在巴哈欧拉的《卡尔迈勒书简》中，核心的内容便是这段：“不久，神必将驾着方舟降临于你，并荣显万名之书上表扬过的巴哈之民。”守基·阿芬第解释道，“巴哈之民”指的就是世界正义院的成员。

教长在祂的《遗嘱》中对各教务管理机构的建立做了明确的指示，因此这一章程得以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祂的《神圣计划书简

集》与巴哈欧拉的教义在全球的灵性征服有关，其舞台也是在全球。而与之相对的是，《卡尔迈勒书简》的阐述和惠赐则正是针对卡尔迈勒山。守基·阿芬第写道："在巴孛陵殿的荫庇下，这一神圣之地……注定会发展成为这些震撼世界、包纳世界、引导世界的机构的中心。巴哈欧拉授予了它神圣的职责，阿博都-巴哈预见了它的未来。在运作时，这些机构所遵从的原则也正是支配圣护和世界正义院这一双子机制的原则。"

世界中心的这些机构"正在展现辉煌"，其意义在守基·阿芬第晚年的许多信件中都有所反映。有感而发的乔治·汤曾德曾于1952年1月14日回信，表达了自己荣膺圣辅的感激之情："上帝之胜利的图景日渐临近，您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这一图景展现在了惊叹不已的巴哈伊世界面前。因此番景象而深表震动。请允许我向您献上卑微的颂词，它包含了我无上的敬意和感激。"

在这些信件中，守基·阿芬第揭示了他新近建立的圣辅机构的地位和部分职能。在本天启"形成时代"第二阶段的"最初几年"中，这一"庄严的机构"正在展现，对此守基·阿芬第给予了盛赞。巴哈欧拉不仅预见了这一机构的成立，还在生前任命了几位成员，阿博都-巴哈在祂的《遗嘱》中也正式确定了它的成立。在圣地，圣辅们给予了守基·阿芬第巨大的支持。他们协助圣护修建了巴孛陵殿，巩固了与以色列政府的联系，在圣地大力发展国际捐赠，并完成了建立巴哈伊世界教务管理中心的初期步骤。除此之外，他们还在1952年10月到1953年10月这一圣年期间代表圣护参加了四次伟大的洲际传导大会。会后，在阿芬第的要求下，他们奔波四方，足迹遍布北美、中美、南美、欧洲、亚洲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守基·阿芬第于1954年4月说道，这一机构正在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其标志就是它与参与执行十年计划的总灵理会建立起了联系；圣地之外的十五位圣辅应当在里兹万节期间从各洲的信徒中甄选人员，组成辅助团，其成员将作为圣辅的"副职"、"助理"和"顾问"，并将为十年远征提供更多的帮助。美洲、欧洲、非洲的委员会将由九名成员组成，亚洲为七名，澳大利亚则为两名。各委员会对所在洲的圣辅负责，而对圣辅来说，他们所要做的是与当地

的总灵理会保持密切联系，并把委员会的活动告知他们。他们还将与圣地的圣辅保持联系，后者须担任他们和圣护之间的联系人。这一时期，守基·阿芬第设立了洲际巴哈伊基金，用于支持圣辅的工作。他向每个基金捐赠了一千英镑，作为启动资金。

一年后，守基·阿芬第任命了十三位圣辅作为他的代表，出席将于1957年举办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以选举出新的总灵理会。从正式任命圣辅，一直到他去世，守基·阿芬第一直在借助圣辅完成这一目标。1957年，守基·阿芬第发出了一封长篇电报，此时距离他去世整整四个月。他在电文中告知信徒，“一系列历史伟业圆满成功”，但“外部的敌意”和“内部的持续阴谋愈加明显”，这预示着“光明之军与俗世、宗教两界的黑暗势力定将对峙”，因此，五洲圣辅与总灵理会须齐心协力，携手挫败“内部敌人的邪恶行径，以有效措施对抗其奸诈计谋”，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广大信徒，避免邪恶势力进一步扩散。守基·阿芬第在电报开头指出，圣辅不仅要担当协助总灵理会执行世界灵性远征的新职责，现在还必须履行它的“首要义务”，也就是与总灵理会紧密合作，捍卫巴哈伊世界社团。在这份举足轻重的信件的结尾，圣护这样写道：“号召各洲圣辅与总灵理会间建立无障碍沟通，但凡可行即通电文，递交于各自辅助团。总灵理会毫不懈怠执行不可动摇、不可回避的神圣职责。稳固宝贵的圣教，维护巴哈伊教团的精神健康，提升每位成员的信仰，合理运营来之不易的机构，耕耘全球的事业，实现它最终的使命，这些都直接取决于妥善地分派重任。这些任务目前依靠世界正义院的这两个机构的成员，他们还将依靠另一个机构，即圣护制。圣护制是神授的巴哈欧拉世界秩序教务等级中的塔尖。”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伟大信件中（写于10月，实际上从8月便开始构思），守基·阿芬第再一次强调了圣辅机构的意义和重要性。他在信中不仅任命了最后一支圣辅队伍，而且还迈出了意义极为深远的一步，这便是为各洲设立了辅助团：“世界教务管理秩序正在飞速发展，最近一次对其高层职员的补充涉及到了进一步扩充庄严的圣辅机构。鉴于各圣辅最近承担起了捍卫信仰的神圣职责，在进行这一补充时，这些圣辅需要在每个洲分别任命一个额外的辅助

团。其成员人数要与现在的相等，具体负责照看信仰的安全。这样一来两个机构之间就形成了互补，而原有机构便可以专心投入到协助十年计划的实施当中去了。”

如果守基·阿芬第没有提及圣辅，如果他没有如此明确地指示总灵理会要与作为信仰保护者的圣辅合作，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在他过世后，巴哈伊世界将会沦落到何种景象。在他最后的几封信件中，我们难道没能察觉出地平线上的那一片人手大小的乌云吗？

教长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任命圣辅是守基·阿芬第的职责和权力。在他使命周期的前三十年中，圣辅之职一般仅授予离世之人，唯有一次破例。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圣辅是一位信徒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许多东西方的巴哈伊都在死后得到了他的提名。这其中最为杰出的当属玛莎·鲁特，她被守基·阿芬第尊为自信仰“形成时代”以来的首个世纪中最为卓越的圣辅。唯一的那次例外便是阿梅莉亚·科林斯。1946年11月22日，他致电科林斯道：“您在国际上做出了卓越的服务，当为奉献之楷模。您的服务意义重大，促使我现将巴哈欧拉之圣辅一职委任于您。您是首位在生前就获此殊荣的信徒。何时公布此事尚待斟酌。”守基·阿芬第总是在公开宣布之时把每位圣辅晋升之事告知其本人。其中，弗雷德·朔普夫洛赫尔、穆萨·巴纳尼和我本人是三个得到他当面通知的人。获知此事时，弗雷德·朔普夫洛赫尔正在海法朝圣。我们无法用言语描述，当这一殊荣降临己身时，领受者是怀着何种惶恐、自叹不配和敬畏的感觉。每次突然获得任命的人都会对圣护怀有更深的爱和忠诚。

在海法和阿卡之外，巴哈伊世界教务管理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在其内部的中心，巴孛陵殿的上层结构已经完工，世界中心也总体上得到了巩固。这些经年累月的准备工作包括了一个神圣之地的创造，用守基·阿芬第的话说，这里可以形成信仰诸多最伟大机构的“聚焦中心”。这里绝不仅仅是阿博都-巴哈的母亲、妹妹和弟弟的安息之处。圣护说，“在巴哈欧拉的圣道之中，三位无与伦比的珍贵灵魂仅仅位列信仰的三位中心人物之下，他们的地位高踞于众多英雄、字母、殉道者、圣辅、传导者和教务管理者之上。”

至大圣叶的母亲和弟弟迈赫迪都是葬在了阿卡，能被安葬在母

亲身旁是她的夙愿。当巴希叶·哈努姆于1932年去世时，她被合乎情理地安葬在了卡尔迈勒山上，就在巴孛陵殿附近。她的母亲和弟弟被安葬在阿卡当然是非常不合适的，于是守基·阿芬第便设想有朝一日能把两人的遗骨迁至巴希叶·哈努姆的墓附近。1939年，他从意大利订购了一组双子大理石碑，与至大圣叶墓上的石碑风格相似。幸运的是，尽管正值战事，两座石碑还是被安全运到了海法。然而，“完成这一长久而珍贵的愿望”并不是一道简单的程序，而是极其艰辛的。当时我当然在海法，引用一段我此前出版的作品中的内容：“正当两人的坟墓还处在挖掘过程，人们正在开凿山上坚硬的岩石时，圣护得知圣约破坏者正在抗议，他们宣称巴哈伊们无权将阿博都-巴哈的母亲和弟弟的遗骨移往新的墓地。他们竟然还把自己是死者亲属的声明提交给了政府。尽管如此，政府官员还是很快查明了事实真相：这些自称死者亲属的人曾是教长和池家人的最大敌人，他们背离了巴哈欧拉真正的圣道，转而图谋私利，曾遭到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中的谴责。官员们批准了圣护的计划，并立即签署了挖掘遗体所需的必要文件。守基·阿芬第未作迟疑，两天后，他亲自将至纯圣枝和他母亲的遗骨移至卡尔迈勒山。”

拂晓一过，守基·阿芬第即在几位巴哈伊的陪伴下前往海法。他将两座墓塚一一打开，将遗骨带至海法。他事后曾跟我说起此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让他痛苦万分的一件事。首先，圣约破坏者极有可能集结同党前往墓地，以武力阻止他迁墓；他们还可能得到穆斯林的同情，因为穆斯林认为开棺掘墓是对死者最大的亵渎，令死者蒙受奇耻大辱。除了上述顾虑之外，无论初衷多么崇高，站在一座开启的坟墓旁，毕竟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而对守基·阿芬第这样一个感性的人来说尤为如此！当泥土从教长母亲的灵柩上被一层层移除后，他发觉棺木依旧完好无损，仅有底部腐烂，于是他吩咐大家缓缓移开棺盖。他告诉我说，阿博都-巴哈的母亲身着寿衣，轮廓十分清晰，人们几乎可以看出她的容貌。然而，一经触碰之后，遗体便随即断裂碎开。他下到墓中，亲手将骨骸移入事先准备好的新棺中；随后他们盖上棺盖，将灵柩抬到守候一旁的车辆中，一同前往阿拉伯第二墓地，也就是至纯圣枝长眠的地

方，在那里他们又开启了他的墓冢。由于至纯圣枝先于其母二十年入葬，并且安葬仪式也是草草进行的（当时巴哈欧拉正被严格囚禁于阿卡的监狱中），所以他的棺木已经荡然无存。守基·阿芬第也是亲自收起墓中的遗骸，将其放入放在墓旁的新棺木中。虽然整个过程进展非常顺利，但那好几个小时仍然充满了紧张和不安，令人深感痛楚。守基·阿芬第怀着一份珍贵的信念，最终返回了海法。我将再次引用我在当时写下的文字，因为时至今日，我已无法用更为生动的语言去重述这件事："暮色笼罩着卡尔迈勒山，阿卡海湾上空的尘雾渐渐浓厚。在台阶下的门口处，一群人伫立等候着。突然间有了动静，园丁过来用灯光将门口照亮，一个手持白色杆灯的队列出现了。一位身着黑衫的男人扛着灵柩走来。他是圣道的圣护，肩上扛着的是至纯圣枝——巴哈欧拉的爱子——的遗体。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扛着灵柩，默默无语，在狭窄的小道上缓步走向至大圣叶安葬处旁的一间房子。一位忠实的仆人拿着取自圣祠的地毡和大烛台疾步走在前面，并很快将房间布置妥当。圣护走进了房间，他的面容儒雅而坚毅，一直肩扛着珍贵的灵柩。灵柩被暂时放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面对巴吉宅邸——巴哈伊信仰的朝拜点。然后，在圣护的带领下，这些忠实的仆人返回到门口处，扛起另一个神圣灵柩——巴哈欧拉的夫人、阿博都-巴哈的母亲的遗体，再度登山。"

在这一使命刚刚完成之后，美国灵理会就于12月5日收到了守基·阿芬第的电报，其中写道："至纯圣叶与教长母亲受福佑的遗骸已安全转至卡尔迈勒山陵殿附近。终于洗雪了长久的耻辱。圣约破坏者企图阻挠这一计划，但以失败告终。至大圣叶夙愿得偿。阿博都-巴哈的妹妹、弟弟、母亲和妻子已重聚此地。而在信仰的世界中心，这一地点也将作为神圣命定的巴哈伊教务管理机构之聚焦中心。与全体美国信徒分享喜讯。守基·拉巴尼。"由于当时正值战事，所以圣护需要署全名，而且所有信件都要通过审查。

圣护创立的一切都刻有他个人的印记。高雅的品味，对比例的感觉，在他为阿博都-巴哈四位至亲的陵墓树立纪念碑时，这两点得到了最好的彰显。这些纪念碑是按照守基·阿芬第的指示，在

意大利完成设计的，随后采用白色卡拉拉大理石雕琢而成。在1932到1942年的十年间，它们被运抵海法，安放在了早已命定的地点。在它们周围，阿芬第建立了几座美丽的花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纪念碑花园”，并且将它们逐渐发展成为卡尔迈勒山那道弧线上的支点，此后，在其周围，信仰的各个国际机构簇拥而建。

三周以来，这些珍贵的遗骸一直都存放在那座小屋中。到了12月26日，守基·阿芬第在电报中称：“圣诞前夕，至纯圣枝和教长母亲的珍贵遗骸安放在了巴孛圣墓中。圣诞节当天，他们已安息于卡尔迈勒圣土之中。仪式极为感人，近东信徒的代表出席了仪式。不由想起在美的七年大业，二位圣者令人久久难忘，他们的地位仅次于信仰的双缔造者和完美典范，高踞整个信徒团体之上。我为享有这些特有权利感到高兴，并承诺捐献一千英镑给巴希叶·哈努姆基金，用于确保明年4月份的合同顺利签订，并最终完成灵曦堂的工程。时间紧迫，机遇难得，我们拥有神赐的无穷援助，定会所向披靡。”

圣护有一种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恰到好处的天赋，并始终坚定地继承挚爱的外祖父留下的事业。在完成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深爱的两位神圣灵魂的最终入葬时，他所表现出的无上荣耀和崇敬便是明证。这种情况在宗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有必要在此详细阐述。我再一次援引前文提到的文章：“最后一块石头在两个墓穴中放置妥当，墓穴表面铺好大理石，墓碑竖立在墓穴前上端，四周地面得以平整，通向他们这最终安息之地的道路也修好了……而现在，同样由圣护肩扛着，他们被抬往巴孛灵祠这里，供人缅怀瞻仰。与这个世界里的大人物比较起来，这两位英灵要伟大得多。他们并排安息在那神圣的灵祠入口旁，面对着巴吉宅邸方向，烛光照耀着他们的面庞和脚边的鲜花……太阳落山之后我们再一次聚集在神圣灵祠前……在从未放弃他珍贵之肩负的守基·阿芬第的带领下，英灵的灵柩——阿博都巴哈的母亲在前，至纯之枝在后——被信徒们慢慢从神圣之点抬出……守基·阿芬第亲自抬着亲爱的迈赫迪的灵柩，跟着的是教长母亲的灵柩，从我们面前缓缓经过，再次绕行神圣灵祠。庄严肃穆的送灵队环行灵祠，穿越灯光照耀的花

园，走过白色小径，来到月光照耀的道路上。灵柩被信徒高高抬在头顶上缓缓行进着，看上去好像是它们自行移动……它们在我们面前经过，夜空衬托出它们的轮廓……它们来临了，圣护的面庞贴近他亲担的无价肩负。灵柩被传递到了期待已久的墓穴。现在，人们开始安置至纯圣枝的遗体。守基·阿芬第走下铺着地毯的墓穴，小心翼翼地将灵柩放在了它注定的地方。他亲手在它上面撒了些鲜花，最后，再用手抚摸它。随后，教长的母亲也由圣护用同样的方式在旁边的墓穴里予以安葬……泥水匠按吩咐将墓穴封掩……墓穴顶盖上堆满了鲜花，圣护将一小瓶玫瑰油洒在上面……此刻，响起了守基·阿芬第的声音，他吟诵巴哈欧拉的启示以及专用于这两位英灵移葬的经文。”

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十分谨慎的处理，让人深感焦虑和不安，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令人感到痛苦。而且，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圣护刚刚从一场大病中康复。每当忆起这些，我们就不得不再次感慨圣护人生的悲怆，以及鼓舞他完成各项事宜的勇气、热忱和钢铁般的意志。

在上天的有力指引下，守基·阿芬第最终成功建立起了他的“聚焦中心”。然而，直到十四年后，他才得以将此时迈出的步伐告知巴哈伊世界。他说，这一步将“宣告世界教务管理中心在卡尔迈勒山上的建立。在《卡尔迈勒书简》的最末，巴哈欧拉将这座山称为方舟。”这便是巴哈伊国际文物馆的建立。

30年代初期，就在巴孛陵殿增加了三个房间后不久，守基·阿芬第便在世界中心建起了一座文物馆。当时，文物馆暂时设在了这些房间之中，最初陈列的是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一些珍贵遗物。它们有的归教长的家人所有，有的则来自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境内的巴哈伊老信徒。观摩这些文物成为了一桩感人至深的经历。1937年，当我首次看到它们之后，我这样写道：“假如有人曾经走进一家博物馆，其中的文物的确来自耶稣的时代和祂的生活，那么这对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可以亲眼目睹祂穿过的便鞋，那双陪伴祂从伯利恒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沾满灰尘的便鞋，或者是那件祂佩戴于双肩的斗篷，亦或是为祂遮挡炎炎烈日的衣衫，祂

的信仰的传人将会表现出怎样的信心、感慨乃至敬慕呀！如果他们的双眼能够定格在池亲笔所写的一行字上……对于世上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经历的意义超越了他们的想象；上帝的意志尚未完全展现在人类面前，而巴哈伊信仰是上帝意志的最新启示，作为它的信徒，我们却被赐予了这一无可估量的特有权利。”

随着巴哈伊对文物馆的了解逐渐加深，前来拜访的朝圣者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看到具有历史价值的神圣文物在此得到了十分完好的保存、美轮美奂的展示和饱含崇敬的陈列，于是便开始从波斯送来一些堪称无价的物品，它们都与信仰的三位中心人物以及殉道者和英烈有关联。这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巴孛的遗物，它们由阿夫南家族捐赠，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收藏。陈列的规模日渐增大，到后来，另外一间小房子也被圣护改造成了文物馆，也就是在至纯圣枝和他母亲入葬前，存放他们遗骸的地方。为方便起见，这两间文物馆被称为“主陈列馆”和“辅陈列馆”，或者被直接称为“旧馆”和“新馆”。

1954年，也就是世界远征的第一年间，守基·阿芬第决定开始修建“主建筑中的首个工程”，它们“将构成卡尔迈勒山上世界巴哈伊教务管理中心的所在地”（圣护语）。他打算修建一座大楼，用来存放在圣地收集而来的文物，这既是当务之急，也切实可行。当时，这些文物被分散保存在两座建筑中的六个厅室内。到1954年的诺鲁孜节的时候，人们已开始为这座大楼挖土奠基。在为心中的重要建筑考虑最初设计方案时，守基·阿芬第遵循了三个原则：它必须美丽、端庄，有经久不衰的价值。它不应像一些转瞬即逝的现代建筑（在他看来，大多数现代建筑都丑陋不堪），在这样一个试验的年代，它们总是寻求新的形式。他极为推崇古希腊的建筑，认为雅典的帕台农神庙是人类最美的建筑。他把帕台农神庙的比例作为他的模型，但把柱顶的秩序由多利安式改为了爱奥尼亚式。最后的设计方案融入了他的许多建议，并最终得到了他的批准。这座被他称为“庄严雄伟、美丽夺目的建筑”于1957年竣工。它耗资约二十五万美元，同巴孛陵殿一样，其原料也是在意大利订购、雕琢并最终完成的，随后被运往海法，完成最后的组装。每一块石头都

有各自的编号，而且它们最终的安放位置也在图纸上做了标示。除去地基和用于加固地板、墙壁和天花板的水泥，这几乎是一座在国外完成建造，而在当地树立起来的建筑。

守基·阿芬第是一个独具匠心的人，在他人的观点和建议面前，他可以保持超然，在完成工作时，他力求快速、高效。这些品质在他亲自处理这项工程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首先，他花了大量时间考察研究，通过在地面拉绳标记出大楼的维度和准确的位置。在最终确定其所在地之前，他做了数次改动。随后，他又对楼前的地区进行了景观美化，铺设了小路，种植了树木和草坪。他还告知勒罗伊·约阿斯（他当时是这项工程的本地监管，乌戈·贾凯里负责监管工程在意大利的部分），大楼应当从尾部建起，让正面融入围绕在它周围的花园中，大楼三面都能完整延伸，只留下五米左右的空间。最后，当大楼拔地而起时，花园已完全长成。而当大楼全部竣工时，四周远非通常施工后一片狼藉的样子，仿佛大楼已在那里矗立了多年。圣护的做法可谓恰到好处。他带领众人，以他无可挑剔的品位和对比例的完美感觉，在他生前就使大楼完全竣工。圣护的准备工作也是面面俱到，他亲自购买了用于装饰文物馆的家具和摆设，等到布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一应俱全。他勤勤恳恳地收集在主、辅文物馆中的文物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物品，提前为它们设计好了背景，最终几乎可以丝毫不差地按他的本意安放。

在最后一封致巴哈伊世界的里兹万文告中，守基·阿芬第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这座他亲自筹建的文物馆大楼的满意之情。在宣布了大楼竣工之后，他写道：“它斑斓的色彩、古典的样式、优雅的比例，与另外一边拔地而起、庄严肃穆的金顶陵殿交相辉映。一个世界性信仰的中心机构不久将屹立于上帝圣山的中心。文物馆大楼的建立，为这正在彰显的荣耀增光添彩。”

1954年11月27日，在教长的辞世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守基·阿芬第致信巴哈伊世界。他反复述说了这栋大楼的意义，称我们终于得到了这片渴望已久的土地，这使得建立巴哈伊国际文物馆成为可能。他继而说道：“反过来，这栋建筑的落成预示着其他建

筑也将在‘形成时代’的不同阶段拔地而起，作为圣护、圣辅和世界正义院等神圣命定机构的教务管理所在地。这些风格和谐的建筑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弧线，环绕着至大圣叶（巴哈伊天启中地位最高的女性）、她的哥哥（巴哈欧拉为加快巴哈伊世界的发展和统一而做出了牺牲）以及他们的母亲（巴哈欧拉称，她是自己所挑选的‘上帝所有世界中的伴侣’）的安息之地。这一浩大工程的竣工标志着神圣命定的教务管理体制（其开端可以追溯到巴哈伊信仰的‘英雄时代’）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守基·阿芬第非常重视这一“弧线”，连线条都是他实地仔细考察后的结果。它就像一只拉开的弓，在卡尔迈勒山上延伸，环绕着阿博都-巴哈几位至亲的安息之地，其右侧现在坐落着文物馆。1957年，圣护在最后一封里兹万文告中宣布了“弧线”的完工，文告中写道：“我们一直计划扩建‘弧线’，将它作为日后建立巴哈伊教务管理中心建筑群的基地。这一计划现已成功实现。”

第十二章　世界中心的崛起

在海法和巴吉，构筑巴孛陵殿的上层建筑，建造文物馆，修筑卡尔迈勒山阶梯，或是进行其他类似活动时，购买土地是成功的基本条件和巩固因素，的确，正是土地的购置使得各项工程成为可能；圣护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同时这也是他在整个使命周期中一直致力的事业。在去世之前，围绕着各个陵殿，包括最为神圣的陵殿——巴哈欧拉之墓，以及巴孛、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的母亲、妹妹和弟弟的安息之地，圣护都成功地建立了巨大的土地保护圈。此外，他还选定并主持购买了卡尔迈勒山上的土地，作为将来在圣地建造灵曦堂的地址。阿博都-巴哈去世时，卡尔迈勒山上的地产很可能还不到一万平方米，1957年，守基·阿芬第把这个数字增加到了二十三万平方米；1921年，巴吉的地产为一千平方米，到1957年则增加到了二十五万七千平方米。圣护在此领域的成就仅从这两项对比中便可见一斑。由于信徒们的慷慨，由于他们的遗赠，由于他们积极地回应圣护在危机时刻发出的呼吁，由于圣护在世界中心设立的基金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守基·阿芬第成功地购得了上述面积的土地，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信仰在世界中心的状况。

1931年5月，圣护致电美国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电报中写道："美洲总灵理会已在巴勒斯坦登记成为受认可的宗教机构，将被授权作为美洲信徒的受托人持有相关财产。已将转到其名下的产权证寄往美洲总会。信仰的名望大大提高，其根基也得到了巩固。致爱意。"这是建立各国总灵理会的巴勒斯坦分部（后来改为以色列分部），并将圣地拥有的财产注册在各分部名下的第一步。尽管处理这些财产的权力完全归属于世界中心，但是，这次运动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信仰的威望，各圣所得到了支持和保护，信仰的世界性

特质受到了当局的重视，而各国的巴哈伊社团也大受鼓舞，并得到了巩固。从守基·阿芬第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和信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原则和动机："印度总灵理会的巴勒斯坦分部成立了。祝贺印度和缅甸的信徒们，他们注册成立的总灵理会成为东方巴哈伊世界第一个合法成立的机构……""……我们在卡尔迈勒山的陵殿周边获得了广阔且珍贵的地产。在巴哈伊世界，优异的服务不断丰富着这一杰出社团的成就记录，作为表彰，我将安排把这块土地转到美洲总灵理会巴勒斯坦分部名下……""一种卓越的精神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信徒注入了活力，他们付出了持续可嘉的劳动，我们将在圣地不遗余力，以此作为对这种精神以及他们劳动的献礼……要尽快将巴哈伊国际捐赠中的一部分转到贵灵理会新成立的以色列分部名下，这一行为将立刻使贵灵理会大受灵性和物质裨益，并巩固联结它和世界中心的纽带……"

到守基·阿芬第去世时，他已经建立了九个总灵理会的分部，分别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不列颠群岛、伊朗、巴基斯坦、阿拉斯加，以及印度和缅甸的巴哈伊总灵理会。

守基·阿芬第建造起了巴孛陵殿的另外三个房间，并完成了巴哈欧拉宅邸的修复工作，从而切实地证明了当地巴哈伊社团的实力。同时，他战胜了圣约破坏者，以此向英国当局证明，他拥有全世界巴哈伊信徒的坚实后盾。此时，他开始着手为巴哈伊圣所免除市政和政府税收。如果某座建筑明显是灵性聚会的所在地，并且常常受到朝圣者的拜访，那么使其免除税收并不难，但是，要为巴哈伊信仰日渐增多的土地获得免税待遇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大部分土地都是登记在个人名下的。政府和市政当局极不情愿丧失这些税收来源，他们非常担心这将会开启一种先例，其他社团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随之效仿。正因如此，守基·阿芬第的成就才尤其伟大，他使得全国的巴哈伊建筑和财产最终免除了一切税务，包括海关关税。这方面的主要胜利都是在英国托管时期取得的，在新的国家于1948年建立之前，以色列政府接受了巴哈伊已经取得的税收地位。

当守基·阿芬第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为获得这种认可而努力的时候，驻巴勒斯坦的高级专员亚瑟·沃筹普爵士（Sir Arthur

Wauchope）曾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从他给守基·阿芬第的信中可以看出，亚瑟爵士是一个温和、有礼、高尚的人。1933年6月26日，他在写给圣护的信中说道：“我已经收到您于6月21日的来信，并迫不及待地回信以表示感谢，同时也请您放心，如果您提到的案件由我负责，我将根据巴勒斯坦（圣地）协商令[①]来做决定，尽我所能去处理。” 将近一年之后，守基·阿芬第于1934年5月10日致电美国，电报中说道：“与巴勒斯坦当局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卡尔迈勒山上陵殿建设用地周围的整个区域获得免税待遇。”同时他还指出，在他看来，这一步等于“使外界间接地认可了信仰国际中心的神圣性……”与此相关的还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亚瑟爵士于1934年5月16日写给守基·阿芬第的，他在信中写道：“我希望这次免税会有助于您继续推进卓越的工作。”另一封则是守基·阿芬第六天前写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刚刚从地区专员那里收到了一条令人高兴的消息，政府批准了我们的申请，免除了卡尔迈勒山上所有巴哈伊财产的税收。”他继而表达了他本人以及巴哈伊们对爵士阁下的深深感激，因为爵士对此事的关注富于成效。他还说，“我们计划逐步美化这块土地，使海法人民能使用和享受”，而这个决定为我们的计划开辟了道路。

如果只看到了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守基·阿芬第为购买土地、获得免税、保护世界中心的财产所经历的一切。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只摘取圣护的一封电报。1935年3月28日，圣护致电美国总灵理会，他在电报中写道：“合同已签，我们将购买卡尔迈勒山上坐落在中心地区且专用于陵殿建设的杜米特地产，并将其转移到美国灵理会巴勒斯坦分部名下。历时四年的诉讼被撤销，在这期间，巴哈伊世界不断向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请愿。拥有人开价四千英镑。已筹得半数。美国信徒可否在五月末之前联合捐出一千美元，再在九个月里募集余下的一千美元。我

① 该命令〔Palestine（Holy Places）Order in Council〕是英国政府于1924年7月25日发布的一道命令，主要内容是说一切有关圣地的问题都不归任何地方法庭判决，而必须由英国驻巴勒斯坦专员裁决，以避免巴勒斯坦的各宗教发生纠纷和争执。——译者注

不得不呼吁，整个美国社团要将信仰的国家利益放在世界中心至高的迫切要求之后。”两天后，美国灵理会回复道，美国巴哈伊社团“将团结一心履行挚爱的圣护赋予它的光荣特权”。

守基·阿芬第多次称圣地为信仰的“心脏和神经中枢”。作为圣护，他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护它，发展它，并将它的荣耀传播出去。在与政府和市政当局的正式接触之外，守基·阿芬第还与许多非巴哈伊人士（有的十分有名，有的就是普通人）保持着礼貌、友好的关系。宽宏大量是圣护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绝无偏见，也毫不狂热，他的同情心和谦恭有礼令他卓尔不群，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了他与各界人士的通信之中。在他的使命周期之初，圣护与俄国的亚历山大大公（Grand Duke Alexander）保持着长久的通信，从信中的语气来看，他明显非常喜欢大公。他这样称呼对方：“我真正的服务上帝的兄弟！”“我亲爱的上帝之爱中的兄弟！”有一个运动叫“灵魂的统一”，亚历山大大公非常感兴趣，守基·阿芬第曾鼓励他道：“我们的目标和原则惊人地相似，这令我惊叹不已，我祈求万能者，当仆人们为苦难的人类事业服务时，他们能得到保佑。”在一封给圣护的信中，亚历山大大公这样写道：“……亲爱的兄弟和工友，我必须向您坦白，在我卑微的工作中，我偶尔会感到消沉……大多数人都受一股邪恶势力的影响，其力量令人震惊。”守基·阿芬第的回复十分优美：“……我亲爱的服务上帝的工友，自私、粗鄙的物质主义浪潮日渐高涨，似将吞没世界，请相信，在它面前，我也常有不知所措之感。我以为，不管我们共同的任务多么艰苦，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并且要不断热忱地祈祷，以使上帝永恒的精神能够注入人的灵魂，让他们带着新的远见卓识挺身而出，服务并拯救人类。我认为，在这紧张而阴郁的日子里，我们必须将祈祷和个人的不懈努力置于更为显著的位置上……”

守基·阿芬第与许多皇族成员保持着联系，不仅有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和她的许多亲属，还有希腊的玛丽娜公主（Princess Marina，后来成为肯特公爵夫人），以及埃及的卡卓雅公主（Princess Kadria）。守基·阿芬第会向他们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拉明顿勋爵，许多驻巴勒斯坦的高级专员，东方学者，大学教

授，教育家，等等）寄去最新的《巴哈伊世界》，或者他的最新译作，并且还会附上他的名片。似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使用名片。对他而言，名片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做记录！当朋友们遭受丧亲之痛时，圣护总会一丝不苟地发信吊唁（只要在这个关系中彼此都是礼貌、恭敬的），表达他对当事者“巨大损失”的“深切同情”。这些通过电报或电传发出的信息深深地感动了收信者，并使得圣护在他们之间声名远扬，因而圣约破坏者的极力扭曲便不攻自破。当人们新婚或升迁时，圣护也常常向他们表示祝贺。

除了这些个人关系之外，守基·阿芬第与一些非巴哈伊组织的联系要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尤其是与世界语学者，因为他们的整个目标正是巴哈伊信条的践行：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必须采用一种通用的辅助语言。我们保存有守基·阿芬第写给1927年、1928年、1929年、1930年以及1931年举办的国际世界语学者大会的信件，当然，在此之外他也写过许多其他类似性质的信件。如果有人示好，守基·阿芬第总是热情地回应；不仅如此，他还主动选出代表，派他们参加与巴哈伊利益相符的会议。我们发现，1927年他曾致信国际世界语学者协会，表示玛莎·鲁特和茱莉亚·戈德曼（Julia Goldman）将作为巴哈伊代表参加他们在但泽（Danzig）的会议，他深信这“将增强世界语学者和巴哈欧拉追随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巴哈伊们最主要的信条之一……就是全人类要采用一种国际辅助语言。”在第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学者大会召开时，圣护致信与会代表和朋友：

> 我亲爱的服务全人类的工友们：
>
> 很高兴写信给你们，并全心全意地祝愿你们……在为促进全人类福祉而做的工作中获得圆满成功！
>
> 我相信，你们将有兴趣了解，在阿博都-巴哈反复而有力的劝诫下，祂的许多追随者，即使世界语的光辉还未曾照耀到的波斯偏远村落，或者东方其他的土地，都已积极、热情地参与到了世界语的学习与教授中来，他们对世界语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许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巴哈伊们珍视的理想十分类似。圣护本人深受他们的敬重。1926年，弗朗西斯·荣赫鹏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曾就“世界信仰大会”的相关事宜致信守基·阿芬第，信中写道：“我想请您赏光，希望能说服您来英国参加此次大会。您的与会将带来巨大影响，我们将不胜感激。我们非常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圣护谢绝了他的邀请，但是安排提交了一篇巴哈伊论文。他认为，他的计划和工作使他不能开启这扇门。

1925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复国主义行政部邀请圣护参加一项活动，活动内容与一所大学在耶路撒冷的成立有关。守基·阿芬第在4月1日复电道：“承蒙友好邀请，憾无法参加。巴哈伊们希望并祈祷这一学府的成立有助于这块土地的复兴，这里寄托了我们所有人的回忆，也寄予了阿博都-巴哈最高的希望。”对方的回复也十分友好，其中说道：“犹太复国主义行政部非常感谢您发来的信息和良好祝愿。我们相信，新学校的成立不仅有助于学习和科学的进步，还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而这一理想恰是巴哈伊们为之竭诚服务的。”在二十五年之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联系：“希伯来大学非常高兴收到您寄来的一百英镑支票，作为守基·阿芬第·拉巴尼阁下对本校工作的捐赠……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守基·阿芬第阁下对本校正在开展的重要工作有所了解，也很高兴收到您的慷慨资助……”

1930年12月，守基·阿芬第给印度发去了一封意义非凡的电报。这封电报表明，一直到至大圣叶生命的尽头，守基·阿芬第总会深情地把她写进电文和信件，同时这些信息又让人感到非常合适：“代表阿博都-巴哈的妹妹至大圣叶以及我本人向印度亚洲妇女大会致意，我们对他们的商讨怀有真切而深刻的兴趣。愿全能者指引并保佑他们崇高的努力。”

在这些与著名人士及各种协会的广泛通信之外，守基·阿芬第还会在家中接待一些受人尊敬的人士，如塞缪尔勋爵及夫人（Lord and Lady Samuel）、阿博都-巴哈的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Sir Ronald Storrs）、摩西·沙雷特（Moshe Sharett，后来成为以色列最受爱戴的杰出官员之一）、诺曼·本特威奇（Norman

Bentwich）教授，以及许多作家、记者和杰出人物。

这些联系和交流固然重要，但毋庸置疑，不管是在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统治期间，还是在独立战争结束、以色列政府建立之后，圣护与世界中心的官员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虽然他与两个政府的代表关系非常友好，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信仰的各类敌人（不管是不忠的巴哈伊，还是其他宗教团体心怀嫉恨的成员）在暗中不断制造事端，那么这种关系本应该更好，并能够成就更大的事情。而很多情况下，守基·阿芬第缺乏得力助手，使得此类事件的影响进一步加剧。有一次他跟我说，许多很好的人都不具备好的判断力，而许多聪明的人又欠缺好的品格，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他指出，最理想的情况是一个好人同时又很聪明。作为圣护，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但在为他服务的人中，却很少有人能够兼而有之。我还记得，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波斯谚语，说拥有一个聪明的敌人要胜过拥有一个愚蠢的朋友！在这方面，守基·阿芬第需要应付许多事情。有一回，圣护需要处理的是一位家庭成员的一句话。此人告诉我，一个英国人（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说他想要拜访守基·阿芬第，这位家庭成员便回复说，欢迎他来拜访，但他绝不能期待圣护回访，因为圣护从不这样做。我们很容易就明白这句话是多么不妥和轻率，它在守基·阿芬第周边建立起了一堵误解的围墙，再加上那些真正不怀好意者的谣言，守基·阿芬第在公众面前便被误解了，并给人一种很不和善的感觉；如果这个人见过守基·阿芬第，他就会被圣护深深地打动，而不会去想圣护是否会回访。但是，在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后，他当然就再也没有接近过圣护。但是，圣护自己的判断是十分完美的，他严格指引着想成为他的同事和下属的人们，在许多看似无望且复杂的形势下，他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他自己有着清醒的头脑，可以知道那些头脑不清醒的人是怎么想的，所以他不会不合时宜地做出不明智的事情，也不会因他人的拒绝而措手不及，即使这种拒绝会使圣道陷入僵局，而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无法使圣道从中解脱出来。

当我们思考守基·阿芬第是谁，思考他崇高的地位和显赫的能力时，我们只会深深地惋惜，因为他不能拥有世界上伟大的人作

为朋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伟人本可以带给他一份有趣的、充满活力的友谊。在和我谈论时，他经常说他的生活中缺乏这种关系。守基·阿芬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透一个人，其准确性与其说是一种人性，不如说是神性。

在处理与政府和市政当局的所有关系时，守基·阿芬第总是从一开始就向他们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巴哈伊信仰是一个独立宗教，具有普世性质，其永久的世界灵性和管理中心位于圣地。他用三十六年的时间让巴哈伊信仰赢得了当局认可，使信仰享有其应得权利，得到上述地位，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信仰的承袭领袖，在出席正式场合时，他本人应该享受合理的待遇。鉴于诸多原因，比如巴哈伊社团在巴勒斯坦的数量还微不足道，教长刚刚离世，圣约破坏者便开始挑战他的权威，所有的行政当局都尽量避免涉足宗教问题，等等，英国和以色列政府都不愿给予圣护与其重要职位相称的尊敬和级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守基·阿芬第极力避免参加官方的聚会（只有很少的例外）。1868年，阿博都-巴哈来到阿卡，一直到祂于1921年离世，祂都从未去过耶路撒冷。守基·阿芬第说，教长享有崇高地位，祂对耶路撒冷的拜访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祂知道，祂绝不会受到与此相称的待遇，于是祂避免去那里。想到这一点时，我们便会对这场斗争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有所了解。

如果守基·阿芬第接受了地方当局的邀请，作为一名拜访海法的高官出席这样的场合，那么他会遇到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在使命周期之初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圣护跟我说，有一次，他参加了地区专员迎接高级官员的招待会。进入房间后，圣护发现高级专员正坐在房间中心的上座，靠近高级专员的唯一空位在他的右边。守基·阿芬第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坐了下来；因为这是为地区专员留出的位子，而他又不想公开要求圣护把位子让出来，于是叫人又给他搬来一把椅子。守基·阿芬第非常清楚，在任何类似的场合，这样的事情是不允许发生的，所以他再也没有参加过此类聚会。

在一封写给斯图尔特·赛姆斯上校的信中，圣护似乎对这种情

况有所暗示，至少是对他所处的窘境有所暗示。上校是前任的海法行政长官，最近已调至耶路撒冷，担任巴勒斯坦政府的主任秘书。1925年5月17日，守基·阿芬第写信祝贺他获得这一任命。之后赛姆斯上校似乎到海法进行过一次正式访问，因为我们发现圣护在25日又给他写了信，其中写道："巴哈伊社团的地位仍不明确，这也带来了各种相关的顾虑，鉴于此，我无法亲自参加为迎接您而举行的各种公开聚会，对此我深感遗憾和抱歉。于是，我发现自己失去了这一乐事和特权，不能以地方社团的名义乃至代表全世界巴哈伊向你们表示感谢，阿博都-巴哈突然去世之后，各种问题不断出现，你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和公正态度。现在我只能选择从这些公开聚会中抽身而出，我相信你们会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热情和友好的缺失，巴哈伊们对贵政府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坚定的信心。"他继而邀请上校和赛姆斯夫人以及她的母亲到花园中用茶，如果不方便，他会亲自登门拜访。有意思的是，在将近二十五年之后，圣护又面临了类似的问题，这一次与本·古里安首相首次拜访海法有关，出于相同的动机，守基·阿芬第选择了类似的处理方式。

圣护与赛姆斯上校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上校作为腓尼基的行政长官，曾在教长的葬礼上讲话，并参加了教长家中的十四日聚会。1922年4月5日，当赛姆斯上校回国时，守基·阿芬第曾写信给他，信中写道："出于健康方面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海法，在此期间，我指定阿博都-巴哈的妹妹，巴希叶·哈努姆作为我的代表。"他继而说道："为了协助她管理巴哈伊信仰在国内外的事务，我同时指派了一个由以下巴哈伊组成的委员会（八位当地社团的信徒，其中有三位是阿博都-巴哈的女婿）……委员会的主席将于近日由其成员选举产生，巴希叶·哈努姆的签字将代表我的权威，处理任何在我离开期间需要考虑和决定的事务。我对不能在启程之前见到你深感遗憾，深知你的正义感将在紧要之时保卫巴哈欧拉圣道的利益，对此我满怀欣慰。"

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圣护对行政长官的品格的敬意体现在了他在返回圣地后写给对方的信里，他写道："我愉快地告知您，在长期的休息和冥想之后，我已返回圣地，重新担起了我的职

责。”他继而说道：“在挚爱的外祖父去世后，我深感疲惫、迷茫和伤心，无法高效地处理巴哈伊信仰的事务。现在我已恢复体力、重振精神，可以继续履行繁重的义务。此时，我希望向您表达诚挚的谢意，在我离开期间，您对信仰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接下来的一段里，我们能读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温暖：“能够重温我与您及夫人的交往令我深感愉悦和荣幸，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交往将发展成为温暖、持久的友谊。”守基·阿芬第以“真诚的问候和最美的祝愿”作为信的结尾，署名时只写下“守基”二字。赛姆斯上校后被封爵，并在二战之前和二战过程中任苏丹总督。两人之间的通信持续了多年，甚至在赛姆斯卸任之后他们仍有书信往来。

1927年，守基·阿芬第写信给他，他写道：“我冒昧地附上最近就埃及局势写给西方的信函，供您查看……我们正面临着微妙、复杂的问题，所幸管理巴勒斯坦的政府以公平和正义为己任。念及于此，我们深受鼓舞、深表感激。很高兴您对《巴哈伊年鉴》感兴趣……”信的结尾同样送上了最真诚的问候。1935年12月27日，赛姆斯（当时已是斯图尔特爵士）从“哈图姆，宫殿”给守基·阿芬第写信，他写道：“非常感谢您的圣诞节问候以及您寄来的书……” 一年之后的1936年4月9日，他又从苏丹给圣护写信道：“感谢您寄给我《巴哈伊世界》的第五期。我希望巴哈伊精神也能融入到国家和国际事务中！相信您和您的工作都非常好……”

在守基·阿芬第的档案里，赛姆斯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45年7月。守基·阿芬第总是温暖、谦恭地对待他人，如果对方也能以同样的温暖和谦恭对待他、回应他的姿态，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必定持久，此信便是明证。圣护此前得知，赛姆斯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了。赛姆斯写道：“您的电报令我和妻子非常感动。感谢您能惦记着深感悲痛的我们……”在信的最后，他这样写道：“如果您要拜访英格兰，请告知我们。能够再次与您见面将是我们的荣幸。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地区专员的职位并不太高，但他却对巴哈伊社团在世界中心的事务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守基·阿芬第最初开始为巴哈伊信仰赢得认可、谋求实质权利时，这一职位由爱德华·基思-洛奇（Edward

Keith-Roach）担任。此人是一位获得英帝国勋章的军官。尽管他与斯图尔特上校的才干截然不同，不过他却很友好，帮过不少忙，而且似乎非常喜欢圣护，两人在1925年到1939年间一直保持着通信。有时，基思-洛奇是十分合作的，这当然是因为他知道更高层的当局同意他这样做。他不仅会为守基·阿芬第的工作提供便利，以加快工作的进程，而且还会为圣护提供一些建议，其中有一些还被圣护付诸实践。从我们发现的复件来看，圣护写给他的第一封信非常简单，不过却表现出了圣护一贯的热情（如果对方以正确的态度做出某种表示，那么圣护总是会热情地回应），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引用出来。信开头只简单地写道："海法，25年12月25日"。圣护在正文中说道："亲爱的基思-洛奇先生：您友善的欢迎信和问候令我十分感动，我迫不及待地给您回信，请相信，我将回馈您在信中表达的情谊。祝愿圣诞节快乐并送上我最美好的祝福！您真诚的朋友，守基·阿芬第。"

从守基·阿芬第和基思-洛奇的许多信件往来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两人是经常见面的。1935年，基思-洛奇在耶路撒冷住院，当时守基·阿芬第在给他的信中写道："非常感谢您的来信……得知您的身体正在好转，我非常高兴，相信等您回来时，您将能够与我在安息之圣所周围新建的花园里一起品茶。"从守基·阿芬第与基思-洛奇和赛姆斯的通信来看，圣护经常邀请二人到卡尔迈勒山上的花园喝茶。在邀请赛姆斯上校时，有时还会邀请上校的夫人。这不仅是守基·阿芬第向这些政府官员表达善意的方式，同时，通过将他们带到巴哈伊财产的中心，圣护也是在向他们展示花园建设的最新进展，而且我相信，他肯定也会借此向他们介绍未来的计划，并寻求他们的共鸣与支持。实际上，许多这样的会晤都是为了这个特殊的目的。

从开始担任圣护到二十世纪40年代，守基·阿芬第经常要会见与他的重要事务有关系的官员、工程师、律师以及其他非巴哈伊人士；他从不去他们的办公室，而是去他们的住处拜访，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会到圣护家中，或者圣护与他们在陵殿周围会面。这些友好的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2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便是一

例。这一年的11月19日，至大圣叶陵墓的纪念碑被运到了海法港。20日，守基·阿芬第给基思-洛奇写信道："恳请您就大理石纪念碑一事提供帮助。这座纪念碑将矗立在阿博都-巴哈妹妹的陵墓上，已于昨天下午安全运抵海法。一个级别较低的海关官员表示，如果能够得到上级的同意，他愿意免除关税。因此，我请求您的帮助，相信您会尽全力为纪念碑运进巴勒斯坦提供便利。就其某些特点而言，这件艺术品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向您表示深深的感谢！您真诚的朋友。"11月22日，守基·阿芬第再次致信道："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请求做出了友好而快速的回应！纪念碑已经安全送到，我对即将进行的立碑工作做了必要的指示。再次感谢并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纪念碑在免除关税的情况下运进了巴勒斯坦，这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先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信仰在世界中心获得免税待遇的领域逐渐增加，最终从以色列获得了诸多委任统治时期不曾取得的特许权利。

四天后，守基·阿芬第写信提醒地区专员，请他关照自己之前提出的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要求；这封信紧接着上面引用的两封信，展示了一种高超的交际手腕，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这归功于上帝和守基·阿芬第，因为前者提供了一连串的事件，后者则敏锐地抓住了其中的机会。

亲爱的基思-洛奇：

我正在为台阶的扩建做必要的准备，它们将一直延伸到德国殖民地，最终将成为陵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想您肯定会对此很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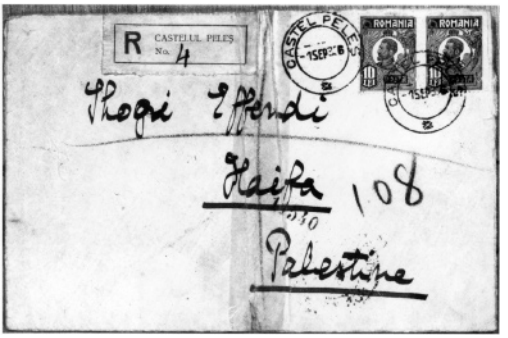
我联系了市政工程师，他非常赞同并支持我们的项目。因此，我打算向城市规划委员会提交一份正式的声明，以陈述我们开辟和扩建台阶所需的条件，我们将自筹资金，并且会遵照已经采用的整体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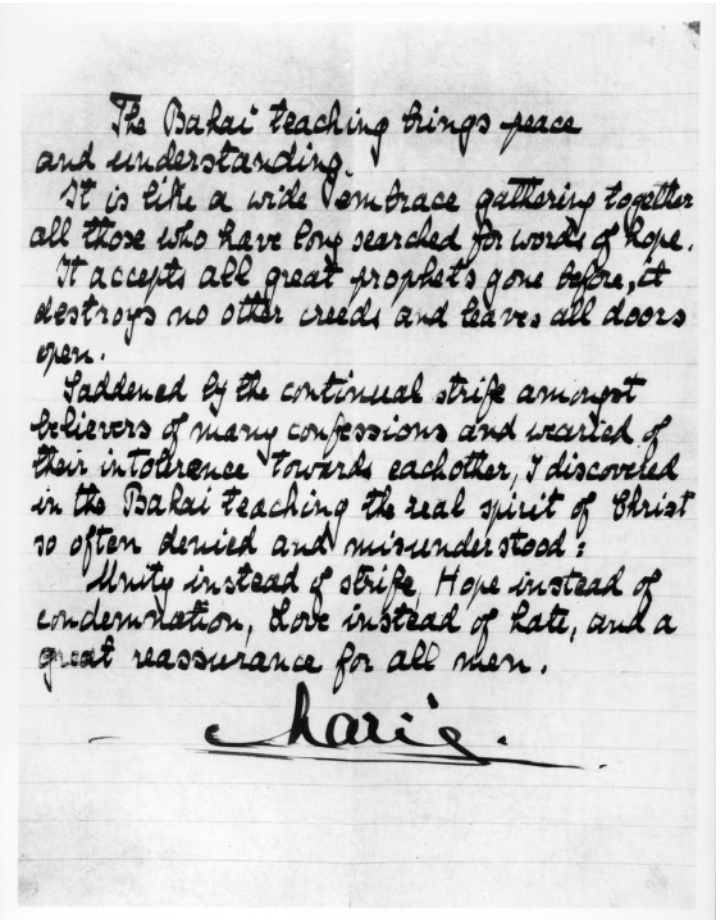
我真诚地希望，在1933年年底之前，您曾表达的愿望将彻底实现，而我也将全心全意地为此而努力。

巴吉宅邸是巴哈欧拉陵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最近提

图四十五　返回海法后的圣护

守基·阿芬第与教长的老园丁伊斯梅尔·阿加在一起，1921年摄于教长家中的花园。





图四十六　玛丽王后的手迹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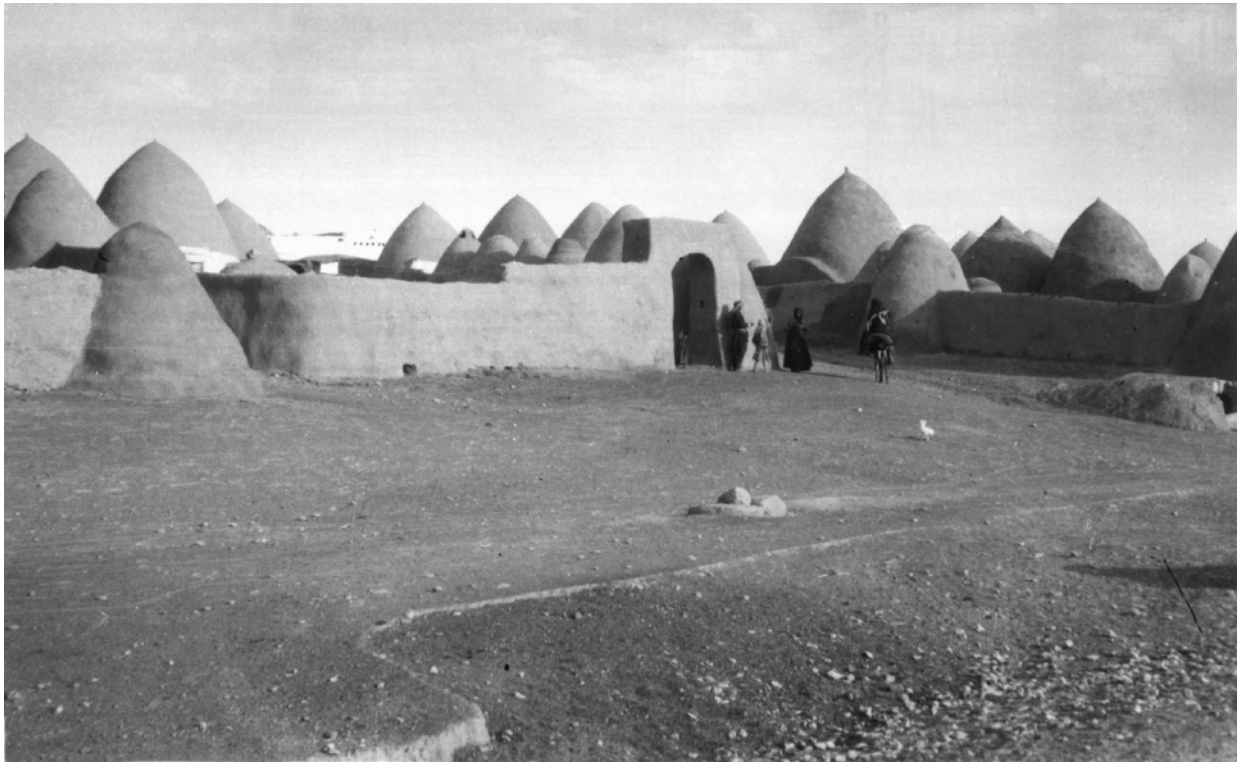
上图：罗马利亚玛丽王后于1926年8月27日在她的至爱住所布兰，给圣护写了第一封信。图为该信信封。下图：王后殿下为巴哈伊教义的意义所写的颂词。

图四十七　守基·阿芬第的手迹副本

左图选自1927年11月写给东方巴哈伊的一封信，内容与玛莎·鲁特女士的服务有关；右图是《隐言经》中的几句话。

图四十八　野外旅行

1929年，作为一名乘客的守基·阿芬第与一位英国猎人乘车穿过东非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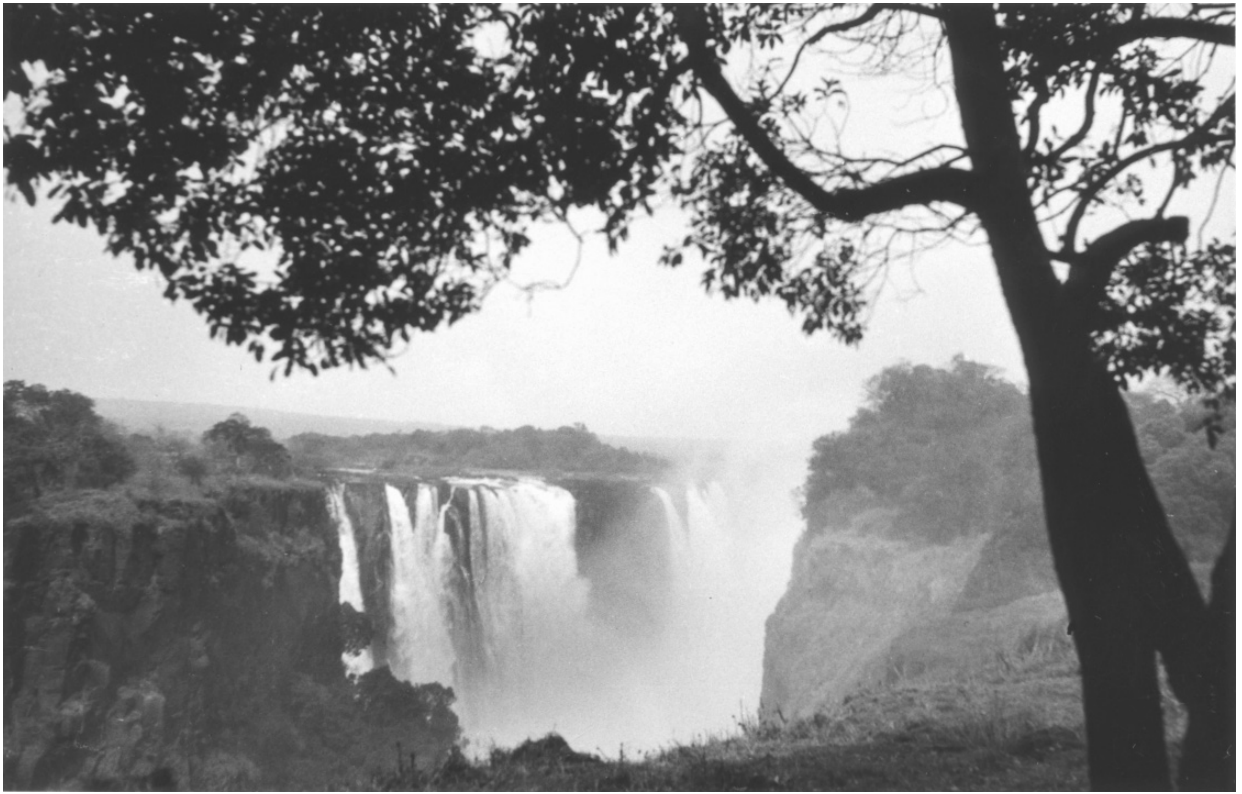


图四十九　圣护拍摄的一张照片

一个美丽的村落，典型的非洲“泥村”。圣护在1929年从开普敦到开罗穿越非洲时拍摄。

图五十　尼罗河上的渡船

正在使渡船穿越尼罗河上一片长满纸莎草的沼泽地，守基·阿芬第本人摄于1929年。



图五十一　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1929年）

守基·阿芬第的摄影代表作，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之一，摄于非洲的津巴布韦。

图五十二　非洲风景

上图：圣护拍摄的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此树生长于维多利亚瀑布附近。下图：圣护站在塞西尔·罗兹的墓地旁，摄于1929年。

交给您的申请中也提到了其神圣性。相信这份申请会得到您的支持，同时，这一建筑所需的物品即将运达，相信免除关税的必要证明也会得到批准。

1932年11月26日于海法

很明显，守基·阿芬第不但把相关信息全部告知了地方官员，而且还礼貌、友好并巧妙地一再提醒，以确保巴哈伊信仰获得应有的权利。基思-洛奇当然确认了巴勒斯坦的政府对守基·阿芬第正在开展的工作是赞同的，因此他也积极配合，提供了诸多帮助和建议。于是，守基·阿芬第在1934年2月2日给他写了下面的这封信。在为巴哈伊财产获得免税待遇的长期斗争中，这封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亲爱的基思-洛奇：

按照您的建议，随函附上了一份正式的声明，而且作为巴哈伊信仰的圣护，我已签署了这份文件，相信它会帮助卡尔迈勒山上的国际性巴哈伊陵殿的周围土地获得免税待遇。

我们的镀金装饰大门将要运抵海关，它将构成至大圣叶陵墓入口的一部分，如果您能够签发免税授权，我将不胜感激。

随函附上陵殿上门的钥匙，希望当您从这里的花园走过时，可以到陵殿中观赏。

您对巴哈伊社团的利益提供了诸多帮助和支持，请相信，对此我将怀有永远的感激和真心的谢意！

您真诚的朋友

三个月后的5月10日，我们发现圣护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希望向您表达最深的谢意，因为在卡尔迈勒山上，国际性巴哈伊陵殿周围的土地，同时也是专属于陵殿的土地，获得了免税待遇，而您在此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世界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这乃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1935年6月21日，守基·阿芬第致信基思-洛奇，请他关注一些与一起法庭诉讼案有关的事情。圣护说道：“请就此提供任何可能

的帮助，相信我的感激之情将不亚于各巴哈伊灵理会，因为我代表了它们的利益。”在守基·阿芬第的使命周期中，他总是想清晰地向官方表达这样的意思：尽管他是信仰的领袖，但在他身后是许多国家的巴哈伊信徒，他们随时准备用全部的力量支持他的宣言和要求；在表达感谢的时候，他常常把巴哈伊们的感激之情也包括进来。

尽管圣护不参加任何政府的招待会或聚会，他却经常愿意私下约请官员，原因已在前文提到。他在给基思-洛奇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如果您能在明天下午到我家中喝茶，并讨论此事，我将十分高兴……如果您觉得在安养院中见面更方便，我也可以随时前去拜访。”基思-洛奇在1936年12月27日亲笔写信给圣护（信上还标记了“亲启”的字样），信中说道，他因守基·阿芬第“芬芳美丽的圣诞节问候”而深表谢意。他不仅感谢守基·阿芬第送了花，更因为圣护赠送的巴哈伊书籍而深怀感激。在圣护结婚之后，基思-洛奇于1937年3月写信给他道：“请允许我向新娘和您表示诚挚的祝贺，希望在上帝为你们设定的伟大使命中，你们二人都能取得丰硕的服务成果。择日登门拜访。致以深深的祝福……”在收到信的当天，即4月23日，守基·阿芬第就回复了这封温暖的私人信件，他写道：“在我新婚之际，您表达的情感令我深深感动，我十分珍视您发来的美好祝愿。在我艰苦的工作中，您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此我将怀着感激之情永远铭记。只要您方便，我将十分欢迎您前来做客。深深地感激您写来的信……”之后不久，基思-洛奇就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的地区专员，但是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而且几年以后我们也在他新婚之际送去了祝福，之前他就写信告诉我们他正在筹划婚事。守基·阿芬第与非巴哈伊人士的关系是友好的，但至于圣护具体持什么态度，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记录，所以我仔细查阅了他和基思-洛奇的通信，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圣护多样性格中的另一面。

在教长去世之后，守基·阿芬第一返回圣地，就采取了将各种信息告知当局的原则，不光是地方当局，更重要的是告知耶路撒冷的政府。通告的内容不仅包括他的计划，还包括他面临的各种问题

和危机，例如，巴哈欧拉在巴吉的陵殿和在巴格达的故居的钥匙被抢走一事，信仰正在遭受的迫害和不公正对待等。1922年1月16日，守基·阿芬第给阿博都-巴哈的朋友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写了第一封信，此后一直到他去世，圣护始终与政府保持着这样的联系，最早是英国的官员，后来则换成了犹太官员。1922年的春天，身心崩溃的守基·阿芬第离开了耶路撒冷，在此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离开期间，为保护圣道而采取的措施告知了赫伯特爵士；同年12月15日，圣护返回海法，到19日，他便致电赫伯特爵士道："在我回到圣地、重新担起职责之际，请接受我的美好祝愿和诚挚问候。"

我们发现，在1923年的5月，守基·阿芬第把当时的一些事件同时告诉了海法的行政长官和高级专员。在写给前者的信中，圣护说道，"海法巴哈伊灵理会"已经"正式重建"，它"将和我一起指导本地区的所有事务。我最近也将此事通知了高级专员阁下……"圣护说到的这封信写于4月21日。在这封信中，他随函附上了给西方巴哈伊社团通报的复件，其内容与发给东方巴哈伊社团的波斯文通报相似。圣护说道："在上封信中，您说希望了解我们为巴哈伊信仰的稳定组织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如果阁下对附上的通报，或者对任何与信仰利益有关的事宜有所疑问，我将十分荣幸地为您进一步阐释。"

从最初的巴勒斯坦到后来的以色列，我们无法详述守基·阿芬第在三十六年间与当局的关系。圣护成功地赢得了当局的好意，并与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对于圣护在世界中心的各项事业，当局也持合作态度，他们认可世界中心作为巴哈伊信仰的历史中心，而且信仰也享有了与其他宗教相同的权利（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我们还享受了更多的权利）。而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各方敌人不断搅起的是非中取得的。他们或明目张胆，或掩人耳目，不断地阻挠守基·阿芬第的每个行动。在对上帝圣道的领导过程中，超凡的智慧和耐心是守基·阿芬第的显著特点，而他取得的上述种种成就便是这一特点的明证。

圣护通过许多信函有效地建立起了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他在

1925年6月15日写给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的信便是一个例子。当时爵士任期将满，圣护在信中表达了他本人和巴哈伊信徒永久的感激和深深的谢意，他写道，“自从阿博都-巴哈去世之后，信徒们一直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面对这些问题，阁下对我们采取了友善和高尚的态度……在您的领导下，巴勒斯坦政府表现出了好意，并以实际行动支持着我们，对此巴哈伊们将铭记心中……他们将满怀信心，为这片土地在物质上的繁荣和在灵性上的进步贡献力量，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这里都是无比神圣而珍贵的。”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在回信时这样说道：“……我非常高兴在任职的五年时间里，能够与巴勒斯坦的巴哈伊社团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也十分感谢巴勒斯坦社团对政府和我本人表现出的一贯好意。”

1929年，巴勒斯坦发生了暴动，圣护在9月10日给当时的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内容如下：

> 亲爱的阁下：
>
> 我遗憾地得知巴勒斯坦发生了令人悲痛的事件。您正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离家在外之际，我急切地向阁下表示衷心的支持。
>
> 由于我们的信仰，巴勒斯坦的巴哈伊社团深深地依恋着这块土地，并强烈地谴责这些出于宗教狂热主义的暴力行动。我们大胆地希望，随着巴哈伊理想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和深化，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能够为贵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促进友好、宽容的精神在圣地的各宗教社团之间发扬光大。
>
> 我怀着感动的心情，代表他们向阁下随函附上这笔钱，作为对苦难和贫穷者的救济，无论其种族、信仰……

也是在1929年的5月4日，海法的巴哈伊社团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正式请求，在这一举措的帮助之下，守基·阿芬第成功地获得了当局的准许，即巴哈伊社团可以根据巴哈伊律法，管理有关个人身份的事务（如婚姻），从而在这方面获得了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基督教社团相同的地位。守基·阿芬第把这誉为“意义

极其重大的一个举动，在任何国家的巴哈伊历史上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圣护本人为他自己纯粹巴哈伊仪式的婚姻进行了登记，由于他为信仰赢得的这一认可，他的婚姻具有了合法性。

当圣道开始以这种实际的方式赢得外界对其独立地位的认可时，另外一位担任高级专员这一要职的是亚瑟·沃筹普爵士。与赛姆斯上校一样，他个人也很喜欢守基·阿芬第。而且我们觉得，亚瑟·沃筹普爵士非常理解作为巴哈伊信仰的年轻领袖守基·阿芬第所肩负的重担。在他任职期间（与基思-洛奇担任地区专员的任期有一段重合），信仰在权利的争取上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如上文所述，社团获得了根据自己的律法管理个人身份的权利，而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成就当属巴孛陵殿周边的土地获得了免税待遇。与其他高级专员不同，亚瑟爵士曾和守基·阿芬第在私下见过面，他曾在信中提及过此事。

1933年6月26日，亚瑟·沃筹普爵士致信圣护道：“我已经收到您于6月21日的来信，我急切地回信向您表示感谢，同时也请您相信，如果您提到的案件由我负责，我将根据巴勒斯坦（圣地）协商令来做出决定，尽我所能去处理。1930年到1932的《巴哈伊世界》我也已经收到。非常感谢您送来了这本极其有趣的书……希望我能有幸再次拜访海法郊外美丽的山区花园。”

1934年3月13日，守基·阿芬第写信给他说：“……由于最近提交给阁下的案件关系到卡尔迈勒山上的巴哈伊陵殿，具有重要的国际性意义，因此我已经邀请X先生来巴勒斯坦商谈此事。如果阁下可以与他进行一次会谈，以澄清一两个我尚不明白却又事关未来举措的问题，我将非常感激。”这一年的5月1日，守基·阿芬第又给他写信道：“在您托X先生捎来的信中可以看出，您对卡尔迈勒山坡未来的美化计划表示赞同和支持，对此我非常感激，并大受鼓舞。不幸的是，一些强大且颇具影响力的势力正在试图阻碍计划的实施。地产投机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眼前的利益，这些目光短浅的商人正在想方设法地开发卡尔迈勒山北面的斜坡。对我们的计划来说，更难缠、更危险的却是那些一贯与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为敌的人。比如，可以肯定这些人是杜米特诉讼案背后的支持者，正

因如此，我们认为把案件从法院撤回，并移交给阁下来亲自处理是合理的……向您致以问候，并再次感谢您的赞同和支持……”上面说到的这个案子历经四年的诉讼，最终被撤销。1935年，我们签署了杜米特土地的购买协议，守基·阿芬第致电美国灵理会，说他计划将这块地注册在美国灵理会巴勒斯坦分部的名下。

为使巴孛陵殿周围的地产获得免税待遇，守基·阿芬第做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最终得知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1934年5月11日，守基·阿芬第致信亚瑟爵士，在信件正式的文字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胜利带给他内心的喜悦：

亲爱的阁下：

我刚从海法的地区专员那里得知这一可喜的消息，关于卡尔迈勒山上的巴哈伊财产的免税申请已经获得了政府的批准。

我迫不及待地向阁下表达世界巴哈伊社团和我本人的深深谢意，在这一件事上，阁下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并进行了有效的关注，我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最终的结果。为使海法人民能够享用这块土地（政府的这一举措已经为此开辟了道路），我们将逐渐对其进行美化，我热切期望阁下能继续赞同并支持我们的美化计划。

五天之后，亚瑟爵士亲自回复了这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守基·阿芬第：

感谢您于5月11日的来信以及您友善的话语。一直以来，我都非常赞同您美化卡尔迈勒山坡的计划，希望这次的免税待遇能够帮助您开展卓越的工作。

您真诚的朋友

亚瑟·沃筹普

在另一封信中，这位高级专员写道：“非常感谢您赠送的《破晓群英传》，我将以极大的兴趣去阅读这本书，因为您知道，当我最早在波斯听到这个美妙的故事时，我便深深地为之吸引。这本书写得引人入胜，插图和巴孛书简的复本更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再次

感谢您的好意和这份令人愉悦的礼物……”亚瑟爵士还写过两封类似的信件，感谢圣护赠送的《巴哈欧拉圣作选萃》和《巴哈伊世界》。在信仰的世界中心，亚瑟爵士利用自己的要职帮助守基·阿芬第赢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在他于1938年2月写给圣护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典型的礼貌与和善再次展现，信中写道：“……我很想去海法拜访您，希望看到您在花园建设上取得的进展，并能当面跟您说再见。不幸的是，我非常繁忙……不能前去拜访，因此，只能通过这个机会向您道别，并表达我对巴哈伊社团的美好祝愿。”在信的下面，他还亲笔加上了这句话：“我听说您的花园一年比一年漂亮。”

在委任统治将结束，巴勒斯坦忧虑的人们正在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联合国委派了以埃米尔·桑德斯特伦（Emil Sandstrom）法官为首的驻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7月9日，这位法官从耶路撒冷给守基·阿芬第写信，称根据其授权范围，委员会受命对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巴勒斯坦的宗教利益进行细致的考量，并说道：“不知您是否希望以书面的形式，就贵社团在巴勒斯坦的宗教利益递交证明。若能告知我此事，我将非常感激。”由于守基·阿芬第的回信对巴哈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此我将其全文引述如下：

桑德斯特伦法官，
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主席

先生：

我已经收到您于7月9日的友好来信，非常感谢您给了我这一机会，让我向您以及您受人尊敬的同事提交一份陈述，说明巴哈伊信仰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表明在这块神圣而争端频仍的土地上，当未来的局势发生变化时我们所持的态度。

为方便您参考，随函附上一篇对巴哈伊信仰历史、目标和意义的简介，并附一个小册子，其中阐明了巴哈伊信仰对世界现状的观点，陈述了我们希望并相信世界将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同时这也是它必须选择的方向）。

某种程度上，巴哈伊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虽

然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徒的精神中心，但它却不是罗马教会或其他任何基督教派的教务管理中心。同样，尽管穆斯林认为，他们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便坐落于此，但穆斯林信仰的各圣所和朝圣中心都是在阿拉伯，而不是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对这个国家的依恋与巴哈伊有些许的类似，因为耶路撒冷有他们陵殿的遗迹，是与其历史相关联的宗教和政治机构的所在地。但即使如此，二者的情况仍在一个方面有所不同。巴哈伊信仰的三位中心人物都被埋葬在了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这里不仅是全世界巴哈伊朝圣者的中心，也是我们教务管理体制的永久所在地，而我有幸担任了此秩序的领袖。

巴哈伊信仰是完全非政治性的，当前我们不会在圣地及其人民所面临的悲惨争端中偏向某一方，将来也不会，而且也不会就这个国家未来应有何种性质的政治前景做出任何声明，或给出任何建议。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普世和平，我们的愿望是正义盛行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巴哈伊信仰的许多追随者都是犹太人或穆斯林的后裔，所以我们对这些团体都无偏见，同时，为了双方的利益、为了国家的福祉，我们急切地希望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影响巴勒斯坦未来的任何决定中，我们关注的是，任何对海法和阿卡行使主权的一方都应认识到这一事实，即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世界性信仰的灵性和教务管理中心，信仰的独立性、信仰从这里管理其国际事务的权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巴哈伊作为朝圣者前来拜访的权利（在这方面，我们与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一样，都享有拜访耶路撒冷的权利）应给予承认，并得到永久保护。

卡尔迈勒山上的巴孛陵殿、阿博都-巴哈陵殿，附近的东方朝圣者招待所，环绕在它们（所有的这些地方都向公众开放，而且不分教派）周围的大型花园和台阶，卡尔迈勒山脚下的西方朝圣者招待所，社团领袖的宅邸，阿卡的各个宅邸和花园以及附近与巴哈欧拉的囚禁有关的地区，巴哈欧拉在阿卡附近的巴吉的圣坟，祂在巴吉的宅邸（先被保留为一座历史古迹和一

座博物馆，而且也都对任何教派的公众开放），我们在阿卡平原的土地——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巴哈伊在圣地的大量财产。须指出，由于其宗教性质，几乎所有这些财产都获得了政府和市政当局的免税待遇。其中一些大面积的土地是美国加拿大灵理会巴勒斯坦分部的财产，根据本国法律，该分部是一个宗教协会。在信仰在圣地的国际捐赠中，未来其他各个巴哈伊总灵理会也将通过其巴勒斯坦分部持有其中的一部分。

鉴于以上信息，我请求当您以及贵委员会的成员向联合国提交任何事关巴勒斯坦未来的建议时，要将对巴哈伊权利的保护考虑在内。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您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您和您的同事在调查这一圣地上的混乱状况时所表现出的可贵精神。我相信并祈祷，您深思熟虑的结果将使出现在巴勒斯坦的棘手问题得到公正和快速的解决。

您真诚的朋友
守基·拉巴尼
1947年7月14日

必须记住的是，独立战争以前，在所有具有些许地位的人中，守基·阿芬第是唯一一个没有逃离巴勒斯坦的重要人物。新国家成立后，当局并没有忽视这一事实。圣护有着正直的品质，严格地信守着他认为正确的道路，这是他作为巴哈欧拉信仰之领袖的典型特点。非巴哈伊没有理由对守基·阿芬第抱有同样的信念，但通过上述的举措，圣护成功地以这些品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当局在各个方面都非常配合，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因为当局知道对巴哈伊教义代表了什么，对此犹太独立运动的先锋派也十分清楚。在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当局最初的行动之一便是在巴哈欧拉陵殿（与海法的陵殿相比，巴哈欧拉陵殿更为孤立）外贴了一则通告，称这是一处“圣地”，确保它会受到所有犹太人的尊重。

虽然经历了政府的更迭，但如何在正式场合保持身份这个问题

仍然困扰着圣护。1949年1月，临时政府的总理本·古里安第一次正式访问海法，市政当局举行招待会欢迎总理。市长很自然地向守基·阿芬第发出了邀请。这让圣护十分为难，如果不参加，这当然会被看作是对当局的公然冒犯；如果参加，他就必然会被淹没在人群之中，任何礼仪上的安排都无济于事（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作为守基·阿芬第的代表，我的父亲从招待会回来后如是说道）。因此，圣护决定不参加招待会，但是为了向新政府总理表示敬意，圣护非常愿意亲自拜访总理。海法市长沙卜泰·利维（Shabatay Levy）费了很大周折才安排了这次会面，因为总理在海法待的时间很短，而且两天后新政府就要进行首轮大选。

1月21日星期五晚上，在总理卡尔迈勒山的私人住所中，二人进行了大约十五分钟的会谈。本·古里安就信仰以及守基·阿芬第与信仰的关系提问了几个问题，还问到是否有相关的书籍可供他阅读；守基·阿芬第回答了总理的问题，并说他会送上自己写的《神临记》。随后圣护就给他寄去了这本书，总理也回信表示了感谢。

圣道的整个历史充满了坎坷，种种问题不断袭来。1948年12月20日，一份重要的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篇大篇幅的文章，其中以赞许的口吻陈述了圣道的教义，并提到了守基·阿芬第作为其世界领袖的地位。1949年1月28日，该报纸在书信专栏里刊登了一篇短小而不寻常的声明，其署名为“巴哈联合国观察员”。作者断然驳斥了之前的文章，宣称“拉巴尼先生不是巴哈伊信仰的圣护，也不是其世界领袖”，并给出了纽约的“新历史协会”作为读者寻求进一步信息的渠道。由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巴哈联合国观察员”，因此这只是以前的一伙圣约破坏者所采取的行动。在新政权刚刚建立之际，他们试图玷污守基·阿芬第的名声，同时，为了分散人们对圣护之地位的注意，他们提到了艾哈迈德·苏赫拉布在美国的这个毫无根基的组织。后来，巴吉的圣约破坏者在1952年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守基·阿芬第拆毁了巴哈欧拉宅邸附近的一栋老建筑。当时苏赫拉布试图给宗教事务部部长施加压力，以诋毁巴哈伊的声明，但没能成功。当信仰在世界中心的事务刚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时，这些或明或暗的攻击再一次成为了圣护必须应对的对象。

当局对守基·阿芬第和巴哈伊信仰的热诚在许多信件中得到了反映。不过，这种热诚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信仰的国际总部，政府对其地位的认可还有许多实际的证据。

当巴哈欧拉永远地离开监狱之城阿卡后，祂最初住在了马兹拉伊的宅邸中。很久以来，守基·阿芬第一直想获得对这座宅邸的控制权。这份财产是穆斯林的捐赠，现在无人占用。政府打算把它建成官员的休养所。通过相关部门来获取这份财产的努力无果而终，后来守基·阿芬第直接联系了本·古里安，向他解释了这所宅邸对于巴哈伊的重大意义，并说他希望朝圣者能够到此拜访，因为这是一个与巴哈欧拉有着紧密联系的地方。之后总理亲自干预了此事，最后宅邸作为一处古迹租给了巴哈伊。在1950年12月16日，守基·阿芬第自豪地向巴哈伊世界宣告道，在历经五十多年后，以色列政府将这座宅邸的钥匙交到了我们手中。

在世界中心，当需要因工作与政府进行日常的交涉时，巴哈伊社团的事务被放在了宗教事务部的管辖之下，最初由负责穆斯林事务的司长进行处理。对此，守基·阿芬第坚决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信仰在某些方面等同于伊斯兰教。在多次协商之后，我们收到了一封由宗教事务部长写来的信，写信的日期是1953年12月13日，收信人为“巴哈伊信仰的世界领袖守基·阿芬第·拉巴尼阁下”。部长在信中说道：

> ……我们将在本部为巴哈伊信仰设立一个独立的司，我很高兴地将这一决定通知您。希望这个司的成立有助于您在本国处理与巴哈伊中心相关的事务。
>
> 以以色列宗教事务部的名义，我愿向阁下保证，巴哈伊信仰的圣地和世界中心将会得到充分的保护。

在上文提到的案子中，圣约破坏者基于一项细则对守基·阿芬第提出了诉讼，指控他拆毁了巴吉的一座与巴哈欧拉陵殿和宅邸相邻的房子。而就在这个案子之后，我们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胜利，这让人尤为欣喜。不管是对守基·阿芬第还是对圣护，背叛者总是无休无止地试图公开羞辱和诋毁信仰的领袖。他们居然不自量力地

传唤守基·阿芬第出庭作证。守基·阿芬第非常担心圣道在世界中心的名誉，因此他再次直接向总理求助，并派国际巴哈伊委员会的主席、秘书长和成员（圣护特意把他们从意大利召集回来）作为他的代表，不止一次地前往耶路撒冷，执行他制定的策略。这些代表成功了，由于这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问题，政府撤销民事法院对此案的审理。当原告发现他们羞辱守基·阿芬第的计划受到阻碍后，他们表示愿意通过协商来了结此案。对于这个结局，当局和巴哈伊社团都非常高兴，这可以从总理的工作人员（这两个人的支持和努力给信仰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写给圣护的信中看出，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巴哈伊信仰的世界领袖
守基·拉巴尼阁下
海法

阁下：

总理指示我向您说明，您于5月16日的来信已经收到。

作为巴哈伊信仰的世界领袖，您与信仰创立者的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了分歧。想必您已经知道这一问题现在得到了解决，因此，我们也就无需再采取任何行政措施。

在此，请允许我对您在争端中所持的智慧和友善的态度表示感谢，正是由于您的这种态度，我们才得以对这一持不同意见的团体采取了公正的解决方法，而且，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个持久的解决之道。

总理表达了他个人对您的尊敬，并向您致以美好的祝愿。

您诚挚的朋友
总理办公室法律顾问S. 伊恩纳斯
1952年5月19日于耶路撒冷

第二天，外交部秘书长沃尔特·埃坦（Walter Eytan）又给守基·阿芬第写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

……在我尽力给予阁下最大的帮助以解决这些令人烦恼的

> 争端后，今天早上，当我得知已达成完整的协议时，我真的非常满意。我真诚地相信这可以结束您及巴哈伊信仰成员在一段时间内的担忧，并且您现在可以顺利地进行您的计划而再不会受打扰。

在这些信件中，自总统以下，所有人都称守基·阿芬第为“阁下”，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虽然这一称谓仍远低于他的地位，但在他的使命周期之初，这个称谓就已经被采用了，只是在犹太政府建立之前，并没有任何官员在实际中使用过。

守基·阿芬第与以色列政府官员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希望探知总统是否愿意拜访海法的巴哈伊陵殿。当得知总统愿意来访时，守基·阿芬第便正式发出了邀请。这个时间被安排在了1954年4月26日，此前总统办公室的主任也致信守基·阿芬第，表示总统“非常高兴能进行一次正式访问”。于是，在两名官员的陪同下，总统及夫人抵达了教长的宅邸，用过茶点之后，圣护向他们赠送了一部波斯相册，作为此次访问的纪念。相册上画有一些微型画，并用银做了装裱，其中包含了各座陵殿的一些照片。随后，总统一行、守基·阿芬第及陪同人员去了卡尔迈勒山的花园。在圣道的历史上，这是首次有独立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这样的正式访问，也是信仰的世界中心在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总统一行对巴孛陵殿表现出了极大的尊敬，在进入之前，他们像我们一样脱下了鞋子，男士们没有摘帽子，因为这是犹太人对神圣场所表示尊敬的方式。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本·兹维（Ben Zvi）总统在门槛前站在守基·阿芬第旁边，总统戴着他的欧式礼帽，圣护则戴着一顶黑色菲斯帽。守基·阿芬第讲解了几句后，我们都退了出来。在花园走了几分钟后，我们在东方朝圣者招待所前道别。总统的车子在那里等着他。

4月29日，总统亲自给圣护写信道：“我希望向您表示感谢，您的招待热情友好，在拜访美丽的花园和奇特的陵殿时，我在您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段有趣的时光……我非常感谢巴哈伊社团与以色列保持着友善的关系，而且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

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情谊不断加强。”5月5日，圣护以同样热情的语言回复了这封信，他写道：“……能够与阁下及夫人会见，并带二位拜访以色列的巴哈伊朝圣之所，我感到非常荣幸……如果您方便，拉巴尼夫人和我以及陪同的约阿斯先生（Mr. Ioas）非常愿意到耶路撒冷拜访阁下及夫人……”这次回访安排在了5月26日下午。我们与总统及夫人一起喝茶，并进行了愉快的谈话。这对夫妻的性格非常相近，都很和善。在两次拜访中，守基·阿芬第曾如约向总统赠送了一些巴哈伊书籍，随后总统表示已经收到，并表达了他的感谢，他说自己将以极大的兴趣去阅读这些书籍。总是一丝不苟的圣护在6月3日致信总统道：“非常感谢您及您夫人的热情接待。拉巴尼夫人和我非常享受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光。而且我相信，您此次来访巴哈伊圣地以及我们到以色列首都的回访加强了巴哈伊与以色列人民及政府之间的纽带。祝福您及夫人……”在为信仰在世界中心赢得认可的过程中，又一个值得铭记的新篇章划上了句号。

世界中心的主要事务通常都是由耶路撒冷的高级官员来协助处理，不过，其中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在阿卡和海法（尤其是海法）的市政官员的帮助下完成。多年来，巴哈伊社团与海法的市政工程师有着许多业务上的往来。有趣的是，双方最早的接触还要追溯到阿博都-巴哈时代。当时，斯弗瑞博士把他的设计提交给了教长，设计的内容包括一座纪念碑的台阶和一条大道。大道两旁种有柏树，从卡尔迈勒山脚下老旧的圣殿士聚居区一直通往巴孛陵殿。教长不仅同意了这个计划，还批准了修建所需的土地，并且率先为这个名为“巴孛纪念碑台阶”的工程捐出了一百英镑。

海法和阿卡是承载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双子城，在这两座城市，为了从市政官员那里获得一些特权，赢得人们对信仰之独特地位的认可，守基·阿芬第一方面智慧而执着地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在多项市政事业中，他都与海法的市长保持了友好、合作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当属他对当局（不管是市政当局，还是更早些时候的高级专员）慈善工作的财务支持。

守基·阿芬第在使命周期之初就表明了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和原则。1923年2月7日，圣护给塞姆斯上校写信说道：“我刚刚得

知，为了帮助海法的贫苦人民，赛姆斯夫人正在组织一个慈善舞会。穷人的事业是我挚爱的外祖父一直支持的，继续沿着祂的脚印前行是我诚挚的心愿，念及于此，请允许我附上二十英镑作为对该基金的支持……我相信您在埃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见到您及夫人……”圣护在两年后还给赛姆斯上校写过一封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想，他在信中写道：“我细读了您于1925年2月16日发的通函，其中提到了海法慈善基金的设立，这让我想起了阿博都-巴哈对慈善机构的浓厚兴趣。在同样的情怀的激励下，再加上我对继承外祖父事业的渴望，我迫不及待地附上二十英镑，希望能够减轻海法穷人们的痛苦。”

每当灾难降临到人们身上的时候，守基·阿芬第都会热切地回应他们的需求。1926年4月，他给北区的专员写信道：“我深深地意识到近期骚乱所导致的苦难，也不忘阿博都-巴哈给予遭受苦难及贫穷的人的关怀，我欣然捐赠三十英镑，希望能够为贫穷和无家可归的人带来帮助……当有这样的需求时，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当事者属于什么教派，如果您能告知我，我将非常感激。”1927年，我们发现守基·阿芬第又对灾难做出了反应，他给耶路撒冷政府的秘书处寄去了一百英镑，作为他对地震救助基金的捐赠。教长以前被人称为“穷人之慈父”，这些年来，不管捐赠数额的大小，守基·阿芬第一直在追寻着教长的脚步。

这些对各项事业的捐赠当然是极受欢迎的：1934年，北区的地区专员致谢守基·阿芬第，感谢他“为赈济太巴列（Tiberias）灾难所做出的慷慨捐赠”，并表示他会将圣护的同情转达给太巴列的地区专员。1950年，海法市政委员会主席、海法市长写信感谢守基·阿芬第寄去了五百英镑，信中写道：“感谢阁下于巴孛殉道一百周年之际为救济海法的穷人的慷慨捐赠”。在进行这样的捐赠时，圣护几乎总会补充道，“把它们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社团的贫苦成员，不分其种族或宗教信仰。”

1929年5月7日，守基·阿芬第致信海法市长，他在信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信仰对于慈善的总体原则。他说，他已经收到了市长此前关于在海法禁止行乞的通函，并表示：“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没

有影响到巴哈伊社团，因为我们的律法严格禁止乞讨。不过，我充分理解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及时性。我很荣幸地代表巴哈伊社团附上五十英镑的支票，期待市政府提出的任何缓解贫困、帮助海法贫苦人民的计划。请相信，巴哈伊社团将会严格遵守任何需要执行的规章。”

在巴勒斯坦以及后来的以色列人民经历巨大困难的那些年，仅在1940年到1952年间，圣护就通过海法市政当局向各个教派的贫苦人民捐赠了一万多美元。在这些通过政府和市政部门的救助之外，圣护还响应许多慈善机构的请求，为那些他认为值得赞赏的机构捐款，有时他甚至会为了一些与海法的清真寺有关的特殊目的而捐钱。很多次他都是主动捐赠的，例如，当巴哈欧拉在土耳其兵营住过的房间移交给巴哈伊管理时，他向阿卡的政府精神病院（也是先前的土耳其兵营）捐赠了一百英镑；他还为魏茨曼国家纪念馆正在着手建设的物理研究所捐过钱。

但这并不是圣护向地方当局表示善意的唯一方式。不管是别人提出怎样的要求，圣护总会热诚地回应。我们可以以圣护在1952年与海法市长阿巴·胡希（Aba Khoushy）的通信为例。当时，一个全国性的照明问题研讨会将在海法的希伯来技术学院举行，并且在时间上与犹太的献殿节——光明节重合。市长阁下写信将此事告知守基·阿芬第，并说：“如果您能和我们一道为成功举办这个会议而努力，并且下令在12月12日到12月19日的一周时间里（包括12日和19日），像过节般地点亮巴哈伊信仰在卡尔迈勒山坡上的美丽陵殿，我将不胜感激。”像往常一样，每当守基·阿芬第受到礼貌对待时，他也总会热情回应。12月7日，他写信给市长道：

阁下：

从巴吉返回后，我就收到了您于11月30日的来信，请相信，在海法的照明和装点上，在希伯来技术学院的照明问题研讨会上（尤其是考虑到该研讨会将在光明节期间举行），巴哈伊社团将很乐于合作。

在这些天里，我会做出指示，延长我们陵殿的照明时间

（在日落之后，陵殿总是在短时间里点亮泛光灯）。同时，我希望通过阁下向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和参观者发出邀请，当他们在某个晚上游览我们的城市时，也请他们来参观陵殿和花园，以享受其光辉。如果事先告知我们，我们就可以作一些必要的安排，向他们开放大门和陵殿。

您真诚的朋友
巴哈伊信仰的世界领袖
守基·拉巴尼

当一些值得尊敬的事业引起了守基·阿芬第的注意时，他所表现出的精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来说明。1943年，阿卡的地区专员写信给圣护，说他找不到给孩子们办学校的地方，问圣护能否考虑将阿布德宅邸（一座非常大的建筑，并且是巴哈伊朝圣的地方）的八个房间租出来用以办学。圣护同意了他的请求，允许学校使用其中的一些房间，但他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三章　教务管理体制的建立

多年来，圣护不仅在世界中心为信仰建立了物质的、有形的资产，而且也为信仰赢得了认可。这些认可一方面来自于世界中心所在国家的政府，另一方面来自于中心主要机构即将建立的永久总部所在城市的市政当局。与此同时，他也在国外开展着类似的工作。多年之后，他把这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三重努力，其目的是为了彰显信仰的独立性、扩大信仰的范围以及增加信仰支持者的数量。不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必须要借助工具。教义中明确指出，那些工具是地方和总灵理会，它们是教务管理体制的基石。有趣的是，在守基·阿芬第于1941年写给一位非巴哈伊人士的信中，他用这样的话清楚地界定了他与自己的重要工作之间的关系："……按照阿博都-巴哈在遗嘱中的明确指示，我一直在努力地阐释和建立教务管理体制……根据祂的任命，我有责任担当这一体制的阐释者……"很明显，他对这种清楚直白的表述并不满意，于是接下来又在这封信中重新措辞，说他受到了建立教务管理体制的"授权和召唤"。

尽管守基·阿芬第本人很少提到他自己（实际上，"我"这一代词是极少出现在他的公开信中的），但是，《阿博都-巴哈遗嘱》赋予了他巨大的权力，如果没有这些权力，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就永远无法建立，我们今天所说的巴哈伊世界社团就不可能出现，而巴哈欧拉世界秩序的基石也就无法奠定。随着圣道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机构数量的大大增加以及圣道结构的日益稳固，圣护真正的地位也变得愈加明显，这不仅在资格较老的巴哈伊那里如此（他们一直以来都清楚这一点），而且许多缺乏经验的新信徒也认识到了他的地位（虽然他们之前未能理解这种地位的真正意义和含意）。

为了保护圣道，圣护曾经被迫写过一封信，以阐明他自己的行政权力；在此之前，一个国家总灵理会的秘书曾写来一封非常缺乏见解的信，守基·阿芬第以下这封信便是给他的答复。他破例没有在信中亲笔写下任何附言，只是加上了一句“已阅，同意。守基”。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 就像总灵理会对其所有的地方灵理会拥有完整的管辖权一样，圣护对所有总灵理会也拥有完整的管辖权；如果他认为某一决策符合圣道的利益，那么他无须征求总灵理会的意见。对于他做出的决策，这些机构无权判断其是否智慧和可取，相反，他则有权判定这些机构的决策是否智慧和可取。若仔细研读《阿博都-巴哈遗嘱》，就可对这一原则更为明确。他是圣道之圣护，具备“圣护”一职所含的全部职能，他是教义的指定阐释者，而且他是在指引之下才决定去做那些保护圣道、对圣道大有裨益且符合圣道最高利益的事情的。
>
> 他永远都有权介入和撤销总灵理会的决策；如果他没有这一权力，那么对于圣道的保护而言，他便完全无能为力，就像总灵理会，如果它被剥夺了撤销地方灵理会决策的权力，那么它便不能照看和引导巴哈伊社团在这个国家的福祉。
>
> 他很少认为必须改变某个灵理会做出的“重大”（如你所说）决策，但这样的情况的确会发生；不过，如果必要时，他也总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而与之相关的总灵理会则应欣然地、毫不犹豫地接受改变，将其视作对信仰（在这信仰之中，所有选出的代表都在全心全意地设法为之服务）非常有利的措施。

我们发现，守基·阿芬第把信仰在阿博都-巴哈离世后的这个阶段描述为“钢铁时代”、“过渡时代”、“形成时代”，这并不奇怪。在这个时代中，圣道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机构正在逐渐创立。如圣护所言，这些机构形成了一种处于萌芽期的模型，在巴哈伊天启的“黄金时代”，它们必将进化为一个世界联合体。他写道，信仰“激荡世界的精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

种精神已经为“化身为具体的机构”做好了准备，而这些机构的建立正是为了“发挥这种精神的倾泻而出的能量并激励这种精神的发展”。在守基·阿芬第使命周期的最初几年里，他与全世界的信徒保持着书信往来，并通过这些数量庞大的信件阐释了《阿博都-巴哈遗嘱》中确立的教务管理体制的支配原则。他在信中清楚地说明了灵理会的职能和管辖区域，以及赋予灵理会以生命的那种精神，这尤为重要。在不远的将来，如果灵理会要实现它们的目标，这种精神将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行政机构就像人体的动脉和静脉，它们通过自身的脉络将巴哈欧拉教义的生命洪流输送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它们的媒介作用，一个重生的社会将得以构建，“基督允诺的王国”将会诞生，“世界秩序”终将确立。对于这一“世界秩序”而言，“它的原动力正是巴哈欧拉本人，它的领地是整个地球，它的标语是团结，它的生命力是正义的力量，它的直接目标是正直和真理的盛行，它的至高荣耀是全人类彻底、安宁和永恒的幸福。”

在阐释了灵理会应该如何选举和运作这类纯机械性的技术问题之后，圣护早年对他们的告诫常常与团结这一主题有关；如果未来社会的“标语”是“团结”，那么很明显，在巴哈伊之间勤勉地建立起团结则是至关重要的。1923年，守基·阿芬第给一个地方灵理会写信道：“朋友们之间以及灵理会内外都笼罩在和谐与理解的氛围中；非灵理会成员对他们选举出的代表所通过的每一个决策都信心十足；那些放弃了自己的好恶，只以信仰利益为念的朋友们坚定不移——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可靠的基础，未来任何建设性的工作都只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而且也唯有在此基础上，这些工作才能服务于圣道之利益。”在给总灵理会的信中，他的语气也同样铿锵有力，以下节选自两封写于1925年的信件的片段便是例证：“然而，在朋友们可能从事的每一项事业中，首要需求便是一种纯洁的伙伴关系的精神，以及一种全心全意的、忠诚合作的精神……真正的巴哈伊伙伴精神是我们生命中许多困惑的唯一去除者，同时也是我们在为挚爱的圣道付出辛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的诸多问题的解决者。”“如果一个总灵理会是积极、团结且和谐的，是被合理而

谨慎选举出来的，是生机勃勃运转着的，是对诸多紧迫的责任充满警觉且意识充分的，是与圣地的国际中心保持着紧密、持续联系的，是在不断扩张的工作领域中敏锐察觉到其中的每一个发展的，那么，它便是当今时代所急需的，因为它是神圣管理之大厦最终必须依靠的基石。”

守基·阿芬第以极大的爱和理解，缓慢地、耐心地教导着东西方的灵理会应该如何根据教义合理地执行上帝圣道中的事务。这些新创立的机构成员就像孩子一样，彼此间有时容易发生争吵；但如果争吵将使信仰本身陷入危险的境地，那它就是圣护所不允许的。有一回便发生过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事件：一个重要的总灵理会由于对它的一名成员感到厌烦，便投票将他剔除了出去，得知此事的守基·阿芬第通过电报给予了他们严重警告，说这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不良影响，给巴哈欧拉之圣道带来无可挽回的伤害”，并说此人的成员资格应该保留，他们应该放下和忘掉所有的批评和讨论，因为这会“损害总灵理会机构的整体权威”。

圣护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同寻常；他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信徒们以及各个灵理会都尚不成熟；“正义”（这个词本身便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的管理前提是，相关各方要有一定的成熟度，具备一定的经验，并且对教义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正义的管理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圣护的整个使命周期中，面对提交到他这里的案子时，他曾一次次地拒绝做出仲裁，并极力劝说牵涉其中的人要避免受到当下情况的影响，要忘记过去，选择原谅，要把精力集中在信仰的紧迫的、最高的需求上，因为信仰还要完成当前计划所设定的目标，并将它有着治愈力量的信息传播给全人类。当然，遇到离婚、财务纠纷以及其他较为实际的问题时，守基·阿芬第建议信徒们将案子提交给灵理会，并且他还敦促灵理会进行调查并做出决定。的确，随着管理机构多年来逐渐走向成熟，圣护鼓励巴哈伊们将自己的问题提交给管理机构以寻求解决，这样一来，巴哈伊们和各个灵理会都能积累经验，学会如何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团生活中践行巴哈欧拉的伟大秩序。但是，严重的不和、中伤和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圣护总是呼吁朋友们为了

圣道的利益而不要去计较。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告诫和呼吁就像炎炎夏日里的一缕清风，安抚着愤怒、苦恼的冲突各方，使其冷静下来，并一直为其提供抚慰，直到他们做好了准备——让对信仰的挚爱流回他们的心田并治愈他们的伤口。

在守基·阿芬第使总灵理会被合理地选举出来并开始运作之后（这一步只是在那些条件允许的国家完成了），他就立刻着手为这些机构建立一个明确、清晰的法律基础。1927年，也就是在他开始作为信仰的圣护履行职责的五年之后，巴哈伊历史上最大的里程碑之一在他的鼓励之下得以建立。这块里程碑正是“巴哈伊国家章程的起草和采用”（该章程最初是由“在美国巴哈伊社团中选举产生的代表制定和颁布的”），用守基·阿芬第的话说，它是“巴哈伊世界社团走向统一和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得到巩固”的第一步，是对“每一块土地上巴哈伊社团的法制基础的有价值、可靠的阐释”，它“预示了未来的巴哈伊世界共同体的最终崛起”。

这一文件成为了所有总灵理会的“章程”，并被翻译成了巴哈伊世界中使用的多种主要语言，如波斯语、阿拉伯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圣护在他的著作中对信仰的教义和“巴哈欧拉教义中明确提出的完整的世界管理体系”（守基·阿芬第语）做了阐释。此文件的内容正是以圣护著作中的指导方针为基础的。他将这些内容总结如下：“该国家章程的文本含有一份《信托声明》，其中的文章阐明了国家巴哈伊社团的特征和宗旨，明确了所选代表组成机构的职能，指定了其中央办公室，描述了其官方印章。章程的文本中还包含了一系列细则，它们界定了地方灵理会和总灵理会的地位、选举方式以及权力和职责，描述了总灵理会与世界正义院、地方灵理会以及信徒之间的关系，概括了国家代表大会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与总灵理会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巴哈伊选举的特征，规定了对所有巴哈伊社团中选举成员的资格要求。”

1931年，纽约市的巴哈伊灵理会起草了一份《细则》，这是教务管理体制演化过程中跨出的又一大步，而且一年之后，纽约州的灵理会也成为了一个合法成立的团体。关于这些细则，守基·阿芬第写道，它们将“作为美国的每一个巴哈伊地方灵理会的一种模

式，并作为整个巴哈伊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社团的模型”。

这一范例的形成为所有国家的巴哈伊章程拟定提供了参照，同时，细则的制定对于任何地方灵理会来说也都是适合的。这两者为国家和地方巴哈伊灵理会根据其所在国家的法律成立或注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合法成立或注册之后，灵理会也就拥有了信仰的一些捐赠物的所有权，例如土地、国家和地方的总部、历史遗址等，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巴哈伊灵曦堂。守基·阿芬第对这两个步骤的至高重要性给予了认可。1928年，圣护开始敦促东方的灵理会，要他们根据美国章程的模式形成自己的国家章程，此外，他们还应使当局认可灵理会作为宗教法庭的地位，并授权其执行个人身份方面的巴哈伊律法，如结婚、离婚、继承等。因为在许多伊斯兰国家，这些事务并不在普通的民事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内。

所有这些都首先涉及到了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一个独立的信仰要获得人们对其历史地位的充分认可以及与其他的世界性宗教的同等对待。守基·阿芬第使得单个的巴哈伊社团的命运朝向了他们共同的目标，即形成一个世界中心指导下的完全统一的国际团体；同时，他也在为构筑全人类兄弟般的情谊、实现世界和平以及最终缔造世界各国共同体而努力着。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守基·阿芬第抓住了联合国成立的契机，并使其成为了进一步加快实现这一至高目标的途径。

联合国的框架允许非政府组织派出它们委任的代表来参加由联合国主办的各种会议；当这一点变得明确无误时，守基·阿芬第便立刻敦促当时的美国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申请非政府组织身份。在申请时，美国加拿大灵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人的义务和权利的巴哈伊声明》以及一份《妇女权利的巴哈伊声明》。1947年，美国加拿大灵理会获得了非政府组织身份。之后，一个巴哈伊联合国委员会被委派成立，同时，一位巴哈伊观察员参加了联合国的会议。由于非政府组织身份在权利范围上仍旧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在1947年到1948年的冬天，他们又找到了扩大权利范围的途径和方式。当时，七个国家总灵理会共同授权美国总灵理会作为它们的代表并使用“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头衔，这使得它作为一个被委派到

联合国的国际组织获得了认可。这一方面提高了信仰的声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官方巴哈伊代表的特权，他们可以定期地参加联合国的各种会议，而这些会议是只对那些享有这种身份的代表们开放的。随后陆续成立的新的总灵理会也加入了这个代表巴哈伊世界的组织，并使其得到了巩固。

这一纽带将圣道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系在了一起，关于其重要性，守基·阿芬第曾这样表述道："为了在全世界的目光中获得应有的正义地位，并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性宗教被认可，我们挚爱的信仰不断地奋斗着，而这一事件标志着我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的确，这一步将对圣道在各地的发展起到非常有利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仍然在迫害、贬低或蔑视圣道的地方，特别是东方。"1955年，一股巨大的迫害浪潮席卷了波斯的巴哈伊社团。在巴哈欧拉的祖国，祂的追随者遭受到了伤害和暴行。而就在此时，信仰与联合国之间小心建立并维护起来的关系结出了果实。事件发生后，一份详细的文件给提交到了联合国秘书长那里，秘书长随后委派了一个以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为首的委员会。按照指示，该委员会与波斯政府取得了联络，并获得了它的正式保证，即巴哈伊少数群体的权利将受到保护。圣护非常重视与联合国的关系，在"十年国际传导和巩固计划"（即"世界远征"）中列出的二十七个目标里，"巩固巴哈伊世界社团与联合国之间的联系纽带"便是其中之一。

守基·阿芬第写道，圣道的历史"如果能被正确地解读，那么，它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的脉动以及危机和胜利的交替，正是它们带领着圣道一步步地走向其神圣指定的命运"。无论是巴孛、巴哈欧拉还是阿博都-巴哈，凡是信仰中心人物的离世，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场危机；但是，推动信仰向前发展的主要冲击力还是来源于信仰所遭受的迫害，而施加这种迫害的通常是穆斯林神职人员（虽然也有例外）。在守基·阿芬第三十六年的使命周期中，针对信仰追随者的暴力行动不断在波斯爆发，这些暴力行动有时是地方性的，而有时则是全国性的，但其性质都极为残忍和血腥；信仰在土耳其的拥护者受到了镇压、迫害和诬告；埃及的追随者受到了

针对他们的人身、财产、墓地和法律权利的攻击；俄国信徒的灵理会被解散，灵曦堂被没收，而且很多时候他们自身也会被驱逐和流放；德国的巴哈伊社团被官方解散，社团活动于1937年6月被禁止，国家档案馆被没收，一些社团成员遭到审问甚至逮捕。

这样的事件令圣护感到忧心忡忡，并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也进一步加重了他心灵和头脑中的负担。不过，最大的问题永远都是波斯，在那里，一个“长期受到伤害、压制且饱经磨难的社团”一直都在不断的迫害中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挣扎。在圣护的使命周期中，他从头到尾一直惦念着这个让人“心爱”（他常常充满爱意地用这个词来形容它）的社团。他总是与这个社团的成员以及他们选举出的总灵理会保持着大量、稳定的通讯往来，而且在他与西方的巴哈伊的通讯中，这个社团也是一个频繁出现的主题——他会为它担心，会呼吁外界来协助对它的保卫，会解释它为什么会遭到本国人民如此无情的攻击。圣护还说，正是这个社团引领了信仰的“英雄时代”。

上帝的至高显示者出现在波斯，这里因而成为人们所深爱的“信仰的摇篮和我们最温柔的情感寄托对象”（守基·阿芬第语）；圣护还写道，我们“见证波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灵性和物质的崛起”之时刻即将到来。但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性质在当下已经得到了改变，从而能够保证这一预言的快速实现。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只有当一位观察者是细心的、公正的且具备波斯人民的礼仪和习惯时……他才能够真正理解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位尽心尽责的信徒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而这种艰巨性正是由“人群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普遍盛行的倾向性”所造成的，例如冷漠，懒惰，缺乏公共责任感和对原则的忠诚，在行动中缺少齐心协力和持之以恒，习惯于盲目地屈服于无知、狂热的神职人员并且为他们的行为保密。巴哈欧拉的天启必须改变整个世界，因此也必须改变祂的祖国。当这个国家来到祂的庇护之下时，摆在它面前的将是一个伟大的命运。

我们从守基·阿芬第的信中可以看出，有一段时期，他曾经希望新的巴列维王朝的建立者（此人在当时正在进行多项必要的改

革）可以迅速地为巴哈欧拉的信仰在该国的发展带来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守基·阿芬第写道，那里的信徒们“尝到了他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解脱的滋味”。鉴于这项改革的进程正在推进，他建议总灵理会抓紧获取关于印刷书籍和建立一个巴哈伊出版信托的许可。当这一要求被拒绝时，我们发现，圣护在1932年1月致电美国，电报中写道：“立即通过德黑兰灵理会向波斯政府和沙阿转交两封书面通讯，代表美国信徒向近期卓有成效的内部改革表达真切的赞赏之情，强调联结两国的灵性纽带，诚挚地呼吁撤销对巴哈伊作品出版权的禁令，强调它们高尚的道德价值，要特别提到纳比勒的书和《巴哈伊世界》。”然而，守基·阿芬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改革的规模还太小，依然容不下一个遭人痛恨的社团，因此，这一要求也遭到了拒绝。圣护决意不能轻言放弃，五个月后，他又致电美国道：“立刻代表美国信徒向沙阿递交请愿书，介绍兰塞姆·凯勒作为我们授权的代表，要求巴哈伊作品在波斯的出版权。强调对内部改革的普遍赞赏之情以及联系两国的灵性纽带，强调巴哈伊著作对伊斯兰教的崇高称颂以及它们对波斯的道德价值。向波斯总灵理会寄请愿书。”

圣护总能抓住任何可供使用的工具，并利用它来为信仰的利益服务，以下这件事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基思·兰塞姆·凯勒（Keith Ransom-Kehler）夫人是一位美国信徒，她能力卓著、品格出众。她作为一名朝圣者来到了海法，守基·阿芬第便决定派她到波斯去。在成为巴哈伊之前，她是一位基督教堂的牧师，也是一名激昂而雄辩的演说者。圣护让她在海法待了好几周，在此期间，圣护对她简要介绍了波斯的情况，同时希望她能够为信仰在那里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哪怕些许的认可贡献力量。尽管由于沙阿拒绝接待兰塞姆·凯勒夫人，导致圣护托付给她的使命没能实现，但是圣护特使的这次访问仍然对波斯的巴哈伊社团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因为她受到了圣护关于建立教务管理体制的悉心指导，而且，她让这个时常遭遇威胁、一直受到压迫、有时十分冷漠的社团意识到了摆在自己面前的未来使命。然而，就像埃斯尔蒙特博士一样，兰塞姆·凯勒夫人——这一刚刚拿起的工具也从圣护的手中被夺走了。

1933年10月28日，圣护致电美国道：“在巴哈欧拉的祖国，凯斯把她珍贵的生命贡献给了挚爱的圣道。在波斯的土地上，她遭遇了黑暗势力；但是为了波斯的利益，她凭借卓越的品格、坚强的意志和始终不渝、堪称典范的忠诚，勇敢地向其挑战并与之斗争。众多无助的波斯同胞为突然失去他们杰出的解放者而深感痛心；美国信徒感激、自豪地缅怀他们第一位卓越的殉道者。与这样一位极为宝贵的合作者、始终如一的顾问和备受尊敬、忠诚不渝的朋友在尘世诀别令我深深地陷入悲伤之中。我对她的离去表示哀悼。敦促地方灵理会组织追悼会。她的国际服务使得她成为了巴哈欧拉的圣辅中的杰出一员。”她的离世是波斯的巨大损失，却也成为了美国的伟大收获。

兰塞姆·凯勒夫人去世后，守基·阿芬第毫不吝惜地赋予了她诸多的荣誉，而这些荣誉正是这位特使所应得的。她自己的话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些话是她在波斯期间写下的，当时的她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她在首要任务上的失败，她写道：“尽管我从未动摇，但我失败了。付出了几个月的努力，到头来却一事无成，这是我必须面对的结果。如果将来有人对我这段遭遇挫败的经历感兴趣，那么在我疲惫苍老的身躯倒下时，他一人便可以判定，我距离那看似坚不可摧的讨好与冷漠的高地是近还是远。今天，战斗的硝烟密布，让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在向前走，还是倒在了途中。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苦难。牺牲有它固有的痛苦，它就像一个微生物，一个有机体。人可以破坏尘世种子结出的果实，却无法破坏牺牲结出的果实。我一直觉得，一旦牺牲的种子被种下，它将在永恒的沃土中绽放。我的牺牲将会结出一朵非常普通的花，也许就像我从巴尔富鲁什（Barfurush）的市集采撷到的娇小的勿忘我一样，它是在库杜斯的鲜血浇灌下长成的；如果我的这朵小花有朝一日映入了某人的眼帘，那么，但愿似乎正在徒劳奋斗着的他，能以守基·阿芬第的名义捡起这朵小花，并作为美好的纪念珍藏起来。”

1934年12月，守基·阿芬第致电波斯总灵理会，电报中说道：“塔尔比亚特学校（Tarbiyat School）是否已被永久关闭？查询并

电复。”关于这个问题的背景，在波斯总灵理会给守基·阿芬第的回电中有所体现，电报中说道：“按照您的要求，德黑兰的两所塔尔比亚特学校在巴孛殉道纪念日当天停课，教育部因此强制关闭了这两所学校，并问我们为什么不掩饰自己的信仰……”波斯的巴哈伊们不断地受到守基·阿芬第的激励、引导，为了在追随自己的宗教时至少可以获得应有的自由（从信徒的数量上来讲，巴哈伊信仰是该国除伊斯兰教之外最大的宗教），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奋斗着。这一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塔尔比亚特男孩和女孩学校完全归巴哈伊们拥有和管理，它成立于阿博都-巴哈的年代，具体时间是在1898年，到1934年为止已经有三十六年历史，是阿博都-巴哈非常看重的一个项目。学校的声誉一直很好，而且，尽管它的学生以巴哈伊为主，但是所有教派的孩子都会入读。每逢九个巴哈伊圣日，学校都会停课，但是现在，教育部突然要求学校在圣日期间也开课，并为此找了一个牵强的借口，说巴哈伊们所属的教派还没有得到波斯官方的认可。圣道迫切地想要赢得这场寻求解放的战斗，而教育部的这一命令则意味着圣道的倒退，而非前进。因此，守基·阿芬第断然拒绝了教育部的要求，命令灵理会在巴孛殉道纪念日当天让学校停课。由于圣护既不愿建议信徒们掩饰自己的信仰，也不希望学校在巴哈伊圣日开课，而政府又拒绝变更其命令，于是，塔尔比亚特——这所波斯最好的学校之一被关闭了，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开放。

收到德黑兰答复的第二天，圣护便向北美的巴哈伊们宣告了这一坏消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北美的巴哈伊们享受着最高程度的自由）。他在电报中罗列了波斯的巴哈伊正在遭受的屈辱和苦难，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愤怒之情，他说道：“刚收到的消息表明，有人要刻意破坏掉波斯境内所有的巴哈伊机构。卡尚（Kashan）、加兹温（Qazvin）和苏丹阿巴德（Sultanabad）的学校已被关闭。在几个主要的中心，包括加兹温和克尔曼沙阿（Kirmanshah），官方已经颁布命令，要求暂停传导活动，禁止集会，关闭巴哈伊会堂，并否定了在巴哈伊墓地中埋葬亡者的合法性。在处罚和关押的威胁下，德黑兰的巴哈伊被迫在身份文件中将自己登记为穆斯林。得意

洋洋的神职人员在煽动群众。德黑兰总灵理会写给沙阿的请愿书没有被递交上去并遭到了拒绝。局势令人无法容忍，将其严重性告知波斯公使。”

在大流士（Darius）及其继任者之后，能够真正为这个国家博得声望的就只有巴哈伊信仰了。现在，更为开明的政策正在影响着整个波斯，人们原本有理由希望这些政策可以将巴哈伊们囊括进来，可他们却受到了这些毫无理由的打击。在当时，波斯的巴哈伊们能够举行大会，会议代表能够充分代表该国境内的巴哈伊社团选举产生总灵理会，按照守基·阿芬第的统计手册中的记载，该灵理会是在1934年成立的；而早在1927年，“第一次由各个代表参加的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守基·阿芬第语）便已举行，大会计划以后每年都要举办这种性质的集会，而且在1928年，守基·阿芬第已经开始把在这些集会上选举出的灵理会称为“波斯总灵理会”。如他所述，这一合理的选举是“以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同胞所采取的方法为榜样”的，而选举之所以被长久地搁置，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圣护曾指示，成立一个国家总会要有合理的行政程序，其先决条件是要详细地编制出这个国家所有信徒的名录，而该灵理会在当时还无法执行这一指示。

1931年间，守基·阿芬第曾指示波斯，买下一块土地以备将来建设灵曦堂之用，同时要开始在德黑兰修建一座巴哈伊管理中心。尽管守基·阿芬第和波斯的巴哈伊社团竭尽所能地保持克制，不去无谓地触怒当局或人民，但毫无疑问的是，该社团关于其有权作为一个被认可的社团而存在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非但没有被这个愤怒的政府所承认，反而致使政府决意否认其存在。沙阿曾发动了一场新的妇女解放运动，其中包括弃用面纱，这一点与巴孛和巴哈欧拉的教义完全一致，但是，守基·阿芬第指示巴哈伊妇女不要在这场运动中走在前面，以免带来新的麻烦，他们的克制由此可见一斑。

在东方，尤其是在波斯，巴哈伊们面临的局势从来没有真正平静过，也从未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而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频繁的暴力流血事件。巴哈伊们惨遭杀害的案件时有出现，其中的

一些受害者被圣护称为殉道者；迫害不断发生，有时这里更严重一些，有时那里更严重一些，但总是此起彼伏。当波斯朋友们被时局的种种变化所折磨时，圣护总是以爱的讯息做出回应，同时还会提供救济款项，并且给出指示。这种指示通常是给美国总灵理会的，他会要求它代表朋友们进行干预，为圣道争取正义。像下面这样的通讯十分常见，它反映出了这类信息的精神，通讯中写道："建议……在灵曦堂的礼堂举行特别的宗教集会，祈求阿卜哈王国不可见之天军的协助，以使巴哈欧拉饱受苦难的祖国同胞获得解放。愿美国不懈努力，以弥补东方信徒力所不及之处。"

不过，在圣护三十六年的使命周期中，波斯的巴哈伊社团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1955年。正如圣护在电报中所言，这个巴哈伊世界中最大的社团突然面临着局势的剧变。在一封日期为8月23日的长篇电报中，他向各圣辅和总灵理会通报了具体情况，电报中说道：当局没收了波斯信徒在德黑兰的国家总部，而且总部的装饰性穹顶遭到了破坏（在这场破坏中，这个国家的一位主要的神职人员和一位军队的将军拿起手镐，亲自上阵），在此之后，整个波斯的巴哈伊地方行政总部都被攫取和占领，波斯的议会宣布巴哈伊信仰是非法的，新闻界和电台掀起了一场恶毒的报道风潮，他们歪曲信仰历史，诽谤信仰缔造者，讹传信仰教义，掩盖信仰的目的和意图。随后，一系列针对这个饱经磨难的社团成员的暴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对这些可怕的破坏和"野蛮的行径"进行总结时，守基·阿芬第对种种事件这样描述道：信仰在波斯最重要的陵殿——位于设拉子的巴孛故居被亵渎，且被严重损毁；巴哈欧拉祖上的宅邸被占领；信徒们拥有的商店和农田被掠夺，家园被洗劫，牲畜被屠杀，庄稼被焚毁，墓地中的巴哈伊逝者惨遭掘坟和亵渎；成年人被殴打；年轻的妇女遭到绑架，被迫与穆斯林结婚；孩子们被嘲笑、被辱骂、被学校开除，而且还遭到了殴打；商人抵制巴哈伊信徒，拒绝向他们出售食品；一名十五岁的女孩被强暴；一个十一个月大的婴儿被踩在脚下；信徒们不断受到压力，外界要求他们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圣护接着说道，最近，一伙人数多达两千的暴徒和着音乐和鼓点，用铁锹和斧头将一个七口之家劈成了碎片，

遇害者中年纪最大的已是八十岁高龄，最小的只有十九岁。

在圣护的指示下，全世界有超过一千个团体和灵理会向波斯当局发来电报和信件，巴哈伊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抗议他们遵纪守法的同胞却遭遇了如此不公不正、无法无天的恶行。此外，所有国家的总灵理会都给沙阿、政府以及国会发去了信函，对这种毫无正当理由、纯粹出于宗教目的的迫害表示抗议，而且迫害的对象又是一个绝无恶意的社团。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官方人士的回应，于是圣护命令国际巴哈伊社团把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在日内瓦的办事处（国际巴哈伊社团已经是联合国认可的非政府组织了），而他本人则提名了一批人作为社团在这一紧要关头的代表。巴哈伊的上诉递交给了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成员国代表、人权司司长以及一些享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专门机构。美国总统也收到了美国总灵理会、各信徒团体以及各地方灵理会的上诉，他们代表自己受压迫的波斯姐妹社团进行干预。

在历史上，这是信仰第一次以具有防御能力的武器进行了反击。守基·阿芬第清楚地阐明了此事的意义。不管这些“令人心碎”的事件结果如何，有一个事实已经清楚地浮出了水面：在阿博都-巴哈升天后的二十五年间，上帝婴儿期的信仰已经具备了神圣指定的教务管理体制，并可以利用其新生的管理机构，通过一系列国家计划（这些计划在世界远征期间达到了高潮），来系统地传播这一信仰；现在，在经历了这种令绝大多数追随者不安的苦难之后，信仰正在从默默无闻之中崛起。这些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响将会被后代称为“上帝之号角的雄伟奏响”，通过圣道“最老、最可怕、最狠毒、最狂热的敌手”的媒介，东西方的政府和政府首脑必将被唤醒，并意识到这一信仰的存在和影响。在波斯，这些事件所处的形势波谲云诡，它们在国外的反响也非常强烈，因此圣护说道，它们必定会将信仰从伊斯兰国家传统信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会使巴哈欧拉的祖国最终认识到祂天启的独立性质。

考虑到波斯的信徒遭受到了巨大的苦难而且身处悲惨的境况，守基·阿芬第发起了一项“救助被迫害者”基金，并且率先捐了折合美元一万八千元的款项，以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他并不满

足于仅以此证明巴哈伊的团结，于是呼吁在非洲的中心——坎帕拉（Kampala）建设这块大陆的“灵曦堂母堂”，以此作为一种“至高的慰藉”，因为在信仰的发源地，我们“勇敢的同胞”中还有许多“受压迫的大众”。黑暗的力量集结于信仰在世界上的最古老的堡垒上方，守基·阿芬第利用可供他支配的最强大的武器予以了反击，这武器便是创造性进步、启迪和信念的力量。

当暴力攻击的浪潮于1955年突然在波斯爆发时，守基·阿芬第正独自一人在瑞士隐居，身边没有顾问为他提供帮助或安慰，我们很难想象他是如何承受了这一打击，如何以一己之力筹划出他的策略，致电他的副官，即各总灵理会，告诉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并且提名了一批代表信仰利益的人，与联合国——这一人类设计出的最高国际机构——进行交涉，同时安慰受压迫者，筹集资金为他们提供救济，为保卫他们而费尽心力。

在讲到信仰在俄国遭到的清洗时，我们必须记住，世界上最早的巴哈伊社团之一便是在这里的高加索和突厥斯坦地区形成的，从上世纪末开始，许多在他们的祖国不断遭受迫害的波斯信徒发现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他们在一些小镇定居下来，尤其是在阿什哈巴德，他们在这里建起了整个巴哈伊世界的第一座灵曦堂，并为巴哈伊儿童建起了一些存在了三十余年的学校。他们的事务得到了很好的组织。到1928年时，他们已经有了多个灵理会（有一个在莫斯科），在真正的全国代表选举举行之前，两个中央灵理会管理着他们的事务，并且作为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的总灵理会出现在美国出版的名录上。1927年9月，守基·阿芬第给阿什哈巴德的地方灵理会写信，指示其要为各位代表的到来做好准备，他们来自突厥斯坦的所有灵理会，要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他们的总灵理会。1928年6月22日，守基·阿芬第收到了一封阿什哈巴德灵理会发来的电报，内容如下：“根据1917年总协定，苏联政府已将所有的庙宇、寺院、神殿等收归国有，但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会向各宗教社团自由出租。政府按照协议，为灵曦堂开出了与灵理会相同的条件。通过电报请求指引。”圣护立刻采取了行动，他致电莫斯科灵理会道：“积极向当局请求，阻止没收灵曦堂。向阿什哈巴德征

询详情……”同时，他也给阿什哈巴德方面发了电报，其中写道：“将相关材料提交给莫斯科灵理会，由它代表俄国所有巴哈伊向当局请愿。坚定行动。为你们祈祷。”

在回顾发生在俄国的事件时，我们必须对俄国信徒经受的苦难和波斯信徒受到的迫害做一个区分。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圣护本人有着清楚的认识。在波斯，信徒们成为了各种不公的受害者（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是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俄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巴哈伊们并非由于自己的信仰受到区别对待，而是因为政府对所有的宗教社团都采取了这样的政策。

1928年9月，在一封给玛莎·鲁特的信中，守基·阿芬第不仅指出了俄国发生的事情，还说到了它们对他个人的影响：“今年的夏天令我非常沮丧，圣道在俄国的情况进一步恶化。灵曦堂被占用，随后被关闭并贴上了封条。如果要租下来的话，朋友需要支付一大笔钱，如果不租的话，当局威胁要把它的一些部分卖给他人。局势十分危急，许多家庭都迁移到了波斯。会议被搁置，灵理会被解散，当局还实施了严格的限制和惩罚……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让我情绪十分低落且深感伤心。”许多巴哈伊从俄国返回了波斯，这一举动是圣护完全没有批准的。他通知阿什哈巴德灵理会说：“朋友们启程前往伊朗极为有害”，并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应该将国籍由波斯改为俄国。之前他便极力劝说俄国的巴哈伊移民学习该国语言，并且要将巴哈伊作品翻译成俄语。1929年，他在给波斯总灵理会的信中表示，阿什哈巴德的信徒应该留在那里，且不应疏散，要等待不公的乌云散去，正义的太阳升起。

在所有的迫害中，受迫害者本身的不智，与下属在执行上级（他们可能心怀恶意，也可能并无恶意）指示时的不智相互作用，而这在多大程度上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是一个我们永远难以解答的奥秘。不过，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至少有一些不幸是由我们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1929年1月1日，守基·阿芬第在一封给西方巴哈伊的长信中写道，俄国的巴哈伊们“遇到了官方原则的严格限制，其他的宗教社团也是如此”；对于“国家在自由行使其合法权利时所选择实施

的措施，作为忠诚守法的公民，巴哈伊们严格地遵守了”。“出于国家的利益，当局对宗教性质的建筑和纪念碑采取了罚没政策”；阿什哈巴德的灵曦堂是巴哈伊们“最为珍爱和看重的财产”，而现在，在这样的政策下，当局罚没了这座灵曦堂，获得了对它的拥有权和控制权。此外，巴哈伊灵理会和个人信徒收到了正式的“口头及书面国家命令”，这些命令要求“暂停会议，查禁所有巴哈伊地方和总灵理会的委员会，禁止筹集资金，声称官方有权对巴哈伊灵理会的议事会进行全面、频繁的检查，对巴哈伊灵理会收到和发出的信件进行严格的审查，中止一切巴哈伊期刊，并驱逐圣道主要人物出境，不管是公共的传导者、发言人，还是灵理会的官员。”守基·阿芬第称，对于所有这些，“巴哈欧拉信仰的追随者如灼痛在身，却表现出了英雄般的坚毅，他们牢记巴哈伊行为指导原则，并且毫无保留地一致认为，无论管理活动（这些活动的终止本身并不违背忠于信仰这一原则）受到的干预会给信仰的发展之路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如果他们要忠于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明确禁令，面对负责任的统治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颁布的判决和权威法令时，他们便要完全尊重且忠诚地服从。”他接着说道，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的巴哈伊们尝试了所有的合法途径，以求放松这些强加于他们之上的限制，却没有成功，在此之后，他们便决定“认真地履行被认可的政府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判决”，同时他们心中怀有一个希望，那便是 “任何世俗的力量都不能掩盖圣道的光辉……将圣道的利益托付给那位警惕的、万能的神圣拯救者看顾。”

守基·阿芬第在这封信中向巴哈伊们保证，如果他认为有帮助的话，他随后会号召巴哈伊世界进行干预。1930年4月，他感到这样做的时机到了。在这座珍贵的灵曦堂被没收后，巴哈伊们成功地从当局手中把它租了下来，现在，当局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更加严厉的措施，朋友们面临着永远失去它的危险。圣护因此致电美国总灵理会：“……须立即行动。强调灵曦堂的国际性……”在之前的长信中，圣护已经概述了应该采取的方法，当时机到来时，海外的信徒需要提高呼声做出抗议和解释：东西方国家的地方和总灵理会要团结一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同胞不仅要让俄国官员明白，对于

可能归咎和牵连自己的政治计谋或其他别有用心的想法，他们都将予以驳斥，而且要让他们意识到，巴哈伊工作有着博爱、灵性的本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种族的巴哈伊都参与到了其中，同时，这座建筑是国际性的，它是巴哈欧拉的第一座世界灵曦堂，它的建造凝结了阿博都-巴哈本人的构想，得到了祂的指导，并且受到了全世界巴哈伊的共同支持。

但是当事态已成定局时，守基·阿芬第致电阿什哈巴德灵理会，要求他们“遵守国家当局的决策”。阿什哈巴德的灵曦堂是在阿博都-巴哈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两座灵曦堂之一，类似这样的案例为各巴哈伊灵理会构成了一个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指导模式，同时也为个体的信徒提供了一套信息，即无论一个政府的性质是怎样的，信徒都必须担起自己对政府负有的义务。

在圣护的一生中，与俄国、波斯和德国一样，信仰在土耳其和埃及也受到了严苛的限制措施。自从伊斯兰王权垮台之后，土耳其便实行了“旨在使国家世俗化、废除伊斯兰教的强硬政策”（守基·阿芬第语），采取了一系列大的改革，而且这是一场巴哈伊们完全支持的改革。因此，巴哈伊们在土耳其遇到的麻烦并不是宗教歧视，而是因为新的政权发现土耳其的所谓宗教团体曾经为政治鼓动提供了掩护。当政府的特工看到巴哈伊社团已经组织起来，而且公开地进行与传导相关的活动时，他们变得疑心重重且警觉起来，于是，他们搜了许多信徒的家，没收了他们发现的任何书籍，对信徒们进行了反复盘问，把其中的许多人都投进了监狱。这一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报道，有的是在国外，不过主要还是在土耳其。新闻界的反应有利于巴哈伊们，而且当1928年12月13日刑事法庭公开审理此案件时，媒体进行了全程的、公正的听证。守基·阿芬第写道，这标志着圣道在展现于世人面前的道路上又踏出了新的一步，“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一个国家的官员召集起来……来展现他们信仰的历史和原则……”

有意思的是，当局从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现在被称为伊斯坦布尔）的灵理会搜到了许多文件，其中便有玛丽王后为信仰写的颂词，而负责检查的官员理解了颂词的含义。在出庭陈述证词时，

君士坦丁堡灵理会的主席将信仰的教义做了睿智的陈述，其中包括对巴哈欧拉这句原话的引用：“在正义面前，要说出真理、无所畏惧。”此事以巴哈伊们缴纳罚款告终，因为所有组织必须在政府注册，在举行公开集会时需要获得授权，所以他们触犯了法律。不过，这件事的结果对信仰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国际层面上。1929年2月12日，守基·阿芬第给西方的巴哈伊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将法院的判决总结如下：“至于判决……其中明确说明，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出于对其信仰的灵性特质的单纯理解，认为无须为其教务活动的举行进行申请，因此有责任缴纳罚款。但是，令国家的法律代表满意的是，他们不仅证明了巴哈欧拉之圣道的无罪，而且他们出色地从许多方面为圣道进行了辩护，包括圣道的独立性，圣道的神圣起源，圣道对环境的适用性，以及圣道对当前时代的要求。”

在伊斯兰王权垮台之后，一个新的国家在土耳其发展起来。此事首次将巴哈伊们与这个新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世俗的政权时刻警惕着国内的反叛力量，在十分匮乏的官方记载中，与1928年的情况类似，相同的怀疑和指控再次于1933年出现。这一年的1月27日，守基·阿芬第致电美国灵理会道：“约四十名君士坦丁堡和亚达那（Adana）的巴哈伊被捕，罪名是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务必通过土耳其驻华盛顿公使向其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释放一个非政治信仰的守法信徒。建议总灵理会致电安哥拉，与国务院进行交涉。”同时他还给波斯总灵理会发了电报，其中写道：“斯坦布尔（Stamboul）和亚达那的信徒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并被逮捕，立即代表他们向土耳其大使提出抗议。”第二天，他给一位杰出的土耳其人士发了电报，电文如下：

尊敬的伊斯马特帕夏（Ismat Pasha）阁下

安卡拉（Ankara）

巴哈伊信仰之领袖震惊且悲痛地得知巴哈欧拉之追随者被囚禁于斯坦布尔和亚达那。全世界的巴哈伊信徒对贵国政府划时代的改革深感钦佩，他们誓将忠于贵国政府。敬请阁下代表

本信仰之追随者进行干预。

此前的事件发生时，圣护在信件中有过详尽的描述，因此巴哈伊们对类似的情况已经十分熟悉。他们便立刻采取了行动，引证了刑事法庭在前一个案子中的判决，并向土耳其当局提出了抗议。在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努力之后，信徒们被无罪释放。3月5日，圣护通知美国灵理会道："伊斯坦布尔教友已获无罪宣判，但仍有五十三名信徒关在亚达那。立即再次提出抗议，要求释放。"4月2日，圣护再次给他们发去电报，其中写道："亚达那教友已被释放。建议向土耳其大使表达感激之情。"

当此事在土耳其发生时，守基·阿芬第正在竭力使信仰在波斯获得一些权力（此间基思·兰塞姆·凯勒女士正旅居波斯）。由此我们不难想到，一直以来，守基·阿芬第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谓数不胜数，其性质也都十分棘手。尽管土耳其当局对信仰多有怀疑，但是在圣护的一生中，他还是为这个国家的巴哈伊社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圣护去世之后，作为他的十年计划中的一部分，社团选出了其独立的总灵理会。

埃及是在巴哈欧拉的时代便接受祂的启示之光的国家之一。在土耳其信徒的第一个案件发生三年后，埃及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圣护看来，这些事情同样也有着重大意义。起初，埃及北部一个无名小村里的几个巴哈伊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守基·阿芬第说，"在巴哈伊信仰最终被普遍接受、成为被认可的世界独立宗教体系的过程中，"这还只是"第一步"。在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里，关于个人身份的法律都是由宗教法庭来执行的；当这个村子的巴哈伊成立了他们的灵理会时，在狂热的宗教情感驱使下，村庄的头人开始掀起了对三个已经成为巴哈伊的已婚男子的不满；他们通过法律途径提出了要求，即三个人的穆斯林妻子须与他们离婚，理由是她们现在嫁给的是异教徒。这个案子被提交到了贝巴的宗教上诉法庭。1925年5月，法庭做出判决，强烈谴责了破坏伊斯兰法律法规的异教徒，并判处当事人解除婚姻。这本身便是意义重大的一步。但在圣护看来，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法庭做出了肯定的、令人吃惊的、

历史性的声明，即这个为异教徒所包围的信仰应该被看作一个不同的宗教，完全独立于之前的各个宗教体系之外。”在对这一判决的摘要中，守基·阿芬第引用了其中的原话，这段话对巴哈伊而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 巴哈伊是一个新的、完全独立的宗教，其信条、原则和律法为其独有，区别于伊斯兰教的信条、原则和律法，并与后者大相径庭。因此，巴哈伊信徒不能被视为穆斯林（反之亦然），就像佛教徒、婆罗门或基督徒不能被视为穆斯林（反之亦然）一样。

即使这份裁决只能算作一个孤立的现象（毕竟这只是埃及一所无名的地方法庭所做出的判决），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巴哈伊手中的一件宝贵的武器。信徒们寻求伊斯兰各国承认信仰的独立地位，而法院的这份判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此事并非仅止于此；开罗的最高教会权威随后批准并维持了这一判决，而且判决书由穆斯林打印出来并进行了传阅。

即使是最琐碎、最脆弱的工具（不管是人还是文件），圣护也总是时刻准备着抓起它们，用作战斗中的武器，使信仰获得认可和解放。埃及的事件发生后，圣护紧紧握住了这一由信仰之敌人带给他的利剑，并一直用它战斗到了生命的终点。他说，这是将圣道从伊斯兰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篇章。在圣护的英明指导下，东方的巴哈伊以此为杠杆，获得了一个勉强的承认，即信仰不是伊斯兰教之内的一种异端邪说，而对于这一指控，西方的巴哈伊也借此给予了断然否定。曾经，守基·阿芬第向以色列宗教事务部部长表达过强烈抗议，此事也被引作理由之一。当时，圣护坚持巴哈伊社团的事务不能由以色列处理穆斯林社团事务的领导负责，他指出，这会让人们误以为我们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他说，他更希望将巴哈伊事务置于基督教司的领导管辖之下，这样人们对巴哈伊信仰的独立地位也就不存在疑惑了。正是由于类似这样的论据，以色列宗教事务部设立了巴哈伊司，由一位专门的领导负责。

埃及的巴哈伊总灵理会以贝巴法庭的裁决为有力武器，在经过

了几年的抗争之后，使得外界对该国社团的独立宗教地位至少有了些许的认可。为了达成这一步，该灵理会出版了一份关于个人身份问题的巴哈伊律法汇编，通过这份文件背后的力量，同时又利用了狂热的穆斯林不断掀起的针对巴哈伊的事件，灵理会成功地从埃及政府那里获得了一些土地。土地分布在一些信徒数量相对较大的城市，由政府正式批给灵理会，专门用作巴哈伊墓地。

这份关于个人身份的律法汇编后来被译为波斯语和英语，在那些缺少相关民法的国家里，它可以用作指导巴哈伊事务的准则。尽管有的穆斯林国家当局因此而做出了一些让步，如埃及、波斯、巴勒斯坦和印度，但巴哈伊面临的法律形势仍是含混不清的，特别是在埃及和波斯。在某些方面，信徒们常常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权利，生活在一种法律的真空地带中。婚姻方面的问题尤其如此。巴哈伊的结婚和离婚注册在灵理会下面，依照的是巴哈伊律法，而各国政府均视其无效。大的信徒社团骄傲地接受了这种困难，它们拒绝在国人嘲讽的目光中蒙羞，直到今天仍在为获得这种基本问题上的认可而努力。巴哈欧拉的教义在他们的心灵中萌发出了信仰之精神，这便是对这种精神的最高证明；挚爱的圣护指示他们“不要介意任何不欢迎、不信任或者批评的风潮，如果我们严格地遵守自己的标准，这些情况便可能出现”，他们忠诚地执行了圣护的指示，这便是对这种忠诚的最高证明。

这些事件必将为信仰带来最终的认可和解放。在《神临记》中，守基·阿芬第用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字对它们做了简要的叙述，其中写道：“巴哈伊社团忠于其对政府的神圣义务，深知其公民责任。对于政府当局在各个时期颁布的行政法规……巴哈伊社团一直毫无保留地服从着，未来也将如此……然而，这些命令却等同于让信徒们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或者构成了一种对其灵性、基本及神授原则和戒律的不忠行为，因此社团坚决不会屈从于它们，我们宁可遭受囚禁、放逐和所有形式的迫害，包括死亡（已有两万名殉道者，他们将自己的身躯铺在了社团缔造者的路径上），也不愿遵循一个尘世当局要求其放弃对圣道之忠诚的命令。”

守基·阿芬第对信仰事务的管理总是轻重有别，而这也是一个

真正伟大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点。在核心事务的处理中不能有任何妥协，不过，在管理一个遍布世界的社团时，我们会认识到，而且也应该认识到，人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的。守基·阿芬第智慧与技巧的一个例子是，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社团。圣护从不允许任何社团忽视巴哈欧拉的教义，不管这个社团是在一个世界最大、最成熟的大都市中，还是在一个人人目不识丁的村子里。但同时他也知道，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五岁的孩子像一个少年那样，或者要求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具备古稀之年的智慧、服从和经验。正是因为守基·阿芬第深知各个社团或青涩或成熟，处在不同的阶段之中，因此，对于世界上最老、最饱经考验的社团——波斯的巴哈伊社团，圣护总是持最严格的态度，希望其荣幸的信徒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成为服从和忠实于巴哈欧拉之律法的典范。在这一方针之下，他不仅悉心帮助北美的巴哈伊（他们组成了最古老的西方社团）做准备，使他们遵循数量不多但至关重要的律法（圣护最终同意了他们实施巴哈伊律法），而且，在教导信徒们的多年间，圣护一直持容忍克制的态度，直至他们能够接受并应用这些律法。基于这一认识，圣护指示那些在许多国家（它们是在世界远征期间开拓的）传导信仰的灵理会，巴哈欧拉之圣道的新追随者须对教义和律法有起码的了解，然后才能接纳他们进入至大圣名的社团之内。

对发展阶段的区分显示出了当前不同巴哈伊社团的特点。在守基·阿芬第写给一个伟大的非洲地区灵理会的最后一封信中，这种区分体现无遗。这封信写于1957年8月8日（距离圣护去世不到三个月），由秘书根据圣护本人的指示代笔，其中指出了在巴哈伊历史的这个阶段，圣护关于这一至关重要主题的思想精髓：

“在X夫人的拜访中，圣护与她讨论了X地的传导工作，在那里，这一天启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边远地区的人们似乎迫切地想要加入信仰。圣护认为，那些负责接纳新信徒的人们应该知道，最重要、最根本的接纳条件便是申请者对巴哈欧拉今日之地位的认识。我们不能期望一个不识字（识字与否并不能反映出精神的能力或潜力）的非洲人像伦敦的信徒那样学习了所有的教义，尤其当以他们的语言写成的作品本来就很少时，也不能期望他理解了教义全部

的影响。重要之处在于这个人的精神，在于这个人对巴哈欧拉的认识，以及对祂在当今世界的地位的认识。因此，当非洲人民满怀热情地转向信仰时（许多人已经接受了信仰），朋友们绝不能太过苛刻，否则他们会发现非洲人民充满爱意的热情之火将冷却下来。而且非洲人民是敏感的，他们会微妙地感觉到自己遭到了拒绝，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便受到了损害。

“新的非洲各灵理会以及各管理机构的目的，是把天启带给人民，将诚挚者召唤在信仰的旗帜之下。

“你们的灵理会片刻都不能忘记这一点，而且要继续勇敢地提高辖区内的社团人数，并逐渐地在教义和教务管理方面教育朋友们。最可悲的莫过于这些伟大管理机构的建立反而压制了传导工作，或使之陷入困境。我们必须记住，与今天的巴哈伊对信仰的了解相比，早期的东西方信徒几乎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甘洒热血、挺身而出，并说出了‘我相信’，不要求任何证据，而且他们常常是从未读过一个字的教义的。因此，那些负责接纳新信徒的人们必须明确一件事，即申请者受到了信仰之精神的触动。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建立起来。

“他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非洲的巴哈伊传导者能够进一步加强在新信徒中间的活动，深化他们关于教义的知识和理解。”

守基·阿芬第总是能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断，这是他心智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品质。下面这些出自同一封信的指示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至于部落习俗的问题，圣护希望你们在帮助巴哈伊们摈弃旧有的习惯时，要保持极度的克制和耐心。不同情况出现时要具体对待，要运用至高的智慧和友善，当前不要试图面面俱到地严格执行所有的巴哈伊律法，只有如此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巴哈伊男子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那么不管部落的律法是怎样的，他都不能再娶第二个。这是一个基本点，你们的灵理会应该将其与部落社团生活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新的巴哈伊可能仍然深深植根于以前的部落生活中，无法从中脱身，直到社团内的巴哈伊元素足够强大，从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

“剥夺朋友们的选举权是一种严厉的惩戒，你们的灵理会认为，当前采取这一做法是最不明智的。对此圣护表示同意。最好的方针是爱的教育。”

守基·阿芬第使我们明白，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之树在最初种下时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这便是祂的信仰。慢慢地，种子开始生长，就像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在守基·阿芬第看来，同时也是依照阿博都-巴哈在遗嘱中的指示，他的主要任务便是把信仰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将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召集在信仰的旗帜之下。他认识到，我们必须首先把塑造未来社会的原材料收集起来。创造新社会需要很多东西，而且不可否认，它们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一个事实是，在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荣耀地崛起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将大众带到祂的身影之下。

北美是信仰之教务管理体制的摇篮。在这里，圣护花了十六年时间，为所有的巴哈伊管理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它们创造了一种模式。用我们现代的话说，他建立了一座可以让他的火箭升空的发射台，这便是伟大的传导计划。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这些计划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守基·阿芬第明确指出：“圣道的管理应该被视为一种工具，而不是巴哈欧拉之信仰的替代品，它应该被看作一种渠道，上帝允诺之福佑会从中流淌而出，它应该护卫信仰免受僵化之害，使祂的启示所释放出的解放力量不被束缚和阻塞。”他继而说道：“对那些接过如此宝贵之遗产的人们来说，他们当然要虔诚地看护，以免这一工具取代信仰本身，以免人们对信仰管理中的细枝末节表现出过分的关切，从而遮蔽了管理体制之支持者的视野，以免随着时间的推移，偏颇、野心和世俗掩盖了巴哈欧拉之信仰的光辉，玷污了它的纯洁，损害了它的效率。”1922年1月，守基·阿芬第第一次与东西方的巴哈伊通信，四年后，他便开始强调这一要点，在他的使命周期中，他自始至终都将其视为一种危险。1926年1月，圣护致信美国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信中写道：“随着圣道的管理工作稳步发展，各种分支的重要性和数量不断提高，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不管其执行

多么和谐、多么有效，所有的管理活动只是通往终点的途径，应该被视为宣传巴哈伊信仰的直接工具。我们要多加注意，以免过于关切圣道管理机制的完善，而忽视了创造这种机制的神圣目的。”

1957年，第一批地区灵理会在欧洲选举产生，在总灵理会成立之前，它们将作为中间机构管理第二个七年计划中“十目标国家”的一些事务。当时圣护给每一个新选举出的机构写了一封信，再次强调了多年来他不断向各灵理会重申的观点，即管理只是途径，而非目的。他的秘书代表他给一个灵理会写信说道：“当前，巴哈伊管理机构的全部目的就是传导，增加信徒的数量，增加灵理会和团体的数量。”在给另一个灵理会的信中，秘书又写道：“目前，巴哈伊管理体制的基本目的便是传播信仰，对信仰的管理只是为了协调它的活动和保卫它。朋友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圣护曾多次向一些老的、饱受考验的总灵理会指出了这一点，现在，你们的灵理会在历史使命中刚刚踏出了第一步，他感到应该向你们重申，要努力避免引入种种规章制度，它们会使信仰在本地区的平稳运行复杂化，为巴哈伊们带来不必要的阻碍，并使他们感到困惑。教义中规定的要素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在此之外，总灵理会必须动用一切力量，鼓励朋友们独立传导，主动服务，开拓新的中心，将团体转变为灵理会。”

关于自己在做什么，要如何做，圣护总是心如明镜。在第一个七年计划制定并启动之后，圣护于1939年告知北美的巴哈伊，即这一计划的执行者，他们正在“促进这一拓荒运动的发展和巩固，整个教务管理机制也正是为此而设计和建立的”。

宇宙中有许多星系，它们处在不同的演化阶段；同样，在上帝之圣道的全球维度内，巴哈伊世界的不同部分也处在不同的发展状态中。关于巴哈伊律法和规定在信徒生活中的应用，中东的社团要更为先进，但它们既没有获得解放、认可，也没有得到自由。西方（包括美洲、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社团是自由的，但是在这些国家，个人身份的法律是由民事法庭管理，而非宗教法庭，再加上过去文化的影响，在许多信仰之律法的应用上，在信仰之规定的遵循上，它们要远远落后于东方的社团。在一些国教为伊斯兰教的国

家，信徒们成为了狂热政府的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与这些东方的教友相比，许多较落后国家的新巴哈伊是自由的。但是，很多时候巴哈伊律法却得不到应用，因为这些信徒生活在部落社会，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诸民族都是不同的。巴哈伊信仰本身便是来自于后三者的共同背景。由于这些因素，守基·阿芬第要像一个伟大乐团的指挥一样，必须确保巴哈伊世界的每一个社团都在这场交响乐中发出自己的音符。尽管每个社团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但它们都要遵循圣护的指挥。如果我们没有认清巴哈伊世界在当前发展阶段的图景，那么我们便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在其使命周期中，守基·阿芬第真正创造了什么，实现了什么，也无法理解他的成就是多么地振奋人心。

这些不同的例子都表明，尽管人类是同一的，信仰是同一的，尽管教务管理体制是同一的，而且世界秩序也将是同一的，但在不同的地方，圣道之律法、规定和管理程序的执行必须按照不同的速率进展。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东西方的巴哈伊才变得足够成熟起来，对教务管理体制有了充分的理解。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守基·阿芬第才引入了诸如惩戒等原则。在教长打下的基础之上，圣护用多年时间建立起了一个有序的制度。在这一体系之内，一个巴哈伊可以清楚地与非巴哈伊区分开来（体现在信徒的信仰、特有权利和责任上）。圣护最终是想设计一种方法，确保在巴哈伊社团之内，信徒为领会教义而付出了应有的努力，如果他们公然无视教义，也能有一种现行的惩罚方式（一种惩戒），从而保证他们没有危害到信仰的名誉和独立特质，同时这也是一种保护社团声誉的方式。这一惩戒便是解除一位信徒的行政权利；这意味着这位信徒将不能在巴哈伊选举中投票，不能以选举或任命的方式进入巴哈伊灵理会和委员会，不能得到巴哈伊机构关于结婚或离婚的批准，也不能参加巴哈伊社团的集会。这是巴哈伊们所拥有的最严厉的管理惩罚，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将其与破坏圣约而带来的开除教籍相混淆，后者乃是由于一种灵性的疾病而受到了隔离。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守基·阿芬第开创了这一惩戒之时，他向各国总灵理会明确表示，这必须作为一种极端措施来使用。在西方，它只有在灵理会

的批准之下才能使用，也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能使用。在东方，许多与个人身份相关的法律都是由灵理会来管理的，惩戒涉及到了许多《亚格达斯经》中的内容；西方的情况比较复杂，惩戒涉及到对相关法律（在圣护看来，巴哈伊们现在必须领会的法律，如征得双方父母对婚姻的同意，举行巴哈伊婚礼仪式，遵循巴哈伊离婚律法）的服从。当信徒们完全无视信仰的教义，涉足政治问题时，当他们“公然败坏道德”（这是圣护的谨慎叫法），使整个社团名誉受损时，或者当他们严重违犯“巴哈伊信仰的指导和管理原则”（守基·阿芬第语，他说，“随着教务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巩固，圣道的支持者……感到他们有责任坚持并警惕地应用”这些原则）时，这一惩戒也可以被使用。守基·阿芬第明确表明，投票权的剥夺绝不可轻易使用，而且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这既是为了保护个人，以免愤怒的机构做出草率的回应，从而伤害到他们，也是为了让朋友们意识到，作为巴哈伊的他们是荣幸的，也有自己的责任，如果失去了在社区中的权利，他们就丧失了一种伟大而珍贵的东西。

守基·阿芬第将这一基本程序普遍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不管信徒们处在何种类型的社会。而且在圣护逐渐实施巴哈欧拉钦定之律法和原则的过程中，这一程序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说：“这些律法和原则都是各机构的基础（祂的世界体制最终又必须以这些机构为基础）的实质。”

守基·阿芬第从世界中心管理着这个信仰。他的管理是一个有趣的观察课题，在对待根本问题时，须严格而不能有例外，在对待次要问题时，则允许甚至鼓励灵活。各种枷锁将巴哈伊与过去、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捆绑在了一起，圣护的使命周期则不断地将这些枷锁打破，并使信徒们不断积累对信仰及其管理机构的知识。他就像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为所有人给出了一般性的健康准则，同时也为具体的情况开出了具体的药方。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里我只援引一二。

1923年，守基·阿芬第致信印度和缅甸的总灵理会，称巴哈伊妇女也应该被纳入到所有的管理活动中，享有与巴哈伊男子同等的

机会。与西方相比，这些地方的妇女已经享有了更高程度的自由。但在一些中东国家，如波斯、埃及和伊拉克，妇女在公民生活中仍处在完全受压迫的地位。圣护不希望以挑衅的措施无谓地触怒穆斯林群体，因此直到二十五年之后，他才允许这些地区的巴哈伊妇女参与到信仰的管理之中。尽管圣护对巴哈伊妇女有诸多溢美之词，阿博都-巴哈也曾明言相证，“一旦名列信仰之下，妇女的表现要比男性更勇敢”；尽管巴哈伊教义中明确阐明，男女平等是一条基本原则，但在守基·阿芬第看来，与促进信仰在伊斯兰国家的一般利益、保护信仰之生存的至高需要相比，这一原则在教务管理机制中的应用完全是第二位的，是相对次要的。

各灵理会在圣护的统率之下执行计划，圣护对它们的明确指示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做出修改。这方面的另外一个极好的例子便是在世界远征期间，地方巴哈伊基金和地方总部的建立：由于十年计划的目标涉及到了国家哈齐拉图-古兹（Hazíratu’l-Quds）[①] 和国家捐赠的获得，圣护曾指示各灵理会，不能由于地方开支而进一步耗费信仰十分有限的资源，因为信仰已经担起了这样一个沉重的项目。如果他没有明确这一点，主要的目标绝不会实现；但是，到1957年夏天，圣护的秘书在代表他致信非洲各地区灵理会时又说道：“既然整个巴哈伊世界的工作都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哈齐拉图-古兹和国家捐赠实际上也已建立，圣护认为，朋友们应该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自由地增加额外的哈齐拉图-古兹和捐赠。”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针，圣护在他去世前很久就着手在全世界建立起了信仰的管理体制，并使之成为一个运行平稳的国际组织。如果没有拿捏好分寸，他绝不能在有生之年实现这一壮举。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让步于事件的压力而无损于信仰，而什么时候又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将某些原则一丝不苟地贯彻下去，如若不然便会危及根本的问题。让我们以圣护在不同情况下给出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命令为例，它们都关乎同一个主题，即国家代表大会。1932年，美国灵理会向圣护建议，由于迫切需要节约开支，这一年的代

① 哈齐拉图-古兹（Hazíratu’l-Quds）：地方或国家级的巴哈伊教务活动总部，是“一切巴哈伊教务活动的中枢”。——编者注

表大会应被取消，而选举可通过信件进行。对此圣护复电道：“代表们在召集起来的大会上进行商讨将产生灵性的进步，这一点比财务上的考虑更重要。敦促取消不必要的开支。”还有一个类似的事件。1937年，圣护给当时正在召开的代表大会发去电报，启动了北美信徒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当时，他号召代表们延长大会，从而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这一即将形成和启动的计划的细节。但是，当圣护在1934年指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立联合的总灵理会时，他肯定已经完全意识到了灵理会在召开会议时将遇到困难，因为两个国家相隔遥远，旅行的开支会十分高昂。但他明显认为利大于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巴哈伊在1934年、1937年和1944年召开了代表大会，十年间只举行了三次；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通过通信完成的，同时，要有一半以上的成员在澳大利亚，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这个例子与圣护给美国信徒的建议完全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守基·阿芬第能够迅速地推进信仰的发展，从不让琐细的考虑阻碍自己，挫败他的意图。一旦为选举打下了合理的基础，那么新灵理会的成立便成了重中之重。理想中的情况是代表大会每年都要召开，参加的代表越多越好，灵理会要尽可能多地集会、协商，不过这些并非核心要素，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达到目的。

守基·阿芬第在表达每一个观点时都能体现出这种恰到好处的平衡。他对信仰资金的态度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对圣道的支持，巴哈欧拉本人曾有详细的规定，阿博都-巴哈也曾在许多场合提及；但直到1923年，对工作的系统性财务支持才由守基·阿芬第奠定了基础。这一年的3月12日，圣护写了一封公开信，信头的称谓是“在美国、大不列颠、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和澳大拉西亚，主所挚爱的人们以及仁慈者的女仆”。他在信中说道：“灵性活动的进步与拓展要依靠物质的途径，并受其制约，因此，一旦地方和总灵理会建立起来，我们须立刻设立一项巴哈伊基金……巴哈欧拉勤恳、忠实的仆人渴望看到圣道的进步，为这一基金的增加做出慷慨大方的贡献是每一位仆人的神圣义务。”5月6日，圣护致信美国灵理会，详述了这一主题，并说，该灵理会正在开展传导

活动，这样的活动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为了巩固它们，更好、更快地推进该灵理会分内的多重事务，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这一中央基金，如果这项基金得到了每一位朋友以及地方灵理会的慷慨支持，那么你们便可以迅速、高效地执行你们的计划。”教长去世之后，信徒们需要立刻承担起相应的工作。在同年10月份的一封信中，圣护流露出了他对此的关切：“今天的圣道迫切需要物质的帮助和支持。”

一方面，如果没有财力上的巨大支持，那么巴哈欧拉救赎世界的秩序绝不会得以建立；而另一方面，在守基·阿芬第看来，有两个原则是巴哈伊们务必注意的，如果这两个原则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阐明，那么信仰的各项基金在接受我们迫切需要的捐赠时就会受到阻碍。第一个原则是，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巴哈伊们获得了了解巴哈欧拉、接受巴哈欧拉的惠赐，并因此而成为了祂的臣民，有幸建立起了祂在尘世的神圣王国，这令他们受益良多，所以，他们应慷慨地回馈给自己的同胞；我们不能首先让人为某物（在这里的情况下，它指的便是巴哈伊信仰的诸多机构）付款，然后又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守基·阿芬第在1929年便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每一项具体的巴哈伊活动的组织安排中，我们都应该将其看作教务管理的公理和指导原则……有的信徒已经认同信仰，并被视为信仰公开的、绝对的支持者，只有他们应该受邀加入与合作。因为，当纯巴哈伊性质的机构接受非信徒的资助时，一些令人尴尬的复杂情况便可能出现。除了这一考虑之外……我们还应记住，这些具体的巴哈伊机构应该被看作巴哈欧拉赐予世界的礼物。有的信徒完全意识到了并毫无保留地服从于巴哈欧拉天启之固有要求，只有在他们的培养和维护之下，机构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最有力地对世界加以影响。”这便是其中所涉及的伟大的灵性原则。实际的、物质的原则可能会带来“令人尴尬的复杂情况”，这便是，如果你接受了非巴哈伊的钱财，并将其用于巴哈伊的学校、灵曦堂和其他巴哈伊机构（还包括许多许多由灵理会承担的活动），那么由此带来的风险是，这些好心人（不管是政府、个人、社会还是慈善家）便会觉得，他们有权追踪自己钱财的去向，并且在纯粹

是巴哈伊的事务管理中拥有发言权。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圣护说，巴哈伊们只能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目的来接受非巴哈伊的钱财，例如那些囊括所有民族、所有种族、所有宗教背景而不仅限于巴哈伊的慈善活动。

第二条原则是圣护所称的“基本原则”。1926年，圣护在给美国总灵理会的函件中有所阐述，其中写道：“从性质上讲，所有对基金的捐赠都必须是完全自愿的。需要向每个人明确指出的是，任何形式的强制（即使是间接的，即使其程度十分轻微）都会打击到自该基金设立以来，形成该基金的根本原则。”巴哈伊信仰的态度是，显圣者在当今时代的天启是上帝给世界各民族的免费礼物，所有人都应上帝的召唤而进入到神圣同道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们的要求只是信仰，而非钱财。圣护的这一指示便与这种态度相伴而生。与许多教会不同，巴哈伊信仰没有入会费用，无需缴纳义务会费，灵曦堂中的席位不可购买，也没有强制的捐赠。穷人可寻得庇护之所，富人也同样受到欢迎。

在这两个原则之外，巴哈伊们对基金的义务是什么？支持它当然是一项明确无误的义务。1935年，守基·阿芬第在写给美国灵理会的信中明确指出：“你们正在努力建立其各个机构，当前，支持国家财务的资金供给是这些初生机构的生命线。其重要性当然不能被低估。”在这封信中，圣护还说，国家基金正是“所有其他机构所必须依靠并得以建立的根基”。他说，“不管是以个人的能力，还是以集体的力量，不管是作为有组织的团体，还是作为地方灵理会，全体信徒都应越来越多地支持它。”三十多年来，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圣护让信徒们明白了建立、支持一项巴哈伊基金以及从中支出资金的意义。这是一个至为引人入胜的主题。通过人体的动脉和毛细血管，心脏将血液输送到全身，为每一个细胞注入生命，同样，国际、国家和地方的基金将捐赠带来的益处又反馈给了信徒团体。国际机构宣告了一个世界社团的名望，创造了这个社团的心脏；国家机构、巴哈伊灵曦堂、夏令学校、基金、传导机构、文献及通讯也在国家范围内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地方的基金则使得信徒能够拥有集会地点，执行他们的传导活动，并广泛地推进信仰在

城市、乡村和部落的利益。

守基·阿芬第明确指出，作为巴哈欧拉追随者的义务和特有权利之一便是支持祂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他还指出，在给予中，原则要比数额更重要。对于一个穷人和他的家庭来说，一分钱也代表了一种真正的牺牲，因此，与一位更为富裕的巴哈伊捐出的一百乃至一千元钱相比，这一分钱是同样珍贵、同样为我们所需要、同样可敬的。圣护一次次地强调这两点：给予的普遍性，所有人的参加象征了我们对信仰共同的爱和我们在信仰中的团结；以及给予所代表的牺牲精神。当西方伟大的灵曦堂母堂在建设过程中急需捐赠时，圣护写道："不可否认，灵性力量的释放以及这一中心建筑注定带来的启迪，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奉献精神的信徒的数量和类型，以及他们自我克制（这是主动付出所必须的）的性质和程度。"富人很难做出牺牲，因为他拥有太多；但穷人的牺牲却更容易，因为他拥有的很少。作为一种牺牲，任何给予者的钱财都带有一份特定的福佑。

我记起了一个关于穷人在上帝王国中捐赠钱财的故事，对此圣护本人在《神临记》中这样写道："……一位波斯朋友刚刚从阿什哈巴德抵达伦敦。阿博都-巴哈从他的手中接过了一块棉布手帕，里面包着一片又干又黑的面包和一个干瘪的苹果。这是阿什哈巴德一位贫穷的巴哈伊工匠的给予。阿博都-巴哈在满堂宾客面前打开手帕，将自己的午餐放在一边，把那片面包掰成小片吃起来，并与在场的人一同分享。那一幕感人至深。"俄国的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美国的西方之灵曦堂母堂，以及三座其他的灵曦堂（分别在欧洲、非洲和澳大利亚）都是由全世界信徒的捐赠而建立起来的，许多捐赠都代表着巴哈伊男子、妇女乃至儿童的牺牲。

在守基·阿芬第于1923年通过电报首次就设立国家基金和地方基金的必要性给出指示时，他还指出了另外一条关于给予的根本原则："个人可自由地指定其捐赠目的。但是，个人和地方灵理会对中央基金的慷慨、频繁的捐赠，最好由总灵理会酌情分配。这一一般性原则是我们强烈建议的。"圣护一如既往地简短阐明了每一件事情；地方和总灵理会基金需要得到慷慨、频繁的支持，但圣护同

样也指出了个人自由，这一原则是信仰中所固有的。

守基·阿芬第本人曾多次支持不同国家的各项事业。在教长去世后不久，圣护便开始为美国灵曦堂的建造捐赠；他在1957年宣布，他本人将为世界远征期间建立的三座巴哈伊灵曦堂支付三分之一的资金；他为许多巴哈伊书籍的翻译和印刷提供了资助，帮助购置了巴哈伊墓地和各个巴哈伊总部，类似的事情不计其数。通过这些行为，他为所有的信徒及巴哈伊机构树立了榜样，告诉他们要给予，要让上帝圣道中的计划结出硕果，并分享这其中的喜悦。他总是十分坦诚，当他想为圣道做某件事却又没钱时，他总会公开声明。在为美国灵曦堂的建设送去一小笔钱时，他的话语令人动容，他说道："请允许我附上卑微的十九英镑，过去一年间，灵曦堂金库收到了不计其数的捐赠，在此我也贡献一份力量。"对信徒而言，不管是贫是富，圣护的这些言行不仅是一种榜样，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鼓励，让他们追寻他的足迹，并因此而幸福。

在鼓励巴哈伊们挺身而出，为众多缺乏灵性滋养的同胞传播信仰时，圣护常常向他们提起巴哈欧拉本人的训谕："你们须集中精力宣扬上苍的信仰。有能力响应这崇高召唤的人，让他起来促进它吧。没有能力的，有义务委任那些乐意代替他的人，从事宣扬这启示的工作……"他说，那些不能去巴哈伊最为缺少的地方定居下来的人应该牢记这段话，并且应该"下定决心……指定一位代理人，由他代表自己挺身而出，践行如此崇高的一项事业"。圣护本人也曾多次通过总灵理会指定多位巴哈伊代表自己履行特定的目标。

圣护给全世界的巴哈伊带去了指示，在我的心里，我喜欢称之为"思想指南"，其内容涉及了不同领域的不同主题。打一个朴实而贴切的比喻，它们就像列车行使的轨道；由于轨道的存在，列车才得以保持在前进的路径上，并最终到达目的地。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地理解守基·阿芬第毕生的工作，研究他如何成功地为未来社会建立起了这些新生的机构，那么我们必须回顾这其中的一些重要主题。

第十四章　思想指南

要想正确理解圣道的发展，必须先要洞悉蕴藏其中的一些基本真理。阿博都-巴哈就其中一条这样写道：“从太初之时起直到现在，神圣启示之光都是从东方升起，将其光辉照到西方。这样发出的光明已使西方灿烂辉煌。”

这段话道明了世界宗教现象的共同原则，在巴哈伊天启中，这一原则的运行方式一直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五年有余。巴孛在祂的第一本也是最有力的经书《盖尤穆勒-艾斯玛》中号召西方人民前往各地，确保圣道的胜利。巴哈欧拉在祂的至圣经书《亚格达斯经》中号召美国大陆的统治者挺身响应祂的召唤。随后，在上帝双显示者最初的神圣宣言之外，圣约中心又投入了祂的密切关注。巴哈欧拉升天之后，自从阿博都-巴哈的名字第一次在1893年的芝加哥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上响起，北美就一直沐浴在神圣信息的不断迸发中，这其中既有祂笔下的文字，也有祂口中的话语。现在，这里的信徒又有了来自守基·阿芬第孜孜不倦的指导和鼓励。圣护告诉我们，在制定神圣计划时，阿博都-巴哈从巴哈欧拉的《亚格达斯经》中汲取了灵感，同时，教长在北美之旅中与美国加拿大两国信徒的直接交往也对计划的制定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天父对第一个孩子，即第一个响应祂讯息的西方国家表现出了深深的爱，这种爱与新世界自身的活力相结合，以一种看似神秘而美妙的方式，赋予了北美巴哈伊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力量。教长亲自赐予他们“巴哈欧拉使徒”的称号，守基·阿芬第也写道，他们成为了“‘阿博都-巴哈温情关怀’的对象，‘他们寄托着祂的期望，得到祂的承诺，受益于祂的祝福’”。在守基·阿芬第的使命周期

中，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了和教长时期同样多的关爱和鼓励。的确，同样的关爱和原则得到了延续。圣护称他们为“坚定不移、不可阻挡、正展现出威严气势的美国巴哈伊社团”，是教务管理体制的“摇篮和堡垒”，“受到万能者垂青，独享这一巨大恩惠”。在无数的信件中，圣护常常称他们为“最受珍重、最受爱戴的同胞”，他们“深受关爱，富于才干，刚毅坚定”。他说，阿博都-巴哈授予了他们“灵性的至高地位”，在“上天构想并影响世界的”神圣计划中，他们是“指定的主要受托人”。这一神圣的计划赋予了他们一项世界性的使命，而这也是“美国的巴哈欧拉追随者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他们不仅是教长神圣计划之训令的执行人，而且是“阿博都-巴哈遗嘱的执行人”，鉴于此，在“巴哈欧拉萌芽期的教务体制中”，他们是“先锋建设者”，是“世界文明的火炬手”，享有“构建和保卫巴哈欧拉信仰之章程”的权利。在观察教义中蕴藏的真理如何实现时，守基·阿芬第指出，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在其钟摆式的有力摆动下，信仰的教务管理中心已离开了它的摇篮，来到了美洲大陆的岸边。”“他们的波斯同胞在信仰的‘英雄时代’赢得了殉道者的桂冠，现在，作为‘黄金时代’的先驱，美国信徒不负众望地接过了他们的衣钵。”他们已成为了“圣道英雄的灵性后裔”。他们属于一个“沐浴众爱”、“高尚勇敢”、“上帝甄选”的社团，是信仰“无敌之臂膀，伟大之脏器”，在他们继续履行其“独有的使命”之时，他们的命运就是“成为巴哈欧拉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先锋建设者”。

守基·阿芬第认为，在信仰的首个世纪中，美国巴哈伊社团的崛起是最为恢弘的一页；其发展直接受到教长遗嘱的指引。不露锋芒的圣护没有提到的是，正是由于他对遗嘱的执行，对遗嘱的忠诚，以及对其中指示的应用，才有了这个社团的发展。

圣护在其使命周期之初曾于1923年致信纽约灵理会。他在信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对美国的态度，直到他生命结束，这一态度都没有改变：“挚爱的教长曾做出过明确、有力的预言，即西方对巴哈伊信仰取得普遍性的胜利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对此我牢记在心，在祂离世以后，我便将目光投向这片遥远的海岸，心怀希望与

期盼……”同年，他在给美国总灵理会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常常希望并向往更加接近你们的活动领域，从每一个细节上与你们在各方面的重要服务保持一种更为频繁与紧密的联系。”

从守基·阿芬第被指定为教长的继任者开始，青年圣护和“阿博都-巴哈的孩子们”（圣护语）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互相信任、互感亲切的关系。在教长的遗嘱于1922年1月7日被正式宣读之后，其中的内容被传扬天下，当时还被称为“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体”或“执行委员会”的美国总灵理会于1月20日致电圣护，其中说道：“对任命深感欢欣，美国将竭诚服务、通力合作。”圣护和美国社团当时都很年轻，在他的使命周期中，他们的共同成长方式里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东西。1922年，守基·阿芬第结束了那段精神崩溃、隐居深山的日子，并于12月16日返回海法，随后便给美国发去电报，电报中说道：“圣道前进之步伐从未停滞，也永远不会停滞。我向上帝祷告，现在我已重振精神，重拾信心，愿在你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下，带领圣道走向胜利。”总灵理会于19日复电道：“你们的消息振奋人心，激发统一机构重新运作，愿美国持久团结的力量成为您永远的帮助，向您致以爱、忠诚、竭诚的合作及幸福的祝愿。”

在守基·阿芬第最初写给该灵理会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心理状态和双方关系的开端。这封信的信头这样写道：“致总灵理会成员，美洲大陆所有信徒的民选代表”，日期是1922年12月23日，在写下九个名字之后，守基·阿芬第写道：“……诸位迅速地回应了我卑微的请求，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鼓舞，让我得以重振信心。我反复阅读了你们的活动报告，仔细研究了你们为巩固美国的巴哈伊信仰所走过的每一步，并对你们制定的发展与传播圣道的计划感到由衷的满意……”守基·阿芬第请他们相信，他不仅期待着“每一条关于深化和传播圣道——挚爱的教长为之倾尽时间、生命和所有——的喜讯”，还会在“每次叩首于神圣门槛之上时”，念及他们“充满爱和服务的劳作”。署名时他这样写道：“你们在上帝的服务中的兄弟。”

我们必须永远铭记，与美国的早期伙伴关系是信仰宿命中所固有的，它促进了教务管理体制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发展。尽管在阿博

都-巴哈的时代，教务管理体制就已经以一种萌芽期的形式存在，但其模型却是在美国臻于完善的。守基·阿芬第在1923年初写道：“我再次向你们保证，我已准备好，愿为这片土地上巴哈欧拉忠诚坚定的仆人提供帮助与服务。”他的这种态度从未改变。他在1939年写道：“就我自己而言，我已下决心巩固那些驱动力。正是这些力量促使各成员不断向前，迎接使命。”

阿博都-巴哈升天后，北美的巴哈伊陷入了圣约破坏者所带来的危机中。他们由于教长的离世而深受打击，在悲痛和绝望的情绪面前不知所措。当他们将目光投到年轻的圣护身上时，他们又获得了爱和希望，获得了帮助。帮助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有人需要而且愿意接受帮助，二是有人希望提供帮助而且有这样做的能力。使命周期一开始，守基·阿芬第就积极地指引着美国，认为她既有热情又很活跃。圣护曾致电1923年的代表大会，他在电文中说道：“我诚挚地祈祷今年的大会将……开启一场举世无双的传导运动。以此作为里兹万文告主题，即：团结、深入、崛起。”这位船长掌起了船舵。不论穿越风暴，还是行于止水，不论面临考验变故，还是经历战火洗礼，从青春，到中年，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守基·阿芬第都从没有放弃指引，没有停止关注、爱护、训诫和鼓励这个“巴哈伊世界的杰出社团”。他曾写道，这个社团“受到万能者垂青，独享这一巨大恩惠……信仰缔造者殚精竭虑地构想并书写了神圣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启示使其从姐妹社团中脱颖而出”，它“被视为上帝信仰中坚不可摧的堡垒，是冉冉升起的世界秩序之机构的摇篮”，“圣约中心满怀信心地预言，它将登上永恒王国的宝座”。

1923年1月6日，也就是阿博都-巴哈的遗嘱被宣读一年之后，守基·阿芬第在写信给美国的一个地方灵理会时这样说道：“在无数写给美国蒙爱之人的书简中，我们的挚爱者用热情的口吻，传达着充满爱、信心和希望的信息，每当我想起这些，我就觉得这无尽之爱中的秘密迟早定会浮现，这片在祂心中如此亲近和珍爱的大陆，会很快在祂天启的荣光中完全展现自己。”

教务管理体制的崛起与北美巴哈伊社团，尤其是美国信徒的发展密不可分，二者一体相连。三十六年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

圣护大部分的公开信都是写给这个社团的，而且书信内容也是由他们来进行出版和传播。许多教务事务的模式、关于传导活动的重要指示以及影响世界的概念与计划都是通过这些信件传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圣护忽视了波斯和其他社团，事实远非如此。他与每一个社团都有一种独立的、非常个人的、充满爱的关系，对老的社团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没有谁在这些年里被冷落一旁，它们都在随时间慢慢变大变强。守基·阿芬第永远是每个人的圣护。只是上天神秘的行事方式让北美的信徒承担起了独特的使命，接受了特殊的荣誉。在写于1933年的《美洲与至大和平》一书中，守基·阿芬第明确阐明了美洲的地位。他写道，在经历了教长去世的悲痛后，“巴哈欧拉不可战胜的信仰教务体制诞生了”。阿博都-巴哈的升天释放了“强大的能量”，这些能量“结晶为这一至高无上、绝对正确的体制，为的是完成一个神圣的目标”。《阿博都-巴哈遗嘱》阐明了它的性质和条件，美国支持了教务管理的事业：“这项任务赋予她，只赋予她……成为这一教务体制的无畏斗士，成为新生机构的枢轴及其影响力的主要推动者。”

作为一个天生的管理者，守基·阿芬第的思维和性情总是整齐有序的。他以一种高度系统的方式管理着信仰的事务。在前两三年间，他用一个单子记录着收发的信件。此后由于通讯数量增加，事务日渐繁杂，加之他又过于劳累且缺乏有效的帮助，所以再也不能这样处理信件。从这些单子中，我们收集出了他的通讯对象，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波斯、突厥斯坦、土耳其、澳大利亚、瑞士、印度、叙利亚、意大利、缅甸、加拿大、太平洋岛屿、埃及、巴勒斯坦、瑞典及欧洲。他还给许多位于美洲、欧洲、北非、中东和远东的独立中心写过信。在1922年到1923年，我们发现他的名单上有六十七个这样的地方。1923年到1924年有八十八个，1924年到1925年有九十六个。我们仿佛看见他伸开激动的双手（实际上，他的双手也许正因为病痛而颤抖），驾驭着他在1921年接手的巴哈欧拉广袤国度中的繁杂事宜。

大多数巴哈伊仍然居住在波斯及周边地区，北美有一个规模较

小但是赤胆忠心的社团，欧洲、非洲、印度次大陆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社团规模更小。大多数信徒（包括阿博都-巴哈的家族成员）根本不知道巴哈伊信仰代表着什么，不知道根据教长的遗嘱，信仰的未来发展形式会是怎样的，更没有真正了解教务管理体制的含义。尽管有些机构被称为灵理会，但它们常常还有一些别的称呼，而其功能和成员构成也总是十分混乱，和我们现在理解的灵理会相去甚远。美国总灵理会自1908年以来就已存在，当时被称为“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体”，1909年，人们经过整合，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除了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外还有“候补代表”；芝加哥灵理会被称为“巴哈伊芝加哥灵体堂”，在一段时间里，它拥有九位成员和两位“咨询成员”；在纽约，有一个由九人组成的“纽约大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加利福尼亚某城市的巴哈伊写信给守基·阿芬第，说他们已经选举了十二人作为他们的地方灵理会；尽管早在阿博都-巴哈去世的十年前，选举程序就已经出现，但是，所谓的教务管理机构在形式和功能上尚不成熟，依然处于不折不扣的萌芽阶段；波斯的情况不仅同样混乱，而且，大批无组织的信徒还在承受严酷的迫害，圣护花了多年时间才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了稳定的秩序；其他国家同样对圣道教务管理机构的原则感到陌生。1922年，英国巴哈伊自发成立了“巴哈伊委员会”，管理全国的事务；印度有一个准灵理会，因为守基·阿芬第在1923年声明，尽管缅甸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但它必须受“全印度总灵理会”的监管；1921年，德国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但直到1922年，才选举产生了总灵理会。在教务管理体制的发展初期，波斯、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的巴哈伊事务都由本地区最为突出的地方灵理会来管理，由它们履行总灵理会或国家委员会职责，因此各地都盼望着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自由选举产生的国家总会。至此，由于阿博都-巴哈在生前不遗余力的努力，以及在祂去世之后守基·阿芬第与众巴哈伊们的辛勤付出，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的雏形得以形成。在1922年时，整个巴哈伊世界，只有美国灵理会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全国选举产生的总灵理会有些许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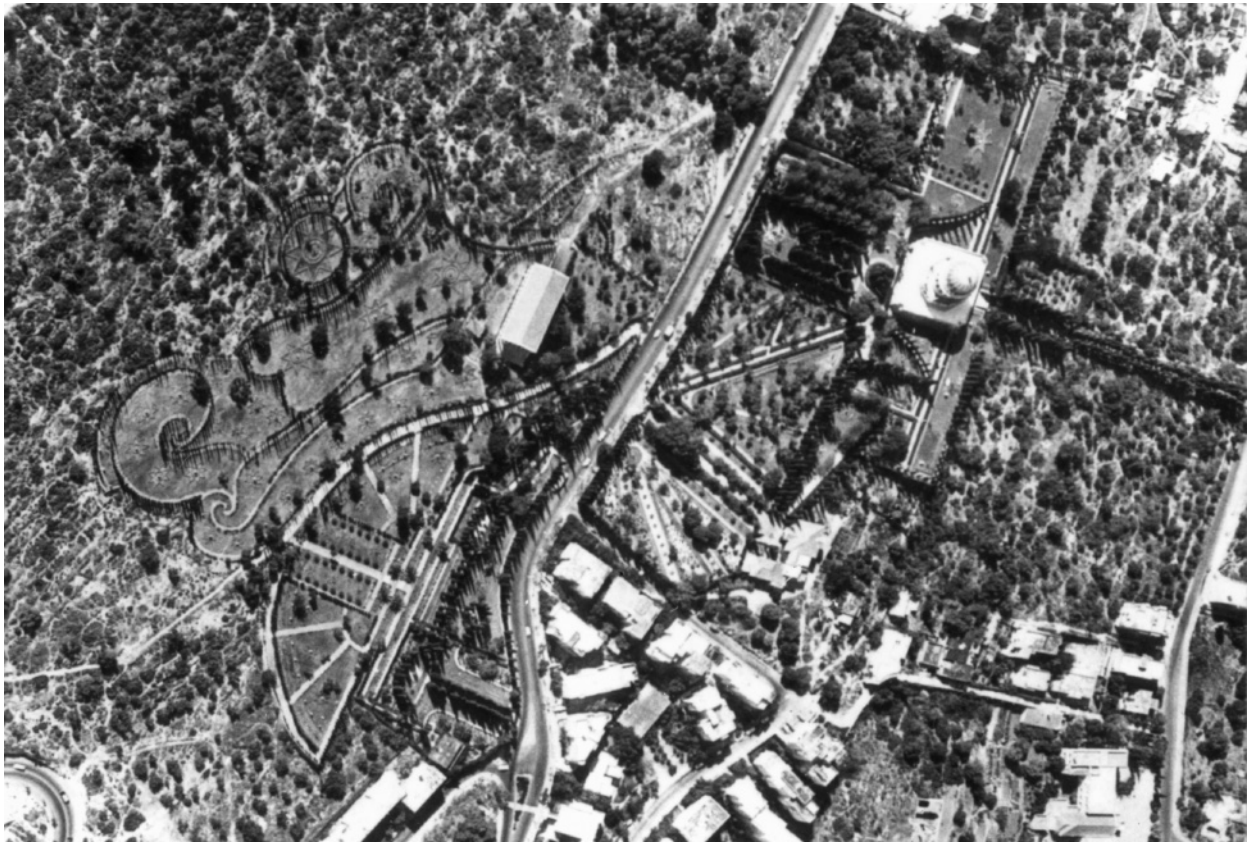
这些分散、构成各异、没有统一组织却忠诚无比的信徒还有

其他困难要克服。波斯的朋友们完全认识到了信仰的独立性，而且为了坚持这种独立，他们毫不吝啬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与一些和信仰缔造者的教义相悖的国家习俗和罪恶一刀两断，仍然存有一个交织着伊斯兰习俗和诸多弊端的灰暗地带，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的衰落，这些弊端也日渐泛滥。一夫一妻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和正确理解；饮酒之风仍四处可见，在这片深受鸦片等和其他毒品戕害的地区，巴哈欧拉对毒品的严厉禁止仍然没有得到彻底地的领会。在西方，特别是在有着西方最大社团的美国，不论巴哈伊对信仰多么依恋，他们还是与教会以及各种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样只会分散他们极其有限的资源，浪费他们的精力，让他们不能在上帝的圣道中采取一致、专注的行动，并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本质。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巴哈伊们对远离政治联系和政治活动的教诲都没有清晰的认识。针对巴哈伊世界中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守基·阿芬第采取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以教义和教长对教义的阐释为基础，制定一个统一持久、条理清楚的路线，来规范巴哈伊的社团生活，组织日常事务；第二种是教育信徒，让他们理解巴哈伊信仰的目标和意义，以及蕴含在其中的真理。

守基·阿芬第有着天才的组织能力，这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而这无疑是由上天所塑造的，好使他完成自己在信仰形成时代的使命。这一能力日益彰显，在世界范围内，他迅速而又周密地建起了地方和总灵理会的统一体系。第一步是给美国的总灵理会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并进行有效的选举。在阿博都-巴哈遗嘱中的内容被宣告后不久，一些重要的美国巴哈伊来到海法，拜谒了这里的陵殿和圣护本人。科琳娜·特鲁便是其中之一，她曾在一封写于1922年5月4日的信中向守基·阿芬第报告道："代表大会的精神无与伦比，通过您的信件，巴哈伊圣道的一个新时代得以开启。加拿大和美国的六十五个中心都派了代表……我努力把您在海法传达给我的计划告知了这些教友……这次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总灵理会'，或者叫执行委员会……这九位男士和女士是您永远的仆人，请求圣约中心的确认，以使他们在各方面忠诚奉献，弘扬圣道……"在圣护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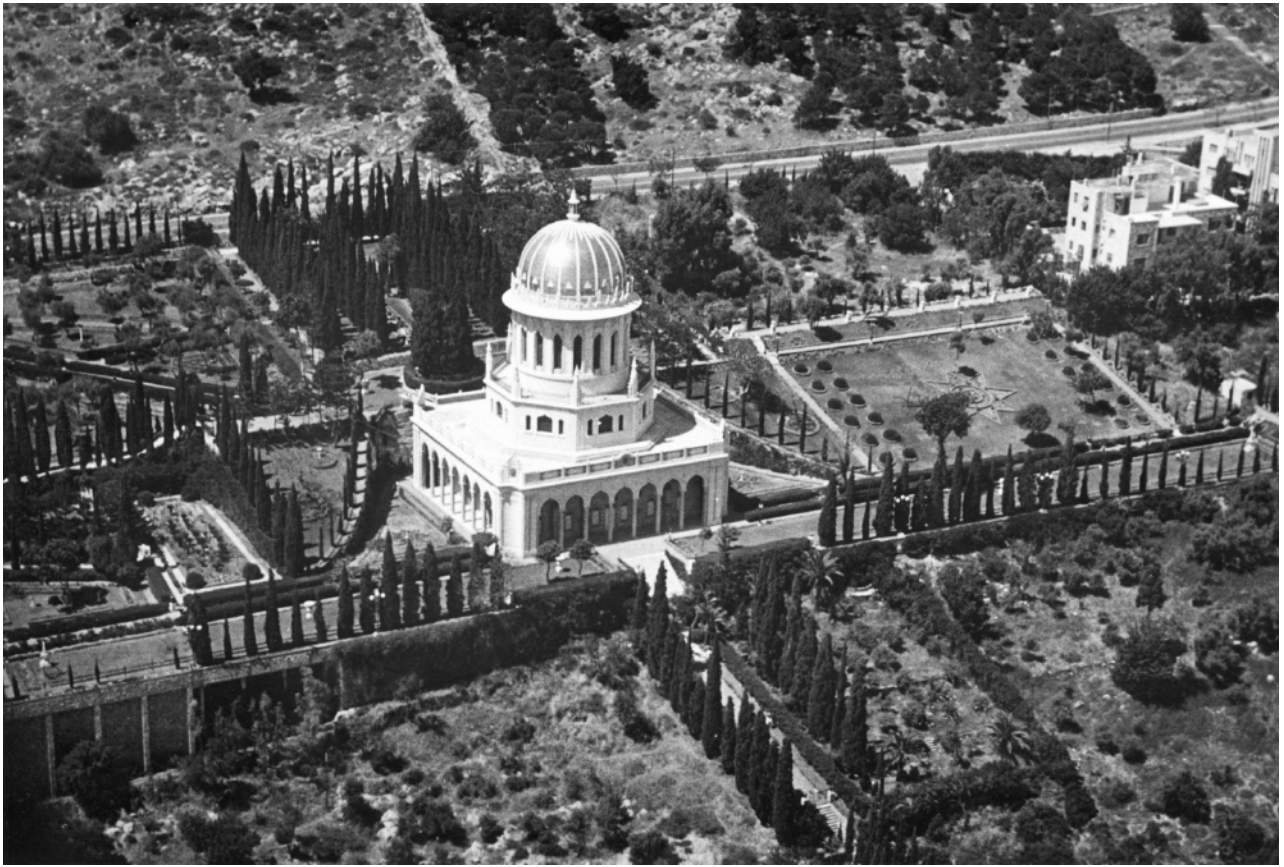
图五十三　卡尔迈勒山的两幅图景

上图：教长去世时巴孛陵殿的样子。下图：陵殿的上层结构，由圣护根据教长本人的总体指示于1953年完成。



图五十四　圣护对卡尔迈勒山的开发

左上角的巴孛陵殿坐落在台阶和花园之中；狭长的文物馆大楼前面便是那道弧线，其上方是阿拉伯风格的花园。



图五十五　卡尔迈勒山上的巴孛陵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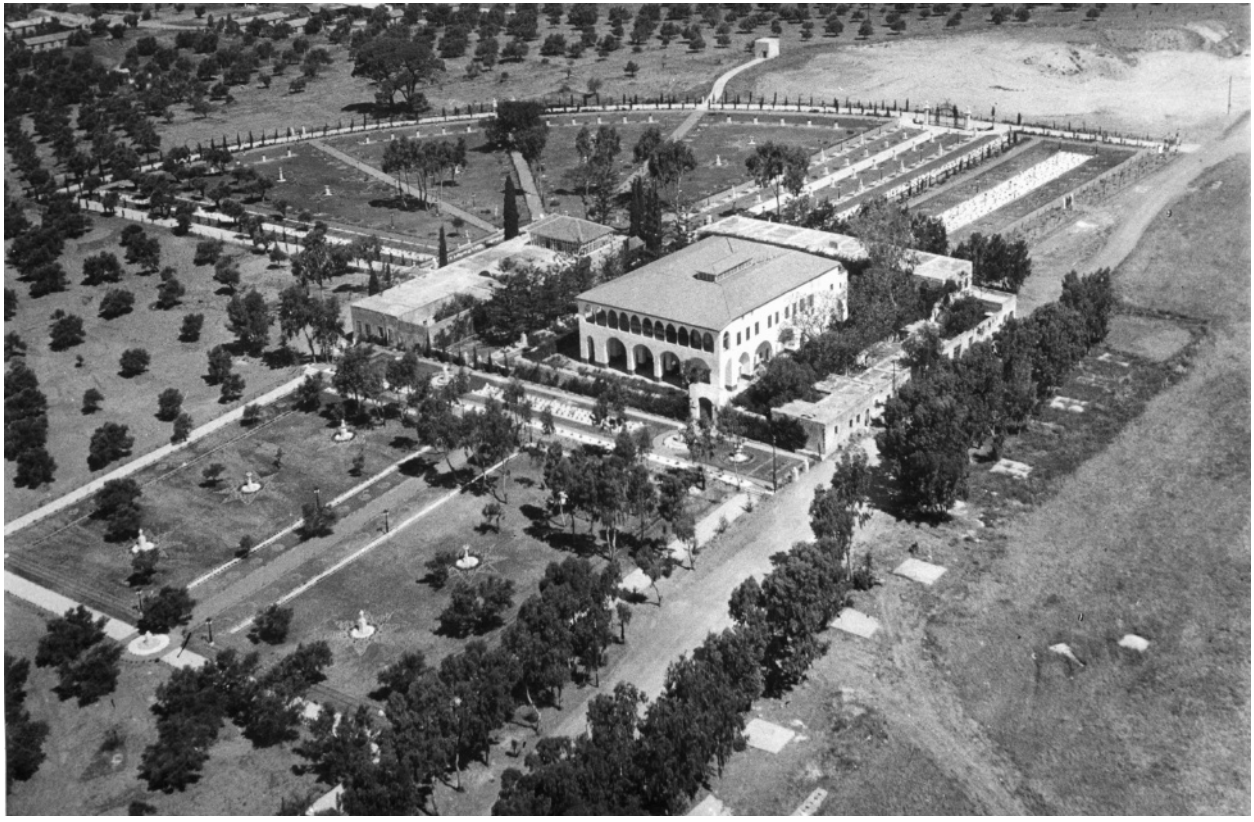
围绕在巴孛墓地周围的部分花园和台阶，由守基·阿芬第主持修建。

图五十六　守基·阿芬第建起的建筑

左边：国际文物馆。右边：巴孛陵殿。这条弧形道路是弧线的一部分，其他国际建筑均建在道路两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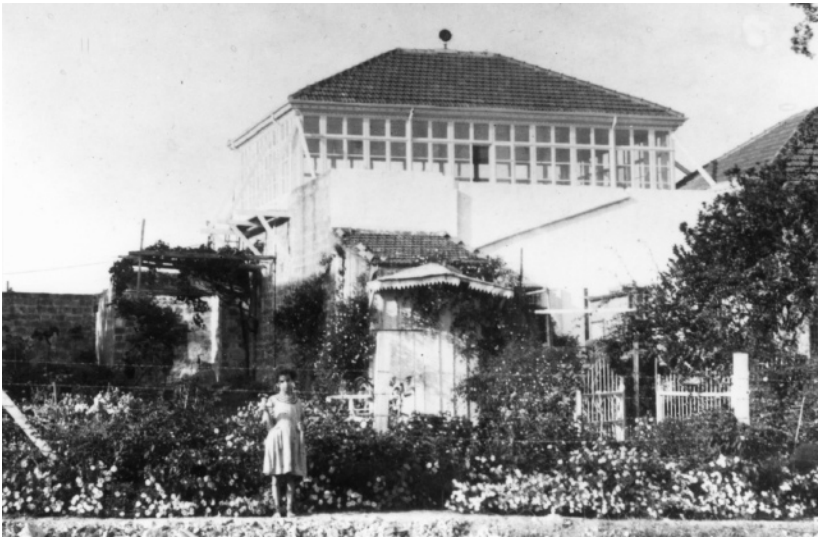
图五十七　圣护仔细察看他的花园

上图：圣护从卡尔迈勒山山顶观察巴孛陵殿。下图：圣护视察巴吉新开发的区域。



图五十八　巴吉宅邸航拍图

向北看去，那个大型建筑就是巴哈欧拉宅邸，左侧有尖顶的建筑是祂的陵殿。圣护修建的广阔的花园位于西南部和北部。注意在这幅图最上方的中间位置，有一栋白色小屋位于蜿蜒道路的尽头，圣护曾站在屋顶上监督工作。



图五十九　巴吉的巴哈欧拉陵殿

上图：1921年左右陵殿入口的样子。

下图：美观大气的陵殿入口，拍摄于1957年。

图六十　至圣陵殿

上图：巴吉的巴哈欧拉陵殿。下图：在九十六盏灯（这幅图只显示出一部分）的照耀下，夜幕下的陵殿花园灯火通明。

刚上任一个月时，楚女士和其他几位年长的巴哈伊曾在海法得到他的指导，他们都被选进了这届灵理会。

1923年4月4日，守基·阿芬第致电新成立的总灵理会道："强烈敦促在里兹万节的第一天，即4月21日，重新选举所有地方灵理会。"守基·阿芬第强调了巴哈伊选举的系统性和统一性，以及这些巴哈伊机构的合适名称应该是什么，这种强调似乎影响到了整个巴哈伊世界。各地掀起了一场运动，人们遵照阿博都-巴哈早已立下但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原则，并在圣护的不断鼓励和推动下，选举出了他们的地方灵理会。尽管有了这些早期努力，能够保证灵理会的成立，但守基·阿芬第还是要为此投入多年精力，因为朋友们常常会完全忽视选举或重新选举地方机构的事宜。巴哈伊满怀渴求，却又颇为迷茫，因此，他们欢迎来自圣护的指导。当守基·阿芬第给他们答疑解惑之后，事情会明显变得清晰，对他自己而言也是如此。1922年12月，圣护曾写信给国家代表，我们可以从复印件中找到"灵理总会（the Spiritual National Assembly）"和"灵理地方会（Spiritual Local Assemblies）"这两个名称。后来，他最终敲定了"总灵理会"和"地方灵理会"的说法。同月，他给法国巴黎的信徒写了封信，他写道："每当我获悉一个地方灵理会已经正确地组织起来，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并且正式得到伟大的巴哈伊家庭承认时，我的内心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悦。我强烈要求诸位，如果这样的灵理会还没有成立，就要为圣道建立这样一个明确、固定的中心，尽管一开始它只是一种形式，但它不仅能填补全世界的统一教务管理体制的空白，而且，我坚信，它还能成为一个核心，在未来吸引众多生灵……"类似的信件肯定还有很多。就像这段节选出的文字一样，守基·阿芬第总是用这样一种充满爱的方式，巧妙而直率地与巴哈伊们沟通。每当此时，他总是会得到广泛的配合，有了回应后，他会迅速地给与褒奖。这一次，在等待了一年多之后，他给巴黎发去了电报，他在电报中说道："诚挚祝贺灵理会建立。"

有些社团此前就响应阿博都-巴哈的鼓励，成立了委员会。我们从阿博都-巴哈与美国总灵理会在1922年和1923年的通讯中可以看

出，当时存在着这样一些全国性的委员会，在传导、出版和评论、儿童教育、图书馆、《西方之星》、种族亲善以及国家文物馆等方面都有各自的委员会。令人吃惊而又引人入胜的是，在回顾圣护早期的活动和通讯时，我们会发现，所有在他使命周期结束时存在的事物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守基·阿芬第阐释了自己的思想，详述了他的主题，他本人在逐渐成熟，而圣道也在逐渐成熟。当他第一次接触信仰事务时，一切都完全处于萌芽阶段。与后期相比，他最早传达给总灵理会和社团的指示仅仅在质量上有所不同，在性质上却一脉相承。举例来说，1923年，他曾致电美国全国代表大会道：“……在圣道的历史上，在新的纪元到来之际，你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你们需要行使的职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你们承担的责任伟大而又重要；各民族的人们……正注视着你们，期待着亲眼看见那一天的黎明之光，见证祂的神圣允诺成为现实。”未来将近三十五年的历史事件都浓缩在了这几句简短的话语中。

许多年来，向巴哈伊传授巴哈欧拉社会系统内部的原则一直是圣护的心头大事。人们习惯于信任教义，习惯于在同胞中间传播教义，习惯宴会、聚会和圣日庆典这类社团生活方式。他们还不适应有组织的工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成员。他们也不习惯保持信仰内部的通讯系统畅通。守基·阿芬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眼前的工作特别需要他对全世界巴哈伊社团的发展情况有全面的认识，对他们活动的状态以及他们对建立教务管理体系的反馈有彻底的了解。要做到这些，圣护不仅需要与所有总灵理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也要与所有的地方灵理会保持密切的通讯；总灵理会还很弱小，有的甚至基本不存在，地方灵理会常常更加弱小。守基·阿芬第认为这种与东西方的全面联系十分重要。1922年12月，他告知美国总灵理会道：“我希望并期盼尽快收到各地方灵理会的正式材料，详细地报告其灵性活动、灵理会的性质和组织、公开和非公开集会的描述、圣道在各辖区的真实地位以及未来的计划和安排。请把我的想法告知地方灵理会，我将不胜感激。请将我最诚挚的感谢和对他们服务人类伟大事业的全力支持传递给所有人。”一年后，圣护用同

样的口吻写信给德国总灵理会：“我非常希望从总灵理会那里得到频繁、全面、即时的报告。报告要阐明圣道在德国全境的状况，并介绍全国各巴哈伊中心的活动情况。”

守基·阿芬第不仅计划在世界中心搜集这些信息，还要传播西方姐妹社团的胜利消息，以此激励那些受到迫害的东方社团。在1924年2月写给纽约地方灵理会的信中，他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我在写给总灵理会的第一封信中就已表明，美国各巴哈伊中心不断传来有关圣道地位和教友活动的详尽报告，这让我十分喜悦。我非常乐于将这些消息传到东方教友那里，我相信，他们虽然现在身处不安和混乱，但定会因信仰在你们土地上和平稳定的成长而欣喜……等待你们的喜讯……”

这个体系要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正如圣护于1922年写给英国巴哈伊“全国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的一样：“我现在正在和东西方的每个巴哈伊地方中心建立联系，我永远不会忘记引导和督促每一处的巴哈伊，让他们通过地方灵理会，以定期详细报告的形式，直接把圣道进步的喜讯传达给他们在西方各灵理会的灵性兄弟姐妹。”在给莱比锡巴哈伊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深情地企盼你们的来信。”在致信日本信徒时，他说：“我希望日本的朋友们从现在起能经常与我通信，详细地把他们对巴哈欧拉圣道的未来计划告诉我。”他给太平洋岛屿的巴哈伊也写了同样的话。在早期写给各国地方中心的信件里，守基·阿芬第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了这种情感。但是，要想得到他寻求的实质响应并非易事。在使命周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提醒巴哈伊们勿忘自己的使命和任务。1923年，圣护致电美国道：“期待总灵理会经常发来内容全面的报告。”1924年他又给他们发去电报，他在电报中说道：“前两个月没有收到总灵理会的信件。”1925年，他致电印度道：“急切盼望总灵理会频繁详细的报告。”这种提醒屡见不鲜，而且对象不止一个国家。

巴哈伊是一群真诚友善的人民，他们聚集在巴哈欧拉周围，满怀信仰和自信，深知他们在信仰中的团结是一种国际性的纽带。但这还远远不够。现在需要一种充满活力、积极进取、日常性的意

识。守基·阿芬第要创造一种统一的巴哈伊选举体系，要通过报告和通信与信徒保持紧密的联系，除此之外，他还采取行动，巩固、发展了一些巴哈伊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是在阿博都-巴哈本人的鼓励与支持下创办的，在守基·阿芬第初任圣护时就已存在。其中，在美国发行的《西方之星》资格最老，名气也最大。除此之外还有德国的《真理之阳》（*Sun of Truth*），缅甸的《曙光》（*The Dawn*），印度的《印度巴哈伊新闻》，还有阿什哈巴德的《胡尔希德-哈瓦尔》（Khorshid-i-Khavar）。守基·阿芬第全力支持它们的发展。1923年2月，圣护在写给叙利亚巴哈伊的信中表示，他们应该订阅《西方之星》、《印度巴哈伊新闻》以及俄国信徒的《胡尔希德-哈瓦尔》（Khorshid-i-Khavar）等巴哈伊杂志，并向它们投稿。两个月后，圣护写信给缅甸《黎明》的编辑，清晰地表达了他为这些出版物所定的标准："态度普世，所倡导的措施既进步又实际，忠于圣道的神圣传统和原则，方法全面，观点客观，风格高雅动人，愿这本杂志永不迟疑、一往无前，完成它的使命。"1923年初，圣护在写给《印度巴哈伊新闻》总编的信中这样说道："我最近邀请了波斯、突厥斯坦、高加索、伊拉克、埃及、土耳其、美国、大不列颠、德国、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朋友们定期向贵杂志投递关于灵性话题的文章，希望借此扩大杂志的影响力，提升其价值，并使之成为巴哈伊社团在世界上的主要宣传工具之一……我将满怀希望和关切地跟随你们的每一步发展，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它完成自己的伟大使命。"德国和美国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圣护在信中督促巴哈伊杂志采取同样的措施。他不断敦促各国的巴哈伊社团向这些出版刊物发去新闻和合适的文章，以支持它们的工作，传播信仰，激励信徒。

此外，守基·阿芬第还启用了"通函，每隔十九天就从海法巴哈伊灵理会发往东方所有巴哈伊中心"。信由波斯文写成，并有英文对照。1923年2月，圣护致信瑞士的巴哈伊道："从现在开始，在海法成立的灵理会将定期向你们传递圣地的消息……"这里说到的海法通讯得到了圣护本人的细致督导，材料也由他提供。从1938年到1939年，守基·阿芬第遣走了本地社团，海法灵理会也被他解

散了，在此之前，海法通讯一直在不间断地向外派发。这些举措就像一个巨大的汤勺，搅起了全世界所有忠诚社团的热情，不断地整合、鼓舞、挑战，让社团的各组成部分加强活动、合作和理解。

但是，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守基·阿芬第如此不分昼夜地工作，他要建立的教务管理体制究竟是什么？圣护说，随着这一体制的发展，它会“立刻体现、保护和促进”无往不胜的信仰精神。它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是上帝的神圣构想，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宗教体系。从根本上讲，它是未来世界秩序和世界文明（一个几乎可以涵盖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世界联邦）的载体。虽然它的整个选举结构是以普遍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原则为基础，但其终极的运行方式却有着不同的目的，因为在民主政体中，被选举人要永远对选民负责，不同的是，巴哈伊机构则要永远对信仰的缔造者和祂的教义负责。在民主政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是他们自己的委员会，任何决策都要经过民选代表的仔细审查和同意。在上帝的圣道中，这一支配因素便成了上帝所有仆人（换言之，也就是信徒的主体）的仆人，不过，他们要对一个更高的因素负责，即受到神指引和启迪的圣护，或称唯一阐释者，以及被选举出的最高机构，即世界正义院，或称唯一立法者。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体系中，民众远离了提名、政治游说的腐化，摆脱了人们很容易因为奇想和不满而产生的暴力（如果仅凭民主原则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人来指导他们的事务，护卫他们的权利，同时保护并服务于上帝圣道的利益。

选举出的巴哈伊机构很像一个巨大的灌溉系统，它们由民众根据自己的利益选举出来并组织在一起。但是这个系统里流淌的生命之水来自于高处，独立于民众，也独立于这个体系的意志，这水便是圣护和圣道最高机构在神圣指引和启迪下的忠告，在巴哈伊天启中，忠告的来源正是上帝的双显示者。守基·阿芬第写道，巴哈欧拉的体系“永远不会堕落为任何形式的暴政、寡头统治或是煽动主义——这些迟早会腐蚀掉所有人造的、有着严重缺陷的政治组织体系”。早在1934年，守基·阿芬第就写到了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它正在迅速发展，在整个巴哈伊世界深深扎下了根，展现出“一个

幻灭、动摇的社会”不能忽视的力量。它的机构充满活力，它的管理者克服重重苦难，它的传导者不断奔走，充满激情，它的先锋建设者奋勇牺牲，它的坚定卫士表现出了远见、希望、快乐、内在的平和、正直、克己和团结，它将各民族的种种偏见扫除干净，并使他们融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守基·阿芬第写道，这一切都证实了巴哈欧拉不断发展的秩序的力量。

守基·阿芬第有着真正的政治家品质。许多巴哈伊像伊卡洛斯（Icarus）一样，用蜡做的翅膀飞行，空有希望和信仰。守基·阿芬第则用适合的材料来打造飞行器械，精工细作，按部就班。在使命周期的前几年，他为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中的核心事务创造了一种定式。他为地方灵理会和一个总灵理会（当地的国家团体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支持这样一个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到1930年，圣护已经建立了九个这样的机构，它们都被列入了美国总灵理会的“巴哈伊目录”中，分别是：高加索、埃及、大不列颠、德国、印度和缅甸、伊拉克、波斯、突厥斯坦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高加索、突厥斯坦和波斯的机构性质多年来一直较为特殊，因为代表们不能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自由会见，选举他们的国家组织。不过，管理机构（圣护在英语里称其为“总灵理会”，但是在波斯语里他用了另外一个称谓，后来，该名称在波斯全国选举时被采用）还是存在的，由这一机构来开展社团在国家层面的事务；俄国的形势导致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的总灵理会被解散，后来，所有的巴哈伊活动都完全中止。

在建立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的努力中，守基·阿芬第得到了东西方同事的有力支持。他们才干卓著，坚定虔诚，并似乎得到了上帝的擢升，以领会圣护的远见，回应他的指示和要求，用建设性的建议与他的思维相互作用，迅速地实施他的愿望，并使之符合当地的需要。

教务管理体制迅猛地展现开来，与此同时，关于信仰的真正意义和内涵的教育也同时得到了发展。只有圣护能够推进这项教育事业，因为他是唯一有权阐释信仰教义的人。工具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因此，让我们试着粗浅地了解那些显著的真理，多年来，

守基·阿芬第一直提醒我们去注意它们。

守基·阿芬第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心智，这是他身上最为奇妙的地方之一。他对圣道的远见源自他对其内涵的全面理解。在三十六年间，任何方面都没有出现退步，一切都在日益壮大。在这无尽的空间里，我们不仅能够呼吸，还能够梦想。巴哈欧拉是一个五十万年周期的开启者。祂是以亚当为起点的六千年周期预言的顶点。当然，在神圣指引的无穷链条中，祂的天启只是一个部分。圣护用巧妙的语言总结了这个概念，并将其提交给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他写道："巴哈欧拉阐明的基本原则……指的是宗教真理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本神圣天启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从起源上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神圣的，它们的基本原则是完全和谐的，它们有着同样的目标和使命。它们的教义都是同一真理的一部分，其作用相互补充，只有在一些非核心教义方面有所不同；它们的使命代表了人类社会灵性演化的不同阶段。巴哈欧拉的目标……并非毁灭过去的天启，而是要实现它们……祂的目的……是为了重申基本的真理，它们在这些教义中被传承，其传承方式顺应了……我们所处年代的需求……巴哈欧拉也没有宣称祂的天启便是终结，而是规定了一个更加圆满的真理……要在人类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未来演化阶段中逐渐展现。"

在这份声明中，圣护清晰地阐明了教务管理体制和本天启的正确关系，即"巴哈欧拉信仰的教务管理体制将注定演化为巴哈伊世界联邦……和各宗教在创始者去世后所形成的体系不同，本体制从起源上是神圣的……需要注意的是，本体制所服务、保卫和弘扬的信仰完全超越自然和国家，是完全非政治、非党派的，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尊崇某一种族、阶级或国家的政治方针和思想派系。它摆脱了任何形式的教会主义，不需要牧师，也不需要仪式，它完全是由忠诚的追随者自愿支持的。"

在一封写给西方巴哈伊的信中，圣护也表述了这个概念的未来，即"一个世界联邦体系，治理着整个地球……融合了代表东西方的思想，从战争的诅咒中解放了出来……在这个体系中，力量成为正义的仆人，正义的生命源泉来自对一个上帝的普遍承认，以及

对一个共同天启的忠诚。在走向统一的生命之力量的推动下，人类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尽管如此，这个世界仍然问题重重。对此，守基·阿芬第在《应许之日来临》一书中指出：“整整一个世纪以来，上帝免除了对人类的惩罚，好让他们承认这样一个天启的缔造者，支持祂的圣道，宣扬祂的伟大，建立祂的秩序。在一百卷书中……这一讯息的信使宣告了（之前的先知都没有这样做）上帝赋予祂的神圣使命……我们自问，作为神圣关怀的对象，这个世界要如何报答这位为之牺牲所有的人呢？”守基·阿芬第写道，精英阶层毫不掩饰他们对巴哈欧拉讯息的漠视，神职人员对其表现出了无情的憎恨，波斯人民冷眼观之，大多数统治者对祂发来的书简嗤之以鼻，异域的人们对祂满怀妒忌和恶意。这些都是圣言在这个时代的遭遇，“这代人沉迷于自我满足，不敬上帝，不理会祂的使者的预示、警示和告诫”。人类因此要自食其果。他们拒绝了康庄大道，不接受当今的应允者，在他们再次接近曾经唾手可得的目标之前，他们必须经历一条漫长、痛苦、血腥、黑暗的道路，一条带他们穿过地狱的道路。

巴哈欧拉本人的话语清楚地指出，由于人类从最初就拒绝接受祂的天启，他们必须面对恶果：“我们为你设定了时限，噢，世人啊，到那时你若不归依上帝，祂必行苛法峻律于你，让痛苦的折磨从四方来打击你。那时主对你的惩罚必定严酷！”“世界毁灭、人类消亡的时候到了。”“应许之日来临，无情的审判会在你们头上涌动，在你们脚下翻滚……”“很快，祂的涤荡之雷将击中你们，地狱的灰尘会将你们掩盖。”

从使命周期的开始，深受教义熏陶的守基·阿芬第就预见了种种看起来不可避免的事件将呈现何种进程。早在1923年1月，在一封写给美国某地方灵理会的信中，他就描绘出了未来的图景——“个人和国家都受到奸诈和自利之风的侵袭，若不加以抵挡，文明便会陷入危险，乃至消亡。我们要逐渐坚定不移地以我们真诚的动机和宽广的视野，以我们服务人类的投入和坚持，赢得世界的关注，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恩典。”他不仅对世界局势和补救之道

了如指掌，而且对避免全球灾难的可能性提出了明智的质疑，因为八十年来，人类一直无视显圣者的讯息。他在1923年2月写道：“这个世界明显已经离神圣教义的精神越来越远……”在撰写著作以及与来访的朝圣者谈话时，守基·阿芬第多次用巴哈欧拉的警告来提醒巴哈伊：“人类的文明——往往充满倡导艺术与科学的博学之士的夸耀，倘若允许它超越中庸的界限，必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全知者这样警告你们。倘若强调过分，文明将成为生长邪恶之果的沃土，正如此前文明被局限于中庸的界限以内时带来丰硕的善果一样……狂烈的火焰将吞噬各城市，这日子已届临。”

守基·阿芬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有一种剧毒的癌症正侵蚀着人们的生命力，物质主义在西方已经登峰造极，以往当文明衰落时，它就必然出现，但未表现得如此腐败堕落。对于那些不知物质主义为何物的人而言，我们不妨援引韦伯斯特对其部分特征的定义来向他们解释：所谓物质主义，就是“对物质利益过于看重；醉心于物质和物质需求”。他还说，另一种定义就是人类的现象应该从物质的角度去观察理解，而不是从精神和伦理的角度。从1923年一直到1957年，守基·阿芬第对这一主题的态度反映在了不计其数的著作中，同时他还论述了是何种罪恶造成了这种现状，以及这种现状反过来又会带来何种罪恶。1923年，他谈到了“人类所陷入的混乱粗俗的物质主义”。几年后，他撰文论述了“麻木、粗俗的物质主义及当今社会的浮华”。1927年，在写信给美国总灵理会时他这样说道：“在社会深处，奢侈挥霍之风愈演愈烈，此为不祥征兆，它们促使了反叛和反动力量的增长，而这种趋势已经日益明显。”1933年，在一封写给美国巴哈伊的公开信中，他说道：“愚昧、愤怒、变故、骗局和妥协成了当今时代的写照。”1934年，在给整个西方的公开信中，他谈到了“预示灾难临近的征兆，和西方罗马帝国的败象惊人的相似，这种预兆将威胁当今文明的整个结构”。在这封信中他还说道：“无法无天、腐化堕落和信仰缺失正在吞噬摇摇欲坠的文明的生命力！”在1936年写给西方巴哈伊的公开信中，他写道：“无论我们将目光朝向何方……都无法忽视道德沦丧的证据，不论男女，不论个人还是群体，都显露出了这种沦

丧。”1938年，他警告道：“当今时代的挑战，充满了危险，遍布着腐败。”他还谈到了所有人的罪恶根基，“反宗教的战栗无情地蔓延到人类的全身”，“世界因宗教之火熄灭而黯淡”，这个世界里，民族主义盲目无知却大获全胜，正对种族和宗教进行着无情的迫害，对上帝的崇拜面临着被错误的理论和教义取代的危险，总之，这是一个“被正在蔓延的野蛮物质主义所削弱的世界；一个因道德和灵性堕落的腐蚀而分崩离析的世界”。

1941年，守基·阿芬第鲜明地斥责了社会的主流倾向：“违法、酗酒、赌博和犯罪的传播；对享乐、金钱和其他尘世名利的贪恋；道德的败坏，体现在对婚姻的不负责任，父母管教的削弱，离婚风潮的兴起，文字和出版标准的日渐低下，对践踏纯洁、道德和忠贞的理论的宣扬。——这些道德堕落的迹象入侵东西两方，在每个社会阶层比比皆是，它们流传于男女老少之间，让记载着不知悔改的人类所犯罪孽的书卷愈发黑暗。”1948年，他再次抨击现代社会，称其“政治扭曲、经济混乱、社会颠覆、道德沦丧、灵性消亡”。通过这些反复出现的词语，圣护希望能保护巴哈伊社团，提醒他们注意周遭无处不在的危险。

但是，守基·阿芬第更加公开、频繁地谈论这个话题却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指出，虽然欧洲是一个“无神”的、“骄傲自得却瑕疵毕现的文明”的摇篮，但如今，美国成了这一文明的主角，在那里，这一文明的种种表现带来了无节制的物质主义，整个世界都因此而面临危险。1954年，在给美国巴哈伊的信中，他用全新的表达方式，首先重述了这个社团享有的非凡恩典和赢得的伟大胜利，接下来又转而说道，他们处在一个最关键的历史时刻，这不仅是指社团自身的历史，也是指这个国家的历史，他称这个国家“包含着世界巴哈伊社团中如此珍贵的一员”。他在信中指出，美国巴哈伊的祖国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一场灵性、道德、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其形势极为严重——肤浅的观察者会危险地低估这种严重性。

“犯罪率在惊人上升，政治腐败不断蔓延升级，婚姻的神圣纽带日益弱化，人们过分渴望享乐，父母的管教在逐渐明显地松懈，

这些都证实了道德水准持续、惊人的下降。整个国家的命运已经开始衰退，我们可以清楚地察觉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在这种衰退中，道德水准的下降正是最引人注意、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粗俗的物质主义充斥在生命的各个方面。这个国家与所有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国家都充斥着这种罪恶，尽管后者不那么严重，同样，那个体系的死敌及其卫星国也沾满了这种邪恶。物质主义对物质福利有着日渐严重的过度强调，忘却了那些精神上的事情，而只有它们才是人类社会持久稳定的基础。这种癌症般的物质主义，最早出现在欧洲，蔓延到了北美大陆，还污染了亚洲人民和国家，并将其不祥的触角伸入了非洲的边界，现在又侵入了它的心脏地区。巴哈欧拉在著作中清晰鲜明地谴责了这种邪恶，将其比作吞噬一切的火焰，视之为促成痛苦折磨和世界危机的主要因素，届时，我们必将看到城市的焚毁、恐惧的散播和人心的恐慌。”

守基·阿芬第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阿博都-巴哈的教导。在访问欧美之时，教长就在讲台和布道坛之上，用“充满同情和坚定”的声音，号召抵制“四处弥漫、毒害人心的物质主义”，并指出，“不祥的道德松懈、对物质追求和物质福利的日渐强调”还在继续，政治的地平线被黑暗笼罩，“两大对立思想派系之间的隔阂日渐加深，但不管它们的意识形态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是物质主义的哲学，都忽视了灵性价值和永恒真理（文明最终只有建立在其之上才能实现稳定和繁荣），注定要遭到巴哈欧拉信仰之旗手的声讨”。

圣护不断提醒我们，今日世界的大部分目的、标准和行为都和巴哈伊所信仰的以及巴哈伊努力建立的背道而驰，至少是大打折扣。圣护就这类事情给予我们的指导并不总是像上面的引文那样，局限于一些明显、迫切的问题，他也会就高的品味、理智的判断和良好的教养来指导我们。他常常说，我们的信仰是追求适度，走的是中间道路，不会偏向任何一个极端。他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妥协，而是提炼出了巴哈欧拉话语的精髓：“不要超过适度的边际”；“坚守公正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越过适度之限”。我们所处的社会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不适度的社会，因为它背离了上帝，拒接了祂的信使，因此，它定将走向瓦解。

守基·阿芬第不以我们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否则，他也不会成为我们的指引和庇护。上帝的显示者从天国而来，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圣护的地位和职责却完全不同。他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绝对没有和这个世界隔绝。我们可以说，通过清晰的逻辑思维，通过对这个世界毫不掩饰的评价，他体现了这个年代的精髓。不过，圣护对他人弱点的了解没有让他妥协，他不会因为错误的倾向是一种普遍的罪恶而去接受它们。无论我们如何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我们总是认为，普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的领袖和学者持有的观点必定是正确的观点，因为专家们用权威的语调向我们保证种种事情是合乎情理的。守基·阿芬第从来不受这种自满的困扰。在他看来，今日世界的一切，包括政治、道德、艺术、音乐、文学、医学和社会科学，都和巴哈欧拉的教义体系相冲突。它们和巴哈欧拉的指示相符吗？它们的发展趋势合理吗？它们正走在一条危险的错误的道路上。

多年来，守基·阿芬第一直在为我们澄清巴哈伊信仰的重大原则、教义和思想，我喜欢称之为“思想指南”。在本书中我们只能援引其中的一小部分，在我看来，它们对我们在今日世界中形成巴哈伊世界观起着重要作用。有一条至为谬误的现代信条与所有的宗教教义截然相悖，即人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于环境使然，他们的错误可以被饶恕。守基·阿芬第对这一论调反感至极，因为它不符合巴哈欧拉的话语：“规范和引导世界者乃正义，因为它由奖赏与惩罚这两根柱石支撑。这两根柱石乃是世界的生命之源。”个体、民族、巴哈伊社团以及人类都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决定，但巴哈伊信仰的精髓是，上帝赋予我们机会，给予我们帮助和力量，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会因此得到奖励，也会因为错误的决定而受到惩罚。现代心理学的学说几乎与这一概念完全背道而驰。我在生活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条原则的正确性，当挚爱的圣护给了我一个伟大而又意外的荣誉——选我做他的妻子时，我意识到，至少对我来说，所有关于灵性终点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我就要成为他身边的人了。就像人死后升到天堂，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一天，在谈话的时候，

守基·阿芬第的话涉及到了这样的内容：“你的命运在你自己手中！”我吓坏了！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我要一辈子为自己的灵魂去努力做正确的事情。

圣护和整个巴哈伊世界以及与个体、官员和非巴哈伊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的。他极其耐心，但在最后，他的惩罚来的又迅速又公允。他的奖励也很及时，而且在我看来，这些奖励往往大于受奖之人所应得的。

文学和语言——不管是波斯语、阿拉伯语还是英语——的最高标准反映在了巴孛、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与守基·阿芬第的著作之中。他们之中没有人会使用格调平俗低下的词语。记得有一次，一名朝圣者真诚谦逊地向圣护抱怨说，美国的普通民众不太容易理解他的著作，建议他写得简单一些。圣护坚定地指出，他绝不会同意，他想看到人们的英语水平得到提升，为此他才用英语写作。说这些话时，他声音优美，吐词清晰，眼睛里还泛着光芒。他的意思非常明显，大西洋彼岸有很多文章并不总能达到这种标准！他敦促巴哈伊的杂志，要他们使用“高贵、宏伟的文风”，而他自己总是以身作则。

刚刚成婚的时候，我还有些担心，不知道圣护对现代艺术的态度。我喜爱的是祖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黄金时期，如果他喜欢现代的绘画、雕塑和建筑风格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偶尔会一起去参观欧洲著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我很快就欣慰地发现，他深深地、真切地热爱着对称与美丽，喜欢成熟的风格和伟大作品中的恢宏表现手法。新的风格要建立在旧世界秩序的瓦砾上，守基·阿芬第从来不把对新风格的盲目追求——不管这种追求多么真挚和符合逻辑——错认为是一种新的、发展中的艺术形式的证据，更不可能是巴哈伊的表现形式。他太了解历史了，所以不会将腐败的深渊，将一个堕落垂死的社会的影子，错看成在巴哈欧拉世界秩序激发下生成的新风格！他知道，那种果实是树上最后结出的，不是最早的；他知道必须先有一个世界体系，它从世界和平与统一之中汲取了力量，然后才会有黄金时代中新的、成熟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繁荣。从他修建的巴孛陵殿和国际文物馆以

及他亲自选择的卡尔迈勒山、德黑兰、悉尼以及坎帕拉灵曦堂的四种设计中可以看出，它们虽然很保守，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但是，这些风格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会一直保留下去，直到在巴哈欧拉教义的影响下，一种新的、自然发展的风格得以出现。我曾经记下了他对坎帕拉灵曦堂的一份设计方案的评价："可怜的非洲人民！他们成为巴哈伊，就为了聚集在这怪物下面吗？"于是他开始为这片大陆上的兄弟姐妹们争取利益，让世界中心方面出了一份设计，最后的结果令他十分满意，他也批准了这一设计。如果要核实这条信息的话，人们只需要去找他写的信件。1956年，由秘书代笔，圣护就两个国家的灵曦堂建设致信它们的总灵理会。他的秘书将他的观点表述如下："他认为，既然这是灵曦堂母堂……就非常重要；无论如何都要庄重，建筑风格不能极端。没有人知道两三代过后，人们会如何评价当今的风格；但如果目前建设的灵曦堂在将来显得非常极端和不适宜，从而需要另建一座的话，这是巴哈伊们担当不起的。""他很遗憾让F先生失望了……但是，要接受如此极端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圣护强烈地感受到，不管新兴的建筑流派对此话题持何观点，当今世界的建筑风格不仅非常丑陋，而且毫无端庄和优美可言，而这两者是巴哈伊灵曦堂必不可少的，至少也要有部分的体现。我们必须牢记，大多数人在品位上既不非常现代，也不十分极端，那些先锋学派大加赞赏的，在平民百姓看来却常常令人反感。"

圣护热爱音乐，他对音乐的看法与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也是一样的。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圣护渴望保卫圣道，渴望让圣道及其宝贵机构保持高贵和美丽，以保护圣道之圣名，保护其机构的神圣性质，保护其国际性特质，使其长青不老，不负允诺，避免受到这个变幻时期中奇思怪想的侵害，远离一个完全西化的腐败文明的不良影响。因为我们要清楚，到目前为止，信徒的主体一直都是雅利安后裔，但他们并不是人类的主体。我还记得第一位日本巴哈伊朝圣者到来时，我看着他的面庞，守基·阿芬第用美妙、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他说道，人类的大部分都不是白人，也没有理由都

是白人。这位来自远东的信徒刚刚结束了漫长的美国之行，对他而言，守基·阿芬第对这一观点的强调和开放精神定然是一种明显的启示。

就像贞洁、正直和诚实是巴哈伊们必须做到的一样，礼貌、庄重和尊敬也是巴哈欧拉的教义所支持的品质，有多少巴哈伊充分了解这一事实呢？守基·阿芬第在早期发给美国的电报中就强调了这一点："圣道之庄重要求我们谨用教长之录音。"对事物心存敬意是人能享受到的一大幸事。圣护多次在指示中提醒我们注意类似这样的事情："确保展示期间没有巴孛肖像的照片。"看到显圣者——不论是巴孛还是巴哈欧拉——的面庞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惠赐，需要有特定的方式，而不能像对待普通的照片一样随意。

在巴哈伊周期的开端，一些国家要响应召唤，在历史上扮演特定的角色。守基·阿芬第对这方面教义的阐释可谓拨云见日、发人深省，而且常常与我们的有限理解大为不同。波斯之所以是信仰的摇篮，美国之所以是教务管理体制的摇篮，其原因都建立在教义之上：世间最伟大的力量是圣灵的力量，这是可以化青铜为黄金的神圣之术。在《神圣正义的降临》一书中，圣护曾就此真理教导我们："有人声称，某一种族或国家有固有的良好品质、高的道德标准、政治才干和社会成就，这是那些神圣智者出现在它们之中的原因。但这一论调是对历史事实的彻底颠覆，它会逐渐使人们彻底否定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清晰鲜明、毋庸置疑的阐释。"他继而说道，这些被上帝选中的种族和国家必须毫无保留地认识到并勇敢地证实一个事实，即：它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有迫切的需要，它们已陷入可悲的境地，积重难返，并非因为它们更为优越，也不是因为它们的政治潜力和灵性美德。出于这些原因，巴孛和巴哈欧拉选定波斯为信仰的摇篮，选择美国为世界秩序的摇篮。在这一伟大律法的履行过程中，上帝的荣耀就会得到彰显，人类会意识到，他们的力量和荣耀只来自于上帝。那些"最为落后、最为懦弱、最不理性的民族"，一旦接受了神圣天启，就会变成英雄的民族，并"在人类生活中掀起一场类似的革命"，这就是巴哈欧拉的天启能使人脱胎换骨的明证。守基·阿芬第说，同样的原则也适

用于美国：“尽管它有着伟大的品格，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之所以被选择，却恰恰是因为其深重的罪孽，因为其不幸产生的物质主义泛滥成灾，束缚人心”，所以它才成了新世界秩序的旗手。他接着说道：“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巴哈欧拉能最好地向这不知敬神的一代人展示祂的全能力量，他们被淹没在物质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卑劣顽固的种族歧视的牺牲品，因政治上的腐败、对法律的蔑视和道德的沦丧而声名狼藉。巴哈欧拉要将他们从中拯救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男人和女人都会逐渐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崇高的道德，贞洁、不带歧视的友谊，神圣的自制能力和灵性的洞察力等重要品德”，而这些品德会让他们在巴哈欧拉世界体系的建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守基·阿芬第开始写作《神圣正义的降临》期间，有一天，当他正在详细阐释这个主题时，他突然说道，美国的政治是全世界最为腐败的。我被这评论弄得不知所措，因为我一直认为，正是因为我们的民主体系和政治的优越，上帝才选择我们来建立祂的教务管理体制！我试着去反驳，说波斯的政治应该更加腐败。他说，不，美国的政治才是最腐败的。他一定看出我很难接受这个新观点，就突然指着我说：“咽下去吧，这对你有好处。”我咽了下去，没有说话。由于他对这一主题的阐释，多年之后，当他写下那些令人难忘的章节时，我逐渐看清了他是如何阐明和澄清教义中的伟大灵性律法和真理的，如果我们有了透彻的理解，就能获得其中的药方和力量。作为巴哈伊，如果我们的理念是错误的，我们用自己有限、充满偏见、受环境左右的想法去渲染神圣教育者的教义，我们便不会获得任何优势。扭曲不会使任何事物得到改善或变得更为有用。因此，我将圣护给予我们的这些伟大主题，以及这些对真理的论述，统称为思想指南，它们能让我们洞悉事物的原貌，正确地理解我们的信仰。

圣护这种实在求真的方法意味着他不仅要评估圣道的真实力量，还要意识到它在当前的局限。他从来没有混淆这二者。1926年，在写信给美国一位非巴哈伊青年领袖时，圣护说道：“我们相信，圣道的精神正逐渐指引着人民和国家，所有巴哈伊都被号召

起来，大力宣扬、保卫巴哈欧拉所启示的崇高原则。当公众思想的真正领袖做出伟大的人道努力时，他们从来不会漠不关心，而是永远欢迎每个机会，代表和平、真理和公正，与其他运动一道，发出他们的声音。”尽管如此，但他并没有对我们可支配的力量抱有幻想。1939年7月，他致信美国总灵理会（它代表了巴哈伊世界最自由、最有力量的社团），称他们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那些掌握着波斯巴哈伊命运的人；他们还没有能力发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抓住人类的想象力，唤醒他们的良知，最终匡扶正义，解救他们饱受迫害的同胞；在各国的委员会中，他们还不能运用与圣道的声明和伟大相称的力量；他们现在也没有能力和责任去“遏制人类社会及其机构悲剧性的急速衰落”。

守基·阿芬第于1948年写道：“我们不要去猜测，也不要指望在一个垂死的秩序上能迅速建立一个不可摧毁的天道体系，抑或托起神圣计划的荣光，将世界的灵性重生和最终救赎的种子播种在其中。”他多次向朝圣者说起了两个计划：一个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计划，即神圣计划，其实施要依靠我们的双手；还有一个是全能的上帝为这个星球制定的整体计划，对此，祂有祂自己的实现方式，祂会运用来自圣道之外的力量，最终达成祂的目的。巴哈伊们要在神圣计划的框架内努力工作，尽快完成任务，即在全世界建立万军之主的国度，这样巴哈欧拉的祝福之雨才会相应落下；若世界忽视祂的讯息，一意孤行，上帝之天谴就会降临到国家和人民之上，通过击打、破碎、研磨，使他们形成一个世界，因为他们拒绝听从上帝的信使今日带来的指示，和平地创造那个世界。

在这个团结、受灵性推动的世界体系中，巴哈欧拉的追随者联合在一起，这与那些正在毁灭世界各种族、宗教和党派的瓦解、对立和憎恨截然不同，圣护反复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如果巴哈伊们不与这些分歧割裂开来，便会招来危险。1938年9月，由于人类正在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悬崖，守基·阿芬第向信徒们发了一封警示电报，明确地严厉重申要谨守中立的政策：“在当今邪恶势力翻涌，民族、国家、信条、阶级日益分裂之时，对巴哈欧拉世界秩序的忠诚以及基本机构的安全要求所有宣誓支持者（尤其北美大陆

的先锋建设者）下定决心，顶住压力，明确公共意见，无论个人集体，不管在非正式场合还是在正式出版的文章中，不能相互攻讦，党同伐异。要深入理解，以免这样的妥协日积月累，最终令社会结构瓦解，阻塞恩典之渠道，使本质上超国家、超自然的上帝之体系难以为继，而这一新近建立的体系的发展是如此艰辛。”

巴哈伊的爱国主义并非对国家偏见和政治体系的忠诚，而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通过培养最高的灵性利益，以及对政府（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暗暗服从，来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圣护在1932年指出，巴哈伊的活动遍布世界，加上“社团所在地有不同形式的政府，他们的标准、政策与治理方式各异，使得……这些社团的成员非常有必要避免招来他们政府的怀疑或敌意，给他们的教友招致新的迫害……”他继而说道：“我不禁反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这个分布广泛的信仰，既要超越政治与社会的束缚，又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更多不同的、相互斗争的尘世政府的善意与支持呢？还有什么能让这个信仰成功地保持其统一、维护其利益、保证其机构稳定平和地发展呢？”另有一次，守基·阿芬第写道：“让他们大声宣告，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不管他们的机构多么完善，不管他们多么渴望执行巴哈欧拉的律法、应用巴哈欧拉的准则，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服从于各自政府的法律和准则。在努力执行和完善信仰的教务事务时，他们绝不会去违反本国宪法的条款，更不会允许信仰的管理机制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1930年，在发给近东一灵理会的电报中，圣护给出了明确的指示，以纠正巴哈伊的态度，电报中说道：“除非政府反对重要灵理会的成立。”正如守基·阿芬第恰如其分的说明，巴哈伊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而只属于“上帝之党派”。他们是上帝神圣政体的代理人。

主权国家有执行自己政策的自由（不管这种政策会对巴哈伊的利益带来多大的损害），这一点得到了守基·阿芬第的支持。1929年，苏联政府没收了世界上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圣护对此深感遗憾，但还是表示了理解。他写道，官方只是根据宪法的条款“行使他们认为合法的权力”。当所有的诉求都无济于事后，他便让这个国家的巴哈伊服从政府的命令。他写道，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上

帝会“掀起遮盖他们领袖视线的面纱，昭示出目的的高贵、意图的纯洁、行为的正直以及人道的理想，这些乃是每片土地上、每个政府下的巴哈伊社团的特点，它们目前虽小，却有着巨大的潜力”。

不要认为，由于信仰日渐强大，并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刚刚担任了八年圣护的守基·阿芬第就会摒弃他所倡导的这个基本政策。事实绝非如此。1955年，他给所有的总灵理会（当时，在信仰诞生以来最强大的远征的感召下，聚集在信仰旗帜下的国家数量已经在两年内增长了近一倍）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道：“无论身在祖国还是异乡，不管此地的政权如何残酷，都要再次仔细思考他们管理巴哈欧拉圣道的全部意义和核心要求……做出更大奉献，警觉地与各种形式的歪曲斗争，消除疑虑，驱散不安，通过向他们各自的政府表示出更令人信服的忠诚来使批评之声缄默，赢得并保持国内当政者对他们的正直和真诚的信心，重申信仰的目标和意图的普适性，宣扬基本原则的灵性特质，表明教务体制的非政治性……”

对政府的忠诚涉及到了三个因素，它们都和政治完全无关，这三个因素分别是服从、智慧、运用得到批准的合法渠道。智慧这个因素常常被人忽视，但是圣护说得十分清楚：“社团所在地有不同形式的政府，他们的标准、政策与治理方式各异，使得……这些社团的成员非常有必要避免招来他们政府的怀疑或敌意，给他们的教友招致新的迫害……”不仅如此，圣护还反复指示不同的社团和个人，要求他们必须以最高的智慧服务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报刊和电台每时每刻都在对其他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指责、中伤和辱骂。巴哈伊绝不能有丝毫大意。当第一个灵理会在伊斯兰教的中心成立时，守基·阿芬第表现出了深深的自豪和喜悦，他盛赞了那位对此负责的拓荒者（他有犹太教背景，又成为了巴哈伊，所以身陷于双重危险之中），并回忆说，两年里，这个人从没有透露自己的巴哈伊身份，直到有一天，战战兢兢的他在心中默念祷文，将第一个潜在信徒请到了自己的店铺后面，开始诉说出信仰的主题。当我们记起此事时，我们应该能理解守基·阿芬第所指的智慧了。

在很多国家里，守基·阿芬第都禁止巴哈伊们进行宣传，告诫

他们一定要避免与某些教派和民族接触，如果这些人听说了或者接受了信仰，拓荒者的全部工作都会陷入危险之中。这就是智慧的精髓，每当人们忽视了它，灾难就必然降临。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圣护总是大力敦促灵理会和拓荒者，只要有可能，就要通过合法途径保护信仰的利益，使其获得法律的承认，也可以通过报刊和电台取得公众的支持。

这些政策会影响到信仰的国际利益和福祉，但是，在诸如此类的事务中，指导和庇护必须来自世界中心，从性质上讲，世界中心是唯一的权威，只有它可以在这些重要、微妙的问题上做出判断。

圣护的另一条思想指南是他对团结在巴哈伊教义中的意义的阐释。他写道，圣道“倡导和代表的团结之原则”被信仰的敌人“误看作徒有其表”；“让世上再无人误解巴哈欧拉世界律法饱含生机的目标……它一方面拒绝过度集中，一方面否定所有不知变通的尝试。它的口号是多元化的团结……”守基·阿芬第指出，尽管“人类一家”的原则以建立“一个在生活各重大方面都有机统一的世界”为目的，但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有无限多样的国家特质”。他写到了“高度多元的未来巴哈伊社会”，敦促巴哈伊特别注意，要让信仰拓展到不同的民族中去，他说：“这些迥异的人类种族联合起来，和谐地编入到巴哈伊无所不在的友爱之网中，通过神圣命定的教务管理体制融合在一起，为巴哈伊社团生活的丰富和荣耀做出各自的贡献，每个巴哈伊的心灵都会因为这种设想感到温暖和振奋。”他还写道，信仰“不会忽视，也不会压制族裔、思潮、历史、语言和传统，以及思想和习惯的多元化，因为正是这些造就了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

在一个传教的时代，国家与国家集团、各个社团与组织都在日夜叩击人们的心扉，企图将别人打造成他们的模样，强迫别人采取他们的政治体系、衣着、生活方式、住宅、医疗体系、哲学以及道德和社会准则，因此，巴哈伊们要思考自己的教义和圣护对教义的启示性解读，这是非常重要的。今日的西方世界偏爱统一，只要可能，它就会把每个个体塑造成相似的人。于是，一些好的东西无疑得到了传播，更多的人享受到了物质利益，但与此同时，很多和巴

哈欧拉的教义完全相悖的方法与目标也粉墨登场。

除了反宗教、不道德和崇拜财富以外，西方的物质主义还在快速传播着一股绝望、不安的浪潮，以及一种世界上所谓落后民族之中强烈的低劣感。这种自负、自满以及财富带给其他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我们可以将其与圣护对这些民族的重视做个比较。为什么守基·阿芬第如此全面地记录并出版了这些聚集在信仰旗帜下的“种族”和“部落”的名单呢？他是否将它们看成一颗颗珍珠，编进巴哈欧拉圣道的珍贵纹饰中呢？为什么他在巴吉宅邸的墙上挂了一幅首位俾格米巴哈伊和首位接受信仰的印加人后裔的画像呢？它当然不是奇珍异品或奖品，将它挂起来是因为回到他们天父帐篷的受到珍爱的游子。我清晰地记得，当守基·阿芬第发现一名朝圣者其实是古老的夏威夷王室的后代时，他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将这个人包围，而在他生命中的许多时刻，他却因为自己的血统而受尽蔑视！不要以为这是守基·阿芬第的个人怪癖，抑或某种政策。绝对不是。这就是教义的最本质体现，每个人类种族都有自己的天赋，能使巴哈欧拉的新秩序变得多元、丰富和完美。

守基·阿芬第不仅宣传这一点，还通过向巴哈伊灵理会发出声明、呼吁和指示，来积极地追求这个目标。1949年，他发出了一封令人欢欣鼓舞的电报，其中写道：“首个全部为红色人种的印第安灵理会在内布拉斯加州梅西市成立。”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守基·阿芬第仍在追求着这个目标，因为他一直谨记阿博都-巴哈在《神圣计划书简集》中的话：“要注重对印第安人，也就是美洲原住民的传导。”1957年7月，圣护致信加拿大总灵理会，称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皈依严重滞后”，须加紧努力，“让整个西半球的所有巴哈伊社团成员感到惊诧，同时受到一种激励”。

一年前，守基·阿芬第致信美国总灵理会，由秘书代笔：“挚爱的圣护觉得联络美国少数族裔的事宜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贵灵理会应该安排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研该项工作的可能性，然后指示各地方灵理会，同时鼓励巴哈伊们积极活动，这片土地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由于少数族裔总是受到冷落，他们对友善

的反应常常比那些享有盛名的多数人更为迅速。”

这项政策促成了巴哈伊信仰对少数族裔的独特态度，守基·阿芬第在《神圣正义的降临》一书中对此有清晰的阐释，他写道：“如果因为某个种族社会落后、政治不成熟、人口较少就去歧视他们，就是对信仰生命之源精神的无耻亵渎。”当一个人接受了信仰，“所有阶级、教派或肤色的分别都要消失，不管出于何等原因，也不论环境或公共舆论多么咄咄逼人，都不能故态复萌。”守基·阿芬第继而陈述了一条原则，它与整个世界的政治思维大相径庭，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如果世上有可以容忍的歧视，那就不是对少数人的歧视，而是对少数群体（不管是种族还是其他方面）的偏向。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采取民主还是专制，实行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也不管是处在新世界还是旧世界，当地球上的国家和人民在各自辖区内面对种族、宗教和政治上的少数派时，要么对其视而不见，要么践踏他们，甚至要铲除他们。与此不同，每个聚集在巴哈欧拉旗帜下的社团都应该将培养、鼓励和保卫每一种少数派作为首要的、不可回避的义务，不论其种族、信仰、阶级和国籍的背景如何。”这条原则至关重要，当选举中出现相同票数时，当某一职务要在社团内不同种族、信仰或国籍的成员之间选择时，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优先权给予少数派的代表，此举意在激励和鼓励少数群体，为他们提供推动社团利益的机会。有一次，守基·阿芬第言简意赅地表达过这条原则的效果，我在此引用：“多数中的少数要比少数中的多数更重要。”也就是说，判断少数的标准并不是这个国家内的数量优势或劣势，而是举行选举的巴哈伊社团内的数量优势或劣势——每个少数派都应得到强大的保护。圣护曾说，当巴哈伊国家出现时，非巴哈伊信仰的少数派的权利会得到巴哈伊的全力保护。

巴哈伊信仰不仅保护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以及少数派的权利，还支持个体的权利，包括国际上作为个体的国家，以及社团内个体的人。守基·阿芬第写道：“巴哈欧拉所预见的人类团结，指的是世界联合体的建立……其中，成员国的自治和个人自由，以及其中个体的自主绝对会受到完全的保护。”

圣护非常支持灵理会的权威，但同时也是个体信徒的坚定守护者，他深爱着巴哈欧拉追随者中的那些“平民百姓”。几乎所有对巴哈伊世界或国家社团的呼吁都说到个人，他鼓励他们主动行动，并且指出，如果没有这种主动性，所有的计划都必将失败。1927年，圣护致信美国总灵理会道：“每当我在神圣陵殿祈祷，都会祈求神圣指引之光照亮你们的道路，使你们以最为有效的方式运用个体的开拓精神，一旦这种精神在每个信徒的心中燃起，一旦它受到巴哈欧拉伟大律法的指导，它就会作用于我们，推动挚爱的圣道前进，使之完成其光荣的使命。”他在《神圣正义的降临》中指出，每个信徒都有责任“成为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的忠实信托人……去开拓、提升和巩固”任何他们认为能够帮助计划实施的活动，只要所有的行为都符合信仰教务原则的规定。他告诉美国总灵理会，虽然他们有权指导巴哈伊事务、有权做决定，但还应该在自己和其他灵理会以及个体信徒之间“培养相互依赖，互相合作、理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

卑微的人一直都受到了独特的福佑。1925年，守基·阿芬第写道：“有的时候，不，很多时候，教友中间那些地位最低、知识最少、经验最少的人，因其纯粹的无私和热情的投入，做出了重大且令人难忘的贡献，成为了各灵理会谈论的焦点。”圣护十分欣赏内心谦逊纯洁的人，讨厌那些好斗，特别是有野心的人。他对拓荒者的呼吁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在七年计划期间，他写道，“没有信徒，不管多么卑微”，会感到自己被剥夺了参与这次伟大拓荒活动的权利，那些想要去服务的人不应遇到任何障碍，“无论年纪大小、贫穷还是富有”。在《神圣正义的降临》一书中，他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所有人都必须参与进来，不管其出身多么贫寒、经验多么有限、资源多么匮乏、所受的教育多么不足、有多么紧迫的事情或工作、居住环境多么恶劣……很多时候……信仰的那些最为卑微的追随者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任何经验，没有一点地位，有的时候甚至缺乏智慧，但他们也能为圣道带来胜利，甚至让那些有知识、有智慧、有经验的人相形见绌。”守基·阿芬第指出，连彼得这个笨拙到将食物分成七份，却又在第七天安息日休息的人都能被

基督激励起精神来，成了祂的继任者；那么天父巴哈欧拉的力量就能使祂的最纯洁最卑微的追随者做出远远超越耶稣第一门徒的丰功伟绩。圣护并不满足于强调卑微之人的义务，他同样也非常清楚地告诫另一类人："因此，每个美国信徒——尤其是那些富裕、独立、热爱舒适的人，还有那些沉迷物质追求的人——要挺身而出，将他们的资源、时间乃至生命都献给圣道，其卓越绝伦的荣耀非肉眼所能见。"他感人至深地说："每当个人响应分派给他的任务时，我的心就会喜悦地悸动，头脑中就会迸发出新的灵感。"

守基·阿芬第非常清楚谁是信徒，他是如何成为信徒，又是如何融入这个灵活而又严谨的世界教务管理体制的，而信徒本人对这一点却未必很清楚。我们必须明白，圣护一直都将圣道看作一个成长中的、有生命的机体，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速度扩展。核心问题上必须是统一的，其他方面则可以也需要有多元化。比如，福特车作为一种机器，它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大家族中的成员却绝非机器，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年龄，处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没有人会期望一个五个月大的孙子会和在大学教物理的爷爷有同样的行为与理解力。一开始，人们看重的是老的东方社团，尤其是波斯社团，而不是年轻的西方社团，也就是那些在美洲和欧洲的社团，尽管人们对它们的期待还是超过了那些更为年轻的社团，比如说非洲的社团和太平洋地区的社团。我们必须记住，除巴哈伊信仰之外，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新启示的宗教。可以说，伊斯兰背景的巴哈伊更接近巴哈欧拉为我们立下的律法，因为祂的律法对伊斯兰律法既有吸收又有舍弃。因此人们自然会期望伊斯兰背景的信徒在个人身份方面遵循巴哈伊模式，并从一开始就遵循巴哈欧拉的律法和条例，将其应用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而那些来自于其他宗教或更早启示的宗教的人则需要受到更多的、缓慢的和耐心的教育，直到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些。

在理解怎样才能成为巴哈伊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圣护是如何构想和管理上帝之圣道的。所有的宗教都有一种灵活的、成长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如果我们研究以往宗教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它们的追随者总是倾向于将这种力量变成一种模式，使之固化为一种形

态，这是影响它们的一个重大弊病。宗教是不断成长的。1953年，守基·阿芬第致信芝加哥洲际大会，用最美妙、最富诗意的文字描述了这种自然的成长。他将宗教的历史比作一棵大树，从亚当之日一直到巴孛的年代，这棵树已经成长了数千年，它不停地抽出新芽，长出枝叶，开出花朵，最后孕育出一颗神圣的种子，即巴孛的显圣和启示。这颗种子在仅仅六年之后就被送进了殉道的磨坊，产出一种灯油，其光芒在西亚查尔监狱的巴哈欧拉眼前闪烁，祂的火焰在巴格达熊熊燃起，照亮了阿德里安堡，随后又投射到了美洲、欧洲和澳洲大陆的边缘，如今，这光明又在“形成时代”传递到全球。圣护说，在未来几千年时间里，这光明将遍布整个星球。我们目前只是走出了发展的第一步！

心智狭小之人本能地限定周围的事物，将四壁拉到只能容纳自己，将一切都缩小到自己的层级，这样他们才会觉得安全、舒适。这种做法意味着砌墙用的很多材料都来自他们原来居住的房子，是他们搬走之前就已经习惯的材料。心智宽广的人则相反，他们将地平线向远方推展，划定新的边界，给成长留出空间。对现阶段的信仰而言，有些事情是明智且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有一些事情会过分限制信仰的发展，把鲜活的教义固化为一种不成熟的形式，这种形式太过狭小，国家或地方、教派或种族的特征过于明显，因此，它不能扩展成为一种世界秩序，并相应地形成世界政府和世界社会。在阅读圣护的信件时，我们不难发现，圣护总能很好地平衡好这二者。在我作为巴哈伊的生命历程中，我常常想，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包括商人、律师、挖水沟的工人，等等）在生活中如此务实、理智，却没有把这种能力带到巴哈伊活动中。对他们而言，乌托邦就是一部电影，你只需要将其打到屏幕上，然后它就会变成现实。

圣护却不是如此。他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建立教务管理体制，实施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组织他个人以及巴哈伊世界的工作，就像那些伟大的文艺复兴画家创作巨幅壁画和油画一样。首先要有草图、整体构想、尺寸、颜色、比例；然后要切割，分成一系列的方格；再将其表面固定，放进主要的指示线，还有外部轮廓以

及阴影人物；接下来是细节和着色，要以无尽的耐心，直至尽善尽美。这就是守基·阿芬第的方法，在万事俱备之前，他不允许任何人画上人物或细节。在实际当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列举很多例子。教长去世后，我们希望正义院能够尽快成立。在等待了四十二年之后，我们终于打下了能够支持它的基础，在地方灵理会和总灵理会层层成立后，正义院才得以牢固地矗立在它们之上。我们希望有英语版本的《亚格达斯经》。在反复引用的过程中，守基·阿芬第慢慢地将大部分内容为我们翻译了出来，少数没有翻译的律法、规定和细节都在后来给出了。这些都需要非常认真的工作，其中一些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承担起的。很多次，某个热情的个人或团体想立刻在某个安静的乡村角落建立一个巴哈伊聚居点，并在此把所有的经济教义付诸实践。这种乌托邦计划是纸面上的，不是立体的。但是守基·阿芬第的答复却是，时机尚未成熟，要把精力集中在增加信徒、团体和灵理会的数量上。我们想在首都建一所学校；但圣护说，不能在首都，如果失败，这将成为圣道的耻辱，调用有限的资金和人手，去到未开发的地区，要有个简单的开始，不应张扬。还有人想建一所巴哈伊大学，说这话的人一生中恐怕从来没有欠过债，或者假装他是一个百万富翁，他从不会想到这种举措会使其他国家的活动陷入瘫痪，甚至需要动用在全世界弘扬信仰的有限资金！守基·阿芬第的所有本能都阻止他开展那种商业式的“过度扩张”。他会冒险，但必须是合理的风险，而不能是愚蠢的风险。他的判断力和他的信念同等强烈。他坚信奇迹的存在，但他从来没有把万能者看成一个魔术师。如果我们研究阿博都-巴哈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同样在实际、理性的心智与坚定的信念方面保持了完美的平衡。

还有一个小例子，但同样能说明问题。圣护对精神论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他的秘书写道：“圣护认为现在不是对此做出任何特别声明的时候……对朋友们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便是新的灵理会和团体的成立。”他常常这样回答，还不是时候，还不是。将巴哈欧拉的旗帜插在地球最边远的角落，把人类带到祂的疆域，将王国的基础打好，不要去装饰一座还没有建造的房子。

从使命周期初始，守基·阿芬第就致力于给当时尚很弱小的巴哈伊世界（只有三十五个国家或多或少地接收到了巴哈欧拉之光的照耀）建立秩序。在他心中，伟大的思想指南已经非常清晰，而随着他年岁渐长，随着社团的发展和信徒经验的增加，这些思想指南变得更为具体、更加丰满。阿博都-巴哈在遗嘱中谈及圣护时，便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发展："让他能在幸福、快乐和灵性中日渐长大，最终成为一棵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不在此按时间顺序赘述这种演化了。我们应该把握住他给我们的大的图景，以及细节是如何添加进来的。很多时候，当我观其言、察其行时，我觉得守基·阿芬第是世界上唯一一位真正的巴哈伊。至于其他人，尽管大家都声称是巴哈伊，但在他的信仰中，总有一部分、一个角度、一个概念（不管多大）受到了自身局限的影响，唯有圣护看到的是整体，看到了信仰全部的伟大及其完美的平衡。他不仅能够看到，而且可以分析，可以用美丽、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所见。

比如，他对巴哈伊信仰的看法便符合事物的一般规律："……应该说明的是，巴哈欧拉的天启无条件废除了此前所有的天启，坚定地支持它们蕴含的永恒真理，完全地承认其创立者的神圣起源，保卫它们真正的经文不受冒犯，不认同任何贬低其创立者地位的意图，以及贬低其所传递的灵性理想的行为，澄清它们的职能并与之紧密关联，重申了它们共同不变的根本宗旨，调和了它们之间看似不同的教义，诚心、感激地承认它们对同一个神圣启示的逐渐展现所分别做出的贡献，坦率地承认自己只是逐渐显现的启示中的一环，以遵照当务之急的律法和规定补充了它们的教义，在一个快速发展、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在越来越多的人的接受下，宣告了它有意愿、也有能力融合相互竞争的教派和派系，使它们成为手足，在同一个体系下发挥作用，与统一世界、救赎世界的神授秩序的准则相一致。"人们一下就能看出，这个"人类灵性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启示"融进了历史的全景之中。

巴哈伊信仰"是所有宗教的精髓、允诺、调和和统一"，其"首要使命"是建立一个神圣的文明。我记得有一次，守基·阿芬

第与他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老师谈话时，这位老师问道，对巴哈伊而言，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圣护的回答十分优美。他说，巴哈伊的生活目的就是要推进人类一体性。他继而指出，巴哈欧拉出现时，祂的讯息可以而且应该被传递给全世界，而不仅是传给个体；今日的救赎就是社会全体的救赎、全体的改变和全体的变革，反过来，由此产生的世界文明也会反映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体身上，并带来他们的救赎和改进。守基·阿芬第不断地在著作和讲话中强调，社会的改革与个体品性的改进这两个过程要合二为一。1926年，他在给一名非巴哈伊人士写信时说，个体的重生是“社会重建所必须倚靠的持久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社会才能发展、繁荣。当前的社会正在消亡，也必将消亡，但是，如果巴哈欧拉未来的世界联合体的外围还与这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又如何为未来社会创造一种模式，或者哪怕是为这个世界共同体建立一种雏形，从而打开通往新世界的道路呢？

守基·阿芬第拿起了他的手术刀，这便是对信仰著作的阐释，然后开始切除。尽管我们的教义指明，自古以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宗教，也就是全能上帝的宗教，先知就是祂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阐释者，但守基·阿芬第让我们明白，在每个新的天启之下，人类的责任就是信守此天启的任何形式，远离之前宗教的外在形式与次要律法。如果一位诚实的基督徒知道巴哈欧拉就是天父，知道通过建立祂的律法和体系（它们在教务管理体制中都有反映和体现），便可使祂的王国诞生，他还会留在教堂里祈祷天父和王国的降临吗？东西方各地的巴哈伊都或多或少地明白这一点，但通过圣护的通信，他们开始看到阴影和光明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向家庭亲情、集体意见或个人偏好妥协的灰暗地带荡然无存。你要么进来，要么出去。这对世界上的全体信徒有一种涤荡心灵、振聋发聩的效果，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的一个集体，是新时代的人，是新天启的人。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说巴哈欧拉造了一艘船，那么是教长使其逐渐加速，而守基·阿芬第则放下缆绳，扬帆出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光是非巴哈伊对我们另眼相看，我们也对自己有了新的看法。我们逐渐明白，我们不是社会中的新生事物，我们

就是新社会，我们就是未来。

正是考虑到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弄清重点是如何转移到对新巴哈伊的接纳上的。在守基·阿芬第使命周期的前十五年中，他总是鼓励巴哈伊机构（特别是在西方）要确保成为信徒的人意识到了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是多么地伟大。他们要做的是和过去决裂。守基·阿芬第在1927年写道："否则"，"那些信念尚不成熟的人会永远停留在外围，继续半心半意地忠诚于圣道所有的教义。"在那些年间，信仰声望渐长，在许多西方地区都得到了承认，被视为独立的宗教，有自己的律法和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埃及的一个穆斯林法庭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它宣称我们不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部分，而是和基督教或犹太教一样，区别于伊斯兰教），其独立的权利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但是守基·阿芬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警惕，对影响到圣道之生命的东西格外敏感。他发现了一种不好的趋势。1933年，他曾做出指示，要求灵理会"慢慢地接受"新的信徒。而教务管理机构在执行这一指示时有些过了。这种新的死板的做法可能使所有巴哈伊机构的鲜活目标——使全人类皈依巴哈欧拉的信仰——陷入危险境地。巴哈伊们迫切地遵从守基·阿芬第的指示，却走向了极端，一心要对申请人仔细筛选，结果使成为巴哈伊变得难上加难。因此，1938年，守基·阿芬第觉得有必要告诫美国灵理会，他说道："不要再在细枝末节上过于坚持，这样可能会阻碍那些真诚的申请人。"他还指出，巴哈欧拉社团的责任是去培养新的信徒，让他们在接受信仰之后，发展为成熟的巴哈伊。

信仰变得日渐团结和强大，东西方的灵理会一个接一个地成立，并且开始有力、系统地运作，世界人民逐渐认识到了这一新宗教的存在，而且明白它是一个独立的天启，有着属于自己的体系；与此同时，守基·阿芬第的指示也有了不同。特别是在伟大的十年传导与巩固计划期间，强调对接纳新巴哈伊的条件有了变化；现在，我们强大了，现在，我们的基石已经牢牢打下，现在，我们可以、终于可以面向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众了。打开大门，把他们带上巴哈欧拉救赎的方舟吧！行使阿博都-巴哈指示的时候到了："召集在那些国家、首都、岛屿、集会和教堂中的人们，让他们进入阿

卜哈天国！”换言之，当守基·阿芬第到达终点时，他改变了策略。他告知美国总灵理会，要承认巴孛作为先驱的地位，承认巴哈欧拉作为创始人的地位，承认阿博都-巴哈作为信仰之典范的地位；要听从祂们启示的任何内容；要忠于并坚定地遵守教长遗嘱的内容；要与世界巴哈伊教务管理的精神与形式紧密相连：这些是成为信徒的基本和首要的条件。他说，这些是“主要因素”，而任何分析和进一步阐释的尝试都只能带来无谓的讨论和争议，对圣道的成长没有益处。在行文结束时，他敦促朋友们除非特殊情况，“不要进行生硬的划分”。

巴孛、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都是伟大的导师。他们的使命周期性质各不相同，但全都奉献给了一个崇高的使命，即将人类带入信仰那医治世人、带来和平、洗涤新生的帐篷之下。三十六年间，守基·阿芬第一次次地将我们召集到“把信仰传导给大众的伟大使命之下……”在他写给巴哈伊世界的最后一封《里兹万文告》中，他请我们相信：“这一使命……如此神圣、如此重要、如此紧急，涉及并挑战到了每一个个体；在一个正在崛起的秩序下，不断增加的机构的牢固和稳定必须以此为基础。在今年，这项任务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任何巴哈伊活动。”守基·阿芬第反复提醒我们，巴哈欧拉本人最为看重这一使命，并用如下引文来支持它：“巴哈的子民啊！宣扬上苍的圣道吧，因为上苍已命定，每个人都有责任宣扬祂的教义，并认为这是一切行为中最值得奖赏的善行。”“将你们的能量集中在传播上帝的信仰上。”“现在正是大声宣告之时。巴哈的人民要以无上的耐心和忍耐，努力带领世人进入那至大启端（即祂本人）。”“你们当不停地宣讲祂的圣道。较之过往与将来的所有财富，这于你们更有益，唯愿你们属明察此道理者……”

巴哈欧拉对圣道的传导给予了极大的重视，祂坚定地告诫追随者，如果谁不能亲自上前，“他就有义务指定一位能代替他宣扬启示的人”。1938年，守基·阿芬第写道，“关于传导的命令系于所有人身上”，每一位巴哈伊都应“全心关注”，而且每次会议期间，灵理会都要安排时间，“认真虔诚地思索能促进传导事业的方

法与途径”。

圣护清楚地指出，传导的人应该“从一开始，就要避免将过于强调律法和服从，以免给探索者刚刚萌醒的信仰施加过多压力……不要让他满足，直到他给自己蹒跚学步的灵性融入一种强烈的渴望，从而促使他独自站立起来，并反过来贡献出他的能量，去复苏其他灵魂，同时还要融入他对新接受的律法和原则的支持。”

如果把圣护关于传导的文章编纂成书，那一定会是一部巨著。但纵览全书，我们定会发现，其目标是明确的，其义务是固定的，其方法则是灵活多样的。守基·阿芬第用了大量笔墨，谈论新巴哈伊以及他们对巴哈欧拉的接受。他以“皈依者”、“候选人”、“公开的拥护者”、“新的信徒”，信仰“毫无保留的”支持者以及许多其他贴切、优美的名字称呼他们；在他口中，他们被“吸纳进来”、“皈依信仰”，他们“宣告了自己的信仰”，“拥抱信仰”，“加入到”巴哈欧拉的旗帜之下，“支持祂的圣道”，“加入到”虔诚者的“行列”，诸如此类。在一个陈腐俗套之语盛行的年代，我们应该记住这些话。需要补充的是，我从未听过他将人们承认上帝之至高显示者一事，贬低成那句用来形容灵性重生的糟糕无聊的言语：“他已写下名字。”守基·阿芬第从未因为某些词汇变得不流行而放弃对语言的正确使用。巴哈伊信仰没有牧师，也没有传教士，然而，巴哈伊们自己踏上了“传教之旅”，公开声明其旨在让人“皈依”。

第十五章　执行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

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开始于1937年，并将于1963年结束，由“三场连续”的远征组成。如果要对守基·阿芬第所称的第一阶段计划进行完整的描述，我们必须追溯历史，按时间顺序研究他的著作，因为它们清晰地反映了他对第一阶段的思考，以及他所拟定的计划模式。自从敬爱的教长离世之后，圣护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实现祂的愿望，完成祂的工作。神圣计划是祂在人类历史中一段最为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守基·阿芬第说，这是阿博都-巴哈“独到而又伟大的设想”，包含在寄给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的书简里，由此，北美大陆的巴哈欧拉追随者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二十年来，这份计划一直处于搁置状态，与此同时，教务管理机构逐渐建立起来，并得到完善，从而能够“有效、系统地执行计划”。圣护极为重视这个基本概念，时常强调其重要性，而我们却总是忘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来倾听他的原话。1939年，在首个七年计划的头几年，他致信美国社团：“他们动用手头所有的资源，不断地促进这个先驱运动的发展和巩固，他们的整个教务管理体制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规划设立的。”十八年后，守基·阿芬第对此仍持有相同的观点，因为在1957年8月，也就是在他即将去世之前，他在寄给一个欧洲国家的总灵理会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是，在重要的传导领域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个体信徒的皈依更是乏善可陈——整个教务管理体制最初就是为此而辛苦设立的。”

是圣护本人“辛苦设立”了这套体制，他从北美信徒那里得到了积极热情的帮助，他们能够领会他的思想，遵从他的命令，将他的指示迅速地付诸实践。唯有圣护一人拥有神圣不败的权力，能指挥巴哈欧拉的光明力量来对抗黑暗大军。“很快，”他写道，“今

日秩序将会落幕，新秩序将会降临。”它将打破人们所熟知的世界之根本平衡。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种下的幼苗不仅能理解祂们的远见卓识，还能组织祂们的教义和追随者。

1937年是首个七年计划的开端，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年入不惑的守基·阿芬第成为了一名统帅，领导着军队，也就是北美的巴哈伊，开始了对西半球的精神征服。那些世间所谓的伟大将领无非统领着浩浩大军四处烧杀抢掠，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犯下滔天罪行；而这名将军不为人知、不得认可、无人颂扬，却筹划进行着更为重要、更具影响的战役，让前者无法望其项背。那些人的战斗是出于国家仇恨和野心，而他的战斗是出于爱和自我牺牲；他们捍卫的是奄奄一息的理念和价值，是过去的秩序，而他却为未来而战，那是闪耀着和平与团结的时代，是世界大同的社会，到那时，上帝之王国将降临人间；那些人的名字和战斗都会渐渐被人遗忘，但是守基·阿芬第的名字和声望将会越来越响亮，他的伟大胜利将随他一起冉冉升起，永远被人铭记。象征他的才华和成就的太阳将会照耀一千年，成为巴哈伊天启之光中的一部分。

与圣护的计划有关的材料难以计数，当我们回顾它们时，一定要记住，尽管美洲信徒（不只是美国的巴哈伊，而是全部北美的信徒）首次有组织地执行阿博都-巴哈的灵性指令是在首个七年计划开始的时候，但是在此之前，美洲已经涌现出信仰的坚定信徒，其中大多数人都被守基·阿芬第称为“女性拓荒者”，她们的出现是为了积极响应1919年纽约第十一届巴哈伊年度代表大会上的《神圣计划书简集》的号召，她们踏上了澳大利亚、欧洲最北部的城市、美国中部各州、巴尔干半岛、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边缘、亚洲的一些国家，以及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三十六年来，守基·阿芬第从来没有忘记这些人的贡献，总是提及她们的名字。不过他也说，这些美洲巴哈伊的传导活动也一直处于“试探性”和“断断续续”的状态。随着第一个七年计划的展开，一个新的时代得以开始。

我们不清楚什么时候神圣计划会结束。相传彩虹触地之处会有一罐黄金，而我们荣耀彩虹的末端也会划入信仰的黄金时代。圣护

用大量篇章详细阐述了神圣计划的意义。他写道，这一计划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最重大的灵性事业”，是“发展世界教务管理体系最有效的途径”，是“东西各方世界秩序诞生和发展的主要部分”。北美的信仰者，这些“受到划时代书简所眷顾的人们”，这些“巴哈欧拉秩序破晓者的先驱”，将掌握上帝赐予的钥匙，即对神圣计划的传扬，有了它，他们就能打开大门，完成他们无比光荣的使命。守基·阿芬第请他们相信，当他们忠诚地逐步展开阿博都-巴哈的计划时，教长对他们的允诺就会在信仰的黄金时代得到实现：当歌颂他们的“崇高与伟大的赞歌”“响彻整个大地”时，他们就会升到“永恒国度的宝座”。

因为守基·阿芬第的存在，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计划，接着又是计划！在第一个七年计划开始后的岁月里，世界各地纷纷出现了十九月计划、双年计划、三年计划、四十五月计划、四年半计划、五年计划、六年计划以及其他的计划；不管这些计划是由他指派的，还是由巴哈伊自发制定的，他都知道该如何统筹安排。在神授命令之下，上天授予的使命被交给美洲信徒来完成，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只有服从教长《神圣计划书简集》的指引，只有赢得每次远征的胜利，他们才能完成这项使命；至于其他的计划，守基·阿芬第在1949年写道，它们“只是伟大事业的补充，其特征已经在同样的书简里得到阐释，从性质上讲，它们是区域性的，而不是世界范围内的。巴哈欧拉世界秩序的先锋建设者的使命是世界范围的，世界秩序最终必将建立起一个文明，他们便是这一文明的火炬手”。

如果说守基·阿芬第是将军，那么他的参谋长无疑就是美国灵理会了。美国灵理会直接接受他的命令，这种关系密切而又完整。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士兵，也就是他常说的“普通一兵”，正是一支军队的荣耀所在。他一直在向他们呼吁，一直激励着他们，爱护他们，告诉他们每个北美的信徒都有责任为神圣计划的成功而努力。他知道人容易偏离目标，所以反复念及那些承担起的任务，那些肩负起的责任，还有那些紧迫的需求。当不同的远征接近尾声，各项工作的成功悬而未决的时候，他总是奋起高呼，带领巴哈伊们

取得胜利。在阅读他与美洲信徒三十六年以来的通讯时，我们似乎感觉他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在他的生活、思想、祷词、计划和担忧之中，一直都有他们。他们给他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希望，从来没有让他陷入绝望，他们可以感到安慰。愿他们的记录毫无瑕疵。

守基·阿芬第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会在喷发前有所动静。1933年，他致电美国代表大会，说道，所有人都注视着你们，现在是释放力量的绝佳机会，这种力量将带来一个时代，一个光辉“盖过我们钟爱的圣道之英雄期”的时代，“至高天庭等着你们去把握”。1935年，在庆祝灵曦堂穹顶完工时，他给前来的巴哈伊发了一封更为详细的电报：“新的时刻来临了……号召开展全国性、系统性、持久性的传导运动……”十周以后，他变得更加明确，做出了坚定的预言，因为人们开始感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所带来的第一丝阴霾：“我们刚刚进入信仰形成期逐渐展开的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集中传导的阶段，同时，这也是一个愈发阴暗、普遍无能的年代，这个年代，充斥着日益增多的贫穷，以及衰败时期命运起伏的幻灭。”在给1936年的代表大会发去的电报中，他指出，当前的时机异常重要，敦促他们慎重思考“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书简集》里划时代的号召”，并为他们在全人类的“生存处于最危险境地的边缘”之时如何确保计划“完全实现”提出建议。最后，他献上了一直在他心中孕育的珍珠：“望美国各州、美洲各共和国在此辉煌世纪结束前，拥抱巴哈欧拉的信仰之光，打下祂世界秩序的基础。”我们启程了！这就是神圣计划的开场礼炮！

第一个七年计划有“三重任务”：第一，完成西方世界第一座灵曦堂的外部装饰工作；第二，在美国各州及加拿大各省成立一个地方灵理会；第三，在拉丁美洲各国建立一个中心。守基·阿芬第写道：“该计划主要是为了让上述地区加入巴哈欧拉的团体。”西半球的每一个国家都将“归于巴哈欧拉的胜利秩序之下”，他还向我们指出，这二十个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占到了世界主权国家的大约三分之一”，神圣计划不只是“在家乡和拉丁美洲同时展开的艰巨的双重战役”。

这次历史性的传导运动刚刚开始两年，欧洲就爆发了战争，又过了两年，美国以及差不多整个世界也加入了战争。七年以来，摆在新世界面前的是从未有过的巨大磨难和威胁。守基·阿芬第对神圣计划的这第一个伟大计划倾注了难以想象的关注、鼓励和指导。电报从他那里源源不断地发出，传到巴哈伊们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灵理会。1937年，他告知他们，这项计划的双重任务的实施给首个巴哈伊世纪的最后几年“所带来的光华不逊于那些在信仰英雄年代中象征其开端的非凡事迹”。1938年，他又告诉他们，旧世界“愈发阴暗”，他们的工作变得“重要而紧急”，一刻都不能轻视。拉丁美洲的运动是“信仰国际历史中最为荣耀的一页篇章”，未来的计划是否成功都维系于此。他在电报里称，它标志着“这项耽搁已久的世界任务已经开始，它是巴哈欧拉留给北美巴哈伊社团重要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史诗的开篇，其主题绝不亚于东西半球的精神征服”，尽管如此，“它还仅仅是个开始，是一种力量的尝试，只是为一场更加宏大的远征投石问路……”

计划开展两年后，灵曦堂的外部装饰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他的一系列热情号召和一笔九百英镑的捐款（他觉得此举是受到了一种“无法抵抗的驱策”，他对此“引以为豪”，因为，这可以帮助北美的九个州和省建立永久的拓荒点）保证了大后方的所有初步工作都实施到位。此时，守基·阿芬第开始挥舞手臂，指挥大军冲上中美洲的海岸和岛屿，追随着“阿博都-巴哈笔下的路线”，正如他在电报里说的那样。他不顾日渐加重的负担和烦忧，向朋友们表达了自己想跟北、中、南美洲的拓荒者保持个人联系的愿望，当时，拓荒者们“正坚守着他们在辽阔的美洲大地上星罗分布的阵地”。虽然只有那些收到信的人才能真正评判圣护的信件对他们的意义，但我自己常想，如果他没有和信徒建立联系，这次以及随后的远征是否还能成功。他的爱、鼓励和理解让他们安心守在岗位上。很多人还留在那里，就因为信上写着：“你真诚的兄弟，守基。”

“肆虐世界的大火”爆发一年之后，守基·阿芬第写道，这把火最先在远东燃起，摧毁了欧洲，包围了非洲，现在不仅威胁

到世界中心，还威胁到了美洲——他所说的信仰“首要的幸存堡垒”——只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还未接受拓荒者。“幸存堡垒”里的居民们已经履行了他们职责：气宇轩昂地“将神圣之火传至西半球诸国”。波斯的信徒受到迫害，信仰在俄国遭到解散，灵曦堂被没收，并处于危险之中；巴哈伊们在欧洲的西部、东南和中部都受到压制，在德国遭禁，在北非成为了极端宗教势力的主要攻击目标。随着战事发展，世界中心也面临着巨大危险。难怪守基·阿芬第这样寄语美洲的信徒：“不论东方西方，不论老少妇孺，不论自由民众还是奴隶，千百万教徒的希望和抱负”都指望于他们的“胜利完成”！难怪他呼吁他们，要“大胆尝试、不断开拓、尽力奉献、忍辱负重、毫不退缩，直到最后”。难怪他肯定地说：“他们这代人的生存处境有多么严峻，他们的任务就有多伟大。当黄昏笼罩在这日益沉沦的社会之上时，他们救赎使命的光芒就会变得更为耀眼。当今世界动荡不安，世界内的顽疾病象频出，他们的世界性宗教已断言，这些必将引向一场世界灾难，从中世界公民之意识才会诞生，单凭它就足以建立世界大同的结构，一个持久的世界和平必须以此为基础，继而开启一个标志着全人类成年的世界文明。”他说，“当看到慢慢瓦解的文明时”，他们已经“得到激励，开始行动”。如果他没用激昂的语言指明他们肩负的世界大势之任，他们永远不会得到激励。

在回眸战争中那些光荣而又可怕的年月时，第一个七年计划的成功看上去的确充满了神奇。当人类在欧亚遭受屠戮时，当信仰的世界中心陷入从未有过的危险时，当美国和加拿大被卷入世界冲突时，在随之而来的忧虑、束缚和愤怒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缺少资源却不乏信念，无甚名望却意志坚定，不仅成功将北美巴哈伊灵理会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不仅保证了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都至少有一个灵理会，而且提前十六个月完成耗资巨大的灵曦堂母堂的外部装饰，并在拉丁美洲二十国建立了强大的巴哈伊组织和十五个灵理会。在计划的最后几个月里，那支勇敢的军队，紧紧跟随着守基·阿芬第，在他的带领下，他们斗志昂扬，忘却了连续七年征战的疲惫，强攻下未完成的剩余工作。当第二个巴哈伊世纪的朝阳升

起时，它屹立在凯旋的旗帜之下。守基·阿芬第对他的队伍说，他和整个巴哈伊世界都对他们深怀感激，这种心情“难以言尽、难以形容”。他写道，这个集体“肩负起了超人的使命，充分地展现了它的价值”，堪称一个小奇迹。

二十年间，在守基·阿芬第的指导下，按照他提供的设想，巴哈伊编织出了一幅他使命周期中三次伟大远征的绣帷。在这幅忙忙碌碌、多姿多彩的场景中，在它描绘众多场所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见三个巨大的金色车轮——三场伟大的百年纪念，他将他的计划脉络织入这些历史性的事件中，从而形成更加美丽、更富表现力的纹饰。第一场百年纪念是在1944年5月23日举行的。幸好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巴哈伊社团还没有和世界中心的圣护失去联系，尽管有的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但还没有被战火吞没。波斯、伊拉克、埃及、印度、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半球都奇迹般地逃过一劫。所有这些社团都充分利用各国的客观条件，着手庆祝这场荣耀的巴孛宣示（它既是巴哈伊周期的开端，也是阿博都-巴哈的生日）的百年庆典。

尽管信仰诞生于波斯，这片土地的信徒却不能自由地开展全国性庆祝活动，以纪念信仰的首个百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缅怀天佑的巴孛。圣护本人对这个多灾多难的社团充满了关怀，他对总灵理会就纪念活动的举办方式作了详细指导。在巴孛的家乡设拉子，他的特别代表杰纳比·瓦利奥拉·瓦尔加（Jenabi Valíyu’lláh Varqá，胡古古拉的委托人），将一张珍贵的丝质地毯（守基·阿芬第亲自赠送的礼物）放入巴孛宣示使命的房间；在日落两小时十一分钟后，也就是巴孛在这个房间向穆拉·侯赛因（Mullá Husayn）宣告自己的身份一百年之后，总灵理会的成员和年度大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总灵理会成员应守基·阿芬第的要求，代表他拜倒在这个神圣地点的门坎前，吟唱《盖尤穆勒-艾斯玛》的第一段经文，接着，有人朗读了圣护的致东方巴哈伊的世纪通告，文中他赞美了巴孛，歌颂了百年前发生在这个神圣地点的事件的意义。

与此同时，另一个纪念活动在北美巴哈伊社团中开展，因为时逢信仰在西方建立五十周年。1943年，守基·阿芬第以其惯有的

洞见和方法，在一连串电报中向美洲巴哈伊阐明了他心目中纪念活动的举行方式，以及他让他们如此兴师动众的原因：“许多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社团都不便参加，连巴哈欧拉家乡的信徒都不能在这个荣耀的历史时刻来向他们敬爱的信仰致以敬意，而凭借其广度和深度”，它却“能够完全弥补这一缺憾”。他说，美洲的庆祝活动不仅仅是赞扬他们的辛劳，也是彰显东西方兄弟姐妹们的耕耘。

在百年纪念前，人们开展了一场面向全国的宣传活动，旨在通过报社、电台和出版物来传播巴哈欧拉的讯息，让公众了解信仰的目的、英雄、殉道者、传导者、拓荒者和行政人员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机构的本质。信徒在地方和全国范围都要举行庆典，通过讲座、会谈、晚宴和与重要领导人接洽的方式宣扬这一节日的欢乐本质。

节庆将在全美洲百年大会上达到顶峰，与会的不仅仅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他们首次由州和省级大会的全体信徒投票产生，而不是由具备地方灵理会条件的社团选举的），拉丁美洲每个国家都至少派了一名代表。就在巴孛启示的同一时刻，灵曦堂的礼堂里举行了一场庄严的感恩献礼仪式。仪式中，守基·阿芬第给出的唯一一幅巴孛微型肖像，以及他为这个备受喜爱的胜利社团所准备的特别礼物，都会放在这些受庇护的人面前，供他们瞻仰，接着会有一个公共集会，用以追念巴孛和阿博都-巴哈。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什么可以遮蔽“最为光耀的巴哈伊时代的第一个百年的胜利结束”。类似的活动也在其他国家举行，尽管规模没有这么浩大。守基·阿芬第说，这些国际节日的闭幕，标志着信仰形成期第一个阶段（从1921年到1944年）的结束。

百年之交正是审视巴哈伊世界的绝好时机。面对浩瀚如烟的资料，任何试图评价圣护工作的人都会对在如何看待他的成就上犯难。他不仅仅做出了伟大的事迹，而且还是一个能干、热情的统计员，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利用的。但这不就是生活的本质吗——从那些表面上看似无趣、不得不做、十分无聊的事情中生发兴致？

1944年，守基·阿芬第在海法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册子有二十六页厚，名为《巴哈伊信仰1844-1944》（*The Bahá'í Faith, 1844*

– *1944*），下面的副标题貌不惊人：《统计和比较资料》；1950年，美国巴哈伊出版协会在收到他提供的详尽数据后，出版了页数更多的类似小册子，有三十五页厚，并附有地图，上面写着“巴哈伊信仰之圣护，守基·阿芬第编”。1952年，他又鼓励英国和美国的总灵理会出版同样的册子，并提供了相关数据，册子上有着相同的标题，但这一次内容增加了一倍，时间是从1844年到1952年。守基·阿芬第给它加了一个新的副标题：《十年国际传导和巩固计划》。

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来观察这个宏大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对其完全忽视，则又是愧对于守基·阿芬第十三年来为这项工作所倾注的关心和时间。大多数人都容易犯错，效率低下，而搜集这些资料本身就代表了守基·阿芬第超人的成就。要从它们当中得出事实又需要多大的付出呢？他一直保持数据的更新，在他去世时，他的卧室里还放着常用的小笔记本，用来记录最新的数据。记得有一次，他一边拿起本子一边微笑着问我：“你有没有意识到，整个巴哈伊世界都在这里面？”

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这些数据，我们必须理解数据后面守基·阿芬第的所思所想。事实胜于雄辩。他们可以排斥意见，否认观点，漠视历史，但是当冷峻的印刷体告诉他们某物价值五百五十万美元时，或者七个国家的巴哈伊灵理会已经成立，或者巴哈伊婚礼仪式已经在十五个国家完全合法，或者当人们念出那些在信仰占有一席之地的非洲部落的名字，说出教义的译文种类时，他们不得不接受信仰已深入人心这一事实。事实是守基·阿芬第的武器之一，他用来抵御敌人，捍卫信仰，激励巴哈伊，并让他们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最珍视的一份名单是他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一份，它反应的是光荣圣道的传播，由阿博都-巴哈于1921年托付于他。在“接受巴哈欧拉信仰的国家”一栏下，他写下了不同时期的数目，巴孛时期：两个；巴哈欧拉时期：十三个；阿博都-巴哈时期：二十个。守基·阿芬第的谨慎作风颇耐人寻味，因为在1944年的册子里，巴哈欧拉时期只有十个。那为什么在1952年的册子里，守基·阿芬第会写十三个呢？因为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而原来沙俄的两

块领土已经成为苏联的四个共和国——这就是多出来的三个，它们使巴哈欧拉时期的数字得以增加。否则它们能去哪里呢？这些数字令人惊叹地反映了我们信仰的拓展速度。只要有数据可查，我会继续提供这些数字，一直到圣护去世的那一年。从1844年到1921年，三十五个国家（巴哈伊的目标包括了主权国家、委任统治地区、非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已经向信仰开放。从1921年到1932年，十一年内增加了五个；从1932年到1944年，十二年间增加了三十八个；从1951年到1952年，一年内增加了二十二个；从1952年到1953年，没有增加；从1953到1954年，一年内增加了一百个，守基·阿芬第写道，这项成就标志着“十年计划中最重要、最宏大的目标”已经“在十年伟大事业的第一年结束之前基本完成”。现在，根据巴哈伊的目标，世界上剩下的国家就不多了！即便如此，从1954年到1957年又增加了二十六个国家。当守基·阿芬第成为圣护时，一共有三十五个国家，但当他去世时，凭借他的洞见、激励和决心，凭借全世界那些忠诚、点燃灵性的信徒，这个数字变成了二百五十四个——增加了二百一十九个。

尽管没有关于全球巴哈伊居住中心的精确数字（守基·阿芬第称其为“无往不胜之天启的温暖与医治之光的所在”），但在信仰的第一个百年里，它们的数量可能不到一千。1952年的一项粗略调查显示有两千四百个。守基·阿芬第亲自公布了如下数字：1953年，两千五百个；1954年，近两千九百个；1955年，远超过三千二百个；1956年，接近三千七百个；1957年，四千五百个。不到五年时间就增加了两千多个。

其中体现的总体形势既清晰又惊人。但是，巴哈伊之树的哪一部分成长地最快呢？这也在圣护发布的数字中得到了体现。当阿博都-巴哈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历史性访问时，巴哈伊信仰已经传播到了西半球的大约四十个地区。到1937年，这个数量达到了三百个，二十五年内增长了二百六十个。到1944年，北美的中心骤增至一千三百个，在第一个七年计划期间增加了一千多个。1957年10月，守基·阿芬第发出了最后一份数据——一千五百七十个。在他三十六年的使命周期中，凭借源源不断的电文鼓舞与激励，通过连

续几次计划的实施，仅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有超过一千五百个中心建立了起来。北美地方灵理会发展也毫不逊色：1931年有四十七个，1944年有一百三十一个，十三年间增加了八十四个，大多数是在和第一个七年计划有关的运动中出现的。到1952年已经有一百八十四个，1957年4月，总数则达到了二百零四个。

1944年，守基·阿芬第发布了第一份拉丁美洲的资料，列出了五十七个中心和十五个灵理会；1950年，当地已经有七十个中心和三十五个灵理会。到他去世时，中心的数量已经扩大到一百三十七个，灵理会也扩增到五十二个左右。在1921年到1944年的手册里，他列出了印度（包括后来的巴基斯坦）和缅甸的资料，一共有六十六个中心，三十一个灵理会；到1957年，这个数字分别变成了一百四十个和五十个。因为长期的反复迫害，波斯方面的数据一向很难获得，但守基·阿芬第还是在1952年公布了一组数字——六百二十一个中心和二百六十个灵理会。在守基·阿芬第的特别关注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他的使命周期内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尽管它们和别的巴哈伊世界远隔千里：1934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八个中心，三个灵理会，到1950年，它们有五十九个中心（十六年内增加了五十多个）和十个灵理会；到1957年，已经有了一百个中心和十二或十三个灵理会。不列颠群岛上的数量也出现了显著增长：1944年，只有若干个中心和五个灵理会，1957年，中心超过了一百一十个，灵理会则达到二十个。守基·阿芬第在1950年第一次列出了德国和奥地利的资料，它们共有三十四个中心和十四个灵理会（战前的数量大致分别为十五个和五个）；1957年，已经有超过一百三十个中心和二十五个灵理会。

随着第二个七年计划的进行，新的名单出现在了1950年的手册上，“欧洲十目标国”有三十四个中心和十四个灵理会；1957年，这个数字猛增至一百一十个中心和二十七或二十八个灵理会。圣护谨慎地补充了阿拉伯地区的数字（从1950年到1957年都没有变过）：十个中心，这个数字可能是整个巴哈伊世界里最难获得的。在与穆斯林偏见的长期斗争中，1952年的埃及和苏丹有了三十八个中心和十个灵理会。1956年，守基·阿芬第宣布，全世界共有九百

多个巴哈伊灵理会。到1957年，他告诉巴哈伊们，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一千多个。要知道，1921年，阿博都-巴哈离世的时候，东西方一共就只有十几个灵理会。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在教长本人打下的基础上，守基·阿芬第创造出了这一切。

除了建立教务机构的基石，保证信仰的快速传播外，圣护还特别关注巴哈伊文献，以保证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得到不同语言版本的巴哈伊著作。很多翻译和出版工作都是由他提供资金；更多的时候，玛莎·鲁特一直为他代理着这份十分重要的工作，直到她于1939年去世。1944年，巴哈伊出版物被译为四十一种文字；1950年，增加了十九种；到1952年，已经有了七十一种，两年后又增加了十一种；195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一百六十七种，三年内增加了至少九十六种； 1957年达到二百三十七种，两年内增加了七十多种。有意思的是，每当“出版语言”的名单列出来后，马上就会有一份新的名单，名为“巴哈伊文献正在被翻译成的语言的数量”。

他不仅热情欢迎各民族加入信仰，而且总是鼓励巴哈伊深入到不同的种族中去，好让“多元化团结”这个主要原则得到佐证。这一点在他的两组数据里得到了体现，其中第二组数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对这条教义的重视，仅它们的标题就能说明问题，标题为《巴哈伊世界社团中的种族》，资料依照种族名称列举了出来：1944年有三十一个种族，1955年有四十个左右的种族。《巴哈伊与之建立联系的少数群体和种族》名单同样也依照种族名称列举：1944年有九个，1952年增加到十五个，其中十二个是美国的爱斯基摩与印第安部落。1952年，他又加了一个标题（尽管其下数据并不起眼）：《巴哈伊信仰的非洲部落》，自豪地给出了十二个部落的名称。他还定期公布增长数据：1955年，九十个；1956年，一百四十个；1957年，一百九十七个，五年内增加了一百八十五个。1954年，他告知巴哈伊世界，仅乌干达一国就有超过五百名非洲信徒（整个大陆的追随者估计有八百人），到1957年，非洲信徒到达三千多名。他对我们当下的种族问题非常关心，强烈地意识到上帝给不同的人群赋予了不同的特质，他十分愿意分享这些伟大的胜利。1956年，他宣告大洋洲已经建立了一百七十个巴哈伊中心，

1957年，他告诉我们这个数字增加到了二百一十个，而该地区棕色人种的信徒已经超过两千人。

信仰的机构和捐赠的增长是一道坚固的城墙，它保护着正在走向成熟的教务管理体制，守基·阿芬第对此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巴哈欧拉到这个世上帮助我们梦想，这不是梦，祂给了我们一个设计，我们可以以此创造现实。注册机构能合法地拥有财产。发展中的信仰应当拥有自己的灵曦堂、国家和地方总部、机构、土地以及学校等，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相关数字雄辩地说明了圣护使命周期内的成绩：1944年，共有五个注册的总灵理会和六十三个地方注册灵理会，它们分布在多个国家里；1952年，这个数字分别为九个和一百零五个；到1957年，有超过二百个注册的巴哈伊地方灵理会，十三年内增加了一百三十七个。1944年，在第二个巴哈伊百年之初，只有几个地方获得巴哈伊婚礼合法地位，到1957年，超过三十个地区的巴哈伊们享受到了这项权利，巴哈伊节日在四十五个地区得到认可，成为暂停工作或学习的正当理由，这些地区包括国家、州和区。1952年，巴哈伊只有八个国家总部，到1957年已经有四十八个；国家捐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年，有五十项捐赠在世界多个国家的首都建立起来。

发展中的信仰也有同样快速增长的金融资产。从守基·阿芬第多年来不断发布的数字来看，各国的巴哈伊财产都有迅猛的增长：美国，1944年，约值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九美元；1950年，一百七十八万三千九百五十八美元；1952年，三百零七万九百五十八美元；1957年10月，接近五百万美元。波斯，1952年，约值五十万美元；1957年，增至五百万美元。1947年，守基·阿芬第列出了圣地的巴哈伊世界中心的数据：三万五千英镑（合十四万美元）；1952年，五十万美元；1957年，五百五十万美元。他还给出了其他国家的数据，1952年为五十万美元，1957年为五百五十万美元。保守估计，这些数字的总和在1952年为四百五十万美元，1957年则为一千六百三十五万美元。

守基·阿芬第发布的三本统计手册不仅信息丰富，还可以让我们借此一窥他的想法，因为它们反映出了圣护所珍视的东西。其

中，在记有重大历史日期的几份名单上，除了巴哈伊历史的重要日期外，还列有西方第一座灵曦堂和巴孛陵殿的建设日期，埃及穆罕默德法庭裁定信仰为独立宗教的日期，玛莎·鲁特第一次觐见罗马尼亚玛丽王后的日期，国际联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支持巴哈伊主张的消息传到巴哈欧拉在巴格达的故居的日期，各种计划成形的日期，诸如此类。没有一个日期表明，信仰曾有过圣护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告诉我们，不要举行任何与他相关的周年纪念，这样的纪念日不要出现在名单之中。手册列举了巴孛和巴哈欧拉最著名的著作，誊写了巴哈伊日历，记下了阿博都-巴哈在三年旅行中访问过的城市，印有一份格陵兰中心（巴哈伊著作曾被寄往那里）的名单，还列出了赞颂巴哈伊信仰的人的名字以及其他信息。每份新的手册里都有一份很奇怪的短名单："著名穹顶建筑比较。"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清真寺，罗马万神殿——这些被单独列了出来。这是一份发人深思的名单。他是否预见到，有一天巴哈伊会为了天父的荣耀，建造气势更为恢宏的灵曦堂呢？

随着每次统计数字的发布，总灵理会的数量也在增加。它们是未来世界正义院的"支柱"，守基·阿芬第把它们的成立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很少有巴哈伊记得1930年提及的九个名字：高加索、埃及、英国、德国、印度和缅甸、伊拉克、波斯、突厥斯坦，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总灵理会。尽管俄国的两个和波斯的一个灵理会都属于过渡性质（有一个中央灵理会承担着未来总灵理会的职能，直到国家代表可以进行有效的选举），但不管怎样，它们还是在履行总灵理会的职能。由于俄国所有的巴哈伊活动都受到压制，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的总灵理会完全解散，因此到第一个巴哈伊世纪末，只剩下了八个总灵理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在1934年成立了总灵理会。

巴哈伊世界最早的总灵理会是美国加拿大灵理会，在阿博都-巴哈离世时它就已经建立，名为"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体"；1909年，该机构注册，其"执行委员会"在同年成立。1921年，当圣护掌舵时，他立刻设定了统一的基本原则，从此以后，这些未来的

“二级正义院”都被称为“总灵理会”。到1923年，英国、德国、印度和缅甸的总灵理会已经开始运作，很快，埃及、苏丹、波斯、伊拉克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紧随其后。尽管圣护渴望这些新的“支柱”竖立起来，但是他还是必须确认社团要足够强大（尤其要有地方灵理会的强大基础），之后，他才能允许人们选举出全国机构。1948年，他让加拿大开始了其独立的教务使命，1951年，又有另外两个总灵理会加入进来，一个在中美洲，另一个在南美洲。守基·阿芬第很清楚为何要将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统一在一个总灵理会之下，他在1929年曾对印度的巴哈伊朝圣者做过解释，这位朝圣者写下了他当时的话：“他反对将缅甸和印度分开，因为他说我们的人手不足，分离只能削弱我们的力量和能量，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加强我们所有的资源和力量……”

随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两个大型机构的成立（它们的名称虽然是总灵理会，但是其组成和职能却是区域性的），教务管理进入了新的一页。守基·阿芬第从来没有被工作的繁冗或难度吓倒，他也从来不盲从于现有的观点和方法。九年的时间里，他专心建立起这些庞大的国家“区域”灵理会（1953年选举产生的巴哈伊意大利和瑞士灵理会除外），其规模非常大。这两个拉丁美洲机构包括了二十个国家，于1956年成立的四个非洲国家的总灵理会则代表了五十七个地区。这意味着九个人要来过问和管理分散在上万平方公里的组织事务，而大部分的灵理会和社团都很年轻，没有经验，彼此分散，这九个人彼此也相距千里之遥。毫无疑问，如果守基·阿芬第让巴哈伊们来出谋划策，这项事业中的智慧就会遭到质疑，他们要么会提议建立真正的总灵理会，要么会说至少缩小一下区域灵理会的规模。所幸的是，圣护没有向他人咨询，他以清晰果断的头脑，揣度出这两套方案中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并选择了看上去很笨拙的方案。如此选择涉及很多因素，主要原因是，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急需更为集中的工作指导，其他国家的总灵理会的委员会正在进行神圣计划的后期工作，它们已经不能有效地对其羽翼下的星罗分布的基层进行管理，即便它们十分能干和敬业。另外，信仰在新地区的主要传导目标是让新的皈依者能够承担起当地工作的责

任。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有了一批优秀的、有经验的巴哈伊拓荒者、管理者和传导者，但要完成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二十个独立的行政机构里的工作，人数还是不够，更不可能满足非洲五十七个地区对有经验的巴哈伊的需要。解决方法就是让这些临时的总灵理会分成更小的单位，直到每个国家都发展起足够强大的地方灵理会网络，组织起更为成熟的信徒，他们要对刚刚接纳的教义更加熟悉，能够在自己的地区肩负起管理和发展圣道的责任。在守基·阿芬第不断的鞭策和鼓励下，这些区域灵理会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它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证明了圣护是正确的。

在决定将哪些国家放在同一个总灵理会之下时，圣护充分展示了一个事实，即巴哈伊不仅是国际性的，在他们的信条和政策里，他们超越国界，而且是在国家之上的。国家偏见、政治敌对或者宗教分歧都不能影响到他对将在同一个灵理会工作的人员的选择。对他而言，这种世俗的观点不应考虑，尽管他潜心研究时事，从未忽视现实。他运用的是信仰里那些神圣的力量。他曾用美妙的文字表示，这信仰“吸收着……上天力量的隐秘泉水的滋养”，并“用神秘的、迥异于普罗大众所接受的方式来传播自己”。

直到1957年，他才重启了真正的总灵理会的组织工作；这一年的4月，阿拉斯加、巴基斯坦和新西兰选出了它们永久的巴哈伊机构。这是教务管理体制形成中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因为那一年至少有十一个总灵理会在同一时期成立，其他地区则成立了区域灵理会，包括东北亚、东南亚、荷比卢（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阿拉伯、伊比利亚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安的列斯群岛、南美洲北部国家，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新的机构。原来南美洲和中美洲的两个总灵理会变成了南美两个较小的区域灵理会，中美洲的机构则被削减，一些岛国加入了它们自己的灵理会。在守基·阿芬第的最后一次伟大远征临近结束时，拉丁美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独立的总灵理会，而这正是他的计划。1953年，也就是信仰新一个百年的前夕，他把“十年国际巴哈伊传导和巩固计划”纳入了当时出版的手册中，以此作为最振奋人心也是最负挑战的任务之一，因为这意味着要把总灵理会的数量增加到五十余个，相当于当前数量的

四倍。

这些只是对守基·阿芬第所取得成绩的简短评价，无法详细记述在他的使命周期内各国所取得的进步。这需要记录一段完整的历史，而且要对逐渐汇集到世界中心的数据进行大量研究。因为他总是从最宏观的大局来看待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必须努力跟随这颗彗星划过天空时的路线。对这颗星球的精神征服（这是巴哈欧拉教义公开宣告的目的）与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的执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美洲信徒在连续的远征中实践计划赋予他们的使命时，在整个巴哈伊世界中，一种强大的力量被释放了出来，并且不断增强。如果把北美的社团看作喜马拉雅山（这是上帝圣道传播力量的巨大分水岭），其他社团则可看成涓涓溪流，它们汇入自己开凿的大河中，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浇灌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

第一个七年计划的成就给其他社团树立了榜样，并激励着他们也去勇敢尝试。圣护给许多国家的总灵理会传达了鼓舞的信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巴哈伊的第二个百年到来之前，会有荣耀的奉献机会摆在巴哈伊世界面前。他经常援引巴哈欧拉的训谕："彼此争锋，服务上帝和圣道"，公开提倡最高贵的竞争精神。引用数据就是他的一种方式。1941年，他在致电美国时说："在首个巴哈伊世纪行将结束时，灵性竞争激励着东西方组织起来的巴哈欧拉追随者，鼓舞着他们的斗志。"随后的文字更加容易理解，他宣扬道，这就是全球五大洲巴哈伊团结的象征，好比一架罗马马车的赛马，每一匹都奋力狂奔，但都一同向前。如果说这种宣扬形同竞价拍卖，那是一种不敬。但是，他总是毫不迟疑地告诉他的武士，前面有金羊毛等着他们去赢取；问题是，谁会得到呢？这种鼓励无疑是神圣的，同时也充满了温情和人性，充满了活力和刺激！

圣护不断给波斯发去鼓舞人心的电报，将第一个七年计划期间取得的胜利告知那里的信徒。1943年，守基·阿芬第在电报里说，这些胜利"让巴哈伊世界的东方社团肃然起敬，倍感欣喜……九十五个波斯家庭仿效美国信徒的拓荒者"背井离乡，前往阿富汗、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苏莱曼尼亚、希贾兹（Hejaz）和巴林，高高举起了信仰的旗帜。印度和埃及跃跃欲试，伊拉克的巴

哈伊也积极筹划自己的计划，为第一个百年的落幕献上自己的胜利果实。东西方的巴哈伊都在最后书写着他们在信仰首个世纪的华丽篇章。

在1944年5月的庆典过后三个月，圣护告诉北美社团：“巴哈欧拉信仰在西方的历史已经翻过了这难忘的一页。新的一章现在开始了，美洲信徒曾经无所畏惧地开启了阿博都-巴哈伟大计划的第一步，气宇轩昂地赢得了最为耀眼的胜利，而新的一章在结束前，必定会让之前的成就黯然失色。”他们面前是“一个由一系列远征组成的新阶段……他们有幸接收到了划世代的书简，新的运动要带他们超越西半球，直达世界尽头，去竖立旗帜，打下巴哈欧拉信仰的教务管理结构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这个星球上，做事的方式并不太多。正确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守基·阿芬第是一个精神领袖，领导着一支精神军队，去夺取精神胜利，但他的作战方式却很古老：组织队伍、布好战法、攻击目标、占领地盘、保持基地通讯的顺畅、派出支援、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营地、一鼓作气开始下一次作战。当英明的军队统领越来越有经验时，战役之间就变得越来越紧凑。守基·阿芬第的计划也是如此。

赢得第一场战役后，他随即巩固了胜利：他告诉美国总灵理会，要保护好辛苦建立的地方灵理会，把团体提到灵理会的地位，增加中心的数量，向大众传播信仰，让新加入的信徒加深对信仰的理解。另外，为了拉丁美洲的工作，要翻译和出版更多的巴哈伊文献；最重要的是，还没有灵理会的国家都要开始着手成立。

守基·阿芬第在第二个七年计划启动仪式上说，在美洲信徒的世界任务的第一阶段（和第一个七年计划同时结束）与第二阶段之间，是一段“两年的间歇”。在圣护如是指出之前，美洲社团不太可能意识到，他们在1944年到1946年间的辛苦劳作（其范围从西半球北边的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南边的马加来恩）其实是一种“休整”。一个“饱受战争摧残、希望破灭、土崩瓦解的社会”在六年后停止了战争，欧洲在1945年夏季终止敌对，开始擦拭自身伤口，这个时候，守基·阿芬第告诉巴哈伊神圣计划的美洲执行者们，他们必须“摩拳擦掌、备好资源”，准备迎接他们命运的新篇章。他

在第二个七年计划开启的前几个月发出了这样的号召，美洲信徒的心理和感情深受感召。他告诉这些“巴哈欧拉信仰的使节们”：欧洲那些“满怀悲伤、被战火蹂躏、茫然无措的国家及人民”在等待信仰来抚平伤痛，正如当年的美洲。德国和缅甸是两个历史悠久而又饱受考验的社团，当圣护得知它们的信徒身处困境时，他深受触动，忧心忡忡，急忙号召“那些受到庇护、故土免遭侵略之苦、逃脱邪恶和痛苦侵扰的兄弟”立刻齐心帮助，以减轻他们的苦难。他特地请求美洲社团，在战争时期，他们是“东西方所有姐妹社团中受伤害最少的一个”，而且承蒙庇护，胜利执行了如此浩大的计划，他让他们竭尽所能，在资金和其他可能的方面提供帮助。

第二个七年计划，即“美洲巴哈伊历史上的第二次集体行动”，在1946年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开始。从1921年起，所有的工作似乎都井井有条，信仰建立了强有力的教务机构，北美社团在七年内发展到了美国的每个州和加拿大的每个省，中心的数量从三百个增加到了一千个，精神征战在拉丁美洲取得了成功，这一切都旨在将西半球融合为一个大家庭，从中，新世界就能够向旧世界——欧洲，它的祖先的大陆——有组织地进军了。守基·阿芬第再次召集了一支小型军队，他告诉朋友们：“巴哈欧拉的精神军团已经就位。”美洲，旧世界的孩子，已经是一个羽翼丰满的年轻巨人了，充满着能量与活力，肩负使命，准备返回，正如守基·阿芬第所言：“在几十年后，完成伊斯兰教没有实现的对这片大陆的精神征服，它一直以来就被视为基督世界的母亲、美洲文化的源头、西方文明的干流……”

我们又一次看见，守基·阿芬第宏伟绣帷中的构思，变成又一轮闪耀的光环。他告诉我们，这一次，信仰在1953年的第二个百年纪念将会庆祝“第九年”，也就是巴哈欧拉的先知使命在德黑兰的西亚查尔监狱神秘诞生的年份。

在新计划的目标里，欧洲成了“重点”对象，因此这份计划后来也被人称为“欧洲运动”，其内容如下：巩固在美洲的成绩；完成西方灵曦堂母堂的内部装饰，以庆祝它在1953年的五十周年纪念；通过加拿大、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的总灵理会，选举出三名未

来世界正义院的核心人员；在欧洲开展系统性的传导活动，旨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挪威、瑞典和丹麦）和意大利建立灵理会。在电报的最后，圣护称自己会出资一万美元，作为第一笔援助，用来支持“肩负多重任务的光荣远征，其远胜于巴哈欧拉信仰追随者在首个巴哈伊世纪所建之功。”

六周后，守基·阿芬第电告美国总灵理会，敦促其应该迅速向欧洲派遣那“九名能干的拓荒者”，去尽可能多的国家，卢森堡公国需要增加到低地国家的名单里，瑞士也要被加进去。这两个国家，加上之前的八国，成为了我们巴哈伊词汇里的“十目标国”。一段时间以后，鉴于北欧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芬兰也被加进了计划。尽管除了英国和德国以外，巴哈伊还生活在法国、瑞士、挪威、瑞典、丹麦、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也许还生活在其他地方，但很多时候，他们过于孤立，或者饱受压迫，不能进行大规模的传导活动。随着这项组织严密的系统计划在“饱受战火、灵性匮乏”的欧洲得到开展，美洲社团现在“在两个半球都启动了系统性远征的更为辉煌的新阶段，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在时机成熟时完成对整个星球的精神征服”。这意味着美洲社团要在三十个国家辛勤劳作，还要保证打好1948年加拿大总灵理会选举的基础，在该国的很多省份里，重要的地方灵理会大多刚刚建立，还很弱小。

这些身处大后方的信徒最多时共有几千名，他们英雄般地与许多巨兽搏斗，并最终制服它们，而圣护对他们的爱和敬慕也与日俱增。尽管他偶尔会修辞性地使用“我们”一词，在新计划初始时的一段感人至深的电文中，他所使用的“我们”却明显地表现出，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看成了美洲追随者的一员，而他们一听到圣护的声音，就至死不渝地跟随着他：“我们过于靠近这座亲手搭建的宏伟大厦……反而不能审视我们的贡献，身为阿博都-巴哈命令的执行者、巴哈欧拉秩序的先锋建设者以及以神圣秩序为动力和前身的文明火炬手，我们现在被引导着……去创造信仰的世界胜利……”确然，他们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守基·阿芬第说，无需这么早就试图预见新计划将走向何方，完成现时的职责就足够了，未来要看现在的努力。不能错失任何机会，不能逃避任何责任，不能敷衍任何工作，不能拖延任何决定。所有资源，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要集中起来应对眼前的工作；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不管他们的工作多么卑微、多么有限、多么不起眼，直到每一份力量都用完，人们才能“疲惫但又充满幸福”，那允诺的庄稼便获得丰收。欧洲大陆“动荡不安、政治混乱、经济停顿、灵性干涸”，但是美洲社团必须在这个舞台上翻开“跨大西洋传导事业的第一页”，“进入那幻想破灭的人群中，这群人中有着多种多样的族裔、语言和世界观，他们在灵性上一贫如洗，他们因恐惧而瘫痪，他们的思想充满困惑，他们的道德标准十分低下，他们因内部的分裂而土崩瓦解……”

当第二个七年计划的拓荒者刚刚开始他们的任务时，欧洲只有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巴哈伊社团，即不列颠群岛和德国的社团，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战前都有总灵理会在活动；第一个从没有间断工作，第二个于1937年被纳粹政府解散，所有巴哈伊活动正式停止，现在正在重新组建，并无畏地把受到战争折磨的信徒们聚集起来。靠着这些条件，美国总灵理会的欧洲传导委员会和“十目标国”计划中日益增多的拓荒者密切合作。工作进展极其顺利，到新计划的第二年，这些国家里已经成立了八个新的地方灵理会，随着工作的继续深入，圣护扩大了目标，把芬兰也囊括了进来。

圣护保持着第一个七年计划实施时的热情，开始跟随第二个计划的发展轨迹。1948年，他告诉朋友们，美洲巴哈伊社团的“首要地位得到再次的肯定、完全的证明和彻底的保护”；“在试图保持其在姊妹社团中的领导地位”时，它让“东西方的几个社团充满了崇敬和羡慕”。守基·阿芬第指出，欧洲的胜利更值得赞扬，因为其环境和条件比拉丁美洲更为不利，更具有挑战性。尽管从肉体痛苦的角度而言，战争的影响已经逐渐过去，但阻碍巴哈欧拉圣道向欧洲人民传递的根本障碍并未改变。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一如他在1946年所做的那样，守基·阿芬第在给某总灵理会写信时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道：“巴哈伊要时刻想着用巴哈欧拉的启示照

亮他们同胞的心灵，他们要每天与这些人来往，而对方本性极度保守，沉浸在传统之中，大多受到宗教传统的束缚，深陷物质主义，安于已经实现的标准”，巴哈伊必须“意识到，这项工作极度缓慢，非常艰巨，而且常常让人感到沮丧……但是这些种子在逐渐被种下……”他向他们保证道：“这无知的一代人早晚要经历苦难，作为其结果，到指定的时候，这些种子会在上帝的保护下发芽，并结出令人惊讶的丰硕果实，因为他们会满是惊讶地看到丰收的果实。”

这场伟大的欧洲事业极大地激发了全世界的巴哈伊，包括拉丁美洲的新社团——他们甚至派了自己的拓荒者来协助这场新的远征。就在这时，身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的美国巴哈伊发现他们遇到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因为成本突然增加，他们挚爱的灵曦堂（其内部装潢的设计一点也不比外部逊色，而且使用同一种材料）所需的建筑经费骤增。守基·阿芬第的队伍陷入了困境。他仔细地调查了这件事，立刻决定采取必要措施来挽救。他对轻重缓急的区分让人看后茅塞顿开：有的预算资金被用于重要的欧洲工作，以及发展和维护拉丁美洲和北美宝贵的灵理会和中心，这些资金不能削减；美国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巴哈伊新闻》的印刷都是必需的；但是其他的活动，比如宣传、出版和夏季学校可以被“大力裁减，或者暂停两年”（1949年和1950年）。和任何一位指挥战斗的伟大统帅一样，他要保护好三样东西：他的前线、他行动的“核心基地”（他的原话）和他的补给线。但在1951年，圣护也开始考虑，不应该只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而是要让整个巴哈伊世界携起手来。巴孛陵殿的修建（他刚刚签下了一份有关陵墓石工部分的工程协议）、国际巴哈伊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圣地日渐繁多的工作促使他向所有国家的总灵理会、地方灵理会和个体信徒发出呼吁，让他们缩减预算，用巨大的付出和牺牲来支持世界中心。他在电报里写道：“困难时期首先使美国巴哈伊社团受到了影响，如今扩大到了整个巴哈伊世界。至关重要的、光荣的国际事业亟需资金支持。”到1950年，美国的巴哈伊已经筹集到了五十万美元，可以用来装饰他们灵曦堂的内部，就这样，他们战胜了沉重的财务负担。

规模较小的加拿大社团是美国社团执行神圣计划的合作伙伴。它从1948年开始独立发展，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它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圣护为其指定的五年计划之中，无法给美国的信徒主体提供太多帮助，而在1951年成立的另外两个新的总灵理会（一个在中美洲，一个在南美洲）让美国信徒的承受力、资源和勇气受到了更严峻的考验。尽管有这么多的负担，他们在第二个七年计划里仍然成绩斐然、捷报频传。这个具备真正英雄气质的社团每年都在证明他们没有辜负阿博都-巴哈的巨大希望和信任，守基·阿芬第对其深表满意。所以，圣护在1950年夏说道，在“充满悲恸记忆”的巴孛殉道的百年纪念上，应该让该社团决定在巴哈欧拉使命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上——正好也是第二个七年计划结束的时候——献上一份“价值连城、适当得体的五重大礼……呈上巴哈欧拉信仰的圣坛”，这份礼物就是：巩固已建立的北美机构的基础；培养未来世界正义院在拉丁美洲的两名核心人物；保持完成“欧洲十目标国”任务的工作力度；完成灵曦堂的内部装饰；帮助圣地世界中心完成一座更为神圣的建筑的上层结构。尽管他们还是个“处于困境、尚未成熟的社团”，但守基·阿芬第还是提醒道：“尚未利用的上天力量可以释放出无穷的潜能，如果他们勤勤恳恳，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上天会毫不迟疑地为他们释放能量。”

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赢得了如此多的胜利（还要算上这次远征的最后他们在非洲大陆的服务，最初的计划本没有这一部分），远超战后笼罩世界的阴云中那些隐约闪现的、模糊的收获，这使得圣护将其当作巴哈欧拉圣坛上的第六重礼物，他称其为伟大欧洲计划中“最迷人的果实”。1952年，他在电报里说，在“美洲社团的第二个七年计划结束前”，应该建立起意大利和瑞士的巴哈伊总灵理会，并说：“建议欧洲传导委员会，在荣耀事业完成之际，正式邀请新成立的总灵理会之灵性幼苗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姐妹总灵理会参加同年8月在瑞典首都举行的洲际大会。”他解释道，他计划单独给巴哈伊世界最年轻的灵理会一项任务，作为第二个和第三个百年庆典之间的全球远征的一部分。对圣护而言，这已成为惯例，他要让这些新生的国家巴哈伊幼儿们口里含着使命呱呱坠地！

可以想象，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在获悉这个消息时会有多么地兴奋、高昂和激动。他们看到，近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敬爱的“真正的兄弟”，用他的谦逊、赞扬和体贴让他们相信，所有的奇迹都属于他们。在十年里，意大利从一无所有，到建立起一个足够强大的地方灵理会，而且与瑞士的灵理会一道，承担起了一个独立总灵理会的责任，这简直超出了任何人的狂想。

在第一个巴哈伊百年结束时，圣护就反复提到第三个七年计划。要理解（哪怕只是一知半解）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十年计划，我们必须明白信仰的一项基本教义。当公正、慈爱的上帝想让人有所作为时，祂必赐予他力量。荣幸中总是包含着责任，群体如此，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他们得到的恩典和支持，与他们履行的责任相符；他们受到的惩罚与剥夺，自与他们遭受的失败相当。守基·阿芬第在第一个七年计划里就这样写道：“若辜负这次绝好机遇，就……意味着失去了上帝所赋予美洲巴哈伊社团最珍贵的特有权利。”阿博都-巴哈曾说：“上帝之王国拥有无穷力量。若王国之援助不断赐予，生命之军必定勇敢无畏……”正是在践行这一伟大律法的过程中，肩负神圣计划的巴哈欧拉追随者直面挑战，用他们的奉献获得了强大无比的上天援助，势不可挡地完成了他们神圣的职责，提前一步面对他们的命运。在扫除眼前的一切障碍之后，这支凯旋的军队常常受到战功的激励而不需要休整。胜利点燃了它的斗志，它已准备好再次出征。这正是1953年即将到来，巴哈伊世界马上要跨入圣年时，其心态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统领是一位不需要任何激励的将军，他也从不休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有如此的心态，有这样的领袖，巴哈伊发现他们无需“三年的休整”，取而代之的是十二项完全更新的计划（每个总灵理会负责一项）。一听到1953年的里兹万花园响起出征的号角，他们就会将计划付诸实施。

1944年，在有史以来最为恐怖的战争阴影之下，巴哈伊社团庆祝了巴哈伊信仰的百年诞辰，整个庆典令人赞叹；而庆祝巴哈欧拉在德黑兰西亚查尔监狱接受启示的百年纪念则更胜一筹。在庆典前的几个月里，圣护怀着沉痛的心情，与巴哈伊世界一同纪念那一浪接一浪的迫害和殉道，那么多巴孛的使徒，那么多的英雄，那么

多纯洁的妇女甚至是儿童，都被那场洪水卷走，这些迫害与殉道从一百年前开始，在1852年8月15日达到顶峰，当时，一场针对纳西里丁沙阿的未遂刺杀让上帝的至高显示者被投进了污秽的地牢中。圣护将圣年（“第九年”的周年庆典）的开端选在了1952年10月中旬。东西方的信徒翘首以待，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尽情欢庆。在巴哈伊的历史上，这也许是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真正的世界一体。曾经的信条、教导和坚定信仰，现在能被每一个个体感知，成为伟大而荣耀的现实。在守基·阿芬第一系列热情电报的推动下，未来的计划激起了人们这种新的认识。

1951年11月底，在一封发给巴哈伊世界所有总灵理会的电报里，守基·阿芬第告诉我们，信仰期盼已久的教务发展的跨洲时期已经到来。他指出，我们已经经历了地方性、地区性、国家性和跨国家性的活动阶段，在这个吉祥的时刻，巴哈伊世界要脱胎换骨，我们要开始以全球的视野来思考传导活动和大洲之间的关系。守基·阿芬第将百年庆典——他的绣帷中耀眼的金色车轮——巧妙运用，让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汇成一股巨大的、创造性的力量中心。一个是过去，是缅怀撼动灵魂的烈士，是巴哈欧拉的镣铐，是祂在西亚查尔关于自身身份的神秘经历，是祂的流亡，是所有象征人类接近造物主的事件；另一个则是统领全世界一切有组织的巴哈伊社团都加入这个庞大的计划：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的下一步进展。

阿博都-巴哈在祂的《遗嘱》中许诺，两位显圣者将绝对正确地指引守基·阿芬第。作为信仰的圣护（“圣护”一词的英文表达只是约略等同于它的阿拉伯原文“瓦利-阿姆鲁拉”，这个词的意思是信仰的卫士、领袖、统领），在两位卓越之人的感召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扬信仰的事业之中，制定了教长计划的下一个步骤。其细节在1952年的《巴哈伊信仰1844-1952》一书中得到了披露，不过在此之前就已在他的心中成形。该书还附有一份“十年国际传导和巩固计划”，在圣年开始时公布。之前，他询问过不同国家的总灵理会，要求提供五大洲有巴哈伊活动的地区和主要岛屿的名字，用来补充他已经十分详细的名单。这份名单包括阿博都-巴哈在《神圣

计划书简集》里提到的国家，是他依靠地图册和参考著作搜集汇编的。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怎么在地图上研究十年计划的目标的。他当时精疲力竭，在海法工作了一个漫长的冬天，陵殿、花园、朝圣者以及源源不断且日渐增多的信件令他应接不暇。我费尽心力才勉强说服他，他终于同意去一个有名的矿泉疗养地，答应在那里彻底休养，用那段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我们在疗养地住下，夏日美好的阳光照在外面，茂盛的树木遮住了长长的巷子，把炎热挡在了外面，身在其中的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水边饮水。所有一切都使人感到轻松、惬意。但是守基·阿芬第整天都伏在地图上，仔仔细细地补充每一处细节。我和他的医生不停抗议，我还忿忿地提醒他不要忘了承诺，但都无济于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忘记了酸痛的肌肉、干涩的双眼和过度劳累的大脑。

圣年的高潮是四场大规模的洲际传导大会，会议召开的消息通过1951年11月的同一封电报公之于众。大会将先后在四块大陆上举行：第一场于1953年春在非洲乌干达的坎帕拉举行；第二场于里兹万节期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第三场在夏日的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第四场在秋天的印度新德里举行。这些大会的模式（在新计划披露的一年前公布）随着时间的临近而变得清晰。所有的圣辅都要尽可能多地参加会议；每场会议中，圣护都会派他们其中的一位作为他的特别代表，“荣幸地与世界中心新开辟的事业直接接触”。按时间顺序，他们是勒罗伊·约阿斯（Leroy Ioas）、阿玛图-巴哈·鲁希叶·哈努姆（Amatu'l-Bahá Rúhíyyih Khánum）、乌戈·贾凯里和梅森·里米。这些特使肩负四重使命：他们要带着巴孛微型肖像的复件展示给参加这一历史聚会的朋友们；他们要向与会信徒传达圣护本人的讯息；他们要详细解释世界灵性远征的特征和目的；他们要号召与会者精力充沛、一鼓作气、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眼前这些重大使命中去。

在叙述细节之前，我们最好记住，尽管守基·阿芬第在1951年11月的电报中宣布这些会议将于圣年召开，但此前他对此已经有所暗示。他说，他们要开启洲际活动的新阶段，展现出规模空前的紧密团结。不过在巴哈伊世界看来，它们指的就是纪念“第九年”、

第二个七年计划以及许多区域计划胜利结束的大型庆典集会。的确，在宣布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传到巴哈伊世界的一周前，圣护还在另外的电报里谈论“第三个七年计划”，所以在1951年，巴哈伊们的头脑里还没有把这些庆典和新一轮远征联系起来。巴哈伊们在全世界取得的辉煌胜利，美国和英国等灵理会（它们分别在欧洲和非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踏上了一条新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在十年计划启动的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计划内容覆盖范围非常广，守基·阿芬第通讯极其频繁（这些名单、通知和统计从1952年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1957年11月），我不能概述全貌。然而，这次远征成为了他使命周期和毕生事业的璀璨明珠，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不断到来的胜利也能抚慰他那颗常常充满悲伤、过于劳累的心。因此，我必须尽量叙述，哪怕结果难以令人满意。

没有语言可以更为精辟地总结他所设想和组织的至高计划的精髓，除了他自己的定义：“谨记，这场灵性远征首要的明确目标是征服人类心灵的堡垒。它的活动舞台是整个地球，持续时间是整整十年；它的开端正值巴哈欧拉使命诞生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它的结束将正值该使命宣示的一百周年纪念日。”

圣年的这四场大型会议欢迎所有的信徒，不过，守基·阿芬第还是单列出了一个邀请名单，邀请那些投入四大陆工作的相关总灵理会和社团的代表参加。如果我们从2月非洲的第一场会议开始，分析整个远征的关键环节（新地区的开辟和已开辟地区的巩固）在当地的情况，我们就会了解到这些历史性集会对巴哈伊历史的巨大影响：要在五十七个地区展开集中传导活动，由六个总灵理会负责，分别是英国、美国、波斯、埃及和苏丹、伊拉克和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总灵理会，它们要开辟三十三个新地区，巩固已开辟的二十四个地区。通过美国、加拿大、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四个总灵理会，西方社团得到了同样重要的任务：五十六个地区，开辟二十七个，巩固二十九个，包括一些相隔遥远、困难重重的目标，如北边的育空（Yukon）和基韦廷（Keewatin），以及南边的福克兰群岛。亚洲的任务更加繁重：总共八十四个地区，开辟四十一个新地区，

巩固四十三个原有地区，范围从喜马拉雅的山区国家延伸到太平洋上的零星小岛；这些工作分配给了九个总灵理会：波斯、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伊拉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和英国。在欧洲大会上，五个总灵理会接受了五十二个地区作为他们的任务，三十个需要开辟，二十二个需要巩固。与美国、加拿大、不列颠群岛、德国和奥地利的总灵理会相比，仅仅成立三个月的意大利和瑞士总灵理会还只是刚刚起步，圣护给了它七个地区的名额。

这些历史性的集会尽管彼此相距遥远，而且大多远离当地散居的巴哈伊社团，但仍然有超过三千四百名信徒到场参加，守基·阿芬第称，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所有重要的人类种族，而且代表了八十多个国家。每场大会都有其独特之处。第一场非洲大会有至少十名圣辅、来自十九个国家的朋友以及三十多个部落和种族的代表参加，一百多名新皈依的非洲信徒在圣护本人的请求下，成为了特别嘉宾，更为大会锦上添花。这是他深思熟虑的体现，明示了他对非洲新巴哈伊的深切关怀。的确，在写给圣年首次会议的重要电文中，他不遗余力地援引了巴哈欧拉的话，后者将有色人种比作“眼睛的黑色瞳孔”，从中“闪耀出精神之光”。守基·阿芬第不仅称颂非洲人民，他还赞扬非洲大陆，称这块大陆“未被粗鄙的、泛滥的、扩散的物质主义污染，而这股流毒正在侵入东西方人类社会的机体，吞噬着美洲、欧洲和亚洲那些正在发生冲突的民族和种族的命脉，甚至要将人类置于共同灾难的包围之中”。巴哈欧拉的追随者试图在此建立以灵性为基石的世界秩序，而当圣护在非洲命运的历史转折点上发出这样的警告时，他们难道不会将其牢记在心吗？

守基·阿芬第写道，第二场大会“无疑是四场洲际传导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它为庆祝巴哈欧拉使命诞生的百年纪念，以及那场‘划时代的长达十年的全球灵性远征’的开展而举行”，大会于圣年年中开始，成为了当年庆典的中心事件，也是庆典活动的高潮。这场全美洲的大会在北美的中心芝加哥召开，六十年前，正是在此，在世界宗教议会的一次会议上（此次会议与1893年5月1日开幕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有关），巴哈欧拉的名字首次在西方世界被

公开提及。大会举行之前，一项持续五十年之久的工程终于完工：5月2日，用于公众礼拜的西方灵曦堂母堂竣工，守基·阿芬第请我们相信，它不仅是“以至大圣名之荣耀建立的最神圣的灵曦堂”，而且没有任何灵曦堂会“拥有它被赋予的无限潜能”，而且“它在发展巴哈欧拉之世界秩序上注定扮演的角色”尚无可度量。

这次大会期间，守基·阿芬第还亲手筹划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便是为世界中心未来将在卡尔迈勒山建造的巴哈伊灵曦堂的模型揭幕。他认为这场大会将“作为自信仰英雄时代以来最值得纪念的集会而被载入史册，会被视作自信仰开端以来最为重要的里程碑，在巴哈欧拉的追随者迄今展开的最为宏大的一场远征中，它为其中一个辉煌阶段的启动铺平了道路……”

在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的新远征中，守基·阿芬第将最重要的部分安排给了一群特别的人。他充满爱意地说，他们不仅“随时准备承担起最重的责任”，而且无愧为神圣计划“指定”的“首要信托人”。他们曾经承担了“持续而且艰巨的工作”；现在，通过他们所属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总灵理会（两者都收到了相当多的任务），这个社团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保持其领头地位，且不负众望，赢得新的胜利。接下来的十年中，会有一百三十一个处女地向巴哈欧拉的信仰开放，一百一十八个已经开辟的地区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以巩固成果。在这二百四十九个地区里，大部分是辽阔的独立国家，美国和加拿大负责六十九个，为总数的28%；四十八个新的总灵理会要在1963年前成立，美国要负责其中的三十六个。这个社团还要负责修建一座巴哈伊灵曦堂周边的首个附属建筑；同时，它还要为未来的灵曦堂购置两处土地，一处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另一处在巴拿马的巴拿马城；并且要负责翻译和出版印第安语的巴哈伊作品，以及许多其他的任务。

三十三个国家的巴哈伊参加了此次大会。在与会的十二位圣辅面前，在听到圣护讯息中关于这场伟大使命的清晰阐述后，超过一百名信徒自告奋勇地担任起了拓荒者，来开展这项事业。圣护号召美国信徒（“首要执行者”）、加拿大信徒（他们的“盟友”），以及拉丁美洲信徒（他们的“伙伴”），要他们“全身心

地投入，开始……在世界其他大陆开展洲际运动，将已经席卷西半球的光荣事业推上一个新台阶”。守基·阿芬第很早就写道，拓荒工作所需的“首要特质即克己、坚毅、无畏和热情”。不论老少，不管是否成家，也不论其肤色，这些特质都在新志愿者的脸上闪耀着天堂般的光辉，他们是队伍的先锋，接着会有越来越多信心坚定的人们从世界各地加入进来，攻下这些“未开垦”土地上的堡垒，他们在一年之中就赢得了一百片这样的地区。守基·阿芬第授予这些拓荒者“巴哈欧拉之勇士”的头衔，此头衔专为做出这种决定的任一年龄的信徒而设，他们要么开辟了一块处女地，要么到达过那里，或者在远征的第一年结束之前就已经到了那里。未来的几年里，那些来到未经开辟的土地上的第一批人也会得到同样的头衔。有趣的是，阿博都-巴哈用过的“主之勇士”一词似乎预示了这个美丽头衔的诞生。圣护不辞辛劳地从前辈的著作中搜集火种，然后用它们点燃熊熊烈火。

灵曦堂母堂向礼拜的公众敞开了大门，卓越的巴哈伊和非巴哈伊人士在庆典期间举行的公共集会发表讲话，数千人到场参加，报纸、电视和电台进行了覆盖全国的热情宣传。在圣年期间，信仰的光芒照耀着西方伟大的共和国，照耀着教务管理体制的钦定摇篮。在这些光荣的庆典活动中，最触动心弦、最令人难忘的时刻当属由圣护亲自安排的圣洁的巴哈伊灵曦堂落成仪式。两千五百多名巴哈伊依次来到阿玛图-巴哈·鲁希叶·哈努姆面前，接受这位圣护的代表的涂油礼，所用的玫瑰精油是守基·阿芬第特意准备并托付给她的。然后，人们用英语诵读了神圣经文的选段，并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吟唱。最后，他们来到巴孛和巴哈欧拉的肖像面前，短暂而又崇拜地看上一眼上帝在人类新时代的双显圣者，这个环节是整个场面的点睛之笔。安静、满足的人们最后离开了灵曦堂，深深地沉浸在刚刚的仪式之中。

7月，第三次巴哈伊洲际传导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会议有幸请来了最多的圣辅，有十四名圣辅到场，另有五名波斯圣辅和一名非洲圣辅在芝加哥的远征启动仪式结束后，按照圣护的指示，刚刚从西半球风尘仆仆地赶来。我们把这第三次集会定义为“执行

会议”也未尝不可。尽管比美国会议的规模小很多，但客观环境却能让全欧洲最虔诚、最活跃的总灵理会成员、传导者、教务管理人员和拓荒者前来参加，包括从十目标国来的一百一十名信徒。在六天的时间里，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与会者不仅庄严而喜庆地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重大事件，而且对敬爱的圣护交给三个欧洲国家的总灵理会和美国总灵理会的工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另一个参与欧洲工作的外来灵理会是加拿大总灵理会，它负责对冰岛的巩固任务。

在发给这个历史性场合的电文中，守基·阿芬第首先回顾了巴哈伊信仰在欧洲的历史。他说：“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这片大陆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片土地。”此外，他还回顾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其命运的影响。在概括从上次大战结束后巴哈伊取得的成绩与胜利时，圣护指出，这一切主要得益于“一系列国家计划的巨大影响，它们是在为一个世界灵性远征的启动做铺垫”。这些计划包括北美信徒的第二个七年计划，英国巴哈伊的六年计划和双年计划，以及德国和奥地利巴哈伊社团的五年计划。这些组织严密的工作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十目标国的首府以及爱尔兰共和国、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都成立了地方灵理会，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灵理会、中心和信徒的数量总数大大增加，又一个独立的总灵理会选举产生，法兰克福拥有了一个国家巴哈伊总部。守基·阿芬第写道，时机已经成熟，他们“要合理启动、全力推进全球远征的欧洲运动”，不仅要拓宽信仰在欧洲的基础，还要“向临近的岛屿播撒光明”，“在上帝的保佑下，将光辉传播到这块大陆的东部地区，乃至亚洲的中心”。他说，欧洲正进入“灵性复苏的起始阶段，其以往的灵性历史都变得黯然失色”。他继而希望“这些被选举出来的各国巴哈伊社团代表担起这片土地上的重大事业”，并“迅速增加皈依的人数，在这片饱受煎熬、充满怨恨、灵性匮乏的大陆上，在相互斗争的各色人等、各类族裔和各层阶级之间实现和解及最后的统一”。

这些话语让与会者燃起了热情，并立刻投入到了行动之中。有六十三人申请加入欧洲的拓荒事业，而更不同寻常的是，派代表前来的许多总灵理会和委员会立刻接受了这些申请，在大会结束前，

欧洲信徒负责的所有任务都已经分派给了拓荒者，只有苏联境内的地区除外。“十年传导与巩固计划”的原有大纲中包括了两座巴哈伊灵曦堂的修建，德国的欧洲灵曦堂母堂便是其中之一。这一激动人心的计划得到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另外三个耗费巨大的欧洲工程也得到了大笔资金，包括购买英国巴哈伊的国家哈齐拉图-古兹，以及两座巴哈伊灵曦堂的建筑用地（一座在斯德哥尔摩，一座在罗马）。很多新的拓荒者都是由一些充满热情但不便远行的与会者指定代替自己的。有的人没有什么钱财，便捐献了很多个人物品。这次大会的召开受到了广泛积极的关注，与之相关的公共集会吸引了大量公众参加，如此盛况从未在这片大陆上出现过。

圣年开始的十二个月后，伟大的亚洲洲际传导会议于1952年10月中旬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尽管波斯或伊拉克更适合举办此次大会，但是由于当地人的狂热情绪，加上穆斯林神职人员一如既往的敌意，使得会晤根本不可能在这两个国家举行。因此，它们伟大的东方姐妹国家获此殊荣就显得合乎时宜。早在巴哈欧拉的使命周期之初这里就已经得到了开拓。祂的追随者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他们的家乡远在欧洲、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许多西半球的国家以及波斯；五名亚洲圣辅也参加了大会，此前他们已经在圣护的要求下参加了非洲、美洲和欧洲的会议。与会的还有从圣地、欧洲、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前来的其他六名圣辅。这最后一场传导大会收到了守基·阿芬第发来的消息，他“满怀期望和愉悦”地向与会者表示问候，指出了亚洲工作的独特环境与意义：在这一“环绕世界的远征”中，这项“覆盖亚洲大陆、澳洲大陆和太平洋岛屿的三重运动”可能是“所有运动中最有广度、最为艰巨、最为重要的”。其影响范围在“信仰的东半球历史上绝无仅有”；作为运动的施展舞台，这片土地“一百年前就流淌着神圣的鲜血”，在巴哈伊世界中独树一帜，有着最多的巴哈欧拉的追随者；这片大陆是“人类主要宗教的摇篮，是众多曾经兴盛的最古老、最强大文明的故乡，是众多宗族和种族的交融地，是各民族和国家的战场”；在现代，两轮独立的天启之阳在它的地平线上先后升起，许多圣地都诞生于此，包括信仰的吉卜利（巴吉）、世界之

母（德黑兰）和“敬爱世界之北辰”（巴格达）。在电文结尾，圣护既表达了信心，又提到了将来可能发生的不测：“愿从亚洲大陆、周边岛屿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同时开展的这场远征……能随着其进展，逐渐化解无神论、民族主义、现世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邪恶势力，这些毒素正在侵袭这片动乱大陆的命脉。愿这场运动能够再现灵性英雄主义的场景，它曾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些鼓噪一时的世俗革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来到新德里的巴哈伊们对眼前的任务同样充满了热忱（任务最繁重的要数在八十四个地区中的工作，其中一半尚未开辟），他们的热情毫不逊色于参加之前大会的兄弟姐妹们。当圣护通过电报传达了他的好消息时，他们的热情更加高涨：圣护说，他的个人愿望（他在圣年庆典开始之前表达过）随着巴孛陵墓上层结构的完成得到了满足。巴哈伊们整装待发，去完成他们的使命。七十多人申请担任拓荒者，其中有二十五人在大会结束后不久就到达了自己的岗位；人们为未来的三座巴哈伊灵曦堂（分别在巴格达、悉尼和德里）捐献了大量资金，用来购置土地。在大会开始前，人们已经在德里购买了九亩的土地；人们还为将来在巴哈欧拉的家乡波斯首都建立最为珍贵、万众瞩目的灵曦堂筹集了大笔资金，这座灵曦堂是原先世界远征计划建立的两座中的一座；人们还举行了公众集会，以及一场包括很多知名人士的千人招待会；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博士，以及著名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都接待了大会的代表，媒体的报道既广泛又友好。在大会结束时，守基·阿芬第指示参加会议的圣辅进行为期几个月的出访，并亲自提供对行程的帮助和指导。

在这两年里，那些所谓的日常工作已经占据了圣护的大部分时间，而在此之外，他不仅要全心全意地处理这次全球远征的细节，还要费尽心思地为规模庞大的周年庆典制定必要的计划，并时常指导将要实行计划的圣辅和总灵理会。有人会觉得，接下来他该从工作中抽出身来，稍事休息。但事实并非如此。每次大会结束后，他就一刻不停地发着电报和信件，它们就如同射向目标的箭

矢。四年以来，他从未让迸发的热情冷却。美国大会结束后不久，巴哈伊世界还没有从新计划的首次炫目启动中回过神来，他就致电波斯总灵理会，其口吻完美地诠释了这种热情，“告诸朋友：至少一百二十八名信徒在威尔梅特庆典中自荐为拓荒者，亦有人申请前往麻风病区。望诸位不要被西方兄弟超越。要有千百人挺身而出。所列国内外任务须迅速完成。整个社团的胜利都依赖于积极响应、进取与保护。急盼付诸实践。”再三的号召极大地感染了这个受困于偏见和迫害的社团，波斯信徒发现，一扇大门在他们面前打开，他们开始成群结队，涌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没有他们强大的资金支持，没有他们始终如一的牺牲，这场远征就不会在1963年以大获成功而告终。

守基·阿芬第清楚，西方信徒人数较少，所以他时常伸出援手，协助他们的工作。在芝加哥大会宣布远征正式开始后，他立刻给中美洲国家的总灵理会捐助了五百英镑，用于购买巴拿马灵曦堂用地，给意大利和瑞士总灵理会捐助了一千英镑，资助罗马灵曦堂的修建；与此同时，他还催促美国、英国和印度的总灵理会，让它们尽快完成十年计划里巴哈伊著作的翻译工作，并汇给英国一千英镑的资助金，因为他知道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资金负担，他们自己恐难以承担。世界远征的任务之一是要将巴哈伊著作翻译成九十一种新的语言，其中有四十种亚洲语言，三十一种非洲语言，十种欧洲语言和十种美洲语言，由印度、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社团负责这项工作。在完成远征的过程中，他时常给这项工作提供支持，的确，语言工作是他在使命周期中最关心的事业之一。他甄选语种，敦促出版，不停地询问工作完成时间，还经常提供印刷和翻译所需的资金，不时给自己订购几本，运到海法。

守基·阿芬第的远见卓识，他对完成圣道事业的不懈坚持，以及频繁的资金支持〔根据阿博都-巴哈的遗嘱，胡古古拉（上帝的权利）应付给作为信仰之领袖的圣护，这使得此举成为可能〕，成为了许多工作的幕后推动力。他的捐赠明智而慷慨，有时是为他人树立榜样，有时是一种个人参与，因为有些工作让他觉得特别亲切。有时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曾给塔斯马尼亚

（Tasmanian）的巴哈伊寄去五十英镑，让他们开展第一次全国性的传导活动。他多次为巴哈伊传导者的行程提供资金，尤其是在教长刚刚去世之后，当时西方的信徒面临着很多考验，需要增强他们的信念，于是他让他们去拜访一位历经风霜的波斯老巴哈伊；后来，他还曾提供资金，援助囊中羞涩的圣辅进行指定的考察。当他将阿博都-巴哈母亲和弟弟的遗骸从阿卡卑微的墓地移到卡尔迈勒山时，为了纪念他们，他给灵曦堂母堂捐赠了一千英镑。在每次伟大计划实施期间，他都在很多场合捐出钱款，然后号召信徒们用这笔钱来完成特定的任务。他袒露心扉的话语常常感人至深，他说自己“被剥夺了亲自参与的机会”，或者说这是他的“先期捐赠”。他对受灾者的捐助也是毫不吝啬。当波斯的巴哈伊村民受到迫害、以身殉道时，当在俄国定居下来的人们被驱逐出境、身无分文地回到家乡时，当地震或者洪水让朋友们无家可归、穷困潦倒时，守基·阿芬第都会伸出援手。他每年都给波斯总灵理会捐赠一笔资金，用于购置与信仰有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遗址，这是该灵理会的具体职责之一。他帮助购买了几座巴哈伊总部和灵曦堂的用地，并用自己的钱为那些享有盛名且备受敬爱的信徒树立墓碑，以表示他个人的敬意和感情。

不过，在圣护的使命周期内，最伟大的贡献当属他为三座灵曦堂捐助的三十三万美元。这三座灵曦堂的修建是世界远征的目标之一。他筹集资金的方法与他做其他事情的方法并无二致。我清楚地记得整个过程：他首先提供了几座灵曦堂的设计，然后从负责修建工作的总灵理会那里得出预算数额，并顺便限制住花费上限；接下来，在确定它们将耗费一百万美元左右，而且已经筹集到十五万美元之后，他估算出巴哈伊们在远征结束、灵曦堂行将竣工之时所能筹集的资金，这样一来，三分之一的资金已有着落；然后，他开始考虑自己如何再助一臂之力，他根据以往的情况，算出了世界中心的预期收入和其他计划的支出情况，把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件考虑在内，最后得出了三十三万美元这个数字。他把最后的三分之一交给了上帝，他深知，如果祂的追随者全力以赴的话，便会有神秘的力量出现，帮助信徒达到他们的目标。

不过，让我们回到刚刚启动的“肩负天命、激发心灵、跨越十年、涵盖全球的灵性远征运动中”，它的四个目标分别为：发展信仰在世界中心的机构；巩固十二个地区的大后方，将其建设成神圣计划中十二项计划的教务管理基地；巩固所有对信仰开放的地区；开拓地球上剩下的主要未开发的地区。尽管远征的管理被托付给了十二个总灵理会，但每个信徒都能为完成这项“宏伟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不论种族、不分国家、不讲阶级、不谈肤色，也不管年龄和性别如何。在一篇瑰丽的文章中，守基·阿芬第用一段华丽的文字拉开了新计划的舞台大幕：去何处？为何不去任何一处——去北极圈、去沙漠、去丛林、去北海的冰冷岛屿，还有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酷热之地。对谁？为何不对每个人——对非洲的部落、对加拿大和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对北方的拉普兰人、对波西尼亚人、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对美洲的红色印第安人。在何种环境之下？不仅在荒野，还要在“淹没于粗鄙的物质主义”的城市里，里面的居民呼吸着“激进的种族主义”的恶臭，受制于“傲慢的理性主义”，被“盲目好战的民族主义”包围，沉湎于“狭隘、偏执的教会主义”。巴哈伊战士必须攻占哪些堡垒？印度教的城堡，佛教的寺庙，亚马逊的雨林，西藏的高山，俄国的草原，西伯利亚的荒原，中国、蒙古和日本，这些有着庞大人口的地方——他们也不要忘记与居住在流放地的麻风病人齐肩并坐，和被放逐之人携手并进。“我满腔热血地呼吁，”他写道，“当阿卜哈天国的不可见之天使奏响和散那，上帝的胜利之师庆祝最终的凯旋时，应服从万军之主的召唤，为万日之日的到来做好准备，这是祂的武士应有的作为。”

毫无疑问，圣护将这十年的事业看成是“巴哈欧拉的武士大军”之战，这支军队是“世界性的，忠诚且坚不可摧”，是一支“光明之师”，对抗笼罩世界的顽固黑暗势力。军队的“至高统帅”是阿博都-巴哈；祂的身后是祂的父亲（“万王之王”），祂发誓对“每一个为祂的圣道而战的战士”都提供帮助。“无形的军队”被召集起来，“一级接着一级，准备从高处降下援助”。上帝的英雄也聚集到一起，准备冲上前去，将“他们的盾牌刻上新的胜

利的纹饰”，把“巴哈欧拉之天国的凡间象征”带入世界的每个国度，为基督允诺之天国的降临建立牢不可破的教务基础。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守基·阿芬第将伟大的世界远征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的里兹万节到1954年里兹万节，第二阶段是从1954年到1956年，第三阶段是从1956年到1958年。他把第四阶段的结束和预计与十年计划期间竣工的灵曦堂联系在了一起，到1963年，三座灵曦堂已基本完工。在计划成形之时，圣护并没有如此划分各个阶段，这是远征所释放出来的力量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胜利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毫无疑问，他有意识地指导着这些力量，在整个运动期间，他指挥着十二个军团，逐一完成各个目标。

远征开始三个星期后，守基·阿芬第电告巴哈伊世界，称需要在所有未开发的地区进行“及时、坚决、持久、广泛的”开拓，这是神圣计划执行中“富有挑战的重要部分”。守基·阿芬第一向礼仪周到（包括我们有时所说的神圣礼仪），他说，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拥有书简赋予的首要地位，有权将拓荒者派到东西方的姐妹社团负责的目的地去。于是他呼吁，号召一百三十名“巴哈伊战士”挺身而出，填补空白，去远征的第一年还没有征服的地区工作。四个月后，在亚洲洲际传导会议开始之前，他告诉巴哈伊世界，已经有三百多名信徒自愿成为拓荒者，一百五十名来自北美，有超过五十名来自欧洲，四十多名来自非洲和亚洲。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二十八个地区和岛屿得到开拓。在胜利的鼓舞下，守基·阿芬第对朋友们说，世界上接受信仰的国家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个，他们会争取在圣年结束之前将数量增加到二百个。巴哈伊几乎完成了这个任务，圣年结束三个星期后，他们完成了二百个目标。1953年9月，守基·阿芬第公布了他写入“光荣之册”的首批人员名单，他计划等这份名册完成后，将其放入巴吉的巴哈欧拉陵殿入口前的地板之下，对池英雄的“勇士”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点。名册上有名字和被开拓的地区，圣护一直定期公布着拓荒者的信息，直到他逝世。到1963年，名册中的代表囊括了各个种族和所有大陆，他们国籍众多，既有男子，也有女士。远征开始

九个月后，圣护就公开宣告，已经开拓了将近九十个地区，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不包括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到1954年，他在里兹万文告里高兴地说，“万军之主的勇士履行着对这个星球精神征服的崇高使命”，他们已经开拓了一百处未开发的地区，这样一来，远征的开始阶段“圆满完成……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

也正是在这个里兹万节期间，根据圣护之前通讯中的详尽指示，各圣辅为每块大陆指定了一个由九名成员组成的辅助团，作为他们的“代表、助手和顾问”。在圣护的倡导下，五只“大陆基金”也建立了起来，以资助这个不断发展的机构工作。

在得到一百个新的奖章后，巴哈欧拉的军队现在继续挺进。守基·阿芬第对前线的工作已经较为放心，并立刻投入到更为深入的工作中。神圣计划的第二阶段现在开始了，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已有的成果。在1954年的里兹万文告中，圣护列出了十三条需要在今后两年遵循的指示：做好所有重要的传导工作；保护好所有的胜利果实；维护好所有的地方灵理会；增加团体和中心的数量——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四十八个总灵理会的建立，根据计划，这一任务要在远征结束前完成；购置灵曦堂用地；为指定的国家哈齐拉图-古兹的购置设立特别基金；迅速完成多项语言工作；取得巴哈伊在波斯的历史遗址；在德黑兰和法兰克福建立灵曦堂；修建威尔梅特灵曦堂的附属建筑；启动国家捐赠；注册地方灵理会；设立新的出版信托。他对巴哈伊世界十二个总灵理会的一百零八名成员“发出热切的呼吁”，将他们从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中挑选出来，希望他们完成这些如此伟大的任务！

这份呼吁，在那些世故之人看来只是卑微无力的做法，却迸发出了极大的能量，堪称奇迹。整个巴哈伊世界，上至领袖，下至普通一员，都在加倍努力，并且再次凯旋而归。1955年，守基·阿芬第在年度里兹万文告（这是他发布信仰工作进展的主要途径）里告诉信徒们，神圣计划正“勇往直前，每天都能获得新的动力，推倒各个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壁垒，将恩惠之举播撒四方，势不可挡，并在通往全世界精神征服的道路上，不断展示其日渐强大的内在力量。”

尽管守基·阿芬第时常给与鼓励，但他有时觉得，有必要在向军队的指挥官——十二个总灵理会——下达命令时使用十分严肃的措辞。1955年5月，他给这些灵理会发去电报，说他“不得不”在“这个重要关头”要他们静心思考作为圣道“管理者”的“全部内涵”和“核心要求”；请他们不要“让变故在任何时候抵消他们的努力”或者“削弱他们的决心”。他向所有人发出呼吁，尤其那些“与其他兄弟相比，没有被镣铐摧残、束缚的人们”，让他们加快工作速度，扩大工作成绩，以化解一个稳定发展但却尚未“完全解放”的信仰可能遭受的“暂时挫败”。

当年8月，巴哈伊世界遭受了一次周期性危机。这次危机大大削弱了圣护的力量，也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他在一封电报中写道（他说须将这封电报转给所有的圣辅和总灵理会），“巴哈欧拉祖国的信徒百年以来不断遭受迫害”，现在，这个规模仍为最大的社团再受重创：德黑兰的总灵理会被占领，其屋顶被波斯的一名神职头领公开拆毁，一名伊朗军队的将军参与并积极协助了这次行动，此前，全国的地方性机构都同样遭此厄运；该国的议会正式宣布巴哈伊信仰为非法信仰；媒体和电台恶毒地诋毁信仰的使命和目的；国内的巴哈伊遭遇到一系列暴行；巴孛的神圣居所被两度玷污，最后遭到严重破坏；其他的圣地要么被占领，要么被损毁；巴哈伊拥有的商店和房屋被洗劫一空，然后被付之一炬；巴哈伊墓地被掘开，尸体惨遭肢解；巴哈伊成人和儿童被毒打，女人被拐走，然后被强迫嫁给穆斯林；有一个七口之家，最大的已是八十岁高龄，最小的才十九岁，均被暴徒用铁锹和斧头劈成碎片，当时居然还有鼓手和喇叭手在一旁奏乐。这些惨象让整个巴哈伊世界激愤不已，在圣护的建议下，超过一千份文件从各地递交给了波斯政府，其议会成员连有些地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联合国收到了申诉，文明世界的总统和重要人士也收到了申诉。人权司司长向美国总灵理会（它是其他巴哈伊机构的官方代表，联合国已经正式认可它是以“国际巴哈伊社团”的名义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保证，关于形势的概述很快就会递交给人权委员会和波斯政府，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将派出一组由难民署高级专员牵头的联合国官员，他们将向波斯政

府提出抗议，并要求对方做出保证，保护在波斯作为少数群体的巴哈伊的权利。尽管信仰还未完全解放，但一百年的发展已经让它有了足够的力量，这一次，它狠狠地进行了还击。在美国，花费四万美元的宣传活动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场暴行戕害的是一个和平而手无寸铁的群体，除进行了迅速的反击之外，守基·阿芬第还设立了一项“拯救受迫害者”的基金，并随即捐款一万八千美元，愤怒的巴哈伊社团纷纷积极响应，而他们依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

正是在世界远征的第二阶段，巴哈伊成功地购置了十年计划目标里十一座灵曦堂中十座的用地，花费超过十万美元；获得了五十一个国家中的三十个国家的捐赠，总计约十万美元；并且在各个大陆购置了四十九个国家巴哈伊总部中的四十三个，花费五十余万美元。对于最后这项成功，守基·阿芬第微妙而又着重地强调道：“它极大弥补了军方占领波斯首都的国家教务总部、损毁其穹顶造成的损失。”

早期的远征赢得了很多辉煌的胜利。西亚查尔监狱被购买下来，这是巴哈欧拉启示先知使命的地方；在麦加成立的灵理会则将巴哈欧拉的旗帜插到了伊斯兰的中心；更令人欣慰的消息也传到了圣护那里：有一些巴哈伊（之前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社团的剩余力量）生活在苏联境内，远征开始时，这些地方被划为未开辟地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地区已经有了我们的力量，不管这些孤立的烛火是多么微弱，多么渺小；世界上有九十八个岛屿有巴哈伊存在；在世界中心建立国际文物馆的工作也开始了。

正当凯歌高奏之时，守基·阿芬第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十年计划中要建立三座灵曦堂，而不是原来的两座。在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作中，迈什里古-埃兹卡尔（提及上帝的初始之地）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守基·阿芬第说，修建它们是为了“对唯一真神的崇拜，为了今日显圣者的荣耀”。它们和个人的灵性生活以及信徒的社团生活都有密切关系。圣护将美国灵曦堂称为教务管理体制的“标志性大厦”，是其“坚固的壁垒，象征它的力量，预示它未来的荣誉”，是“尚未出生之文明的先导”，是“世界秩序的象征和先导”。他说，这些“灵曦堂母堂”就是信仰沉静而伟大的传

导者，在信仰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所以他认为，美国灵曦堂代表了西半球美国巴哈伊社团的灵魂。第一座灵曦堂建在阿什哈巴德，由阿博都-巴哈亲自指导，并在圣护的有生之年完工，尽管如此，他还是向我们保证，新世界建立的第一座灵曦堂才是有史以来最神圣的，因为教长在北美之行中亲手奠下了基石，而且这里一直是祂最关爱的地方。到1921年，当守基·阿芬第成为圣护时，地基已经打好，但是阿博都-巴哈生前期盼已久的建筑却还只是个难看的黑色防水圆柱体，就像一个建在地上的大型煤气罐。

圣护把尽早完成这座神圣建筑视为头等大事。他花了三十二年来完成这项工作，称其为西方信徒开展的最宏大的工程，同时也是巴哈伊天启的形成时代里最为耀眼的胜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1922年给灵曦堂基金寄去十九镑。1926年，他说自己“欣喜地保证，每月将有九十五美元的捐赠，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多年来，他经常给建筑工作提供捐赠。环绕的灵曦堂阶梯会形成一个大的环形空间，守基·阿芬第建议巴哈伊们将其变成一个实用大厅，用于举行代表大会和其他集会，并随后暂缓了某个建筑外部，也是用于举行集会的礼堂的建设。到1923年，代表大会都在后人所称的“基础大厅”举行。为了装饰它的墙壁，守基·阿芬第送来了巴哈欧拉陵殿中的精美波斯织毯作为礼物。但是，在1928年以前，建筑工程并没有什么进展。那年，他给正在召开的代表大会寄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信件，要求美国信徒重启伟大灵曦堂的修建工作，此举使得他们启动了所谓的“统一行动计划”，旨在为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筹集资金。尽管如此，到1929年，所需金额还是没能凑齐，于是守基·阿芬第决定变卖信仰在圣地最宝贵的物品，因为他当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他电告大会：“牺牲巴哈欧拉陵殿至珍装饰，用以贡献和加强美国信徒的共同努力，希望以统一的行动完成计划，呼吁做出空前的自我牺牲。”和往常一样，他首先给这项无价物品的波斯捐献者发去电报：“美国灵曦堂在建，尚缺四分之三款项，第一层所需资金已筹到。所捐丝质地毯价值甚高。请速就市场价格回电。感谢理解。”当他收到对方的热心回复，并得到可以拿到纽约变卖的意见后，才把他的决定告诉了美国。巴哈伊们被圣护的礼

品深深打动，他们在大会召开之前筹集到了三十万美元。守基·阿芬第担心，如果未来所需的资金不能预先得到保证，就会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所以他不允许签订任何合同。但是，到了1930年的代表大会时，款项已经有了保证，圣护准许可以开始签订合同。巴哈伊们想把那张已经卖到美国的贵重地毯买下来。他回复的电报十分典型："同意，继续进行整座灵曦堂的建设，外部装饰除外，等到信徒们决意完全奉献时，再做最终装饰。我认为，我们都应该遵循阿博都-巴哈批准的整个设计。所献地毯无需变卖或归还，用作西方首座灵曦堂的永久饰品。"大会深受感动，在电报中表示"非常感谢这份无与伦比的礼物"。守基·阿芬第用这些文字和举动点燃了激情，这不是他的个人策略，作为一个有着单纯目的和想法的天生领袖，这是他内心的无私本能。

在1931年的代表大会召开时，守基·阿芬第发来了电报："至大圣叶和我一起……表达我们内心的祝福、无尽的欣喜与深深的感激之情，这座光荣的建筑终于快要竣工了。"1933年，他又发来电报，再次将阿博都-巴哈的妹妹与这项工程联系起来："至大圣叶已离世，请所有爱戴她的美国信徒不要中断灵曦堂的修建，她心系灵曦堂，灵曦堂的建成盖过以往所有成就。请记住我急切的请求。"这条信息在1月发出，到10月份，圣护又发来一条电报："请美国信徒倾听我最后的真切恳求，对灵曦堂的捐赠绝不可迟疑，不能折损千秋事业的荣光……我承诺，待我们光荣的灵曦堂第一阶段的装饰完成后，会有一年的休整。"他用"我们"一词并不奇怪。他与美国巴哈伊一起，为修建工作而奋斗。灵曦堂的修建正值"美国人民本世纪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衰退"（圣护语），他坚持认为，在困境中，能对修建工作做出贡献的只有那些"毫无保留"的信仰支持者，只有那些"完全意识到"巴哈欧拉之天启，并且对其"绝对服从"的人；他召集了他的巴哈伊兄弟，他们人数不多，大部分并不富有，每天都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艰难度日，他安慰他们说，完成这样伟大的事业靠的不是"几个人的慷慨，而是忠于信仰的所有信徒的集体贡献"，他指出，灵性的力量注定要从灵曦堂传播出去，而这种力量将依赖"在各地做出贡献的各类信徒"，以及他们

“自愿奉献”所需要的“真诚、彻底的克己自律”精神。他鼓励他们，安慰他们，鞭策他们走向成功。他自豪地提醒道，他们有着别人没有的东西——一个有效运转的教务管理体制和一座灵曦堂的双重福佑！

年复一年，电报不断发出，美丽的灵曦堂慢慢建起，到守基·阿芬第生前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型百年庆典即将举办之际，我终于看到了以下这些文字：“作为代表巴哈欧拉信仰之圣护，我荣幸地宣布，西方第一座灵曦堂向公众的礼拜开放……代表信仰的圣护，向你们致敬，欢迎你们走进大门……”

这项工程备受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的关爱，从其简短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灵曦堂在巴哈伊社团的生活中举足轻重。而令人略感惊讶的是，在远征的初期，圣护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巴哈欧拉祖国的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的修建工作上。1942年，守基·阿芬第宣布，波斯巴哈伊已在德黑兰附近购置了三百五十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他们未来灵曦堂的建设场所。美国巴哈伊在修建灵曦堂时的持之以恒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正如美国人当年受到东方信徒的鼓舞一样，彼时，正是在亚洲的阿什哈巴德修建的灵曦堂让美国人在1903年决定开始修建工作。圣护把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神圣灵曦堂看得很重。我们应该记住，他邀请了很多人设计，但拒绝了所有反馈的方案，因为他觉得它们都过于极端，过多使用当代流行的玻璃，对于一个孕育世界秩序和千年天启文明的宗教而言，这样的设计既不庄严也不合适。他选择了一个保守的设计，在海法写下了他的同意书，他说：“这个设计中的穹顶让人想起巴孛神圣陵墓的穹顶。”热情的波斯信徒已经启动了一个五年计划，来筹集修建需要的一百二十万土曼。在1953年里兹万节的第一天，圣护在巴吉的会议上将设计公之于众。守基·阿芬第对这项工程格外关注，1955年，当波斯宣布所有巴哈伊的行为非法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他意识到，在他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使命周期中，那里的情况远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再度恶化，在十年计划结束前完工的希望变得极为渺茫。尽管欧洲第一座灵曦堂（也就是计划中的第二座灵曦堂）还能建好，但他在1955年11月立刻用电报回击了信仰

的敌人：“做出历史性决定，将在坎帕拉中心建非洲灵曦堂母堂，以向居住在信仰的摇篮、饱受压迫的勇敢教友致以至高安慰。除澳大拉西亚外，每块大陆都自豪地直接受惠于自己的灵曦堂。在整个大陆上发展迅猛的信仰和扩展惊人的教务机构更要匹配于相应的认可……”就这样，非洲信徒得到了“修建非洲灵曦堂母堂的伟大的、历史性的、独一无二的任务”。

原本，德黑兰要建立巴哈伊世界的第三座灵曦堂，而德国建第四座，但实际上，欧洲灵曦堂成了第三座，非洲的是第四座。非洲灵曦堂的设计是在守基·阿芬第的监督下进行的，并得到了他的完全肯定。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亲自敲定设计方案，然后寄给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巴哈伊总灵理会，但当时，修建巴哈伊灵曦堂一事已经激起了很多教堂的反对，总灵理会告诉他，他们觉得他所选的设计趋于保守，在这个目前极度崇尚现代建筑风格的城市里，这一设计会让修建工作更加复杂，他们会因此得不到修建批准。于是，守基·阿芬第允许他们组织一场竞标，然后将设计方案寄给他看，由他选定方案，然后再建。

1953年，守基·阿芬第宣布将在德国建立欧洲灵曦堂，我坚信，如果他事先去询问巴哈伊的意见，他们肯定会建议不要选在德国，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八年，除了几个几乎没有信徒的国家以外，全世界巴哈伊所在的国家在战时不是遭受过德国的欺凌，就是曾与之兵刃相见。面对世俗意见，圣护毫不动摇，努力实现托付给他的、建立至大圣名世界社团的灵性使命。尘世的标准不是他的坐标，只有教义包含的标准才能指导他。守基·阿芬第从未忘记，阿博都-巴哈曾拜访这个国家，也从未忘记祂对这个社团的关爱，他在使命周期的第一年就对其发展关怀备至；1922年，当悲痛万分、踌躇不定的他第一次给尚很弱小的巴哈伊世界写信时，这个社团就是其中的收信人之一。1926年，他提到了“德国巴哈伊中心和附属机构的蓬勃发展，我们的挚爱者用荣耀的话语说到了他们的命运，说到了他们在未来欧洲觉醒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1927年，他在给玛莎·鲁特的信中这样写道：“德国应当成为您活动的核心，因为我非常看重这个觉醒中的国家所提供的宝贵机会……”“我认为您

应该给予德国更多的关注，因为我和您一样，对它为欧洲的灵性重生做出贡献抱有希望。”1947年，他提到了“被战争蹂躏的中欧社团”的“伟大复兴”，认为德国境内将建立“欧洲大陆上信仰拥护者的最大团体。正如阿博都-巴哈的预言，这个社团将注定在欧洲人民的灵性觉醒和最终皈依主之信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法兰克福是德国的中心，德国是欧洲的中心。欧洲灵曦堂理应建造于此。

大多数巴哈欧拉家乡的虔诚信徒仍在遭受迫害。守基·阿芬第为此寝食难安，他很快便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他选定了第三座灵曦堂的设计方案，并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巴哈伊总灵理会进行秘密调研工作，确定在悉尼修建一栋建筑所需的资金。他收到的评估结果显示，工程不会过于加重远征的经济负担，于是，他在1957年的里兹万文告里做出了惊人决定：开展一项“目标远大的三重工作，祂家乡的信徒社团历经磨难，饱受考验，为了弥补他们，计划在法兰克福、悉尼和坎帕拉三地建立欧洲、澳洲和非洲的灵曦堂母堂，计划耗资一百万美元，作为对已有的亚洲和美洲灵曦堂的补充。”这一通知意味着，波斯信徒损失了第一座灵曦堂会因大洋洲修建的灵曦堂而得到补偿。后者被圣护称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灵曦堂母堂，也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灵曦堂母堂”。他说，非洲大陆的中心建立的另一座灵曦堂“必将深刻影响圣道在世界的传播，极大地巩固这个神圣命定的秩序中不断发展的机构，弘扬它在全球每一块大陆的声名”。圣护还在里兹万文告中宣布，这三座“里程碑式的建筑，每座都是上帝之精神的居所，同时也是为赞美祂今日信使之荣耀而建的礼拜堂”，它们的设计都会“首次”展示给“今年里兹万节举行的十三场历史性巴哈伊全国大会的与会代表”。

在世界远征的第二阶段，美国总灵理会为灵曦堂的第一座附属建筑购买了土地。圣护告知该灵理会，他不认为修建图书馆（也就是他们的第一份建议）能够充分展现灵曦堂在巴哈伊社会中的目的和意义，因此决定为老人建一座养老院。在他的最后一批信件中，他敦促总灵理会开展敬老院的修建工作，因为，此举会让公众明白，服务全人类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任务，这里没有信条、种族和宗教派别的差异。同时，要确保引起公众与媒体的注意。

第十六章　独一无二的使命周期

凡寻求他那保护全人类之庇荫者，必得福佑。

阿博都-巴哈

圣护在他富于创造力的头脑中，将巴哈欧拉信仰的所有元素融合成了一个无形的整体；他创造了一个有组织的信徒社团，巴哈欧拉的教义、律法和教务管理体制都容纳在此社团之内；上帝的双显示者和完美典范的教义被织入一件闪亮的披风之中，它将为人类遮风避雨一千年，由守基·阿芬第亲手裁剪和缝制的，华丽的风扣上有他对神圣经书的注释，它永不破损，永不掉落，直到新的律法制定者出现，给祂创造的人类披上新的圣衣。

教长在遗嘱中将祂的外孙擢为信仰之圣护；他与神圣的前辈并肩站立于统领之阶层，他本人就是一位元首。血缘的纽带赋予了他显赫的地位，而在此之外，上帝之圣约的履行还给他注入了绝对正确的指导力量。守基·阿芬第拥有为圣道掌舵的神圣的绝对权利，三十六年来从不间断、呕心沥血的工作证明了他无愧于此。我们很难在历史上找到这样一个人，在三分之一个世纪里发起了诸多不同的运动，一方面关注细节，另一方面用计划、指示、指引和领导来影响整个世界。教长从巴哈欧拉那里接过了关于未来世界的构想，并使之进一步完善，在去世之时，祂又将其传给了祂可靠的继任者，而后者则为这个未来世界打下了基础。

珠宝大师工作的时候，会耐心地从一堆宝石中挑出最大气的，将它放在较小的但却同样珍贵的宝石之中。同样，守基·阿芬第也耐心地在教义中选了一个主题，取出来研究，打磨它的表面，将它放入卓越的注解当中，这样，它的光芒就会抓住我们的目光，而之

前，它只是埋没在一堆珍宝之中，不为人所见。毫不夸张地说，巴哈伊现在所居住的房间里，充满了守基·阿芬第创作的荣耀的闪亮装饰。他仿佛用一面三菱镜将天启的光芒抓住，让我们能欣赏巴哈欧拉那夺目的话语之光中的颜色和光泽。

突然间，我们一直习以为常的东西有了新意义。我们受到了挑战、批评和鼓舞。我们发现自己挺身而出，去服务，去拓荒，去牺牲。我们在他的保护下成长，信仰也和我们一起成长，变得和从前迥然不同。让我们不妨看看这其中的一些稀世珍宝，这些守基·阿芬第巧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主题。有一天，巴哈欧拉在卡尔迈勒山上休息，祂向阿博都-巴哈指出一块土地，说要将它买下，把巴孛的遗体带来，埋葬于此。教长带着这一珍贵的信托，把它放在大山之中，上面建起了祂为之呕心沥血的建筑。圣护完成了这神圣的建筑，现在，信仰先驱的荣耀陵殿庄严地矗立在卡尔迈勒山上，成为所有目光的焦点。

战后，教长给美国寄去了一批著于危难之时的宝贵书简，人们举行了一场喜庆的典礼，称为“神圣计划的揭幕”，当时，几对儿童和青年（包括我在内）拉起帷幕，其中一封书简出现在讲台的幕布背景上。阿博都-巴哈给北美信徒带来了一笔财富，他们欢呼雀跃，但并不理解。守基·阿芬第却从来没有忘记这笔存在于世界彼端的财宝，并努力地逐步向其靠近。他耗费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历经艰辛但仍斗志昂扬，建立起了教务管理体制。他终于可以拿起这些财富，将其安置入位。北方被征服了，南方被征服了，东方和西方的土地上闪耀着新生的巴哈伊中心和灵理会，它们在世界上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四千二百个。守基·阿芬第确保全球二百五十一个地区被神圣计划的清风唤醒，重获活力，信仰的著作被译成了二百三十种语言，被他汇聚成一条河流，注入这些地区。二十年来，从守基·阿芬第将蕴藏在阿博都-巴哈书简中的力量释放出来起，他一直没有停止对拓荒大军的指挥，在他的命令下，一队队人马南征北战，每征服一处，他们就插上巴哈欧拉的旗帜。

圣护领会了巴哈欧拉《卡尔迈勒书简》的隐含意义，把至大圣叶的墓建在了巴孛陵殿的附近，她的母亲和弟弟则葬在她的身边，

并将这个地点建成了世界教务中心，在其上方的山坡上划出一道弧线，他引用巴哈欧拉的话，称其为“上帝圣座之所在地”，在这道弧线上，他修建起了第一批雄伟的建筑，并多次在文章中指出，进步之本质须从这个伟大的灵性中心传到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这样的进步是建立在巴哈伊信仰的教义之上的，我们的信仰“完全超越自然和国界，完全不分政治、不分党派，完全不同于那些企图抬高某个种族、阶级或国家的政策与思潮”；在信仰中，它的“追随者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注重最根本的利益，断不会向任何个别利益屈服；不管是个人利益、地方利益还是国家利益，都不能超越人类整体的利益，他们深知，在一个人民和国家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满足部分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满足整体利益”；守基·阿芬第解释道，信仰的胚胎在“英雄时代”已完全发育，其儿童期也就是巴哈欧拉教义中包含的社会秩序，将在“形成时代”发育成型，其青春期将见证世界秩序的建立，而信仰将在遥远的“黄金时代”成年，在一种世界性文明中绽放，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全球文明，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的顶峰”，它永不衰落，人类会永远向前发展，不断攀登灵性的高峰。

他将上帝圣道之下的过往与当下分为一个个片段，将每一段和信仰的整体发展联系起来，绘制出一幅色彩鲜明的地图，让我们对目前的进展一目了然，也让我们看清短期目标的成就为接下来的服务做了怎样的铺垫。他采用的定义和分类绝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服从教义，遵循信仰中万物发展的进程。在“先知周期”（从亚当开始，在穆罕默德那里达到顶峰）中，人类接受先知的教育，为自己的成熟做好准备，现在，以巴哈欧拉为启端的“实现周期”已经到来。科学让世界大同有了可能，人们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应该说，人们必须建设一个新社会，在其中，和平可以使世界专注于人类的物质和灵性发展。正因为有了这样伟大的转变，巴哈欧拉五千个世纪里荫庇地球，其中前十个世纪将由祂制定的律法、条例、教义和原则来管理。

守基·阿芬第将这个千年天启分为几个伟大的时代。第一个时代从巴孛宣示开始，到教长升天结束，历经七十七年，被圣护称

为信仰的“使徒时代”或“英雄时代”，这两个称谓主要与期间所发生的大事的性质有关，大屠杀是其初始阶段的特征，两万名英灵被带走，包括巴孛本人。这一时代又被圣护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巴孛、巴哈欧拉以及阿博都-巴哈的使命周期有关。第二个时代被守基·阿芬第称为“形成时代”、“过渡时代”，“钢铁时代”，期间，信仰的教务管理体制（正是这个时期的标志）得到发展和完善，绽放在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之中。这个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始于1944年和随后的一些大事，第二个阶段在1963年结束的世界远征中谢幕，与巴哈欧拉宣示的百年庆典同时。圣护从未说明“形成时代”到底有多少个阶段，但他曾暗示，还会有更多同样重要、同样振奋人心的阶段，直到信仰稳步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他曾在多个场合透露，这个时代很可能会在巴哈欧拉天启的后半叶来临。

守基·阿芬第说，圣道曾默默无闻、饱受迫害，现在成为了一个世界性宗教，它将打碎所有过去的枷锁，实现完全的解放，成为一个国教，最终，这个巴哈伊国度将崛起，这是世界宗教历史上崭新的、独一无二的创举。当“形成时代”结束、“黄金时代”来临时，人类会进入一个《圣经》“哈巴谷书”（2:14）所预言的时代：“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的历史性展开同样被守基·阿芬第分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期又被分为不同的阶段。通过这种方法，巴哈伊就能紧紧跟上行动的步伐，把注意力放在各个具体的目标上。神圣计划的第一个时期有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个七年计划、第二个七年计划和十年传导与巩固计划，后者也被我们称为世界远征。这场远征又被守基·阿芬第分成了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持续一年，从1953年到1954年；守基·阿芬第说，这期间的重要任务就是增加巴哈欧拉麾下的国家数量，这个数量不应少于一百个；第二个阶段从1954年到1956年，主要包括大量的巩固和拓展工作，为在计划结束前选举四十八个新总灵理会做铺垫，其他工作还包括为国家哈齐拉图-古兹、灵曦堂大力购置土地，以及成立巴哈伊出版信托；

图六十一　圣护

圣护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拍摄。此照片是从一张小快照放大而来，表现出圣护温和、高贵、谦逊的品质。但该照片没能表现出圣护平日的威严和力量。

图六十二　1957年的圣护

这张快照中，圣护站在教长房子的花园门口。他走在送葬队伍中，指示人们安放一位去世的老仆人的灵柩，灵柩后来被移送到巴哈伊公墓。

图六十三　圣护最后的信息

在这座山间客房的阳台上，当世界传导运动进行到中期的紧要关头时，圣护为最后的电报定下了终稿。

图六十四　圣护在伦敦的葬礼

1957年11月9日，巴哈伊列队经过放在坟墓边的圣护灵柩，悲痛地与之告别。

图六十五　圣护灵柩

圣护灵柩安放在鲜花装饰的墓中。

图六十六　刚建成的圣护墓地

葬礼结束后，刚刚建成的圣护墓地成了鲜花的海洋。

图六十七　圣护在伦敦的墓地

白色卡拉拉大理石，科林斯式柱头，一个雕有非洲地图的地球仪，顶上是他自己的日本雄鹰，是胜利的象征。

图六十八　镀金雄鹰铜像

一尊镀金雄鹰钢像挺立在守基·阿芬第的墓地上。

“第三个，也会是这个世界灵性远征中最绚丽的阶段”，他写道，会发生在1956年至1958年之间，其特征是全世界将成倍地涌现出巴哈伊中心，会有十六个新的总灵理会成立。圣护离世前指出，他的伟大计划的第四个时期从1958年开始，到1963年结束，不仅新信徒和中心数量的增长要远超过前期，而且还要建立三座灵曦堂（现在是十年计划的一部分）。

但对我们而言，这位曾经给予我们伟大理念的领袖，这位出色完成阿博都-巴哈所开创事业的领袖，这位不仅执行了教长的指示，还贯彻了上帝显示者至高指引的领袖，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没人可以预想，也没人敢去想，巴哈伊世界在1957年10月收到的电文会是守基·阿芬第生前的最后一则消息。那封电报洋溢着快乐和胜利，充满了希望和新的计划，是从他那里而来的最后的无价的礼物。当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放下笔，转过身去，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和它的悲伤。守基·阿芬第告诉我们，全球灵性远征的发展很快就会到达中期。中期以五个洲际大会为标志，它们将分别在1958年的1月、3月、5月、7月和9月举行，地点分别是非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洲、欧洲和亚洲。会议按照远征开始时，在圣年时期举办的首轮四次洲际大会的模式，守基·阿芬第指定了五个机构，它们将负责组织这些会议，并由它们的主席担任会议召集人。中部和东部非洲区域灵理会负责第一次会议（非洲在五年内两度举行首轮会议，难道只是个巧合？），澳大利亚总灵理会负责第二场，美国总灵理会负责第三场，德国和奥地利总灵理会负责第四场，东南亚区域灵理会负责最后一场。守基·阿芬第写道：“会议的召开……有五重目的：向我们信仰的神圣创始人深表感激，在那段人心浮动的岁月里，在恐慌和不安中，在人类命运的危急关头，祂慷慨地赋予追随者以力量，让他们完成为实现阿博都-巴哈的宏伟设想而制定的十年计划；回顾并庆祝那围绕世界的远征其历次战役中迅速取得的辉煌胜利；思考取得最终圆满胜利的途径与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大力推动个体的皈依，这个伟大目标是神圣计划所有成果的基础，并完成欧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三座灵曦堂母堂的修建工作。”

守基·阿芬第告诉我们："环绕全球的远征在启动之后，取得了辉煌的进步……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执行者的成就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超过了……'英雄时代'……结束以来的任何集体运动……"他满心欢喜地重述了这些成绩，列举历次胜利，称它们是"非凡的进步，其波及范围如此之广，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而且只是依靠那么少的英勇人物"。

也是在这条信息中，圣护任命了最后一批圣辅，又有八人加入了这个"庄严的机构"。这样以来，"快速发展的世界教务管理秩序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总数增加到了二十七人。鉴于他们新近承担起了"保护信仰"的"神圣责任"，圣护做出了这一安排，而此举意味着要成立一个新的辅助团，其成员数量和之前的委员会相同，它将"受命照管信仰的安全，这是它的具体义务"。守基·阿芬第选定了五位圣辅在世界中心工作，这五人将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参加五次洲际会议。其中两名将为坎帕拉和悉尼在建的灵曦堂母堂带去"一捧巴哈欧拉陵殿深处的圣土"，撒在灵曦堂的地基上；另一捧圣土会送到法兰克福的德国和奥地利总灵理会，并在适当的时候，撒在欧洲第一座灵曦堂的地基上。巴哈欧拉的肖像复本和一缕宝贵的头发不仅出现在了欧洲、澳大利亚和非洲大会的与会者面前，圣护还将其作为爱的礼物，永久存放在了灵曦堂所建地的总灵理会。圣护派遣了一名圣辅参加了亚洲会议，同时也带去了巴哈欧拉肖像的另一份复本，供与会者观瞻，但复本最后还是要带回圣地保管。在即将召开的芝加哥代表大会上，守基·阿芬第的代表还会展示巴哈欧拉与巴孛的肖像，这两件物品一直都是由美国总灵理会代管。这是圣护对信徒表达的最后一份关爱，他一直照看着这些虔诚的信徒，他们则紧紧跟随着他，经历了无数创造历史的岁月。

1958年，成千上万的巴哈伊从各地赶来，参加了这五次大型洲际会议，实现了守基·阿芬第的设想与心愿。在这五次会议上，他们瞻仰了信仰奠基人的神圣肖像，他们充满敬意，同时又悲痛欲绝，泪流满面。他们扑倒在祂的荣耀前，拥护祂的教义，他们一直注视着祂深邃、全知的双眼，为何祂决定将祂的子嗣从他们身边带走呢？他们不仅仅因圣护而呼喊，他们还问，圣护体制在哪里？这

是对信仰的至高考验。上帝给予的，上帝也已拿去，“祂依自己的意愿行事，祂的选择无人可质疑”。当巴孛殉道后，巴哈欧拉留了下来；当巴哈欧拉升天后，阿博都-巴哈留了下来；当阿博都-巴哈离世后，守基·阿芬第留了下来。但是现在，他们仿佛列王（尽管他们的地位有巨大的差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我们巴哈伊看着那扇门，如同在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孩子一样，不停地问：那扇门为什么要关上啊？

也许，只有在守基·阿芬第去世后的那一年，巴哈伊们与信仰之间的纽带之深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他们在悲恸面前低下了头，但并没有倒下。如果不是圣护提供了这五次伟大的机会，让如此多的信徒汇聚一堂，相互安慰，接受圣辅（他们要挺身完成圣护的计划，保证天佑的世界正义院的选举得以进行）的指引，否则敬爱领袖突然而毫无预兆的去世，会给信仰带来难以想象的影响。事实上，朋友们都在积极参与计划；整个巴哈伊世界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它的中期；在这几次大会中，五个议题受到了特别关注；圣辅一直都在向他们传达爱、信念和勇气的信息——这一切都使得世界上的巴哈伊紧紧团结在一起。在经历了悲伤洪流的洗涤之后，这场灾变本身给他们内心注入了新的勇气，唤起了更深沉的爱。他们不会辜负守基·阿芬第。他曾告诉他们，要想出保证计划胜利完成的方法与途径——是的，他们会做到的，他们保证会在1963年用胜利为之加冕。试想，圣护一定会为之心花怒放，而他们也一定会倍加珍惜他发来的连连赞美与感激。

再没有什么比胜利完成圣护的世界远征更能彰显圣道的真理和强大了。这项使命的开始格外困难。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风餐露宿，做出了比以往更大的牺牲，没有他的领导，没有他的号召，没有他的公告，没有他电文中的生花之笔，没有这位敬爱的船长掌舵并将他们送到胜利安全的彼岸，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巴哈伊做到了，这几乎是个奇迹，这不仅证明了他的雄才大略，还印证了教长所说的话：“圣道自有神力，远远超过人与天使之理解。”

生存和死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如同心脏的起伏，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死亡对我们来说从来不是真切的，因此谁又会预料到

守基·阿芬第的去世！他去年夏天身体一直很好，甚至比以前更为健康，不仅他自己这么说，他的医生也在他去世几周前做检查时做出了同样的诊断。没有人会想到，他心脏中的时钟正临近停摆的时刻。人们经常问我，是否留意到任何表明他来日不多的迹象。我总是迟疑地回答“没有”。如果万里晴空突然变为狂风暴雨，事后，人们才会去想象曾看见风中飞扬的稻草，并假设它们是不祥之兆。我记得有些情况是有某种意义的，但当时我并没有多想。如果我事先对圣护的离世有哪怕一点的预感，我也根本挺不到今日，我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他，不能放弃他宝贵的工作，正是他的工作让他的生命突然结束，远远早于人们的预料。

十年计划中有一项任务和世界中心有关，圣护分配给了自己来完成，即“将巴哈伊天启的母经——《亚格达斯经》中的律法和条例编纂成典”。守基·阿芬第说，这本书，加上《阿博都-巴哈遗嘱》，是“存放神圣文明之无价宝藏的宝库，巴哈伊信仰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这一文明”，如此重要的工作当然只能由信仰的领袖来完成。1957年春，守基·阿芬第为此工作了三周左右，随后离开了海法。他工作时，我经常也坐在书房里，听他大声地朗读，看他做笔记。我从他的话中得知，他当时不打算将《亚格达斯经》中的条款直接编为法典，而是按照一个个主题对其进行编辑，这样，巴哈伊就能很容易地理解巴哈欧拉给追随者写下的律令的本质。当时，守基·阿芬第不止一次地透露，他觉得自己可能完不成这项任务了。我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有时会被日益繁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并将其归咎于在房间里日以继夜后的劳累困顿。他去世后，我才想起这些，感叹万分。

在最后的那个夏天，他重游了很多他最喜欢的山林景色，后来我也想过此事，但当时看到他很高兴，我也很欣喜，暂时忘记了他生命中的负担和悲伤。

在11月返回海法之前，守基·阿芬第前往伦敦去添购一些物品，用来装饰已落成的文物馆，并准备在回来后，将之前参加过展览，后又被存放在那六个房间里的珍贵历史资料转移过去。当我们在伦敦时，亚洲大流感正在欧洲肆虐，我们都病倒了。我们有一

位很好的医生，圣护很喜欢他，也很信任他。圣护的病情并不严重，尽管他发了几天高烧。医生坚持让他待在伦敦，直到他的体温能在一周内保持正常。圣护同意了这个安排。虽然发着烧，他还是坚持在床上阅读，处理信件和电报。疾病没有让他倒下，尽管他十分虚弱，几乎毫无胃口。感染流感的一周后，他还忙于他最后一张精美的地图，他称其为“十年远征中期”地图。他要我在他的房间里摆上一张大桌子，用来放地图，他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和我一起查阅各种数字和资料，与他做的笔记（上面记着世界范围内远征的发展形势）进行核对。我苦心劝他不要在虚弱的时候长时间站着工作，求他休息几天，等身体好一些了再说，他却回答：“不，我必须把它做完，它让我心神不宁。除了核对，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了。我还有一两个名字要加上去，我在这封信里看到的，今天我一定要做完。”工作时，他重复着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反复听到的话：“这工作快让我受不了了！我怎么样才能继续下去？我应该停下来。太多了。看看我记下来了多少地方。看看我要多么准确！”当工作终于完成时，他又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房间，坐在床上读报告。每天，来自巴哈伊世界各地的资料多如牛毛，他若不每天花几个小时查看，很快就会跟不上外界的脚步。

但是，他生命中的压力和负担太多了，11月4日清晨，他突发冠状动脉血栓症。死亡来得很轻、很突然，他临终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升入另一个世界。当我在早上进到房间里问安时，并没有察觉他已经去世。他半睁着眼，眼神里没有痛苦、警觉或者惊讶。他躺在那里，仿佛已经醒来，正气定神闲地若有所思。当他突闻外祖父过世的消息时，他是多么悲痛！现在他被轻快地叫走了，去与祂团聚。这次，他将悲痛和惊愕留给了他人。

在我看来，在那个黑暗可怕的日子里，即便我异常痛苦，我也不愿让其他巴哈伊遭受我所受到的打击。我能就这样告诉信徒们，说他们的圣护已经升天了吗？对那些年老体弱的人来说，这种打击对他们不正是釜底抽薪，如同我母亲和守基·阿芬第听闻教长离世的时候一样吗？正因为如此，我才立刻发出电报，这样告诉海法的国际巴哈伊委员会：“挚爱圣护染亚洲流感，病情严重，告勒罗伊

通知所有总灵理会，让信徒祈祷信仰的神圣保佑。”我知道几个小时以后，我不得不再发一条电报，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但我必须先把第一条发出去，希望能缓冲一下这可怕的打击。当天晚些时候，我再次致电海法，给出了与他去世有关的所有细节，再由海法通知所有的总灵理会。我觉得，这一消息应该由信仰的世界中心首次发布，电报内容如下：

> 教长赐予信徒们的神圣信托、万千心灵挚爱的守基·阿芬第身染亚洲流感，突发心脏病，于夜晚去世。请信徒务必精诚团结于圣护新近培养、巩固及强调的圣辅机构周围。圣护为圣道的服务牺牲了自我，唯有一心一意，方能证明所有总灵理会与信徒对他的忠诚。
>
> 鲁希叶

第二天，也就是11月5日，我又将一封电报发往所有的总灵理会，这一次是直接从伦敦发出的，内容如下：

> 万千心灵挚爱、上帝圣道之珍贵圣护患亚洲流感，于昨日去世。请圣辅、总灵理会、辅助团协助信徒，克服这场悲恸的至高考验。挚爱圣护的葬礼将于周六在伦敦举行。圣辅以及灵理会和辅助团成员受邀参加。任何新闻稿都应声明圣辅将进行会晤，稍后海法将就未来计划通知巴哈伊世界。请于周六举行悼念集会。
>
> 鲁希叶

这条消息给全世界信徒带来了无尽的悲伤，三十六年前，教长去世得一样突然，一样让人心碎，悲痛同样淹没了信徒。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同样令人担忧。根据《亚格达斯经》的律法（守基·阿芬第被指定为该律法的保卫者），葬礼地点离死亡地点最多只能相隔一个小时的路程，我知道我们绝无可能违背律法，将遗体送到圣地。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后，万众敬爱者的遗体被安葬在了伦敦附近的一所公墓里，那个地方宁静美丽，种满青松，鸟语花香。葬礼在11月9日周六上午十点半举行。整个巴哈伊世界都奔向伦敦。电报、

电话和信徒涌进了国家哈齐拉图-古兹，将悲爱交织的感情汇聚成一片汹涌的海洋，围绕着那个平和安静的人，那个终于卸下了所有担子的人。

发出这则令人惊愕的消息后，第一批响应的正是我的同僚——信仰的圣辅。当我在房间里发现守基·阿芬第去世后，我立刻向居住在伦敦的哈桑·巴柳齐（Hasan Balyuzi）求助。他很快就赶来了，随后来的还有约翰·费拉比（John Ferraby），他也住在伦敦。当晚，乌戈·贾凯里（Ugo Giachery）从罗马赶来，次日，米莉·科林斯（Milly Collins）也从海法来到我身边，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总能在我身边。阿德尔贝特·米尔施勒格尔圣辅正好也是位医生，在电话里，我问他能否来为圣护神圣的遗体做清洁工作，他便和赫尔曼·格罗斯曼一同从德国赶来。这些圣辅同仁分担了我的压力，确保每件事都尽可能地表现出信徒心中强烈的尊敬、感激和爱戴。后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圣辅从各个大陆赶来，给我、信徒以及他们彼此都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在守基·阿芬第葬礼的前夜，我们圣辅商讨了葬礼事宜，这次商讨也成了以后许多会议的先声，就在随后的岁月里，守基·阿芬第的远征佳音不断，直到赢得他所期望和计划的最辉煌的胜利。

最后告别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几百名信徒乘坐六十多辆汽车，整个送葬行列跟着圣护的灵柩，缓缓地朝北伦敦大公墓行进。当他们抵达时，已经有一大群信徒在那里等待多时，几乎整个英国社团都来到了伦敦，向圣护神圣的遗体致敬，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上帝将他托付给了他们祖国的土地。第一辆是载满鲜花的灵车，之后就是载着守基·阿芬第灵柩的灵车；这时人群一片肃静，额头低垂，很多人脸上淌满了泪水。葬礼仪式在简朴而庄严的非教派墓地教堂举行，因为太小，不是每个信徒都能进去。在几个月后发表的《守基·阿芬第的去世》一文中，我真切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伟大的圣护被抬了进来，放到了铺着绿色台布的灵柩台上。大堂里水泄不通，还有很多人不得不站在外面。这时，人们用阿拉伯语唱起了由巴哈欧拉为逝者指定的美妙祷文。六段其他的祷文和教义片段由朋友们用动人的语调朗诵，有的用英语，有的用波斯语，他

们代表了欧洲、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巴哈伊，代表了非洲人、犹太人和雅利安人。

“灵柩被抬起，再次放上灵车，朋友们排着肃穆的队列跟在后面，缓缓地向几百码外的墓地走去。

“当所有人等待灵柩放下坟墓的时候，鲁希叶·哈努姆感到四周的悲痛之情与她的悲伤绞在了一起。他是他们的圣护。他永远地从他们身边走了，不可更改的上帝之令突然将他从他们身边夺走，无人敢质疑祂的意志。他们还没见到他，还没来得及接近他。她决定让人宣布，在棺木下葬之前，朋友们可以走上前来，致以敬意。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东西方的信徒鱼贯走上前去。大多数人跪下亲吻了灵柩的边缘或把手。诚然，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交织着爱和悲痛的时刻。孩童在母亲身边，垂下他们小小的额头，老人流着泪，盎格鲁撒克逊人固有的冷峻矜持——那种永不公开表露感情的传统——在内心强烈的悲伤中融化了。那个清晨阳光明媚，天气宜人；现在却洒下了一阵细雨，落在棺木之上，好像大自然也突然感动得流下眼泪。有些人将小瓶波斯玫瑰精油放在了棺木前部，还有个人迟疑地将一朵红玫瑰放在了上面，这朵花无疑代表了他的心；有人不愿意看到雨滴落在那张神圣的、被棺木遮盖的脸上，在跪下的时候小心地将雨水拭掉；还有人颤抖着带走一小撮灵柩边的泥土。在他们‘真正的兄弟’面前，泪水、亲吻以及庄严的内心誓言倾泻而至。当最后一个悲痛万分的信徒退下后，鲁希叶·哈努姆来到灵柩前，亲吻棺木，跪下祈祷了一小会儿。然后，她铺开绿色的棺罩，放上从巴哈欧拉陵殿最深处拿来的蓝金色织锦，撒上仍然清香的茉莉花瓣。随后，‘双涌之洋中闪耀着的最奇妙、最独特、最无价的珍珠’（阿博都-巴哈语）——圣护——的遗体被缓缓放入墓穴，墓壁四面铺满了冬青的枝丫，长满了花朵。灵柩最后安放在了从巴吉陵殿拿来的毯子上。”

带着崇敬，怀着悲痛，巴哈伊将阿博都-巴哈外孙的神圣遗体安然下葬。

整个葬礼过程中，他的灵柩上一直放着一大束红白相间的鲜花，这是我特意订制的，这个芬芳之盾护卫着他的遗体，我在上面

放了一张卡片，我想卡片上的文字能够表达我们这些幸运之人的感受：“鲁希叶和所有你珍爱的人以及全世界爱你、因你心碎的人献上。”当墓穴关闭后，这个花束就铺在了上面，巴哈伊从世界各地带来或者订来了成千上万朵花，它们像一个五彩的海洋，轻轻冲打着坟墓，将墓地四周包裹在一片清香之中。

葬礼结束后，巴哈伊世界得到了一则通知，信徒被要求举行合适的悼念集会：

> 隆重葬礼之后，敬爱的圣护按《亚格达斯经》律法葬在了伦敦一处绝美之地，东西二十五国信徒前来悼念。医生确认是突然离世，并无痛苦，天佑面容表现出无限的美丽、安详与威严。参加葬礼的十八位圣辅敦促总灵理会让所有信徒于11月18日举行仪式，纪念神圣指引之黎明，在三十六年之后，他为我们留下的是至高牺牲、不停劳作和持续警惕。
>
> 鲁希叶

1958年，人们用炫目的白色卡拉拉大理石（正是他在海法为自己卓越的亲属修建纪念碑时所选的石料）对坟墓进行了修缮。这块墓地就像他希望的那样简洁。一根大理石柱子，顶部有科林斯式柱头，上面是一个地球仪，非洲的地图冲着前方——在他最后一年的生命里，不正是非洲取得的胜利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吗？地球仪之上是一只镀金的雄鹰铜像，是他曾非常喜欢的一尊日本鹰雕的复制品，原件就放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他曾率领着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不停地征服世界五大洲的土地，对他的安息地而言，没有比这个胜利的象征更好的标志了。

守基·阿芬第以金石般的刚毅面对每次考验，完成了“确立模式、打下基础、建立机制、启动教务管理体制的艰巨任务”（圣护本人语）；他通过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实现了上帝之圣道的世界性传播与建立；他把勇敢和清醒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并凭借这种非凡的精神，将巴哈欧拉的信仰带上了从未有过的新高度；他穷尽一生的精力，不断推进主托付给他的工作，直到倒下；在整个使命周期中，他身负无数攻击留下的伤疤。他从工作的舞台上离开

了。他被“悲伤和一丝奇特的希望召入了安静之中”。教长在遗嘱中将圣护称为“终点圣树的初始之枝”，通过这份遗嘱中的条款，在阿博都-巴哈去世后，他深深地扎根在信徒内心的土壤之中，直到永远；毋庸置疑，“凡寻求他那保护全人类之庇荫者，必得福佑。”

译自巴哈伊世界中心2000年英文版

无价的珍珠
The Priceless Pearl

鲁希叶·拉巴尼　著
史文韬　　译
北京审阅小组　　审阅

责任编辑：高　芸　赵会亮
编　　辑：张玉明　段　娟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